革命历史资料丛书




# 回忆闽浙皖赣苏区

**革命历史资料丛书**

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增订本）

井冈山的武装割据（修订本）

回忆中央苏区

红一方面军史略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中、下）

湘赣革命根据地斗争史

回忆闽浙皖赣苏区

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革命历史资料丛书

# 回忆闽浙皖赣苏区

方志敏 邵式平 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南昌

本书分为上、下编两部分。上编中各文(除《闽浙皖赣(赣东北)党史》及《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经过的报告》外)曾在我社1981年10月出版的《回忆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中刊载过(原书中的《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系节录)。下编中各文均系有关单位访问闽浙皖赣苏区革命斗争参与者的记录稿(其中的《皖浙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概况》曾在《回忆闽皖赣的革命斗争》一书中发表),在此都是第一次发表。在发表前,由中共江西上饶地委宣传部组织人员进行了少许技术性修改,余皆一切照原记录稿排印。



# 目　　录

## 上　编



## 下　编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 上　编

# 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

方　志　敏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九日）

## 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1]

## 第　二　章

### 第一节　弋阳九区是暴动的发源地

中国自被帝国主义侵入后，就象一个人的身体被肺痨菌侵入一样，一天一天地精枯血衰，瘦弱下来。到现在痨病已进入了三期，血肉俱竭，只剩下一把瘦骨，日益迫近死期了。国民党所宣传的什么公路建设，都市建设，不过是肺痨病者脸颊上所泛起的血潮而已，表面上好象好看，实在是更快要死亡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必须找到本地的帮手，就象强盗要抢劫人家，贼儿要偷取人家的东西，必须找到坐地的线眼一样。帮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好的帮手，那就是中国的封建军阀、官僚、豪绅地主买办阶级，他们替帝国主义强盗们作经理，把货物运销到中国各地，又从中国各地收买各种原料供给帝国主义，这□□□□□[2]义的嘴□吸取一点漏出来残唾。他们是帝国主义的爪牙□□□保镖人，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布满全国的吸血管。中国工农劳苦群众的血液就被无数的吸管吸收

① 《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序言及第一章，已在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编的《方志敏狱中遗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一书中发表。

② □此符号代表原稿中此处缺一个字。（下同）

了去，转输于帝国主义便便的腹中。因此，帝国主义要资助保护中国的封建势力以作侵略工具。最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与封建势力一起，投入于帝国主义的怀中结成三位一体，共同来榨取中国工农群众了。

在帝国主义无孔不入地侵略下，在军阀官僚贪婪的搜刮下，在豪绅地主资本家无厌的剥削下，就造成中国农村大破产，无数千万农村中的工农群众，穷得一场精光！一般手工业者的工资极为低下。贫农雇农都是没有或缺乏田地，向地主、富农租田租地来种，结果只是白费气力，亏本赔钱，他们因穷而借债，借债使他们更穷，他们还要交纳刮民党的七捐八税。加上连年不断的水、旱灾荒，更加不能生活，于是树皮、草根、观音土，都成了救饥的粮食。饿死冻死病死的，一来就是几百万人！就是各国前期的农奴，也比中国农民的生活要较好些，要有保障些，中国工农的生命真象树叶子一样，轻死一个人就象一皮树叶子从树上落下地来，再也引不起谁的注意。有一位先生自恃聪明，作了一篇特创的反俭朴论，文中曾说：“一个乡下人的俭朴，西洋人不但没有看见过，也决梦想不到。孙子身上的棉袄，是祖父娶祖母时缝的。祖母赔嫁的被窝，仍旧铺在孙媳妇的床上，里面的棉絮，就象一块烧焦了的木板。还有老鼠咬坏了的木床，更不知是那一代传下来的。二百年前盖的木架房子，东撑西补……”（这位先生说这是农民的故意俭朴，阻障物质的进步，应予以反对。但我却很奇怪这位先生竟会这样愚蠢，不知道“乡下人”的如此“俭朴”完全是他们赤贫化的结果！）除了这位先生所写的而外，“乡下人”还有许多“俭朴”：一块小猪油，可以涂几十回的锅，（在锅内涂一个圈就铲上来，即放菜下去）整年不见肉面；不买盐而吃淡菜；热天不穿衣服，宁愿让太阳晒脱一身的皮；晚上不点灯，宁愿黑摸，生病不吃药，宁愿病死；荒年就吃树皮、草根、观音土。租和债逼紧时，就出卖儿子老婆，或吊颈投水而死。这样“俭朴”，这样轻生，大概那位先生更加要皱眉吧？！是的，中国工农群众，早也起来反对过分“俭朴”和轻生了。他们在共

产党指导之下，逐渐觉悟起来，他们要求过较好的生活，要求不饿不冻，要求不吃树皮、草根、观音土；要求不出卖儿子老婆；要求不吊颈投水，总之，他们要求生存，要求不轻易死掉。要达到这个要求，就要革命，要革掉豪绅地主高利贷者的命，把他们占有的土地没收过来，实行平均分配，把高利贷者的债务取消，不再受重利的剥削，不再交捐税给刮民党。因此，就要求实行武装暴动，就要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和自己的工农红军。以保护从武装暴动夺过来的利益。

弋阳九区的工农群众，在革命前受到的压迫和剥削的生活的痛苦，正如上述，心里所怀的愤恨和不满，急待发泄！在第一次大革命时代，北伐军到江西后，就起来组织农民协会，纷纷捕捉平素为他们所切齿痛恨的土豪劣绅，多数罚款，少数并处死了。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九区首先遭到反革命军队的进攻。在这一次进攻，工农群众集合了三千余人，用土枪土炮，配合一连哗变来的军队作战。因无健全的领导，以致被敌攻入，烧去了三十余村的房屋。加上一个农民领袖——方远杰同志，又因试放土炮，装硝过多，炮管炸裂，受伤而死，运动曾有一时的沉寂；但革命的怒火，仍在各人心里燃烧着。以后，我由吉安潜回九区，又恢复工作，重起运动，接着又遭大劣绅张大纲引兵进攻，又烧去了几村房屋，后张大纲所勾来之兵退走，群众立集三四千人反攻，将张劣绅及其爪牙驱走。经过几个月的组织宣传工作，有五十余村的农民革命团成立了，虽未成立苏维埃，但他们实际的统治了乡村。在暴动中他们获得了自己所需要的，解决了急要解决的问题。从此就遭受了白军长期的进攻和蹂躏，七十一村的房屋，被烧去了六十八村，有的全烧，有的烧去十分之八九，有的烧过四五次的，只剩三村未烧。被群众驱走的豪绅地主，一旦挟兵回来，群众又躲避不见而反来抗战，乃施用烧杀淫抢手段，以作报复。在共产党顽强不屈的领导之下，敌人愈残暴，斗争愈激烈，到底群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白军虽用四十倍的兵力，进据九区各村，搜山捉人，不间一天，然而终无效果。

白军士兵又有部分哗变，卒至败逃。有领导有组织，顽强斗争的群众，好象一座焰红红的火炉，任何反革命的东西投进去，终被融毁！就是目前敌人筑碉进占九区，我可以预断，这些碉堡，在群众不断的打击之下，仍将归于消灭无踪。

## 第二节　一九二七年横峰的年关暴动

在二十五天极短期的准备下，接着弋阳九区暴动之后，横峰来了一个六七万人的年关大暴动！横峰工农群众在革命前生活的穷苦无告，不弱于别地，一听到共产党的煽动，立即秘密组织武装的农民革命团。一声号令，六七万有组织的武装群众，一致起来捕捉豪绅地主，抢借字，抢田契，杀猪起伙食，整顿队伍准备与敌军对阵，同时出发各未革命区域打土豪，十分威风。在工农群众未团结之前，豪绅地主吸血虫们，个个都象老虎，谁也不敢在他们老虎头上拣饭生；在群众团结起来之后，他们就闻风生怕，不敢照前横行，等到群众暴动起来，他们就由老虎变成了小鼠，捉到的叩头乞怜；未捉到的不顾命地逃窜一空！谁说我们无力？谁说他们的统治牢不可破？谁说少数人应该永久统治多数人？只要我们觉醒起来，团结起来无畏惧的(毫用不着畏惧)斗争起来，我们一动手就可以把他们从高高的宝座上拉滚下来。从前我们的头踏在他们脚下；现在我们的脚也要踏在他们头上！从前求他们让一角一分的利钱不肯，现在却驯服地捧出借字来作废；从前求他们让一升一合的租谷不肯，现在把他们占有的土地夺过来，烧契分田！从前他们管事，现在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世界是我们创造的，虽被他们霸占住，这要看我们知不知道敢不敢伸手去夺。如果我们都知道而且都敢一齐伸出手来去夺，谁还有力量拦阻着不交还我们！横峰的年关暴动，使群众十分清楚地认识：谁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应用什么方法去打倒它？打倒它之后立刻就会获到何种利益。

横峰的群众暴动，因无主力红军作斗争骨干（当时只有二十余杆枪，未成军队），只经过三个多月就被敌人暂时镇压下去，但不久

又起来斗争，终成为赣东北苏维埃可靠的根据地。

### 第三节　一九二八年——极端艰苦斗争之年

敌人知道苏维埃是危害他们统治最可怕的敌人，故在一九二八年三月份，就开始对我们残酷的进攻！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小游击队，枪三十余枝，（添买了十余枝枪）战斗力极弱，敌人却有一个足团，（枪一千二百余枝，近四十倍的兵力）来进占我们横直只有七八十里的根据地。所有的重要一点的村坊，都被扎了敌人。这一年的环境，是十分险恶艰苦的。在这年内，我们没有走过大路，只走山僻小路；没有住过房屋，只住在山巅岩下的小茅篷。一面是我们的坚持领导，一面是敌人定期的军阀混战，每进攻二三个月，就开走了，给了我们一点喘息的时间，以便我们整顿队伍，作第二次的迎战。敌人一面惧怕我们的发展，一面又藐视我们，认为不值一击。每次进攻，敌人总是怀着狂妄的心思，以为一下就可以消灭我们。但每次都遭到我们有力的抵抗和打击，粉碎他的阴谋企图。在这年年终，有一连和一排白军哗变过来，这不仅使他们从革命区内溃逃出去，并增长了我们的军事力量不小，同时，德兴有三十余村的群众暴动，增加了几十里区域。

在这年的三月，虽开了群众大会，成立苏维埃，但实无一点工作，斗争的领导，全由党直接当任。

### 第四节　一九二九年——开始新的发展之年

在一九二九年的上年，敌人仍猛烈进攻。群众因经过一九二八年长期的斗争，斗争经验加多了。红军又因添加一连一排白军的武器和战斗员，战斗力有极大的增强。同时，弋阳贵溪的秘密工作，有大的发展，敌人经半年筹备而来的砍树运动，遭我们击破后，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威信，大大的提高，国民党县政府，在群众眼目中看来，不但可厌，而且无用。在秋收时节，首先，贵溪发动七万余人的秋收暴动。接着弋阳八万人的暴动也起来了。在两三个月间突

然扩大了三倍以上的苏维埃领土。到了年终，又爆发了万年、余江的年关暴动。横峰苏区，向外发展不小，上饶也有百余村的群众起来斗争了。德兴苏区也扩大了一倍以上。各地的秘密工作，也在发展着。

我们的红军，继续打了好些胜仗。尤以贵溪周坊之战，消灭了敌军一个整连，第一次夺获了敌人一架重机关枪。大家都很快乐，军委会主席邵式平同志，看到送机关枪来，乐得在地上打滚。在周坊胜利之前，曾攻下横峰城，把横峰县衙门的官吏吓得连爬带滚地逃走。红军由三连发展到六连。各县还成立了小的游击队。

我们开始筹备召集第一次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准备成立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

### 第五节　一九三〇年——大发展之年

一九三〇年一月初，我们召集第一次全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代表三百余人，庄严热烈，可称空前。此会选举了苏维埃委员，正式成立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从此，我们对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建立起政权的领导了。

因蒋阎冯在津浦线上大混战，抽调了一部分对我们的兵力。剩下来的军队，数近一师，然区域太宽，不敷分配，形成各方面的空虚。我们的红军独立团，又严加整顿训练，迭次胜利，士气极高，战斗力较前大为增强！自"五五"乐平秧坂战争胜利后，兵力所指，无不奏捷。先后攻克上饶、河口、弋阳、余江、乐平、德兴、景德镇、鄱阳、秋浦、彭泽等城市。七月中即成立红十军。苏区的发展，横直达五六百里，人口约一百万。可惜当时执行立三路线的领导，又因斗争经验不足，以致对于分配土地，开展群众的阶级斗争，锻炼加强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与工人群众武装斗争的准备等工作都做得十分不够。新苏区的巩固程度是薄弱的。自蒋介石深感全国苏维埃和红军的威胁，迅速结束自己内部的军阀战争，用全力来对付新兴的革命势力后，我们又受到十倍以上的敌军的进攻。烧杀淫

抢。备极凶残，新苏区亦失去许多，老苏区因群众基础坚强，虽受尽白军蹂躏，仍能支持。此年环境极顺利，若能得正确有力的领导，红军的胜利与新苏区的发展巩固，必有更可观的成绩。

在八月一日，我们曾开了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江西东北特区革命委员会，这是依照立三路线的指示做的。

## 第六节　一九三一年——发展了闽北苏区

在这一年内，中央红军，接连击破敌一二三□□大举进攻□□□□□□消灭了一部分，其余的驱逐□□□利是大大落后于中央区了。主要的原因，还是军事领导不强和右倾，缺乏战争计划。故未能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一个领导国内战争的党，如果它的军事知识，组织和领导战争的艺术，战略战术的了解和运用，有欠缺不够者，它的胜利自然是要落后的。

在五月初，我红十军渡信河而南，第一次出征闽北。这一次战绩极佳，消灭了许多敌人，将闽北苏区从危急中巩固起来，并奠定了它以后向前发展的基础。闽北红军，亦因红十军的独立营留下作它的骨干，很多成为可畏的红军。

三一八开赣东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赣东北省苏维埃□□□□□□□□□□□□□□□□□□□□□十月革命纪念节，又□□□大会同时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许多重要决议。检阅过去工作的错误，指出今后工作的方针，并□□□□了领导机关。

## 第七节　一九三二年与一九三三年

这两年间，因为党的领导，犯了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故苏区没有多大发展，且缩小了一部分；红军的胜利，也极不够，应记载之事，计有下列各项：

（1）开展了肃清地主残余，反对富农的斗争，依照阶级斗争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检举党及群众机关中异己阶级的分子。

（2）开展了肃反斗争，将隐藏在红军和苏区的反革命组织破获了，保证红军和苏区进一步的巩固。这次肃反，当然免不了有错误的地方。如肃反中心论，肃反工作的扩大化和简单化，造成群众间一时的恐惧现象，后来也就纠正了。

（3）接着肃反胜利之后，红十军第二次出征闽北，大大地巩固与扩大了闽北苏区。

（4）红十军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间南渡，与中央红军集中行动，牵制了敌之三个师，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取得宜黄的绝大胜利，将敌人四次围剿，最后的予以粉碎。

（5）红十军南渡后，我们就开始创造新红十军的努力，经过半年来的战斗，坚强的新红十军建立了。

（6）余贵的南岸与金资各县，开始了游击战争，后转成了暴动。因群众的组织教育工作，都没有切实认真去做，工作人员过分估计了斗争形势，致一个小区域的暴动，遭敌镇压而失败。

（7）苏区工会工作的改善，建立起真正的群众的阶级工会，提高了工人阶级在革命战争中的领导地位□□□□□。

（8）苏维埃各部工作的建立□□□□□□□□□□□□□□□□□□□□争的同时并进，苏维埃在群□□□□提高了。

## 第八节　一九三四年——五次战争之年

一九三四年，为五次战争残酷决战之年，以战争动员的广泛和深入的程度而言，以战争的持久和激烈而言，以双方兵员伤亡数之众多而言（敌之伤亡，较我多十倍以上，多数为五百队群众的地雷队用地雷打死打□□都比较从前战争为大。我们苏区根据地，虽被敌筑碉前进，造成许多封锁线，遭受白军野兽般的践踏和摧残，但他们所付的代价是不小的。我们□□□□□□□□□□□□□！这一年战争，全苏区的□□□红军和工农群众，都无□于受了一次军事大学的教育，许多新的战争经验，是学会了。

因为执行中央一九三三年七月反保守主义的指示信，皖赣、皖

南、浙西的游击战争胜利地开展起来了。并创造了新苏区，这使那一带豪绅地主资本家们，不能安心地收租逼债，榨取工农的血汗，就是浙皖两省的法西斯蒂的"当局"，在陪着他们的姨太太睡觉时，也要三夕三惊，深感不安呢！

目前，赣东北苏区，虽被敌筑了五六千个碉堡占据着，但这些碉堡都不能一日无兵，只要早晨离开了守兵，中午或晚上，那个碉堡就会被群众挖倒下来！现在还限制了敌人四个师，不能抽动，我相信久经战斗的赣东北党，它是会领导红军和那"战斗只剩我一个人，还是要战斗的"群众，将敌人全部消灭，将碉堡全部拆毁，而恢复原有的苏区。做到这些，并不在很远的将来。

# 闽浙皖赣（赣东北）党史

邵式平　汪金祥　胡德兰等

## 前　言

闽浙皖赣（赣东北）的党，自产生后，即参加了大革命，领导了闽浙皖赣轰轰烈烈的苏维埃红军运动，经过了三年艰苦困难的游击战争，然后走向了抗日战场，成为新四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宝贵的经验和血的教训是很多的，但由于现在延安的同志不多，其离开赣东北时间前后不同，且无任何成文材料作参考，我们这一文件，只凭邵式平、汪金祥、胡德兰、徐连娇、缪敏、毛彪、聂显书、陈禅元、范式人、张捷勋、林辉山、刘先、许威、江天辉等同志的回忆，经过几次座谈写成的，挂一漏万，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记者及同志们予以补充、指正，在文字和抄写上得了杨超与钟永骥二同志极大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一九四五年三月写于延安

## 第一、闽浙皖赣（赣东北）共产党的产生和参加大革命（自开始至二七年八月）

### 一、闽浙皖赣的社会特点

闽浙皖赣地区，位在几省交界，山多地偏，经济落后，政治复杂，特别是接近第一次大革命的前几年，社会经济政治起着迅速而剧烈的变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个地区还是自然经济的封建社会。农村是人人穿土布，家家有纺车，城市还是土产品相交换的市场。当时封建势力、地主、士绅、官吏，统治着农村和城市。大战开始后，情形大变。农民成为小商品生产者，在城市洋货洋东西越是大量的输进来，米、棉、麻、丝、茶等原料越是大量的输出去，城市越成为土产品与洋货的交换市场。政治上变为以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北洋军阀统治，普遍深入，所有城乡的统治机关，连一个极小的警察派出所，都为北洋军阀官吏所占据。兼商人及高利贷的封建地主士绅又与之结为一体。苛捐杂税，无奇不有，贪污腐化，无恶不作，横行霸道，如狼似虎。因此，大大地尖锐化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封建地主与广大人民的矛盾，特别是尖锐化了广大人民与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

在这样的情形下，加速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工人的失业，农民的破产。于是农村骚动，械斗之风甚炽，打官吏，抗捐粮，闹"赊帐"，土匪蜂起，闹"红枪会"，谣传"真命天子"起义等等事情，层出不穷。

闽浙皖赣社会的这一变化，是中国社会将近百年的变化，缩短成为数年的变化，因此是迅速而剧烈的，这一变化的时间，又正值大革命的前夜，这就造成了闽浙皖赣社会的改革根源。

## 二、共产主义与闽浙皖赣群众的相结合——共产党的产生

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经济变化，文化方面也逐渐开明起来，以前一般人认为读洋书，学洋务究非正路，现在也认为读洋书有用了。富农、中农、中小商人与小业主们的子弟，到洋学堂去读书，逐渐多起来了。"五四"运动震动全国，影响所及，闽浙皖赣的一些城市也激动起来，特别是那些学生们，愤激异常，整队游行，高呼"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口号，这时方志敏同志是弋阳高小学生，成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五四"之后，外出到省城、上海、北平求学的学生逐年俱增，大城市的革命运动与革命

思想，经过这些学生不断传播到地方，引起了地方上新旧学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革命思想与反革命思想之争。这些学生中，许多先进分子在外接受了共产主义，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如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经过他们，共产主义思想传到地方学生群众中，而地方学生又传播到农村，共产主义便与闽浙皖赣广大革命群众开始相结合。

方志敏同志于1922年到上海，加入共产党，23年便与赵醒农等同志回江西。创造江西的党，他团结了一部分青年在团的周围，组织江西改造社、出版《新江西》宣传革命，汪群、黄道、袁孟冰同志这时均为该社社员，1925年方志敏同志回弋阳，又在弋阳高小组织弋阳青年社，当时有黄镇中、汪明、邵伯平、舒翼、方志纯、杨立程等加入，并从中吸收一部分人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年秋，黄镇中、饶克恭等即在漆工镇一带做农民运动，发动了农民反大地主张大纲的斗争，组织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党在闽浙皖赣开始诞生。

1926年秋，北伐军入江西，革命浪潮更加高涨，南昌、北平等地学校不能开课，许多党员在此时机回到地方，进行农民运动，建立党的组织，如邵式平同志首先与方志纯、雷夏、黄镇中、舒翼、胡德兰等组织弋阳县共产党支部；黄道同志与吴先民、邵棠、邹秀峰、李穆、黄端喜等组织横峰共产党支部，其他如贵溪、景德镇等地亦开始有了党的组织。

科学共产主义，经过先进知识分子传播到城市、农村与广大劳苦群众相结合，就产生了革命力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许多山地，落后农村与城市虽不能自己创造出科学共产主义，但有科学共产主义的种子，一经播种在这广大群众迫切要求革命的土地上，便会发芽生根，漫生滋长和蔚然成林的。

## 三、大革命斗争中闽浙皖赣的党

北伐军占领南昌、九江后，革命高涨的浪潮与方志敏同志在革命运动中的声望，极大的兴奋了群众，打击了反革命，这时各县党

的组织发动群众，组织农协，获得飞速发展。当时反动军阀刘至陆、刘保题企图在赣东北负隅顽抗，但到处遭到革命群众的反对、袭击、缴枪。北伐军东征自南昌出动，在广大群众热烈欢迎与帮助下顺利进军，未遭任何困难，我们的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当时各县地方反动政权暂时麻痹，实际上被打倒了。北洋军阀的县长，有的跑了，不逃跑的也不敢妄动。革命阵线内的各阶级便开始夺取地方政权的斗争，均希望新县长是自己阶级利益的代表人。但县长要由省政府委派，此时方志敏同志力主委派党的同志掌握地方政权，江西省委强调群众工作，不许党员作官，反对方志敏同志的主张，结果各县政权，均落于右派与中派之手。但革命还在继续高涨；各县党更加紧群众运动，农民自卫军与工人纠察队更加扩大和武装起来，成千成万的武装入城，游行示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由口号变为行动。许多地方的农民协会，实际上成了乡政权机关。这是闽浙皖赣革命的最高潮时期，开始了革命群众直接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

弋阳九区农民，武装赶走了漆工镇巡官，横峰农民武装赶走了县长，邵式平同志为江西省政府特派员，即委任雷夏同志为漆工镇巡官，邹秀峰为横峰县长，吴先民同志为警察局长。由此我党得以掌握此二地的政权和武装。不久，李烈钧踞上饶，开始反动，“四一二”事变后，各地反动势力纷纷向革命进攻，五月朱培德“欢送”共产党出境，许多地方革命群众武装夺取政权，均告失败。景德镇工人纠察队被缴械，贵溪农民群众领袖江宗海牺牲。雷夏、吴先民、邹秀峰等亦带武装转入山地开始游击战争；“八一”起义失败后，革命便转入低潮。

总之，大革命时期闽浙皖赣还是幼年的党，在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主要的错误是：

1.统一战线中“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当时许多地方的国民党不仅是我们同志所创造，且都掌握在我们同志手里，我们只是帮助国民党大吹大擂，对其坏处一声不响，而对自己党的面目与主张反

而隐藏起来，一切都用国民党的名义，帮助国民党、忽视了自己。

2.不要政权，不要武装，失去时机。在北伐军到来之前，北洋军正退之际，用群众武装驱逐北洋军，粉碎旧政权，组织新政权是完全可能的；弋阳九区群众就是这样获得政权与武装的。其次，在革命高涨时，利用省政府权力，改造各地方政权，亦完全是可能的，横峰就是这样获得政权与武装的。但未能都这样做。

3.宣传过于组织：当时革命的宣传相当大，特别是东征军过境，宣传深入群众，群众大会，武装示威不断举行。但切实组织比较强的农协武装和党的支部是不够的。

但闽浙皖赣是经过"五四"反帝学生运动的准备，建党之后，领导了广大农民反大地主的斗争，反北洋军阀与官僚政权的斗争，有一条以方志敏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存在。实际工作中，获得以下成绩：

1.党开始以知识分子为主，并通过他们与农民群众结合，相当地发展了党。在弋阳、横峰一些地区建立了一些农村支部。

2.取得政权武装，坚持就地革命。在"四一二"事变后，革命遭受挫折。弋、横部分同志武装退到山上，在山里坚持斗争，成为转入土地革命的基础。

3.培养了党的骨干，锻炼了一批群众领袖，结合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发展了农协的组织，烧毁了田契，逮捕了土豪劣绅，个别地区农民取得了政权。因此，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所有这些成绩，准备了苏维埃运动的前提。

## 第二、一九二八年的武装起义

## （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

### 一、大革命失败后闽浙皖赣的党

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开始了对革命进攻，发布反革命布告，诬蔑革命群众为土匪，通缉革命领袖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同

志，变本加厉向群众算帐，夺回群众已得的毁契平债等利益，取消农协、工会，加强各县地方反动武装，向革命进攻。

在此情况下，革命者有的遭受捕杀，有的流亡他方，有的消极隐藏，有的争取合法，求得生存，有的叛变反动，有的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但弋、横县同志虽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仍在山上坚持斗争。此时，方志敏同志回到弋、横，即与坚持斗争的雷夏、方志纯、吴先民等同志会合，于十一月召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党员会议，当时到会有：

弋阳：方志敏、邵式平、邹奇、彭皋、方志纯、黄镇中、方远辉等。

横峰：黄道、吴先民、邹秀峰。

贵溪：邵棠

上饶：汪佑春(会后赶到)

铅山：缺席

会议在方志敏同志领导下决定：

1.当前形势与党的方针：指出国民党已反动，中国革命任务仍未解决，革命形势依然存在，目前中心任务是土地革命，党的方针是以地方暴动夺取政权。

2.武装起义纲领：

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匪党。铲除贪官污吏，肃清土豪劣绅。平债分田分地，建立劳农政府。如果中途变心，刀斩弹穿不赦。

3.起义的组织：

组织农民革命团为起义力量，以村为单位，秘密组织，团下设排，排下设班，每团须在三十人以上。在团举行成立典礼时，团员吃鸡血酒宣誓，规定下列公约：

(1) 保守秘密，不得走漏消息。

(2) 利用村关系，秘密发展新团。

(3) 以打猎为名义，准备武器。

(4) 大家齐心，听取上级指挥。

4.建立党的领导机构：

大会选定方志敏、黄道、邵式平、方志纯、吴先民、邵棠、方远辉七同志组成工作委员会，志敏同志任书记，规定未与上级党发生关系前，委员会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此外弋阳成立区委，以黄道同志负责，其他各地派遣同志，发展组织，进行工作。

## 二、弋、横武装起义

由于五县党员会议决定的纲领，特别是平债分田分地，最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农民革命团获得迅速发展，仅月余，组成七、八十团。当时湘南、广州等地起义消息纷纷传来，地主恐慌万状，农民要求起义，同时年关迫切，反革命在闽浙皖赣地区力量又很薄弱；适有横峰县法警数名，至流底蓝家勒取捐款，农民革命团便将其解除武装，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开始了。各村听到武装起义消息，即连夜竖起红旗，立刻挨户上名，扩大队伍，武装团员，农民叫做“揭开了”；各村对内部少数革命的敌人，烧毁他的借字契约，没收了他的粮食，交出罚款，允准其为老百姓。对一般的殷实户，只要承认革命法令，担保不做反动，农民革命团亦准其为老百姓。然后宣布分田。农民革命团即村政权。当时起义的消息传遍远近，尚未起义的邻村贫苦农民，纷纷要求派队援助起义，数日间，起义区域纵横遍及百余里。在总指挥方志敏同志指挥下，分兵数路，向外发展，起义声势，越来越大。

驻河口之敌，初见起义军声势浩大，未敢出动，各县反动地方武装亦固守城市。起义军分兵发展，为敌探知虚实，遂即开始进攻。当有敌军政工人员，率兵一连，伪装革命，进驻横峰青坂桥，声言是共产党员，骗取吴先民、黄球二同志相见，以致吴、黄为敌扣留，押解河口，横峰起义稍受挫折。数日后，吴、黄乘机逃回，横峰起义军声势又振。弋阳马王坡土豪劣绅，阴谋活动，收买本村流氓，假用革命起义，派人请弋阳八区起义军雷夏同志前往援助，雷一入村，伏兵四起，雷夏同志及其父亲英勇战斗牺牲，八区武装起义遭受挫折。但敌人此时，尚系局部进攻，起义声势仍在发展。

一九二九年二月，敌人更以罗英团为主力，组织进攻，派兵一连进驻中心葛源。起义军见敌兵少，且进驻中心，企图乘其立足未定，给予歼灭打击。于是动员万余农民攻打葛源。事为敌知，中途中伏，被敌冲散。

此次战役失败后，敌人更加紧进攻，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遂转入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当即采取下列办法：

(一)军事上，挑选起义中积极分子，集中二十余人，脱离生产，成立土地革命军，名为第二军第二师十四团一营一连，进行游击战争。

(二)组织群众武装斗争，规定眺高、守夜，打号铳的制度，实行联防，打击敌人。

(三)解散农民革命团，自下而上的建立乡村苏维埃政府，组织贫农团和全民武装的赤少队。

(四)加强党的支部工作，教育党员使其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

(五)在敌人驻扎地，教育群众，实行"白皮红心"政策，配合土地革命军，打击敌人。

此时，江西省委派饶漱石、洪仁二同志来弋、横巡视党的工作，饶同志亲自写了"眺高、守夜、打号铳的办法"与"怎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的二十二条，二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对创造苏区与党的建设有很大的作用。

在此时期我们认为：

1.南昌起义后，闽浙皖赣的同志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以方志敏同志为首，毅然决定，进行土地革命，深入农村，武装起义，事实证明这一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2.提出动员群众进入土地革命的具体纲领，采取适合农民的团结办法——吃鸡血酒，以地下军的形式，组织起义武装——农民革命团，这些都是获得起义成功的条件。

3.选择适宜时机和条件，发动武装起义；起义中组织进攻，扩大胜利；形势转变，及时转入游击战争，坚持阵地，争取发展，这

都是对的。

但在武装起义过程中，对反革命进攻，估计不足，及时组织主力注意不够。动员成万农民与敌人正规军作战，是其缺点。

## 第三、游击战争，创造苏维埃与红军及其壮大（1928年4月至1929年12月底）

### 一、方胜峰会议与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

自暴动转到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后，敌人企图一鼓歼灭我们，分兵“搜山清剿”。在起义地区周围，利用反动的地主豪绅，组织反动落后的农民向根据地进攻，烧杀抢劫，所过均成废墟。同时敌人又在我区内进行无耻欺骗，造谣：“只要有人出来接头，就可保村”，不接头的村子日夜骚扰，不胜其苦，使根据地农民发生动摇。我军当时战斗力很弱，在此情形下，形势十分紧急，方志敏同志于六月在横峰方胜峰召开干部会议，打开当前严重局势；会议上发生：

1.当时团省委代表庞同志主张埋枪。放弃阵地、分散、隐蔽；

2.部分外来干部主张转到根据地外去打游击；

3.方志敏同志坚持在根据地打游击，与群众共存亡。并严厉驳斥了第一种意见，分析了第二种意见，坚持第三种意见，决定具体办法是：

（1）军队交给邵式平同志指挥，坚决击破敌人最弱一路。

（2）群众某些动摇，由方志敏同志负责解释，并给反动首要分子以必要打击；

（3）积极准备新的根据地，派黄道同志开展贵溪秘密工作。

这次会议是闽浙皖赣党为游击战争转变到创造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的关键。六月二十六日，我军与弋阳靖卫团数千反动武装大战于金鸡山，一战大捷，长追敌人五十余里，烧毁了敌人的指挥部，威胁当时反动中心弋阳城，迫使进入根据地的敌人全部撤退。同时方

志敏同志已把动摇的群众争取过来。第一次“围剿”便被粉碎，根据地得到巩固。八月，敌人以四十六军杨劲部及罗英团为主力，配合地方靖卫团，向我举行第二次“围剿”。杨劲部原为土匪，进入我区，奸淫、抢劫，但敌遭受我军与群众几次打击，损失日重。朱培德疑杨部不稳，乘机将其全部缴械，二次“围剿”即被粉碎。二次“围剿”粉碎后，环境稍缓，我军扩大，分散进行群众工作，苏区扩大至上饶、德兴及弋阳八区等地。十二月敌人增大兵力，以周志群旅为主力，向我进行三次“围剿”。反动豪绅满望此举定可消灭我们，值天大雪，周部士兵尚着单衣短裤怨声载道；我在敌人进攻前，即动员进行士兵运动，并集中兵力，相机袭敌，周匪进到苏区，一与革命群众接触，部队便开始哗变，周匪大怒，纵兵奸淫、烧杀勿论。但进攻数月，到处受到我军与民众打击。一九二九年二月，哗变更烈，匡龙海、龙志光、杨廷辉三人率全营求降，周匪狼狈逃去，三次“围剿”遂为粉碎。我军扩大一倍以上，便分兵扩大游击队，争取群众。接着二九年四月王均第七师，又来向我区进行四次“围剿”。采取“久困穷追战”；我军初接触，团长郑孝胥同志不幸被俘牺牲。后我军逐渐摸到敌人弱点，便于六月伏击敌人于长茅岭，把进驻苏区之敌击退。局面大开，苏区面积扩大二倍以上，人口也由十余万增至四十余万，奠定了一九三〇年大发展的局面。

## 二、红军游击队的壮大及其战略

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时，土地革命军四十余人，实为游击队，不久改为红军。金鸡山一战胜利后，又改为江西红军第五团，部队稍有扩大。二次战争胜利后，部队扩编为二个连，约二百人，但战斗力不强；此时各县均成立地方武装。于是革命武装体系，主力军、游击队与群众武装，初步具备。三次战争胜利后，部队已扩大有五个连，为了提高军事化，加强战斗力，用了一部分哗变的士兵为干部，战斗力加强。四次战争胜利，改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部队扩大约有一千人，经过整军，加强政治工作，部队开始正

规化；闽浙皖赣红军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纠正了下列倾向：

1.土地革命军时期有绝对民主化的现象，打仗都要经全军会议举手决定，根据第一次战争胜利的经验才纠正过来。

2.由于敌人的残酷，群众产生了报复行为，烧杀现象，党的六大决议到后才有纠正。

3.由于部队是农民起义发展起来的，散漫现象比较严重，每于敌情紧急时便各自走散，事后又自动回队。三次战争后开始纠正。

4.由于提拔了哗变来的士兵为干部，又带来了军阀主义习气，打骂现象一时严重。当即警觉，加强政治教育，纠正过来。

在干部问题上，由于外来干部对情况不熟悉，地方干部缺乏军事人才，部队中干部调动很大。为了解决干部问题，除起用哗变来的部分官兵外，曾于一九二九年开办了一个信江军政学校，约三百人，训练六个月，这些学生在红军壮大中起了很大作用。总之，闽浙皖赣红军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是较为曲折复杂的。

我们的战略，经过两年来实践战斗的摸索，逐步形成指导作战的原则，“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这一军事思想从今天看来，完全是根据敌强我弱及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出发的。但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认为扎口子是分兵把口，打小仗是怕打大仗；曾洪易（王明路线的中央代表）反对游击战争更以此作为根据，其实扎口子打埋伏即是伏击战，绝不是曾洪易的分兵把口；打小仗吃补药就是游击战，集小胜为大胜，绝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红军每当敌进攻之初，避免作战，待敌几次扑空，弱点暴露，抓住具体敌人弱点，下定决心，一举而歼灭其一股。这样几次战斗胜利，结成一次战役胜利，每次反“围剿”的胜利，大都如此，以后的实际战斗中更证明其正确性。

## 三、从战争中壮大起来的苏维埃

自起义转入游击战争后，即自下而上的建立苏维埃，当时苏维

埃的中心工作是教育群众，实行民主，认识苏维埃是自己的政权，发动群众为自己的政权斗争的积极性。1928年12月为统一各县苏维埃的领导，成立信江苏维埃。主要工作是：

1.分配土地，自暴动后没收豪绅地主封建祠堂的土地，虽有初步分配，但无明确办法，这时规定土地法：

（1）以村为单位，平均分配土地。

（2）凡是不反对苏维埃的人民均有得土地之权。

（3）谁种归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好坏均匀。

2.发动春耕，一九二八年根据地耕牛被敌抢劫一空，春耕成为当时的严重问题。政府为了解决牛荒，通令军队及各级地方政府捉土豪罚耕牛，由政府分配给群众。同时奖励群众集股购牛，由此耕牛得以解决，生产积极性得以提高。

3.明令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政府只征收土地税，税率：上田每亩征收干谷一斗；中田八升；下田五升。

4.统一财政收支，凡军政机构之打土豪罚款，统一政府入库。规定供给标准，建立预算制度。

5.规定优待红军家属办法。红军所得的土地，政府发动群众代耕；并奖励红军家属作生产模范，生活困难的红属，政府给予适当的补助。

1929年冬，召集第一次信江工农兵代表会，这次大会：

（1）根据群众利益，发表宣言，号召苏区、白区群众一致起来打倒国民党政权，拥护苏维埃政权。

（2）根据党第六次大会的十大纲领及信江苏维埃的法令，颁布信江苏维埃施政纲领。

（3）补充土地法。分配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可以出租出典，可以雇人耕种。

（4）确定借贷政策，平债之后可以借贷，利息不得超过一分五厘，工资店帐不在平债之列。

（5）确定贸易政策，根据地保护贸易自由，准许外来经商，开

辟市场，进行赶集。

由于各种政策的实施，虽然敌人不断进攻苏区，并无赤白对立现象。苏维埃的威信不仅在苏区群众中，即在白区群众中的影响，亦日渐提高。

## 四、党的建设特点

五县党员会议，是闽浙皖赣党在新的基础上——土地革命基础上的重建，起义过程中，党获得很大发展，转变游击战时，进行了巩固党的工作，有了弋、德、横三个县委的组织，以弋阳县委为中心县委，受在鄱阳的赣东北特委领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党的六次大会后，接着江西省三次大会，决定了成立信江特委，并于十二月省委派来唐在刚同志为特委书记，直接受江西省委领导。一九二九年秋江西省委及赣东北特委均遭破坏，信江特委便失去上级的联系。此时，党已发展到贵溪、余江、万年、上饶、铅山，共八个县委与闽北党取得联系。赣东北特委遭破坏后，失去上级关系的余江、乐平等县党的组织，亦来信江特委找关系，信江特委领导下党的组织，便发展到赣东北各地。

这时，信江党的基本特点：有根据地，有红军，几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实际上形成闽、浙、皖、赣地区的革命中心。在党的组织上：

1.发展党员，是以斗争坚决，在群众中有信仰，对革命忠实，工作积极为主要标准寻找对象。成份问题只是标准之一。因此所发展的党员大都是群众斗争的领袖，对新党员的教育，中心的是"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二十二条)。

2.党的支部是很精干的，即千多户的大村支部，也仅有十几个党员。支部中心任务是怎样做到群众斗争的核心，党与群众关系非常密切。

3.干部选择是以在斗争中表现忠诚，积极，有办法，有成绩，且为群众所信任为主要标准，逐级提拔，不轻易调动工作，注意干

部与群众联系，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亦很团结。

4.发展党的秘密工作及与公开联系，做得很好。方胜峰会议决定黄道同志去贵溪准备第二根据地以后，这个方针便成为党内外的群众运动。每在敌人进攻时，党员与群众能在根据地以外找关系的，都向外去做工，并到处发展自己的组织。党员发展党，团员发展团，群众就发展群众团体；到一定的程度，就派游击队配合行动，或者直接派红军去援助起义；一九二九年秋，贵、余、万起义就是范例。

5.党内的民主作风。根据地党，在群众中是半公开的。但党内各级都是很民主的，讨论问题非常实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是有不同意见争得面红耳赤，但经多数表决，便完全一致，坚决执行。能鼓励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热情与责任心。

总之，闽浙皖赣的党在方志敏同志领导下，克服了各种倾向，充分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坚决性与群众血肉联系，在革命生死关头，坚持游击战争。也表现了创造精神，在两年的实际斗争中自己摸索出建党与苏维埃建设的一套办法和规律，是完全正确的。但也表现了他的朴素性，系统地总结经验比较缺乏。

## 第四、闽北党的创立及其发展
## （自开始至一九三〇年八月）

### 一、闽北党的产生与崇安武装暴动

闽北较赣东北更为偏僻，封建统治极其黑暗，官僚政治极其腐败，租息苛捐杂税极其繁重；广大群众不能生活，对革命要求非常迫切。由于闽北地处近海，帝国主义教会的欺骗深入农村，多少散布了一些自由主义的空气到闽北，引出一些富豪子弟在读洋书。在外求学的先进知识分子，如陈耿同志等，在福州参加学生运动，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二七年陈耿同志在崇安发展党的组织，这是闽北党的开始。

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在闽北山地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对群众影响不深。党刚开始组织，来不及发动群众进入大革命斗争，大革命的浪潮便过去了。因此当反革命高唱凯旋时，对闽北潜伏着的革命力量，并未予以严重注意或来不及注意；党的组织与活动，仍然得以继续。

到一九二八年春，从赣东北来的一批采茶造纸工人，带来了弋、横武装起义的消息和情况，并在广大群众中传播着，鼓舞了闽北党群进行抗租抗债斗争。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因与群众的准备不足和没有经验，但这是闽北党和群众秋收起义的最好演习，并仍保持着党的力量。此后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更加提高，领导的同志虽不能公开活动，但在群众掩护下，活动区域扩大，活动效力增强，我党同志陈耿等已成为广大群众所拥护的领袖，闽北党逐更加发展。因此，闽北革命不仅没有低落，而且在继续扩大高涨。由于朱、毛、方、邵起义的胜利，影响日大，福建省委亦指示闽北积极布置起义响应，闽北党采用弋阳起义农民革命经验，提出“抗租抗债”“分田分地”口号，以“民众会”的名义进行地下军的组织，崇安东区北区发展最快。于一九二八年在陈耿同志领导下，东区最先树起义的旗帜，接着北区各地纷纷响应。

当时起义军仅一、二支步枪，其余都是土枪土炮，反动地方军阀部队省防军来攻，起义军上山与敌人进行游击战。群众大都采取两面政策，内红外白，少数领导者与积极青年携带武器，敌来上山，以挨丝炮，地雷打击敌人；敌去又下山开展工作，并向周围薄弱地区发展。起义的胜利，便这样坚持下去。

## 二、建立苏维埃与红军

起义之后，福建省委即派杨实同志来巡视。在杨同志领导下，各种工作都有开展，游击队亦有扩大。到一九二九年四月就正式定名为闽北红军独立团，约三百余人，枪百余支。到八月便与赣东北苏区铅山党取得联系，经赣东北党同意，派黄富武来帮助工作，红

军独立团加以整理，编为三个连，以陈耿同志为军委会主席兼团长，战斗力稍有加强。苏维埃政府的办法，也从赣东北带来，自下而上的建立苏维埃政府，进行分配土地，各项工作前进了一步。一九三〇年闽北形势大为开展；原因：第一，是敌人几次进攻均被我区打退，在长期的游击战争中，我们的力量日益壮大，最足以兴奋群众，提高信心。第二，又与赣东北方、邵红军取得联系，相互呼应，不只是敌人包围我们，我们反包围敌人。第三，蒋、冯、阎军阀大混战，福建军阀刘兴邦、刘和鼎等亦在混战中。这样闽北苏区得到新的发展，建阳、蒲城都有了我们的工作。

一九三〇年四月，福建省委派李静愚、李克敌二同志来负责军事工作，李静愚先到，为军委会参谋长，李克敌后到为团长。七月奉省委转来中央命令，闽北党拨为赣东北特委领导，闽北红军独立团即到赣东北集中，陈耿调去上海出席苏代会，杨实调省委另分配工作。当时地方干群多不同意独立团去赣东北集中，战士们也难说服。为服从党的命令，八月将独立团由李静愚、李克敌二同志率领去赣东北，陈耿、杨实同志亦去福州上海，以后闽北便成为闽浙皖赣党的组成部分。

## 第五、军阀混战中党的大发展与立三路线
## （1930年1月到1930年10月底）

### 一、当时闽浙皖赣的形势与我们的进攻

长茅岭一战，将王均第七师驱出苏区，敌人暂时无法向我作全面“围剿”，但仍不断局部进攻。一九三〇年二月弋阳团林一战，将敌大部歼灭，敌人局部进攻亦被粉碎。这时正值酝酿着蒋、冯、阎军阀大混战，敌人无法增援，分驻城市要地，前强后弱，前紧后松，隔我苏区愈远，敌人愈薄弱，警戒越松懈。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即采取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的奔袭战法，

实行战略进攻。杨言攻取乐平秧板，主力隐蔽集结万年，奔袭鸣山，一战胜利，威胁了乐平城，动摇了秧板之敌，我军相机袭敌，秧板敌人全部被歼；德兴之敌便不战而跑。又如奔袭河口获胜，弋阳城之敌动摇，我军乃一鼓歼灭，占领该城，在红军胜利的进攻中，苏区向北扩大了数千里。

蒋、冯、阎大战爆发，形势更对我们有利，各地红军大胜利的消息经白区报纸不断传来，特委便召开会议讨论当时形势及任务。认为形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总的任务还不明瞭，决定唐在刚同志去上海报告工作，请示中央。因为江西省委于一九二九年秋遭受破坏后，与上级失联系已近半年。在未得中央指示以前，我军应相机袭攻景德镇、乐平、开化、浮梁、婺源三角地区，进行整军扩编等工作，以准备争取更大胜利。

## 二、立三路线到来及其执行情况

我军于一九三〇年五月初攻景德镇时，唐在刚同志亦由中央到景德镇，传达立三路线，要把红军立刻开去打九江；当时随军特委方志敏同志殊为惊异，坚持要在特委讨论，并须整理队伍；我军便退出景德镇回师苏区。回师后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同志商量，一致认为打九江主张，恐非中央指示，因为九江是全国重镇之一，敌人必驻相当兵力，而且增兵极为方便，我军仅二千余人，越湖进攻，离苏区作战，有全军覆灭危险，准备在特委会上据理力争。但在特委会之前，唐在刚同志根据中央指示，为信江特委改组，增加了肖韶、李杰三、胡定铨三同志为委员，并将信江特委改为赣东北特委，调邵式平去中央受训。由于这一改组，在特委会议上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未加展开，会议上唐在刚同志传达立三路线中央指示，指出目前形势已是全国革命高潮到来，当时任务是猛烈扩大红军，攻打大城市，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赣东北党的任务是迅速攻占九江，以配合朱、毛夺取南昌，配合全国夺取武昌。特委决议红军独立团即向九江湖口发展；后方迅速动员赤少队一百连加

入红军。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对打九江截断长江的决定仍有怀疑；一面周建屏同志率红军攻九江相机行动，胡定铨(为政委)初到不了解情形，前线军事要周建屏负责；另一方面邵式平同志速去中央，并带详细书面报告，希中央指示有所改变。

八月邵式平同志自中央回来，带来六月十一日立三路线政治决议案及组织决议与中央指示，便在万年富林召开特委扩大会决定：

1.成立红十军，将江西红军独立团编为第一师三个旅；中央已去令闽北红军开来，待到后补充成为独立师，此外再成立野战军补充旅；共计约三万人。以邵式平同志为前委书记兼十军政委。

2.党、团、工会各级一律合并为行动委员会。当时周建屏、胡定铨率军与敌大战湖口，虹桥大胜，自已伤亡也重。回师景德镇，但士气旺盛，即令回乐平扩编。仅整训一周便分两路，景德镇、乐平、鄱阳向九江进军；截断长江，配合朱、毛攻占南昌。此时军阀混战正在决战阶段，我军进到都昌、湖口、鄱阳、彭泽之间，以游击战的行动，攻克鄱阳、彭泽、马当、秋蒲等城塞，并进行赤化这一地区工作。十月探知蒋、冯、阎混战结束，蒋已派大军向我军包围，我军即星夜回师苏区。

当二次红军向都、彭、湖、鄱行动过程中，敌人在我后方信江方面，集中了横、铅、上、玉、广五县靖卫团向我进攻，闽北苏区、铅山苏区、上饶苏区及横峰部分苏区遭受严重摧残。

邵回区后，苏区群众大为振奋。同时敌人向我作全国第一次大“围剿”；我军方进苏区，胡祖玉第五师即跟上，我军在朱山桥给以回击，敌稍为停顿。我军即穿过苏区，奔袭上饶城，将五县靖卫团全部歼灭。再回袭河口镇，又将李坤全部歼灭。上饶、横峰苏区完全收复，并有扩大。此时涂振农代表中央来赣东北传达三中全会，执行立三路线就此结束。

## 三、执行立三路线的检讨

闽浙皖赣党是执行了立三路线，表现在：

1.取消地方武装，主力远离苏区；

2.取消党、团、工会等组织，成立各级行委会；

3.城市政策过左，不加调查，乱打土豪，没收许多商店；

4.原有秘密工作全部暴露。

但在苏维埃政策，土地政策，政府工作等均未改变，在军事行动上打到鄱阳湖边，还未肯冒险越湖，攻击九江，亦不坚决截断长江；虽攻占景德镇、鄱阳、彭泽、马当、秋浦、乐平等城镇，并未攻坚硬打，反而避攻万年、贵溪、都昌、湖口等坚固城市；尤其蒋介石大举向我进攻时，我即星夜退军，回到苏区，并在有利条件下主动打击敌人。这些都不是遵照立三路线指示做的。

是由于我们执行了立三路线，所以曾受到损失，上饶闽北及横峰部分苏区遭受到敌人摧残，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一时有些混乱，特别是失去巩固发展的时机。同时又由于未完全执行立三路线，获得了不少的成绩：首先是红军打胜仗，攻占许多大城镇，扩大了苏维埃运动的影响，其次军队得到几倍的扩大，缴获大量物资，解决了反一、二次"围剿"中的财政供给。我们认为，未完全执行立三路线，其原因在于遭受到了方志敏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严重抵抗；没有钦差大臣直接监督；同时闽浙皖赣党有相当长期的斗争历史和经验，在实际行动中能机动转变，掌握方向。并且立三路线时间很短，一经指出，改正亦易。

## 第六、纠正了旧立三路线，又来了新立三路线（指王明路线——编者注）

##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五月）

### 一、纠正了立三路线党的转变与粉碎敌人一、二次"围剿"

蒋、冯、阎军阀混战停止后，敌人开始了全国性的对苏区新的

围剿”，敌人对闽浙皖赣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开始了第一次的“围剿”，当时敌人有胡祖玉、阮肇昌、李抱冰、赵观涛等师，集中兵力三万余人；由南到北，从景德镇到乐平，从鄱阳到万年，从南昌到贵溪，从贵溪到上饶，四路进兵向我苏区中心冒进，企图找我主力决战，一口吞吃。在敌人大举进攻的情势下，苏区曾一度发生过某些紊乱现象。

这时涂振农以中央特派员名义又来赣东北，在弋阳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三中全会后，特委在会议中批评与检查过去闽浙皖赣苏区立三路线的错误，提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粉碎敌人“围剿”，并具体布置：

1.军事上将约三万的红军缩编为四千余人的三个主力团，采取一人一枪的正规编制，以便争取主动寻找敌人的弱点，相机打击敌人；把补充旅新兵解散到农村，作为在乡赤卫队的骨干；扩大地方武装，将过去立三路线时期调过来的闽北独立团整理充实派回闽北。并成立一新独立营派到万年、余江活动；各县组织独立连，各区组织五枪至十枪的游击队。以展开游击战争，配合主力，打击敌人。

2.党的组织：取消行动委员会，恢复青年团、工会，成立省委，以唐在刚为省委书记，黄道为组织部长，肖韶为宣传部长，方志敏为苏维埃政府主席，邵式平为军委主席 涂振农由中央指定为十军政委，并加强各县党的领导，派邹秀峰去弋阳任县委书记，洪坤元去闽北，以加强对战争的领导。

3.政府工作：在军阀战争，我们大发展时期，某些地方政权有脱离群众现象，打骂群众，少数“异己分子”混入政权，志敏同志同苏区沿途调查，搜集研究了这些现象，认为必须纠正，曾写一苏维埃与群众关系问题通俗小册子，解决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并进行了区乡政权的改造工作。

4.肃反工作：取消非常委员会，恢复了在同级党与政府领导下的肃反委员会，制定了一些条例办法，防止乱捕乱罚现象。

由于以上工作改进，恢复了战斗秩序，加强了战斗力量，敌人对苏区“围剿”扑空，红军在上饶河乘胜回苏区，与敌周旋一月，后将敌诱入弋阳苏区七星尖，集中兵力，予以歼灭打击，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大围剿”，闽北独立团，几经战斗胜利，闽北苏区亦逐渐扩大。由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敌又很快增加部队，开始第二次“围剿”，从余江、贵溪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堡垒进攻，从德兴、上饶一带采取跃进，寻找我主力决战；红军则采取避实击虚，先攻占华埠，再渡信江去闽北，攻占赤石街，调动了敌人，我再回师赣东北，袭攻余干城，敌人在我主动的进攻下部署混乱，东调西窜，最后在葛沅将进攻敌人全部击溃，粉碎了第二次“围剿”，巩固扩大了苏区，主力红军发展到五千余人。由此可见，闽浙皖赣党是已经执行了正确转变，彻底纠正了立三路线错误。

## 二、曾洪易等到来与党在领导上的变动

当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后，中央派万永诚，倪宝树来赣东北，在葛源召开县以上干部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由万作政治报告，传达了四中全会，认为赣东北还有立三路线，必须彻底转变。又批评闽浙皖赣党是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调和主义。会议即有争论，方志敏同志认为这些批评是没有根据的，闽浙皖赣党在广大农民斗争基础上创造了工农红军，苏维埃根据地，如果是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等，路线都错了，则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会后，省委部分改组，由中央指定万为省委书记，倪为十军政委，以黄道同志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肖韶同志去闽北任特委书记。当时虽已传达四中全会和省委部分改组，但实际工作尚不起决定作用，故影响不大。

但中央认为赣东北执行四中全会不彻底，一九三一年四月又派曾洪易以中央代表资格，聂洪钧、杜石公、关英等来赣东北。曾等到达后，首先改组省委，以万永诚为书记，聂洪钧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将省委吴先民、黄道、邹秀峰、洪坤元等同志排

挤了；在团组织方面，将方志纯同志撤职，以关英为团省委书记；在军队中，将参谋长舒翼，政治部主任吴先民撤职，以杜石公、吕振球代替；并说红军是中央的，应直属中央代表指挥。

其次是检查文件，断章取义，把同村大支部叫做封建党，把富农分到些好田，地主分到田叫富农路线。把解决难民生活的实验农场（当时曾叫过苏维埃集体农场）叫立三路线的过早办法。在军事上，把过去游击战争的"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等的战法叫做保守主义。

再次是挑拨原有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拉拢唐在刚、杨真吾、李静愚等为其助手。

曾洪易经过上述准备，一九三一年七月在葛沅召集第一次党的全省代表大会，说闽浙皖赣党是保守主义、封建主义、立三路线残余，富农路线，要执行国际路线的彻底转变。甚至提出列宁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民问题的口号——反对富农，中立中农，团结贫农。确定赣东北党的中心任务是巩固苏区，打通中央苏区。大会选举时又将吴先民、邹秀峰、洪坤元同志从省执委排挤出去。

## 三、打通中央苏区与"持久围困堡垒"

敌人三次"围剿"更增重兵在信江沿岸，防止我军与中央苏区打通，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更加厉害。但皖浙方面敌人薄弱，多是地方反动武力，亦无堡垒，党在军事发展方向与战略方针上发生了分歧意见：曾洪易在打通中央苏区的口号下，提出向西南（贵溪、余江、信江以南）发展的方向和持久围攻堡垒的战略方针。认为中央苏区在西南，必须向西南发展，敌人的堡垒政策必须粉碎，不能粉碎，就不能战胜敌人。方、邵主张向皖浙赣发展的方向，采取游击战争，主动打击敌人。以巩固和扩大苏区来打通中央苏区，必须以巩固发展苏区，必须以少打堡垒，多占地方，粉碎敌人堡垒政策，战胜敌人。持久围攻堡垒是被动的，是碰钉子的战略方针。曾洪易认为方、邵这一主张，是反对打通中央苏区，在敌堡垒政策面前退

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打击方、邵。将邵式平军委主席撤职，以唐在刚接任。并以聂洪钧为十军政委。从此便发动红军主力，实现他们的持久围攻堡垒的战略方针。敌人在那里筑堡垒，红军就开到那里去，处处被动，消耗实力，敌人的三次"围剿"在闽浙皖赣是没有被粉碎的。

## 四、"明确阶级路线"与干部政策

曾洪易为实现其"国际中央路线"，提出"明确阶级路线"，反对富农路线，于是大举清查阶级。不顾党员干部的斗争历史，工作的表现，与群众的联系，对党的忠实如何。凡是地主、富农出身的或其子弟，大都无条件的开除党籍撤销工作，给予所谓"无情打击"。对于非党干部与群众，只要是地主、富农成份，也无条件撤销工作，开除其参加的群众组织。凡此一切，都被认为"异己分子"。甚至男女婚姻，因为成份不好，都要退去婚约。因此，影响党内的不团结，许多干部情绪低落，农村发生许多极左现象，使苏维埃变为评阶级的机关。修改土地法，无条件收回地主分得土地，驱逐地主家属叫做"减轻苏维埃负担，加重国民党负担"。收回富农分得好地。于是使地主更加反动，富农不满，中农动摇，雇农、贫农陷于孤立。农村统一战线政策，被曾洪易完全取消。

## 五、惨痛的闽浙皖赣肃反

由于路线的错误，造成军事上的失利，环境日益严重。地主、富农恐慌怨恨，群众动摇，干部群众表现不满。鄂豫皖肃反文件传来，曾等以鄂豫皖肃反后打过胜仗，遂提出"以肃反胜利争取红军胜利"；同时中央亦有指示，责赣东北肃反工作未展开。适有由上海派来做文化工作的潘务行，工会工作的何东桥，互济会工作的罗子华，对曾洪易及省委领导不满，曾便对他们怀疑；他们在闲谈中提倡健康，要洗脚、爬山等，曾认为是以"健康会"的名义进行改组派活动；吴先民同志亦因对曾洪易的领导与路线不满而后有议论，

曾认为是反革命的派别活动，捕捉吴先民，实行逼、供、信，于是惨痛的闽浙皖赣肃反开始了。

肃反开始时，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说反革命虽有，但不致有这样多。吴先民等是长期斗争中考验过来的忠实党员，不会是反革命，在省委常委会上大起争论。曾洪易认为方、邵对肃反动摇，加以打击隔离，强制写声明书，并在群众中公布。从此肃反更加疯狂，由党到军，由上级到下级，由机关到农村，由赣东北到闽北，都大举肃反，非刑拷打，指名逼供，乱捕乱杀；数千革命群众在这错误的肃反政策下含冤而死了；以改组派罗章龙等的名义，捕杀了不少群众领袖与重要干部，如红十军政治部主任吴先民同志，地方暴动领袖黄镇中同志，团省委宣传部长汪明同志，闽北苏区创造者陈耿、徐福元同志等等；县苏维埃主席、县委书记，以及红军团以上的知识分子出身的负责干部大部被肃。甚至在白区工作的一些干部与交通员亦调来苏区，加以肃反。余干县保安大队罗英，连人带枪一百七十余人，携带妻室儿女投奔革命，以及其他白军哗变过来的士兵，也都认为是反革命派来的，将其杀掉。这种肃反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五年尚未完全停止，当时省委还认为这是肃反的胜利。

肃反造成的恶果，表现在：1.由于乱捕乱杀，大伤了党的元气，造成干部动摇逃跑，人人自危，使党内产生一种严重的恐怖现象；2.许多军事骨干被杀，影响了红军作战的情绪，减弱了战斗力，使军事遭受不断失利；3.形成农村恐慌，群众对党怀疑，隔离了苏维埃与人民，党与群众的联系；4.造成赤白对立，失去了苏区周围群众工作的桥梁，影响党的白区工作，在社会上种下了极坏的影响；5.杀投降官兵，杀俘虏，破坏了党对投降兵、俘虏兵的政策。

我们认为这完全是曾洪易等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与宗派主义危害党和革命的罪恶。

## 六、与中央红军会师后的情况

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四次"围剿"中，向闽赣方面有很大发展，一九三三年一月红十军奉命过河与中央红军会师，当时中央的措施：1.将红十军改为红十一军，以交换经验名义，十军营以上干部撤换，军长周建屏调去学习，邵式平同志离开部队，有的干部不满便给予打击，如黄开书、易开统开除军籍党籍；2.以闽浙皖赣原有游击部队赤卫警卫师一千五百余人成立新十军，派王如痴为军长兼政委，刘畴西为军区司令员，曾洪易兼军区政委；3.闽北独立师奉命开闽赣，闽北游击部队成立独立团，派李德胜为军分区司令员，并将闽北苏区划归闽赣省。

主力离开闽浙皖赣后，敌人增兵"围剿"，实行保垒分割进攻。新成立部队战斗力弱，形势严重，群众怀疑，认为"中央不要我们了"。刘、王到达后，在改变闽浙皖赣红军作风名义下，否认游击战争，主张正规战，硬打硬拚，部队伤亡很重，几经挫折，便认为部队怕死，不能作战，曾洪易等到此情形下，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召开全省支书大会，以反罗明路线的精神，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以边境余江县委书记何映辉同志为右倾机会主义代表，展开反何斗争，提出"全面出击"。

## 七、五中全会给闽浙皖赣党的影响与抗日先遣军的失败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央召开五中全会，电调曾洪易出席，以方志敏为省委书记。当时志敏感觉过去工作有严重错误，在曾离开时的省常委会上，给曾以严厉的批评；指出其军事上战略上的错误，把红军摆在苏区内部与敌人堡垒作战，陷于被动，不向敌人空虚的浙西皖南发展，并指责曾洪易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且压制同志的自我批评，使正确意见未被采纳，争论非常激烈。此后，在方志敏同志领导下，工作上有些转变，表现在：（1）把新成立的红十军向

皖南行动，获得某些胜利，建立了华、婺、德苏区；（2）停止查田查阶级，认为过去进行过左，肃反也缓和了一些；（3）调数十干部开办白区工作训练班；分配皖南及景德镇一带，重新开展白区工作。于是部队中群众中的情绪均有好转。此时，闽北和独立师在敌人五次"围剿"中被敌隔断，再划给闽浙皖赣；独立师在方志敏、黄道、黄立贵领导下，已有某些转变，但肃反仍在继续。

中央五中全会决定传到闽浙皖赣后，在军事上更提出以"红色堡垒反对白色堡垒"，"不失苏区一寸土地"，"为阻止殖民地道路与实行苏维埃道路而斗争"等口号；敌人的堡垒进攻更加发展，红色堡垒抵不住白色堡垒，伤亡颇大，部队损失，苏区日小，形势愈趋严重，曾洪易离开后，志敏同志领导下的某些转变，这时又被否定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军，以曾洪易为中央代表兼随军全权代表，乐少华为政治委员，寻淮洲为军长，曾洪易带队又回闽浙皖赣。十月，先遣军到，部队损失过半，疲劳不堪，军队干部又与地方没有联系。在此情况下，曾知中央红军长征，即认为中国革命失败，在部队与干部中散布失败情绪，主张党不要武装，应转为秘密的地下活动。至此更悲观失望，企图逃跑。方志敏同志电告中央，撤去曾中央代表及省委书记职务，并开展反曾斗争。

七军团到苏区后，中央军区电令七军团与红十军合并，组织十军团，以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方志敏为随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向皖南行动。此时，敌人已在皖南有重兵布置；我军与敌接战，干部伤亡很重，寻淮洲牺牲。刘畴西指挥队伍犹豫不决，缺乏机动，部队被迫撤回苏区，进到怀玉山，不幸被敌包围打散，方志敏同志被捕，英勇牺牲。曾洪易此时逃去南京，告密自首。不久，苏区全部被敌占领；闽浙皖赣苏区遭受敌人残酷摧残，闽北苏区也完全变成游击地区。被敌打散的少数部队和干部，分散各地，转入游击战争。赣东北轰轰烈烈的苏维埃运动，遂遭到凄惨

的失败。

这一时期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在某些工作上有些成绩，例如：1.在某些工作上正规化条例化些，纠正了某些游击习气；2.在军事上打了几个胜仗，攻下开化、蒲城等，但这不是基本战略的改变，只是在战斗中不断失利的情况下，经大家提出意见不得已的行动，获得了个别战斗的胜利了；3.群众武装斗争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发展，广泛运用地雷，挨丝炮，在边境组织基干自卫队，群众的瞭望哨交通网，采用坚壁清野，大大发挥了群众战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敌人寸步难行，收到很大的成效。当时的中央反而批评这是保守主义。4.在经济战线上发展了农民生产，政府奖励开荒，加强军工生产，大量制造地雷炸弹；建立税收制度，管理对外贸易，发行苏区纸币，调济苏区市场；创造出一套经验。

虽然有上述工作上的成绩，但不能挽回闽浙皖赣苏区由路线错误造成的失败。曾洪易等这种“新立三路线”在闽浙皖赣统治时间整整四年，发展极为完备，危害革命最甚。

闽浙皖赣党在苏维埃运动中的失败如此之惨，完全是“新立三路线”所造成的。

# 第七、闽东党的创立及其发展
# （自开始到一九三五年一月）

## 一、闽东党的创造与游击战争

大革命时，福安有少数进步知识分子，在北平、上海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加入共产党，当时还未与群众结合，对闽东的影响不大。不久国民党开始反动，党在不健全的状态下保持着。一九二九年秋，福建省委派邓子恢同志来福安整理组织，提拔马立峰，加强领导，布置秋收斗争，福安党开始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继有一九三〇年反鸦片捐斗争，一九三一年秋收年关等斗争。是年終福州中心

市委陶铸同志派叶飞来担任福安中心县委书记，成立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并分头进行争取土匪工作。一九三二年冬，以游击队为中心配合群众进行分粮斗争。一九三三年初，因在敌人摧残压迫之下，游击队政委马立峰被捕，游击队被迫退寿宁，福安遂暂告沉寂。党遂以福安为中心向霞浦、宁德、寿宁边界先后建立了党与农会的组织。

一九三一年寿宁边叶秀藩、范浚开始建立党的组织；一九三二年冬建立特支。一九三三年初利用农村封建形式组织大刀会，争取土匪。一九三三年夏在范、叶领导之下举行起义与游击第一支队配合行动，几次胜利，成立闽东工农游击第七支队。后在闽浙敌人的残酷进攻之下，党内东西区对立和许多地方党的意识不纯的分子占据，脱离群众，遭到失败。

连江、罗沅在一九三〇年就有了党，一九三一年下半年由陶铸同志亲自领导，建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九支队，以当地群众领袖杨其昌同志负责。后杨在战斗中牺牲，福建省委另派魏耿负责；并与闽东取得联系。

闽东党在发展中曾发生严重的宗派主义。在一九三二年秋曾以詹嬴为首，企图谋杀党的负责人，发生了第一次反中心县委事件。福州市委派陈三枢前去解决，竟提拔詹为中心县委书记，将范、叶撤职，调去宁德。一九三三年寿宁游击第七支队因范濬被忌，由中心县委调去福安秘密处决。

## 二、武装起义及闽东苏维埃

福建处在军阀割据局面下，从未统一过。闽东处在海军派统治下，适有蒋蔡事变，闽东党根据过去利用迷信组织的经验，把广大群众组织到自己方面来。一九三三年秋广泛发动了抗租抗债的斗争，反动势力的进攻，被我游击队乘势击败，并消灭了一些民团，增加了我们的武装，兴奋了广大农民，并乘胜攻占福安市镇赛岐、甘棠等地。年底建立闽东工农红军第一团于连江，将福安、寿宁两

游击队扩大为独立第二团。各地群众亦纷纷响应，自下而上建立苏维埃。当时有县委九、县苏七、与苏办事处一；苏区面积，连罗纵横百余里，宁属由东北而西南五百余里，由东至西三百余里，人口约二十万；在巩固区域一般的分配了土地；至一九三四年福建省委破坏，闽东党与上级失掉联系，为统一党政领导、合并连、罗、寿、宁、索成立闽东苏维埃和闽东特委，以马立峰、叶秀蕃为正副主席，苏特为特委书记。不久党内发生了以施霖为首的第二次反中心县委，另组第二中心县委事件，党内虽有这种分歧，但党还在发展。八月间，北上抗日先遣队攻福州未克，进军闽东，闽东党即与中央发生联系，并奉中央命令将两个独立团集中编为红军独立师。十月正式成立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冯品太为师长，赖金彪副之，叶飞为政委，属三团，一特务连，连同地方武装，七个独立营及游击队警卫队总计人枪二千余。不久主力红军长征，局势变动，在敌人的进攻下，采取正规作战，遭到失利，遂转入游击战争。

## 三、闽东党发展中的检讨

闽东党以马立峰、叶飞同志为首，在艰苦中创造了军队，是有成绩的。但党的发展过程，是非常曲折复杂的，其经验教训：

1.建立游击队武装组织，虽几经摧残，但他仍是群众起义的骨干，革命斗争的旗帜。在军事方针上，开始是消灭地主武装，不打硬仗，坚持游击战，这都做得好的；但是后来在错误的军事路线下，对八十师守土作战，尤其在编为独立师后，一反过去，集中力量于苏区内部与优势敌人拚消耗，这是完全错误的。

2.闽东党的发生与群众斗争表现和长期的分散的游击战争，这是闽东党的特点。一方面在困难环境下能长期存在坚持斗争，但另一方面，好的环境到来，不能统一行动，以取得应有的发展。

3.党成立不久，发生几次分裂：由于闽东临海，帝国主义侵入较早，军阀割据，农村破产，土匪遍地，帮会盛行；在党内也反映

出严重的非党意识，个人主义，互相攻击。两次中心县委的分裂事件，对起义领袖范濬的杀害，不仅影响了党内团结，而且妨碍了党的发展。

4.闽东武装起义，是在苏维埃后期才建立了闽东苏维埃。党与苏维埃虽曾一时有大的发展，但未巩固，又因接受了后期苏维埃的错误政策；土地政策是执行肉体消灭地主，反对富农，侵害中农利益，经济政策是截留商人物品，乱加没收，在婚姻法和对男女平等的错误了解等等政策执行过左，造成基本群众甚至党员的不满。

这些问题是值得闽东党的同志深刻研究的。

## 第八、三年游击战争与走上抗日

## （1935年至1937年12月）

中央红军的长征，北上抗日先遣军的失败，与方志敏同志的蒙难；敌人对闽浙皖赣集中更大兵力，日夜搜山"清剿"。抢夺妇女手中的小孩，摔死于地，大批俘虏青年妇女，纵兵奸淫后，送去市镇卖为娼妓，群众愤恨已极，坚守红色堡垒，抵抗到最后，死不投降，有的自缢于树上，有的服毒自尽，妻离子散，惨不忍闻，党的干部大批牺牲；苏区全部沦陷。红军游击队亦被迫转入分散的游击活动，来坚持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

当时有北上抗日先遣军突围部分，粟裕刘英挺进师一股转到浙西南、浙南一带活动。赣东北地方武装滕国荣、匡龙海、关英一股在皖赣一带活动，闽北独立师黄道、黄立贵一股，闽东独立师叶飞一股，均就地坚持斗争。各部经艰苦困难的斗争，警觉到过去政策过左，执行开始转变：如闽北的黄道同志检讨闽北党的政策，纠正乱打土豪，允许并教育群众实行"红心白皮"的两面政策，进行争取保甲长统一战线工作，在军事上放弃打硬仗、攻堡垒、守阵地的错误办法，进行游击战争，争取群众。各部在政策执行上一般都有转

变，程度各有不同；但在军事上关英与刘英二股，虽然他们在进行游击战争，基本上仍继续过去硬打硬拚的作战方法。由于政策上的一些转变与游击战争的活动，到一九三五年底闽北闽东开始稳定，挺进师在浙西南与皖赣游击队在黄山西麓亦有些发展。但由于作战方法的错误，又遭失败。

一九三六年由于中央红军东征，"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全国抗日浪潮的高涨，西南事变的发生，绥远的抗战，红军在西北的大会师"双十二"事变，及党在全国人民中威信的提高，在此时期各部分均有新的发展。闽北闽东根据地均有些恢复；游击战争趋于活跃；挺进师与皖赣游击队亦有些发展。

"双十二"事变和平解决，各部获此消息，对时局估计不足，没有认识到国民党在谈判过程中乘机消灭我们。一九三七年一月，刘建绪为四省"剿匪"总指挥，以十余正规师，配合各省保安队及反动地方武装，向我各部分区"进剿"，我们在思想上、工作上缺乏应有的准备，因此挺进师与浙南根据地皖浙独立团与浙赣根据地又遭严重失败，闽北、闽东在军事上早有转变，部队损失较少，根据地得以坚持。

七七抗战爆发，统一战线成功，各部又有新的发展，年底即奉党的命令改编为新四军，部队集中，开上抗日战线。当时，闽北约一千余人，闽东一千三百余人，浙南五百余人，皖浙赣三百余人，共三千余人，成为新四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原有根据地在"一切为了前线"的错误解释下没有留下必要的武器，放弃了革命的支点。

闽浙皖赣党在极其困难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各部队能在长期失去上级领导，独立坚持与敌斗争，能在实践中检讨自己，掌握方向，执行政策的转变，尤其与群众生死在一起，而又领导群众，散布了革命种子，扩大了党的影响，发展了各地党的组织，保存了党的基本力量；在毛主席领导下走上了抗日战场，成为党和全国人民在抗日战场的劲旅。这些都充分表现了我们

党的布尔什维克精神是光荣的。同时，我们也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遭到了许多挫折。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

1.一九三五年敌人以绝大优势兵力向我进攻，根据地不能坚守，即时执行战略退却，群众采取两面政策，部队转为游击活动，根据地转为游击区，保存力量，坚持斗争，发展新区，如闽北闽东的转变；在根据地完全失败，干部率领部队转到阵地，分散扩大游击战争，如刘英、匡龙海二部离开闽赣东北，向浙南皖赣发展，这都是很好的经验。但未及时转变，实行退却固守苏区，如赣东北的失败；与转移后创造了新根据地而又重复过去的错误，硬打硬拚，如一九三六年浙南和皖浙赣新根据地的失败，这都是严重的教训。

2.在具体政策上，纠正乱打土豪，停止错误肃反，教育群众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与保甲长进行统一战线，这是三年游击战争能够坚持下来的重要条件。但转变还不够明确彻底，且有的地区过早暴动，重复过去的错误政策，这是创造新区又遭失败的重要原因。

3.在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党内团结，行动一致，游击队与地方党密切结合，是坚持游击战争的决定因素。但宗派主义，闹不团结，甚至分裂组织是非常有害的。如闽浙边省委的分裂，互相缴械，互相杀害，以至在敌人进攻面前，不能互相配合与策应，使党与革命遭受严重损失。

4.在被迫失去上级联系，应坚持斗争，开展工作，在接上党的关系时应及时服从党的领导，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备的品质。三年游击战争也深深体会到没有上级的领导，不了解形势变化与党的路线，这是非常痛苦的。但有个别同志固守山头，独立自革，这是非常错误的，把部队全部集中开上前线，放弃原有阵地，这也是非常错误的。

## 结　语

闽浙皖赣的党，自建立以来，领导群众，进行革命，英勇斗

争，迄今已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党内充满着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以方志敏同志为代表的路线，这条路线在一切革命基本问题上是与全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始终相符合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另一条路线是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是与全党发展历史上各个时期机会主义路线相联系的，在大革命后期为陈独秀路线，在苏维埃前期为立三路线，在苏维埃后期为新立三路线，在抗战初期又转为新陈独秀路线，这是一条错误路线，闽浙皖赣的党始终站在以方志敏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上，与这些机会主义路线进行顽强斗争。

闽浙皖赣党，在大革命后期与陈独秀路线斗争，和在苏维埃前期与立三路线斗争的史实，党早已检查，做过结论；他们危害党与革命的罪恶是非常严重的，历史也做了判决。但对新立三路线，在闽浙皖赣尚未做过严肃的检查，党亦未做过结论。新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某些成见迄今尚在流行，例如："红十军原来是不能打的"，"新红十军是怕死的"。这是完全歪曲历史事实的。如果红十军打不得仗，新十军又怕死，那么红十军与赣东北苏区，是那里来的呢？敌人为什么早不把它消灭呢？闽浙皖赣的党史，非常有力的说明：在以方志敏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下，创造了苏维埃和红军，苏维埃根据地日益巩固扩大，红军日益强大能打，革命日益向前发展。而在曾洪易为代表的新立三路线之下，断送了苏维埃和红军，造成革命严重挫败。并且这一错误路线，余毒很深，在三年游击战争尚未完全消除，因而不断的招致严重损失。抗战初期还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强令要游击队集中，完全放弃了原有的阵地。因此，对于新立三路线在闽浙皖赣，有着重清算的必要。

新立三路线在闽浙皖赣是怎样危害党与革命呢？新立三路线根本不了解中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因此不了解中国革命现阶段是民族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不了解中国革命根据地与武装长期斗争积蓄力量的特点；亦不了解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在中国的正确内容。于是他

提出了一条与党的正确路线完全对立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在闽浙皖赣是以曾洪易为代表的。具体表现是：

1.打倒一切的"明确阶级路线"。在"明确阶级路线"的口号下实行"反对富农，中立中农，联合贫农"。由于所产生的清查阶级收回地主已分得土地及富农分得的好地，驱逐逃亡地主、富农家属出境，禁止敌占区群众的"白皮红心"，断绝苏区与白区群众来往，等等过"左"政策与行动，实际上是消灭阶级，打倒一切。这样孤立了自己，结果是被一切打倒。

2."不失寸土"的"持久围困堡垒战"。在曾洪易的持久围困堡垒战略方针下，实行与强大敌人盲目决战。由此产生的攻堡垒、守阵地、拚消耗、分兵扎口全面出击，取消游击战争等等错误的军事行动，美其名曰"战胜敌人，不失寸土"，结果是到处挨打，一切失掉。

3.宗派主义的"保证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在"保证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的借口下，实行篡党篡团吞编军队，给坚持党正确路线的干部戴上"封建主义"、"保守主义"、"立三路线"、"富农路线"、"异己分子"等等帽子，打杀撤职，以"肃反胜利来争取红军胜利"给以反革命罪名，大量杀害、割断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自毁长城，自丧元气。名之谓"保证执行国际的彻底转变"，结果是保证了一条反国际路线的新立三路线。

以上就是新立三路线在闽浙皖赣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出来的具体体系，也就是它危害党和革命的主要内容。

由此可知，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是革命成功与失败的斗争，是千百万群众祸与福的斗争，是党生死存亡的斗争。过去党与错误路线斗争，特别是新立三路线的斗争，许多问题，不能够明确提到路线的高度，这是我们的弱点，应作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这里党史教训我们，实际经验是非常需要的。脱离实际的理论是教条，是害死人的。但只有实际经验，不能上升到理论，是盲目的。只有理论与实际结合，才能有力的与一切错误作斗争，并克服一切错误。

因此我们要加强学习毛泽东思想。虽然闽浙皖赣党由于新立三路线的错误遭受到深重创伤，迄今未恢复元气，但我们相信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确路线领导下，创伤是可以治好的，胜利是可以取得的。闽浙皖赣的同志应该有这样的信心。

#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诞生前赣东北初期农民运动的概况

邵 式 平

自广东出发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六年秋，进入江西，攻占了南昌。广大人民莫不欢欣鼓舞。汹涌澎湃的大革命高潮，飞速地向前发展。正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来到了南昌，不久便谣传"国民政府要迁来南昌，将以南昌为革命首都，以便策划东进"。就在这个时候，北洋军阀孙传芳残部得以从容地由赣东北分别向皖南浙西撤退。这就造成了赣东北广大地区一时的混乱局面。在这种反革命政权已经塌台，革命政权尚未建立的混乱局面下，各阶级都纷纷起来争夺地方政权。赣东北各地的农民运动，就是在这个时期飞跃地发展起来的。

远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我们党在南昌开办了黎明中学，黎明中学的校长就是曾天宇，党的组织在青年学生中有很大的发展。当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都参加了国民党，在党的领导和指示下，学生党员在寒暑假回家，都要做群众工作，主要是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在许多地方的群众中，散播了革命的影响。大革命的风暴到来了，当时赣东北各县的局面又是那样地混乱，因此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便迅速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开展了夺取地方政权的革命斗争。

当时在各县领导农民运动的同志，据我所知：弋阳有黄镇中、雷夏、方远辉、舒翼、余汉潮、范荷香、潘式京、彭年、黄应钟、方志纯、胡德兰和我；横峰有黄道、吴先民、邹秀峰、陈仰范、钱璧、项春福、黄球、黄端喜、李穆等；贵溪有江宗海、邵棠等；余

干有董思远等；波阳有李新汉等；都昌有刘肩山等；东乡有舒同等。这些地方都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共青团支部、国民党县党部、县工会、县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商民协会、学生会等等的革命组织。发动了广大群众，开展了打倒土豪劣绅夺取地方政权的激烈斗争。弋阳、横峰、贵溪三个县的斗争，表现得更突出。

孙传芳指挥下的刘致陆残部从弋阳沿信江向浙西撤走了，国民革命军在南昌还没有出动，弋阳在混乱中，便出现三种势力：

一、原来的当权派。这一派是当时革命的对象，是代表地方豪绅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极端反革命派。他们从来就是与军阀官僚勾结在一起，残酷地压迫剥削劳动人民，一贯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他们在这个时候，却摇身一变，五颜六色，一会儿宣布自己是同盟会员，一会儿又派自己的儿女和亲戚来要求加入国民党，一会儿宣传差不多所有革命者都曾经是他们的好朋友，实际上他们对革命是非常仇视的。他们借口"要维持地方秩序，以利革命的发展"，便到处拉拢挑拨，暗中收买流氓地痞，布置打手，运动大家签名挽留伪县长改任革命的县长。当这一切无耻阴谋被揭穿之后，他们便在表面上装得更进一步接近革命的样子，实际上则秘密派了好些人去南昌进行反动活动。

二、流氓匪棍派。这一派是土豪劣绅的走狗。他们平时不务正业，坏事无所不为；在这个时候，与原来的当权派勾结，也想夺取地方政权。当刘致陆残部从弋阳撤退的时候，他们预先埋伏在弋阳县城东门外，从掉队的病兵手上抢到了几条枪，便盘据叠山书院，招兵买马，网罗流氓地痞，到处送委任状，到处封官；表面上要求改编成为地方武装，实际上听命于豪绅地主当权派，并暗受他们接济。他们和前一派一样，到处拉拢，时刻散布种种谣言，并要求加入国民党。他们把自己说成是革命起义的武装，乘机向人民敲诈勒索。当时乐平、景德镇、浮梁三个地方的流氓匪棍也组成了一股这样的土匪队伍，不敢驻在当地，就开来弋阳芳家墩驻扎。弋阳的流氓匪棍派便衣与这股土匪相互联络，积极阴谋以武装夺取地方政权。

三、由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派。这一派是代表工人阶级、农民群众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就是以方志敏同志为首的革命派。国民革命军攻占南昌后，方志敏同志任省农民协会主席，影响很大，全县人民都根据自己的经验，认识到这一派是真正的革命派。这一派积极地深入群众，召开各种群众性的会议，宣传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减租减息、烧毁借字契据、不还旧欠，组织起来就有力量等等的革命主张和口号，取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在很短时期内，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成为革命的领导核心；建立了国民党县党部，以及各种革命组织。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认识到前面两个派别都是反动的，都是当前革命的具体敌人，如果不把他们的势力打倒，革命就不能发展起来，一场严重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因为当时当地具体情况，革命力量和条件尚不够成熟，不能贸然进行斗争。为了要争取这次斗争的胜利，党动员了自己可能动员的力量，积极贯彻执行以下的政策：(1)加倍努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一切反革命派别，从群众中孤立起来；(2)在革命力量和时机没有成熟以前，要尽量避免过早决战；(3)利用一切条件，不要错过一切有利的时机；(4)前面的两个派别，虽然都是反革命的，但也有一定的区别，必须有区别地对待；(5)要在各种情况下，尽可能正确地运用我们的影响，争取中间人物；(6)多方设法与党省委和方志敏同志联系，以取得上级党委及时的领导和方志敏同志的支持。这些作法，在事后看来，基本上是正确的。

决战有利时期很快地到来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师自南昌出发，十一月底经过弋阳，并在弋阳城宿营。我们动员了数千群众在城外夹道欢迎，国民革命军全体人员，极为兴奋。军民之间异常亲切，互相欢呼，高唱革命歌曲，欢欣鼓舞，热闹非常。当时豪绅地主当权派以伪县长为首，几十人自成一队，站在最显著的地方，想借此以表示他们对国民革命军的“欢迎”。但是国民革命军的全体官兵，根本不理睬他们，而且讨厌他们。没有欢迎终了，他们的欢迎队伍

就散了。群众的队伍就更加兴奋百倍。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的政治部了解了当时弋阳的情况之后，立刻派兵将伪县长从县衙门里叫去，怒斥了一番，并警告伪县长说："如果以后，你有一点违抗县党部的领导，就枪毙你。"国民革命军就这样地支持了革命派，因此，豪绅地主当权派阴谋在混乱中夺取县政权的企图，便一时被打击下去了。

国民革命军第一师次日就离开弋阳，继续东进了。这个时候，盘据叠山书院的流氓匪棍派及其武装都感到特别恐慌，表示靠拢革命派，并且为豪绅地主当权派说和。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我们对他们说："你们与那些当权派是有区别的，不应恐慌不安"。几天之后，第二师又开到弋阳宿营，该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特别约我谈了一次话。对于弋阳政治情况的看法，我们完全一致。当晚该师即派队伍解除了流氓匪棍派的武装，并将他们的头子逮捕入狱。与此同时，该师还派了部队把盘据在芳家墩的乐平、浮梁、景德镇三个地方的土匪也消灭了。这场斗争的结果，革命派基本上获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

弋阳的革命派夺取了政权后，为了发展革命力量，认为普遍深入农村、扩大宣传、组织群众并武装群众，是最重要的环节。因此，便派了很多干部下乡去开展农民运动。这个时候，省里派了新县长到弋阳来，并逮捕了伪县长送省处理。新县长到任后，未通过县党部，便派出了一大批旧人员去各乡捐款，这是与我们普遍深入地发展农民运动直接矛盾的。有了农民运动的地方，都纷纷反对。我们认为新县长这种做法，使县政权有脱离革命领导的危险，实际上这是争夺政权的问题在新的情况下的继续发展。必须采取坚决的步骤，纠正新县长这一错误，必须使新县长接受和依靠革命的领导。办法是经过县农民协会决定，各乡农民协会有逮捕贪官污吏之权。这样一来，区乡一切政权实际上都归了农民协会，农民运动就更进一步高涨起来了。这个运动一开始，弋阳漆工镇的伪巡官便带了两条枪到县里来辞职，这两条枪即交给县农民自卫军。同时，东进部

队有个病兵背着半条枪（截了一节的）来县党部请求医治，这半条枪也交给农民自卫军负责保管。当时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是完全在党领导下由党员方远辉同志掌握的。后来群众相传红十军团是两条半枪起义的，故事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个时候，我们在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已开始感到武装的重要。漆工镇伪巡官辞职后，立刻决定派雷夏同志去担任这一职务。当时党交给雷夏同志的任务是：(1)必须把武装交地方农民自卫军，警察的职务也由农民自卫军担任；(2)必须与黄镇中同志等一起做农民运动；(3)必须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因为当时黄镇中等同志在漆工镇业已成立党支部。由此，漆工镇的农民运动，便以暴风骤雨的形势，开始向封建主义的基础直接冲击了。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向豪绅地主进攻和执行省政务委员会的财政任务起见，我们与新县长谈妥了，应该向豪绅地主官僚资本家捐款来解决，并由农民协会和工会去执行。各地的农民群众在农协领导下，取得了向豪绅地主捐款的权力，革命情绪更加高涨。漆工镇一带的农民背起枪到豪绅地主家里要北伐捐款。根据农民群众的分析，豪绅地主能拿出多少，就向他们捐多少。如果豪绅地主不接受群众的意见，便坐下来要同豪绅地主算帐，算多少天，就吃多少天。如果豪绅地主反抗，就把他们逮捕起来，押送农民协会法办。有的豪绅地主不服，偷着逃亡县城，农民马上到县里来追捕。这时豪绅地主的威风体面扫地，农民协会权力大得很。农民群众开始领会革命对农民的利益，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农民群众说："共产党领导坐天下，我们就真出头了。"实际上，这不只是取得向豪绅地主捐款权的问题，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农民向豪绅地主专政。这是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初步尝试，也是后来弋、横农民大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次演习。

当弋阳在混乱局面中，各阶级争夺政权斗争正在开始的时候，横峰县黄道同志从报纸上知道我是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知道我早已与党省委取得组织联系，即派邹秀峰同志到弋

阳与我商谈工作。我从邹秀峰同志那里了解到当时横峰比弋阳要好一些。横峰的主要特点是流氓匪棍没有另外形成一种力量，因而在他们那里只有原来的豪绅地主当权派与代表工人农民和广大人民的革命派对立，双方旗鼓相当，而且不象弋阳那样分化得明显。邹秀峰同志回县后，他们也和弋阳一样，积极发动工人、农民群众，并把各种革命组织都建立起来了。省政务委员会派了新县长和公安局长到横峰后，豪绅地主当权派头子就暂时地消声匿迹，有的逃亡到河口镇去了。横峰县的革命派和新县长合作了一个时期，革命是在比较和平斗争的情况中向前发展着。但农民运动逐渐深入，又在弋阳漆工镇一带的农民运动直接影响下，必然发展到直接向农村的豪绅地主斗争。实际上横峰的姚家垅、青板桥、霞坊等地的农民协会，已开始发动了农民群众向土豪劣绅清算地方各项公款的斗争了。

那个时候，蒋介石和他的司令部驻在南昌，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全省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用圈定的办法，支持右派段锡朋等夺取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领导权，取消了省政务委员会，并任命右派李烈钧为江西省主席，江西省的右派便开始猖狂起来了。这一情况的变化，不能不直接影响到全省各地正在发展着的农民运动。横峰县的新县长和公安局长，是当时国民党右派分子，与段锡朋等的关系较为明显。当农民一起来斗争，土豪劣绅就利用各种关系，诬蔑农民运动，并收买拉拢一批狗腿子，到县政府告状。县长就装作中间人，采取仲裁的形式，来缓和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民运动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南昌爆发了伟大的群众革命运动。把国民党右派李烈钧、段锡朋等打倒了，成立了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并改组了省政府。我在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全省代表大会之后，即被任命为没收张天师财产委员和省农协特派员。四月五日我视察了赣东北各县农民运动，回省报告工作，第二天即从朱克靖同志

（当时省政府的秘书长）手上，接了省政府任命我为赣东北各县特派员的委任状。党委告诉我，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风声很紧，要我迅速返回赣东北各县视察。我即从捷径直趋横峰，在横峰党委的同意下，根据省政府给我的权力，撤销了横峰县长和公安局长，成立了县政务委员会，任命邹秀峰同志为政务委员会主席，吴先民同志为公安局长。当时县公安局有武装警察20人，步枪14枝，均由吴先民负责掌握。这样横峰县的革命派，才真正地掌握了政权和武装。同弋阳漆工镇一样，警察的枪支都交给了农民自卫军。这也是后来弋、横农民大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的一个有力因素。

形势变化很快，当我处理了横峰的问题之后，上饶的国民党已经反动，贵溪的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很紧张，我即赶往贵溪视察。

在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攻占南昌之后，贵溪的情况与弋阳相似。在刘致陆残部撤退后的混乱中，一下子出来三种势力争夺政权。贵溪的特点是流氓匪棍乘机而起的土匪部队没有及时消灭，他们在组织以后，即进占了河口镇，就在那里招兵买马，积蓄力量，伺隙而动。另外一个特点是时间长了，情况越来越复杂化。江西省政务委员会派去的新县长，带了一连部队去贵溪上任。新县长一到任，原来的豪绅地主当权派即退了位，并在表面上装做不问政治的样子，实际上却暗中与驻在河口镇的土匪相勾结。革命派虽然把革命的各种组织都建立起来，党的支部也建立起来了，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很不够。这样革命派虽然与县长合作，实际上决定权在县长。这时流氓匪棍的武装还在河口镇，他们对于革命总是一种威胁。但是这种情况是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四月二日，南昌群众的革命运动，把国民党右派打倒了，把省主席李烈钧赶走了。这个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全省。贵溪的右派分子有些恐慌，便暗中与豪绅地主勾结，并通过他们，要河口镇的土匪潜兵袭击贵溪。土匪到了离贵溪仅十里的流口地方，县城才知道。这个时候，县长和我们党的各领导同志仓猝出兵应战，幸而一战大胜，缴获步枪15枝，俘虏三个土匪，都是贵溪的恶棍，人心大振。贵溪的党决定要发动群众，

镇压反动派，打击右派，召集了一万多农民入城，开祝捷大会。正在这个时候，我到了贵溪。

这天，到会的农民群众，革命情绪非常高涨，万多农民，拿着锄头，集合在大会场上，俨然是一支革命的大军。这是当时贵溪农民运动的最高峰。但在大会之后，游行示威的时候，群众采取了请愿的方式，一致要求枪毙俘虏来的三个土匪，弄得县长极为被动。县长说："省政府特派员在这里，只要特派员批准就行"，这样一来搞得我也十分被动。我立刻要求党支部开会。在党支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枪毙土匪对发动群众，打倒反革命，反对右派都有好处。我便以特派员的权力批准了群众的要求。从这一点，我认识到贵溪当时党的领导也是被动的，事前并没有考虑到群众请愿，也没有决定要枪毙俘虏来的三个土匪。群众里面没有党的领导，而是各人指挥自己所影响的一部分群众，个别同志不经过党就指挥群众行动，这是错误的。事情来不及检讨，革命的转折点就到来了。第二天上午十时许，自南昌逃出来的李烈钧率领着二、三百人的卫队，突然进了贵溪城。这时我正在贵溪中学向学生宣传打倒蒋介石，城里面的枪响了，这就是枪杀贵溪革命领袖江宗海同志的枪声。恐慌和哀悼的情绪，一下子笼罩了贵溪城。贵溪的革命和农民运动，就这样受到了虽然是暂时的，但是严重的挫折。

自南昌逃出的李烈钧及其卫队，打了贵溪，又打了弋阳，到了上饶，便与赣东北各地逃亡的反革命分子会合，成立赣东伪省政府。紧接着便是"四一二"事变，赣东北各县的情况，就处在宁汉对立的接触线上，许多县的革命和农民运动，便开始进入了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一九二七年开始，我即调离开弋阳，由方志纯同志接替我的工作。当革命进入武装斗争的时候，方志纯、舒翼、方远辉等同志领导的弋阳县农民自卫军，退出了弋阳城，转移到漆工镇与黄镇中、雷夏、方远杰等同志领导的农民自卫军会合。他们在会合之后，声势大振，动员了一万多农民武装，把李烈钧的反动武装赶走了，又

进占了弋阳城，但由于情况日紧，便主动地撤退，再回到漆工镇一带打游击。“四一二”事变，蒋介石完全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狰狞面目，许多革命的部队，不断地哗变。自蒋介石那里哗变出来的队伍，有一部分(约一个连)来到漆工镇想与农民自卫军结合，虽然结合没有成功，但他们赠送了农民自卫军几条枪，这对于增强农民自卫军的力量和信心是很大的。这时横峰吴先民、邹秀峰、黄端喜、黄球等同志领导着农民自卫军武装，在情况紧急中也主动地撤出横峰城，转移到山区坚持打游击战争，并三次率领农民自卫军攻入横峰城，救出了许多革命同志、革命群众和革命家属。

蒋介石反革命势力，自上饶步步向南昌进逼，弋阳、横峰、贵溪及其他邻近的一些县城，先后均为反革命所占。赣东北许多地方的农民协会，都向农村转移。弋阳、横峰的农民自卫军，因为有武装，便在漆工镇、青板桥、姚家垅一带山区一面坚持游击战争，一面派员去南昌请兵增援。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到廿日，在南昌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全省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改选了省党部。方志敏、黄道当选为常务委员，我也当选为监察委员，因此我们三人都在南昌工作。弋阳、横峰的同志不断来南昌要求早日出兵增援。南昌的情况，正处在“八一”起义的前夜。朱培德从“四一二”后，日益动摇，不久，就完全反动了，停止工农运动，“礼送共产党”出境等等反动罪行，接二连三地发生，方志敏和我都先后离开了南昌。弋阳、横峰来省请援的干部，本来是和我们联系的，我们一离开南昌，他们也先后各自回去，仍然打游击去了。

“八一”起义后，全国的反革命势力，急于争夺地位，他们相互矛盾，尖锐复杂，无法集中火力来进攻弋、横山区的农民自卫军。同时弋、横山区的农民自卫军武装，因为与上级党的领导失去了联系，也开始转为无定形的小股革命游击队，就地坚持游击战争。

方志敏、黄道和我在“八一”起义后，都失去了联系，各人只好回到农村去，依靠群众，继续工作。我们都先后回到弋阳、横峰与

那些坚持打游击的同志相会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由方志敏同志召集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的共产党员开会，这就是有名的弋阳窖头会议。这次会议以后，赣东北的农民运动便进入了新的阶段。

关于窖头会议的情况，一九四五年红十军团在延安的同志，集体写闽浙皖赣（赣东北）党史，献给"七大"，其中对窖头会议曾有一段：

弋（阳）、横（峰）的同志虽与上级党失去联系，但仍在山区坚持斗争。此时，方志敏同志回到弋、横，即与坚持斗争的黄镇中、雷夏、方志纯、吴先民、黄端喜等同志会合，于十一月召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党员会议，当时到会的有：

弋阳　　方志敏、邵式平、邹琦、彭皋、方志纯、黄镇中、方远辉等

横峰　　黄道、吴先民、邹秀峰等

贵溪　　邵棠等

上饶　　汪同志（会后赶到）

铅山　　缺席

会议在听取了方志敏同志报告后决定：

1.当前形势与党的方针：指出国民党已经反动，革命任务没有解决，革命必然在新的形势下向前发展，目前中心任务是土地革命。党的方针是以武装起义，夺取政权。

2.武装起义纲领：

推翻帝国主义，　　打倒国民匪党。

铲除贪官污吏，　　肃清土豪劣绅。

平债分田分地，　　建立劳农政府。

如果中途变心，　　刀斩弹穿不赦。

3.建立党的领导机构：

大会选出方志敏、黄道、邵式平、方志纯、吴先民、邵棠、方远辉七同志组成党的工作委员会，志敏同志任书记。规定未与上级

党发生关系前，工作委员会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窖头会议之后，接着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弋(阳)横(峰)农民大起义。赣东北其他各县的农民运动，也多方派人前来联系和响应起义。从此便创造了闽浙皖赣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和强大的红十军团。

以上便是红十军团诞生前赣东北初期农民运动的概况。

一九五八年二月廿八日

# 弋横暴动

缪　敏

一九二七年"八一"起义后，方志敏同志从吉安化装回到了故乡弋阳九区湖塘村，立即把隐蔽在各地的同志方志纯等，一个个的找来开了一个会。大家认为必须反对悲观动摇、灰心消极，应该重起炉灶，从下层群众做起，不要怕艰苦。会后分头到各村去进行活动，在七天之内，居然组织了二十几个党支部和二十几个群众团体如农协会等。

这个地方的革命组织发展得这样快，是因为这里的群众深受革命的影响。在北伐军到江西的时候，这里就成立了农协会，捉了该区的大劣绅张念诚。其余的土劣逃的逃、罚款的罚了款，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后来反动军阀李烈钧到了赣东，土劣就请了一连人来报复。因为无人指挥，九区人民虽然集合了五千余人，打退了他们的一次进攻，但是终于失败了，被李军烧了二十几个村子，漆工镇被烧得精光。因此，群众恨透了反动军阀和土豪劣绅，所以这次一有人去宣传组织，他们就很快组织起来了。

农民组织起来以后，当时检查了一下武器，实在太少，力量太不够，于是决定派方志敏同志到波阳去搞些枪来。波阳原有一个警备团，有枪一百枝。团长是共产党员胡烈同志，波阳珠湖人。志敏同志从吉安回弋阳途经波阳时，曾在船上找到了波阳的同志谈话，要他们把警备团带到弋阳去，以保存实力，他们答应可以。这次去波阳，志敏同志满以为可以把警备团带来，至少可带一半；那知到了波阳后，才知道警备团内部有反动派，将警备团断送了。胡烈同志被撤职，共产党员都被开革，警备团变成了豪绅地主的走狗。只从

一个负责人家里弄到十来枝枪。

在波阳，志敏同志遇见省委派去的特派员，听了关于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经过的报告，土地革命的口号，举行秋收暴动等决定，好不欢喜！志敏同志速将十来枝枪运回，准备秋收暴动先攻下弋阳城，即以此为根据地。

大革命时被弋阳九区农民捉去关在南昌的大劣绅张念诚，在“八一”起义时，乘机逃出来了。就这时，他运动了一营白军，来进攻革命的农民。

当时，志敏同志在湖塘村召集各村的农民代表开会，讨论秋收暴动问题，我们虽有十几枝枪，但还没有组成队伍，枪还分散在农民手里，自然没有抵抗力量，只好散会。

张念诚带着白军，一来就进攻志敏同志的家乡，放火烧屋。志敏同志带了几个同志和十几个托枪的农民，到丁山村暂避。住了两天，张念诚又派兵来包围，幸好早就有人向志敏同志报信，连夜离开了丁山，让敌人扑了个空。

后来志敏同志因过度劳累，吐血病复发，不得不休养。三个星期后，他到波阳县委去请示工作（当时弋阳、横峰都是区委，均属波阳县委领导），县委认为志敏同志在弋阳工作目标太大，决定调他到横峰工作，将原在横峰工作的黄道同志调到弋阳。

志敏同志回弋后，九区农民干得很起劲，还缴到了敌人两条枪。后来白军退走了，志敏同志就领导群众去打张劣绅的根据地——烈桥。应召到的群众有三百多人，沿途临时加入的群众则有三千多人。攻入烈桥时，张劣绅与其党徒均逃遁一空（张逃到南昌上海等地，以后病死在外）。从此，弋阳九区就成了出色的九区了，坚持了八年的斗争，成为赣东北苏维埃最巩固的根据地。

※　　　※　　　※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志敏同志遵照党的决定潜赴横峰工作。

横峰农村的经济也很衰败，农民群众受的剥削和生活的贫困痛

苦，比较弋阳，有过之无不及。千千万万的农民缺地或无地，终年劳累，得不到温饱，群众在贫穷、痛苦、怨恨中，迫切要求解放。志敏同志在他的遗著中曾写道：横峰象一个革命的火药箱，我毫不讳言的，我是烧线人，我走进横峰，把火药箱的线点着，火药暴炸了——革命的暴动很快就暴发起来了。

志敏同志到横峰后，首先找到黄道同志，他是在"八一"起义后跑回来隐藏在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的。志敏同志将许多情况对他说明之后，在打石坞召开横峰共产党员会议。黄道同志介绍志敏同志与横峰的同志认识，讨论了横峰工作问题之后，就到弋阳九区工作去了。志敏同志就带着半截套筒子步枪到各处进行活动，他有时化装成一个商人，有时化装成一个农民。

他到蓝子坂村时，是化装一个商人，戴着一顶绒帽子，穿一件灰色袍子，有时赤着脚，穿一双草鞋。志敏同志到蓝子坂村先找花春山同志，说是书友(即同学)。花春山同志是中农出身，小时念过几年书，后在蓝子坂开杂货店，很早就参加了革命。

志敏同志化名汪祖海，在花春山家里住下，白天就在屋里休息和看书，晚上就到各地进行活动，积极地发动和组织贫苦农民，大家都叫他老汪哥或汪先生。他首先是通过当地的一些积极分子(过去农民协会的会员如花春山、蓝长金等)，再去串连欠债最多、生活最苦的贫雇农民，找他们谈话，提出平债分田的口号。

那时正大革命失败之后，横峰的共产党员和群众都受到反革命的相当打击，有的罚过款，有的才从福建逃回家来，情绪不免低落了一些。他们说："欠财主佬的债，会让我们平了吗？地主佬的田，会让我们分了吗？"有的还说："你是不是有谕旨来的？没有谕旨来的就是犯法。"遇到这种情况，志敏同志总是耐烦地进行解释，一而再，再而三，说得他们思想通了才罢。

几天之内，居然被志敏同志说服好几个群众了。他们高兴地说："照你这样说，革命是会成功的。"志敏同志回答说："当然。"并嘱咐他们拿这些道理去向村中别的穷人宣传，邀伙结伴，组织一

个团体。经过他们邀集介绍，没得一两天，有个村子就邀集了三十四人请志敏同志去他们村里开会，帮他们把团体结好。志敏同志在会上问："没有钱用，欠了财主佬债的同志有几个？请举手！"三十四个人一齐举起来。志敏同志又问："自家没有田种，向地主佬租田种，交租给地主佬的有几个？请举手！"大家又一齐举起手来。他们嘈杂地说："那一个不是穷的；不穷也不来革命了。"随后，志敏同志又问："大家赞成平债分田吗？"大家一齐举手，一边齐声喊道："赞成啊！"又说："这个还不赞成！？我们吃尽了他们的亏！"

于是一个一个的宣誓："斗争到底，永不变心！"在红纸名单上画过押，喝过一杯鸡血酒，编好小组，选出团长委员，这村子的农民革命团就算是成立了——当时认为农民协会这个名字弄腻了，故取名叫农民革命团，凡村中的工人、雇农、贫农、中农都可以加入，是农村工农群众统一的联合组织。主要的口号是："打倒豪绅地主"、"建立工农政府"、"实行平债分田"等。

志敏同志以蓝子坂为中心，到处发动和组织群众。在蓝子坂起初发动和组织了花春山、蓝高茂、王国师、王启发、蓝何玉、蓝挺怀、张世恩等七人。以后由这七个同志去宣传、串连，共发展到三十多个革命同志。

一天夜晚，志敏同志随带二、三人到瑶山进行秘密活动，召开了贫雇农座谈会。当时参加的有张德远、张大礼、张相木、张世恩、张兴有、张相来、张明、张大栋等八人。经过一个时期的秘密活动，该村就发展了十几个团员，到暴动时参加的有四十多人，并杀猪宣誓：

"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扶助工农群众，大家努力革命，如若反党，刀斩弹穿"。宣誓完毕大家都嘻笑地喝鸡血酒盟誓，农民将鸟铳、土炮、花枪准备好，集中了百余人准备暴动，成立了农民革命团。

之后，志敏同志又到青板桥进行过活动，住在吴先民同志家。

吴先民告诉他妻子说："来了一个同学，你不要对人说呀。"到晚上找五、六个贫雇农和手工业者开会，并要吴先民的老婆买了一只鸡，要了水酒和香，进行宣誓。

志敏同志住在蓝子坂时，那里正在打醮，要吃素，花春山打了一条狗吃，封建头子蓝金元说他破醮，罚他一堂斋烛，否则要赶他走。花春山不肯接受，封建头子就勾结国民党派了几个警卫团的人来捉他们，志敏同志得到了消息，又化装由蓝高茂和蓝玉河两人送到楼底村去住在蓝辉和家里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志敏同志到楼底村后，也是找欠债最多和生活最苦的人谈话。他问人家家里有多少人，种多少田，欠几多债；并问欠了债准备怎么办。当有人说慢慢还时，志敏同志就耐心地对他们讲贫苦农民和豪绅地主都不是天生的道理；要是有人说要抗租抗债，志敏同志就告诉他："对豪绅地主的租不能缴，债不能还，而且他们的田地都是我们的，一定要拿来分过。要分田，就得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豪绅地主的统治，这就要我们农民团结一条心。"

一个村的农民革命团组织起来后，即由这一村发展出去，不上十几天，周围三、四十里的村坊，都逐渐有了农民革命团组织。农民革命团一经建立，这村中的权力，即暗中转入于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之手，农民对于地主的租和债，也学会了拖的办法。他们对地主说："先生，今天没有，明天再说。"周围的人也围上来，一边拉，一边劝，一边说："逼死了人，可要偿命。"就这样把欠租欠债拖着不交。

到快过年的时候，豪绅地主都纷纷向工农群众逼租逼债。起初还设词拖延，但愈逼愈紧，无法拖延下去，于是各村农民革命团体的群众，每天总有十几批跑到志敏同志跟前来催问：

"什么时候暴动？"

"还早啦，准备还不够呢。"志敏同志回答。

"赶快动手，实在忍不住了，要逼死人啊！"他们再三说。志敏同志再三说服解释，才把他们劝走。但过几天，他们又来催问：

“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暴动？”

* * *

志敏同志所以从蓝子坂转到楼底村组织农民革命团，作为暴动起点，是因为楼底村有很多优越条件：一、这里群众是靠挖煤推车为生，全村只有一户富农，没有地主；二、这个村的群众斗争性强，不怕闯祸；三、地形好，有茂密的山林，北通葛源磨磐山，东通铺前目灵山，南通弋阳横峰；四、武装基础好，打鸟的很多，有很多鸟铳，并有煤洞便于隐藏。

楼底村的农民革命团团长蓝长金同志，是个性情暴躁的人，他与同村的几个人，开了个煤洞，每天钻进洞里去挖煤，好的日子每天能挖出两块钱的煤来，不好的日子只能挖出块把钱的煤。为着每天一、二块钱的煤，要脱得一身精光，在漆黑无光，水蒸汗臭的煤洞里劳动十几个钟头，挖的挖，拖的拖，爬出洞来一身乌黑，真不象个人样。这样赚来的几文钱，真是一文钱、一滴血！可是横峰县的衙门却每月要抽他们的捐，怎叫他们不痛心呢！

十二月十九日，县衙里来了一个收煤捐的委员，到他们的茅屋煤厂里坐下。这委员的神气十分傲慢，眼眼朝天不理人，一下轿就冒火：

“你们每月五块钱的捐，不按期送县缴纳，还待我来催，是何道理！”

“近来煤出得不旺，凿进一洞又一洞，尽是些石壁烂皮！”一个煤工，一边吸烟，一边懒洋洋地说。

“我们官府，不管这些，我们只是要捐！”委员说。

“没有煤，我们饭都没有吃，没有钱交捐嘛，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蓝长金忍不住大声叫起来。

“呵！原来你们是抗捐不交，我早听到你们这里结党要造反，现在弄清楚了。看吧！老子回衙门报告，明天就把你们捉进牢里去，坐到头发三尺长。你们这班狗东西！”委员破口骂起来。

“你说那个是狗，你才真是狗！就不交捐，咬我的卵去！”蓝长

金站起来回骂。

这一下气得委员跳起来，赶上去照着蓝长金的脑壳一拳打下去。蓝长金是个活手，有一手好武艺，他一个能敌过两三个，早将来拳架住，顺手向委员的肋下轻轻一推，委员是个斯文人，官格虽大，力气却很小，给蓝长金这么一推，早已两脚朝天，滚倒在地上。看看今天势头不对，倘再不识时务，必定还要吃大亏，于是很快翻身从地上爬起来，急向外跑。一边跑，一边喊。

"你们抗捐不交，还要殴打委员，看！明日再来和你们算帐！"

"咬我的卵！咬我的卵！"蓝长金还在回骂。

人们见闯下大祸，有的不免有些担心，明天要是县衙门发兵来不是好耍的，不是家破便是人亡，蓝团长呢，毫不畏惧，用拳头往胸前一捶，说："怕什么！组织农民革命团是做什么的，打起锣来，召集各村革命团的人来，追上去把那委员捉回来，把他杀掉，就没有人去请兵来了"。

人们都赞成蓝长金的意见，大家就飞跑回村，把锣大敲起来。一面敲锣，一面喊："革命团的人快来，捉回那县衙的狗委员，他要去班兵来捉我们人啦！"

这伙人跑到离县城几里的地方转回来，并不解散，集合到蓝家村的祠堂里，杀猪煮饭吃，准备第二天真有队伍来，就同他们杀一场。

那时志敏同志到弋阳九区开会去了，他们就连夜派人请志敏同志回来。志敏同志一到，大家就围拢来了，有一千多人。志敏同志考虑暴动准备虽不十分充分，但事已至此，是不能再按下去了。所以当他们围拢来要求他下命令时，志敏同志回答说："照往日开会所讲的计划去做，暴动吧！"

在这天晚上，群众拿着刀枪绳索，自动地到高利贷者、地主的家里去取回借字契据。平素，他们一升租谷一文利钱都不肯让的，这时却驯驯服服将借字契据全部拿出来，交给暴动者，并假意说："革命也是好事啦。"

当晚，志敏同志发出通知到葛源、青板桥，指示各地同志同时举行暴动，那时黄端喜同志在姚家垅，吴先民同志在青板桥，程伯谦同志在葛源，黄道同志在弋阳一带进行工作。这一带已有八十来个农民革命团，也都举行暴动了。

自志敏同志到横峰至暴动日止，只有二十五天，暴动的范围却占了横峰县的一半地区，参加暴动的群众有五万多人，这可见工农群众要求革命的迫切！

#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的诞生

## ——弋(阳)横(峰)农民武装大起义

邵 式 平

“八一”起义后，全国形势起着激烈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当时的赣东北弋(阳)横(峰)地区也并不例外，只是由于当时各地的具体条件不同，因而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也有不同。

在“八一”起义前，革命高潮时期，弋阳、横峰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基本上打倒了地主阶级，取得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蒋介石在“四一二”叛变后，造成了革命与反革命汉宁对立的局面。李烈钧在南昌被革命群众打出去了，便逃到上饶，组织反革命的赣东省政府，同南京蒋介石合影，与武汉、南昌革命政府对抗。弋阳、横峰在这种对抗局面中，处在反对反革命李烈钧赣东省政府的最前线。这个时期，革命与反革命的武装斗争是不断的，而且是较为激烈的。农民自卫军和广大武装农民群众，完全以自己的力量夺取弋阳和横峰县城，曾经数进数出。只因当时蒋介石在南京不断增援上饶的反革命力量，而弋、横农民自卫军和革命力量，便不得不被迫地逐步转入弋、横山区。

“八一”起义的影响很大，所有的反革命势力，无论是南京或武汉，无论是南昌或上饶，都不能不集中力量去应付当时的那种激烈变化。南京的反革命蒋介石政府和武汉的反革命汪精卫政府合并了；上饶的反革命赣东省政府撤销了；原来集中在上饶和联系南京、上饶之间的一些较大的反革命分子，争夺地位去了，在他们指挥下的反动武装也抽走了；反革命的赣东省政府原来占领的几个属于江西的县分，仍划归江西南昌反革命朱培德的省政府管辖了。当

时的朱培德和他的政府怎样呢？（1）朱培德在汉宁开始对立的时候，特别是在南昌革命群众打走李烈钧的时候，把自己装扮成为革命的，企图以此来欺骗广大工农革命群众。但他在革命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过程中，便逐步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狰狞面目。例如：诬蔑工农运动过火；三次"礼送"共产党出境；发布停止工农运动的反动命令；最后就变成了南昌"八一"起义的直接敌人。（2）"八一"起义的胜利，打得朱培德狼狈不堪，不得不集中力量去收拾这种残局。（3）"八一"起义之后，接着秋收起义，江西地区差不多遍地都发生农民起义，虽然没有能够把当时反革命朱培德的政权打倒，但也迫得他们手忙脚乱。正是由于这些，当时反革命朱培德的省政府，除了派几个反革命县长去接管赣东和弋、横各县的反革命政权外，对我们已经转入弋、横山区的农民自卫军武装，一时确实无力组织进攻。

这个时期，弋阳、横峰的反革命情况怎样呢？赣东北各县的反革命情况怎样呢？我们原来被迫转入山区的弋阳、横峰农民自卫军的情况又怎样呢？

弋阳、横峰的反革命，在革命高潮时期，就基本上被革命力量打倒了。他们的政权和武装都已失掉，他们的影响在群众中大部被扫除，他们的财产有的已被革命没收。"八一"起义后，逃亡在外的反革命分子，虽然能够依靠反革命县长勉强回到县城，但不敢回到乡村的老家。已经回到县城的反革命分子，为了争夺反革命的领导权，内部矛盾重重。在这样情况下，如果没有外来反革命武装力量的增援，他们要完全依靠自己组织必要的反革命力量，立即向已经转入山区的农民自卫军作坚决的进攻，是不可能的。

赣东北各县的反革命，在革命高潮的时候，都起了变化。原来在北洋军阀时代无恶不作的老反动分子，一时不能不退到政治舞台的后面去。有的就地隐藏起来，有的逃到南京，有的逃到武汉，也有的逃到南昌、上饶，还有的隐藏在革命队伍中。"八一"起义后，这些反革命反子，也和弋阳、横峰的反革命一样，都争着出台。他

们反对革命虽然是一致的，但是他们为要争夺本县的反革命领导权，镇压本县的革命群众，因而，各县的反革命分子要想迅速联合起来，进攻弋、横地区早已转入山区的农民自卫军武装，也是不可能的。

弋阳、横峰已经转入山区斗争的农民自卫军和党的领导怎样呢？在"四一二"之后，经过多次的战斗，被迫转入山区。在战略上已由进攻转到防御，一面积极地保存革命的力量，另一面不断派人到南昌求援。派出求援的同志，在"八一"起义之后，不断地回来了，都带来许多好消息，特别是南昌起义胜利的消息，给了大家以极大的鼓励。大家认为，南昌起义胜利了，必然会有军队派来赣东北。坚持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胜利了。但消息总是消息，光靠好消息，坐等外援，是不行的，只有时刻注视着局势的变化，机警灵活的决定自己的行动。

根据当时局势的变化和敌我力量的对比，"八一"起义后，在全国形势激变中，弋阳、横峰以及赣东北地区，反而出现了一时较为平静的局面。这种一时较为平静的局面，是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具体表现。但这只是表面的、一时的现象。实际上，革命与反革命双方都在积极准备力量。大家都意识到，更大更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久必然到来。

弋阳和横峰的反革命怎样组织反革命力量，向革命作坚决的进攻呢？弋阳的反革命分子首先以反革命县长为中心，组织国民党反革命的县党部。其次，便进行反革命清党运动，把地主、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都收集起来。第三，积极组织反革命的警察队，并多方欺骗群众。第四，向反革命朱培德省政府请求派武装增援。第五，散布谣言，并派反革命的警察大队逐步向农村进行勒索，要税要款，甚至带着地主、土豪劣绅，收租逼债，追捕曾加入过农协的会员。横峰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县长，首先在河口镇集中，由驻在河口的反革命朱培德的军队派了一个连掩护，才敢进占横峰县城。进占县城以后的做法，大体上和弋阳的反革命活动相同。

这个时候，弋阳和横峰的农民自卫军虽然早已转入山区，并且相依为邻，但在对敌斗争上，还没有直接联合起来行动。他们的武装虽然少，人数不多，行动不定，但他们和广大农民群众有密切联系。出城收租逼债的地主、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如果没有反革命武装掩护，或掩护的力量太小，都有被农民自卫军和农民群众消灭的可能。

正在这样斗争的局势下，方志敏、黄道、方志纯同志和我等都先后回到弋、横山区，并与农民自卫军取得联系。革命阵营，大为振奋。因为这个地区的革命，从头就是我们领导和组织起来的，并且有密切联系的。

以方志敏为首，迅速地在弋阳窖头村召集了五县会议。除铅山外，弋阳、横峰、贵溪、上饶（会后赶到）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是在秋收割禾的时候召开的。这个时候，各县的地主、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正开始带着武装向农村进行收租逼债、索捐勒款，广大农民群众深刻感到，不革命就无路可走。同时全国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消息，又在不断传来。出席会议的同志，革命情绪，极为振奋。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赣东各县的情况，强烈地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决定组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

怎样组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呢？

一、会议制定了宣传大纲。大意是：国民党反动了，汪精卫、蒋介石合影了，他们向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投降了。他们要来向革命进攻，他们要来向革命的人算账，要向工人、农民算账，要向工会会员和农协会员算账。在这些反革命的统治下，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是永远也见不着天日的。现在只有中国共产党是坚决革命的，是坚决忠诚于国家和工农群众利益的。广大的工人、农民要想解放，要想见到天日，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和共产党员一起，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夺取政权。我们工人、农民是人民中的绝大多数，一百个中国人里面，我们有九十

五、六个人，敌人只有四、五个人。我们团结一心，坚决打击敌人，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二、会议通过了武装起义的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把宣传大纲上的思想编成为下面的几句话：

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匪党；

铲除贪官污吏，肃清土豪劣绅；

废债分田分地，建立劳农政府；

如果中途变心，刀斩弹穿不赦。

这个纲领，特别是废债分田分地，建立劳农政府，普遍深入人心，并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三、会议通过了武装起义的组织形式。这个组织，当时名为农民革命团。以自然村为单位，秘密发展。团下设排，排下设班，每团须在三十人以上。秘密串连，到了三十人以上，就组织成团。在举行成团典礼时，每个团员都要宣誓，要忠诚于革命事业，要遵守如下公约：

1.绝对保守秘密，不得走漏消息；

2.利用亲邻关系，秘密发展新团；

3.利用打猎名义，各人准备武装；

4.大家齐心努力，听从上级指挥。

四、建立党的领导机构，成立武装起义指挥部。会议决定党必须统一领导，成立了五县的党委会。选举了方志敏、黄道、吴先民、邵棠、方远辉、方志纯同志和我为党委会的委员，并以方志敏为书记。规定在未与上级党取得联系以前，党委会就是五县统一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党委会之下，成立了起义指挥部，并以方志敏兼任总指挥。

窖头会议，使弋阳、横峰的革命形势起了显著的变化。自"四一二"以来，革命不断退却的局面终止了，开始向反革命进行反攻。

在窖头会议后，绝大多数同志展开了艰苦的工作。有的日夜奔跑，进行秘密的宣传活动；有的改名换姓，到陌生的地方去进行工

作；有的日伏夜出，进行活动。就这样，窖头会议的精神和决议，迅速传布到广大农民群众中去，新的革命力量，迅速地增长起来。

当时在广大的农村，特别是曾经组织过农民协会并发动过斗争的地方，反革命的进攻极为频繁。抢劫勒索，非刑拷打，捕人杀人，残酷非常，无数的革命群众遭受了惨祸。广大农民群众在反革命武装进攻和残酷的蹂躏下，感到"命运相同"。当他们秘密听到窖头会议的精神和决议时，好象听到"救命王菩萨到了"，参加革命团的农民非常踊跃。有的自然村，一时没有人去工作，农民只要听到消息，就自动派代表冒险来山区找革命团的关系。

当时的农民自卫军积极地进行游击活动，密切配合秘密组织农民革命团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反革命分子如果出城下乡，农民革命团的团员就会很快地密报自卫军。自卫军得到消息，了解情况，就把枪支隐藏在便衣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进行袭击。这样不断地行动，吓得反革命分子躲在城内，没有武装掩护就不敢出城下乡。即使有武装掩护，也不敢远离城区，在乡过夜。这对于展开农民革命团的工作，造成了有利条件。

由于窖头会议决定的正确，同志们的艰苦努力，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特别是农民自卫军武装的积极配合，农民革命团的组织发展得很快。仅一个多月的时间，组织了上百个团。弋阳北乡地区和横峰的大部分地区，除少数较大的自然村以外，大多数的村子都有革命团的组织。以弋阳漆工镇和横峰青板桥为中心的地区都组织起来了。纵横数十里，相互联成一片。群众的革命情绪极为高涨。革命武装起义的形势，迅速地成熟起来。

窖头会议，预计革命武装起义的时间，在旧历年。因为旧历年关，地主、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利用年关习惯，向农民进行收租逼债，而广大农民反抗的斗争也必然激烈。这个时候，举行革命的武装起义，较为有利。农民群众一旦组织起来，就迫切地要求迅速起义。他们说："要掀开来，再也秘密不住了。"我们劝告农民革命团，要争取时间，尽量扩大组织，以免起义地区过小，不易

战胜敌人。这个时候，全国各地起义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从反革命报纸上可以看到。特别是广州起义，井冈山会师，都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在弋阳、横峰县城内的敌人，怕旧历年关到来，革命势力更加发展，也争取时间，提前加紧收租逼债。年关越近，逼债越紧，农民真的“再也秘密不下去了”。大概是旧历十二月初，公历十二月底，横峰的反革命派了警察队二十余人，到楼底蓝家勒收税款。这里恰好是方志敏亲手组织农民革命团的地方，农民早就迫切要求起义了，无奈找不到机会。反革命警察队到来，农民革命团一面暗中武装埋伏在村里，一面派人殷勤地招待他们吃饭。当他们正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伏兵四出，顷刻之间，就将反革命警察队武装缴了。轰轰烈烈的弋、横农民武装大起义的序幕揭开了。

起义总指挥部当天得到楼底蓝家的起义消息，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便通知各村农民革命团，即日就地武装起义，并积极支援邻村，坚决进攻，扩大革命地区。

凡是接到总指挥部通知的农民革命团，都立即武装集合，召开本村群众大会。当场宣布武装起义，进行全村革命户口登记，并立即扩大农民革命团组织，成立农民军。强迫地主交出契据、租约、借字，立即当众烧毁。实行废除债务，实行分田分地和镇压反革命。对罪大恶极的地主反革命分子立即逮捕法办，并当众宣布没收其财产。各村没收的反革命财产，一部分用以分给本村的贫雇农和革命的人，另一部分用作本村的革命经费。对于一般的地主，如果不作反革命，自愿捐助一部分财产，他们的户口也准登记，但登记他们的户口是另一本册子。这样各村的农民革命团武装革自己村里的命，各村的反革命是无力抵抗的。一、二日之内，都取得了胜利。

取得了本村革命胜利的农民革命团，立即扩大，组成农民军，自动武装出发，援助邻近尚未起义的村庄。如果某村反革命武装抵抗，就结合几个村的农民军，组织联军，坚决进攻。

武装起义的消息，很快的传遍远近。邻近的地主、土豪劣绅、

反革命分子一时吓得手忙脚乱。邻近的农民群众，兴高采烈，纷纷派代表来起义的村庄，要求支援起义。因此兵分五路，积极向周围发展。

第一路，由花春山、邹秀峰、黄端喜、蓝广平等指挥，以楼底蓝家为中心，积极向横峰城和弋阳城发展。当时横峰的敌人很快就得到河口敌人一个连的支援，并出发向楼底蓝家进攻。我军得到这个消息，预先通知各村的农民军，埋伏在沿途附近，掩旗息鼓，让敌人进来。敌兵进到楼底蓝家，突然四面山上和树林里，炮声隆隆，杀声震天，敌人不知农民军有多少，便调头逃跑，一直跑进横峰城，紧闭城门，死守待援。弋阳城内敌人吓得一时也不敢妄动。于是两城之间数十里，所有村庄，都竖起了革命胜利的红旗。

第二路，由吴先民、黄球、钱壁、项春福、吴先喜等指挥，以青板桥为中心，积极向铺前、霞坊等地发展。农民大军所到之处，各村内部立即响应，未经战斗，兵不血刃，连下数十村庄，直逼横峰城。

第三路，由程伯谦、丘金辉、胡粹方、喻传才、黄立贵、李穆等指挥，以枫树坞为中心，向葛源、璜村等地发展。进攻葛源街，一战而胜，军威大振。数十村庄不战而下。那时有民谣："葛源三千烟，出了程伯谦。伯谦开了口，举人老爷也得走。"

第四路，由黄镇中、方远辉、方远杰、方华日、邵伯平、洪坤元、方胜喜等指挥。以漆工镇为中心，向中湖坂、芳家墩、姚家坂一带发展。这一带大村大姓较多，不易进攻。但大村附近的小村，都在农民军援助下，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第五路，由雷夏、余汉潮、舒翼、甘遇霖、方华根等指挥，以樟树墩为中心，向周围发展。在起义之后，周围各村农民派代表请求支援的很多。农民群众说："只要雷夏到，红旗竖起来，我们各村的革命就会胜利。"当时有许多事实也的确如此。雷夏到哪里，哪里的红旗就高高飘扬。

五路农民军同时积极向前发展，捷报频传，声势浩大，这是武

装起义胜利的最高峰。

弋、横农民武装大起义之前，弋阳、横峰的敌人，早就千方百计，向反革命朱培德省政府求救，朱培德只派了一部分政治工作人员率领一个连进驻河口。当起义爆发后，这个连在横峰楼底蓝家被打败了。农民军猛烈向外发展，声势日大，反革命阵营甚为恐慌，于是朱培德又增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到河口。该团到河口后，迅速分兵进驻弋阳城和横峰城，并布置向弋、横革命起义地区大举进攻。

弋阳的反革命得到反革命朱培德的军队支援，秘密派便衣队进占了马王坡村。这个村子当时正在酝酿起义。反革命便衣队进村以后，酝酿起义的活动就停下来了。反革命便衣队和当地的反革命分子即利用这个机会，派人伪装革命农民，请雷夏前去支援和领导起义。雷夏一时大意，未辨真伪，中了敌计。刚刚进村，伏兵四出，雷夏和他的父亲及随从数人，拔刀格斗，杀死了几个反革命分子，自己也英勇壮烈地牺牲了。这一路农民军的发展，开始受阻。

横峰的反革命利用新增援的反革命军队，伪装起义，开到青板桥要求吴先民、黄球亲自收编。吴、黄二人未将情况了解清楚，便亲身出来收编。反革命分子立即逮捕了他们。这一路农民军的士气，暂时受到挫折。吴、黄二人被捕后，关押在河口天主堂。天主堂的窗户，都是铁条的窗栏杆，铁条与铁条之间空格相当大，吴、黄二人身体矮小，当晚就钻窗而逃。吴、黄二人逃脱后，急速回到青板桥。这一路农民军的声势，又复大振。当时的民谣说："横峰有了吴先民，不愁天下不太平。"横峰敌人逮捕吴先民和黄球的阴谋，完全失败后，随即派兵进驻葛源。

程伯谦、丘金辉等率领的农民军，机动的退出了葛源，并派人到起义总指挥部报告情况，请求集合各路的农民大军，夺回葛源。当时认为，乘敌脚未站稳，彻底消灭敌人是可能的，于是集合五路农民军，会攻葛源。由于走漏了消息，敌人早在中途埋伏。农民军万余人，浩浩荡荡，正在弯曲的山地里前进，突然山上枪声大作，我军大乱，火速分路撤退。敌人见我军众多，甚为恐慌，在山上打

了一排枪，便从山后溜走了。

葛源之役，虽然没有获得胜利，但我们得到的经验教训是极为有益的。这就是农民军如果没有主力军为核心，而贸然与反革命军队进行正规作战，胜利的把握是不大的。

敌人进攻的消息不断的传来，情况又起了新的变化。从消息的分析中，我们知道河口敌人不断在向弋阳、横峰城增兵。横峰敌人已分兵进占葛源和铺前。弋阳的敌人也派兵出城进占了过港埠、中湖坂、樟树墩等地。敌人的围攻与我们的反围攻战争开始了。当时我们知道，当前的敌人，不是过去的地方反革命警察队，而是反革命蒋介石、朱培德指挥下的正规军队，要战胜这样的敌人，是不容易的。如果象起义时一样，仍用大量的农民军作战，将会招致严重的损失，甚至招致革命的失败。各村的农民军在葛源之役后，均已回村，也不容易集合起来作战。怎样办呢？我们的办法是：

1.各村的农民军即作为本村革命群众不脱离生产的武装。就地保卫革命群众，严密警戒，巩固革命胜利，侦查敌情，镇压反革命，并相机打击敌人。

2.干部尽量不脱产，就地与群众结合，依靠群众和各村农民军进行工作。不得不脱产的少数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镇压反革命，严密封锁敌人，积极地扰乱敌人，分散敌人目标。

3.集中各路的步枪，建立脱产的革命正规军。当时集中的步枪有二、三十枝，编成一个连，由邹琦、彭皋负责率领，密切结合广大革命群众，巧妙地保存自己，壮大自己，积极配合武装工作队和农民军，集中力量，机动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就这样，以集中的正规军为主力，以干部武装工作队为各地的骨干，以不脱产的农民军和广大革命群众为基础，这些，结合为一体，统一在党的领导之下，轰轰烈烈的弋、横农民武装大起义开始转变为全民的革命游击战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便从此诞生了。

一九五九年四月八日写于南昌

# 赣东北革命斗争的回忆

方　志　纯

## 一、弋阳革命青年社

一九二三年，我在我的家乡——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加入了弋阳革命青年社，迈出了参加革命的第一步。从此，我开始了几十年的革命生涯。

弋阳革命青年社是以漆工镇地区的革命青年为主组成的一个进步团体，它是方志敏同志创建起来的。

我的家乡同中国农村的其它地区一样，是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缩影。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中国社会激烈动荡起来，我们家乡这一带的穷乡僻壤，也开始波动起来。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开始传播到中国，也开始传播到赣东北。在这个时期，那些外出读书的进步学生，走在前面，起了很重要的先锋和桥梁作用。方志敏同志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方志敏同志是我的堂兄。由于家境贫困，按照不成文的宗族家规，只有老大的长子才能入学。而志敏同志的父亲排行第三，因此，方志敏同志是没有机会入学读书的。但是，因为志敏同志小时就异常聪明，颇具天资，因而，被私塾老先生看重，破例收留他入馆就学。一九一六年秋，方志敏以优异的成绩，由祠堂保举到县城里的弋阳县立高等小学读书。方志敏同志由于成绩好，斗争性强，能说会道，能团结人，富有号召力，因而，在他周围很快就集结了一群比较进步的青年学生。为了联络感情，增强友谊，方志敏同志将

这些学生组织起来，于一九一七年成立九区青年社。

九区青年社成立后，组织和参加了几次反帝反封建的小型活动。但是由于认识不一致，九区青年社成立不久就开始分化，不少社员就退了社。方志敏同志认识到光靠青年学生是不够的，必须要联合贫苦的工人、农民参加才行。于是，他又在家乡发展一些进步青年农民加入九区青年社。到一九一九年，又在九区青年社的基础上，成立了弋阳青年社，这时，弋阳青年社已有很大的发展，成份亦有很大的变化。并改名为弋阳革命青年社。

弋阳革命青年社的成员后来大部分人都入了党。入党后都表现很好，立场坚定，斗争性强，其中有不少同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如黄镇中、方远学、方远杰、郑香、舒翼、郑祖全、黄宫武等同志，都为革命而光荣牺牲了。当然，也有少数人逃避革命，脱离队伍，也有成为反动派的。

弋阳革命青年社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如反对弋阳县大地主、大恶霸黄理卿竞选参议员。这个家伙用钱收买群众，骗取选票，想当省参议员。方志敏同志一方面写文章揭露他的罪行；另一方面带领学生在漆工镇讲演，鼓动群众把选票带回，不投黄理卿的票。结果，黄理卿虽然还是当上了议员，但漆工镇穷苦选民的票，他一张也没有得到。

组织爱国青年示威游行。一九一九年，全国人民掀起反对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的高潮，北京等大城市先后掀起了反对国贼、抵制日货的浪潮。消息传到弋阳后，方志敏首先将自己身边的很不容易买来的日货，毅然销毁，然后组织青年社成员及县城的爱国青年游行示威，抵制日货。

赶走江亢虎。江亢虎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是弋阳人，一九一九年，江亢虎衣锦还乡，耀武扬威地来弋阳讲学，宣传反革命理论，当他来到弋阳高小放毒时，方志敏同志和革命青年社的一些学生和他辩论，经过一番唇枪舌战后，把江亢虎驳得哑口无言，终于将这个连县太爷都不敢得罪的"权威"，赶出了

校门。

出版《寸铁》旬刊。《寸铁》是一张八开的传单式的小报，油印好后，到处张贴，在弋阳影响很大，反动当局极为震惊，他们视《寸铁》为炸弹。弋阳县的一些反动名人，还专门为此事联名写信到伪警军公署，并将贴有《寸铁》的门板抬到伪警军公署告状，污蔑方志敏同志宣传"赤化"，鼓吹"邪说"，要求伪警军公署"查办"方志敏及青年社成员。《寸铁》旬刊的出版，反映了方志敏同志重视武装斗争的思想。他认为，要和敌人斗争，光有文的还不够，还要有武的——哪怕是一寸铁也是斗争的武器，故刊名"寸铁"。

创办旭光义务小学。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还在表面上提倡办学校，学白话文，但封建势力的阻力很大，各地都办不起来，依然是办私塾。方志敏认为此事可以利用来宣传革命，便写了个报告给县教育局，要求批准创办义务小学。报告获准后，方志敏就领导青年社的一些有文化的青年，办起了旭光义务小学。方志敏自任校长。但因方志敏经常要到外地去从事革命活动，便要革命青年社成员、德兴人祝炎到学校负责。祝炎同志多才多艺，既教语文，又教算术、音乐。祝炎同志既是校领导，又是教员，管理人员也只有一个方远辉，并且是业余的。方远辉不在时，我也参与过该校的管理工作。旭光义务小学白天教小学生上课，晚上吸收贫苦农民入学，学文化，灌输革命道理。亦称为"贫民夜校"。我在学校一是帮着管理学校的经费，二是晚上叫农民来上学。旭光义务小学在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起来革命方面，起了不小作用的。

弋阳革命青年社的活动，一直坚持到一九二五年，到弋阳党支部成立后才停止。

就在方志敏同志组织革命青年社的同时，邵式平同志在弋阳邵家坂组织了"益友社"，黄道同志在横峰组织了"岑阳学会"，汪群等同志在贵溪组织了"象山书院"，等等。在这些同志的宣传下，赣东北地区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及青年农民，都在各种进步团体中组织起来，为赣东北党组织的产生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好了准备。

# 二、弋阳党支部

弋阳党支部的产生，是几个在外地入党的同志，回去秘密发展党员，然后组织起来的。

方志敏同志是一九二三年在上海入党的，邵式平同志是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入党的，我是一九二四年在南昌入党的。（一九二三年底，我到江西省委机关任机要交通。并经赵醒侬同志介绍入党。）我们入党后，首先在漆工、湖塘等地，物色了几个革命青年社的社员，吸收入党。

一九二五年夏天，方志敏同志回弋阳时，在漆工组织成立了党小组。这时，除方志敏及我外，发展的党员有：黄镇中、邹琦、彭年、祝炎、方远杰等同志。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又发展了一些党员。这样，到一九二五年底，方志敏同志又将党小组扩大为党的临时支部。这时，新发展的党员有：饶恭美、洪坤元、方远学、方远辉、方华根、彭皋、陈祖令等同志。

到一九二六年六月，党员人数更多了，斗争的形势要求成立党的支部。正在北师大读书的邵式平同志，积极投入领导和参加学生的革命运动，革命风暴一天天高涨，“三·一八”惨案后，即被反动政府通缉，在北京就呆不住了，党组织派他到江西搞农民运动，并回到了弋阳。于是，在邵式平同志的领导下，党的弋阳特别支部在弋阳县城正式建立，弋阳特支直接由党的江西地区委员会领导，第一任支部书记是邵式平同志。这时，又增加了新党员雷夏、舒翼、杨立程、黄品珍、余汉潮、陈有福、黄令正、范荷香、胡德兰、潘式京、缪敏等人。

为便于公开活动，弋阳党支部成立后，一些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如邵式平和我等人，即着手帮助国民党组建了国民党弋阳县党部，邵式平同志为县党部书记。他走后，由我接

任。

弋阳特别支部成立后，党支部派黄镇中同志到九区工作。黄镇中同志到九区后，在湖塘、大溪头、林背、义星源、洪家等村进一步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小组。不久，由于县城的反革命白色恐怖严重，党支部便从城里迁入九区，一些在城里不便活动的党员，也到九区一带的农村开展活动。

弋阳特别支部成立后，主要是在八区九区一带农村，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物色和培养农民工作的骨干。其次是推荐了一些骨干到省农民运动训练班学习，同时，还经过省委，介绍了一些同志到黄埔军校学习。如邹琦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派往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的。

一九二六年秋，北伐军进入江西，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弋阳党支部及它所领导的农民运动都有很大发展。同时，赣东北的其他县，在黄道、吴先民、邹秀峰、钱壁、李穆、黄端喜（以上为横峰县）、江宗海、汪群、邹棠、邵忠（以上贵溪县）、舒同（东乡县）等同志的领导下，也于一九二六年秋至一九二六年底，先后建立了党的支部。

弋阳及赣东北其它县的党组织，也是在反对各种错误思潮中建立起来的。当时，在一些青年中，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比较深，认为不需要党。还有一些青年学生，抱着知识分子的固有偏见，认为工农落后，不能入党，只有知识分子才行。方志敏等同志引导大家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组织讨论，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从此，赣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崭新局面。

## 三、漆工镇暴动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北伐军白崇禧部第一师经过弋阳，并在弋

阳宿营。弋阳党支部动员和组织了数千名学生、农民、工人、市民到城外夹道欢迎，军民互相欢呼，情景异常热烈。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的政治部派人了解了弋阳的情况之后，立即派兵将伪县长从县衙门叫来，教训了一番，并警告他说："如果以后，你有一点违抗县党部的领导，就枪毙你。"国民革命军就这样地支持了革命派。豪绅地主及右派的反动气焰，便一时被打击下去了。

趁着这个大好形势，弋阳党支部组织各界人民群众，主要是以二区、八区、九区的农民为主，打进了县城，活捉关押了北洋军阀的县长。同时，组织了县政务委员会。委员由工会、农会、商民协会、妇女解放协会组织推选。邵式平同志以国民党弋阳县党部书记的名义，领导了政务委员会。工会主任是我(副主任是余汉潮)、农会主席是方远辉、妇女解放协会主任是范荷香、商民协会的主任名字我忘记了。县政务委员会成立后，要求省里派县长来，后省里派了个姓范的县长来弋阳。

县政务委员会成立后，颁布了很多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公告、布告、法令、条例等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同时，县政务委员会有干部任免权，于是，派出了许多共产党员到各区任职。这样，在共产党员的发动和组织下，各地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便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

著名的漆工镇暴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在方志敏同志的指导下，在弋阳党支部的具体组织下，漆工镇的农民运动非常活跃，农民协会普遍成立，参加农民协会的农民越来越多；斗争声势越来越大。打土豪、斗地主，抗租、抗息、抗债、抗税。一切权力归农会。

当时，漆工镇还是被反动军阀盘踞着，在漆工镇设有江西警察厅漆工镇派出所，派出所掌握有十枝枪的武装，反动势力藉此欺压人民，鱼肉百姓，破坏农运，镇压革命。漆工镇的人民群众早就对它恨之入骨。当时，各地农运发展很快，漆工镇事实上已处于包围之中，武装斗争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在一九二六年冬，由方远

杰等同志直接组织和指挥，漆工镇农民协会一举举行起义，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推翻了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服务的漆工镇派出所，赶走了反动巡官余麻子，夺取了反动警察派出所的武装，并用来武装农会，成立农民自卫军。把革命推向了武装斗争的新阶段。当时，这个派出所的十支枪中，七支是土枪，只有三条步枪能用。三条步枪中，一支是德国造的"双套筒"枪，一支是武汉造的"汉阳造"，一支九响毛瑟枪(少机柄)，故称"两条半"枪。这就是赣东北人民争相传诵的"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命"的故事的由来。为了巩固胜利成果，漆工镇暴动胜利后，党即派共产党员雷夏同志担任漆工镇派出所巡官的职务。

漆工镇暴动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赣东北的人民群众，一九二七年初，横峰县的农民协会在党的领导下，赶走了反动县官，并由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派赣东北特派员邵式平委任了共产党员邹秀峰、吴先民同志为县长和公安局长。解除了伪政权的武装，并用来武装农民自卫军。这样，横峰县的政权和武装就掌握在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手中了。贵溪县农民协会，在邵式平同志的直接组织领导下，于一九二七年初，进剿龙虎山，大闹上清宫，在闽赣两省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就在赣东北党组织领导漆工镇暴动的同时，全省其它地方的农民运动也发展很快，为培训农民运动骨干，省委开办了农民运动训练班。漆工镇暴动胜利后，我即由省委机关调往农民运动训练班，任干事。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又发生"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由于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投降国民党，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大革命失败后，赣东北革命、赣东北党便处在一个紧要关头。早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在南昌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在改选省执委的过程中，国民党右派就排挤了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夺取了江西省党部的领导权。虽然方志敏、邵式

平、黄道等同志鉴于他们的威望，仍分别被选为省农民部长、监察委员会主任、宣传部长，但以朱培德、段锡朋为首的右派势力占了上风，省党部已被他们控制。

由于当时朱德同志在南昌，有着很高的威望和相当的武装力量，由于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江西有较强的力量，由于当时江西省农民协会和工会还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国民党右派还不敢明目张胆出来镇压革命。但是，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情况就变了，朱培德公开反共，将省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缴械，宣布对共产党人“礼送出境”。一九二七年六月，许多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领袖，就在“礼送”中被排挤掉了。

与此同时，李烈钧在上饶把持的伪赣东省政府，与弋阳、横峰等地封建势力、流氓地痞相勾结，对赣东北的革命力量发动了猖狂进攻。

在反革命的武装镇压面前，赣东北的党，也在积极准备武装自己。“四·一二”政变后，赣东北党按照毛泽东同志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根据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同志的指示，想方设法从各方面收集了百余枝枪，准备武装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但是，当时江西省委内的王力生等少数领导人，追随陈独秀，主张放弃党的领导，取消革命武装。他们压制工农运动，反对掌握政权。因此，当机会主义者统治的中央及省委得知我们在准备武装时，硬逼着我们交出枪枝。虽然我们进行了斗争，方志敏同志还为此受到了警告处分，但在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威逼下，还是服从了上级决定。

在党内党外情况如此紧急的关头，赣东北党组织并没有灰心丧气，还是勇敢地发动群众进行了斗争。一九二七年阴历五月十一日，在弋阳党支部的领导下，由方远杰等同志率领，以二区、四区、八区、九区的农民协会力量为主，联合工会等各界人民群众二万余人，在国民党一个起义连队的配合下，攻克伪县党部，烧毁县衙门，刀劈伪县长，镇压土豪劣绅百余人，又一次将红旗插上了弋阳县城。

国民党这个起义的连队，后改为工农革命军赣东北大队，方远杰同志任大队长兼党代表。这支队伍在方远杰同志领导下打进县城后，对偌大一个县政府束手无策，便经省委和方志敏同志打来电报，要求派人去领导。省委和方志敏同志接电报后，就派我和黄镇中同志去弋阳。但当我和黄镇中步行赶到弋阳时，队伍已经撤出县城了。原来，方远杰等同志打进县城后，李烈钧即派军队反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第三天，农民便被迫退出了县城。回到九区后，由于方远杰同志试放土炮，装硝过多，炮管炸裂，受伤而死。方远杰同志牺牲后，这支队伍因无得力领导等原因而溃散了。

我和黄镇中同志赶到弋阳后，队伍都已经散了。因为斗争受到挫折，党员、群众情绪低落，一些负伤同志待安排。于是，我首先把党支部成员找来开了会，整顿了支部。接着，做党员和骨干分子的工作，从而整顿了农民协会的队伍，处理了一些战斗失败后的遗留问题，群众的情绪才慢慢安定下来。但由于当时整个形势对我们不利，弋阳只有九区还在我们手里，所以，革命群众的斗争情绪还是比较低沉。

## 四、窖头会议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党的“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员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

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出境后，方志敏同志一直在江西农村坚持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他参与发动和领导了吉安、吉水、永新、莲花四县以“二五减租”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八月中旬，由于吉安的党组织遭到破坏，方志敏同志便奉命回赣东北“重起炉灶，再来干”。

回来后，方志敏同志很快就以九区为中心，在短短的七天内发展了二十几个党支部，组织了农民协会，集合了五千余农民，又一

次和劣绅作斗争。但是，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组织不严，指挥不力，斗争很快就被李烈钧等镇压下去了，他们在九区大肆烧杀，给群众带来很大损失。

一九二七年十月，正在危难之际，方志敏同志在波阳遇见江西省委派来的特派员刘士奇，听了关于党中央“八·七”会议的详细传达。知道党已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方志敏同志立即回到了弋阳，决定召开坚持在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等县的党的负责同志的联席会，并叫我立即到这些县设法找到人，通知他们开会。

在弋阳的人很快就找到了，我秘密通知了邹琦、彭皋、黄镇中、方远辉等人。

邵式平同志这时在哪里？如何找到他？具体活动地点不清楚怎么通知呢？但我知道，“四·一二”政变后，邵式平同志在贵溪一带活动。他与贵溪的俞君实关系很好，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同学关系。于是，我就到了贵溪，果然，在俞君实家里顺利地找到了邵式平同志，并将开会的事通知了他。

到横峰是我和邹琦一块去的。我们先在姚家垅黄文中家里落脚，黄文中曾同情过革命，他家里是地主，不引人注目。以后，我们又找到了黄球，并通知他开会。我们的目的是要找黄道同志，但一直未打听到消息。但我知道，黄道肯定在家里，没有走远，一直到第三天，才在黄道家里的楼上找到了他，告诉了他开会的消息。

铅山县也是我去找人通知的。我在铅山找到了徐先兆，并请他通知坚持在铅山的党员来弋阳开会。

我到德兴县，找到了张其德和邱灵通，通知了他们准备开会。

上饶县的与会人员，也是我去通知的。

会议定在弋阳的窖头村召开。为什么选择窖头？有两个原因：一是窖头是邹琦同志家里，邹琦的父亲在村子上有点权威，人们不敢随便得罪他。邹琦还有个叔父，住在邹家祠堂里，这祠堂是个绝

好的会场。二是我家有个姑姑嫁在窖头，我姑父有个哥哥是地主，这样，志敏和我等人去窖头，便可乔装成走亲戚，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再说，有个地主亲戚，人家便不敢乱说闲话。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通知开会的人基本上到齐了。他们是：弋阳的方志敏、邵式平、邹琦、彭皋、黄镇中、方远辉、方志纯等人；横峰的黄道、吴先民、邹秀峰等人；贵溪的邵棠。

接到通知，因各种原因未能参加会议的，弋阳有饶恭美、陈有福、黄令正、洪坤元、郑香、严毅尧等人；横峰有程伯谦、钱壁、李穆、黄球等人；德兴有张其德、邱灵通等人；铅山有徐先兆等人。

二十五日会议正式开始，由方志敏同志主持，会议开了三天两晚，至二十七日下午开完，这时，上饶的汪佑春同志赶到窖头参加会议。

会议上，方志敏同志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方志敏同志指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是由于国民党的叛变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领导的结果。大革命虽然失败，但革命的形势依然存在，因此，中国革命必将继续发展，最后必然取得胜利。"反革命必然要失败，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这是绝对的真理。"接着，方志敏同志在分析了赣东北的大好形势后，指出当前赣东北党的任务就是深入发动工农，开展土地革命，实行武装暴动，夺取地方政权。

会议对怎样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这次会议，完成了如下任务。

(一)制定了宣传大纲。指出，只有共产党是坚决革命的，是坚决忠诚于工农群众利益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工农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夺取政权，才是我们的出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二)通过了武装起义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口号是：

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匪党；
劫杀劣绅地主，铲除贪官污吏；
平债均分土地，建立劳农政府；
如果中途变心，刀斩弹穿不赦。

（三）决定了武装起义的形式。组织形式是建立农民革命团，以自然村为单位，秘密发展。

（四）建立了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了五县的党委会，同时，成立了武装起义指挥部。大会选举了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吴先民、方志纯、邵棠、方远辉等同志组成工作委员会，即五县党委会，方志敏同志为书记。在未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前，委员会是五县的最高领导机关。工作委员会下设起义指挥部，方志敏同志任总指挥。

党的"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很快发展起来。有的同志主张不论条件好坏先搞起来再说，提出"县县暴动，全面开花"。以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在分析了当时赣东北党的领导经验，群众的觉悟程度，敌人的统治力量之后，认为，赣东北仍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赣东北的党要组织全面暴动还缺乏经验，赣东北的群众还没有这样高的觉悟和要求，如果，全面暴动，必然全面失败。因此，只能先选择党和群众基础较好、敌人力量又较薄弱的地方进行暴动。于是，会议确定，弋阳、横峰为首先暴动的区域，其他各县积极准备。

赣东北党的窖头会议，是赣东北地区革命由退却转入进攻的一个标志，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是一次成功的会议。窖头会议后，赣东北的革命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革命不断退却的局面终止了，向反革命进攻的大好形势开始了。赣东北人民武装斗争的崭新局面，已经势不可挡地到来了。

## 五、弋横武装起义

窖头会议后，方志敏、邵式平同志到横峰，黄道同志到弋阳，其他同志也都分赴各地，发动群众，准备组织年关暴动。

大革命失败后，赣东北广大农村，特别是曾经组织过农民协会并发动过武装斗争的农村，反革命的反攻倒算极为嚣张，敲诈勒索，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残酷非凡。无数革命群众遭受惨祸。广大农民群众在反革命的蹂躏下，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有着革命传统的赣东北人民，心里正在燃烧着渴望复仇的怒火。党的窖头会议的决议，说出了群众想说不敢说的话，群众看到许多曾经领导自己斗争的领袖和共产党员又回来了，听了窖头会议精神的传达，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纷纷要求起来斗争。

在方志敏及邵式平、黄道等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宣传鼓动下，群众中被压抑了的革命情绪迅速高涨起来。各地都开展了“上名字”的运动。所谓“上名字”，就是党员串连骨干分子，骨干分子串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串连一般群众，你同意参加革命就登记一个名字。“上名字”是以自然村为单位，秘密进行的。“上名字”的目的，是组织农民起义的武装——农民革命团。仅一个月，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底，弋横两地农民革命团就发展到上千个团以上。通过“上名字”的运动，群众发动得更广泛了，武装起义的思想准备更充分了，组织工作更严密了。

窖头会议后，方志敏同志在横峰楼底兰家一带，从事秘密工作，楼底蓝家有小煤窖，工农基本条件较好。在楼底蓝家，方志敏同志发展了党员，成立了支部，动员了群众，准备了武装。当时，八一起义、秋收起义相继发生，消息传来，地主恐慌万状，农民磨拳擦掌，弋横起义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一个偶然的机会，点燃了弋阳、横峰起义的导火线。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横峰反动政府当局派了一个收煤捐的

委员和数名法警到楼底蓝家，催税逼债。“煤黑仔”们先用软办法对付他们，但委员总是不答应，并且动手打人，要捉人到县里去。这时，农民革命团的团长蓝长金同志，便召集全村农民革命团的团员和他们斗争，将法警解除武装，将委员赶出村去。方志敏同志因势利导，召集会议，号召大家趁热打铁，向土豪劣绅进攻，并将那些作恶多端的豪绅予以镇压。就这样，武装起义的序幕拉开了。楼底蓝家提出的暴动口号是：“焚烧借字契据，不还债，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打倒国民匪党，建立苏维埃政府。”

窖头会议后，黄道同志在弋阳九区大溪头一带从事宣传，发动和组织农民革命团的工作。黄道同志就隐蔽在大溪头我外婆家里。我当时在离大溪头不远的义星源洪家组织农民革命团，任团长。各地农民革命团组织起来后，弋阳县的农民革命团总指挥部就设在大溪头，黄道同志任总指挥。

楼底蓝家的起义胜利后，消息传开，群情沸腾，方志敏同志认为武装大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起义总指挥部通令各地立即起义，并号召各地，以百倍的勇敢，扩大起义范围。

弋阳、横峰两县，群众基础较好，又有磨盘山为依靠，大革命失败后，群众受苦较深，“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后，党员、群众起义的呼声较高。因此，当接到起义总指挥部的通知后，各农民革命团，都立即武装集合队伍，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起义，竖起暴动红旗，在横峰方面，葛源青板桥等地当晚响应，实现暴动。在弋阳方面适逢弋阳民团团长、烈桥张家大地主张念诚（张大纲之子）派人到漆工镇和烈桥催租收捐，引起农民怒火，一举举行了起义，于是各村纷纷响应，各农民革命团武装镇压自己村里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各村的反革命力量无力抵抗，各村的权力，转入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之手，在短短的二、三天内，弋、横两地绝大多数村子都取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整个农村，一片欢腾，燃毁借契，没收粮食，缴出赃款，平分田地，到处都呈现着一派武装斗争的热气腾腾的喜人景象。

弋横武装起义成功后，弋阳县党的特别支部改为党的区委。同时，团的组织也建立起来，我被调往区团委，任团委书记。

在党的弋阳区委和县委领导下，为了扩大武装起义的范围，起义总指挥部将农民起义大军，分成六路积极向外发展。

第一路，由邹秀峰、花春山、黄端喜、蓝广平等同志为指挥，以楼底蓝家为中心，向横峰县城周围发展。在楼底蓝家，歼灭敌人一个连。敌人龟缩县城内，死守待援。弋、横两城之间数十里，所有村庄，都插遍了革命胜利的红旗。

第二路，由吴先民、黄球、钱壁、项春福、吴先喜等同志为指挥，以青板桥为中心，向铺前、霞坊等地发展。此路大军，兵不血刃，连下数十村，直逼横峰县城。

第三路，由黄镇中、方华日、邵伯平、洪坤元、方胜喜、黄品珍等同志为指挥，以漆工镇为中心，向中坂、邵家坂、芳家墩一带发展。

第四路，由雷夏、余汉潮、彭皋、甘遇霖、方华根等同志为指挥，以樟树墩为中心，向弋阳县城周围发展。

第五路，以方远辉，彭年、舒翼、方远学为指挥，以漆工镇为基础，向德兴磨角桥一带发展。

第六路，由程伯谦、李穆、邱金辉、胡粹方、喻传才等同志为指挥，以枫树坞为中心，向葛源、黄村等地发展，起义部队攻克葛源，军威大振，附近村庄，不战而下。

六路大军同时积极向前发展，捷报频传，声势浩大，形成武装起义胜利的最高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弋阳、横峰地区，纵横百余里，炮火连天，夜以继日，到处是起义的队伍，到处是革命的红旗，这时，农民革命团实际上即为乡、村政权。在这些地区里，地主阶级被打倒了，反革命分子被逮捕了，国民党反动军队躲在城里不敢出来了，革命人民伸起腰了。

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在南昌、秋收、广州起义的鼓舞下，赣东北党领导和组织下的弋横起义成功了。

弋横起义成功后，农民群众热情地编了歌子，歌唱方志敏同志领导这次起义的胜利：

湖塘塌塌岭，
出了个方志敏，
一心干革命，
为的是穷人。

## 六、方胜峰会议

方胜峰会议，是赣东北党继窖头会议后的又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弋横起义刚胜利时，敌人摸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大的实力，不敢贸然行动，因此，弋横起义一直坚持了两个多月。不久，反动派发现革命力量的武装并不很强大，就立即开始疯狂的反扑。一九二八年二月，敌人向弋阳、横峰起义区域大举进攻，妄图一举消灭这支起义队伍。

早在弋横起义前，在张大纲的活动下，国民党省政府朱培德就派了一部分特工人员带了一个营的兵力驻在铅山的河口，这个营被我打败后，又增派一个团的兵力，并迅速分兵进驻弋、横县城，布置向起义区域进攻。在国民党反动军队向起义区域进攻的同时，地方反动武装——靖卫团也逐渐发展起来。敌人依靠这些反动武装，不断向起义区域进攻。但由于起义区域的人民机智勇敢地和敌人作斗争，致使敌人进攻收效甚微。敌人眼看这样进攻不起作用，又在河口纠集广信七县组织了所谓“广信七县军民联合剿匪委员会”，向弋横起义区域进一步大举进攻，除反动靖卫团二百多枝枪的部队全部开来外，还有国民党三十一军一个团六百多人，占据了弋、横两县城，并推进到葛源、铺前等腹地，在这些地方常驻有一个连的兵力，并筑起了堡垒，固守阵地。

在策略上，敌人也改变了手法。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弋、横党组织向上级报告中说，这次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以前大不相同了，第一步，利用农民制农民的策略，以软硬并用的手段，要各村农民接头，接头以后要时刻在家；第二步，要接了头的农民领徽章，徽章编有号码，可以随时找人，找不到就说你"通匪"去了；第三步，对领了徽章的人强迫加入"剿匪搜山队"，当地反动派任首领；第四步，要各乡自动交出革命领袖。

在手法上，敌人也玩弄了许多花招，欺骗农民武装队伍。在弋阳，敌人的特工人员潜入我正在酝酿起义的马王坡村，和当地反革命分子勾结，伪装起义，请雷夏同志去支援。雷夏同志一时大意，中敌诡计，刚一进村，伏兵四出，雷夏等人，拔刀格斗，寡不敌众，壮烈牺牲。在横峰，反革命利用新增援的反动军队，假装倒戈，开到青板桥要求吴先民亲自收编。吴先民同志未将情况了解清楚，便贸然前往，被敌人逮捕。同时，敌军袭击王荆庙，起义队伍遭受较大损失。

在反革命的猖狂进攻下，革命又遭受到严重挫折。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了低潮。革命发展到了一个转折关头。由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逐渐转入了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为了适应当时的情况，赣东北党组织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军事上，挑选起义中的积极分子，集中起来，大概有二、三十枝枪的武装，脱离生产，成立土地革命军，进行游击战争。

（二）各村的农民军即作为本村革命群众不脱产的武装，就地警戒，侦察敌情，保卫群众，并相机打击敌人，不得不脱产的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镇压敌人，骚扰敌人。

（三）加强党的支部工作，教育党员使其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

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扭转整个革命形势，在敌人的"围剿"下，形势一天天地严重了，革命根据地被敌人割据，游击区缩小，联络困难，革命武装力量很少，武器弹药缺乏。一九二八年六月，游击队退到了游击中心磨盘山地带。磨盘山在弋阳、横峰、德兴三

县交界的地方，方圆不到五十里，游击队被包围在这块小小的地方。敌人的气焰越来越嚣张。我们队伍内部部分人的思想逐渐流露出消极动摇情绪，眼看这支游击队无法支持下去了。

就在这紧急时刻，为了统一思想，明确方针，方志敏同志决定召开弋、横两县的干部会议。六月二十五日，在弋、横交界的一个小山上——方胜峰的破庙里，召开了赣东北党的又一次有名的方胜峰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方志敏、邵式平、黄道、方志纯、吴先民、邹秀峰、庞先飞等二十余人，方志敏同志担任会议主席。我是以团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会议的。当时，敌人正向根据地发动反革命"围剿"，我带了一支游击队在九区一带活动，就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刻，我接到了参加方胜峰会议的通知。

会议一开始，庞先飞(团省委代表，黄安起义失败后调来，后叛变)就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全国各省二百多处起义，到现在都先后失败了，只剩下井冈山和赣东北等几个地方了，革命高潮何日到来，渺茫无期，现在形势又这样严重，眼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他提议，把枪枝埋起来，放弃阵地，分散隐蔽。

方志敏等同志，坚决反对这种逃跑主义的想法。义正严辞地指出，这里的群众跟我们一起革命，如果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便埋枪逃跑，群众牺牲太大。丢下群众逃跑，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共产党员应该同群众同生死共患难，谁要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他可以走，我们不走，我们是要和群众一起坚持斗争下去。方志敏同志的意见，得到大家一致赞成。会议很快就否定了第一种意见。

接着，部分干部又提出第二种意见，主张带了枪枝，离开敌人包围圈，到根据地外去打游击，大家经过讨论，很快就得出结论，一致认为，在根据地里，我们有群众可以依靠，现在南昌站不住脚，如果转移到新地区去，人地生疏，群众一下子又不可能了解我们，部队作战无群众支持和掩护，那岂不是自取灭亡。而且，我们

一跑，群众失去引导，革命便会立即失败。再说，即使是把敌人引出了根据地，我们回来，敌人还是跟了回来，我们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消灭他，引来引去，一点也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大家认为，短时间的出击是可以的，但丢掉根据地到外面去当流寇是行不通的。

会议最后一致同意了方志敏同志提出的第三种意见：坚持在根据地打游击，与群众共存亡。方志敏同志详细地分析了情况，指出，我们还没跟敌人交过手，而现在敌人兵力分散，真的打起来，不见得就打不过他们。至于敌人消息灵通，紧跟着我们转，那是因为根据地内部还有反动派的耳目存在，现在敌人正在包围我们。我们想走也走不了，只有打，到万不得已时，当然要转移阵地，但是也得事前有准备，在新地区先做好群众工作，万一仗打不赢，可以按照布置的步骤转移。因此，方志敏同志结论说，第一，敌人很分散，各路很弱，又没有群众，我们力量可以集中，择敌弱点，先打一路，打则必胜，以振军威。第二，反革命在活动，群众有些动摇，我们要向群众作工作，同时，为了打消群众顾虑，争取群众，要坚决镇压反革命。第三，为了作万一要转移阵地的准备，要开辟新的根据地。

就这样，会议在驳斥了第一种意见，分析了第二种意见，确定了第三种意见后，决定：

(一)将主力部队全部集中，由邵式平同志统一指挥，选择从过港埠出来的敌人最弱的一路，坚决打下去，因为这路敌人最为群众痛恨，打胜了可以把群众争取过来。

(二)群众有些动摇，由方志敏同志亲自负责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配备武装，给反动派首要分子以必要的打击和镇压，同时，作好根据地内的坚壁清野，阻击敌人，保护群众的工作。

(三)派黄道同志去贵溪，派方远辉同志去德兴，派邱金辉同志去上饶、玉山交界处的石人殿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

方胜峰会议后，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局面。反革命对根据地的“围剿”，很快就被粉碎了。

(一)出战金鸡山，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即方胜峰会议后的第二天，为配合由邵式平同志率领的主力武装，我带着游击队，来到金鸡山。这时，弋阳靖卫团一个连，驱逼一万余农民，从过港埠那边，一路烧杀而来。

我军绕过金鸡山脚到达金鸡山背后，出其不意从敌人屁股后面杀出去，敌人自进犯以来，未受挫折，未遭抵抗，因此骄气十足，警惕甚微，再加上忙于抢劫，根本没有多大战斗力。我军一个冲锋，就将“靖卫团”一个连冲垮。被敌人威逼来“围剿”根据地的农民一见敌人已垮，都回过头来向敌人冲杀过去。同时，被敌人追赶的老幼群众，也都回过头来，为我们助威。四周山头，红旗摇动，喊声震天，杀声遍地，敌人摸不到我们到底有多少部队，不敢恋战，拼命后退。敌人垮后，我军情绪高涨，乘胜追击，长追敌人五十余里，追到过港埠，捣毁了敌人的指挥部，直逼弋阳县城。弋阳城内乱成一团，伪县长闻风逃走了。敌人以为我们要攻城，遂将各路人马全部撤回县城。我们算准了敌人撤退的时间、地点，金鸡山战斗后，又兵不解甲，长驱八十余里，奔袭樟树墩，又击溃敌军一路，迫使敌人全部退回县城，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与此同时，方志敏同志深入虎穴，大义灭亲，将我家的反动叔父方高雨予以镇压，把有动摇情绪的大部分群众争取过来了。

(二)攻下横峰城，粉碎敌人第二次局部“围剿”。

一九二八年八月，敌人重新增兵，从河口调来四十六军杨劲部的罗英团为主力，配合地方靖卫团，向我举行第二次局部“围剿“。

杨劲部原为土匪。进入我区后，奸淫抢劫，无恶不作。九月，我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放出空气要“攻打烈桥”，而暗地里却集结了红军两个连的兵力，准备攻打横峰，敌人听到风声后，果然上当，在弋阳烈桥等地，赶修工事，增援人马，而放松了对横峰县城的戒备。九月二十三日晚，在邵式平、吴先民等同志率领下，我军急行五十里，直扑横峰县城，二十四日拂晓攻克该城。这是赣东北

武装起义后第一次攻下县城，群众个个欢欣鼓舞，处处庆祝游行。横峰县城攻下后，敌人内部更加混乱，朱培德疑杨部不稳，乘机将该部调回，全部缴械，敌人的第二次局部"围剿"又被粉碎了。

（三）瓦解敌军队，粉碎敌人第三次局部"围剿"。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敌人增加兵力，以周志群旅为主力向我进行第三次局部"围剿"。

当时，根据地内已实行坚壁清野，时届年终，天气寒冷，周部士兵尚衣单裤薄，肚饥腹空，兵士厌战，怨声载道，军心浮动。

一九二八年底，该部十一连，在连长匡龙海带领下，在德兴县磨角桥举行起义，投诚红军。这一连哗变后，周匪内部一片混乱，我军抓住时机，进一步深入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一九二九年二月，该部十二连，在副连长杨廷辉、排长龙志光的带领下，在弋阳县程家桥举行起义。至此，这个营十一、十二两个连起义，余下一个连的白军士兵包括连长颜文清在内也偷偷地个别地来投降。一个营就这样不战自垮，周匪狼狈逃去。

这个营的起义，一方面动摇了整个周志群的部署，另一方面使红军又进一步扩大，力量增加一倍以上，顺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局部"围剿"。

（四）大战长茅岭，粉碎敌人第四次局部"围剿"。

一九二九年四月，国民党王钧第七师第四十团又向我发起第四次局部"围剿"。这一次，敌人改变了战术，采取"久困穷追战"。我军初与接触，还没有摸到规律。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我军逐渐摸到了敌人的弱点和作战规律，当时，敌人从上饶、德兴、弋阳从三路向磨盘山包围。其中，弋阳长茅岭一路最为薄弱，而这一带地形又对我有利，于是我们便集中两个连的兵力，于一九二九年六月，在弋阳长茅岭伏击。我所率领的部队，也参加了这次伏击。一战便把进犯之敌击退，之后我们又在团林打了一个大胜仗。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局部"围剿"。

# 七、贵余万暴动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宗海、汪群等同志就在贵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农民协会，开展了群众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斗争虽然受到挫折，但革命的影响仍然存在。

方胜峰会议后，黄道同志到贵溪与邵忠、邵棠取得联系，积极开展活动。七月下旬，方志敏同志亲自到贵溪的裴源、周坊、江家坪一带活动，和黄道、邵忠等同志研究了贵溪的革命形势和任务。按照方志敏同志的指示，学习弋阳、横峰的经验，在贵、余、万农村开展了“上名字”运动。

为了加强贵、余、万方面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党又派程伯谦、方培龙等同志到周坊。经过这些同志的努力，革命很快发展到贵溪的塔桥、泗沥、横山，余江的划桥、大桥、象鼻湾，万年的富林、陈营一带。为统一三县的领导，在贵溪周坊的江家坪成立了贵、余、万中心县委。受信江特委领导。

贵、余、万中心县委成立后，就着手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为了准备和培养骨干，在江家坪秘密举办了积极分子训练班，吸收各地的农民积极分子参加，方志敏同志亲自向训练班作报告，告诉他们如何去工作，如何去领导群众斗争。训练班结束后，领导和骨干分子都分派到各地，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农民革命团。

一九二九年一月，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群众要求起义的呼声越来越高。贵、余、万中心县委立即召开了会议，研究了形势，认为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举行起义了，并报告了信江特委。于是，方志敏同志决定派武装力量支援贵、余、万起义。

当时，敌人为防止和镇压贵溪农民的武装起义，派了一个正规连和靖卫团驻在贵、余、万三县交界的地方——周坊。红军决定拔掉这个钉子。红军一攻周坊，敌军正规连在正面和我交火，后方宿营地让给靖卫团防守。我军派出一个连队向敌后冲去，靖卫团一

击便溃，我军顺利占领此地，即向敌正规连队射击。敌人见背后打起枪来，还以为靖卫团搞错了目标。待回头来看，见山上插了红旗，才知阵地已被红军占领，急忙退出战斗。我军将敌人前后夹击，四面包围，一连白军，束手就擒，战斗取得彻底胜利。

周坊战斗的胜利，扫除了贵、余、万起义的最大障碍，鼓舞了贵、余、万三县人民的斗志，农民革命团立即举行起义。周坊坂背吕家的农民群众，捉杀了外号"水蛇仔"的大地主四兄弟，首先竖起了暴动的红旗。

周坊起义胜利后，紧接着贵溪的神前、库桥，余江的大桥、划桥，万家的富林等地，也举行起义。尚未起义的村庄，看到其他村庄的农民已经起义了，也纷纷要求派人帮助起义。中心县委为扩大起义区域，选派了一批经过起义锻炼的优秀干部分赴贵溪、余江、万年各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武装起义。于是，整个贵溪的信江以北，周坊周围的余江、万年方圆六、七十里地，都先后暴发了农民武装起义。

为了镇压革命，贵溪大恶霸翁志高带领靖卫团和一百多人的警察队到桃源胡家，我军早有准备，乘敌午睡时，红军在几千农民的配合下，突然袭击翁匪，缴枪四十余枝，当场镇压了翁志高。翁志高失败后，敌人不甘心，又以正规军队第十八师一个营，于一九二九年秋天，向周坊大举进攻，亦被我军歼灭。

这两次大的战斗后，反革命气焰已被打下去，农民武装起义的烈火进一步燃烧起来。农民起义之处，反动的靖卫团被消灭，封建统治势力被打倒，基层苏维埃政权成立起来了，整个农村，欢天喜地，气象一新。

这就是继弋横起义后，持续发展了半年多的贵、余、万武装起义。

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三县的起义成果，信江特委决定建立贵、余、万三县游击司令部，派我去任该部的司令兼政委。同时，我还兼任着团的信江特委书记和中共信江特委的贵余万特派员。

就在贵、余、万暴动的同时，上饶、德兴、铅山也都举行了武装起义，并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样，赣东北的弋阳、横峰、贵溪、余江、万年、上饶、德兴、铅山等八县，除少数县城及附近村庄外，其余土地差不多都纳入了苏维埃的版图。

## 八、信 江 军 委 会

一九三〇年，我开始任贵、余、万游击司令兼政委，后又调任信江军委会代军委书记，在这段时间，我主要是从事军事工作。当时，信江军委会的工作，主要是两项，一是不断加强正规红军的建设，二是组织地方武装，并不断动员青壮年入伍，将地方部队提升为主力部队。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赣东北根据地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一套办法的。

早在一九二六年，漆工镇暴动后，赣东北人民就掌握了“两条半”枪的武装，以后发展到十二枝枪，并且开始了游击战争。

一九二七年夏，国民党一连士兵起义，党派方远杰同志去整顿这支队伍，番号为工农革命军赣东北独立大队。同年底，弋横起义后，从各地农民团中挑选了一部分农民起义积极分子，脱离生产，成立游击队，叫工农革命军。有二、三十枝枪。连长由邹琦、邱金辉、胡德珍先后担任。

一九二八年二月，赣东北党领导的脱产武装正式成立。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第一连。这即是赣东北红军的前身。一九二八年，粉碎敌人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时，工农革命军有所发展。反第一次“围剿”胜利后，队伍又有扩大。一九二八年八月，反第二次“围剿”胜利后，部队进一步扩大。已有两个连队的脱产武装。这时，各县均成立了地方武装。于是，革命武装的体系——主力军、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已初步具备。至一九二八年底，十四团已发展到三个连。团长先后由陈春荣(后逃跑)、章

旭（后逃跑）、黄章、邹琦等人担任。

至一九二九年八月，反第四次"围剿"胜利后，部队又有扩大，于是正式成立红军，改番号为江西红军独立团，下属四个连。团长先后为邹琦、李尚达、郑孝胥、孙志清、匡龙海。其中，郑牺牲后，颜文清曾代过一段时间的团长，经过整军，加强政治工作，部队更加正规化。

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独立团在弋阳余家仓整编。改番号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下属六个步兵连，一个机关枪连，拥有步枪四百来枝，驳壳枪二十来支，机关枪一挺。团长为匡龙海同志。一九三〇年六月，攻克秧板，部队大为发展，经过在弋阳芳家墩又一次整编，设立营的建制。当时，独立一团已拥有三个步兵营（一个营辖三个连）、一个特务连、一个机枪连、一个驳壳枪队、一个担架队，已有步枪六、七百支。此时，团长为周建屏同志。一九三〇年七月，红军独立一团已有很大发展和加强，经过乐平众埠街的整编后，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辖步兵三个团，人数约三万余。红十军军长周建屏同志，政委由邵式平同志兼任。至此，赣东北党的武装已经很是蔚为壮观了。

我在这里想介绍一下周建屏同志。周建屏同志是红十军的创始人之一，为赣东北部队的建设，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周建屏是金溪人，原在云南滇军中任过团参谋长、团长。后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建屏同志被党组织秘密派往江西，在九江、波阳一带做党的地下工作。到赣东北根据地后，一直担任赣东北红军的领导职务。一九三三年调离赣东北后，任红军廿四师师长。红军北上长征后，周建屏同志在陈毅同志领导下，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后不久，派往晋察冀边区，任北岳区四分区司令员。后来，在河北省平山县病故。党和人民为纪念周建屏同志，曾将平山县改为建屏县。

赣东北红军的战略原则是，以游击战为主，在有利条件下，有把握时，也打中小规模的运动战、攻坚战。

红军采取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围点打援，截断给养，扎口子，打埋伏、斩蛇头，切尾巴，打小仗，吃补药，打不打操之于我，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

赣东北党在军队建设中，还以极大的注意力进行了军队干部的建设。

红军创立初期，部队的连排指挥员大部分是提拔哗变过来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充任，但他们之中，有的军阀习气严重，且对革命军队缺乏了解。为了迅速提高部队的政治水平和军事素养，培养自己的军事干部，造就红军指挥员，党加强了对军事干部的培养，当红军还只有几个连的时候，就在弋阳九区大溪头创办了一个临时性的军事教导队。一九二九年秋，在弋阳吴家墩正式创办了信江军政学校。随后，该校迁至省苏维埃机关驻地横峰葛源，改名为彭杨军政学校（以彭湃、杨殷名字命名），以后又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校。军校校长开始由邵式平同志兼任，后为邹琦。教育长为薛子正同志。军校从创办到红军北上，共开办了八期，每期学员二百人左右，训练期为六个月。课程安排是：军事课占百分之七十，着重班排战术。政治课占百分之三十，课程主要有：党史、社会发展史、中国苏维埃运动等，方志敏等领导同志，经常亲自给学员讲课。学员毕业后，到红军中担任班、排、连长，成为红军的基层干部。现在还在我党我军工作的吴克华、饶守坤、黄元庆等同志，都曾是这所军校的学员。

在建设主力红军的同时，赣东北各级党组织还非常重视根据地的游击队、赤卫队等地方武装、群众武装的建设。当时，最基本的有：赤卫军、赤卫队、少先队。

赤卫军是从各地精选出来、富有训练的地方部队，是根据地的常备军，主要任务是镇压地方反动派，肃清地方反革命，随时准备应征前方作战和编入红军。一九三〇年以后，省成立了赤色警卫师，县有独立团（营），区有大队，每大队二十至六十人不等。省赤

色警卫师师长是祝荫龙同志，政委是吴先民同志。祝荫龙同志牺牲后，我接任师长。

赤卫队由二十五——四十五岁的农会会员和工会会员组成，是不脱产的群众武装，村有中队，乡有大队，区有纵队，主要任务是：眺高、守夜、放哨、查路条、送信、转送伤病员、运粮草弹药等。以维护地方秩序，管制当地反动派，协助保卫根据地。

少先队由十五——二十五岁的农会会员组成，是半军事性的群众武装。组织形式与任务和赤卫队大体相同，但体力和政治水平较赤卫队更高。其活动除党组织统一领导外，青年团还负责对其具体领导。

地方武装的武器，大部分是梭镖、鸟铳、土大炮、石头炮、松树炮、挨丝炮、竹钉、竹签、竹筒炮、土炸弹、老虎箭、地老虎等，敌人进攻时，将它们装在村里村外，路旁宅边，墙上地下，橱内灶里，到处都是，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一九三二年，国民党第五师周浑元部进攻葛源，我地方武装到处阻击，使该部从县城到葛源六十里路走了五天，且损伤很重。这一年，根据地群众武装击毙敌人三千余人。后来，这些土武器、土办法介绍到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中央苏区还发了号召，要求各地群众学习赣东北群众的勇敢坚定精神和创造性。

一九三〇年，就在我担任信江军委代书记的时候，年初，蒋、冯、阎正在酝酿军阀混战，各自抓紧布防，主力部队抽走，无暇顾及苏区。接着，蒋冯阎军阀混战爆发，形势对我更加有利，利用这个大好时机，赣东北红军经常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到外线去作战，打击敌人，发展根据地。这期间，我率部参与或组织地方武装配合主力参与了这样几个主要的军事行动：

二取景德镇

一九三〇年七月，由方志敏、邵式平同志亲率红军独立团攻打景德镇。红军夜行昼歇，从根据地中心弋阳，一夜强行一百四十余里，突然出现在乐平鸣山，消灭鸣山煤矿一百余人的伪矿警队，接

着，队伍开到洛口，击溃反动靖卫团许英部，第二天行至段家化装成伪军保安团，分四路进军景德镇。景德镇守军以为“自己人”，我军只打了几十枪，便顺利地轻取景德镇，一九三〇年秋，根据省委决议，由周建屏同志率领红军独立团第二次攻打景德镇，消灭伪江西省保安旅两个团后占领该镇，成立了景德镇临时苏维埃政府。之后，挥兵北上，连克乐平、波阳、都昌数县。二取景德镇后，使根据地扩大到景德镇、浮梁、乐平、波阳、都昌、湖口、彭泽一线。景德镇是当时江西四大名镇之一，红军打下景德镇后，影响很大，军威大振，景德镇瓷业工人、鸣山煤矿工人大量加入红军，极大地改变了军队的成分，这些工人为赣东北红军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二打九江

一九二九年秋，因叛徒出卖，江西省委遭到破坏之后，赣东北的党便与上级失去联系。于是，信江特委派我和唐在刚去南昌找省委，但未取得联系。之后，又决定派唐在刚同志去上海，以期和中央取得联系。

一九三〇年七月，正当我们攻下景德镇的时候，唐在刚从上海回到景德镇，传达了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要红军立即开去打九江，配合兄弟部队，截断长江，占领九江，夺取马当，会师武汉，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当时，随军特委方志敏同志殊为惊异，坚持要在特委讨论，并须整顿队伍。于是，我军便退出景德镇回师根据地。回师后，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商量，一致认为九江是全国重镇之一，三面临水，且有长江之险，敌人驻兵甚多，增援方便。而我军主力仅二千余人，且越湖进攻，又脱离后方，恐有全军覆灭之危。他们准备在特委会上据理力争。但在特委会之前，唐在刚根据中央指示，已将信江特委改组，增加了肖韶、李杰三（后叛变）、胡定铨（后逃跑）三人为委员，胡定铨为前委书记。

由于特委改组，结果特委会上对攻打九江的问题并未展开讨

论。会上唐在刚同志传达了李立三盲动主义统治的中央的指示，说目前形势是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当时任务是猛烈扩大红军，攻打大城市，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赣东北党的任务是迅速攻战九江，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红一军团夺取南昌，配合洪湖、湘鄂两根据地的红二军团和鄂豫皖的红四军团进攻武汉。最后，特委决定：红军独立团即向九江、湖口发展；后方迅速动员赤卫队一百个连加入红军。方志敏等同志对打九江仍有怀疑，因此，一面嘱率军攻打九江的周建屏同志要相机行动，胡定铨初到不了解情况，前线军事仍由周建屏同志负责。一面要邵式平同志速去中央，并带详细书面报告，希望中央指示有所改变。

一九三〇年秋，邵式平同志从中央回来，带来了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决议案《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和中央指示。并命令赣东北红军再次攻打九江。在"左"倾错误的逼迫下，特委在万年的富林召开了扩大会，传达贯彻李立三"左"倾错误。

富林会议斗争非常激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是坚决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但居于少数地位。同时，对打九江的问题，他们进行了分析，认为立三中央要我们打九江，肯定是行不通的，是盲动行为，但是九江方向的都（昌）、湖（口）、波(阳)、彭(泽)一带，是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地方，可以出击。因此，富林会议后，红十军再次出击九江。这次的出击行动，虽然是在李立三"左"倾错误指导下进行的，但并没有按照他的那一套去攻坚打硬，强取九江，而是以游击战的行动，攻取江西之都（昌）、湖（口）、波(阳)、彭(泽)一带，在都昌与波阳交界处的江桥消灭宋子文的税警团。攻克安徽的东流、秋浦等镇，占领马当要塞。扩大这一带为根据地和游击区，并建立和发展了这一带的党组织及苏维埃政权。

这时，由于我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且地方武装骨干也随军前往，根据地内一无主力武装，二由于李立三盲动主义者，取消了党团工会组织，领导薄弱。因此，敌人便乘虚而入。国民党反动派集

中了横峰、铅山、上饶、广丰、玉山五县的靖卫团，及安徽、浙江一部分保安团，向我后方进攻，一直打到上饶的茗洋关、横峰的霞坊一线。闽北苏区、铅山苏区、上饶苏区及横峰部分苏区，均受到严重摧残。同时，蒋、冯、阎军阀混战已结束，已派大军向我军包围，正在作全国性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此时，在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的坚决主张下，决定红军回师根据地。

我军回师后，群众大为振奋。我军刚进入根据地，国民党第五师胡祖钰部已尾随我们到万年珠山桥，这是一场遭遇战，我军奋勇回击，敌稍有停顿，我军乘敌迟疑之机，即穿过苏区，奔袭上饶，将五县靖卫团全部歼灭。随即回袭河口，全歼敌铅山靖卫团及河口守军国民党正规军张辉瓒残部李全坤团。至此，上饶、横峰苏区已全部恢复。

红军两次打九江，取赣北，入安徽后，苏维埃政权发展到彭泽、湖口、秋浦、东流等长江一线，使根据地大为扩大。

二进闽北

一九三〇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苏区进行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以伪第九师进犯赣东北。

在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下，红十军很久没有打过大胜仗了。于是党组织决定方志敏同志由苏维埃主席调任红十军，暂代红十军政委。一九三一年三月，方志敏同志到任。红十军在方志敏同志领导下，避实击虚，跃进福建，与闽北红军会合。一九三一年四月攻占铅山，于是，我军经桐木关进闽北，攻下长涧源后，连战再克赤石街，于五月十四日打下崇安县城。之后，红十军留下一个特务营给闽北作为骨干，其余全部回师赣东北。这时，在我军的主动进攻下，敌军东跳西窜，部署已乱，最后在葛源附近的何家坝击溃伪第九师，在闽北方面，红军独立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击溃国民党第七十九师，开辟建阳等根据地。红十军一进闽北，一共打了十一仗，仗仗皆胜。这就不仅调动了进攻根据地的敌人，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围剿"，而且在闽赣两省，扩大了影响，树立了军威。同时，将

根据地扩展到余江、广丰、铅山、崇安、浦城、建阳、建瓯、邵武、光泽一带。

一九三二年九月，国民党向苏区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以蒋鼎文、周浑元部配合当地驻军王锦文师向赣东北根据地进犯。赣东北的党为了打通闽北与赣东北两个根据地的联系，同时让进犯之敌扑空，以便最后消灭敌人，便决定红十军第二次进闽北作战。方志敏同志随军前往，担负领导军事行动的责任。

红十军到铅山的紫溪后，方志敏同志在紫溪召开干部会议，决定了进军闽北的作战计划：第一步，以红十军大部攻赤石街，另派小部分配合闽北独立师去攻星村街，这两镇占领后，崇安苏区便完全打成一片了。然后，第二步，红十军与独立师前往进攻浦城，一面开辟浦城苏区，同时解决一批给养（因浦城是较繁华的县城）。最后，第三步，红十军自浦城返回赣东北，在铅山方向活动一时期，最后完成打通两个苏区的任务。部队在由方志敏同志作了动员报告后，即分路向赤石街和星村街进攻，两处皆胜，接着便先攻崇安，调动了浦城守敌，我军乘虚攻克浦城。之后，红十军开赴崇安苏区，在完成预定任务后，部队经铅山，胜利返回赣东北根据地。

此外，赣东北红军还有贵溪的周坊之战、德兴的梅溪坂之战、乐平的秧坂之战等著名战斗。

## 九、信 南 特 委

经过一九三〇年的发展，中央根据地和赣东北根据地都得到很大的巩固和壮大。为了打通中央根据地和赣东北根据地的联系，省委决定加速开展信河南岸的赤化工作，并于一九三〇年底，建立了党的信河南岸特区委员会，信南特委成立后，省委派我任信南特委书记。

信河南岸特区包括资溪、金溪、余江（南部）、贵溪（南部）、东乡、黎川、南城（部分）、光泽（部分）等县。特委设在资溪。

一九三一年初，我化名万里，到信南特委工作，和我一同开辟信南特区的有团的特委书记兰广平同志。后来，我们在信南建立了一支武装游击队，游击队队长是宣寿庭同志。

在赣东北根据地，我以前都是作团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为主，到信南特委后，我开始作党的工作。

在这里我想，将赣东北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赣东北各地的秘密党员和党组织在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同时，就积极地开展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秋，弋阳等县建立了党的支部。以后，扩大发展成区委，受波阳中心县委领导。一九二七年窖头会议后，成立了弋横中心县委，此时，弋、横两县已有十二个支部，四十余个党员。

一九二八年初，又建立了弋阳、横峰、贵溪、上饶、铅山五县联合党委会，受设在波阳的赣东北特区区委（也称波阳特委）的领导。

一九二八年四月，弋阳、横峰、贵溪等县先后成立县委，方志敏同志先后任过弋阳、贵溪的县委书记。一九二八年底，召开第一次信江党代大会，报请省委同意后，成立信江特委，并派唐在刚同志任书记。特委设在弋阳黄沙岭，直接受江西省委领导。

一九二九年秋，江西省委及赣东北特委均遭破坏，信江特委便与上级失去了联系。此时，党已发展到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余江、万年、铅山、上饶等八县。并与闽北党取得了联系。赣东北特委遭破坏后，失去上级关系的乐平等县党组织（原属波阳特委）亦来信江特委找关系。于是，一九二九年底信江特委又改为赣东北特委，领导赣东北及闽北各县党组织，特委书记先后由方志敏、唐在刚同志担任。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五日①，中央决定，在赣东北特委的基础

---

① 应为一九三〇年九月—编者注。

上，建立赣东北省委，省委书记为方志敏同志。此时，整个信江特区已有七千五百余个党员，除县委外，有十八个总支，有二百九十多个支部（机关支部四十二个，农村支部一百六十个，军队支部十六个，城市、航运等其他支部八十个。）同年七月，中央正式决定将闽北划归赣东北省委领导。以后，根据地、游击区扩大至整个信江流域和赣北、闽北、浙西、皖南等广大地区，新开辟的地区也都有党的县委或区委组织。此外，游击区和部分白区，也有党的秘密组织，这些县委和党的组织均受赣东北省委的领导。

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党支部已有四百四十二个，党员已有一万二千四百三十六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赣东北省举行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全省党员已有一万三千余人。

一九三二年底，为更好领导四省斗争，中央又将赣东北省委改为闽浙赣(皖)省委。

赣东北苏维埃的工作曾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表扬，这与赣东北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赣东北的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在重视党的组织建设的同时，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

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党的组织是秘密的，党员也是零星的。那时，党员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发展党员的方法，一般是通过亲串亲、邻串邻，在贫雇农和工人中秘密发展。要求入党的人，只要党员介绍，经支部大会通过，就成为新党员，但是在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时，有一定的迷信色彩，必须喝鸡血酒宣誓。誓词是："遵守纪律，严守秘密，努力革命，服从命令，打破宗族，不分姓氏，牺牲个人，不害同志，生死共存，永不叛党，如有变心，刀斩弹穿"，一九二六年以后，党的组织逐渐由秘密转为公开和半公开，各级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都分别设有组织、宣传等部门，这时，按照党章要求和规定，发展党员的手续也渐趋完善，要求入党的人，首先要本人申请，并填写入党申请书，再经党员介绍，支部通过，并由区委批准，宣誓之后，才能成为新党员。

当时发展党员的对象和条件，是以立场坚定、斗争坚决、在群

众中有威信、对革命忠诚、打仗勇敢、工作积极为主要标准，成分只是标准之一。因此，所发展的党员，都是群众斗争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分子。

党的各级干部的选择，是以在斗争中表现忠诚、积极、勇敢、有办法、有成绩、为群众所信任为主要标准。慎重选择，逐级提拔，不轻易调动工作，注意培养本地干部和团结外来干部，同时，注意提拔新的、优秀的工农出身的党员到党和苏维埃各级机关。其中，又特别注意培养妇女干部，如赣东北省苏维埃副主席徐大妹，青年妇女部长李火凤同志，妇女部长张荷凤、姚玉兰同志等，就是从本地干部中培养起来的女干部。

党的支部是很精悍的。人数不多，但战斗力很强。一个一千多户的大村支部，也只有十几个党员，支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群众斗争，成为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和坚强堡垒。

发展白区党组织，也是赣东北党的组织工作特点之一。当时，党把发展白区秘密工作，看成是发展苏区、巩固苏区的一项重要任务。白区工作作好了，既有利于我军迂回出击，又能给苏区予各种支援，打破敌人封锁。方胜峰会议决定黄道同志去贵溪等地开辟第二根据地，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以后，发展白区秘密工作便成为党内外的一项经常的群众性的工作，为了发展白区工作，经常开办白区工作训练班，挑选强有力的干部，经过短期训练，派往白区开辟工作，为发展新的根据地准备条件。同时，每当敌人向根据地进攻时，党员与群众，能在根据地以外找到关系的，都大量到根据地以外去，冲破一切白色恐怖的困难，深入敌后，到白色区域做群众工作。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启发群众的觉悟，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发展组织，党员发展党员，团员发展团员，群众就发展群众参加群众团体。在敌人统治力量雄厚的地方，发展组织的办法，开始一般是利用兄弟会或其他带有封建色彩的形式和名义去发展的。白区工作到了一定的程度，条件成熟后，根据地就派游击队或正规红军配合行动，帮助发动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成为

新的革命根据地。

赣东北党的组织和全国所有的农村根据地的党的组织一样，绝大多数党员都是来自农民小资产阶级，按照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和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党要想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就必须加强党的教育，克服小资产阶级固有的阶级弱点，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这个思想建设的任务是艰巨的。

赣东北的党，从建党那天起，就从各个方面加强党的教育工作，当时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是：加强党的理论教育，组织党员和干部参加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提高党员和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动员党员和干部在党的支部或小组会上，参与党的重要决议和指示的讨论，以明瞭这些决议的是非，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抓紧方针政策教育。经常派遣党员和干部下去检查工作，开展工作，指导工作，以帮助他们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策略；重视军事教育，实现全党军事化，组织全体党员和干部学习军事知识，准备参加武装斗争，根据地除红军中的党员外，都参加地方武装组织；组织劳动锻炼，根据地的党员和干部都要有组织，有计划地经常参加劳动，在劳动中向工农学习，提高自己。

为了通俗地、具体地对党员，特别是工农群众中的新党员进行教育，赣东北党组织还以“二十二条”为中心内容，以“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为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二十二条的内容是：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牺牲个人；勇敢参加战斗；对党忠诚；要随时随地去宣传群众；要随时随地去组织群众；努力做好党的一切工作；严守秘密；按时到会；缴纳党费；勤学革命理论；打破家庭观念；打破地方观念；打破亲族观念；打破雇佣观念；打破领袖观念；打破迷信观念；不得贪污；要明瞭政治；接受批评；永不叛党。这二十二条，对根据地的党的建设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教育党员和培养干部，赣东北省委在根据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学校。卢森堡训练团等专门培养党员干部的学校和训练班。一九三一年，赣东北省的党的“一大”后，又创办了一所固定性的学校。同时，各县、区委以至支部也经常开展各种形式的干部短期训练班，培养党员干部，共产主义学校是一九三一年在横峰枫树坞创办的，其任务是培养县、区级党的领导骨干。卢森堡训练团，是以德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家卢森堡命名办的一所培养党的妇女干部的学校。后改为“三八”女子学校。

各级党校及训练班，除少数专职教员外，都是同级党组织的负责人亲自上课。

赣东北各级党组织都非常重视党的作风建设。

当时，赣东北的党根据党员的大多数是农民，有家长制作风。根据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的特点，在党的作风建设上，主要是强调与培养党员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作风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

赣东北各级党委会以至党的支部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原则。党委委员在集体领导下有详细的分工，党内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发扬民主进行切实的讨论。讨论的问题非常实际，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有不同意见，争到面红耳赤，一经多数表决，便完全服从组织决定，坚决执行。这样，就大大地鼓励了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责任心。

党与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党员都能奋不顾身地保护群众，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都采取各种办法，减轻群众负担，大多数干部都自带口粮参加工作。根据地内，省委、县委、区委各级党的领导干部，经常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疾苦，关心群众生活，赣东北党的这种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曾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

总之，我认为，赣东北的党，在以方志敏同志为首的赣东北省

委领导下，政治上是坚定的、组织上是巩固的，在革命的生死关头，坚持了群众运动，开展了武装斗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实际斗争中，摸索了党的建设与苏维埃建设的一套办法和经验，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党的理论水平不高和党员文化水平低，也表现了它的朴素性，这说明在党的建设中，还缺乏系统地理论学习和总结经验。

## 十、巩固发展的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二年，我离开信南特委，调任省赤色警卫师政委。

由于敌人主力进攻中央根据地，无力分兵"围剿"赣东北根据地，同时，由于我中央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一、二、三次"围剿"，敌人被打得焦头烂额，一下也不敢分兵对其它各根据地轻举妄动。因此，在一九三二年，赣东北根据地得以较为稳定地巩固发展。利用这个相对稳定的大好时机，赣东北的党、赣东北的人民、赣东北的军队，做全力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创造了赣东北根据地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根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制定的苏维埃经济政策，赣东北根据地结合本地的具体情况，制定的经济政策是：

一、没收帝国主义手中财产——租界、海关、银行、铁路、航运、矿山、工场等；

二、中国资本家及手工业企业，不违反苏维埃政府法令者，准许自由营业；

三、实行劳工监督；

四、保护商人正常自由贸易；

五、禁止大商人垄断价格，封锁金融；

六、禁止高利剥削，取消典当铺店，实行低利借贷；

七、发展合作社事业；

八、发展红、白区域之间的贸易事业；

九、禁止苏区内使用国民党政府纸币；

十、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

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首先就是发展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发展根据地的农业生产非常重视，发布了各种决议，制定了各种政策，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

赣东北省苏维埃作出了关于发展耕种运动的决议，决议中指出：发展耕种运动，大量的增加农业生产，不但可以使工农群众有多余的生产品，改善他们的生活；同时，可以充裕苏区粮食及各种军需品，加强我们进行革命战争的物质准备。因此，应奖励耕种运动。

省苏准备用很大的力量发展苏区的农业生产，以发动群众耕种运动。在各种群众会议中，发动群众批评、指责那些对生产怠工的分子，而奖励积极生产者。对成绩优秀的，报告苏维埃政府给以发奖品。这样，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根据地地区的革命和生活。

在当时，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使无土地或少土地的贫苦农民得到土地。因此，赣东北根据地进行了很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省苏维埃成立后，正式制定了土地法。同时，苏维埃政府还规定不禁止土地租佃和买卖，但要防止地主富农乘机收回其土地；土地分配之后，非必要时，不再重新分配。如因人的生产和死亡的关系，苏维埃政府得按照情形将死亡者土地转人与生产者；农民分得土地山坑，须努力耕种，以免荒芜，如因怠工致田地山场荒废者，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得全部或一部分收回其土地，另给他人耕种。

由于敌人对我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为了解决军用民需的工副业产品，赣东北根据地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注意发展了根据地内的工业生产。

赣东北矿藏、森林、药材等资源丰富，棉、麻、甘蔗等工业原料生产也多，有利于工业生产的发展。武装起义后，就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小工业。到一九三一年，为了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

方志敏同志亲自召开了苏维埃财经委员会，提出了大办苏维埃工业的方针，促进了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当时，省、县、区、乡都有工业，创办了规模不等的煤矿、铁矿、发电厂、木炭厂、锅炉厂、铁砂厂、炼铁厂、兵工厂、硫磺厂、地雷厂、樟脑厂、造纸厂、硝盐厂、制糖厂、榨油厂、枯饼厂、染布厂、被服厂、织布厂、织袜厂、制鞋厂、石灰厂、农具厂、木船厂、中药厂等。并组织家家纺纱、村村织布，基本上形成了适应战争和军民生活的工业体系。为此，毛主席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表扬说："在闽浙赣边区方面，有些当地从来就缺乏的工业，例如造纸、织布、制糖等，现在居然发展起来，并且收得了成效。他们为了解决食盐的缺乏，进行了硝盐的制造。"

由于工业、农业的发展，交通邮电事业也相继发展起来，主要是修桥补路，建立渡口，添置船只，设立邮站，发行邮票。

随着工交、农业生产的发展，根据地的财贸事业也发展和繁荣起来。并且规定统一财政收入。当时，财政收入主要是两方面来源：一是取之于民的税收，一是取之于敌的战争缴获和打土豪的罚款，财政委员会规定，各机关单位的缴获及打土豪的罚款，一律交政府统一入库，本单位不得擅自使用。

省苏维埃政府还定了农业税的征收和减免办法。

对红军和政府工作人员还统一供给标准。当时，军队每人每月三斗三升大米，地方干部每人每月二斗八升大米。菜金按日计算，军队每人每日五分钱，地方干部四分钱。苏维埃政府还发行纸币，发放公债，赣东北省曾在根据地内发行一元、一角、十枚铜元等三种面额的纸币，与银元通用。在反五次"围剿"时，决定发行十万元"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群众争相购买，红军，实际发行公债十四万元。乐平县一个妇女就买了三百元。当时规定公债本息一九三五年七月偿还，利息为一分息，后因条件不允许，未能偿还。但群众一直保存着，全国解放后，我们还兑换了为数不少的苏维埃纸币和如数偿还了苏维埃公债。

所有这些政策和措施，在当时，对调动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的积极性，对巩固和壮大革命根据地，打击敌人的反革命“围剿”等等，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十一、曾洪易来到赣东北

就在赣东北根据地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赣东北根据地受到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极大破坏和危害。

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党中央。四中全会后，中央即派万永诚（后叛变）、倪宝树（后叛变）来赣东北省委，在葛源召开县以上干部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我当时是信南特委书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由万永诚作报告，传达四中全会精神，会议认为，赣东北党还有立三路线，必须彻底转变。同时，又批评了赣东北党是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调和主义等等。在会议上，方志敏等同志即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这些批评是没有根据的。赣东北党领导赣东北人民创造了工农红军，创建了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如果是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等，路线都错了，则无法解释这些事实。

省委扩大会议后，省委即部分改组。由中央指定，万永诚为省委书记，倪宝树为红十军政委，方志敏同志仍为省苏维埃主席，邵式平同志仍为军委主席，黄道同志为组织部长，派肖韶同志去闽北任特委书记。当时虽已传达四中全会和省委部分改组，但由于省委整个组织和红十军的领导都没有大的变动，万永诚初到，对各方面的情况还不熟悉，加之省委多数同志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仍然保持着以往的斗争传统，仍能正确执行毛泽东同志创立根据地的主张。因此，仍然取得了红十军一进闽北和反第二次“围剿”的重大胜利。

但是，正因为如此，中央认为赣东北执行四中全会不彻底，一

九三一年又派曾洪易(后叛变)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资格及吕振球同志、聂洪钧同志、杜石公(后逃跑、脱党)、关英(后脱党)等人来赣东北。

曾洪易等人到赣东北后，省委的情形就开始变化了，首先是在省委组织之上，有一个决定一切的中央代表。其次是改组了省委，以万永诚为书记，聂洪钧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将省委委员吴先民、黄道、邹秀峰、洪坤元等同志排挤在省委之外，将我和吴先民等同志分别调离红十军和团省委。再就是在省委常委内组织了一个以万永诚、聂洪钧、唐在刚为成员的三人主席团。

曾洪易一到赣东北，便积极执行王明"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组织路线，大搞宗派主义。挑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拉拢唐在刚等一部分犯过错误的同志，网罗执行王明"左"倾错误坚决的柳真吾、李静愚等骨干分子，组成宗派小集团，排挤执行正确主张的同志。

同时，曾洪易在政治上全面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赣东北党内继续反所谓立三路线、富农路线、封建地方观念与保守主义。曾洪易断章取义地把同村大姓支部叫做封建地方主义的党；把富农分到些好田，地主分到田叫富农路线；把解决难民生活的实验农场叫做立三路线的过"左"办法；把游击战争中"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围点打援"等战术，叫做保守主义，等等。

就这样，曾洪易到赣东北后，不到半年，就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将赣东北党的工作全部否定了，因而，为召开省党代会作好了准备。

一九三一年九月，赣东北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葛源开幕。这次大会，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虽然名义上参加了大会的领导，但实际上大会的领导权完全被曾洪易以中央代表的资格控制了。各种决议草案，都是由中央代表授意事先起草好，并经中央代表修改后提到大会上去讨论，大会讨论的中心不是各种决议草案，而是反立三路线、富农路线与保守主义。会议最后通过了经过曾洪易修改

的、大会没有充分讨论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苏维埃工作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等会议决议。在决议案中，不顾事实地指责赣东北的党不但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而且是立三路线的发挥者；说赣东北党的组织大多数不是从斗争中发展的，而是征服、拉夫、亲族和感情关系的相互介绍建立起来的；说党的支部根本不能领导群众，党的组织生活充满着富农意识、官僚主义、悲观、消极、畏缩、动摇等表现和倾向；说赣东北的雇农工会是富农工会；说赤卫队、少先队没有成为群众武装斗争的组织，更谈不上是群众的武装组织力量，等等。把赣东北的各条战线、各项工作说得一团黑。大会提出要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及四中全会路线的彻底转变，提出要消灭富农，消灭大小商业资本家。认为中农是最危险的，应该打击，贫农也是靠不住的，只能团结。

上述这些决议与指责，引起了绝大多数党员的强烈不满和愤怒。但由于大会在曾洪易等人的把持下，正确意见未被采纳，仍然按照他们的旨意，改选了省委。万永诚为省委书记，唐在刚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方志敏为省苏维埃主席、党团书记，邵式平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黄道为闽北特委书记，聂洪钧为红十军政委，关英为团省委书记，汪金祥为保卫局局长，并都参加了省委。以万永诚、唐在刚、涂振农、方志敏、邵式平等为省委常委。大会选举时，又将吴先民、邹秀峰、洪坤元等同志从省执委排挤出去。

大会以后，又改选了红十军的领导，聂洪钧、杜石公分别担任了红十军的政委和参谋长。

这样，赣东北省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省委与红十军就都在曾洪易的完全控制下了。

曾洪易在组织上完全控制了省委与红十军的领导之后，王明"左"倾错误便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使赣东北根据地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惨重损失，直至最后断送了赣东北根据地。

第一，军事上的盲动冒险主义。

一九三一年底，敌人已开始向我中央苏区等根据地发动了全国性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为防止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打通，敌人布置了近两万人的重兵于信江沿岸，并对赣东北苏区实行钳形包围，以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向前推进。

在这样的情况下，曾洪易在"保卫苏区"，"不失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下，消极防御，分兵把口，处处阻击，攻坚打硬。不要游击战，不要运动战。结果，使我军兵力分散，被动挨打。

方志敏及邵式平等同志坚决反对这一方针，因为当时我军既无炮兵，又无其它重火力武器，攻碉堡，打堡垒是极端困难的。所以，"持久围困堡垒"必然是拼消耗的、被动的、是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他们主张向皖浙方向发展，因为当时敌人为防止我们与中央苏区打通，已经集重兵于信江一线，而在皖浙边境的婺源、常山、江山方面，敌人力量则很薄弱，多是地方武装，又没有堡垒，且这一带有怀玉山为依靠，有利于我们回旋，迂回，又可威胁金华、杭州、牵制敌人，减轻中央苏区压力。我军若向这一带进军，采取游击战争，主动打击敌人，定能占领皖浙边境，巩固扩大苏区。再经仙霞岭与闽北苏区打通，再打通中央苏区，以取得反"围剿"的彻底胜利是完全可能的。

可是，曾洪易等人却认为方志敏及邵式平等同志这一主张，是反对打通中央苏区，是在敌人堡垒面前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而给以打击，将邵式平同志军委主席的职务撤掉，以唐在刚接任。

从此，曾洪易等人便发动红军主力，实现他持久围攻堡垒的战略方针，敌人在哪里筑堡垒，红军就开哪里去，使自己处处陷于被动，消耗实力。仅贵溪夏家岭一个碉堡，曾连续进攻四次均未攻克，部队伤亡千余人。由于执行"左"倾机会主义的盲动冒险主义政策，结果，不仅未能打通中央苏区，而且，由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在赣东北地区未能粉碎，使根据地损失很重。

中央苏区反第三次"围剿"胜利后，敌人虽然暂时停止了对赣东北根据地的大规模进攻，但赣东北根据地只剩下横峰一个县城和弋

阳、贵溪、上饶、德兴、乐平等县境内纵横二、三百里路的地盘了。

第二，政治上的极"左"路线。

曾洪易为实行其所谓"国际中央路线"，提出"明确阶级路线，反对富农路线"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修改了土地法，实行"消灭富农，打击中农，联合贫农"的极"左"政策。无条件地收回地主、富农分得的田地，驱逐地主，富农出境，叫做"减轻苏维埃负担，加重国民党负担"。结果把大批地、富驱赶到白区，增加了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苏区的力量。由于禁止敌占区群众的"白皮红心"，断绝了苏区与白区群众的来往。结果，使我党的敌后工作全部遭到破坏，使苏区边境封锁，消息闭塞。同时，在党员、干部中，则不顾党员、干部的斗争历史和现实表现，出身不好的一律被认为"异己分子，都要给以"无情打击"。无条件地开除党籍，撤消职务。甚至男女婚姻，因成分不好，都要退去婚约。结果，使党内不团结，干部情绪低落。

方志敏等同志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却被戴上了所谓"富农路线"、"右倾路线"、"包庇异己分子"、"立场不稳"等帽子。结果，使得地主更加反动，富农不满，中农动摇，贫雇农陷于孤立，地富子女，人心惶惶。给根据地的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第三，肃反中的严重扩大化。

曾洪易疯狂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结果，造成军事上的失利，环境日益严重，群众动摇，干部表现不满，等等。这些情形的出现，曾洪易都看成是反革命的破坏，施以肃反压力。特别是一九三二年三月间，鄂豫皖肃反文件传到赣东北，曾洪易等以鄂豫皖肃反后打过胜仗，便提出了"以肃反胜利争取红军胜利"的口号。同时，中央亦有指示，责难赣东北肃反工作未开展。这时，适有由上海派来做文化工作的潘务行、工会工作的何东标、互济会工作的罗子华，对曾洪易及省委领导不满，曾洪易便对他们怀疑。他们在闲谈中提倡健康，要洗脚、爬山等，曾洪易认为是以"健康会"的名义进

行改组派活动。吴先民同志亦因对曾的领导与路线不满而有议论，曾认为是反革命派别活动，逮捕吴先民。于是，惨痛的赣东北肃反就这样在地方和红军中开始了。

肃反开始时，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说反革命虽有，但不致有这样多。吴先民等是长期斗争中考验过的忠实党员，不会是反革命，并在省委常委会上同曾洪易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曾洪易即给方志敏、邵式平同志扣上对肃反动摇的帽子，加以隔离，强制方、邵写检讨书，并在群众中公布。

从此，肃反更加疯狂，从军队到地方，由上级到下级，由机关到农村，由赣东北到闽北，都大举肃反。在肃反过程中，既不相信同志，又不调查研究，只是滥加罪名，严刑拷打，指名逼供，乱捕乱杀。无数革命群众在这种错误的肃反政策下含冤而死。许多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群众斗争领袖与重要干部，如红十军政治部主任吴先民同志，地方暴动领袖黄镇中同志，团省委宣传部长汪明同志，闽北党的创始人陈耿、徐福元同志，还有舒翼、兰广平、徐跃等同志，都被曾洪易以"AB团"、"改组派"、"罗章龙派"、"第三党"、"反共会"、"铲共会"、"大刀会"、"兄弟会"等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惨遭杀害。县、团级干部中知识分子出身的负责干部大部被肃反搞掉。弋阳、德兴、乐平的整个县、区、乡、村干部也大都被肃反搞掉。甚至在白区工作的一些干部和交通员也调来苏区，加以杀害。国民党正规部队及地方武装中的一些起义官兵，有的携妻带子来投奔革命的，也都认为是反革命派来的，将其杀掉。同时，在群众中也开展肃反，仅弋阳一县就设有监狱十七所，关有所谓"AB团"犯一千一百多人，被杀害的达三百余人。九个区委书记杀得只剩下一个。

这次肃反错误，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五年尚未完全停止，给赣东北的党、赣东北的军队、赣东北的人民群众、赣东北的根据地建设带来了无可挽救的惨痛损失。

曾洪易在肃反中的严重扩大化，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1）由

于乱捕乱杀，大伤了党的元气，造成了干部动摇恐慌，人人自危，使党内产生一种严重的恐怖表现；（2）许多军事骨干的被杀，影响了红军的作战情绪，减弱了战斗力，使军事遭受不断失利；（3）由于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被杀，引起群众对党怀疑，隔离了苏维埃与人民、党与群众的联系；（4）由于一些在白区工作的同志被杀，造成了赤白严重对立，失去了苏区周围群众工作的桥梁，影响党的白区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5）杀投降官兵，杀俘虏，破坏了党对投降兵、俘虏兵的政策。

一九三四年七月，七军团改编为抗日先遣军。曾洪易仍为中央代表兼随军全权代表，乐少华为政治委员，寻淮洲为军团长。部队在曾洪易等人的指挥下，处处被动，在与敌人交战中遭受惨重损失。在此情况下，十月间，曾洪易知道中央红军已长征了，即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在部队和干部中散布失败情绪。主张党不要武装，应转为秘密的地下活动。至此更悲观失望，企图逃跑。方志敏同志将此情况电告中央，撤消了曾洪易的全权代表职务。后来，中央决定七军团与红十军合并，组织十军团。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方志敏为随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部队即向皖南行动。但是，此时敌人已在皖浙边界布有重兵，我军与敌人交战，伤亡惨重，寻淮洲同志牺牲。刘畴西指挥不力，缺乏机动，部队又回到苏区，进到怀玉山区，不幸被敌人包围打散，方志敏同志被捕，英勇牺牲了。而曾洪易此时已逃去南京，向敌人告密自首，成为可耻的叛徒。不久，苏区全部被敌人占领，闽浙赣皖苏区遭受敌人残酷摧残。

后来在延安和北京，毛主席曾多次对我说：方志敏同志牺牲可惜了！王明路线断送了他。王明路线把好多同志都断送了。象方志敏、何叔衡、刘伯坚等好多好同志，都是王明路线下牺牲的。这真是血的代价，惨痛的教训呀！

写完这个稿子的时候，我想说明一下：赣东北根据地这段历史，确实不应该由我来写，就我的阅历，我的水平，是无论如何不

能挑起这个担子的。但是，赣东北苏维埃的创建，迄今已有四十多年了，在这四十多年的艰苦斗争中，当年创建赣东北闽赣根据地的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投身到根据地建设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绝大多数都已牺牲或病故了。我是幸存者之一。为纪念先烈，为勉励自己，为后人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我觉得我有责任将这段历史写出来，尽管是力不从心，挂一漏万，但我还是根据我的回忆和掌握的资料，硬着头皮将这段历史写出来了，也算是对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牺牲了的同志的一个悼念吧。

一九八〇年三月

# 漫谈闽浙赣老根据地

龙跃　江天辉　黄知真　缪敏集体漫谈

黄知真执笔

我们几个人都是闽浙赣的同志，早年是在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领导之下工作的，凭着四人的记忆，将过去二十多年闽浙赣根据地的斗争，零乱的记载这一些，自然，遗漏了很多重要的环节，并且错误之处一定很多，尚请闽浙赣老根据地的一些革命先进同志们予以批评和指正。

## （一）共产主义在闽浙赣生了根发了芽

### 一、闽浙赣介绍

"青的山，绿的水，灿烂的山河，美的衣，鲜的食，玲珑的楼阁，谁的功？谁的力？劳动的结果，着烂衬，住茅屋，吃的烂蕃薯，工农们，真辛苦，军阀要拉夫，劣绅压，土豪欺，贪官污吏抢，全世界工农们联合起来啊！"

这是大革命时候，在闽浙赣广大群众中流行的一首歌子。

的确，闽浙赣是一个山明水秀，物产丰富的美丽地方，东到大海，西到鄱阳湖，南到闽江口，北至长江，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有着磨盘山、武夷山、黄山、仙霞岭、洞宫山等美丽山区，有着沃野千里的平原，有着丰富的农作物，也有着无尽的地下宝藏。

可是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之下，闽浙赣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地区，工业基础根本谈不上，而广大的农民也过着极悲惨的生活，农民说："镰刀挂上壁，饭就没有吃。"尤其是第一次大战

后，农村经济更加急剧地走向破产。

广大受压迫的闽浙赣农民，为着生存，早在大革命之前就进行过许多英勇的斗争，弋阳邵家坂的农民武装赶走过反动县官，铅山和尚坪的农民在洪门会领导下，拥护一个叫朱龙田的七岁孩子做皇帝，成立大和国，武装打下过石塘镇，福建的大刀会遍及闽北各县，吃大户，捣毁地主粮仓更是普遍发生。

革命前的赣东北，充满了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但是，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都先后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了起义之后，闽浙赣人民革命斗争才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在弋阳、横峰两县开始了武装起义，一九二八年底贵溪、上饶也开始了起义，苏区发展到整个信江流域，成立了信江特委和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到一九三〇年，苏区发展到乐平、浮梁、波阳、婺源和浙江的开化一带，包括整个赣东北，成立了赣东北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此时，闽北方面也早在一九二八年开始了起义，建立了闽北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中央决定将闽北划归赣东北领导后，又改为闽浙赣省，一九三五年游击战争时期，闽东北苏区与闽北苏区会合了，皖南新游击根据地发展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开辟了，整个的闽浙赣苏区，实际上包括江西、浙江、福建、安徽四个省，由赣东北、闽北、闽东三个苏区根据地和皖南、浙南两个游击根据地所组成。苏区的人口约在一百万左右，游击区的人口则在二千万以上，这个苏区在二十六年的斗争中，经过无数迂回曲折的道路，熬过数不完的艰苦困难，牺牲了几十万宝贵的生命，始终坚持着顽强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 二、共产党出现在闽浙赣

"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震动了全中国，也波及到穷乡僻壤的闽浙赣，闽浙赣人民的光荣领袖、不朽的方志敏，最早接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方志敏同志于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入了党，黄道同

志和邵式平同志也先后于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加入了共产党，通过这几个闽浙赣人民革命的先驱者，共产主义的种子播种到了闽浙赣。

一九二三年方志敏同志在南昌组织的改造社，吸收了许多闽浙赣地区的青年参加，一九二五年方志敏同志回到弋阳。在弋阳高小同学中组织了青年学会，方志纯、黄镇中、邵伯平、舒翼、汪明等都是当时的会员，黄道同志在横峰高小同学中组织了岑阳学会，吴先明、程伯谦、钱壁、李穆、邹秀峰，都是当时的会员，邵式平同志在邵家坂成立了益友社，通过这些组织，团结和教育了大批的先进青年，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闽浙赣共产党的骨干和群众领袖。

一九二六年秋，北伐军已经进入了江西，方志敏、黄道、邵式平同志都先后回到家乡，组织农民运动，发展党的组织，邵式平同志在弋阳与方志纯、雷夏、黄镇中、舒翼、胡德兰等同志成立了弋阳共产党支部，黄道同志在横峰与吴先民、邹秀峰、银壁、李穆、黄端喜等同志组织了横峰共产党支部，其他如舒同同志在东乡、江宗海同志在贵溪，都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一九二七年陈耿同志在福建崇安也建立了党的组织。

从此，共产主义在闽浙赣人民中生了根，并且很快就萌芽了。

## 三、漆工镇捣毁派出所，邹秀峰坐镇横峰城

随着共产党组织的产生，各地的农民运动也迅速的开展起来，尤其是弋阳、横峰一带，早在一九二四年方志敏同志就开始在自己的家乡湖塘村进行了工作，通过方远辉、方远杰几个同志传播革命思想，一九二五年方志敏同志回家时，又在湖塘创办了义务小学和农民夜校，通过这两个学校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农民协会，随着湖塘农民协会的成立，弋阳九区及八区七区各一部便开始成立了农民协会，到处酝酿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

在横峰方面，黄道同志在姚家垅、楼底蓝家一带，吴先民同志在青板桥一带，程伯谦同志在葛源一带都经过各种关系，发展了农

民协会，贵溪、上饶等地也有些农民协会的组织。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到了江西，方志敏同志主持江西农民协会，各地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便有了更大的发展，到处收缴北洋军阀溃兵的枪械，替北伐军带路，使得北伐军能够很迅速的占领赣东一带。

北伐军虽然占领了赣东，但是各地的政权，仍然掌握在豪绅地主反动派手里，于是在北伐军胜利鼓舞下的各地农民协会，便纷纷地高举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旗帜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向地主阶级和反动政权的斗争。

弋阳九区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打下了漆工镇，捣毁了反动的警察派出所，横峰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攻克了横峰县城，赶走反动县官，此时，恰逢邵式平同志以省政府特派员资格来到赣东一带，立即委任共产党员雷夏为漆工镇巡官，邹秀峰为横峰县长，吴先民为横峰公安局长，掌握这两个地方的政权和武装。

此时运动更加发展，农民协会到处捉土豪游街，到处封闭地主房子，没收地主财产，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赣东各县开展起来了。

## 四、姚家垅三打横峰县，吴先民首上明山岗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以后，赣东形势开始紧张，贵溪江宗海同志被反动武装杀死在县党部，李烈钧进到上饶成立反动的江西省政府，并且在地方封建势力的互相勾结下，于一九二七年五月间进占横峰、弋阳一带，黄道同志等出走南昌，钱壁、李佑韩等同志及黄道同志爱人吴品秀、吴先民同志爱人周嫦娥被捕下狱，各地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受到了第一次的打击。

横峰县姚家垅楼底蓝家一带的农民，听到敌人进到县城，听到许多同志被捕越发怒不可遏，在黄端喜、黄球等同志领导之下，武装进攻横峰县城。

第一次集中了七十余人带着土枪土炮，进到横峰城西五里之塔

脚山时正遇到从河口开来的一连敌军，起义群众被击散。第二次起义群众正在集合，国民党反动军队已经进到姚家垅，又被迫解散。第三次集中了一千余人，带上九门土炮，于天未明即进到横峰城下，拂晓时一声土炮，农民们奋勇爬城，打开城门，一路直捣县政府，反动县长从梦中醒来，赤脚跳墙逃跑。一路农民打进监狱，用石头打破牢门，背走被捕同志，等到河口救兵赶到时，农民们早已唱着凯歌胜利而回了。

与此同时，吴先民同志率领横峰县警察局的八条枪，转到青板桥，旋又到明山岗一带，方志纯同志和雷夏同志率领漆工镇警察派出所两条半枪转到弋阳八区山地与农民自卫军一道共同坚持游击战争。

也可以说这是闽浙赣伟大起义的前奏。

## （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一、五县共产党员集会窖头村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也笼罩着江西，许多同志被捕了被杀害了，许多同志被迫转入了地下，进行秘密工作。许多同志被通缉。

一九二七年朱培德在南昌，欢送共产党出境不久，邵式平同志回到了弋阳邵家坂，八一起义后，黄道同志被通缉，也潜回横峰姚家垅，秘密与弋、横各同志联系，九月间，方志敏同志从吉安回到了弋、横地区，带回“八七”会议决议精神，经过联系后，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召集赣东北五县共产党员会议，出席会议的：弋阳方面有方志敏、邵式平、方志纯、邹琦、彭皋、黄镇中、方远辉。横峰方面有黄道、吴先民、邹秀峰。贵溪方面有邵棠。上饶、铅山缺席。地点在弋阳九区窖头村，会上方志敏同志传达了“八七”会议的决定，他说：

“大革命已经失败，但是中国革命要解决的问题，一个也未解

决，革命形势依然存在，现在的办法只有从新革命，组织农民暴动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会议上一致同意方志敏同志的传达，并且具体规定了：1.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匪帮。2.铲除贪官污吏，肃清土豪劣绅。3.平债分田建立劳工政府。4.如果中途变心刀斩弹穿不赦等起义纲领。

为着积蓄革命力量，会议决定以村为单位，秘密组织农民革命团，作为起义的骨干。

最后成立了弋横工作委员会，选出方志敏、黄道、邵式平、方志纯、吴先民、邵棠、方远辉等七个同志为委员，以方志敏同志为书记，并具体分工：黄道同志在弋阳九区漆工镇一带，邵式平同志在弋阳七区邵家坂一带，方志敏同志在横峰楼底蓝家、姚家垅一带，吴先民同志在青板桥一带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此时，为着隐蔽起见，大家都改了名字，方志敏同志化名汪祖海、邵式平同志化名余艳王、黄道同志化名陈松寿、吴先民同志化名薛子廷、邹秀峰同志化名丁俊人。

## 二、弋、横各地起了农民革命团

大革命失败后，正在被官僚地主倒算报复下，弄得无路可走的农民，看到自己的领袖回来了，听到窖头会议后各负责同志带来的革命办法，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到处传播“打倒土豪劣绅，平债分田分地”的口号，那些原来农民协会积极分子们更是到处找寻可靠的工作对象，非常秘密的告诉他们：

“现在共产党来了，告诉我们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不还债，不交租，你赞成吧？”

“有这样好的事？我当然赞成。”

“你赞成就上一个名字罢。”

就这样经过这些积极分子一串十，十串百的发展起农民革命团的组织，同志们就依靠这些组织来召开会议，解释政策。并且采用

农村的旧形式，吃鸡血酒举行宣誓。

到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底，便在弋横交界掌握了姚家垅、楼底蓝家、青板桥、明山岗、窖头、湖塘、燕坞黄家、丁山等等大小几十个中心村，就组织了八十几个团，农民们偷偷做好红旗子，并且以打野猪为名，把土枪土炮抬起来，组织了自己的武装，起义准备成熟了。

## 三、楼底蓝家的信号，伟大的起义开始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方志敏同志在楼底蓝家响起了第一声信号枪，楼底蓝家是属于横峰而靠近弋阳的一个百户左右的山庄，村内除了两三户地主之外，都是种田的农民，农民们在农闲时，还集股开了一个小小的煤炭厂，作为自己的副业收入。

早在一九二六年，黄道同志就开始在这里进行了工作，一九二七年北伐军进到横峰之后，楼底蓝家在黄道同志领导之下成立了农民协会，参加过赶走反动县官和三打横峰县城的战斗，在战斗中出现了蓝长金、花春山、蓝高茂等群众领袖。

窖头会议后，方志敏同志来到了楼底蓝家，住在花春山同志的家里，为着隐蔽起见，他有时穿着草鞋化装成一个农民，有时穿着长衣裳化装象一个商人。他首先领导该村农民用软的拖欠办法进行抗租抗债，并在斗争中发展了农民革命团，农民蓝长金就是该团的团长。

十二月十日横峰法警四人，坐着轿子耀武扬威的来到楼底蓝家催讨煤炭税款，农民们先用软的办法，不行，法警要动手捉人，此时蓝长金同志在请示了方志敏同志后。即召集农民革命团十多人，把法警步枪一支缴下来，把轿子打烂，四名法警见势不对，也狼狈逃回横峰。

当夜方志敏同志召集楼底、姚家垅、管山、蓝子坂等九个村的农民革命团领袖，聚集在花春山同志家里，说明暴动的意义后，一致决议展开平债分田，实行起义，弋、横起义的第一面红旗展开

了。

起义总指挥方志敏同志，在楼底蓝家发出的信号一响，弋阳九区燕鸡黄家、丁山、窖头、漆工镇一带，在黄道、方志纯、邹琦等同志领导下，在弋阳九区大溪头举行了七十多人的代表会决定“打土豪分田地”。会议结束后九区起义也开始了，横峰三区青板桥、上坑源、明山岗一带，在吴先民、黄立贵、吴先喜等同志领导下集合二千余人在青板桥召开大会，举起了义旗。

弋阳七区邵家坂一带，在邵式平同志领导下，横峰葛源在程伯谦同志领导下都举行了起义，数日之内纵横百里的广大弋横地区到处插上了红旗，农民们烧毁了地主的债据田契，没收地主的粮食，处分地主罚款，开始分配土地，农民革命团成了实际上的乡村政权。

起义胜利后，党的组织也正式将原来工作委员会，改组为弋、德、横中心县委，仍由方志敏同志为书记，并在弋阳、横峰德兴成立三个县委，各路起义军在中心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分兵数路向外出击，那些封建堡垒村就一个个被起义军打下了，那些工作较弱的村庄也纷纷写上名字，到起义中心来接头，革命浪潮迅速的展开着，至今苏区群众还深深记得暴动初期的一支歌谣：“弋阳方志敏，横峰吴先民，领导共产来革命，都是为穷人。”

## 四、眺高守夜打号铳，白皮红心假接头

不久，国民党军队，探知起义武装的虚实，开始分路向起义区进攻，各地的地主武装——靖卫团也逐渐发展起来，弋阳的过港埠、曹溪、芳家墩、横峰的葛源、铺前等地，成了反革命的反动中心，敌人依靠这些反动武装，每日向起义区进攻，所到之处火光冲天，烧杀抢劫，鸡犬不留。

一九二八年一月间邹琦、钱壁、项春福等同志，在青板桥西北三里的黄金巷被袭击，项春福同志当场牺牲，钱壁同志被捕押回牺牲于横峰，邹琦同志裤裆上打了四五个洞逃出来，接着吴先民同志、黄球同志在青板桥被伪装起义之反动军队押解至河口天主堂，

幸被逃脱，同一时间弋阳方面马王庙地主利用本地流氓伪装起义，请雷夏同志领导，雷夏中计，一入村口即被打死，李穆同志亦在弋德交界处牺牲，斗争已经进入更尖锐的阶段了。

人们为着保护自己的斗争果实，每个村庄在自己村庄前后的高山上，每日都派出了人放哨，群众叫做眺高。眺高的人带上一枝敬神用的三眼铳，望见敌人打第一铳，敌人来了打第二铳，敌人到了再打第三铳，群众叫做号铳，听到第一铳群众早作好了准备，三铳一响都扶老携幼牵牛挑担的转入深山。敌人进村之后，除了走不动的房灶之外，什么也找不到，每日里沿着敌人前进的路上，号铳接号铳，坐在山头上，可以将敌人进兵方向弄得一清二楚。

敌人在到处扑空之后，觉得非取消这个讨厌的号铳不可，于是一面以烧杀相威胁，一面放出空气说：只要有人接头，就没有问题，来欺骗群众。在此情况下起义区的群众又想出了"白皮红心"的办法，来抵抗敌人，果然村村都接了头也找不到一个眺高的了，也听不到号铳声了，可是敌人所到之处还是什么也没有，还是捉不到一个人，什么道理呢？原来每天村头山上都有几个人在砍柴火，他们一声不响，有时候却突然叫了起来，谁家的牛吃了禾，群众听到牛吃禾还是照样的扶老携幼，牵牛挑担，转到山上去。原来这就是新的眺高守夜，新的打号铳。

对于那些领导起义的领袖们，群众更是保护得无微不至，同志们用不着带行李，只要到了那一个村子背后的山上，派一个人下去通知一声，说老汪或者老余老陈来了，饭菜被褥立即送了上来，有时敌人要搜山，要老百姓派人带路，事先群众就会派人来通知你，明天敌人要搜什么山，你们要跑开，群众看到同志们总是说：同志，我们这叫做红心番薯，外面白，心里红，只要你们在，我们总会出头的。

## 五、方胜峰会议

一九二八年春夏之交，敌人看到局部的一些进攻都没有用，便

开始派出部队及强迫苏区周围数万落后农民，分四路向苏区大举进攻，一路由弋阳向漆工镇，一路由葛源向西，一路由铺前向青板桥，一路由过港埠向霞阳、金鸡山，每路都有几千人带着斧子锯子扬言砍光苏区树木，带着小车箩担要抢光苏区财物，苏区日渐缩小，转来转去总在磨盘山周围打圈子，红军力量又小，又分散，战斗力又弱，加之苏区内部反革命分子又乘机活动，和敌人通消息，情况显然是十分严重的，党内的思想也不很一致。

为着统一思想，明确方针，一九二八年六月在弋横交界一个偏僻的光山上的方胜峰冷庙里，召集了弋横两县干部会议，现在就让我们叫它做方胜峰会议吧！

出席会议的有方志敏、邵式平、黄道、邹秀峰、吴先民、方志纯、庞先飞（湖北黄安暴动失败后调来的）等同志共二十余人，方志敏同志是大会的主席。

一开始庞先飞同志就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他以为：

全国二百多个暴动都失败了，只剩下了井冈山和赣东北等几个地方了。现在情况又这样严重，眼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提议：

"把枪枝埋起来，把红军解散，几个负责同志到大城市去。"

这个意见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方志敏同志在冷静的分析了当时情况后说：

"我们在这里有群众，如果我们遇到困难就埋枪逃跑，群众牺牲太大，丢下群众逃跑，那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如果这样那就对不起广大起义群众。"

接着方志敏同志斩钉截铁地说：

"谁要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可以走，我们不走，我们是要同起义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坚持下去的。"

全体到会同志都一致同意了方志敏同志的意见。

但是怎样坚持下去呢？

有的同志主张把枪带走，离开敌人围攻，把敌人引出去然后再

回来。

会议上对这个意见又作了分析，觉得这里有群众，地形又熟，有依靠。而到根据地以外去，情况又不熟，无群众基础，困难一定更多。

最后方志敏同志结论说：

“第一，敌人很分散，各路很弱，又没有群众。我们力量可以集中，选择敌人弱点，先打一路。第二，反革命在活动，群众有些动摇，一定要镇压反革命。第三，为了作万一转移阵地的准备，要开辟新的根据地。”

大家一致同意方志敏同志的意见，决定：

1.部队全部集中，共四十多人，四十枝枪，由邵式平同志统一指挥，选择从过港埠出来的敌人最弱的一路，坚决打下去。

2.由方志敏同志带六条枪镇压反革命，说服群众。

3.派黄道同志到贵溪开辟新的根据地。

当天晚上在蒙蒙细雨中，大家带着兴奋的心情离开了方胜峰。

## 六、首战金鸡山，伏击樟树墩

方胜峰会议后的第二天，邵式平同志率领集中起来的四十条枪，正在竹篷窠休息，从过港埠来的敌人已到了金鸡山，那些挑箩担子的正在金鸡山抢东西，一个连的敌军则与吴先民、花春山同志带的几条枪在金鸡山上打响了，邵式平同志听到群众接二连三的报告之后，跑到竹林外面一看，但见十多里路一片火光，被敌人追赶着的群众漫山遍野的乱跑，立即率领部队绕过金鸡山脚到达金鸡山后面，敌人还正在向吴先民、花春山同志坚守的山头冲锋呢！我军出其不意从敌人屁股后面杀出去，马上就把他冲垮了，在山上跑反的老百姓，看到敌人一垮也都回过身来，拿着鸟铳又漫山遍野的追赶下来，到处喊杀，到处喊打，那些在村里抢东西的砍柴队听到敌人一垮也都提起梭镖，丢下箩担，往过港埠挤回去，后面的人手上平拿着的梭镖，刺到前面人的屁股，前面的人，以为红军来了，一

面叫"同志，我是抓得来的"，一面更拼命的跑。

敌人垮了之后，部队的情绪也很快提高了，饭也不吃，一口气追了五十里，直到过港埠，这一下把弋阳城也震动了，国民党县长连轿子也不要，望南门就跑，城里也是一片风声鹤唳，当晚再回到竹篷窠，恰遇从青板桥退回一路之敌，又一打将敌击溃。

粉碎敌人两路进攻后，算准了弋阳出来的一路一定要回去的，第三天晚上一个急行军跑了八十里，在樟树墩打埋伏，该死的敌人果然开来了，等到敌人走了一半，我们拦腰一打，又是一个大胜仗，其余一路看见势头不对，加上农民中的革命分子，乘机散布"红军来了"，被胁迫的农民一哄而散，敌人也就退了回去。

敌人第一次的全面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与此同时，弋阳、横峰的镇压反革命，稳定群众的工作也取得了成绩，弋阳漆工镇反动地主被我们打死，横峰姚家垅反动富农黄振庐刚刚写好投头书，就被革命农民黄振久杀死在自己家里，在金鸡山胜利鼓舞下，群众情绪又高涨起来了。

## 七、攻打横峰县城，粉碎二次围剿

一九二八年八月敌人重新增兵，以河口调来四十六军杨劲部的罗英团为主力，配合各地反动挨户团、靖卫团向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这个部队原来是土匪部队，进到苏区之后就在苏区内大肆抢劫烧杀奸淫。

红军与群众在与敌人转战了一个月之后，乘隙挺进到横峰城下，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攻克了横峰县城，歼灭守城靖卫团，缴枪十余支，这是赣东北起义后第一次打下县城，为着庆祝这个胜利，农民们自己编了下面一个小调：

"九月念四天，攻打横峰县，红军赶到城门边，不到五更天，

可怜的狗官，睡梦在床上，枪声一响逃到笔架山，在莲荷吃早饭，

枪声响二声，逃到杨梅岭，丢掉枪支不要紧，自己要逃命，

枪声响三声，走到大江渡，浮桥马上两边拖，不知红军有几多。”

横峰胜利后，立即调动了进攻苏区之敌，同时加上朱培德怀疑该部不稳，将该部调回缴械，二次围剿就这样粉碎了。

## 八、贵、余、万与上饶的起义

早在大革命时期，江宗海同志就在贵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农民协会，打过土豪，捉过贵溪最大地主丁佛堂游街，江宗海同志牺牲后，贵溪斗争受到打击，但是，大革命时候的影响，仍然在广大群众中，深深的存在着。

弋、横起义的影响，迅速地传到贵溪一带，农民们到处传播着弋、横起义的消息，描述着方志敏同志等的各种斗争故事。“磨盘山”的名字深入到每个群众的心里。

方胜峰会议后。黄道同志翻过大山来到周坊邵家，最先住在邵棠同志的家里，不久搬到白沙岗，最后住在离周坊三里的一个小庄子上，带着几包济众水、万金油、八挂丹，以行医为名进行工作，并成立了贵溪县委。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周坊邵家、标溪夏家、小田毕家和裴源，以及余江大桥一带都上了名字，吃了鸡血酒，建立农民革命团。

到一九二八年底以周坊邵家为中心的周围数十里地区，实际上农民革命团成了半公开的组织，置备了各种各样的红旗子和颈子上挂的红布条子，背着鸟枪的农民革命团团员，便在村子上走来走去了。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底的一个晚上，从弋、横根据地派来的八条枪来到了周坊邵家后面一个小庄上，第二天召集了以周坊为中心的几十里的农民革命团员大会，举起了第一面红旗。紧接着小田毕家、标溪夏家，和万年余江边境一带的起义也开始了。

起义之后，一方面从贵、余、万向东，一方面弋、横从东向西逐渐的会合起来。

此时上饶方面，茗洋关一带，在江立山、王礼西、李步新等同志领导之下也举行了起义。

苏维埃根据地从弋横发展到了包括上、横、弋、贵、余等县广大地区的整个信江流域。

## 九、女英雄杨莲花和周志群部的起义

二次围剿粉碎后不久，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敌人又再调周志群旅为主力，向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在苏区到处横冲直撞，大肆奸淫掳掠，群众当时有一个小调描述周志群的烧杀，歌词是这样的：土匪周志群，开兵打弋横，弋横百姓不安宁。土匪理不端，放火来烧山，农民的东西被烧光。

但是因为时居严寒，天天下雪，周匪士兵都穿着单衣单裤，士兵们怨声载道，我们则抓住这一点到处进行兵运宣传，从此周匪内部就不断发生哗变，尤其是一九二九年二月，龙志光同志率领的一个营起义，更直接震撼着敌人的进攻部署。在这次起义中，女英雄杨莲花创造了不朽的功绩。

杨莲花，横峰三区明山岗人，贫农出身，自幼失去父亲，依靠母亲扶养，是一个年幼而聪明的女孩子。起义后参加革命，进步很快，她家里曾经三次被烧，不得已与母亲逃到山上架茅屋住。

第三次敌人围剿时杨莲花和其他十几个妇女一道不幸被捕，被捕后敌人强迫她们答应做老婆，起初她们坚决不肯，后来想想在敌人军队中也可以做工作，便答应下来了。

这十几个苏区妇女，虽然都与国民党下级军官结了婚，但是她们并没有安于享受，相反的三个多月来在敌军官和士兵中做了不少工作。向他们介绍苏区情况，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团结了象龙志光等同志这样的下级军官（当时龙同志等好几个人都是该营的排长）和广大的士兵在自己的周围。

一九二九年二月，周匪将要调防南城的消息传到了士兵群众中，杨莲花同志抓住了这个时机与龙志光等同志研究决定组织起义，于

是在一个早晨，依靠杨莲花同志的努力，依靠龙志光等同志的直接作用，强迫该营营长率领二个连举起义旗投向红军。

这个营的起义，一方面动摇了整个周志群匪部的部署，一方面使当时的红军力量增加一倍（当时红军也只有两个连），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攻，鼓舞了苏区的群众情绪。

几个月后，杨莲花同志又第二次被捕，敌人还是无耻的强迫她做老婆，这时杨莲花同志指着敌人的鼻子说："我生为革命人，死为革命鬼，宁死也不愿嫁给反革命。"当晚这个贫农的女儿，一个苏区普通的小姑娘，杨莲花同志光荣的牺牲了。

接着四月间，敌人又进行了第四次围剿，经过两个多月的转战后，于长茅岭一次伏击战，击溃敌人一路，四次围剿也被粉碎了，苏区的局面有很大发展，人口也由十万发展到四十万，奠定了闽浙赣苏区的基础。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江西省委派唐在刚同志来到弋、横地区，决定将原来中心县委扩大为信江特委，以唐在刚同志为书记，方志敏、黄道、邵式平、方志纯、吴先民等同志为委员，成立信江苏维埃政府，以方志敏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下辖弋阳、横峰、贵溪、上饶、德兴、万年、余江、铅山等八个县委。

## 十、红旗飘扬在武夷山上

早在一九二七年陈耿同志从福州回到武夷山麓的崇安县，组织了民众会，建立了党的支部，最初参加的有徐福元、祝维垣等同志。

一九二八年赣东北弋阳、横峰起义的消息，通过每年一度的采茶工人带到了崇安一带的广大群众之中，立即掀起了崇安各地群众的抗租抗债斗争，但是由于缺乏经验而遭受到失败。

此后崇安党便进一步深入到乡村，在抗租抗债、分田分地的口号下准备起义，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与准备，一九二八年六月陈耿同志首先在崇安东北地势十分险要的大小梅竖起来了第一面红

旗。

大小梅的红旗一举，大悲、东对龙、大王四、王子袋、坑口、长涧源一带纵横百余里的广大山区紧接着也举行了起义。

起义胜利后国民党福建军阀卢兴邦就开始了对起义区的进攻，当时红军只有九十个人，两支枪，其余都是土枪土炮，但是起义军就依靠这些武装，依靠大小梅的丛山峻岭，依靠群众的掩护坚持着，敌人一来就上山，用土枪土炮，挨丝炮同敌人打，敌人一走就下山做群众工作，或者向外面出击。一九二八年八月起义军在崇安白水镇瓦解卢兴邦一个班，缴枪十二支，接着打下崇安以东之五夫镇，缴获步枪二十支，起义军声势便更加扩大，民众会也发展到千余人，成立九个农民革命军连队。

一九二九年二月靠近福建边境武夷山麓的江西铅山县石垅、龙鹤和尚坪、篁村、车盘一带，由黄怀仁同志从横峰发展过来的党的组织所准备的起义成熟了，开始了铅山的起义，起义后革命力量迅速向上饶南乡的毛楼、高溪一带发展，在一九二九年八月间与陈耿同志领导的崇安起义区打成了一片，并编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歼灭分水关下乌石镇口税卡子，缴步枪八支，起义军发展到一个连，至此闽北根据地就包括崇安、铅山、上饶三个县交界的广大地区了。

一九二九年四月，正式成立了闽北红军独立团并开始吸收了赣东北的经验，从下而上的建立苏维埃。

## 十一、两个根据地的会合

如果要说闽北与赣东北两个根据地的会师，应该是从一九二九年八月铅山、崇安两个根据地会合算起的。八月会师后，赣东北便派黄富武同志首先到了闽北，帮助闽北红军的整顿和苏维埃的建立。

但是两个根据地的正式合并在一九三〇年七月间，中央正式决定将闽北划归赣东北特委领导后开始的，并将闽北独立团调到赣东北集中。从此，闽北苏区就成了闽浙赣苏区的一部分。

红十军从景德镇回师后，赣东北又派黄立贵同志率领原闽北独立团回到崇安与坚持闽北斗争的武装会师，会师后首先在崇安到坑口的白沙岭上歼灭了从崇安向坑口进攻的敌人一部，并接连攻下了崇安以东的五夫、崇安西北的大安等地。闽北苏区又得到很大的发展，除了原有的崇安、铅山、上饶地区之外，又发展到浦城、建阳一带。

接着一九三〇年底肖韶、邹琦、吴先喜同志又先后到达闽北，正式成立闽北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一九三一年四月黄道同志来到闽北后，更加强了闽北党的领导。

## （三）苏维埃根据地的缔造

### 一、两条半枪创造了红军和苏维埃

闽浙赣男女老幼都知道"方志敏两条半枪起义"的故事，原来这是指一九二六年弋阳九区农民打下漆工镇警察派出所所缴到的三条枪而言，因为有一条枪没有退子勾，打一枪要通一次弹壳，老百姓叫它做半条枪，这是赣东北人民的最早武器，其实在起义开始后如果将吴先民同志所带的八条枪和其他起义的武装一起算进去，实际上是四十六条枪，再要算上陈耿同志在大小梅起义的两条枪的话，应当是四十八条枪。

一九二七年起义后不久，在各地农民自卫军中抽调了二十几个积极分子脱离生产正式成立游击队，名字叫做土地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十四团一营一连，这是闽浙赣红军的最老祖宗，而正式采取红军的名字还在金鸡山战斗之后。

方胜峰会议上鉴于以往红军力量太分散，为着粉碎敌人的进攻，把四十六条枪集中四十条。金鸡山战斗胜利后，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对头而把这四十条枪固定集中起来，并正式改名为红军，番号是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到一九二八年秋这个团已经发展到二百多人成立了两个连。

一九二九年二月周志群一个营起义之后，红军扩大了一倍，成立了五个连，到一九二九年四月红军扩大到一千余人，又改名为江西独立第一团。

到一九三〇年初，立三错误时，将所有地方武装全部合编到主力红军，主力发展到三万多人，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一九三〇年，红军从都湖波彭回师后，确立一人一枪，将一部分武装分散编到地方武装中去，红十军保留五千多人，另外成立了一个二千多人的赤色警卫师，如果加上地方武装仍然是三万多人。一九三三年与中央苏区打通，红十军奉命调中央后，又将原有赤色警卫师扩编为新十军，各县独立营，游击队都有发展，如果将十军计算进去，此时约在五万人左右。

至于闽北方面，从一九二九年四月成立闽北独立团，部队经过几次胜利后苏区有了扩大，主力和地方武装都有了发展。到一九三一年初改变为闽北独立师，约一千五百多人，如果加上地方武装，则在五千人左右。

随着红军的发展，根据地的发展，苏维埃已逐渐巩固和发展起来了。

苏维埃最初的根子是农民革命团，起义后首先党、政、军三个主要系统分开，一方面从农民革命团的先进分子中，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支部。一方面将农民革命团的组织解散，正式建立苏维埃政府。军事方面则自下而上建立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但是苏维埃组织的初期还是很简单的，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内部的分工也更细致了，代表会议组织制度也逐渐巩固了。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信江苏维埃成立后，苏维埃组织的领导系统也就完全建立起来了。

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赣，这就是闽浙赣苏维埃区域发展的一副大体轮廓。

## 二、挺进景德镇，会师根据地

长茅岭战斗后，一九三〇年二月在弋阳团林一战，结束了敌人

的局部进攻，信江苏区面积迅速扩大，人口由十万人增加到四十万。

紧接着蒋冯战争爆发，进攻苏区的敌人大部北调，兵力大为空虚，我军首先乘机集中力量，隐蔽在万年，扬言进攻乐平秧坂，实际上却奔袭鸣山，乐平城敌人大为震动，秧坂敌人大为恐慌，我军乘胜会师，袭击秧坂，全部歼灭秧坂敌人，秧坂胜利后，我军稍事休息，即向南奔袭河口，占领河口后，弋阳之敌动摇，我军又乘机西进，歼灭弋阳守敌，至此，信江流域苏维埃区域比较巩固了。

在此情况下，我军于一九三〇年五月初攻占景德镇，此时，唐在刚同志从中央回来，带回中央决定，将原来信江特委扩大为赣东北特委，仍以唐在刚同志为书记。在信江方面成立信江特委以黄道同志为书记，并带来了立三路线指示，要猛烈扩大红军，并要赣东北红军负责进攻九江。当时方志敏、黄道、邵式平同志等都很怀疑，在特委会上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最后决定一面向都湖波彭进军，一面派邵式平同志去中央请示，八月邵式平同志回来，果然中央是这样决定的，在此情况下，如是将所有信江地方武装全部集中三万余人成立红军第十军，由周建屏同志为军长，攻克都昌、湖口、波阳、彭泽、秋浦等地。

但是由于地方武装的取消和红军远离根据地，敌人便乘机集中了上饶、铅山、广丰、玉山、横峰五县靖卫团向信江根据地进攻，一直打到上饶的茗洋关，横峰的霞坊一线，苏区受了不少摧残损失。同时又得知蒋冯战争结束，开始对我进行第一次全国性的围剿，在这种情况下特委又再度在乐平召开会议展开讨论，在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同志坚决主张下，红军乃决定回师苏区，在回师的路上，从南昌前进的国民党第五师胡祖玉部已进到万年朱山桥，我军立即予以回击，激战一夜，将敌击退。

红军回到苏区后，首先乘敌部署未稳之际，于一九三〇年八月初奔袭上饶城，完全歼灭敌五县靖卫团，次日再挥戈西指进攻河口，驻河口之敌李全坤团曾顽强抵抗。我军一部由河口以西偷渡信江成功，占领河口以南制高点金鸡山，居高临下，经六小时激战，

全歼守敌，占领河口，缴枪八百余支，创赣东北空前记录。上饶、横峰苏区完全收复，此时，中央三中全会指示已到，立三路线也就结束了。

## 三、七星尖大捷，转战闽北，回师再战何家坝

纠正立三路线后，接着一九三〇年第一次大围剿开始了，敌人以胡祖玉、阮肇昌、李抱冰、赵观涛等四个师的兵力，一路由景德镇经乐平，一路由波阳经万年，一路由南昌经贵溪，一路由屯溪到上饶，向赣东北苏区大举进攻，此时闽北已与赣东北打通，奉中央命令将原来赣东北特委扩大为赣东北省委，仍以唐在刚同志为书记，黄道同志为组织部长，方志敏同志为省苏维埃主席，邵式平同志为军委主席，省委研究了当时形势之后，一方面决定将红军主力缩编到五千人，成立各县区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战争；一方面与敌人周旋。这样经过一月，敌人到处扑空，到处遇到游击队的骚扰和袭击，疲劳不堪，终于在弋阳北乡的七星尖遭受到我军歼灭性的打击，而结束了第一次"围剿"。

不久敌人又增加了兵力，从贵溪、余江方面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在德兴上饶方面则采取跃进到处寻找我军主力作战。

我军在方志敏同志亲自率领下首先乘虚向浙江西部之华埠挺进，接着从上饶附近渡过信江到达闽北苏区，与闽北独立团会师，首先占领铅山石塘镇，歼灭守敌一部，群众至今还留传一首歌子，歌颂攻下石塘及在石塘的城市政策，歌词是"三月初十天，红军有几千，说道石塘几千烟，不打不甘心，从下松岭过，石塘就打破，打死团丁几十个，枪支都缴过；红军真公平，并不乱捉人，单捉土豪并劣绅，公平又公平，石塘店老板，早把店门关，关起店门好为难，东西怕拿完；一问不独裁，店门又打开，打开店门做买卖，百姓都自在"紧接着又攻克崇安县城，再克浦城克赤石街、星村，调动了进攻赣东北的敌人后，红军又迅速出桐木关，从铅山以西渡信江回师赣东北打下余江城，至此敌人部署完全混乱，东奔西窜，就在

敌人部署混乱时，我军集中兵力回师葛源，在葛源以西之何家坝将敌全部击溃，歼其一部，又胜利的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 四、两战广丰大刀会，星村和白石岭的胜利

此时闽北方面，经过红十军的几次胜利已比较稳定了。但当第二次围剿开始时，建阳方面的刘和鼎师匪部，铅山方面的靖卫团吴仰山部仍不断向我进攻，尤其是广丰方面地主阶级所组织的大刀会对我威胁很大。

一九三一年四月间，邹琦同志率领两个连到广丰，与广丰南乡大刀会首战于广丰桐家坂附近，大刀会采取吃朱砂念符咒集团冲锋的战法。而我却采取了正规的散兵群作战方法，结果被敌冲散而失利。紧接着黄立贵同志再率三个连抵达广丰，黄立贵同志研究了大刀会用梭镖和集团冲锋两个战术特点，即令所部每班带梭镖三支，再度与大刀会激战于桐家坂附近，我军亦采取密集队形，大刀会无法冲进，黄立贵同志身先士卒与大刀会拚梭镖，终于将大刀会击溃，广丰方面新苏区开辟了，大刀会的威胁也大大减轻了。

此时刘和鼎部，以为苏区空虚，乘势向大安分水关方面前进，沿途遭受挨丝炮和地方武装的袭击，红军则挟广丰胜利余威回师崇安，在崇安建阳之间的星村街附近拦腰一仗，歼敌一个营，粉碎了刘和鼎的进攻，开辟了建阳、邵武、光泽之间苏维埃区域。

铅山方面，靖卫团头子吴仰山所部以铅山城为中心，为配合福建方面刘和鼎匪部的进攻，也积极向铅山苏区根据地石垅一带进攻，我军为开辟和发展上（饶）铅（山）地区，于一九三一年底集中主力在石垅恰恰碰到吴仰山率领三百多人摇摇摆摆由紫溪向石垅前进，吴匪本人坐着轿子，满以为可以大大的发一笔洋财，谁知转到石垅前面的白石岭下，就遇到了红军的埋伏，稍一接触，吴仰山本人就滚下轿子落荒而逃，大部为我歼灭，我军随即占领紫溪、石塘，巩固了上铅苏区。

至此，闽北苏区已发展到包括崇安、建阳、铅山、邵武、光

泽、上饶、广丰、浦城各一部的纵横三百里的根据地。

## 五、葛源和大安街

在横峰、德兴、弋阳、上饶四县交界的中心点，属于横峰县的有一个名叫葛源的大市镇，这就是一九三〇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闽浙赣老根据地的红色省会。

葛源镇位在群山环抱之中，举眼四望，东有赣东最高峰灵山，南有基尖，北有长茅岭，仅靠西面一路，沿着大岭岗迂回曲折的山谷之中有一条大路经金鸡山通向弋阳，葛溪水沿着这条山谷日夜不停的流向信江。而葛源本身却又是一个方圆二十多里的一个大平原，平原的周围有枫树坞、黄山脚、考坑、青湖等数十个大小村庄依山而立，平原的中心葛溪两岸人烟密集，这就是葛源镇，本镇约有八百余户，五千余人，如果把周围大小数十村庄统计进去，总数是三千多户。

葛源镇是横、弋、德、上四县的交通中心，加上周围数万亩肥沃的土地，所以虽然在崇山峻岭之中，市面却也十分繁荣，而且也是周围方圆百里的封建地主集中之地，其中最大的地主要算姓刘的举人，不仅有万亩土地，还有自己的水牢。

早在一九二七年程伯谦同志在葛源就进行过工作。一九二八年初在程伯谦同志领导下曾举行起义，赶走了恶霸地主刘举人，农民们至今还流行着"葛源三千烟，出了程伯谦，程伯谦开句口，举人老爷都要走"的歌谣。

一九二八年随着国民党军队进到葛源，反动地主武装靖卫团又相继成立，此后，直至一九二九年红军占领葛源止，这里又成了反革命的反动中心。

一九三〇年十月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移驻葛源，成为闽浙赣苏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共省委、少共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军区司令部、红军大学五分校、列宁师范、女子职业学校及合作总社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关都集中在这里。

四年来敌人对葛源曾进行过三次进攻，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敌人都到达过葛源，不久又都被红军击退，在敌人三次占领期间，葛源被烧毁十分之九，至今断墙秃壁犹历历在目，但是葛源人民始终没有屈服，他们在废墟上架着茅蓬坚持着，成为闽浙赣的模范区。

大安街位在闽浙赣交界，属于崇安境内的大山中，西北二十里的分水关成了大安的天然屏障，向南沿着大安溪，两山之间的溪谷一直冲到崇安城，向东向西都是高山，满山遍野的竹林，成了天然的造纸地，而依山旁水的大安街，就是该地的造纸中心。从一九三〇年底起到一九三五年二月止，它是闽北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 六、从挨丝炮松树炮到农村军事化

挨丝炮是一种最原始的武器，它的祖籍在福建的崇山峻岭之中，数百年来对于深山中之猛虎，一直发挥过它的无上威力。从一九二八年崇安大小梅起义之后，它又变成了人民对国民党匪军斗争的利器，并且走下了山，跑遍整个的闽浙赣。

它的形状很象一个小排球，铁质的，也有一个小嘴巴，嘴巴的旁边还长了两个小耳朵，耳朵上挂着一副人们打老鼠用的铁丝斫。里面如果装上火药，嘴上罩着发火帽，把铁丝斫翻过来，用一根细丝线头缚在老鼠斫机关的圆圈上，一头横过道路缚在矮树上，只要丝线一动，老鼠斫一动便会立即爆炸起来，如果丝丝相连还可以成为连环炮，经过几年的斗争，人们又把它埋在地下叫做地雷，制在瓦罐上叫做罐雷，名目也就一天一天的多了起来。

松树炮是利用天然的松树，剖成二半，挖去树心，再合起来所制成的大炮，它的好处是成本便宜，制作容易，到处皆有，打过了几炮之后还可以当柴火烧，万一敌人太多，打了几炮还用不着掩护大炮转移阵地。

苏区的人民就用这些武器同敌人斗争，敌人进攻的时候，到处

是挨丝炮，重要的山隘上都装上了松树炮，打击敌人，敌人驻守的时候，农民们便将挨丝炮装到敌人的大门口，早上敌人挑水的人，往往无缘无故的被打死在门口，掌握这些武器的就是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

赤卫军是二十五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壮年，少年先锋队是十六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少年，这是一种半军事性的人民武装，这种群众武装的成立早在一九二七年起义之后，苏区的每一个村庄适当年龄的青壮年都参加了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他们所使用的武器，除了挨丝炮和松树炮外，还有鸟枪、梭镖和关云长用的青龙刀，在战时他们配合红军作战或单独骚扰敌人，在平时则进行军事训练。一九三一年以后的扩大红军运动，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更成连成排成营的开上了前线。

红军就依靠这样广大的取之不尽的人民武装，打击敌人，得到补充，取得胜利。

## 七、幸福的苏维埃人民

“谈谈苏区景呀，同志们听一听，苏区的幸福说也说不尽呀，工人末，天天有工做，农民末，有田分，生活好得紧呀。”这是民歌“苏区景”的开头一段。

农民们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排山倒海之势冲破了数千年来对农民的封建统治，平了债，分了田，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

农民得到土地之后，苏维埃政府又发放农贷，帮助他们解决耕牛种子农具等困难，并且把农村中分散的单个劳动，组织在生产合作社和生产互助组中，每个村庄都有生产合作社或生产互助组的工作。年复一年，农村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物价也十分平稳，四块钱一担米，一块钱八斤排骨肉，至今苏区的农民都幸福的回味着。

为着解决人民工业品的需要，共产党苏维埃政府除了发展农村手工业生产外，又在各地普遍建立了消费合作社，以最低价格将工

业品配售给人们。

妇女们也过着以前梦想不到的幸福生活，他们首先从封建婚姻制度下解放出来了，取消了买卖婚姻。只要自己愿意，可以"由"到一个好老公(这个由字是苏区的特别名词,原来是自由结婚的意思,后来人们把这个由字改成为动词，才出现了这个新名词)，此外还同男子们一样参加劳动，参加生产，参加各种群众组织。

苏区的人民，满怀信心的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努力创造他们更幸福的未来。

无怪乎，在敌人大举进攻苏区时，农民们都高唱着"苏维埃给了我们自由和土地，为阶级，为自己，奋斗要到底"的战歌，奋不顾身的和敌人战斗。

## 八、从识字牌谈到苏维埃的文化教育

假如你从白区进入到苏区的话，你一定会奇怪的看到每一个村庄的十字路口都有一块小小的广告牌，牌子上面既不是什么牙膏牙刷，也不是香烟肥皂，而是一个字，当你走近牌子的时候，立即就有一个小孩子跑出来问你：同志哥，你认识这个字吗？如果你认识的话放你过去，如果你不认识的话，也就会慢慢的告诉你，一直等到会写会认了才放你过去。这就是消灭文盲的识字牌，上面的字是每天调换的。

你如果通过苏区一遍你更会看到苏区每一个村庄都有一所列宁小学，一所俱乐部，在苏维埃红色省会还有一所列宁师范和一所职业学校，这是闽浙赣苏区的高级学校。至于群众的文化娱乐，更是非常活跃，从群众中创造出来的歌子四年来多到三百余个，有的歌颂起义斗争，有的歌颂红军的胜利，有的歌颂苏维埃的幸福生活，有的号召人民斗争。

## 九、闽浙赣人民的无上光荣

一九三一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

议，颁发给赣东北人民光荣的领袖方志敏同志以红星勋章，在葛源的受勋典礼上方志敏同志说："这不仅是我的光荣，而是闽浙赣全体同志和广大人民的光荣"。

的确，闽浙赣人民是光荣的，他们从二条半枪创造了红军，从几个小村庄创造了百万人口的苏维埃根据地，并且也创造了模范的群众工作。

闽浙赣苏区创造的基本特点是先有党而后有群众工作，再由群众起义中创造了红军，创造了根据地，因而党与群众，红军与群众，苏维埃与群众一开始就建立了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

群众对于党，对于党的许多领导同志亲密到这样的程度，他们不称呼什么官衔，而是亲切的称呼着老汪老陈老余老薛，这些同志每一句话，群众都记得清清楚楚，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群众保护这些领袖们无微不至，没有饭吃，群众送来了，没有衣服，群众送来了，没有被褥，群众送来了，敌人一来，群众就冒生命的危险来通消息，就是万一给敌人捉到了，也不会说出一个字来的。记得一九二八年青板桥一个人，有一天吴先民同志派他去探消息，不幸被人捉到，敌人用各种办法甚至用五把香烧遍了他的全身，但是他始终不露出先民同志的住所，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

苏区扩大后，在这个基础上各地的群众组织和群众工作基础都非常坚强，每个村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参加了群众组织，有党的支部、青年团的支部、少年先锋队、赤卫队、儿童团、互济会、反帝大同盟、贫农团、雇农工会、识字班、合作社等等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党和政府的任何一个号召，立即都会百分之百的保证执行。

群众对于自己的子弟兵——红军更是无法形容的爱护，一批批的动员青年们走上前线，象一个六万四千人口的横峰县参军的就有七千六百多人，红军每到一处，妇女儿童就会成群结队的来慰劳，洗衣服，补衣服，送茶送饭，有一首歌是描述群众慰劳红军的："红军同志们！开得来，千千万万（笑呵呵）路上来（我的哥哥）镰刀

斧头大红旗(慰劳红军们，都是你的妹)好多妹妹笑呵呵，送香茶(我的哥哥)”

“红军同志们！歇几天，妇女儿童(笑呵呵)做草鞋(我的哥哥)蒲子红丝线都安起(慰劳红军们，都是你的妹)做起草鞋(笑呵呵)把你穿(我的哥哥)”

“红军同志们！在此地不要挂念(笑呵呵)家中事(我的哥哥)乡村负责家中事(慰劳红军们，都是你的妹)特别优待(笑呵呵)是真情(我的哥哥)”

“红军同志们！要知情(笑呵呵)豪绅地主是敌人(我的哥哥)贪官污吏国民党(慰劳红军们，都是你的妹)杀尽敌人(笑呵呵)享太平(我的哥哥)”

对于红军的家属，照顾得好，送茶送水，送柴代耕，青年团在这里起了最大作用，他们高唱着“共产青年团，发起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来耕田”领导群众进行各种工作。

群众们对苏维埃政府的热情只要从当时敌人向苏区群众进攻时，群众是怎样来保卫自己的幸福就知道了，下面两首歌子第一首是：

“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员，青年紧急动员起来呀，武装保护苏维埃，武装上前线去呀，为了保卫土地革命利益，整连整营整团整师全体参加红军去”。

群众就这样一批批的拥上前线去。

第二首歌是：

“我们都是工农的武装，爬高山，履平地，奋勇向前进。苏维埃给了我们自由和土地，为阶级，为自己，奋斗到底。”

党、政府、军队、人民就是这样团结无间地将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起来。

## （四）赣东北人民的灾难和皖赣边游击战争

### 一、曾洪易害了闽浙赣

到了一九三一年四中全会后，中央派万永诚来到闽浙赣，改组赣东北省委为闽浙赣省委，以万永诚为书记，黄道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方志敏仍为苏维埃主席，邵式平仍为军委主席，并带来了四中全会决议案。但是，由于省委多数同志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仍然保持着以往的斗争传统。

接着中央又派曾洪易以中央代表资格来到闽浙赣，要闽浙赣进行彻底的转变，曾洪易到达后首先改组了省委，以万永诚为书记，聂洪钧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而将黄道同志排挤在省委之外，派到闽北去，将吴先民十军政治部主任撤职，排挤在省委之外。将方志纯同志青年团省委书记撤职，以关英接替，最后将邵式平同志军委主席撤职，以唐在刚接任，就这样，虽有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同志的坚决斗争，但是终于贯彻了四中全会后的错误路线。

曾洪易到了闽浙赣之后，首先批评闽浙赣党过去是“富农路线”，是“右倾保守主义”，是“封建地方观念”，而将原来的土地法修改了，实行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提出中立中农，打击富农的错误政策。

一九三一年以后，敌人为了防止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打通，在信江沿线布置了重兵，到处造碉堡，而皖浙边界敌人则比较空虚，此时方志敏、邵式平同志曾提出向东北皖浙边发展巩固苏区，以运动战粉碎敌人碉堡政策的方针。但遭到了曾洪易的反对，认为这是在碉堡面前退却逃跑的“保守主义”，而提出长期持久围困堡垒的方针。贵溪夏家岭一个碉堡，曾连续进攻四次，均未攻克，部队伤亡一千数百人，花春山、龙志光同志，都牺牲在这里，陷自己于被动地位，伤亡很大，部队又十分疲劳。

尤其惨痛的是错误的肃反，在这种错误下，许多当年领导起义的群众领袖如吴先民、黄镇中、汪明、陈耿、徐福元等同志及不少群众都在AB团改组派名义下含冤而死，干部、群众情绪受到很大影响。

在这些错误面前，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同志一直作了一系列的斗争，一九三三年打通了中央苏区，曾洪易回到中央后，闽浙赣在方志敏、黄道同志领导下，在赣东北和闽北都有一些新的转变，根据地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

一九三四年曾洪易又随抗日先遣队到达闽浙赣，带来了以"红色碉堡反对白色碉堡"、"不失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又重新使苏区遭受到更大的损失。在敌人五次"围剿"艰苦的时期，这个所谓"坚决的布尔什维克"却又反过来认为革命失败，真的主张退却逃跑起来了。方志敏同志坚决与曾洪易错误做了斗争，并报告中央，经中央决定撤销了曾洪易的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职务。

不久，这个闽浙赣人民的灾星，无耻地叛变了革命，变成了反动派最无耻的走卒。

## 二、抗日先遣队的失利，方志敏同志的牺牲

一九三四年七月红七军团从中央出发，十月至闽浙赣与红十军会师于德兴重溪，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民族英雄方志敏同志率领下向皖南挺进。经过婺源，歙县，休宁于十一月间在太平乡柯村茂林一线与敌人激战，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同志不幸牺牲，部队遭遇到第一个挫折，接着转战于东流、祁门、休宁、太平、泾县、石台、秋浦等地，虽屡胜强敌，但是终由于敌人早有重点驻守，我军又十分疲劳，加上给养困难，伤亡很大，不得已，乃决定于一九三四年底经休宁、婺源回师闽浙赣苏区，重新整顿队伍准备执行新的任务，沿途击退敌人拦击，不幸于通过怀玉山封锁线时遭受失败，方志敏同志也同时被捕。

方志敏同志被捕后，虽在狱中仍念念不忘党的事业，还用各种

办法寄出告同志书和遗嘱，劝告同志们继承遗志而奋斗，在遗嘱中，志敏同志谆谆教导同志们说："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是不能再与你们奋斗了，我是如何的惭愧着和难过啊！我所说的意见，都是我最近感触到，当然里面免不了有错误，说错了请你们批评，说对了的，请你们执行，我虽在监狱，但我们的胸中，仍是不断的思念着同志们的奋斗精神，总祈祷你们的胜利和成功，我直到现在，革命热诚仍和以前一样，我正在进行越狱的活动，我想，我若能越狱出来，我将用我最高的努力去创造新苏区和新红军，以恢复这次损失，同志们！越狱恐难可能(主要是无外援)，那时只有慷慨就死了，我不能完成的工作责任，只有加重到同志们的肩头了，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们！永别了，请你们努力吧！我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却了为党努力的机会，你们要认识，你们能够为党工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宝贵的，我与王曾同志都是敌人刀口下的人了，是再也想不到为党为革命工作的机会了，这是无可如何的！我能丢弃一切，唯革命事业却耿耿在怀，不能丢却，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们！请你们经常记起你们多年在一起奋斗战友们的惨死，提起奋勇的精神，将死敌的日本帝国主义快赶走吧，将万恶的国民党统治赶快推翻吧！谨向你们领导下的红军和工农群众致热烈的革命敬礼！"

"我们临死前对全党同志诚恳的希望，就是全党同志要一致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发扬布尔什维克最高的积极性、坚决性、创造性，用尽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学习列宁同志'一天作十六点钟工作'的榜样，努力为党工作！积极开展城市工人运动(这仍是党目前工作最薄弱的一环)，不惮艰苦的进行国民党军中的士兵运动(白军士兵不满已到极点)，广泛开展农民运动，争取千百万被压迫的工农士兵群众到党的旗帜下来，很快实行党提出的'锻炼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在中国各地开展农民游击战争，分散国民党的兵力，使国民党象打火一般，这处打不熄，那处又燃烧起来，不能集中大的兵力来进攻我主力红军，在各地积极创造新苏区来拥护和援助主

力红军，使能很快击破敌人，造成全国的反攻形势，汇集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洪流，冲毁法西斯国民党血腥统治，达到自由的工农的苏维埃新中国的建立。”

“在此时如有哪些同志□□不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而消极怠工那简直不是真正的革命同志，而是冒牌党员，这样的人是忘记了国民党囚牢里有好几万党的同志正在受刑吃苦！忘记了国民党的刑场上党的同志流下了斑斑血迹，忘记了我们的主力红军正在川、黔、滇、湘艰苦的战斗，更忘记了千千万万的工农劳苦群众，正在啼饥号寒无法生存。”

“我们是共产党员，为革命所死，固无所怨，更无所惧，只有两件事使我们不能释怀。作过某些错误，但经党指出，莫不立即纠正，我们始终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竭诚的信仰者，我们相信共产国际的伟大和领导世界革命的正确，我们相信中国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伟大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我们坚决相信在国际和中央列宁主义领导之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必能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全部成功，苏维埃的制度将代替国民党的制度，而将中国从最后崩溃中挽救出来。”

“共产主义世界的系统，将代替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而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从痛苦死亡中拯救出来，全世界的光明只有待共产主义的实现！”

同志们！让我们永远记着方烈士的最后指示吧！

## 三、猪头山，赭亭山烈士们永垂不朽

抗日先遣队挺进到皖南后，赣东北敌人的大举进攻也开始了，以梁匪立柱为主力的二十一师分两路向河口出发，一路经莲荷，一路经上坂张家，企图一举占领横峰县城。

东路敌人在进到莲荷以北猪头山时遇到我地方武装——横峰独立营一个排的抵抗，我军依靠早已做好的工事，依靠工事周围的挨丝炮，顽强的坚守着，敌人虽然用过飞机大炮作过无数次的猛攻，

损兵折将七百余人，终于不能占领英雄的猪头山阵地，只好将猪头山团团围困，一个月后，我军弹尽粮绝，伤亡一半，活着的十四个同志掩埋了同伴的尸首之后，在悬崖绝壁上一个个用绳子吊了下来，下来七个同志之后，不幸被敌人发现，绳子被打断，敌人又占领了猪头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其余七个同志打烂了武器，高喊苏维埃万岁！共产党万岁！跳下了七百公尺的高崖，为人民事业作了壮烈的牺牲。

与此同时，西路之敌在上坂张家附近的赭亭山上也遇到更激烈的抵抗，赭亭山方圆十里左右，四面都是悬崖绝壁，只有向南一面有一条笔直的陡路上山，从山脚到山顶共有三个关，我军早在赭亭山做了层层工事，由横峰独立营的两个排坚守着。一九三四年四月间，敌人两个团的兵力到达了赭亭山下，立即遭遇到守军的坚强反击，敌人以飞机大炮猛击猛炸，我军则依靠地雷手榴弹英勇的抵抗，杀伤其八百余人，经过半月时间敌人才攻上了三关，我军则退守碉堡，碉堡外面团团围住了数百敌人，高声叫喊缴枪，但是从土地革命中锻炼出来的红军是决不投降的，他们将最后剩下的一箩火药点着，在同志们高喊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声中，轰的一声碉堡炸开了，碉堡周围百余敌人，伤的伤，死的死，我们英雄的烈士们也同归于尽了！最后有一百多参战的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员，除了逃走的几十个人外，二十余人被捕后，敌人将他们用铁丝穿上耳朵送到河口枪毙了。

英雄们！永垂不朽！

赭亭山、猪头山弃守后，敌人即占领了横峰城，此时从上饶前进之敌在攻破老鸦尖后占领了茗洋关，弋阳之敌占领了漆工镇，贵溪之敌占领了标溪夏家，各路敌人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会攻葛源，从此轰轰烈烈的赣东北苏维埃运动就遭受了暂时的挫折了。

## 四、仇恨沥沥在心头

与抗日先遣队失利的同时，苏区已完全被敌人占领，到处造碉

堡，造封锁线，苏区的群众纷纷转到山地，在丛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用换丝炮地雷不断的打击敌人，有的地方一直坚持了半年之久，但是整个形势是一天天的困难，敌人每日出动搜山、捉人、杀人、抢劫，将躲藏在山上的群众一批批的捉下来，一批批的残杀，侥幸未被杀害的人们又在残酷的归保运动中受到清乡委员会的凶残敲诈和被迫去做苦工，年青的妇女们一批批的被强奸，被卖掉，弄得苏区到处是断垣秃壁，苏区的人民家家妻离子散。许多村庄被烧成了废墟，许多村庄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随着国民党军队回来的地主阶级，又在人民头上更凶残的掠夺被收回的土地，九年的租子要倒算，许多农民被打死在分得的田里，地主们说："看你还要不要我的田"。

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许多干部，除一部分进行游击战争外，许多同志为党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的牺牲了，唐在刚同志牺牲在葛源以西苏源山上，邹琦同志和徐炎荣同志被捕后牺牲在上饶，程伯谦同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黄端喜同志被捕后临死不屈，被敌人挖出了心肝，缪敏被叛徒告密而被捕，张其德同志亦在磨盘山上被捕。

这是赣东北人民空前的大浩劫，但是赣东北人民是永远不会屈服的，游击战争的火焰始终燃烧在皖赣交界的丛山峻岭中，而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则始终坚信着毛主席是一定要回来的，红军是一定要回来的，苏维埃是一定要回来的，象方志敏同志的家乡——湖塘村的一个普通妇女郑绿蓉，当她重病临终时，还念念不忘共产党，告诉她的丈夫说："你千万不要忘记共产党、苏维埃，他们一定会回来的，我死之后，你一定要给我做一顶红军帽、一套红军衣服穿。"

## 五、坚持在皖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和东秋贵暴动

此时赣东北的红军，除了由粟裕同志率领的挺进师，挺向浙西南外，留在皖浙赣边的尚有刘毓标同志所领导的活动于开化、玉山、

婺源、德兴一带的红军游击队，王丰庆同志所领导的活动于湖口、都昌、波阳、彭泽一带的皖赣边区挺进师，李步新同志所领导的活动于太平、泾县、石台一带的红军游击队以及其他先遣队的突围部队，总数不下数千人。

他们的情况是十分艰苦的，由于方志敏同志的被捕，失去了统一的领导，又不知道整个的形势，天天打，天天跑，部队本身的思想情况一时也很混乱，一部分在平时自称为坚决的革命者，在此时却看到情况严重而逃跑了，也有少数的人象倪宝树之流经不起斗争的考验而无耻叛变了，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仍然抱着一颗为牺牲先烈复仇，为苏维埃奋斗到底的心，顽强的坚持着。

王丰庆同志率领的皖赣边区挺进师先后在浮梁、婺源之间会合了各地抗日先遣队的突围部队，从新整编为皖赣边区游击中队，经过浮梁、婺源、休宁、祁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间挺进到东流的秋浦、贵池一带，通过当地的一些群众领袖，逐渐地站稳了脚跟，经过几个月准备之后，并于一九三五年秋季开始起义，建立皖赣边区委部队，也发展到一千五百人。其他各路则仍然在原地坚持着。

## 六、几路红军的会合、皖南游击战争的发展

但是由于策略上仍然采取了苏维埃运动时的一套，部队还没有脱离打硬仗的旧办法，东秋贵根据地起义前后不到半年又失败了，红军不得已再度分路突围，由东、秋、贵南下，经过祁门、浮梁，在婺源以北的鄣公山上会合了关英、刘毓标同志所率领的红军游击队，此时李步新同志也与关英、刘毓标等同志取得了联系，从此时起，各地互相没有取得联系的部队又会合在一块了。

为了继续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从新成立了闽浙赣省委，决定由刘毓标同志率领一部分红军在开化、婺源、德兴一带坚持游击战争，由王丰庆、李步新等同志率领一部分部队在浮梁、祁门、泾县、黟县、太平一带坚持斗争，成立了三个特委，并在若干政策问题上做了一些转变，例如关于处理与白区群众的关系问题，关于部队的

分散活动问题等等。

从此直到一九三五年西安事变后，皖赣边区的游击战争，就比较顺利的坚持下来了，部队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 （五）闽北和闽东的游击战

### 一、退出大安街，闽北游击战争的开始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敌人调集十二师和张銮基独立四十五旅，刘和鼎的五十六师，郜子举的河南总队，周志群的十一师及江西、浙江、福建等省保安团共十万兵力开始对闽北苏区进攻，第一步由独立四十五旅和十二师二部，由崇安及河口向闽北苏区首府大安前进。

十月中南路之敌进到崇安以北十里之四渡桥，经半个月的战斗敌人占领了四渡桥，十一月初河口之敌占领紫溪镇，沿途虽然遭遇到我游击队和群众的不断打击，但仍然在龟步前进。

此时为迎接新的形势，特委决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的转变，其主要有如下几点：

1.撤退乡村公开干部转入部队，乡村支部立即转入秘密状态，以白皮红心政策坚持。

2.所有党政机关随军行动，区成立游击指挥部，区苏主席任指挥，区委书记任政委，县成立游击司令部，县苏主席兼司令，县委书记任政委。

一九三五年二月两路敌人都距大安十里路，南路之敌已进至小浆镇，北路之敌进至黄连坑。在一个月亮明明的晚上，全体同志集中在大安对面的操场上，每个人都带悲愤的心情遥望着河对面静静的大安镇，就在这个时候，黄道同志出现在同志们的面前。

“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撤出大安街。”一句话立即吸住了同志们，接着他又说：“现在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拨丝炮装满了，敌人除了得到一个空街之外，什么也没有，但是形势是严重的，从

今天以后将要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也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我们的艰苦任务，我们再胜利的回到大安来，我们一定要回来的。”

就这样，我们踏着月夜，我们爬上了大安以东的高山。

第二天敌人在挨丝炮轰炸声中进入了大安。

## 二、饥寒交迫的一九三五年

敌人打通崇安、紫溪封锁线后，闽北苏区被分成两半，接着由二而四，由四而八，封锁线不断的增加着，至一九三五年中，全部闽北苏区密密的摆着五十多条封锁线的封锁网，几乎几路都有封锁线。封锁线与封锁线之间仅仅只有十里到二十里，讲得清楚一点实际上就是一个山。山东有封锁线，爬到山西还是封锁线，所谓封锁线实际上就是碉堡线，每隔三百米到五百米立个碉堡，每天从据点出发搜山，敌人企图以此来扼死我们，按照陈诚的话，这就叫做“张开大网来捉鱼”。

除了封锁线之外，还有一个更毒辣的办法叫做移民并村。凡是封锁线据点之外的老百姓，全部赶到据点里去住，编成保甲。据点的周围用铁丝网包围起来，据点与据点之间又不能互相来往，买东西只准买一样，否则就是济匪。食米、食油、食盐都采取配给，企图这样来饿死我们，依照陈诚的话这叫做“抽干塘水来捉鱼”。

这样自然造成了我们极大的困难，我们不能好好的行动，转一个屁股都要碰到封锁线，无房子可住，终日在山上睡觉，睡了几天再也睡不着，就坐在山上看天亮。为着避免敌人发现不能高声谈笑，不能白天生火，睡了起来还要把睡倒了的草扶起来，似乎说：“对不起”！我们衣食发生困难，记得在崇安西南的北坑山上，足足依靠野菜维持半个月，有时搞到一点米，几百人烧一锅五升米的稀饭连米粒也看不到，整个一九三五年冬天许多同志就看不到棉衣。

但是在共产党的面前这些困难是不能制服我们的，封锁线不能过，我们便晚上过，不能走就慢慢的爬过去。有时我们从封锁线下过，还听到碉堡里的人抽鸦片呢。白天不能生火晚上生，天黑吃晚

饭，天未亮吃早饭，带上一餐冷中饭，睡不着觉就学习天文知识。

至于移民并村，那更有办法克服的，因为在敌人建立据点之前，我们早就有了准备，群众完全是我们的，在据点里有共产党的支部，有苏维埃政府，有时一个人是支部书记苏维埃主席兼保长，这叫做“白皮红心”。红军没有饭吃，群众你一把我一把的凑集拢来，晚上用绳子偷偷地吊到围墙外面来接济。红军没有鞋子穿，群众就你买一双我买一双，自己打赤脚，送给红军穿。

因此虽然增加了我们许多困难，我们一样可以坚持，据点与据点之间敌人的运输兵，通讯兵，经常是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如果有人问我们靠什么？那么回答说：“靠党、靠山、靠群众。”

## 三、挺进敌后，闽北闽东两个根据地的会合

一九三五年底黄立贵同志从建(瓯)松(溪)政(和)回来，了解敌后非常空虚，敌人兵力全部集中到苏区，在敌人的后方许多重要的城镇，都只有少数保安部队住守，财政经济方面也有办法解决问题。特委根据独立师行动的汇报，同时又鉴于部队集中在苏区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决定部队全力向外出击。由曾绍铭、汪林兴同志坚持崇安、建阳老苏区，黄立贵、曾镜冰同志率领独立师第一团挺进闽东，吴先喜同志率领独立师第三团挺进金资贵，并解决了一系列的新区游击战争的各项政策。

一九三六年初各路部队分别向东挺进，这一下子可对了头，果然敌后十分空虚，给养也不成问题，红军一个月之内连续打下建瓯的玉山街、东溪、迪口、临江、水吉等重要城镇，接着分散活动，闽东北新游击根据地开辟起来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间闽北闽东两个独立师会师在洞宫山，闽北闽东两个根据地会合了。

敌人呢？经我们这一击，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倾刻之间，东也告急西也求救，不得已便大量的从苏区撤兵去保护自己的老家，许多封锁线都解除了，碉堡也拆掉了。

这样一来，苏区形势也就开始稳定了。

现在，暂时让我们打住一下，再回过头来谈谈闽东老根据地的创造。

## 四、闽东老根据地的创造和闽赣省委的成立

闽东苏区较赣东北和闽北为迟。党的组织建立在一九二七年，邓子恢同志来到福安整理后，党便开始同福安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并领导群众进行反鸦片捐、秋收年捐抗租抗债斗争。一九三一年冬福州市委派叶飞同志来到福安，叶飞同志到达福安后，便开始领导群众起义，成立闽北工农红军游击第一支队，竖起了闽东的第一面革命红旗，逐渐向寿宁、霞浦、宁德方面发展。

寿宁方面在一九三一年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一九三三年为配合第一支队的活动，在蔡秀藩、范浩等同志领导下举行了起义，成立闽东工农红军第七支队。

另外一部分在连江罗城方面，一九三〇年就建立了党，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在陶铸同志亲自领导下建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九支队。

这是闽东最早的三处星星之火，到一九三三年秋季便发展成了燎原之火，各地先后在抗租抗债的基础上举行了起义，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纵横百里、人口二十余万的闽东苏区，到一九三三年八月统一成立了闽东独立师和闽东特委。此后，闽东根据地就在叶飞、范式人、阮英平等同志领导之下坚持斗争。

一九三六年闽北闽东两个根据地会合不久，黄道、叶飞等同志都感到在脱离中央领导的情况下，为了互相配合行动，更有力的坚持斗争有统一两个根据地领导的必要。一九三六年四月黄道、叶飞同志在洞宫山会议后统一成立了闽赣省委。从此，闽东根据地也就会合在闽浙赣苏区一起了，从此这两个根据地就在黄道、叶飞、范式人、黄立贵、曾镜冰等同志领导下，唇齿相依密切配合的坚持着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 五、争取林熙明，执行新政策

但是，从根据地打到敌后建立整个闽江以北游击根据地，并不是那样容易的，没有一系列的政策上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闽北白区打游击所碰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村村有大刀会，几乎每到一地都要同大刀会打仗。我们如果要想在新区站稳脚，首先必须解决大刀会问题。经过打击和争取的两方面的努力，我们首先争取了林熙明这个在建瓯、松溪、政和一带，有将近一万会徒的大刀会头子。才完成了对大刀会的争取工作。

林熙明，福建寿宁人，贫苦出身，早年曾在旧军队当过兵，不久退伍回家就组织大刀会。这个人一天到晚做着皇帝梦，如果你说："林先生，你将来要做皇帝"，他一定会笑着说："那我一定封你为一员大将"。穿着黄袍戴着小生帽，满身用朱砂写上如来佛祖、关圣帝君、齐天大圣等所有的神仙和菩萨的名字。乍看之下包你哭笑不得。但是在这落后的农村中也确有相当大的影响，并且他与国民党有矛盾。

在我们初到建瓯的时候，也曾经同我们打过几仗，使他们知道了红军的利害，再加上我们的积极争取和在国民党向其进攻时给了他必要的援助，于是逐渐和我们靠拢，最后与黄立贵同志等吃了鸡血酒称兄道弟起来了。

通过林熙明争取了绝大多数的大刀会。

在其他政策方面也有了改变。对于保甲长采取争取而不是取消。

对于地主采取筹款减租，而不是分土地。总之这一切都是游击根据地的政策，而不是苏维埃政策。

就这样才站稳了脚，并且逐渐开辟了群众工作。

## 六、拖垮周志群，痛揍郜子举

三年游击战争又是怎样打法的呢？让我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下罢。

我们进入敌后，敌人自然不可能再造封锁线了。结果改变了方法，采取跟踪追击和分进合击的办法。发现你一个连就是一个团跟着你的屁股打，发现你一点就是几路合击，这个时期，最大的困难不是饿，也不是不好行动，而是天天行动天天打仗。

从一九三六年一月起，周志群足足跟了我们三个月，从建瓯跟到建阳，我们就象“叫化子打狗”一样，一路打一路拖，也足足拖掉了他一千五百人。到底怎样拖呢？有时我们跟敌人兜圈子，今天你追上了我，一个晚上我走八十里一百里，明天你不知道我究竟到哪里去了，等到你再跟上，老子已经休息了两天或三天，又可以再同你兜一个圈子了。有时我们同敌人对流一下，看到好地方暂时隐蔽一下，等你追过头，老子回原地宿营，等你再回头我又休息了一两天。更重要的是一路选择好的地形揍他，无好的地形不打，有了好地形狠狠的揍你一顿，打了就跑。一九三六年二月底，周志群追我们追到建阳界首附近，在一次战争中足足打掉他五百多，打断了他的脚骨，再也不敢追了。这种情况在闽北闽东和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多得很。

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崇安、铅山根据地方面，张銮基、郜子举正准备撤离苏区，我坚持内线的部队在研究了敌人情况之后，乘各路敌人收兵之际集中力量，在上饶甘溪附近的金钟山伏击郜子举一个营，歼灭敌人两个连，打了一个在游击战争时算是大大的漂亮仗。并乘胜打击了张銮基，这样闽北根据地也就稳定下来了，我们就这样靠两条腿，依靠群众，采取以拖对追，有条件就打他一顿；以分散对集中，以集中对分散；牵着敌人鼻子打圈等办法坚持了三年，保存了力量。

## 七、挺向将顺泰，开辟闽中游击根据地

闽北闽东老苏区和闽东北游击根据地逐渐稳定后，一九三六年八月省委决定由黄立贵、吴先喜同志率领红军一部挺进南平、顺昌、将乐、泰宁一线，以开辟闽中新根据地，并决定以黄立贵同志为

闽中特委书记。

黄立贵同志于八月间从崇安出发，经建阳、邵武，首先打下界首镇，歼灭福建保安团一部，接着攻下峡阳镇，渡过闽江挺向将顺泰，当时将顺泰敌人内部还非常空虚，我军所到之处，反动地主武装分子被消灭，等到国民党调七十五师到达这一带时，我们早已做了两三个月的工作，建立了不少的群众关系，站稳了脚了。

从此，闽赣边的游击根据地便扩大到东至大洋，西到资金贵，北到信江，南到闽江口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包括闽北、闽东、闽东北、闽中四个特委和一个资金贵中心县委的二十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红军也有了闽北独立师和闽东独立师及各种地方武装近三千人。

## 八、半碗白米饭，一片慈母心

如果有人问，你们在游击战争的时候，部队给养、伤病、兵源补充又是怎样办的呢？那末，我们回答说：这是靠群众。

红军游击队，就是武装工作队。一面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所到之处，第一件争取群众的法宝就是严明的群众纪律，无论部队怎样苦，决不动群众一针一线，有时到了一个新地方，群众不了解，跑光了，红军吃了东西把钞票放在原地方，群众回来看到这样的纪律，第二次就再也不会跑了。第二是开仓济贫，红军所到之处虽然没有分田地，但是却也将地主粮食没收分配给穷苦群众，有时少数群众不敢要，红军秘密的送给他。除此以外，还领导与帮助群众进行抗租抗债斗争，保护群众利益，因为有红军，保甲长也不敢胡作胡为。第三是建立关系，当时红军提出的口号是：第一天了解情况，第二天结交朋友，第三天建立秘密的群众团体（至于团体的名称因地制宜），这样，只要红军住了几天，同群众的关系就生了根。群众在红军白军你来我往的实际体验下，不要两次，也就投向革命怀抱了。

我们就依靠这无边无际的广大人海，坚持着我们的斗争，敌人

来了有人给我们送消息。部队有消耗，不断的有人来加入红军队伍。打仗有伤亡，到处都是医院。

记得有一同志负伤之后，无法行动寄住在建瓯东溪里面一家山篷里。山篷里只有两个老人家，自己依靠玉米杂粮充饥，生活十分清苦。该同志寄住在他家里之后，老头子每天上山采草药，为他医伤，吃饭的时候，满锅黄色玉米当中放上半碗白米饭，这是专门给负伤的同志吃的。人民就是这样热爱着自己的子弟兵的。

## （六）浙西南新游击根据地的建立

### 一、翻过灵山，挺向浙西南

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失利后，粟裕同志和刘英同志率领一部分部队约七百人在德兴广田山集合。开始企图转到中央苏区一带，经贵溪小田毕家至信江边上受阻，折回德兴徐家滩，到徐家滩时，正遇到从怀玉山进入苏区之敌，经过战斗，当部队向东南翻过赣东最高峰的灵山，经上饶纸坊渡过信江进到上饶南乡的应家口，于一九三五年五月进寮竹关到闽北根据地的车盘，与闽北红军会师，正式整编挺进师，粟裕同志为师长，刘英同志为政治委员，黄富武同志为政治部主任，成立四个纵队，并决定向浙西南发展。

六月从车盘坑出发后，经过浦城、建瓯、松溪、政和，到达浙西南龙泉、庆元、泰顺一带，在庆元以南之上田街与浙江保安团激战一天，未克，再转至松阳之白姆镇，歼灭保安团一个中队，接着又一度攻克汤溪县城和衢州城，此后部队便分在龙泉、庆元、景宁、泰顺、遂昌、松阳、云和一带活动和做群众工作，粟、刘两同志则率领师直属队在龙泉一带做群众工作。

经过几个月后建立了龙泉、庆元、景宁、泰顺、松阳、云和、遂昌各县委及浙西南特委，以黄富武同志为特委书记。

一九三五年十月间在浙西南各地开始举行起义，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府。

## 二、突出包围圈，创造浙西南新根据地

浙西南起义后不久，声势浩大，直接威胁敌人的心脏，加之当时根据地的政策，仍然采取了苏维埃时期的一套，所以国民党调集其精锐部队十八军罗卓英部展开对浙西南根据地的大举进攻，到处大烧大杀，群众开始发生某些动摇。根据地的坚持发生了极大的困难。

在此情况下，挺进师决定分兵三路向外出击，一路由一个纵队向东阳、义乌、丽水方向出击，一路一个纵队向浦城方向与闽北打通联系，一路两个纵队，由粟、刘两同志亲自率领向浙南沿海平阳、瑞安一带，留黄富武同志坚持浙西南，不久黄富武同志不幸牺牲，浙西南根据地遭受很大的损失。

粟裕、刘英同志率领的两个纵队到达平阳地区后，首先打下平阳之朱溪、黄堂、瑞安的大学等地，歼灭保安队数百人，浙南局面迅速的打开了。

此时，在政策上已开始了某些新的转变，如将分田地改为筹款、抗租、抗债，群众组织也采用隐蔽的方式。这样，新的游击根据地就开始建立起来，部队又开始有新的发展。

一九三六年一月敌人调集八十师一部向浙南进攻，我军始则采取分散方法活动，接着在平阳分水排歼灭其一个连，击溃其大部，这样，平阳新根据地也稳定下来了。

## 三、浙西南的恢复和东义浦新根据地的创造

此时，两广事变爆发，罗卓英部也调走了，加上浙南新根据地的创造，在浙西南方面情况开始有了改变，我们又开始派部队恢复浙西南的工作。

部队到达浙西南后，群众见了面纷纷诉说国民党匪军的残暴摧残。各地失散了的同志也纷纷的来找寻关系，就这样，经过近半年残酷摧残的浙西南地区又重新开辟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挺进师第五支队奉命再度挺进到东阳、义乌、浦江一带，创造了东义浦游击根据地。

从此，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便在粟裕、刘英同志的领导下，与闽东北互相密切配合的坚持着三年游击战争。

必须特别指出浙西南斗争是很艰苦的，一方面由于浙西南直接威胁着京沪杭敌人的心脏，另一方面由于浙西南完全是在一九三五年以后所开辟的新区。

## （七）开上抗日前线和抗战中的浙赣人民

### 一、得到中央指示，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三年来失掉与中央联系，各地独立自主的坚持斗争，大家都觉得非常痛苦，各根据地先后派人设法打通与中央的联系。

闽北方面于一九三六年底派吴华友同志（过去曾在太平洋海员公会工作）带了报告到上海、香港一带找寻党的关系。在上海未找到党的组织，在香港找到了党又不敢相信。在九龙住了三个多月，于一九三七年四月间才找到太平洋海员公会，但据说太平洋海员公会已划到美国了，再通过美国党才得到中央八一宣言，民主共和国决议，红军东进山西宣言等几个重要指示。闽东和浙南方面则较早的在沪港等地找到了党的关系，接到新政策的指示。

接到这些指示之后，全体同志如获至宝一样的讨论研究，一致认为中央指示的精神完全正确，特别是在一九三七年从报纸上得到“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的消息之后，各地都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对进攻苏区敌人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但是国民党的回答却是更残酷的进攻。

### 二、一九三七年的紧张关头

双十二事变后，蒋介石虽然与陕北主力红军开始和平谈判，同时却集中大量兵力，增兵南方各地，以刘建绪为闽浙皖赣四省“剿

共”总司令，亲率几十个主力师，对各游击区进行前所未有的进攻。一时各地同时紧张，部队活动困难。

同时因为失掉了与中央的联系，加上交通不便，敌人封锁等原因，一时不易了解全面形势，对新的困难估计不足，未作充分准备，所以损失很大。

在闽北方面一九三七年三月吴先喜同志率领闽北独立师第三团挺进到金资贵地区，遇到敌人的几路进攻部队立即分散，吴先喜同志本人仅带一个连折向光泽以北的寨里一带，刚刚到达寨里，敌李玉堂第三师便进到寨里后面山上，吴先喜同志亲率部队冲出敌人包围，不幸中弹牺牲。同年五月，黄立贵同志率独立师一团，在邵武、顺昌、将乐、泰宁一线活动，敌人在该地，集中第三师七十五师及福建保安团各一部分头堵截与追击。红军由营而连由连而排分散活动。黄立贵同志则亲自率领一个排转战月余，在一个晚上渡过闽江，在界首以北，一个香菇厂休息时被福建保安团包围，黄立贵在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

在闽东方面，独立师师长卢文清同志也在周宁附近牺牲，部队也受了不少的损失。

在浙南方面，敌人更是集中重兵到处追击与堵截，红军根据地也受了很大的损失，粟裕、刘英也遭到几次极大的危险。

在皖南方面，由于省委主要负责人关英离开了部队，各地又失掉了联系，因失掉统一领导，受的损失更大，开化、婺源、德兴间刘毓标同志所率领的部队失利，刘同志本人不幸被俘。王丰庆同志率领的部队也在浮梁以东失利，王同志被捕后幸被逃脱。匡龙海在这严重关头又失去联系，部队大部遭受损失，只剩下王丰庆、李步新等几个同志所率领的少数游击队仍坚持在皖赣之间。

直至一九三七年六月，各地才从痛苦的经验中体会到新形势的变化，才开始做新的转变，采取更分散，更隐蔽的方法坚持着斗争。

## 三、走上抗日前线

七七抗战爆发，主力红军已经开上华北前线，各地国民党军队也纷纷北调，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才不得已放弃了消灭红军游击队的计划，而被迫接受了我们的呼吁。

一九三七年八月各地红军游击队先后下山集中整训，闽北方面集中在铅山石塘，闽东方面集中在福安附近，浙南方面集中在平阳，皖南方面集中在祁门、浮梁交界的石灰山，在中央统一指示下改编为新四军，闽北独立师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第五团，闽东独立师改编为第六团，浙南挺进师和皖赣边游击队改编为第一支队第二团。同志们为了抗战，流着眼泪摘下了为它而奋斗多年的红星帽，珍贵的打在包袱里，换上了新军装。同志们都知道，虽然为了抗战胜利，换了军服改了番号，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为人民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实现而战斗的意志是永远不变的。并且，也就是为着这个目的的实现而光荣的走上抗日前线，承担中华民族解放的重任。

红军下山后，各老根据地的群众，纷纷扶老携幼前来慰问。妻子送着丈夫，父母送着爱子到部队里来。各地的知识青年们也都把部队看成是中华民族的希望，纷纷参加部队工作，就这样，部队得到很大的发展。

一九三八年三月各路部队除了在闽北留丁曾镜冰同志，闽东留下范式人同志，浙南留下刘英、龙跃等几个同志组织留守处外，其他全部在叶挺、陈毅将军的指挥下挺进到京沪杭抗击敌人的心脏，创造了华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支部队也就成了新四军和华东敌后抗日战争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 四、抗战时期的闽浙赣人民

在伟大抗日战争的运动中，闽浙赣老根据地的人民发扬了过去十多年的光荣传统，又站在抗战斗争的前面，除了对全国人民贡献出自己的子弟兵——新四军以外，各地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迅

速成立起来了，党的组织也有很大的恢复。依照闽浙赣老根据地人民的话，这叫做二次革命。

但是国民党在其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下，是不允许闽浙赣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斗争的，一九三八年武汉失守后，赣东北人民又遭受到新的灾难。数以千计的同志犯了“爱国罪”被捕了，国民党强迫他们“自首”、“悔过”。一九三九年五月黄道同志在河口被阴谋毒害，刘英同志在丽水被捕后又被杀害。尤其是一九四〇年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动派更公开的对闽浙赣老根据地人民进行血腥的残酷镇压，新四军家属被关进了牢狱，到处捕杀共产党。更残酷的是将黄道同志的遗体从坟墓中挖出来鞭尸割头，许多当地的群众领袖如闽东的阮英平同志，闽北的王助、汪林兴同志，赣东北的杨文翰同志等等也都在这个时期先后牺牲。他们满以为这一下可以完全镇压住革命的赣东北人民。

可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富有革命传统的闽浙赣人民是决不会被镇压下去的。他们又重新拿起了枪，重新上山，与敌人再度展开游击战争。在福建方面有曾镜冰同志所领导的游击队，在浙南方面有龙跃同志所领导的游击队，在皖赣边方面有胡明同志所领导的游击队，在赣东北有杨文翰同志所领导的游击队，除杨文翰同志不幸于一九四六年牺牲外，其他各地都胜利的坚持着。解放战争开始后，他们更有力的配合人民解放军在敌后胜利的打击敌人。

## （八）红军回来了，毛主席回来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江南广大地区后，五月间胜利的回到闽浙赣老根据地。闽浙赣老根据地受苦受难的人民，重新看到已百倍壮大的自己的子弟兵，看到了分别十多年的红星帽徽，到处响起了“红军回来了，毛主席回来了！”的欢呼声，铅山石垅老革命女干部丘和秀说：“我看到了红五星，心里就说不出的快活”。许多群众都将冒险保存下来的苏维埃

书籍、报纸、党证、钞票等拿了出来，表示他们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无限忠心。

十八年来闽浙赣老根据地人民所受的灾难是诉说不完的，仅闽浙赣老苏区部分的江西上饶专区二十六年来为革命牺牲的干部、军人和群众达二十五万六千多人，横峰一个六万人口的县，七千六百人出外当红军或做工至今健在的只有十八人，烧毁房屋二十万间以上，至今许多村庄仍看不见瓦屋，被抢的东西无法计算，根据我们在几个村庄的了解，约每户在三百担稻谷左右，加以全专区苏区户口计算总数不下亿余担，折人民币不下五万亿元。

一九四九年解放后，我们几个从闽浙赣老根据地出去的同志先后回到了革命的老家。你到哪里群众就一大群一大群的围到哪里，对你控诉国民党十八年来的罪恶，对诉说老根据地人民十八年来灾难。这种悲喜交集的场面，实在是笔墨所无法形容的。只要你身历其境，你就一定要为老根据地富有革命传统的人民而高兴，也要为老根据地人民十八年来所受的灾难而掉下眼泪。

老根据地的人民，在这种悲喜交集的会面之后，立即投入到支前剿匪的伟大斗争之中，虽然大军云集，但是老根据地人民都保证了部队的供给，小小的一个六万人口的江西横峰县在一月之内就借出粮食三百万斤。从解放开始至今，凡是老根据地，没有出现过一个土匪，那些在外面的土匪也很少能够活动到老根据地来。

两年来，老根据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展开了各种伟大斗争，将那些十八年来作威作福的反革命分子法办了，从一九五〇年起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土地又重新回到农民的手上。其他在生产建设各方面，都获得了伟大成就，现在他们正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满怀信心的为保卫和建设伟大的祖国，为重建自己的家园而努力！

## （九）先烈们永垂不朽

二十多年在这漫长的斗争道路上，光荣的闽浙赣老根据地的优

秀人民为党为人民前仆后继的斗争着，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许多革命的先驱者作了壮烈的牺牲，其中有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群众领袖，这里我们不能将全部牺牲的同志记载下来，只能将那些闽浙赣的群众领袖们记载在下面，让他们与其他千千万万的烈士们永远活在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的心上。

方志敏同志，闽浙赣老根据地创造人，江西弋阳人，在一九二二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闽浙赣省委书记，闽浙赣苏维埃主席，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一九三五年牺牲于南昌。

黄道同志，闽浙赣老根据地创造人之一，方志敏同志亲密战友，江西横峰人，一九二三年就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闽浙赣省委组织部长，闽北特委书记，游击战争时的闽赣省委书记，东南局委员兼宣传部长。一九三九年被毒害于江西河口。

周建屏同志，红军第十军创造者，云南人，早在一九二八年就到达赣东北，从红军独立团起一直率领这支部队，后为红十军军长，红十军调中央后才转到中央，抗日战争时期积劳成病，故于冀察晋边区。

寻淮洲同志，一九三四年率七军团（原红军第十军）至闽浙赣任抗日先遣队十九师师长。一九三五年牺牲于皖南。

吴先民同志，闽浙赣苏区创造人之一，江西横峰人，曾任过县委书记、红十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二年在错误的肃反中含冤而死。

邹秀峰同志，横峰人，闽浙赣苏区创造人之一，曾任省委委员、县委书记。一九三五年抗日先遣队失利后下落不明。

邹琦同志，弋阳人，闽浙赣苏区创造人之一，曾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一九三五年在横峰葛源被俘，押至上饶壮烈牺牲。

唐在刚同志，四川人，早在一九二八年来到赣东北，一直坚持着斗争，曾任赣东北特委书记、军区司令员。一九三五年在横峰葛源苏源山被围自杀。

雷夏同志，弋阳人，弋阳八区起义领袖。一九二八年牺牲于弋阳马王庙。

江宗海同志，贵溪人，贵溪党的创造人之一。一九二七年被国

民党杀死于贵溪城。

刘英同志，江西瑞金人，曾任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挺进师政治委员、浙西南根据地创造人，浙江省委书记。一九三九年在丽水被捕牺牲。

黄立贵同志，横峰人，雇农出身，一九二七年参加起义，一九二九年到闽北，闽北独立师的创造者，闽北独立师师长。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牺牲于福建建阳。

吴先喜同志，横峰人，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曾任县委书记、闽北独立师政治委员、闽北军分区司令员。一九三七年三月牺牲于光泽。

阮英平同志，闽东根据地领导人之一，曾任解放军师政治委员。一九四八年牺牲于闽东。

范溶同志，闽东党创造人之一，曾任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二年牺牲于福州。

黄富武同志，弋阳人，一九二七年参加起义，曾任特委书记、挺进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六年牺牲于浙西南。

黄端喜同志，横峰人，一九二七年参加起义，曾任县委书记。一九三五年被俘牺牲于弋阳城。

黄怀仁同志，横峰人，一九二七年参加起义，曾任闽北红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县委书记。一九三五年被叛徒杀害于铅山。

卢文清同志，湖北人，早年到闽浙赣，曾任闽北分区政治部主任、闽东独立师师长。一九三七年牺牲于闽东。

龙志光同志，贵州人，周志群部起义领导人，在红军中曾任团长、师长等职。于一九三三年牺牲于贵溪夏家岭。

除以上同志外，现在尚记忆得到的在赣东北有黄镇中、舒翼、江立山、花春生、钱壁、宁春生、李穆、黄开柏、裴成章等同志，在闽东北的还有徐福元、温绍卿、王助、汪林兴、汪梅亮等同志。

这些都是闽浙赣起义及苏维埃运动中的领导人物，除此以外尚有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们。

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血迹永远前进吧！

# 忆闽赣斗争五年

方志纯

国民党蒋介石在一连三次进攻中央苏区失败后，并不甘心。从一九三二年六月起，蒋介石又调动兵力，对中央苏区实行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这次反革命“围剿”，敌人集中了五十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攻，中央苏区面临着严重的危险和困难。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一九三三年初，中央命令红十军迅速离开赣东北根据地，到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对这个命令，从干部到战士都感到很突然，思想毫无准备。红十军的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是赣东北的工人和农民，都有点故土难舍。我也和大家的心一样。

一月中旬，部队开始集中。二十日，部队分开从葛源、上饶等地向贵溪方向运动。二十四日黄昏时，部队开始渡信江。过江后便同三军团相会了，随即进入了中央苏区。

红十军进入中央苏区，赣东北党组织和方志敏同志决定要我和邵式平同志随军行动。并交待两个任务：一是受赣东北党组织及方志敏同志的委托，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虽然过去通过电台和“交通”同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赣东北党组织的负责人当面向中央汇报工作还是第一次。这次适逢中央调红十军去中央苏区，方志敏同志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了。二是这次红十军调往中央苏区，有不少同志不愿走；也有少数同志对中央这项决策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把我军过分集中，与敌人死打硬拚，是不对的。同时认为以赣东北为中心的闽浙皖赣的根据地应该巩固和发展，不应该削弱它。这块地区，无论政治、经济和地理条件对我们

部有利。如果红十军一调走，留下少数地方武装坚持斗争，就必然受到敌人的破坏和摧残。因此，当时少数领导干部对这个命令有不同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时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方志敏同志对我说，红十军调中央苏区去，有的同志想不通，不想去，这种情绪不好，要服从中央的命令。你是赣东北的“老人”，是领导干部，又是我的弟弟，你带头去，对部队有影响。经志敏同志这么一说，我完全理解了，我愉快地和红十军政委邵式平同志一起踏上了新的征途。

在黎川县，红十军受到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的热情欢迎和接见。黎川军民还开了欢迎大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项英等同志都到会讲了话。周恩来同志还特意接见了排以上的干部并讲了话。他要求干部要带头搞好团结，努力作战，为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而共同奋斗。

我们到黎川县时正值春节。红十军受到中央领导、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群众的热烈欢迎，原来一些同志离家不愉快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我们把部队的工作安排好了，就准备起程前往瑞金向中央汇报工作。

一九三三年春，我同邵式平同志一路扬鞭策马奔向瑞金。在苏维埃的土地上，虽然处在紧张的战争时期，但中央苏区内广大军民情绪镇定，斗志昂扬，到处洋溢着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

当时，临时中央的工作由博古同志主持。我们先向博古同志作了汇报，后又到沙洲坝向毛主席汇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心情很激动。我们的谈话有说有笑，非常随便。

在我们汇报时，毛主席详细地问了赣东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情况，并要我们画个草图加以说明。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那里很好，以武夷山为中心，逐渐地向周围发展，大有文章可做。毛主席接着问，你们为什么把部队调到中央苏区来？我们回答说是中央调我们来的呀！毛主席沉默了一会，果断地说，红十军不应调到中央苏区来，而应该加强赣东北根据地嘛。听毛主席

这么一说，我和邵式平同志都非常高兴，心想我们可以回去了。我心切地问："毛主席，我们还是把队伍带回去吧？"毛主席认真地说，不行，要服从中央的命令。

后来我们才知道，王明路线统治党中央以后，即对毛泽东同志进行排挤和打击，把"左"倾路线推进中央苏区。并污蔑毛泽东同志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纯粹防御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最后以批准毛泽东同志养病为名，而实际上撤消了毛泽东同志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是，当时毛泽东同志无论是言语上和表情上，丝毫都没有流露。仍是那样充满着革命的乐观情绪和必胜的信念。使人难忘。

汇报工作结束后，中央组织局李维汉同志通知我说，中央军委来了命令，任命我为三十一师政委。

三十一师是红十一军的一个师。当时，红十一军军长是周建屏同志，政委是肖劲光同志，参谋长是粟裕同志，该军辖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个师。三十一师原师长是寻淮洲同志，政委是王如痴（后叛变）。他们调走后，由一团包团长提升为师长，我任政委，政治部主任是陈一同志。

三十一师是个特殊的师。平时归红十一军的建制，在特殊情况下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因为该师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后，挺进到敌人心脏地带去活动，故该师又名为挺进师。该师的战士和干部都是经过挑选的，够得上兵精将猛。火力很强，一个排配有五、六挺轻机枪，弹药充足，并有电台通讯联络。这些装备在当时来说是很优厚的。

我一到任便投入到第四次反"围剿"的一场大战中。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蒋介石集中九十个师，以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指挥，采取分兵合击的战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新的进攻。进攻的敌人分三路纵队：右路纵队由宜黄、乐安、黄陂一线前进；中路纵队由藤桥、南城、南丰一线前进；左路纵队由贵溪、金溪、黎川一线前进。三路敌军企图合攻南丰、广昌间的红军主力。

当时，我军三、五军团正在围攻南丰，见敌军靠近，便命令地方部队、游击队与敌人周旋，将红军主力转移隐蔽到黄陂、蛟湖、大龙、登仙桥地区。此时，准备经过黄陂地区的敌右路军是罗卓英带领的第五军。该军辖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罗卓英因为刚升任军长，正在抚州庆贺提升，前线军事由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代理指挥。

为了集中力量消灭这股敌人，在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的亲自指挥下，我军主力分为左右两路，成夹击之状，埋伏在黄陂一带的丛山中。左翼部队为红一军团、三军团和二十军，由聂荣臻同志率领；右翼部队为红五军团、十二军、廿二军和独立五师，由董振堂等同志率领。

这次战斗，红十一军由红一军团指挥。我师于二月二十七日晚进入阵地，埋伏候敌。大家在阵地上，背靠背地挤在一起。由于风吹雨打，外寒内饥，战士们冷得直哆嗦，不时发出捂着嘴的咳嗽声。天刚蒙蒙亮，得到情报，敌人已开始运动。八时许，敌人如期进入我伏击圈。山雾细雨，迷迷蒙蒙。一声令下，红军突然自天而降，四面向敌袭击。我军喊声震天，敌军措手不及，呼天叫地，乱成一团。战斗打响不久，我军首先俘获了敌先头部队的电话总站，敌人失去联系，指挥中断，自顾逃命。战斗不到三个小时，敌五十二师全部被歼，敌师长李明被俘了。我们正在打扫战场，传来了命令，命令挺进师立即撤出战场，追击敌人。于是，我师奉命退出战场，长追敌人百余里，一直追到南丰县城附近。在追击中，我们又歼敌一部。

黄陂战斗，我军歼灭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两个师，两个师长一个被俘，一个击毙。据说，陈诚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沉痛。”这一仗，在红军战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我们这个师先后归彭德怀同志率领的三军团和董振堂同志率领的五军团指挥。打了几仗以后，部队便

进入闽赣根据地，集结在黎川、南城一带。为了便于战争时期军政统一领导，我除军队职务外，还兼任了黎川中心县委书记。

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已联成一片。从而切断了敌人东线与北线的联络，直接威胁着敌人反革命中心的抚州、南昌。这个形势，为建立闽赣省军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于是，中央指示在闽赣省委领导下，成立闽赣省军区。省军区设在黎川、光泽、资溪三县交界处的牛田隘。由肖劲光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在瑞金召开第四十次常委会。会上，由邵式平同志报告了闽赣方面的工作，会议还审查了红十一军近期活动情况的电报。经过详细了解，认为闽赣苏区扩大，建(宁)、黎(川)、泰(宁)苏区与中央苏区联成一片后，对我特别有利。况且地处武夷山脉，进可攻、退可守，东可威胁福州，西可威胁南昌，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重要地位。因此，争取这一广大区域成为巩固的苏区，有着重要的意义。会议经请示中央后，决定把以建宁为中心的建、黎、泰根据地、以资溪为中心的根据地(包括光泽、邵武、资溪、金溪、贵溪)、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根据地(包括浦城、建瓯、建阳、上饶、广丰、铅山)合并，正式成立闽赣根据地。中央派顾作霖、毛泽民、曾镜冰、肖劲光等同志，闽北抽调黄道、肖韶等同志，赣东北抽调邵式平、方志纯、彭皋等同志到闽赣根据地工作。

我们这些同志先后来到资溪，在资溪开会商定成立闽赣省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以顾作霖、邵式平、毛泽民、余泽鸿、钟州斌、肖劲光、周建屏、黄道、薛子正、陈荣州、方志纯、王火仔、张光发、吴家园、包维贤、刘才英、钟光来、钟宝光、曾绍铭、邹琦、黄立贵、彭皋、李德胜、刘炳龙等二十五人为委员。并以邵式平、顾作霖、钟州斌、毛泽民等九人为主席团，邵式平为主席。同时，正式成立了闽赣省委和建立了省委机关。顾作霖为省委书记，黄道为宣传部长(后肖韶)、刘炳龙为组织部长(后黄道)、张

荷凤为妇女部长。还正式宣布成立了闽赣省军区，肖劲光为司令员兼政委（后为叶剑英同志），萧子正为参谋长，并相继成立了团省委、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组织。

一九三三年五月初，闽赣省革命委员会组织成员在资溪集中筹备后，确定黎川县城为省会，同月，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临时代表会议在黎川县湖场开幕，参加会议的有省、县、区代表和红军代表约三百余人。会场布置得很庄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条巨幅标语："罢工、罢工、罢工、逼得资本家要死""暴动、暴动、暴动、国民党何处偷生"。这次会议由顾作霖同志主持，邵式平同志作了闽赣省的"目前中心任务与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正式成立了闽赣省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并选举通过了省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委员。闽赣省苏维埃主席是邵式平，秘书长是吴炳怀，财政部部长是毛泽民，土地部部长是钟光来，裁判部部长是曾绍铭，教育部部长是胡德兰（女），政治保卫局局长是杨良生。

至此，闽赣省委、省军区、省苏维埃已全部正式建立。

一九三三年六月，闽赣省苏维埃政府公布了"目前政治形势和我们斗争方向的决定"，准备着手解决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政权建设、武装斗争等问题。"决定"的内容是：

一、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坚决执行土地法；

二、坚决执行劳动法；

三、号召组织广大工农群众武装起来；

四、从深入和扩大土地革命中筹集经费；

五、发动广大群众深入肃反斗争；

六、巩固扩大苏维埃区域；

七、健全乡一级革命委员会工作，驱逐隐藏在政权机关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一切腐化怠工分子。

一九三三年七月，闽赣省苏维埃从湖场搬到黎川县城，设在城外的邓氏家庙里。

闽赣省成立后，我挺进师的任务就是配合兄弟部队不断出击敌

人，扩大红色根据地。同时，也经常深入白区搞一些军需民用的物资，解决根据地内的燃眉之急。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蒋介石开始着手进行向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敌人为了隔断我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悍然出动重兵，进犯黎川。

驻守黎川的红十一军，本来是一支有作战经验的部队，但是，由于个别领导盲目乐观，轻视敌人，未加严密防守，致使敌人攻城时，我军措手不及，黎川城于九月二十七日被敌轻易夺取。

敌人占领黎川后，一面由硝石攻占资溪桥，一面由黎川城向茶亭方向追击我红十一军的一部。这时，我师随红三、五军团由福建活动回来，在沟口与敌遭遇。沟口位以黎川的东面，是黎川通往光泽的唯一要道。遭遇之敌为国民党第五师二十七团和第六师十八旅，敌人由于自进犯以来，未遇大仗，傲气十足，加上刚取黎川，更显得不可一世，象饿狼一样横冲直撞。我军突然与敌相遇，虽然情况不明，但由于红军长期进行游击战争，善于在突然和敌军遭遇的情况下打恶仗，于是，我军很快就布置好了向敌人的进攻：第一路由茶坪、厚村、莲塘方向的进攻，打敌人的右翼，截断敌人从硝石来的增援部队，堵死敌人向南城的归路；第二路从湖场、飞鸢、荷花庄方向进攻，打敌人的左翼，截住敌人从黎川城来的增援部队，同时堵死敌人缩回黎川的道路；第三路从洋家岩、沟口方向正面进攻敌人。

一九三三年十月七日晨，我军总攻击开始，经过激烈战斗，打得敌人落花流水地败窜下去，并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剩下的敌人，想缩回黎川，被我左翼部队堵死；想退回南城，又被我右翼部队堵死，敌人进退不得，被我军紧紧包围在沟口、莲塘、茶亭一带。敌人妄图作垂死挣扎，一次又一次地向我军进行反扑，但都被我军打败。下午一时许，敌军第十八旅旅长葛钟山所率的三十四、三十一团全部被我军消灭，葛本人被俘。敌第五师二十七团被歼一部分，周浑元率领的增援部队三个团，也在下午三时许被我击溃。

沟口战之后，威慑了敌人。我军刚从前线作战回来，本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休息整顿，观察情况，选择时机，出击敌人。但是，当时的领导者，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急于收复，又命令红军，北上就敌。我军打南城之硝石镇，不胜，又打黎川之资溪桥，又不胜。这时我军已处于十分被动地位。十二月十二日，红军第三次进攻，打黎川之团村。团村战斗，虽然击溃敌人十二个团，但未能全歼，而且我军损失很大。

毛泽东同志后来对这次战斗作了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总结。毛主席在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到："敌以保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确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开脚一步就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在战争时期，事情往往是这样：由于自己的战略方针或战役指挥上的错误，实际上是断送自己，帮助了敌人。

当时，在对待福建人民政府的问题上，也是这样。福建十九路军不满蒋介石的反共卖国政策，在蔡廷锴的领导下，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并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这是一件好事。蒋介石对此非常恐慌，连忙从北线抽调兵力进攻福建的十九路军。当时，我师从沟口撤出后，正运动在黎川、光泽一带。我们清楚地看到敌人匆匆忙忙向福建前进，却不主动攻击，采取守势，还在沿线大作工事，构筑碉堡。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在纳闷。战士问排长，排长问连长，连长问团长，团长来问我，我也不知道。大家只好拭目以待，等候命令。结果，久等无令，我们只好莫明其妙地看着敌人向福建调动。尔后，我们才知道是蒋介石调兵去镇压"福建事变"的。本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军理应积极地支持主张反蒋抗日的进步力量，坚决地、迅速地截击去镇压十九路军的

反动军队。但是，当时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却不然，而是采取了与此相反的错误行动。他们说什么"中间派别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至使蒋介石不但顺利地镇压了"福建事变"，而且得以从容地调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使我军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受到极大挫折和损失。

机会主义者，往往都是在顺利时忘乎所以，搞冒险行动；在困难时候悲观失望，缺乏信心。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敌军先向建宁方面进犯，以打通黎川、建宁一线。"左"倾机会主义者，却视敌如虎，他们既不敢深入敌后，到外线去作战，又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而是错误地提出"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口号，命令红军在康都、建宁一带处处设防，节节抵御。这个时候，我师开始是配合五军团守建宁的将军岭。将军岭是建宁的一扇大门，上级命令我们死守，并命令我们大筑碉堡，"以堡垒对堡垒"。我们丢掉了红军的传统打法，却把一师人分散到各个碉堡中去，敌人的火力很猛，一发炮弹打来，将我们连人带碉堡全部摧毁。而我们又没有重武器，对敌人的碉堡毫无办法。冲不上去，撤不下来，守的时间越长，困难越多。已处于弹尽粮绝、伤员无法安排的境地。可是，上级还是一个劲地命令死守。将军岭一战，我师损失大半。结果，还是没有守住，被迫从建宁撤退到广昌。

在广昌又同敌人决一死战。我师在苦竹一带抗御敌军。英勇的红军战士，为了守卫红色的土地，同敌人死打硬拼，杀伤了大量敌人。但毕竟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苦竹也没有守住。这一战，我师损失更加惨重，从广昌撤退时，一个师的人马已剩无几了。

广昌失陷后，我就离开挺进师了，该师在江西补员以后编入红七军团。

一九三四年六、七月间，我被任命为彭湃县县委书记兼城防司令(后为余泽鸿同志)。

这时，闽赣省的领导已有了新的变化。原来，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敌人占领黎川后，闽赣省委、省苏维埃迁到德胜关的井水和

关上。十一月，又迁到建宁县，并在建宁县城的文庙召开了闽赣省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都到会作了讲话。会后，闽赣省的领导也有变动。赖昌作为省委书记，宋清泉为军区司令；苏维埃主席杨道明，军区政治部主任仍是彭祐。宋清泉原是彭祐的警卫员，所以，他虽身为司令，但对彭祐的话仍然是很听的。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我党我军都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党内的思想统一不起来，军队内部广大指战员，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越来越不满，意见越来越大，要求毛泽东同志回到领导岗位上来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情绪，由隐藏到公开，由小到大。于是，"左"倾机会主义者，为了维护他们的领导权，控制局势，对持不同意见的人或不愿跟他们跑的人，就采取残酷地镇压——"肃反"、"反右倾"等在党内、军内越搞越厉害了。

在中央根据地，"左"倾机会主义者搞了个"邓、毛、谢、古"案件，他们想杀一儆百，把反对他们的人都压下去，报纸等舆论工具控制在他们手里，大造舆论。今天在《红色中华》报上反这个右倾，明天又在报上批那个是反党；今天报道这个乡杀了多少"ＡＢ团"，明天报道那个县杀了多少"改组派"。搞得气氛十分恐怖，人人自危。此时，邵式平同志也被怀疑为"ＡＢ团"，调往中央审查。后来叶剑英同志、李克农同志亲自调查，才给予否定。我的名字也上了《红色中华》报，点名批判。

给我定的罪是三条：第一条是怀疑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领导上的指挥错误，在建宁、广昌战役中，仗越打越糟，人越打越少，士气越打越低。干部和战士牢骚满腹，议论纷纷。当时，我确实也有意见，并且在一定的会议上，或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形式，把我的看法和意见，向领导上说过。按理说，这是正常的，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就犯了不得了的罪了。说对上级领导不满，就是对中央不满，怀疑中央领导，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就是"ＡＢ团"。这一条就可以致我于死地了，何况，还有第

二、第三条罪呢！

第二条罪是散布悲观论调。当时，形势一天天恶化，闽赣根据地眼看着就要守不住了。在研究我们往何处靠拢时，省委内部意见有分歧。省委书记赖昌作主张往闽南运动，开辟新的根据地。我主张往闽北靠。闽北是老根据地，又有黄道同志领导的游击武装力量，再加上群众基础又好，地形有利，坚持打游击是可以的。可是，我的主张不但被否定，而且给我戴上了右倾怕死、悲观失望、不敢开辟新区的帽子。

第三条罪，是不顾群众死活。这是从何说起，我也莫明其妙。后来才知道，我曾建议过要精简省级机关人员，主张将干部家属在根据地安顿隐蔽起来，不要随军行动。因为当时的环境和形势，要求机关、部队都要有很强的机动性，家属一多，婆婆妈妈的事多，很难开得动，走得快。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和对某些问题认识上的分歧，竟成了罪，成了"反革命"。当时，既不调查，也不分析研究，任凭口供，无限上纲，草菅人命。

在外部敌人对我们的进攻越来越猖狂时，内部的"肃反"的气氛也越来越浓了。当时，闽赣省委宣传部长肖韶同志、妇女部部长李火凤同志、资溪县委书记彭皋同志都以"肃反"的名义无辜的被杀害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间，我也被抓了起来。

红军已撤出根据地，长征已开始了。为了坚持继续战斗，中央决定留下项英同志、陈毅同志为首的部分同志，分别组成中央分局和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负责指挥中央苏区和各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当时，闽赣省还通过电台，不断与中央和中央分局取得联系。

我在被关期间，不断审讯——其实，也无须审问，罪状早已定了。一九三四年底，我从彭湃县押送到省委所在地建宁县。在建宁又吊打了三天，逼我承认是"ＡＢ团"。第三天晚上，审讯人员来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知道，这是要准备杀我了。这时我心里很难过，但不惧怕。我说，你们愿意杀就杀，我无法拦住你们。我决不是"ＡＢ团"，我不是反革命！但我有个要求：请给我发两个电报，

一个给项英同志，一个给方志敏同志，向他们报告一下。他们知道我是不是“AB团”。

我整整一个晚上没有合眼。我预感到，这是我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了。我心里翻腾着……，我出生入死在战场，天大的困难心不寒，一心跟着党干革命。可是，现在却要戴上反党分子的帽子，被自己的同志杀害了……。可惜，我没有死在战场上，却不明不白死在这里。我还年轻，我还要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啊！不知他们会不会发电报？不知他们会不会回电报？……我正在左思右想，这时，东方已发亮了，从窗户上照进几道晨光。保卫局的人进来，把我从梁上放下来，我以为我的生命要完结了。没有想到他们的态度变了，好声好气对我说，对不起，你受委屈了，吃早饭去吧！

后来我才知道，项英同志接到省委的电报后，立即回了电报，讲方志纯同志是个好同志，不会是“AB团”，他可作保，要省委立即放出。这样，我才免于一死。如果项英同志不回电报，或迟几个小时，我早就身首异处了。一九三七年在延安碰到项英同志时，他高兴地问我：你还活着？我感激地说，如果没有你的电报，我今天就见不到你了。

这个问题尽管如此处理了，但最使我想不通的是，当时关我的人，审讯我的人，打我的人，都是在一个部队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同志；互相之间都非常了解，怎么能昨天是革命的，是同志，而今天就成了反革命，是敌人？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搞点调查研究，却让自己的同志、战友互相摧残，至使许多好同志被错杀。这种错误的作法，对党和军队的破坏和瓦解，胜似敌人数倍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后来经常批判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路线。这是血的教训，是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啊！

红军长征以后，敌军用了二十个师的兵力占领苏区的重要城镇。前几年逃跑的地主恶霸又都跟着敌军回来了，对苏区人民进行残酷地镇压。有的村子被烧为灰烬，横尸遍野，有的枪决，有的砍头。就连小孩、老人也不放过。苏区人民可吃了苦头了。我们留下

的部队多数都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闽赣省根据地，实际上就成了一块游击区。部队有时分散，有时集中，在游击区内和敌人兜圈子。在这种情况下，困难就更多了，思想情绪更复杂了，部队更难带了。

一九三五年四月，我们在福建龙溪县境内的一个山头上和敌人遭遇。这是敌五十二师。这一仗打的很艰苦。因为敌人太多，我军边打边撤。在战斗中，我的脚被打伤了，只能爬行，不能走动。政治部主任彭祐从我身边走过，我请他派人来背我，他不肯，只顾自己。我躺在荒山上，望着迅速远去的同志们，一颗颗热泪不禁脱眶而出。

我被捕了。和我一块被捕的有朱木贵同志，他原是在中央医院工作，红军长征时转移到闽赣根据地来的。当天下午五点多钟，我们被押送到附近一个村子的祠堂里。我坐在地上，半躺着身子，伤痛得如刀绞。但我咬紧牙关，忍住呻吟。我抬头，突然看见马步英同志在祠堂外面走动。马步英同志是赣东北一位老同志，一直在部队里搞侦察工作。我意识到他是化装来侦察的。我们互相目视，但却不敢打招呼，否则，一打招呼便两个人都暴露了。

审问开始了。敌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教书的。因为我刚被保卫局以“ＡＢ团”问题抓了起来，才放出没有多久，加上连续行军打仗，身体比较瘦弱，同时，又是穿的便衣，确实是一副穷教师的样子。敌人对我从上至下打量一番，横着眼睛，疑迟地用脚踢着我的腿说：你这腿怎么搞的？我就编个理由说，我看打仗，就向外跑，想躲一躲，谁知被枪打断了脚。我边说，边叫着伤痛。敌人搞了一阵子也没有问出什么名堂。加上我走不动，反正跑不了，又把我和朱木贵关在一起。我们两人，这一天一夜，不但没有吃饭，连口水喝都没有，口干舌苦，多么想喝点水啊！

第二天，他们将我们押送到敌五十二师留守处去。我负伤的右脚不断地还在流血，他们给我简单地上了点药，随便包扎了一下。

晚上，一个处长来审问我。他边抽鸦片，边问道：“你在红军

里干什么的？你们有多少兵？”

我以为他们搞清了我的底细，心里一惊。但我立即又镇静下来。我说：“我不是红军，我是教书的。”这家伙想在我身上搞点“油水”，他放下烟枪，走过来，口气缓和地说，“唉！你这里有保人吗？如果有人，拿点钱来，我就放你们回去。”

“放我回去，还有这样好的事”。我高兴起来，但马上又冷静下来：这里搞的什么鬼明堂。我的脚已断了，不能走动；同时，在福建我人生地不熟，说话又不懂。如果出去，一个可能是死在路上，一个可能又被敌人捉回来。于是，我说：“这里我没有熟人，也没有钱，我的脚骨头已经打断了……”

“去，去，去……”很火气地瞪了我一眼，又抽起他的鸦片了。

这样，敌人便将我和朱木贵同志寄押在龙溪县的监牢里。

当时，龙溪县的监牢里只有五十几个犯人，大部分是“匪犯”。监狱长叫曾宗彝，看守长姓杨，还有两个看守，一男一女。按照编制，监狱允许设一个文书，但这个监狱未设，文书的工作就由那个姓杨的做。这样，曾宗彝就吃了一个空额。姓杨的文化水平也不高，于是，这家伙经常找犯人给他干些抄抄写写的工作。

敌人知道我是“教书”的。一天，曾宗彝问我，你的字写得好不好？我说，我是教书的，会写字，但写得不好。曾说，你来试试看。他就叫我写了几个字，见写得还好，就叫我填写“囚粮表”。从这个“报表”里可以看出，这些家伙，不但吃空额，而且还弄虚作假，虚报冒领，克扣口粮。卡下犯人的这些钱和物，都被监狱长和看守长分掉了。

他们经常找我给他们搞点抄抄写写的事，因而，就慢慢地同曾宗彝搞熟了。我曾试探性地向曾作点宣传工作。当然要含蓄些，不能太明朗了，否则就更增加他的怀疑。开始，他总是爱理不理，似听非听。有时他又以怀疑的眼光看看我。不过我始终是以一个做教师的身份，谈点在苏区的见闻。常以道听途说的方式向他宣传一些苏区的情况和共产党的政策。这个家伙大概也听过一点，对有些问

题总是半信半疑。我记得后来他对国民党造谣说"共产党是共产共妻"就不相信。过了一段时间，我的伤势渐渐地好转了，慢慢地能走路了，我心里就有些着急了，总想出去找组织，找部队去。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脱离党，脱离集体更痛苦的了。在这度日如年的日子里，多么想念党，多么想念战斗在战场的同志啊！我曾多次试着向曾宗彝提出放我出狱的要求，但这家伙就是不同意，说我的问题还没有搞清呢。有时又说，如果你能找个保人，可以放你出去。可我在福建人地两生，哪里找得到保人？！还是走不了，真急啊！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全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朱德同志率领的第四方面军，也到达了陕北同毛主席会合了；日本侵占了东北，正在向华北进军，全国人民坚决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已经兴起抗日的高潮。从报纸上可以看到，全国的形势发展如此快，心里既高兴，又着急。我无论如何要设法走出去。

一天，曾宗彝说，"我要调走。"我默默地想，这是个机会，乘他办移交的时候，要想办法出狱。我问他："我在这里蹲这么久了，我的案子到底搞清了没有？"

"你是一般的案子，有人具保，我就放你走。"听他口气可能有点希望。我又进一步说："我在这里人地生疏，有谁保我？"这家伙，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就走了。

没有过几天，米店的老板送粮来。我脑里一闪念，请他保行不行？因为这个老板常来送粮，我也见过几次面，有时也谈上几句。我把我的想法向这位老板提出，他表示可以。结果就这样，由米店老板具保，曾宗彝就办理手续报送伪县政府批准，第二天我就被释放了。

释放了，出狱了，真高兴。我正准备设法找党组织。但曾宗彝又抓我给他出一趟差：叫我和杨看守长先送他老婆回福州。后来，我知道不是他老婆，是一个姘头。这怎么办？不去，又怕他借此找

我的麻烦；去吧，又怕被他缠住我走不脱。同时，这个家伙的鬼主意也毒辣得很：如果路上没有出乱子，这姘头就是他的了。如果路上出乱子，他既抛掉了这个女人，又可能嫁祸于我，再次把我抓起来。但我又想，何不就此机会，到福州去找找党的组织。如果找到了党，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什么事情都好办了。因此，权衡一下，我还是去。

还好，一路上还没有出事，将曾的姘头送到福州。我在福州跑了几圈，想找关系，但结果一无所得。没过几天，曾宗彝来了，他一家人就在福州住下了，等候任职。我以为这下可得放我走了，没有想到这家伙留我给他做饭。不久，曾宗彝被任命为永春县监狱典狱长。他叫我跟他去当文书。我不愿意去。我心里想，这家伙老是缠住我不放，这怎么能行，一定要设法摆脱他。但是，我找了许多理由推辞不去，结果都未成功，而且他又用威胁的口气逼着我去。再就是我的脚走长路还不行，要坐车走又没有钱，当时要离开福建还有困难。所以，我又答应了他。

永春县监狱比尤溪县监狱大得多。这里关了有二百名各种犯人，有匪犯（即土匪），有烟犯（即鸦片烟走私犯），有政治犯。这个监狱是一座极黑暗的监狱。号子里脏得很，苍蝇、臭虫、蚊子多极啦。犯人流行病很多，不要说洗澡，连喝水都困难，也不给理发，一个个长发污面，骨瘦如柴。看到我们一些同志在这里受这样的折磨，我确实目不忍睹。怎么办！我外边找不到关系，眼下解救他们，我还没有力量。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地方，只要有条件都要为党工作，要开展活动。因此，我就着手找几个基本群众，做做工作，视情况能否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经过多次接触和慎重选择，我选了两个人作为建党对象。

一个是刘麟（又叫刘本彪），这个人是山东人，父亲是“二七”大罢工的参与者。父亲死后，在家无法生活，就出来逃难。到了福州，通过他表哥的关系，安排到这里伪县政府作勤务员。在谈话中，知道他对国民党不满。刘的表哥是福州市闽海税务局的一个课

长。该局需要税警，他表哥来信问他去不去福州。他当然愿意去。刘麟后来就到福州去了。

还有一个是王士焜。他是湖南人，大革命时期，湘赣两省的革命斗争，他虽然没有参加，但耳闻目睹。因此，对工农革命有一定的了解，比较同情。也是因生活所迫，逃到福建来的，在永春当警察。他既是法警，又是交通警，在永春县活动很方便。

这两个人我们常来往。但要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还需要进一步接触和了解。就在这时，这里突然发生一件事，我必须得设法离开这里。一九三七年三、四月间，永春县监狱发生越狱事件，跑了十几个政治犯——都是永春县地下党的同志。此事好得很，我非常高兴。但伪县政府把曾宗彝扣起来了。我想，这家伙为了自已脱身，肯定会把我抛出来作他的替罪羊。我决定逃跑。可是，我的脚伤还未好，走不了长路；坐车嘛，也不行。因为我一跑，他们肯定会通缉我，到时只要在码头、路口一堵，就肯定会抓到。怎么办？我就去找王士焜商量，请他给我搞个路条。

王士焜考虑了好久。他说，路条倒是容易搞，但你这个脚怎么走得呢？我说，“不行，我一定要走。”王士焜决定警察也不当了，拼着生命，送我离开永春。我连行李都不拿了，坐在王士焜的自行车货架上，匆匆忙忙地连夜从永春逃到了厦门。到了厦门，王士焜卖掉了自行车，买了船票，我们俩到了福州。

果然，我走了以后，永春县就通缉我。到了福州以后，我们就去找刘麟，请他表哥想办法，给我们找个差事干。过了几天，刘麟告诉我们工作找到了，但只能安排一个人。我和王士焜就推让起来。王士焜执意不肯，坚持要我去。他为了我，已经把警察的差事丢掉不干，自行车也卖掉了，我很过意不去。我就让他去。我们俩你推我让，坚持不下。王士焜诚恳地说：“冠雄(我被捕后就用这个名字)，我们相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感觉你不是一般的教书人，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暂时先留下，我回家去，我回去比你要好些，至少不会杀头。”我向前抓住王士焜的手，激动地说：“谢谢你，王士

焜同志。”

王士焜同志回去没有路费，刘麟就卖掉了他多年积攒买的一个金戒指。王士焜走的头一天，我们在福州一个偏僻的地方坐下来话别。我们本来是萍水相逢，但是他为了我，丢掉饭碗，冒着危险，送我逃生。在这患难知己面前，我还有什么不可以说呢！同时，他已察觉到我不是教书的了。我就如实地对他说，“我的真实姓名叫方志纯，是红军，是共产党员……你是湖南人，我是江西人，我们是异乡相逢，患难之交。以后，你如果要找我，可以到延安来找，我是一定要到延安去的。”

他握住我的手说要我多保重。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十多年，直到全国解放了，他在报纸上知道我在江西工作，才到江西来找我。

我在闽海税务局当差，任贴票员，每天就是贴贴税票，事情很轻松。但是，全国已掀起抗日的高潮，我党我军在华北第一线同敌战斗，我怎么能在这里呆着！一有空我就到福州市图书馆去，翻报纸。了解一下全国的形势。同时，也想看看能否从报纸上找到福建党组织的蛛丝马迹。没有想到，党没有找到，同志没有找到，却看到了宋清泉、彭祐在报纸上登的“反共启事”消息。看到这个消息时，我都呆了。军区的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叛变了，闽赣省的党和军队一定要受到更大的损失了。后来我知道，宋清泉、彭祐这两个家伙，为了向反动派表示他们反动的决心，还把省委书记钟循仁同志骗到荒野之地杀害了，作为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的见面礼。

事情总是那么偶然，真是无巧不成书。一天，我去福州一家温泉洗澡，我刚进来坐下，正在准备脱衣服，突然看到彭祐衣冠楚楚地走进来。这时已经没有办法回避了。他感到非常突然地向前问我：“你怎么也在这里？”

“那年我受伤，你们丢掉我，后来我就一个人流落到这里了。”我正说着，宋清泉也来了。我一看，糟了！这两个叛徒，他们只要一个人缠住我，一个人报告，或者是两个人抓住我，往国民党那里

一送，我不就又完了吗？于是，我急中生智，向门口望了望说："怎么搞的，我们两个人来洗澡，还有一个人哪里去了？"我回过头给他们说："你们先洗吧，我看看去。"说完就往外走，赶快溜之大吉了。

真是冤家路窄，恶有恶报。全国解放后，一九五二年，湖南省政府副主席袁任远同志到庐山，有一天在闲谈中，我无意中问道："你们湖南有个彭祐，你知道吗？"袁任远同志说："知道，黄老(黄克诚同志)把他安排在民政厅工作呢！"我听了大吃一惊，这家伙还活着。我把知道的情况告诉了袁任远同志。袁任远同志听了也大吃一惊，连忙告诉湖南省委。经过调查后彭祐被捕了。审问时，他供认不讳。结果，彭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宋清泉呢，他是瑞金人。解放后，有一次开会，我问赣南行署主任钟民同志知道不知道这个人的下落。我并把宋清泉的情况告诉了钟民同志。钟民同志回去一查，这家伙还隐藏在家里，经过查实，给了他应得的惩罚。

这两个叛徒在福州的出现，促使了我必须迅速离开这里。我把刘麟同志找来研究下一步如何办。这时刘麟同志经我介绍已入了党。同时，我们还物色了三、四个发展对象。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裁缝家里还设了联络点，定期接头，研究问题。

我把彭祐、宋清泉的情况以及在福州相遇的情况向刘麟同志介绍了。我们商量，决定还是走。但没有路费。于是，我就用乳名写了封信给我姐姐，请她设法给我寄点路费。我姐姐又将此信转给我哥哥方远勋。哥哥见了信，着急得不得了。再困难也要设法搞钱。结果，卖了几亩青苗，凑了五十块钱给我寄来了。可是还不够我两人的路费。我们决定一路上省吃俭用，就是讨饭，也要一起走。

正在这时候，一九三七年夏，我在报纸上看到成立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消息，办事处主任就是曾经在闽赣省军区领导过我们的叶剑英同志。我高兴极了。立即写了封信给叶剑英同志，简单地说了我在福州的情况。叶剑英同志很快就回了信，并给我寄了五十块钱。我拿到叶剑英同志的信和寄来的钱，激动得两手发抖，热泪盈

眶，我屏息静气地凝视着北方，党啊！我可找到你们了。

我和刘麟同志的路费都解决了，我们向闽海税务局消了差，就远走高飞了。

一九三七年九月，我和刘麟同志到了南京。

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叶剑英同志和李克农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以后，我们经西安到了延安。一路上，我将在福建的情况，向组织上作了口头汇报。但是，由于到延安后没多久，我就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所以没有写出书面材料。刘麟同志去抗大学习。后来，解放战争时，刘麟同志在东北牺牲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一天，毛主席在他住的窑洞里接见了我。在谈到闽赣根据地失败的原因时，毛主席问我："听说，闽赣苏区这次出现了好几个叛徒？"我向毛主席报告说："是啊！省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祐，几个主要领导人都叛变了。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闽赣苏区不能坚持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毛主席点了头表示赞同。

十二月，朱总司令接见了我。朱总司令要我谈谈南方根据地的情况，他特别问了闽赣根据地失败的原因。

我向朱总司令报告说："红军长征后，闽赣根据地的力量就显得很单薄了。我曾提出，应该向闽北靠，那里有黄道同志领导的一支武装，群众基础好，地形又复杂，坚持打游击是有条件的。"

"对嘛！往闽北靠就好了。两块根据地打通了，就有力量了。"朱总司令说。

"可是，省委、军区几个领导人不同意：他们主张往闽南进攻，开辟新的根据地。结果，不仅没有在闽南站住脚，而且由于宋清泉、彭祐等人叛变，最终使军队垮了！地盘也丢了。"朱总司令听了以后，心情很沉痛，在窑洞里来回走着，但没有说话。

想起失去的根据地，想起牺牲的同志，我心里很难过。朱总司令安慰我说："革命是艰难的，道路是曲折的，牺牲也是难免的。吸取教训吧。"

# 北上抗日与坚持三年斗争的回忆

（一九四〇年写于皖南）

刘　英

## 一、当时所处的环境及中共中央的新政策：

远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保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任务。

一九三四年中共五中全会更有进一步的重要指示：“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与国民党的无耻投降，给了我们以良好的机会去加强和扩大群众的反帝斗争，党必须坚决的为着创造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而斗争。这个统一战线必须依据在明了、通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纲领之上而在一切反帝斗争的形势中实现起来，并在这一统一战线之中，加强与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

一九三四年四月，中共中央给各省、市委一封指示信中同样正确地指出：最近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整个华北的急进，英帝国主义对于川、康、新疆班洪的侵略，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积极的活动与××党法西斯蒂最露骨的投降和出卖，表明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新的最严重的关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正以哀的美敦书的方式提出占领华北统治中国的条件，与卖国贼黄郛、汪精卫、×××等谈判。这一谈判在南昌会议以后已经具体化，有吉在上海与黄郛的会面及其进京的任务，就是最后确定这谈判的内容，与这一谈判同时进行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疯狂的军事行动，现在华北已经充满了日本与满洲国的军队，及其他各种各式的武装力量，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示威计划布置正表明整个华北与全中国的劳苦群众，都直接处在帝国主义炮弹刺刀的威胁之下。最无耻的×××，已经答应了日本帝国主义一切的要求，目前正以种种武断宣传来掩饰这一露骨的大出卖，一面否认华北形势的严重，要全国民众不要“大惊小怪”，同时拚命宣传中国无力抵抗帝国主义来证明他出卖中国签订卖国条约是“合理”的。他以“复兴民族”的口号来麻醉群众，进行所谓“生产建设”“文化统治”“新生活运动”等等转移广大民众对于他卖国投降的愤怒，并以此为“围剿苏区”压榨工农劳苦群众的旗帜，不仅如此，他现在公开的颂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雄飞东西”的威风，积极实行他与日本帝国主义所订立的反苏的军事同盟的密约，恭请傅仪入关，将黄河以北的区域作为觐见礼。在允许自治的名义之下，把内蒙古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藉口“开发西北”“整理边疆”派遣大批爪牙和武装深入陕、甘、新疆，镇压弱小民族，以执行日本军阀荒木的西进政策与英帝国主义反苏的阴谋企图，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先锋，干涉外蒙共和国，从那里侵入苏联的领土，另方面，在“复兴民族”的口号之下，拚命的厉行法西斯蒂化与白色恐怖，企图造成民众对××党新的幻想，并将广大劳苦群众反帝反×××的斗争，沉没到血海中去。

中共中央鉴于当时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亡国灭种的条约接踵而来，不仅及时的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不战胜日寇，不驱逐日寇出中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极端困难与残酷的五次围剿中，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实行对日直接作战，故虽处在极端严重的情势中，特别是残酷的五次围剿中，仍本着为国忠诚、忍痛牺牲的精神，从前线主力红军中抽调红七军团为中国人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实行它北上抗日的任务。另方面，通电号召国内外男女同胞、各党派、各阶层、各友军、各地各级党政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挽救当前的民族危机和争取主权领土的完整。

高举鲜红旗帜而行动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全体将士，本着忠实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与党的事业，抱着英勇而又顽强的斗争精神，遂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由红色首都瑞金出发，实行它郑重而又光荣的北上抗日任务。正因为红七军团在行动上、政治上表明了自己的先进与抗日模范的先锋作用，它不仅冲破了南京政府首席顾问赛克特的堡垒政策，而且给了尾追与拦阻北上抗日先遣队去路的军队以严厉的打击，它得到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军队及各阶层的先进人士热烈的同情与拥护，同样的它得到世界先进人士的同情和赞许。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者与组织者，它是中华民族不会亡的模范战士与对日作战直接的先锋队，它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业已写下了光荣的一页，留下了永垂不朽的声誉。

这正如洛甫同志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论文中所指出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自它产生之日起，直到今天，始终为了民族的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而英勇的奋斗着，不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动，以及它处在何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之下，然而它总是向着这个总的目标前仆后继地奋斗着"。

## 二、中共中央给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

（一）党中央与军委会派遣七军团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与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红七军团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下，经过福建而到达浙皖赣边行动，号召与组织一切抗日的友军，抗日的人民以及广大先进的人士，一致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在七军团肩上放着繁重与光荣的军事政治任务，（关于军事任务详见作战命令）而且政治任务更加重大。因此先遣队必须在党的彻底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口号之下，宣传发动与组织广大民众进行各种各色的反日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

（三）高举着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

先遣队——编者)的旗帜而行动的七军团应在自己的行动中，最明显的表明着自己是有组织的、英勇的、守纪律的、先进的民族革命的先锋队；应该以自己的英勇行动，坚韧不拔的意志及加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去告诉和指示最广大的劳苦工农群众，怎样才能够进行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挽救当前的民族危机，争取主权领土的完整。

(四)如果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与土地革命分割或对立起来，将是极端的错误。七军团在自己的行动中，应该表明自己是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五)为着保证七军团肩上的伟大的政治与军事任务的完成，必须高度地加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与政治水平；提高与巩固部队的纪律，必须与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作严格斗争；应该不倦息的进行吸收积极的革命分子加入自己的队伍；应该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及在胜利的作战之中，扩大自己的部队。并由中央代表及军政首长组织军团革命军委处理一切政治与军事的问题。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形势变动与处在艰难困苦环境中，总是朝着这个总的目标前仆后继地奋斗着。它处在当时极端残酷的五次围剿中，始终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不屈不挠与艰难困苦的奋斗。

## 三、北上抗日的经过及几次主要战斗的检讨：

中国人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忠实地接受了中共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所给予它的北上抗日任务之后，便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由红色首都瑞金，在万民欢呼的护送中，开始了它北上抗日的行动，经长汀、清流，占领大田县，继向闽清前进，渡过闽江，占领古田县城，胜利地到达闽东游击区域，分驻于连江县属的桃源之线。经数日的休息，整理与动员后，则向福州城进拔，这一行动的主要意义，是为了进一步号召全国友党友军各阶层的先进人士，一致响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配合

主力红军反抗敌人五次围剿。但由于先遣队本身存在着某些弱点与当时所处环境的关系，围攻福州的战斗经三昼夜之久。终于自动的退出战斗而回师闽东游击区域，整顿本身与加强闽东党及闽东独立师党政军的领导。特别是检讨了闽东过去的工作与给予今后工作的指示。

根据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红七军团是可以攻克福州的，但当时为什么没有攻克呢？主要的原因如下：

（一）战斗的布置不够周密，侦察工作做得太差，以致影响整个战斗和兵力上的使用。对于福州周围的地形地物不了解，以致对于部署的布置与兵力的使用不适当，如当时将主力用于西南门，但西南门方面不仅有十九路军闽变时所建筑的强固的堡垒，同时绕城的内河与湖泊，是很多的；在东北门方面，不但城墙业已拆去，且飞机场亦建筑于该地，同时内河湖泊也极少；假如当时有可靠的同志或群众引路，以少数的兵力佯攻西南门，而以主力攻击东北门，是很可能攻克福州的，因为当时福州城，仅有王敬九的两个团和一些毫无战斗经验的警察，就是王敬九部也是先遣队沿途击溃的败兵，且士气与战斗力亦不强，特别是部队中不愿意与先遣队作战的情绪相当的普遍。

（二）当时福州周围党的组织是异常薄弱的，特别是福州市的工运薄弱，致未能取得当地党与福州市工人更多的帮助和适当的配合，以致先遣队围攻福州三昼夜之久，始终得不到各方面的消息，而影响到七军团的军事行动与围攻福州整个战斗任务的完成。由此可见党与群众力量的伟大及其配合军事行动的重要性。

（三）几个主要干部不够团结，影响到意见的不一致，另方面，对军委给七军团围攻福州命令的了解亦是很不深刻。如认为军委会只要先遣队“相机占领福州，而不是肯定占领福州的任务”。同时叛徒曾洪易当时身为中央代表，不仅毫无意见提出，且处处表示没有决心战斗，此外，×××与×××两同志之间，亦缺乏同志态度，以致不断的闹私人意见，是极不利和不该的。

（四）攻打城市的经验还是很差，政治上动员也做得不够，虽然红七军团有攻击打沙县、尤溪等城市的经验，然而攻打尤沙城市与进攻福州的过程中，有着许多不同的情景（如时间不允许久战，准备工作不充分，友军的配合以及环境等等），另方面战斗的政治动员亦缺乏深入和普遍。特别是政治工作的动员与军事行动的配合上做得很差。

围攻福州的战斗自动撤退后，经一礼拜的整理与训练，开始攻占罗源县城与袭击宁德县；另一方面分兵占领西洋镇与木洋镇，继行经梅溪、下庄，一举而攻克浙江属之庆元县城。翌日与浙保三、四两团遭遇于竹口，由于先遣队全体将士英勇善战及指挥上的灵活，经数小时猛烈的攻击，卒将凭险抵抗浙保两团打得溃不成军，使蒋志英（浙保副处长）不得不深夜逃窜龙泉城。是役缴获迫击炮两门，机关枪十余挺，长短枪四百余支。活捉庆元县长×××。当日进至小梅镇宿营，翌日本可乘胜进占龙泉县，在有利的条件之下，打击尾追先遣队之四十九师。但由于军团首长战斗意志的不够坚强，进至龙泉八都镇经觉溪，经忠信衔与四十九师接触，此时极大多数指战员作战情绪非常高涨，且有闽北苏区的依靠。但由于军团首长不愿作战，终于是日进驻闽北浦城县属之古楼，部队休整三天，另方面对闽北党工作上作了指示。

寻后接到中央和军委的指示，责成中央代表与军团首长派遣得力的游击部队在闽浙赣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号召与组织广大人民一致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善人民生活，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另方面应以极大的力量去破坏浙赣铁路，以使先遣队任务顺利的完成。除由先遣队留落一个营于该地长期行动外，主力经江山县属之廿八都仙霞岭石门而进占清湖镇，并派出两个营分途的破坏浙赣铁路，继则集中主力攻克常山城，缴获颇多，并得很多军用品。继经浙江边界之白沙关童家坊，石人殿而进驻重溪，除检查了先遣队由瑞金出发至闽浙赣苏区时，党政军及居民工作外，则以全力整顿补充与训练自己的部队属员及解决七军团几个主要干部间某些无原则

的纠纷，特别是关于叛徒曾洪易对先遣部队不负责，及毫无作战决心的机会主义动摇的倾向，加以彻底揭发，同样的指出了军团首长对于中央及军委命令的执行表现不重视之态度与失去自己战斗信心之表现，是极端错误的。越数日，中央及军委责成闽浙赣省委负责人，红十军团之领导者，中共的优秀干部，民族英雄方志敏同志组织更强有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并且布置捍卫闽浙赣苏区之工作。经闽浙赣省委几个负责者及先遣队几个主要干部会商后，除布置闽浙赣边党政军及群众工作外，当时对于各方面主要干部的配备是：闽浙赣省委主要负责者曾洪易，组织部长关英同志、青年兼宣传部长胡仰山、先遣队军团长刘畴西、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原七军团改为十九师，十军团改为廿及廿一师，十九师师长寻淮洲；政治委员兼主任聂洪钧、参谋长王如痴；廿师师长、政治委员则由军团长、政治委员兼任；廿一师师长胡天桃。各级干部配备就绪，闽浙赣苏区反敌人五次围剿的计划布置完毕后，十九师作为先遣队，军团政治部亦随十九师行动。经怀玉山及德兴县之东北，深夜兼程的袭击了常山县，但因敌情变动，经芳村而到达白马，当日得到情报，蒋志英率浙保两团业已尾追于后，于是决意给其严厉的打击，由于十九师英勇善战，蒋志英败退回常山，我先头部队尾追至芳村，蒋志英手部受伤，是役缴获颇多。于是经上坊，渡过新安江向分水县前进，距分水县城约四十里之处，与补充王旅遭遇，经先遣队猛烈的冲击后，将敌全部击溃。但因敌情与任务的关系进至河村，从距徽州府仅十里的地方走过，该城当时只有驻兵一连，沿途群众纷纷请求先遣队打徽州，但因部队过于疲劳，且预计敌人增援部队可能赶上，于是经绕溪县附近一举而攻占旌德县，缴获军用品及西药颇多。翌日，经大坟与泾县宣城之间威胁芜湖，后得军委及军团首长命令，要十九师（即红七军团）回师黄山附近与主力汇合，于是经青戈江、章家渡、茂林、铜岭太平县附近，在新村与主力汇合，并经中央批准以方志敏、乐××、刘畴西、涂××、刘×五同志组织政治委员会，以方志敏同志为书记，该会

职权是闽浙赣皖及先遣队行动区域中党政军最高的领导机关，另方面重新的配备了团以上干部，一切问题布置就绪后，经黄山到达古竹溪，翌日经汤口黄山脚抵谭家桥宿营，是日得到情报：南京政府为防范与拦阻北上抗日先遣队去路，以"避免国际纠纷和听闻起见"为借口派遣了五个正式师、两个独立旅，另浙皖保安团四个团，采取"煮豆燃箕，自残同种"，以及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的政策，企图一举而扑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者与组织者——中国人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当时对方的布置：两师另一旅和两个团沿京芜铁道向徽州前进，一个师及补充王旅则经南陵、泾县、太平，沿汽车路向黄山前进，另两师两团则经青杨、石×向祁门黟县前进。当时政委会讨论的结果，认为左右两翼之敌则以皖南独立师及游击队牵制它，主力突破敌人中央纵队，同时左右两翼之敌靠得很拢，中央纵队之主力在八时内不能赶上前卫队是补充王旅。且补充王旅经我军于分水县附近击溃后，不仅士气低落部队的疲劳现象亦很普遍；另方面，在分水县附近作战时，抵我十九师与之对抗，尚被击溃不成军，以此我们以三师之众来攻疲倦溃败的独立王旅，不但在兵力上占着绝对的优势，且地形、群众条件及士气亦利于我军作战，若中央纵队被我突破，则集结主力配合皖南地方武装及独立师打击与消灭敌人之右纵队，翌晨一时半出发，离谭家桥十里之处布置埋伏侧击战斗，当时我军部署的布置大略如下：

随军教导团的地雷挨丝炮队，在正西沿马路两旁布置适当的地雷与挨丝炮，如未发现我主力埋伏于两旁，直待敌人进入火网内，才采取一致的动作给敌人极大的杀伤；否则需待主力打响后，才从正面动作，十九师埋伏于左翼侧的第一线，主要的任务是：正面或廿师或廿一师打响后，十九师应以全力截断敌人的归路；另方面如敌人向太平县溃退时，十九师应以主力尾追该敌，廿师、廿一师则集结于十九师的右翼。他的任务是：如敌人向正面前进而未发现我主力时，直到我正面部队接触与沿马路之地雷挨丝炮打响后，廿一

师则同时出击消灭敌人于黄山脚附近，当我部队布置完毕后，约上午十时的光景，敌之先头部队向两边搜索前进，此时我高级指挥员已饬各部待敌行进时才开始动作，不料部队走火三枪，引起敌人注意，于是敌人立即集结部队，并派部队占领沿马路的阵地，此时我廿师及廿一师不听军团号令，加之出击动作不一致，结果十九师只用兵力一个连，廿师及廿一师由于野战经验太差，动作又不一致，而影响整个的战局，这一十分有把握消灭补充王旅的战斗，竟形成对峙的战局。特别是在此次战争中，大部分的主要干部负伤与阵亡，如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同志（即前七军团军团长）负伤，伤过重，经数日后光荣的牺牲了，政治主任刘英同志亦负重伤，乐同志因愤于主要干部负伤过多，竟带保卫队一排人向敌人反攻而胸负伤。廿一师政委负伤，师长阵亡，军团保卫局长周群同志亦于分水之役负伤截去右脚。正因为如此，致谭家桥战斗后，全军党政军的工作而处于停顿的状态，以致作战的意志大为削弱，特别是×××同志作战决心的不果断，军事行动的迟缓，致引起极大多数的红色指战员非常不满，甚至有因军团长不愿战而痛哭的，兹将此次战斗不能取胜，主要原因作如下的概括：

（一）轻敌的观念：当时在部队中是普遍的现象，认为补充王旅是不经一击的部队，不是我们的敌手，以至骄傲自大和轻敌，这是兵法上说的"骄兵必败"的教训。

（二）动作不一致，尤其是不服从军团号令致遭敌各个击破，这证明服从命令听指挥是革命军队战胜敌人的主要条件之一，否则不但不能战胜敌人，而且会吃亏以至于自我灭亡。

（三）当敌人业已占领主要阵地，且我主力已退出战斗，凭着几个干部一时的热情反突击，这不但不能解决战斗，而且容易遭致失败。当时先遣队几个主要干部的负伤与阵亡，大部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所遭受损失。

（四）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这在红军中政治工作条例里业已指出了它的重要性。但先遣队自谭家桥战斗后虽然当时军团

政治部有聂××同志代理主任。涂××同志为副主任，然而当时部队中的政治文化教育几乎处于停顿的状态，特别是没有抓紧谭家桥战斗的经验与教训，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解释说服工作和动员工作，致使先遣队自谭家桥战斗后，士气一天天的低落，这将为历史上的教训。

（五）当时对于廿师及廿一师战斗力的估计是有不够的地方，特别是红十军野战经验差，经不起敌人的反冲锋和持久的战斗（因为红十军过去都在苏区内作战，对于使用地雷挨丝炮是有他独特的经验，但野战经验却很差）。在谭家桥战斗，军团首长认为廿师廿一师比十九师战斗力强的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十九师不仅在中央苏区有长期野战的经验，而且它经过了北上抗日的长期锻炼，它那种英勇斗争的牺牲精神与刻苦耐劳的作风，不但值得学习而且应该发扬。

谭家桥战斗后，经陶村附近，翌日与敌人一团人遭遇，本可一举而消灭其全部，由于军团长×××同志加油式的用兵（先用一营，打不过再用一营）结果，不但未能将敌人迅速的消灭，反而遭受到诸多不应有的损失，以致影响战士们的不满和士气的降低，此时引起了许多负伤的干部从担架上跳下来，要求率领战士们一同奋勇杀敌之举动。但由于主要负责者没有作战的决心，终于自动退出战斗，当晚商讨中央及军委的命令和指示。当时中央及军委给先遣队的命令和指示是：

1.先遣队应立即克服和纠正没有作战决心和斗志的倾向，特别是要从党的工作与政治教育上去着手，否则中央和军委给予先遣队的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2.先遣队应派一个得力师，酌量的派遣工作人员与适当的配备干部到达浙江长期行动，号召与组织广大的人民一致进入抗日阵线，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动广大的民众，改善民生，巩固与扩大自己的部队，一直到创立革命的根据地，同时应与中央军委及政委会保持密切的联络。

3.除充实皖南独立师外，应留两团以上兵力依靠皖南党与群众的力量，坚持该地的斗争与不断的号召和团结一切反日反帝的力量在自己的周围，作继续不断的坚持斗争。

4.其余的部队回闽浙赣原来的基本地区整顿休息，提高部队中战斗情绪与加强部队中党与政治工作，坚决而又顽强的保卫革命根据地。

5.中央及军委责成政委在部队中开展由上而下的不愿在白区行动与缺乏作战意志的斗争。提高全体指战员胜利的信心与发扬应有的自我批评。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从党的工作与政治教育着手，使先遣队迅速的克服和纠正今天存在着的不良现象与倾向，而特别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与战斗中来表明自己是先进的有组织的、守纪律的、抗日反帝与土地革命斗争的模范者、号召者与组织者。

当时接到中央与军委指示之后，讨论时有两个争论：甲、大部分同志主张立即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分头出动；粟、刘到浙行动，方志敏同志等回浙闽赣基本地区；乐××、刘畴西等同志率一师留皖南行动，其余部队随方同志回基本地区。乙、少数同志主张暂不分开，统回闽浙赣基本地区，将部队整理、提炼与重新配备干部后，再行分开。由于军团首长坚持后一意见，结果抛弃了第一方案，同意了第二个意见，这是不该的。

翌日二时出发后，计划昼夜兼程进至化、婺、德苏区(即开化、婺源、德兴之间的一块苏区，但由于军团首长认为敌人追赶不上，应以两天行程到达目的地，结果未按照原来计划而直到上午十时左右才开始出发，当日我先头部队已进至化、婺、德苏区（方志敏、乐××、刘×粟×等主要干部随先头部队行动）但刘畴西、王如痴等同志竟迟至翌日午后才到。此时我先头部队除派人与之联络外，并由方志敏同志以政委会负责人的名义，通知刘畴西等同志本日必须通过乐、常封锁线(即乐平、常山是也)至午后三时我先头部队将要通过封锁线时，接刘畴西同志来信，略谓"部队疲倦，本日不能继续前进"此时方同志接到刘畴西同志来信后，即召集了几个主要

干部会商，认为敌人的主力很可能追上，如今晚不进至基本地区，对今后任务的完成当遭到不少的损失；另方面，认为刘畴西同志那种“屎出不找茅厕”的作风非派一得力干部先往，协助主力通过乐、常封锁线，必然会发生诸多的困难，于是，首先决定粟裕同志回去随刘畴西同志一起行动（因乐少华、刘英二同志此时伤势尚重，不能随军行动）后因志敏同志坚持自己随主力行动，要粟裕同志率领先头部队进入基本地区，同时明晚可以汇合；另方面，方同志指示前卫部队，明晚配合地方武装掩护主力通过乐、常线。于是粟、刘、乐三同志随前卫部队行动，志敏同志回去随主力行动。翌晨，我先头部队全部到达基本地区，除通知志敏同志我们业已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外，并根据其指示布置掩护工作，不料主力到达封锁线后，闻敌人堡垒枪声复又折回，且来电告诉我们，明日另走一封锁线通过，谁知数日未闻主力消息，于是除派遣大批当地干部通过封锁线并迎接主力外，并派遣游击部队分头出动，骚扰敌人，后据逃回来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指主力)曾经接连的通过七次封锁线，始终由于决心的犹豫，竟将全部折回。结果，化、婺、德的苏区日益缩小，粮食根本无法再找，有的饿了三天未食粒米，有的吃草根树叶，但战士们始终规劝高级首长，应不顾一切牺牲的冲过封锁线。但由于军团首长的决心不够和认敌封锁线是铜墙铁壁，竟宣布有本事的自找方向出动。可是由于时间的延长，不仅敌人主力全部赶到，且将皖、浙赣之保安团队亦集中封锁线之周围，以致敌人使用包围战术，逐渐缩小基地，且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特别对粮食的烧毁更尽其能事。这样一来，将近万人的部队，围困于荒山僻野间，且又各自为政的毫无中心主张，试问将何以能战胜当时艰难困苦的恶劣环境呢？

## 四、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受惨痛损失及其所得的经验与教训：

当先遣部队进至化、婺、德苏区时，敌以十师之众围攻半月之

久，除某些干部（如李素实、李素、王天龙、钱××等同志）坚决的率领部属，突破敌人重围，回到皖南（有的回到闽浙）配合独立师（当时皖南独立师师长匡龙海）和地方武装坚强的继续行动外，极大部分遭到惨痛的损失。当敌将要解围时，方志敏同志在广大民众拥护和爱戴之下依然无恙。不料方同志的特务班长叛变，竟告密而遭被捕（方同志被捕后受尽了一切非人道的拷打、辱骂与各种各色卑污无耻的欺骗和利诱，然而方同志本着"头可断而志不可屈"的精神，始终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与痛骂民族败类不已。他以共产党员大无畏精神，严正的打击了帝国主义的走卒和民族的败类。他在任何严厉监视与非人道的污辱中，始终站在民族英雄的立场之上，指示与告诉广大的人民，唯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华民族不致灭亡，中国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与出路。他处在极端的困难的囹圄中，对党的事业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始终念念不忘。他在牢狱里不断的指示闽浙赣的党及全体将士和广大的人民应如何坚持斗争，和继续不断的号召与组织全中国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军队、党派，以及各阶层先进人士一致的进入抗日民族阵线，同时，只有这样，才能挽救民族危机，争取主权与领土的完整。方同志虽遭不幸的屠杀，光荣的牺牲了，然其伟大的人格与不屈不挠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方同志的损失不仅是我党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为了检讨过去勉励将来，兹将先遣队遭受惨痛损失的主要原因及其经验教训略述如下：

（一）坚决的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决议是完成党与上级所给予我们的任务，顺利的进展与完成的主要前提。先遣队当时遭受空前的损失，就是由于对中央及军委的命令与指示的执行表示不坚决。假如当时能够坚决执行中央与军委新的指示与命令，不但先遣队不致于在化、婺、德遭受空前未有的损失，而且定能胜利的完成中央及军委所给予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这虽然已成为历史的教训，但在今天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应该警惕我党全体同志以及一切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人们。

（二）上下团结一致与高级指挥员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奋斗中不失自己的斗争勇气，和富于英勇果断与迅速的下达决心，这是革命的队伍，尤其是指挥员和负责者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的具备，要战胜艰险与胜利的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当时先遣队的几个主要负责者，就缺乏深刻的认识与了解这个重要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先遣队几个主要干部每日遇事相商或召开会议始终得不到好的结果。当先遣队自瑞金出发直到闽浙赣苏区为止，从未开过一次圆满的会议，不是你争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闹成打架。另方面，关于行动的决定，特别是作战任务的决定，往往一致的通过与决定了，转瞬间又来一个不同意，甚至有好几次打响了后又命令下属撤退，这不仅表示意见各殊，失去了自己的战斗意志，而且对士气的消磨与战斗力的削弱，亦是极端有害的。正因为如此，以致失去许多有利的时机和造成同志间互不信任与不团结的现象。

（三）部队中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假如忽略了这一点，不仅无法巩固部队加强部队中的斗争力，克服部队中一切不良现象与消除官兵间和军民间的隔阂现象，而且要完成上级所给予我们的任务，同样是不可能的。先遣队自谭家桥战斗后，由于几个主要干部的阵亡与带花，以致影响到部队中党与政治工作的停顿。结果士气一天天的削弱，部队中失败情绪因此骤增。如果当时在化、婺、德被困时，有坚强的党的领导与顽强的政治教育，在坚决果断的指挥员领导之下，是能够战胜当时的困难环境与挽救当时的危局。最低限度亦可集结坚强指战员，集中力量不顾一切牺牲的冲开一条血路，以往斗争经验教训我们，只要领导者不要失掉了自己的斗争勇气，再加上全军团结一致与党的领导正确，以及政治工作的顽强，是可以战胜任何困难而转到胜利的方面。

（四）广泛而又深入的开展反不良倾向的思想斗争是保证党内团结与思想一致的主要前提。先遣队在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与指示中，一再的表示犹豫和失去了自己的战斗意志，虽屡次接中央军委的电

令，责成中央代表在部队中开展由上而下的对上级命令与指示不坚决执行的斗争。然而由于叛徒曾洪易自己就是一个对中央军委命令与指示不坚决执行的典型人物，不但没有及时的开展这一斗争，甚至胡言："中央离我们太远，不了解实际情形"如果当时先遣队有较老练而又坚强的党的干部，坚决的开展与发扬我党斗争中极有历史意义的反陈独秀为首的机会主义的"八七"会议之斗争精神与四中全会击溃了立三路线的斗争精神，我们坚信不仅能够及时的克服自高级首长起以至部队的一切不良倾向，而且中央与军委给予先遣队的军事任务，特别重要的是政治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五）干部的配备适当与否给了我们极大的教训。这就是说：如果部队中党政军的干部配备不适当（地方干部亦不是例外）不仅会造成干部间互不信任和不团结的现象，而且对于任务的完成也是不可能的。这些教训虽已成历史的产物，但应该警惕与勉励我们将来。

总观上述，吾人认为先遣队虽不幸的遭到惨痛损失，致使北上抗日的神圣任务，未能全部的如愿实现。然而它不仅在行动上、组织上、工作上、战斗中表明了自已的先进及其模范的领导作用，同时，它在中华民族的解放史上，也已写下了最光荣的一页。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者、组织者，它是中华民族不会亡的模范战士与先锋部队。它战胜了许多艰难困苦与极端严重的环境，它指出与告诉了全中国不愿意做亡国奴的男女同胞，军队、党派以及各阶层的先进人士，唯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华民族才不会灭亡；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才能从水深火热的逼迫中解放出来，它不仅得到了全国爱国志士、军队党派以及各阶层先进人士的拥护与同情，同时它得到了国际友人及爱好和平的先进人士一致的同情与赞许。我们应以无限的热情与诚恳的态度来痛悼北上抗日先遣队死难的烈士！我们应以不屈不挠与英雄奋斗的精神，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踏着先烈的血路勇往直前的奋斗不息。我们要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向着投降妥协、分裂、倒退的现象搏斗，我们要在民族解放战争中，驱逐日寇于国土之东。我们相信只要全国上下

一致的坚持抗战建国的国策，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定是属于中国的。

## 五、挺进师的成立与胜利的到达闽浙赣边

北上抗日先遣队主力于化、婺、德遭到惨痛的损失之后，当时所处的环境异常险恶，不但敌人集中全力，企图一举而扑灭我闽浙赣边区基地，而且叛徒曾洪易亦乘机活动。他主张放弃原来的基本地区，秘密逃往闽北；他以苏区食粮困难迫使战士回家，遭受痛心的屠杀；他以"共产党应以身作则"的口号，强迫党的干部回到反动的家乡去送死；他以自卫队、游击队不会作战，且暴露目标的荒谬谬论解散成千成万的红军后备军；他在党内外散播先遣队遭受惨痛损失的失败情绪和所谓闽浙赣基本地区无法保卫的荒唐言论；他对中央及中央东南分局的指示与决议，一贯的怀疑与不坚决的执行。他是一个退却逃跑，对革命没有信心对上级的决议与指示一贯的不坚决执行的典型人物。他对于错误的接受，一贯的是采取口是心非两面派的态度。当时中央东南分局认为叛徒曾洪易已形成他自己的退却逃跑路线，责成政治委员会及闽浙赣省委开展反曾洪易为首机会主义斗争，并撤消他原来的一切职务，另方面要叛徒曾洪易向党申明和真正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待乐少华、刘英、涂××粟裕等同志进至闽浙赣基本地区时，闽浙省委在叛徒曾洪易的把持之下，不但没有撤消叛徒曾洪易的职务和开展斗争，反而以先遣队受损失为名，向党反攻。洪易路线的健将××、赵××等，亦极力赞助叛徒×××。此时因乐、刘两同志伤势尚重，粟同志需要顾及部队，于是要涂××同志代表政委的意见去说服省委以及其他干部，坚决的执行中央分局的指示，开展反曾洪易为首的机会主义斗争。不料涂同志此行不但无效，反遭曾洪易，胡芳等责骂不已。翌日，乐、刘、涂、粟诸同志到达省委所在地，并派人找关×同志回来（因当时关某同志出外巡视工作去了），另方面分别的说服了赵胡等同志，于是接连的与叛徒曾洪易等作了三昼夜的思想斗争，并改组省委与重新

配备干部。另方面要叛徒曾洪易在实际工作中去了解和认识自己错误的实质及其严重性，同时认真的克服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接着得中央东南分局的指示电，要闽浙省委组织挺进师到达浙江长期行动，兹将挺进师的成立及其胜利的到达闽浙边分述如下：

(一)挺进师出动时所处的环境及党的基本方针：

挺进师的出动，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上饶县属之灵山附近。当时所处的环境，正是××党及××政府和军队在蒋××及其首席顾问□□□堡垒政策之下，继续以堡垒线来更小分割东南各省苏区，建筑马路，便利运输，在封锁圈内扼要构筑据点，阻我转移，同时分兵以连营，其时以团为单位，进行分段的分进合击，施用奇击跟追，并组织反动的地主富农叛徒等为其清剿耳目。

当时党的基本方针是领导广大群众武装及独立营游击队，在自己活动的区域内，不断的进行顽强坚持的斗争，来粉碎××党××政府的清剿计划及其堡垒政策，准备适时大举反攻，彻底的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

此时我主力部队已进到川黔边，转入反攻形势，准备建立川黔边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自川南发展。虽然我主力部队——野军——沿途得到许多的伟大胜利，但××党××政府对东南各省苏区边区的进攻，不但没有放松，而且更加紧的企图根本消灭东南各省的苏区和红军，这是当时挺进师所处的环境及党的基本方针。

(二)中央分局给挺进师出动的任务：

中央分局根据中央政治局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的指示电，责成闽浙赣省委立即组织挺进师到达浙江长期行动。当时正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开化、婺源、德兴遭受到极大的损失，方志敏、王如痴，刘畴西诸同志，已被捕，反×××路线的斗争，正在开展着。当时中央分局给挺进师的主要任务，是经过闽北到达浙江，长期行动，广泛的游击战争，扩大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发动群众斗争，直到分配土地创立苏维埃新的根据地，以及建立党的组织，配合友军

行动，调动和吸引起大批的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及邻近游击区域，并打通闽东闽北的关系，取得工作上、行动上有力的配合响应主力部队的行动，彻底粉碎敌人清剿计划与五次围剿。

（三）挺进师到浙江行动的实力及其干部的配备：

闽浙赣省委接到分局指示电后，便组织了挺进师，粟裕同志为师长，刘英同志为政治委员，黄富武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宗孟平同志为组织科长兼地方工作科长，王维信同志为宣传科长，姚阿宝同志为特派员，王永瑞为参谋长，刘达云为供给部长，谢文清为没收委员会主任。当时挺进师的人数五百三十八人，长枪四百四十五条，重机关枪四挺，轻机关枪八挺。这些部队的组成是七军团的一部分，十军团的一部分，独立师的一部分，但因组成时间太短，加之部队中当时党内外的动员工作做得不够，部队出动时，潜逃回独立师近百名，于是将多余的枪支留落闽浙赣。到达闽北时与先遣队前留江浦一带行动之二个连汇合，该部人数一百五十名，长枪八十二条，轻机关枪二挺。这样一来，此数略可抵潜逃数目。

当我们进到闽北时，原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叛变了，电台业已失去了，这样一来闽浙赣及分局今后的交通联络颇成问题。为了加强挺进师的领导，以长期行动与便利指挥与工作起见，便组织了政治委员会，是挺进师行动区域内最高的党政军领导机关，以粟裕、富武、宋孟平、刘英、姚阿宝、王维信、洪家云、刘达云、方志富等九人组织之，以刘英同志为书记，部队组织亦有如下的变动：

1.将政治部工作人员、宣传员、保卫局工作人员、供给部人员、工作团等编为政治连，但各个组织的领导系统及组织的独立性，仍然保持着。为使得生活、领导之集中和减少什务人员，增加自卫力量，养成政治工作人员军事化。

2.将原有之部队，按其战斗力之强弱及各个作风的不同，编成三个支队，并进一步的配备干部，各个支队设立行动委员会。这样一来，在任何环境中，均可分散集中，且行动轻便，作战便利，领导加强，工作效率增加。

（四）挺进师胜利的到达浙江：

挺进师于闽浙赣基本地区出动时，正是敌人加紧封锁与积极进攻的时候，然而挺进师全体将士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万众一心，团结一致，英勇果断，敏捷迅速地仅以八小时深夜兼程的通过了敌人六道的封锁线，与胜利的渡过信江，翌日进至闽北苏区之基地。

挺进师进到闽北苏区后，除加紧部队中党政军的教育外，并配合闽北红军给敌人清剿部队以数次严厉的打击。为了挺进师与闽北的党和红军取得工作上、行动上更有力的配合。当时与闽北几个主要干部（如曾绍铭等）会商了今后彼此间的联系与配合，以及提供了对保卫闽北苏区之意见。

挺进师全体指战员本着英勇牺牲、艰苦奋斗、团结一致的精神，遂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从闽北基地出动，胜利的到达龙泉以西地带，并争取了第一次战斗的胜利，和得到了许多情报与敌人部署的布置。兹将敌我的计划，分别的简述如下：

（甲）对方的计划：

A、军事方面：

1.以浙保的两个团及龙泉的独立营，龙泉、遂昌、江山之保安大队配置龙泉、浦城、遂昌之线，以我军深入内地。

2.如粟、刘部队进至龙泉、庆元、浦城之线，除原该地部队，极力堵剿外，并配合松、政、建、浦之部队及浙保进攻闽东之部队二个团，协同合击而歼灭之。

3.浙江素为太平丰裕之区，绝不许粟、刘部队深入内地“骚扰人心”“破坏秩序”影响整个清剿计划。

4.派蒋志英驻守龙泉，为该区保安司令，若粟、刘部队进至浙边时，在该地区之部队，均归蒋率领“进剿”。

B、政治方面：

1.限三月底完成保甲计划，清查户口，特别要防止“匪犯”混入。

2.利用豪绅地主、富农、流氓分子到处造谣，说红军已消灭干

净，并将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等同志的象贴各地，以表示“剿匪”的胜利。

3.利用叛徒大发宣言、传单、标语，说国军如何的“好”，如何的“优待”，当红军如何的“苦”，如何的没有“出路”。

4.严令各区、乡、镇长、保甲长，对群众进行武断威吓的反宣传，不论任何人帮助红军带路者杀，报告给红军消息者杀，分了富户的东西者，除将物交还外，应受严刑，藏“匪”“住匪”者杀，知匪不报以通“匪”论罪等。

(乙)我们的对策和计划：

我们在闽北出动时，业已与闽北的党开了个联席会议，除会议中对闽北工作提出意见外并商讨了今后通讯及工作配合地区之打通和建议闽北分区委应迅速的组织游击队，挺进到顺昌，将乐，光泽之线及松、政、建等处，形成有依靠的闽东闽北、浙西南三角形的发展形势。当挺进师，进到浙边时，根据各方计划及闽东与中央失去联络，有将最近中央之各种决议，及策略路线的转变和指示等转给闽东之必要，另方面则感觉闽东闽北在数年斗争中，还未取得联络，于是决在庆元、政和、松溪、寿宁、屏石间活动一个时期，首先将闽东闽北之联系，来一个迅速打通和配合友军行动，使浙江当局的计划归于失败，同时相继与闽东的党商讨今后的配合与联系等，此外定出了如下的给各支队分散工作的任务。

A、政治任务：

1.在短期内将自己行动区域内之反动势力及反动分子与地主武装、土匪民团干部等迅速解决肃清。但须注意策略的运用与阶级路线及群众路线之执行。

2.运用各种各式的方法广泛的扩大党与苏维埃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不断的揭破一切反革命派别之各种各色的武断欺骗的宣传，尤其是要在自己的行动上、组织上表现自己是先进的军队。在一周内要做到自己区域内的群众不会逃跑，且处处表现同情我们，拥护我们，帮助我们。

3.彻底的将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财产分发给广大的工农群众，并积极的领导灾民斗争。

4.在斗争中物色先进的工农分子团聚于党的周围，普遍的建立各种革命的组织（如工会农会、红军之友、交通网、侦察网、互济会、抗捐、抗税斗争委员会、灾民斗争委员、粮食斗争委员会等等）。尤其是要迅速的恢复与建立各地党团的组织，但在整个工作的进行中，务须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形定出具体的实际计划。

5.在党彻底分配土地的口号基础上，必须防止借口条件未成熟在土地斗争中的尾巴主义；另方面，对整个形势估计不足的“左”的盲动行为亦是值得严格之注意的。

6.在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中，应注意分出和组织新的游击队与游击小组、配合与领导各地区的斗争，创造新的游击区。

7.扩大与巩固部队的工作，是我们目前政治工作中心任务之一。因此除加强各支队领导、政治教育文化娱乐工作、卫生清洁运动以及改善管理教育外，在两月内，每个支队应扩充到充实的营，但需讨论具体的执行方案及方式方法等。另方面造成广大群众自动参加红军的热情运动，尤其是要号召每个党员及战士们为巩固与扩大自己的部队而斗争。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应进行充分宣传解释与教育工作和定出竞赛的计划。

8.瓦解敌军的工作，是我们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除由上而下的建立真正的系统外，必须讨论与布置具体的执行方针和选择大批的人材，给以相当的教育，要将这一工作列上我们议事程序上的第一位，并造成广大群众的热烈运动。

9.教育干部培养干部提拔和引进大批干部是一个很迫切很重要的任务。尤其是在目前这种艰苦斗争环境中，创造大批独断专行、灵敏活泼、忠实于苏维埃事业的干部，更是迫切的需要，同时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目前斗争之需要。

10.关于部队的本身教育，必须无间断的进行，而且更需要抓紧部队中许多实际材料，利用事实对照与正确的批判来教育自己的

部队。列宁同志告诉我们："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11. 要保证红军中思想、行动的绝对一致和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与一切不良倾向、舆论、表现和行为作不调和的斗争。对政委制度的不满，在斗争中表现惊慌失措，退却逃跑，甚至背叛行为，应给以不失时机的彻底克服和肃清。

B.军事任务：

1.在一周内要将自己行动区域内之大小道路逐一调查清楚，并绘成路线图。

2.在自己行动区域内及其周围和附近，尤其交通要道市镇码头等处应建立普遍而又顺畅的交通网与谍报网。

3.在敌人进攻友军及自己时，必须积极的毫不犹豫的转到敌人的侧翼后方，与敌感觉最痛痒的地区上去行动，绝不能困守一地，待敌进攻。

4.彻底的破坏敌人的交通联络及其工具，但首先要充分的准备与侦察。

5.积极袭击敌人的仓库兵站和市镇，并收集必要的辎重与器材，在无法搬运时，尽量分散给群众外，应彻底的加以破坏或烧毁。

6.利用行军空隙，抓紧实际问题去教育自己的部队和教育地方武装，尤其是每一次战争和行动以后，必须来一个检讨，作为本身教育的良材，和加以实际的演习。

## 六、当时所获的成绩、经验与教训：

A. 挺进师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坚决的执行了中央分局的指示，它在这短短的一个半月行动中，开展了六、七县的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预先布置防备有计划的堵剿和分进合击的企图，尤其斋郎战斗，击溃了浙保的主力第一团李秀部和闽保第二团马洪深部，使闽浙边之敌，由进攻转到防守；另方面，发动了行动地区的广大工农群众，分发了豪绅地主之财产，建立了各种革命团体和某些地

区党的基础。尤其是在组织上行动上表现了自己是先进的军队，和艰苦卓绝的为党的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战士。

B．由于党的领导正确和全体指战员的团结一致，以及艰苦的工作精神，奠定了挺进师在浙长期行动与打通闽东闽北联系的良好基础；扩大了党与苏维埃及红军的政治影响；不断的揭发了敌人各种各色的武断欺骗与造谣中伤，使广大的工农群众在为自己的利益斗争中的更加认识与了解谁是敌、友，和怎样争取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的正确途径。

C．在实际行动中，斗争中，以我们的胜利给机会主义者叛徒们以有力的打击和铁一般的事实的回答，尤其是更加证实中央及中央分局派遣部队深入敌人深远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从艰苦的持久战争中，创造的游击区域与新的根据地的指示是十分正确的。同样的给了曾洪易为首的机会主义者严厉的打击，在此更加证实了，在党正确领导之下，只要党内外团结一致，坚决果敢机断专行及时克服一切困难和阻碍，以及胆大心细艰苦卓绝的去行动，在任何地区都能进行和开展新的游击基地以至革命的根据地。任何犹豫动摇，对白区行动全无胜利信心或认为某些地区没有工作基础，满脑子都是困难，以及悲观失望的情绪，都是丧失自己的坚强斗争意志，违背党正确指示，等于自我死亡，或徘徊歧途之下应有的行动。

D．正因为挺进师到达浙闽边后，采取积极勇敢的行动与具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给了进攻闽东闽北之敌极大的威胁与打击，结果敌人不得不从进攻闽北红军中抽调二团以上的兵力，另从进攻闽东苏区之敌全部(三个团)调来对付挺进师，这不仅对敌人“清剿”计划给以有力的粉碎，而且直接的保卫了邻近苏区和给广大群众以极大的兴奋。

E．在当时极端艰苦与困难的斗争环境中，自动的成立了政治委员会，不仅对挺进师的领导加强了，而且对整个工作的进行和布置以及策略路线的运用等均得到不少的成绩和转变，正因为浙闽边

的党有了这样地总的领导机关，所以不仅保证了挺进师和闽浙边长期的行动而且基本上完成了中央东南分局所给予挺进师的任务。

F．由于挺进师过惯了大兵团的生活，初到闽浙边分散工作和行动时，干部忙于找宿营地，调查路线和询问敌情．结果对本身教育未能好的顾及，以至预定的本身教育计划未能完成。

G．对居民工作的进行，因挺进师的同志大部分做惯了大兵团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结果以连排分散行动缺乏群众工作经验。另方面还没有发动全体指战员自动的参加群众工作。

H．对保甲长大刀会等策略的决定是正确的，但上下层实际的运用与执行中，犯了一种仇视和把个别的当做整个一律看待的错误观点，而不知从政治上去瓦解与争取乡保甲长与大刀会等，结果，收效很差。

I．正因为挺进师已往过惯了大兵团的生活，结果单独行动的经验与信心很差的，如分出工作不到几天又跑回来，说这样没有经验，那样没有把握，极象小孩子离了母亲一样，但在各个干部细心的说服教育之下，很快的将此种弱点克服了。

J．正确开展思想斗争是保证上级所给予我们的任务顺利完成的主要因素，是团结干部与保证全党同志思想和行动绝对一致的主要武器。挺进师在各种不良的倾向思想斗争是获得不少的成绩与胜利。尤其在松政间政治委员会战胜了某些同志认为浙江不好行动，敌人注意力太大，主力到两建(建欧、建阳)宁古间行动的错误观点和采取了有效的办法加以克服和纠正。

K．当时针对着敌人“分进合击”之战略与战术，我们是采取“分散争取群众”“集中应付敌人”与“分途出动，深入敌人后方侧翼交通要道和声东击西”对付之。结果，使敌无所捉摸，收效很大，尤其斋郎战斗，四面业已迫近敌人，且环境异常恶劣，当时决心的“集中一切力量，突破敌人一点；乘胜消灭敌人”结果将尾追拦阻号称最顽强之敌，浙保一团及反动大刀会千余全部击溃，缴获颇多。由于这次战斗的胜利，使整个敌人由攻势转到防御，政治影响与斗争局

面亦大大的扩大和转变了，因此我们深深的感觉到：只要全体将士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能够坚持团结与进行充分地战斗动员，选择有利时机，胆大心细的灵活运用战略和战术，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L．在实际斗争中给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训，在环境越紧张越恶劣的时候，加强部队中党的领导，改善支部生活，以突击的精神去进行部队中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娱乐工作以及动员各级干部，深入下层，面向支部是非常重要的。

## 七、挺进师在浙行动第二阶段中的情形及其所得经验与教训（1935年5月10日起至9月2日止）

（一）当时所处的环境及我们的布置：

斋郎战斗胜利后，龙泉河以南之敌大部由攻势转到守势，群众斗争亦大大发动起来了，瓯江流域及浙赣铁路以南的敌，还是异常薄弱，为了开展宽广的游击区域，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创造新的革命的根据地，当时政治委员会，决将主力北进，二纵队回龙、浦、江、遂数县，恢复原来基地，当时给各纵队的任务如下：

A．为了迅速的打通闽东闽北之联系和迅速的恢复二纵队活动地区之工作，派二纵队回江、龙 浦、衢、常、间等会行（其意不明——编者注），为了加强该纵队的领导起见，派宗孟平同志为政委会随军代表，兼行动委员会书记。

B．一纵队及政治部全部工作人员，散布于龙、云、松、遂等县间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发动居民斗争，建立党和各种革命组织，以黄富武、刘达云、王永瑞三同志组织政委分会，并以黄富武同志为书记。

C．其余各部由刘率领进至汤溪、龙游、金华、武义、宣平、处州之线进行辗转不停的游击战争，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扩大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影响，迫近杭平铁路，威胁杭州、金华、处州等中心城市，吸引敌人主力北调，使我一、二两纵队顺利的恢复开展与

进行浙南西各地区之工作。

（二）敌人进攻的兵力和企图：

当我们计划就绪，干部配备完毕时，浙保六个团，另保安大队十一个，南京税警团一团则企图包围我军于龙泉、遂昌间大龙山之遥岭，并将所有各大小道路破坏和堵塞及架设了电话线，在群众中大造谣言说：粟、刘已被包围得水泄不通，不日当可全部消灭，并设立了浙南剿匪指挥部，宣铁吾为总指挥，俞济时副之。

（三）当时我们的决定与部署的布置如下：

1.以第一支队为南路军，由黄富武、刘达云、王永瑞诸同志率领由原地出发（遥岭）往十三坞向西北行动，转到龙泉、遂县、江山、衢州一带行动，主要任务详政委会决议。

2.三、四支队和直属为北路军，由粟、刘亲自率领，往城会徒涉拟向里方、五山东前进到达里方附近，发觉敌人乃撤回到苞箩山径、苞箩五、大风潭溪、梭松、桥松下到达黄岭头宿营，这样一来我北路军与敌背对背进行，沿途捉敌人税警团之伙夫及工作人员数十名，行李军用品甚多；另方面对敌人整个布置有了进一步了解。翌日乘敌后方空虚之际，则深夜兼程的袭击了汤溪县城。

3.由于我们行动的秘密和迅速，当我们袭击汤溪县城时，敌人还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围攻大龙山，并且打得异常激烈，据云，双方死伤百余名（敌人自己鬼打鬼），我北路军则在北线积极行动约十天光景，由于北线威胁太大，敌人则将全部力量调来北线，西南各县只留一个连。此时我一、二支队及工作团，在一个月工作中，正将浙西南十几县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并建立了许多革命的组织，在某些地区建立了党团的组织，一个月行动计划完成后，各部汇合于龙泉北部之小吉，召集了政治委员会，会议的主要内容，结束一个月的行动，和计划今后的工作；另方面，因部队扩大了，重新编制部队和配备干部，兹将详情分陈于下：

A．四支队扩充为四纵队，率十支队及十一支队渡龙泉河南下，到达庆元、龙泉以南云和、寿宁、政和、泰顺之东北行动，开

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建立各种革命组织及党团组织；另方面，与闽东的党取得密切的联系，必要时可举行联席会议，商讨今后工作的配合和部队行动，以及工作地区之划分等。此外坚决的根据政治委员会所给予四纵队的任务，持久而又在艰苦的根据各该地的实际情形，布置具体工作，并与友军（闽东闽北之部队）取得密切的联系和配合。这样一来，使工作上、行动上形成三角形有依靠的猛烈发展和一致，为了加强四纵队的领导起见，政委会派黄富武同志为随军代表兼政委会书记。

B．二纵队仍在江山、常山、衢州、浦城、龙泉、遂昌之线行动，仍以孟平同志为随军代表，兼行动委员会书记。

C．一纵队则随浙东之交通到达永康、缙云、青田、处州、仙居、东阳及永嘉北部一带行动，配合浙东游击队，并取得行动上、工作上绝对的一致，在可能条件下则与浙东的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整个工作的布置，并以许信焜、王永瑞、范连辉、王屠、刘达云五人，组织行动委员会，以刘为书记，许副之，若条件成熟，一纵队则在该地长期行动，但须保持与政委会及军分区之密切联系。

D．为了领导便利和迅速布置各地区工作，政治委员会及军分区留云和、龙泉以北，处州、宣平、松阳、遂昌、衢州以南行动。

E．为了加强地方居民工作及党的工作与统一指挥起见，决即成立浙西南特委，以宗孟平、欧阳道、杨干凡、方志富、李制良、连明永、李宗州、王平、陈庚棠等组织之，并以孟平同志为书记。

（四）"八一"动员和收获：

1．军事方面的计划：一纵队袭击处州，并根据浙东的实际情形，相机袭击其他城市；二纵队袭击衢州，迫近浙赣铁路及江浦马路，破坏各该要道之电话及交通工具和要道；三纵队则袭击遂昌、汤溪，并接近铁道附近，形成与四纵队东西相呼应，四纵队袭击云和，景宁县城；五纵队袭击龙泉、松阳，并破坏龙、云马路及电话线。

2．政治方面：除进行党内外及群众中广泛而又深入的宣传鼓动

和解释工作外，各级党必须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与政治部“八一”动员计划作出详细周密的计划，并责成政治部印发五万份标语、传单散发到各地区去，此外，派遣政治部之工作人员协同特委工作人员分到各个地区去进行突击工作与扩红运动。

各地区各部队对上面计划执行的情形是：一纵队袭击了仙居之秦章，二纵队占领了八都镇、王春口、并袭击了遂昌、汤溪，迫近了浙赣线路，四纵队袭击了龙泉、八都镇，占领住溪及王春口，五纵队占领龙泉县，并破坏了龙泉马路，总结起来在“八一”示威的前后，缴获长短枪百余支，轻机关二挺，地方工作发展到纵横将近二百里，扩大新战士四百余名；龙、浦、松、遂、龙、宣等马路及电话线均已破坏，并得现款数万元，在基本地区建立了赤色游击队繁殖了游击部队及游击小组，同时群众自动的组织了不少的自己武装，大开门进行了分粮分青苗的斗争。各种革命的组织业已普遍的建立，住溪、王春口、官塘、枫坪、谷陈一带已建立了临时的革命委员会和进行了查田运动，以便分配青苗。

正因为“八一”前后的行动积极与工作获得了不少成绩，特别群众斗争业已发动了数百里之宽，分粮斗争每天群众结队的象潮水般蓬勃起来，使进攻挺进师之敌，异常动摇，而且复由攻势转到守势，在得悉对方调十八军及新三师、五十二师等部来进攻浙西南的游击基地和红军，此时，我们的计划如下：

A．一、三、四纵队仍回原地活动，并且要互相取得行动上工作上的配合，尤其在敌人进攻中，要依靠各该地的党和群众的力量及游击基地进行持久而又艰苦的游击战争。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辗转不停的在敌人后方侧翼及交通要道上，积极的行动起来，牵制敌人，吸引敌人，创造新的游击区域，配合原来基地的群众武装力量，粉碎敌人的进攻，并需与各邻近的党和友军取得密切的联系。

B．二纵队及广浦独立营则派一个支队，由李重方同志率领挺进衢州及江山一带行动，在敌人后方侧翼与交通要道上，辗转不停的开展游击战争，以资吸引敌人、调动敌人，疲倦敌人，配合邻近

友军行动。广浦独立营则由洪家之同志负责指挥，在玉村口、大龙山官塘一带行动。

C．挺进师直属部队和五纵队则在龙泉、遂昌间行动一个时间，配合广浦独立营及地方武装的行动，以便巡视和布置各地区的工作。

D．为了领导与指挥便利起见，组成东西军，军分区则率十五支队，配合各县、区、乡之游击部队在东线行动统归司令员粟裕同志指挥；西方军则率六支队独立营警卫连和配合各县、区、乡之游击部队在西线上行动则以李重方同志为司令员，洪家云同志为政委。

（五）在第三阶段中挺进师所得的成绩及其经验教训于下：

1.挺进师在第二个阶段行动中，在军事上运用了新的战略，同时创造了许多新的战术，如"打回马枪""八字形""六字形""电光形""长蛇形""分进合宿""奇袭夜袭"等，所以在三个半月的行动中，占领了浙江中部和东南部不下五十个市镇，特别在"八一"示威的前后，袭击了十九个县城，占领了龙泉、衢州等城市，巩固的占据了碧湖、住溪、王村口等中心市镇，正因为挺进师在第二阶段上能够适时的灵活的运用新的战术和战略，所以不仅开展了十九县的游击战争，而且给了进攻挺进师之敌，以极大的打击和争取了许多的胜利，使浙保二团的团长贺越芳氏在给我们的信中，不得不承认"你们以四、五百之众"，有赤化全浙之概，此种勇往前进的精神是值得我们称佩的。"东南日报论文中更是大声疾呼的这样尖锐的警惕统治阶级：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来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若当局不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太顺县政府秘书长暂代县长刘德闻氏给其留日同学信中，亦这样写着"以数万之众，剿千百之匪，数月于兹，未奏肤功，好逸畏战之心，成为通病，所可告慰于阁下者，当局已采紧急措置耳"，由此可见当时统治阶级，如何的恐慌与动摇。

2.正因为挺进师艰苦积极的活跃于浙西南，所以广大群众的斗争如潮水般的汹涌，因为如此，不但震动了浙江的反动统治阶级，而且引起了整个东南各省，以至全国反动统治的仇注，使蒋介石、黄绍雄不得不成立浙南剿“匪”指挥部，和将闽浙赣皖四省剿“匪”总部移驻江山，以及大量的增兵到浙，调遣了四八军罗卓英全部，另五十二师、南京税警团两个团、福建新三师及五十六师、浙保六个团、三个独立营、十五个保安大队合计在九个师以上的兵力，在敌此种绝对优势兵力进攻中，虽然浙西南的党本身尚存在好些弱点，以致未能争取全部的胜利，同时在某些地区还遭到部分的损失，可是对邻近苏区的保卫与巩固是具有重大的意义。

3.在三个半月的斗争中，对扩巩工作得到不少的成绩（增加了原来的数目两倍），同时对新战士管理教育，在政治动员竞赛下，收效亦属不少（利用老战士教新战士，运用政治力量去巩固新战士等）。

4.发动了全体指战员参加群众工作（每人每天写五条标语，找十个群众讲话，相机的召集群众大会，以及进行革命的各种组织等。）

5.肃反工作依靠着党与群众力量，不仅将其整个组织破获，而且捉获了从江西，×子经过训练的法西斯分子在六十名以上，内部的AB团改组派等反革命的组织，也给了他有力的粉碎与打击。

6.对策略路线的运用，在执行上犯了某些不可忽视的错误。如将秘密工作转为公开，秘密的赤色农会公开的打土豪，对保甲长地区认为都是反革命，而没有从持久的艰苦工作中去瓦解与分化其内部，并积极地去争取其中的先进分子。

7.对当地干部的创造与提拔，胆子是很大的，但尚缺乏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教育，甚至某些地区对新干部不信任，结果使军队中派出的干部，不能同地方上的干部打成一片，以致影响到工作的顺利进展与任务的完成。

8.当时数百里的群众，业已发动，而且普遍的组织了游击队，可是对这些群众武装组织的教育，做得异常不够，结果在敌人进攻

中，虽然表现了他们的英勇和顽强，但由于党在这些组织中，领导的薄弱，所以缺乏坚持到底的信心。

9.各级干部单独行动与独当一面的工作精神和斗争精神，还表现很差，如当敌人布置尚未就绪时，我们已将部队分散于各个基地，并给了他们具体的任务，可是部分的干部看见当时形势紧张，则又跑回基本地区，以致给敌无阻的在短期内逼近了我们基本地区的周围。

## 八、挺进师在浙行动第三个阶段中的情形及其所得的经验与教训。（自九月三号起至十月革命纪念节止，即自敌人第一次大举进攻浙西南游击基地和军区主力南下到达闽东苏区为止。）

（一）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布置：

根据国民党反动派向我浙西南游击基地和红军要举行大规模的残酷进攻，于是在龙泉县属之上田乡召集了政委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

A．结束一个月来党政军的工作。B．根据当时形势，决定对付敌人进攻的对策。C．从新配备干部与编制部队。D．确定各个地区和部队的新任务。

当会议结束与布置完毕后，乘敌人尚未布置就绪之先，我们业已将部队分散于各个基地，配备了各地区中心领导。兹将该会的决议简录如下：

由于挺进师及其干部和全体战士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数月来不论军事上、政治上、群众工作上、巩固部队、发动群众斗争等，获得了不少成绩。因此，我们的敌人深恐我们立地生根，赤化其所谓“乐土肥原”乃调集了廿六团以上的兵力，向我游击基地及红军作大规模残酷的进攻，为了保卫已得的而且正在巩固与发展的游击基地，开展更广泛的游击战争，大量的散播革命的种子于宽广的地区之上，依靠党与群众的力量，灵活的运用党的策略路线，击破敌人

的进攻计划，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是浙西南党与红军当前的头等任务，为了争取斗争的胜利，与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计划，政委会便有如下的决定：

1.政委会认为敌人此次进攻的特点，除采取以往"围剿"与逐段进攻，以及用堡垒线来缩小我游击基地外，在指挥上与领导上有了统一的领导和全盘的计划。敌此次进攻的计划虽然预计是四个月。但很有可能继续的延长下去。其次便是十八军的战斗力及其作战经验与其他各部不同。同时对欺骗群众的手段也比较丰富，因此照旧的应付敌人是不能粉碎敌人整个的进攻计划。

2.根据当前的形势与敌我力量的对比，把全力固守浙西南基本地区，企图把敌人整个进攻计划粉碎，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要遭到极大的不应有的损失；因此除将二纵队、五纵队及广浦独立营留浙西南配合地方武装，在浙西南特委和军分区领导之下进行顽强的自卫战争外，在敌人压力过于强大基地万一不能支持时，广浦独立营应挺到浦城松溪，政和东北及庆元西北地区并与四纵队及闽北部队取得密切联系，二纵队则应挺到衢州江山常山及汤溪龙游西南行动，尽可能的与化婺德友军取得联系；一三四纵队及师直属部队统随师部南下，直至浙闽边庆元景宁太顺寿宁之线。到达该地的除将四纵队留下外主力则向东北前进，掩护一纵队渡过瓯江北进。辗转于永康缙云义乌仙居新昌大盘山一带，依靠原来基地作广泛的游击战争，进行党与群众的组织，配合主力牵制敌人，其余各部则威胁温州、平阳、瑞安等城市，使敌人主力向东南调动，借以保卫浙西南游击基地与粉碎敌人的进攻计划。

3.如果敌人主力南下或东进时，二、五两纵队及广浦独立营应以自己英勇的行动配合当地武装，积极的粉碎敌人清剿计划，求得浙西南浙南及浙东三角形的军事上与政治上有力地互相配合。

4.为了使闽东闽北浙西南的党和部队取得行动上更有力的配合，政委会应尽一切的可能与闽北闽东的党召开联席会议，建立党内外总的领导机关，尤其在闽东，党一再的要求我们派人前往领导

的情形下，刘粟两同志应尽可能的协助闽东党检讨已往斗争，与切实的布置今后工作，尤其对闽东独立师，应以最大的力量派遣得力的军政干部，在短期内把它健全与巩固起来，使之成为一支强有力的部队。

5.浙西南特委应迅速的根据当前的形势及敌人进攻的全盘计划，切实地布置工作，加紧党内外战争动员，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反抗敌人清剿计划的宣传解释与鼓动工作，使全党同志以及广大群众团结一致的捍卫浙西南游击基地与粉碎敌人清剿计划。

6.伤病员必须选择最巩固而群众基础最好的地区去安置；另方面需酌派相当的武装加以保护，在敌人将要威胁到这些地区时，必须迅速的转移后方和将伤病员分散到最可靠的群众家里去。但须给以充分的休养费和招待费，特别重要的应对伤病员及群众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说服解释与教育工作。

7.在敌人进攻时，应绝对的避免正面的战斗和对持局面，必须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防敌奇袭夜袭、埋伏与侧击；另方面应用声东击西的办法，突然的袭击敌人后方，发动广大的群众，彻底的破坏敌人进攻路线或必须转移地区的交通要道，尤为重要的应发动广大群众来实行“坚壁清野”与储蓄自己必需的粮食。

8.兵运工作做得异常薄弱，政委会必须发动浙西南全党的同志以及广大的群众和全体指战员，热烈地进行这一工作，特别是要使这一工作成为广大群众的运动，必须进行普遍的宣传教育工作。对于俘虏必须从政治上去争取他与教育他，经过相当训练时期，则遣散回家或派遣回部工作。

9.必须迅速的普遍的实行赤色清乡与检举政治上有问题的分子，对于那些坏分子，必须采取多方的监视与必要的处置。

10. 责成各级党各部队必须与特委和政委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并迅速的建立交通机关的交通网，求得交通谍报工作的顺畅建立。

11. 各纵队任务另详。

（二）主力南下及其经过情形：

会议结束后除布置浙西南整个工作外，主力于九月二十八号通过龙泉、云和的封锁线，翌晨袭击安仁镇之敌，缴获枪支数条，二十九日抵广九属之林园，当即给九支队于庆元、景宁、云和以南，太顺、寿宁以西北活动之任务，并责成该支队应与四纵队取得密切的联系，在必要时集中行动，统一指挥，其余部队则掩护一纵队北进。上项任务完成后，主力应积极的向东行动，以资吸引敌人东调（当时已吸引敌人一个师两个团）。并约定四纵队及九支队会合的地点。当主力任务完成后，九支队及四纵队均已向西北前进，接连尾追数天，均未找着，于是为了调动进攻九支队及四纵队之敌，主力则向东南行动。此时北线之敌已接近我们，西南线则有五十六师全部担任封锁线，同时有刀匪数千，在这样的情形下，则决意通过闽浙边五十六师的封锁线，以便与九支队及四纵队取得密切的联系；另方面决与闽东特委汇合，经过三昼夜的行军，于十月五日与闽东特委汇合，当即召集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精神是：

A．在目前复杂的斗争中，对闽浙边整个工作的布置以及行动的配合，急需要总的领导机关，才能取得行动上工作上更有力的配合，与适时的粉碎敌人对闽浙边整个清剿计划。尤感敌人历次进攻均有总的领导机关与统一的指挥，可是在我们本身方面，自从与中央分局及闽浙赣省委联系失去后，不论在工作上行动上往往表示不能一致。为了克服这一点与迅速的加强总的领导和集中指挥起见，决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这对于加强闽浙边党的领导，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彻底粉碎敌人对闽浙边的“清剿”计划，是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因此决以粟裕、刘英、叶×、阮英平、范极民、龙×、谢××、许信焜等十三同志组织闽浙边临时省委，并以刘英同志为书记，粟裕同志为组织部长，叶×同志为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

B、根据闽东特委及浙西南政委会的报告，迅速的从新布置闽浙边各地工作。

C、从新配备干部、调浙西南政委会秘书许信焜同志任闽东独立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调四纵队司令员王裔三同志为该师师长，

以王武礼同志为参谋长，以郑家太同志为该师政治部组织干事，以杨发旺同志为该师第三纵队的参谋长，其余干部则由闽东特委自行配备。

D、决由挺进师拨重机关枪一挺，轻机关枪二挺，现款一万三千元给闽东区委，并责成闽东特委迅速的整理各地组织及独立师，尤须加强对各地党及独立师的领导和政治教育文化娱乐工作及卫生医务等工作。临委将各地工作布置就绪后，则致信给闽北分区委，兹将该信的主要内容摘录于下：

黄道先喜镜冰立贵诸同志并转分区委：

一、关于我们最近的工作(略)。

二、关于浙西南斗争的检讨(略)。

三、关于闽东工作的检讨情形(略)。

四、关于浙赣边整个工作我们有如下的意见和提议。

1.关于闽北闽东浙西南的斗争，我们深深的感觉缺乏中心的主要的总的领导机关，以致领导上工作上行动上往往不能求得更有力的配合，如果长久下去，则对闽浙边的整个工作实属不利，尤其在目前这样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加之各地党业已与中央分局及闽浙赣省委失去联系，若不迅速的建立总的领导机关，则对今后整个斗争实属不利，如此闽东特委与浙西南政委会在此次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临时省委，以粟裕、刘英、叶×、阮英平、刘达云、许信焜、洪家云、范极民、李凡林、许国等十一人组织之，并以刘英同志为书记，我们感觉临时省委十分不够健全，因此，我们的意见应成立闽浙赣边临时省委，包括闽北闽东浙西南，并建议以黄道同志面商后再来决定，我们十分的希望闽北分区委采纳我们这一提议。

2.闽东工作的布置，除竭力恢复与巩固原来基地外，则向西北发展，以资与浙西南和松政建屏之游击区域打成一片，和取得行动上一致的配合（大顺、庆元、景宁、云和及瑞安西部均已建立部分的党的组织，游击战争也有相当的开展，群众关系极好。）但我们认为闽北的工作也应积极的与浙西南及闽东打通，求得两方面更有力

的配合。

3.浙西南斗争极为重要，我们当以最大的努力加以恢复与开展。尤其是挺进师到达浙江行动以来，不仅牵制了进攻闽北闽东之敌，而且对于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斗争的开展，也有极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决与镜×立黄文×等同志汇合后，再集结四纵队九支队十三支队特务队迅速的转回浙西南布置新的工作。

外附新条件与新策略一份，这由浙东临委从上海方面转来的。

在三期斗争中，当时检讨的结论及其所得的经验与教训：

1.敌人用七个师以上的兵力来对付幼年的浙西南游击基地，敌人用意的残酷，与更加艰苦的斗争环境之到来，当时政委会及浙西南几个主要负责同志是深深了解与估计到的，但对十八军进攻浙西南长久性的估计是有不够的地方，如认为挺进师主力南下与各纵队分别出动后，必然会调动主力；另方面则认为在主力红军胜利的影响与威胁之下，十八军和五十六师有可能调往北方对付主力红军，或他调对付友军，可是事实证明：挺进师主力南下后，仅仅调动了敌人一师以上兵力，而敌人主力仍用以对付原来的游击基地。这证明当时对敌人进攻长期性的分析是有不够和个别错误的地方。

2.对于当时干部的配备，虽然引起了我们相当的满意，可是事实的证明还缺少过细的考虑；另方面中下层的干部不够老练与缺乏独立一面的斗争精神，例如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同志带花后，军分区司令员×××（廿六路暴动过来的）不到几天则逃之夭夭，特委组织部长×××在环境严重时压迫群众解散武装回家，松途（?）游击队长×××将枪支埋起来，自己给土豪做儿子；二纵队政委×××同志，不跟队行动，带几条驳壳枪躲包萝蓬里；九支队首长，不要红色战士随其行动，说目标太大，容易被敌人发觉，后来竟要战士们将步枪轻机关枪埋到深山里去，自己则实行逃跑。这些血的教训是够警惕我们，对于干部的配备缺乏周密与慎重。另方面：对干部的考察及教育还是做得异常不够，尤其对某些干部的估计，当有许多不够的地方（如某些干部要他负责需要的工作，他是很有信心和能干

的，可是一下子把很重的担子给他们负担，往往负责不起，甚至有时会减少他的信心，而影响局部或整个任务的完成）。

3.当挺进师主力南下后，浙西南特委曾经领导广大工农群众配合自己的武装部队与敌人绝对的优势兵力作长期艰苦的英勇奋斗，这是非常光荣的。可是浙西南特委和军分区对于避免正面战斗与不利战斗方面，有时是在硬拚。正因为如此，特委负责人黄富武同志竟在这样的战斗中，冲锋负伤以致被捕，这是坚持浙西南斗争中一个极大的损失。由于黄同志的被捕，不仅使浙西南的斗争失去了中心的领导，而且在部队中在群众中亦遭到很大的影响和损失。

4.对于异己分子的清除与及时的开展反倾向的思想斗争，还是做得不够，尤其对某些政治上不坚定的分子缺乏采取必要的和迅速的处理，如××、谢××之类，业已一再犯着错误，可是始终认为干部少，老同志会改进错误，结果叛变逃跑了。

5.当主力南下时，基本地区之部队仍然太多，根据当时所处的环境及敌我力量的对比，应该以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主力，组织几个强有力的挺进支队，配备良好的中下层干部，派遣最得力的干部随之行动，挺到敌人后方侧翼交通要道上与某些群众基础较好的游击区域去，依靠党与群众的力量，开展广泛游击战争，创造新的游击区域，以我们积极的行动和顽强的斗争精神去调动敌人，吸引敌人，给敌人进攻基本地区的计划以有力的打击和粉碎。

6.在环境十分严重、下层干部独立行动与工作胜利信心较差的时候，将部队过于分散是不妥当的，如九支队、四纵队在跟随主力行动时，尚能工作和行动，可是由于脱离主要负责人太久，且干部配备不够精密，环境又一天天的恶化，以致失去了他们单独行动的信心与较长的持久斗志，这在斗争中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教训。

7.各部队各级党对于上级的命令及指示的执行，在这次斗争中，表示不够坚决。如当敌人进攻计划尚未布置就绪时，我们的部队业已根据当时的斗争局面及依靠各个游击基地分成了五个单位，责成各级首长及该地的党，坚决的挺到敌人后方和侧翼去，结果由于各

级首长对上级指示未能坚决的执行，以致一月余仍停留在封锁线附近，致影响全盘计划不能顺利的实现，反而遭到不少的损失。

8.各邻近的苏区及游击区域，对浙西南斗争的配合是很差的。尤其在敌人集中全力进攻浙西南基本游击区域时，各邻近友军及苏区未能以极大的力量配合浙西南的斗争，特别当敌人以全力对付浙西南的基地时，未能在敌人进攻的侧翼后方及各交通要道上，积极的行动起来去吸引敌人，掯制敌人，打击敌人，结果使敌人能够从邻近苏区抽调最优的兵力，向浙西南基本地区作绝望的进攻。

9.闽东特委与浙西南政委会的联席会议结束后，本已决定迅速的通过霞浦、太顺的封锁线，回到浙西南团结与集中我们的力量，迎接新局面的到来，可是到达瑞安、王溪时，政委会虽然及时开展了反右倾悲观与失去自己斗志的斗争，然而还缺乏将这一斗争加以进一步的开展，以致预定的行动计划未能完成，这是极大的损失。

10.××、×××及××各同志，认为在敌人二十六团以上的兵力围攻浙西南游击基本地区时，将主力集结南下是退却逃跑，此种论调不仅是毫无根据，而且根本否认了当时主力南下的意义及其重要性。

## 九、挺进师在闽浙边行动第四时期的情形及其所得的经验教训：（从临时省委成立即一九三五年十月革命纪念日起至一九三六年七月为止）

（一）当时所处环境及经过情形：

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后，除将闽浙边整个干部从新配备，部队从新整理，工作从新布置外，当时决定省委暂时随挺进师行动一个时期，待浙西南工作布置完毕后，省委的位置应放在闽浙边太顺、平阳、福鼎、瑞安之间，以便指导闽浙边整个工作，此时进攻浙西南之敌已集结于龙泉遂昌、松阳，丽水之线，在那里大开其所谓剿“匪”胜利之祝捷大会，我们以一晚二天的急行军，通过了闽浙边一师以上的兵力的封锁线，而一举占领了瑞安属之杉溪镇，当时所得

的情况是：1.浙西南基本地区稍受损失。2.黄富武同志被捕，但部队的实力大部分仍然存在。3.洪家云同志等尚在龙泉、遂昌等边境行动。4.群众斗争的情绪仍然很好。5.浙东部队依然活跃于大盆山一带。此时兼挺进师××同志，则提出浙江暂时不能行动，应依靠闽东原来的工作地区，转到两建行动（即建瓯、建阳）。于是当晚召集临时省委会议，除将整个政治局面及当时浙江所处环境作了比较充分的估计与分析外，并着重的指出：没有信心在浙长期行动与积极而又迅速的去恢复浙西南工作是极端错误的。另方面则决定挺进师应从速集结自己的部队，打击进攻闽浙边薄弱之敌，并迅速的回到浙西南行动，临时省委则暂随挺进师行动。会议结束后，叫在太顺、庆元、寿宁、松溪间行动了二个月光景，发动了数县的群众，恢复了不少的组织，并缴获长短枪百余支。此时十八军有向两广开拔的消息（两广事变快要到来的时期），于是决定挺进师全部回到浙西南行动，省委位置于太顺、福鼎、平阳。兹将此时的情形，分别的摘述于下：

一、挺进师之部队由粟×、谢××、许信焜、张友昆、赵春和、张文碧等同志率领，迅速的回到浙西南，集结部队与恢复该地工作（此时原在浙西南行动之主力依然存在），并以文×、信焜、春和、文碧等同志组织政委会，以信同志为书记，粟×同志为随军省委代表，将该地工作整理完毕，部队集结好了以后，粟同志应率特务连经宣平、丽水、永康之线（这些地区原已有了工作）进到浙东（如仙居、永康、缙云、武义之间），检讨与从新布置浙东特委的工作，然后南下回到省委所在地，于一九三六年三月间，挺进师胜利的占领了龙泉属之住溪镇及遂昌属之王春口。当时群众的斗争仍然如昔，二、四纵队及广浦独立营依然存在（此时十八军正开始调动），浙西南基本地区的群众坚决的要求挺进师再不要走了。可是由于当时几个主要负责人不团结与意志不一致，大概行动了十几天的光景，将部队推到闽东去了。这样一来，不但部队未集结，工作一点也没有恢复，相反的，反给了群众一个不好影响。

二、临时省委与挺进师分别后，只带了一个特务班，有短枪六支、长枪二支，当时的敌情，福鼎有第九师的一个团及闽保第四团，在平阳方面有浙保第四团，在太顺方面有保安十一大队等。此时省委的中心任务是以全力整理与建立福鼎、太顺、鼎平及瑞、平、太的工作的一个半月的光景，各地组织均已普遍建立，广大群众业已发动，但进攻我们的敌人，随时以连排甚至以班为单位，分散行动，专门压迫群众屠杀工农抢粮迫债，无所不为，省委工作人员并特务班只不过二十几人，大部都是赤手空拳，然而广大群众在敌人不断压迫下，真是忍无可忍了，于是不断地要求我们配合他们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群众有梭标、土枪之类，斗争精神很好）经我们多方的考虑，认为配合群众力量，采取埋伏侧击的战术，选择有利的条件，是可以给进攻之敌以打击，并决定首先就要打击第九师（因为第九师的牛皮最大，说他一连人可以消灭全福建的游击队及共产党），因此第一仗就击溃了第九师的二个排，缴获轻机关枪一挺，步枪数条，解决最多不过三十分钟，我方只一特务班政治委员周兆坤同志牺牲。此时群众的斗争情绪较前更加高涨，并到处传播，说七军团到了很多的便衣队；此时部队中得到了一支轻机关枪，真是如鱼得水般的高兴和快活。接着又一次战斗，除将敌人便衣队一排全部击溃外，接着击溃了浙保四个连。此时这几个小小的特务班，已扩充成特务队了（群众名之为七军团的驳壳队），于是进攻我们之敌，固守堡垒，由进攻转到防御。临委根据当时的环境，除组织直属工作突击组，分到各地区去切实的帮助与指导各地工作外，即决定普遍的巡视各县工作，由瑞、平、太转到福鼎、鼎平各县，同时在战斗中，已将特务队扩充到教导第一团和第二团（时间约三个月的光景）。此时鉴于整个形势的转变，两广事变已发生，闽东浙西南特委及挺进师亦毫无音讯，于是除给信与浙东浙西南及粟×同志等约其到闽东开会外，并将分开后省委工作的现状告诉他们。此时省委布置了浙南浙东南及闽浙边整个工作后，则率领教导第一团，由鼎平、到瑞、平、太与霞浦、福安一带巡视与布置各该

县的工作，并求得早日与闽东与浙西南诸同志召开临时省委会议。到达霞浦、福安交界时，适遇范极民同志率特务连到来，略谈及一些工作外，则提及浙南大部分的干部都是AB团，并方××、××、×××等已开过会议，重新检讨了闽浙边各地工作，认为××同志由"左"右倾的错误，现已形成了路线，决议取消省委，××、×××、×××、×××同志等分到屏南古田原地区以南去工作，粟裕同志为闽东教导团团长，并估计×××牺牲可能没有牺牲，浙西一带已弄坍完了，这必须给×××以组织上严重的处分；××同志等也有公开信写给××、××等同志，除同意××、×××等为首的所谓紧急会议外，应首先要革除××的职务和设法报告中央批准等语（此信现在还保存着）。后来并讨论到××是改组派或与两广有关？另方面，组织闽赣省委，要闽东加入闽赣省委××为首的所谓紧急会议，结束后，虽然用了很大的力量，所谓要克服浙西南及挺进师以及浙南干部，才能开展反××路线的斗争，可是出乎×××等意料之外的，那就是说服工作做得没效，反遭到挺进师及浙西南干部的反对，并拥护省委路线，反对取消浙江工作与斗争（因×、×、×等计划浙江干部及部队均应分配闽东工作，要××同志一个去恢复浙西南工作）尤其×、×、×三人不能代表闽浙边的党而取消省委。这样一来，××同志此时成了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后给谢××、许友昆数同志再三劝解××同志，才打消建立反××阵线之企图，而同时，谢、许、张等同志的意见，迅速回到浙西南工作和积极的去找浙东特委，以完成省委给予挺进师之任务。当任务完成后，××同志随挺进师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底才回省委，其间××同志曾与×、×等会面一次，除×同志力劝×、×等维护党的一致共同对付主要敌人外，其余问题均俟省委会解决，但×、×则公开宣布××犯了什么错误而与省委脱离关系，并将先遣队与挺进师留落在闽东之战士及干部，除在战斗中牺牲外，说一概都是AB团，均遭杀害，四纵队在闽北同样的如此，当时省委检讨的结论，认为此种肃反"路线"，把个别看成整个，不仅违背了中央正确的肃

反路线，而且群众路线也没有顾及。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残酷的斗争中，难免其中有个别或部分的反动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隐藏在内，但我们如果能采取正确的肃反路线，极大部分的红色指战员是可以争取说服与教育过来的。

当挺进师陆续回省委后，前后争取了十几次的胜利，缴枪长短四百余支，轻机枪五支，俘虏近二百余，闽浙临时省委第十次扩大会议就在一九三六年"八一"革命纪念日的前后举行了。

（二）在第四期行动中所得的经验教训总结是：

A、在游击战争方面，不但战术的运用有很大的转变，而且游击区域的开展更加宽广了，差不多温、台、处、衢各属及杭州以南以至蒋介石家里的奉化附近也有了红军的足迹，这不仅震动了整个的浙江的敌人，而且震动了整个的统治阶级。尤其是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B、由于红军的活跃和实际行动中表现着他们英勇奋斗、坚苦卓绝的先进行动，不但揭破了国民党军阀说红军已经完全消灭了等武断欺骗宣传。同时在龙泉、丽水、青田、温州以南，宣平、武义、永康、缙云、金华、义乌、东阳、仙居及浙东数县，共计不下三十县的广大群众，除了一小部分以外，无不对红军爱好，特别是浙南浙西南及闽浙边数十县的民众，对红军的热望与拥护，确实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某些地区甚至表示同老苏区一样，群众自动的替红军担任运输、响导及治疗伤病员等，并自动的组织游击队。进行分粮和策反等工作。

C、这一时期中，我们存在着不少的弱点，特别来得重要的是由少数的负责同志和主要干部的动摇，对浙西南游击战争的开展，缺乏信心。以致不能坚决的执行省委的指示与决议，而迅速的回到浙西南游击基地收容部队与恢复工作。

D、三月间由×同志率领四、五支队进到浙西南，本可将浙西南部队集结起来（四、五纵队及独立营），而没有坚决的去找。反而将部队拉到闽东去，致使该纵队受到极大的损失，负责人也先后遭

到牺牲。这不能不算是血的教训。

E、六月底由××、××、××等同志率领挺进师之主力，既经占领浙西南之中心地点——住溪及消灭了王春口之敌，而未能坚决的在该地恢复工作，反而离开该地，致失其恢复浙西南工作的良机。

F、由于部分的干部对游击战争缺乏胜利的信心，与存在着悲观失望的情绪，以致影响到部队中战斗意志的降低，甚至个别政治上落后的干部和战士，企图寻找第三条道路。

G、游击区域虽然打得很宽，但缺乏深入的群众工作，从宣传群众到组织群众，特别是自动起来分粮肃反的游击战，还缺乏给以及时的指导与帮助。因之还不能将群众的斗争，使之更有力的发展到更尖锐的阶段。

H、举行紧急会议前，闽浙省委认为××等错误是有其小资产阶级英雄主义的历史根源，而使用其非布尔什维克的手腕，拉拢部分的落后同志，实行其挑拨离间、分散党的力量，取消临时省委，消除浙西南工作与取消浙江的斗争，这是极端错误的，假如××等当时没有此种非党的非组织的行动，和闽北各同志作其错误的应援，以及企图取消闽浙省委而组织闽赣省委的行动，则闽浙赣等省边区的斗争必然会得更多更大的胜利，在工作上行动上更能采行一致的动作，和更有力的配合，尤其不致遭到给敌各个击破的机会。

I、在闽浙临时省委第十次扩大会议上，开展了反××为首的错误斗争，不仅团结了在闽浙临时省委领导下的全党的同志，而且使浙闽工作获得了更多的成绩，与教育了全党的同志，而且在闽浙边斗争的历史中，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J、在敌人绝望的进攻中，证明了浙西南浙东浙南的党和干部以及广大的红色战士斗争的积极和顽强，它不仅保存了自己有生力量，而且进一步的巩固了各该地的党与战胜了一切困难；而表明了自己是坚强英勇的战士，同时起了不少的先锋作用。另方面用事实回答了×、×等所谓浙江工作已经全部坍台论调的破产。

K、闽浙临时省委的成立，它不仅挽救了当时闽东干部——尤其是主要干部，表示无法继续领导和坚持斗争的右倾情绪，而且克服了部队中失去斗志的倾向，另方面迅速恢复游击基地，开辟了浙东南的工作，恢复了浙西南的工作，从三百余人的部队发展到一千八百余人，这与××等所谓浙江工作将完了，以及毫无根据的说闽浙临时省委成立以来毫无成就的论调，根本成了天差地别之反比例。

## 十、挺进师在闽浙边行动第五时期的情形及其所得的成绩、经验与教训：（自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一月）

（一）当时所处的环境及经过情形。

闽浙临时省委第十次扩大会议的主要精神，估计与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与确定了党的任务，检讨了浙西南的斗争，讨论了对××问题的处理，检讨了浙东的工作，改选了省委，检讨了挺进师二年来在闽浙边的斗争，讨论了××同志三次的声明书，并通过了省委给×同志的一封信。总结起来，闽浙边临时省委第十次扩大会议不仅总结了挺进师及闽浙边的党一年来的斗争与工作，而且解决了许多无原则的纠纷，开展了反××为首的取消总的领导机关，破坏党内团结，取消浙江工作的错误斗争。使挺进师及闽浙边全党的同志更加团结和巩固；另方面奠定了挺进师在浙长期行动与闽浙边的党获得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确是今后的斗争方针与策略路线的转变和运用。

在这一时期，正是两广事件爆发的前后，敌人的正规军均已他调，除浙江六个保安团，十一个保安大队和六个独立营与地方武装部队外，尚有闽保第四第六两个团，但由于党的领导正确，挺进师行动的积极，以及各级干部的团结一致，这时期是挺进师到闽浙边行动以来最好的环境，工作与斗争最顺利的时期，不仅扩大与巩固了浙南浙西南，而且开展了浙南各县的工作，并打通了浙东原来的基地，除正规部队已扩大到将近二千外，在浙南特委领导下的地区

随时随地都可号召成千成万的群众配合我军作战，同时县区乡村均有普遍的自卫队及以后分区为单位的独立营、连等组织。当时敌人进攻我们的机会是很小的，于是除消灭了各地许多地主武装外，并攻开了游击基本地区内不少的反动堡垒及据点。各个游击基地的互相联系也从此打通了，浙南某些地区的土地业已分配，浙西南某些地区则实行分青苗，至于红军及游击队经过之处，富户的粮食极大部分均已分配给广大群众。

接着是双十二西安事变爆发了，此时客观形势更利于革命的发展，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当时我们认为“和平统一，共赴国难”将从此实现，且中央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双方等已停止军事动作，然而对东南各省的苏区和红军，仍然采取绝望的进攻，企图一举而消灭东南各省的苏区和红军，并从报端上得悉将从湖南调遣刘建绪的部队来浙闽赣皖四省“剿”共。

（二）兹将挺进师在浙闽边行动第五个时期所得的收获及其经验与教训分别的简报如下：

A、十八军调动后，浙江敌人除保安团队外，可说比较空虚。当时在军事上，我们是采取分散集中的办法，分布于浙南浙东南浙西南及闽浙新边区行动，每一地区行动，每一地区均配备了党政军的干部，隶属于各特委的领导之下，采取“分散争取群众，集中应付敌人”的原则，另方面各特委都配备了二百至五百的正式部队。同时尚有地方武装部队的配合集中起来，随时可以应付敌人两营至一团，结果不但在发动群众斗争方面收效颇大，而且打击了敌人不少的小部队及民团等。

B、开辟了闽东南各县工作，打通了个别游击基地的联系，开展了三十几县以上的游击战争，发动了数百万广大的群众，建立了各种革命团体和党的组织，扩大了党和苏维埃及红军的政治影响，尤其根据中央新的指示（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及策略）转变了策略路线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等。

C、肃反工作不仅取得伟大的胜利，而且基本上对阶级路线及

群众路线之运用和执行也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获得了全党的同志以及成千成万的广大群众一致的同情和拥护。这对于保卫浙闽边斗争和使闽浙边的党能够巩固的向前发展与实力的保存以及全党同志进一步的团结上是具有极伟大的意义。

D、当敌人开始布置进攻时，省委业已有详确的计划，给各特委各军分区及各部队，尤其着重指出在敌人进攻行将到来的今天形势须防止退却逃跑，对胜利毫无信心的现象，可是在敌人布置尚未就绪时，浙西南之主要干部及部队则举行南下，并与浙东南部队会合，停留于敌人包围线内打硬仗，这是极端错误，而且遭到了不少的损失。

E、在敌人此次进攻中，很明显的看得出各级党，尤其各级干部，还缺乏独当一面的顽强斗争之精神。在平时似乎样样都可应付，然而斗争一进入紧张或残酷的时候，往往削弱自己的斗志和事事依赖上级处理。

F、在浙西南浙东南方面，对于当地干部的培养提拔和创造，是做得非常不够，甚至有个别地区专在利用非阶级的异己分子，而缺乏及时的致力于培养各当地的先进干部，以致斗争一进入紧张时，往往外地干部不能站足，那些异己分子也早已逃之夭夭；另方面，反而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政治上有时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G、在这个时期内，党内外有部分的同志过于乐观，轻敌骄傲的习气，在各地区均有部分的发生。若是环境突然急转，这部分的同志却又表示张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了。因此在任何时期克服与纠正在胜利中骄傲自满及失利的悲观失望的现象是非常必要的。

H、当敌人开始进攻时，在浙南方面由于部分的干部，特别是主要的干部，对于整个形势掌握不住，以致失去了自己的斗志，把将近千余人的部队按之不用，他的理由是“为了保存实力”“不好了”“打不得”，以致引起党内外的群众非常不满，特别是亲眼看见敌人在摧残群众时，依然按兵不用，坐食老本，外表似乎很静着的，还在“练兵”，骨子里实是机会主义在作怪；另方面，对策略的

运用，亦是很差，如当敌开始进攻浙南时（其实还有什么正规部队），广大群众及各地下层的党因遭受敌人长期的烧杀抢等而要求特委有计划的组织红心白皮的联甲（其实绝大多数的乡保甲长都是同志或同情者）以应付新的环境，"假降为攻"，可是浙南特委始终坚持自己个人的意见，说组织了联甲和壮丁队的统统都是反动派，一概要杀，结果使广大群众进退两难——进行要与敌人坚决斗争，但特委又不愿打仗，退则"假降为攻"特委也不肯，后来直到省委回到浙南后，才转变策略。结果收较极大，我们几百人的部队，住在任何一地，都有五、六里，甚至数十里路的联甲"剿共义勇军"代我们放哨，而且群众假借清乡，禁止通行，消息封锁得异常严密，敌人是在大吹特吹的说红军已经消灭，或说刘×的部队统统都到海里去了，其实我们就在他们的身边，他还不知道，甚至问我们的哨兵，此地有红军没有？（因为我们的哨兵和联甲一起放哨，弄得敌人莫名其妙）因此上级固然要有明确的策略路战，但在实践中去要求全党的同志，加以灵活的运用。

## 十一、挺进师在闽浙边行动第六个时期的情形及其所得的经验与教训。（一九三七·二——一九三七·一二）

（一）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布置。

当敌人大举进攻将要布置就绪时，正值闽浙临时省委第二届，第六次扩大会议开幕之际，大会除正确的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与确定了闽浙边党与挺进师当时的紧急任务外，尚有如下的决议：

1.大会一致的认为当时整个的政治形势是起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总的趋势，是日趋于激烈地走向革命与战争的大道，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党将以大公无私的度态，进一步的提出了策略路线的灵活转变，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是能迅速的实现，但由于国民党之进步与转变十分不够，东南形势一般的说来，仍然处于复杂严重斗争环境之中，最明显的事实，莫过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闭幕之后，当局对于东南各省苏区和红

军的进攻，不但没有丝毫的减轻和放松，相反的依然采取绝望的进攻，企图一举而消灭东南各省的苏区和红军，刘建绪从湘调浙，组织闽浙赣皖四省清“剿”总部，就是最明显不过的事实问题。

2.为了彻底的粉碎敌人的绝望进攻，与适合当前斗争的需要，红军纵队仍回浙西南，一纵队回浙东，三纵队进至浙东南，师直属部队在浙南，特委队随省委行动，除了给进攻之敌当头一个严厉的打击，除一、二纵队迅速回到自己工作地区依靠党与群众力量坚持各该地斗争，其余各部队及闽浙边区之独立营连队则编第十九师（三个团）采取分散集中的策略（随时能够集中打击敌人，随时又可分散行动，同时能够独立行动的各级干部，亦预先分配好了）。

3.党政军的任务详另决议和指示信。

4.为了便利指挥，加强各地党领导起见，决定闽浙边区成立省委办事处，以粟裕同志为省委办事处主任，直接领导指挥闽浙及边区党政军的工作，省委直属机关由瑞平太出发，经太顺、平阳、鼎平，巡视与布置各该县工作队，通过飞云江进到浙东南，选择适地以便领导浙东南浙西南，并与浙东及闽浙边区取得密切的联系。

5.首先要集中全力乘敌人各路进攻尚未靠拢时，及第十九师李觉部及第九师一团有力的打击，因为这些部队是敌人进攻的主力（可是事实上战斗力并不强，且不断的发生小的兵变，以连排班为单位的如此次拖枪过来）必须在各方面占着良势才能行必要与有力的战斗，一、二纵队在必要时应集中力量打击卢兴邦的土匪部队（该部纪律最坏，逃亡最多，战斗力最差，不断的拖枪到浙东南尤其是浙西南的部队里去。）

6.各特委各部队必须保持与省委和军区的联络并迅速的建立顺畅的交通站。

（二）敌人的布置和企图：

敌人此次围攻的特点，在战略上是采取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的炮团，各路都有纵深配备，并以五十二师及闽保第二四团及第九师，首先散布于闽浙边构成了一年将近七百的封锁线，并构筑了相

当巩固的工事，和数千个乌龟壳(即堡垒)第一步计划限三个月消灭我们，他的兵力的布置，刘建绪自己兵力，首先布置于江山、衢州、温溪、龙游、武义、永康、宣平、缙云、丽水、永嘉之线，则企图由北而南的把我们压迫到闽浙边，而协同由西向东进攻之敌，及围守闽浙边封锁之敌，而消灭我们，西线布置首先新五师五十二师及江西保安团和福建保安团，布置于江浦马路（即江山到浦城的马经）及松溪、庆元、政和之线，由西向东压迫我们，以独立第二旅及九旅浙江保安团保安大队及独立营等首先封锁瓯江及飞云江所有的民船，并将所有的民船于午后三时均集中于指定地点的北岸，来往人员亦检查甚严，并构筑了数千个堡垒，另方面则压迫群众组织联甲及"剿共义勇壮丁队"，有了五家或十家以上的村庄特别是重要的口子及重要道上，均限期构筑堡垒和派与守口子，动员了几十万的壮丁队（根据其当时报纸上的消息）协助军队进剿，五十步一哨，三百步一班，每个壮丁带了三个月的粮食和费用，欺骗群众说红军有几千万的银子，吃的用的不知有多少，打到红军住的地方去，一概都分配给老百姓。

在政治方面利用反动的乡保长，地主富农，压迫群众组织联甲及义勇壮丁队，并实行了移民政策，烧杀政策，（一乡的人民均集中于乡公所驻在地附近）山头山尾的房子与茅蓬一概烧掉，（在此次进攻中，起码烧了万座以上的房子）一切食物均集中于一地，集中时先算过每人每日只准领多少，油盐柴米，到处大造谣言，说朱毛红军已投降了，为了要打日本，首先要"剿灭"共党和红军(？)；颁布了通红军者报告了红军消息者送红军粮食者等十条杀头状，压迫群众执行，此外还有赏格布告散发到各地去，捉到红军首领的赏多少，杀到红军首领的头赏多少，并说只要拿他们的头来，并将介石说共产党员和红军均会消灭干净，可是后来得悉此种消息不正确给刘建绪谎报军情戴罪立功的责备与处分。

(三)我们当时的对策：

在军事方面是，一纵队由浙南出发经浙东南以电光形的进行回

到浙东活动，三纵队回到浙西南，其余各部集结于平鼎交界处首先给了进攻之敌浙保及闽保以严厉的打击并与十九师的李觉打了二仗（按李觉是何键的马弁因何的女儿爱上李觉后为何的女婿，同时又是蒋的干儿子）敌人死亡颇重，我军无甚损失，此时敌人主力均已达到平阳、福鼎、太顺之线，闽浙省委根据当地情况及敌我力量的对比，认为部队集中一起行动，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中实属不利，于是除将各地方武装分布于各部游击基本地区进行持久的顽强斗争外，其余各部均于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先后挺进到浙东南及敌人后方翼侧去了，于是敌人企图消灭我军于闽浙边之计划，完全归于失败。

正当着敌人大举进攻时，省委及军区发出了快邮代电，中心内容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当局派遣了代表到温，并在各报披露，愿与我们进行和平谈判，经省委讨论的结果，认为当时的谈判，当局所提条件，一定是很苛刻，而且没有诚意，但我们很可利用十五天的停战机会，布置我们新的工作与扩大我们党的影响，于是双方谈判，可是谈判的焦点，至我方代表坚持我党组织与部队独立性和划分一定地区时，当局企图扣留我方代表，此时我们很机动的要求对方到温州谈判并邀请各界先进人士参加，不数日蒋介石给刘建绪"停抚进剿"之手令，于是谈判遂告破裂，我们代表也安全的绕道回来了，此时我们的主力由整化零组织了大批的赤色武装工作团，除配备军政干部外，并配以各当地党的干部一起行动约半月的光景，各部挺到敌人后方及翼侧去了，并发出"为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以及和平谈判而破裂告各界人士书"五月间继续发出和平谈判通电，六月中续发"呼吁各界人士要求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当芦构桥事变爆发后第三天当局派"四省""剿共"总指挥党政处主任邓纫先生来温与我方进行谈判，此时我们谈判对方是处于被动地位，且环境非常利于我们，于是则坚持主力红军谈判的条件作为我们谈判的准则，此时对方一一允许，并再三要求停止军事动作（因为进攻我们的部队均要调动，且各地游击队异

常活跃）于七月十三号双方在温签订了和平谈判的协定，并由当局每月供给我们一万五千元的开支，当和平谈判协定签订之后，省委由青田、永嘉、瑞安边境一昼夜的行程赶回平阳北港，集中部队与布置新的工作，约半月的光景，则将散布于瑞平太青丽温等县的部队全部集中完毕，工作人员及红色战士共集中约三百人左右，当部队集中完毕，浙南及边区工作布置就绪后，则分别的派人往浙东南浙西南及金、衢属方面找粟裕、谢文清、张××、范联辉、赵××等同志，约一月的时间，始将各地部队找回，最大的力量是用在创办党的训练班，恢复各地工作，加紧部队教育，创办救亡学校，组织救亡团体及训练群众的抗日自卫队等。

（四）兹录前闽浙临时省委对八越月斗争的总结简摘如下：

甲、检讨省委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与分析。

关于省委第七、八、九、十等次扩大会议所通过之决案，及给各级党的指示，省委第十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一致的认为省委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与分析是正确的，这在八越月事变发见的过程中，更加证实了省委当时的决议是正确的。

无疑的八越月的斗争，证明了闽浙边的党不仅战胜了一切的困难与阻碍，而且有了许多顽强英勇奋斗的光辉例子，如浙东南当时主要负责者叛变后而许多中下级干部和战士仍不但不因此而灰心，而且更加团结一致的在党的领导之下继续顽强不屈的奋斗，与争取了军事上、政治上、工作上不少的职责，同样的浙西南浙南的党在国民党八越月残酷的进攻中，不仅粉碎了我们对方的企图阴谋与凶残，而且更加强了党的组织、锻炼了许多顽强无比的干部，创造了不少的新的工作方式方法，灵活的运用了党的正确策略路线，保存了全民抗战有生力量，发展了新的工作。

当然，如果单纯的只看见我们在斗争中所获的成绩与胜利，而不彻底的来检讨我们在八越月的斗争中尚存在着的弱点与错误，那是极端有害的，事实教训我们正因为某些地区的党和部分的干部未能坚决的执行党的正确的策略路线，反而在国民党凶残的大举进攻

中，在政治上做了敌人凶残的俘虏，行动上有个别的无耻分子直接的、间接的成了敌人帮凶，结果在整个计划的执行中遭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和犯着某些严重的错误与倾向，作了进一步的彻底的来检讨我们已往的工作，总结斗争中所得成绩与胜利，弱点与错误，经验与教训，兹分别的检讨于下：

1.浙南方面：浙南的党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之下，的确在八越月斗争中获得了不少成绩、和表明着浙南的党斗争的顽强，尤其是瑞、太、平及平瑞的党更加表现出一种顽强无比的斗争的精神、明显的事实告诉我们，在国民党一点也不会放松，而且步步加紧残酷进攻中，他们不但没有放弃自己的领导地区和工作范围，而且更加努力勇敢与积极的发展了新的工作地区、强固了党的组织，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锻炼了许多优秀干部、揭发了敌人的一切造谣中伤，提高了党在群众中庄严的威信，博得了社会人士与爱好和平人们的赞助与称佩，使刘建绪呈报上峰闽浙红军只剩××名的立功，企图不得不招致蒋介石事后严防的指责，同样的给了叛徒们铁一般的事实回答与打击，这一切都证明了浙南的党在中央及省委的正确领导之下更加走向坚强的布尔什维克道路上迈进，可是另方面谁也不能否认的，在八越月的斗争中，浙南的党仍然存在着不少的弱点与错误，明显的例子是：

A、对省委的决议和指示缺乏及时而又精密的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形加以具体的计划和布置，结果当敌人凶残的大举进攻时，失去了各地区的中心领导，致使鼎平、福鼎等县的工作，遭受到极大的损失和数月来在该地区党的顽强的领导。

B、对某些地区的干部配备不适当，（尤其鼎平）与缺乏中心干部的配备，结果在领导机关转移地区时，失去了各个地区的中心领导，另方面由于叛徒所造成的恶果，其某些地区的干部，造成不能站脚或部分的促成自杀反水等事件。

C、对军略路线的运用，某些地区县的党不但没有根据上级的决定，而且造成了不少严重的现象，尤其是：鼎平的肃反工作，缺

乏明确的阶级路线，结果引起群众的不满与反抗，对红军问题不但不能保持有生力量，而且把原来之武装及部队遭到极大的损失，对联甲和保甲长的策略，因事先缺乏精密的布置和艰苦工作的作风，结果在某些地区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对进攻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也没有好的顾及，结果失去许多良好的机会（敌方士兵及中下属干部不仅动摇，而是对革命很表同情，并且在进攻中好几个整排整连与个别的拖枪过来。）

D、反机会主义与反叛徒的斗争，浙南的党是做得非常不彻底，特别是在鼎平、平阳两县，事先早已发觉党内某些同志犯了极不容许的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错误和倾向，可是事后不但没有好的处置，而且采取了绝不容许的放任现象，以致造成了平阳、鼎平两县的工作遭到严重的损失，（如江、周、操等错误的揭发，道岸、文楷等叛变发现后不能及时的揭发其反革命行动等。）

E、对红军实力的保存与武器的处理，鼎平、平阳两县的部队与武装极大部分的损失了（平、瑞及平瑞太、寿顺□、福鼎等县亦损失将近半数）这在斗争中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当然平阳、及鼎平两县的武装及部队的损失，浙南特委在某些问题的领导上，亦犯了同等的错误。

F、对肃反工作方面浙南的党在某些县区犯了两种不同的错误倾向，即是：

（1）三月前则犯了一种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结果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反抗，间接方面，助长了敌人的武断欺骗，造谣中伤等实效（特别是鼎平县上下东区对肃反工作执行了非阶级路线，形成了群众尾巴主义。）

（2）在敌人大举进攻中，对坚决反革命的首领及其爪牙，未能不失时机的加以镇压与处理，结果造成对反革命者一种不应有的放任现象。

G、浙南的党在紧张而又复杂的斗争，对问题的处理尚缺乏精密果断，结果在八个月斗争中，同样的遭到不少的损失（如对坚决反

革命分子处理，部队及人员的转移地区，反机会主义斗争未有及时展开，对突然事变不能迅速的处理等）。

H、在敌人极度凶残的进攻过程中，浙南各级党团聚与保存中下级干部与某些地区群众领袖的工作是做得非常不够的。特别是平阳、鼎平、福鼎等县，十分之七八的干部遭到损失与牺牲，其中有许多本可避免的，但正因为没有好的保存（结果在新的政治形势开展的阶段上，确给了我们很大的损失与教训。）

I、党的发展与党内教育，在敌人进攻中停顿了，没有深刻的了解与认识，在敌人进攻愈紧急残酷的时候，是发展党最好的机会，与加紧党的教育团结干部和全党同志最迫切的时候，正因为没有这样地深刻认识与了解，所以在敌人进攻中把党的发展党的教育停顿了，这是极大的损失和血的教训。

J、依赖性很重，专靠上级，缺乏单独和自动的精神。与独当一面的工作作风，结果失去了许多良好的斗争机会，甚至有时表示缺乏胜利的信心，以致遭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这不仅要警惕我们全党的同志，而且必须采取有效的方法加以迅速的纠正和克服。

K、对提拔干部在某些县区里缺乏正确的干部政策，往往只看他某一期的表现而把他提拔起来，甚至有少数分子已知其是一个流氓和成份复杂的分子，可是有时为了所谓无干部，或看其一时的表现好转而将其提拔起来，担任我们党内外的干部，然而当斗争遭到尖锐的时期，这些分子都先后的逃跑或叛变了，甚至把我们单位的武器和金钱携去投敌与为进攻帮凶。这不仅表现着我们组织不严密，提拔干部缺乏正确的干部政策，而且革命遭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这是极端严重的错误。

L、教育群众的精神有某些县区是缺乏耐烦细心的精神。如当敌人进攻时，部分群众有害怕，或暂时的躲避，我们部分的干部和同志，即认为这些人都是反革命了，尤其是当敌人进攻的先后，由于我们本身领导上尚存在着某些缺点，以致影响到某些地区的群众要求组织红心白皮的联甲（为了应付敌人之用，事实上完全是一种

策略的运用，并且先征求为各当地党的同意）可是我们的同志不但没有向群众作广泛而又深入的宣传解释。而且认为这是反动组织，始终不让群众那样去做，以致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反抗，事后当省委到浙南时由于策略路线的转变与进行了许多说服教育工作，结果极大部分地区之联甲转变为赤色的联甲了。

2.浙东南方面：

A、浙东南工作的建立，是牺牲了我们不少的干部，经过了许多的艰苦奋斗，由于党的领导正确，与各级干部一致的努力，不仅发动了纵横数百里之广大的工农群众，建立了宽广地区之组织，而且正因为对于策略路线运用得正确，结果取得了各阶层极大部分的人们对我们同情与拥护，可是由于叛徒刘达云负责后违背了党的策略路线与决议，结果使浙东南之工作和部队以及干部、遭受极大的损失（放弃了四个县的工作，损失人枪各三百余，中下级干部各百名以上，背去金银四万余，而且遭叛徒所害的群众更是一笔巨数。）这种惊人的损失与血的教训，是应该警惕全党同志的，假如不是为叛徒所害，浙东南整个工作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不但不至于遭到这种不应有的损失，而且会更加巩固与发展起来。

B、谁也不能否认，浙东南党的工作，虽由于叛徒刘达云招致了不少损失，但在另方面，浙东南的干部却仍是顽强无比的争取了不少的无上光荣。尤以范连辉，赵××二同志为骨干的领导着三大队(即现在的一支队)和各级干部在浙东南与×××及其军队与单独的作了半年多的顽强英勇坚决果敢与不屈不挠的残酷斗争。他们不仅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部队，而且展开了数县的游击战争，发动了广大的工农群众，巩固与严密了革命的组织，击溃和打击了×××及其军队不断的残酷进攻，锻炼了自己和全体将士以及工作人员，在此我们不仅对赵范二同志表示无限的钦佩，而且应号召全党同志一致的学习范赵二同志那种顽强奋斗的列宁青年的作风。

C、省委给谢文清同志的任务，是在瑞、青、永间进行工作，结果被叛徒刘达云多方的设法，将其派遣北线工作了。固然×同志

在此次斗争中同样表明了自已英勇行动，而且创建了新的工作地区，然而谢同志当时没有及时的拒绝叛徒刘达云一切不正确的指示，反认为刘达云是一个政治部主任，如何敢不执行其指示呢？然而我们的答复是：如果违背了党的策略路线和决议，谁也可以不执行谁的指示，相反的我们要与他作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方是正确的。

D、其次是，瑞、太、青的县委，当敌人大举进攻时，放弃自己的工作地区，而将部队及工作人员向瑞、太、平开倒车，结果将入仓全部损失，（事实上×××及其军队对浙南的进攻。较之浙东南更加凶残，另方面，对浙东南注意较少，同时，地区的群众直到现在对我们极表同情和拥护）这同样在斗争中给了我们一个不应有的极大损失和血的教训。

E、浙东南的党在八越月的斗争中还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弱点，便是阶级警觉性的不够，如叛徒刘达云和张友昆等，在行动上思想上业已不断的发现着许多可疑和不规的行动，然而一部分同志却犯了一种崇拜偶象，敢怒而不敢言的错误倾向，结果一再的让其发展，直至公开投敌与逃跑，这是一个血的教训，假如当时有一二个坚强同志能够起极大的核心作用吧，何尝不能步中央苏区时第七军某同志枪毙叛徒李明瑞的后尘乎？

F、团结一致的精神不够，致影响到整个工作和斗争，自叛徒刘达云和张友昆逃跑之后，在当时那样复杂而又紧张的斗争中，内部的团结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来得重要，当时负责的几个干部，不但不能如此，有时往往因某些管理教育上的事情而斗到几乎分离与动武的行动，这是非常错误的，正因为如此，以致在工作中、斗争中，失去了许多良好的机会，遭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同时给战士们及群众许多不良的影响，这急须引起我们的党和干部在今后斗争中必须迅速的纠正与克服。

G、兵运工作做得太差了，结果敌方拖了许多枪枝，甚至整排连的过来，除收容了一部分外，其余均没有好的联络和收容，结果

致使那些部队，遭到损失与惨杀，假如在敌人进攻的前后，能够很好的注意和布置这一件工作，我们是可以瓦解其许多的部队，与削弱其力量，而增强自己的力量，争取更大更多的胜利。

H、浙东南的党，对当地干部的提拔是非常不够的，除了支部和区一级吸引了一部分的当地干部外，其余的大部分的干部是往部队中抽出去的，当然在敌人八越月的进攻中，从一般的事实证明浙东南当地的干部，是有许多表示异常顽强，和忠诚的，同样的某些地区提拔当地干部比较注意的地方，则该地区的斗争表现特别的顽强，这证明提拔当地干部是如何重要，同时证明浙东南党对当地干部的提拔是异常不够的。

I、浙东南特委，过去对于各县区及下层干部的指示是异常缺乏的，据各县负责同志的报告，叛徒刘达云负责浙东的特委，在数月内除将省委决议和指示照转外，从未发过决议，并且很少给下属具体指示和帮助，至于巡视工作亦是走马看花敷衍塞责而已。

3.浙西南方面：

当敌人进攻闽浙边时，（一九三七年一月间）浙西南特委主要负责同志，随着省委代表某某同志，南下进至浙东南地区，省委认为当时斗争的需要，除责成省委代表××同志召集省委扩大会议，检讨与计划浙西南工作外，并要浙西南特委立即回到自己工作地区，顽强的精密的去领导和布置新的工作，（此时省委业已由浙东南进到浙南去了）。在二月底浙西南部队在胜利中，缴获敌人十二万分五万分及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则由南京军委会领来的）及其进攻的布置，与兵力配备及详细的计划，于是省委根据敌人的布置，讨论对付敌人的策略和新计划，另方面则给浙西南特委以新的指示，并指出进攻浙西南之敌系五十二师，他的战斗力及其内部的复杂腐化动摇以及该部士兵及下属干部大部分均领过苏维埃优待白军士兵的优待费，对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红军的政治影响，有了深刻的认识，（在中央苏区时五十二师是红七军面前的老败将）我们坚信如果浙西南的党能够根据省委的决议和指示，以及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去

计划与布置新的工作是能够给五十二师以极大的打击，而且在不断的斗争中，定能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与成绩。虽然浙西南特委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领导着浙西南全党的同志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行动区域和工作地区，巩固与加强党的组织和领导，保存了有生力量，灵活的运用党的策略路线，在自己行动区域内争取了各阶层极大多数人们的同情和拥护，并在行动上表明了自己的顽强与机断专行的英勇，战胜了敌人半年来凶残的大举进攻，奠定了党在浙西南以至闽浙边今后斗争的良好基础。可是在八个月斗争中，在领导上工作上，红军行动上虽然有了以上的成绩和胜利，但仍然没有完成省委所给予的预定计划和任务，其主要原因是：

A、浙西南的党保守主义遗毒仍然相当的存在着，尤其工作的发展还是限于偏僻狭小的地区，并没有发展到宽广的地区和城镇上去，结果对各个基点的联络，直到今天仍未顺畅的打通，甚至某些地区等已有了相当的基础，而在敌人的进攻中，将其放弃，这样一来，不但对浙西南各个工作地区未能迅速打通，且对其他各工作地区的联络，亦未能按照省委计划而实现，无疑的，对整个工作布置与发展上是给了我们极大的损失。

B、浙西南之斗争，经过了三四年之久，而且工作地区曾经发展到纵横将近五百里之宽，可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大胆的积极的提拔大批先进的当地工农干部，这在斗争中确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损失，党的中央曾经这样正确的指示我们，在目前新的革命阶段上，要将局部的工作转到全国，那就必需大胆的提拔大批先进的党的与非党的干部，浙西南的党对这一正确指示的了解与执行是万分不够的。

C、兵运工作缺乏有计划的布置。当敌人开始进攻时，省委曾经着重的责成浙西南特委，应针对着敌人进攻部队的实情，根据当时所处的环境，加以具体而又精密的布置，可是由于浙西南党对这一工作布置没有能多根据省委的指示去进行，结果虽然五十二师不断的整连整排的哗变，除少数的收容了外，大部分是遭到失败和遣

散，这在敌人进攻中不能不算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假如浙西南的党能灵活的运用党的策略和加以精密而又具体的布置，那末在敌人进攻时我们的胜利就更加伟大了。

D、军事行动上浙西南的部队是犯了冒险主义，如敌人正在撤退时，固然要集中我们的力量乘机反攻，可是浙西南之部队，此时还在攻击堡垒和与打硬仗，结果反浪费弹药，而且部队遭到损失，另方面对群众斗争的情绪上也受到不少的影响。此外对部队的教育虽然尚能进行，但缺乏无间断的突击的带着弹性的政治工作，结果部队中的散慢现象以及政治水平与军事技术的素养较之其他部队还存在一种赶不上的现象，尤其×××一贯的怕走夜路和不断的与敌人优势兵力撞钉子，结果将自己有生力量消耗殆尽时，个人就逃之大吉不知去向了。这是够引起我们加以重视和迅速的纠正的。

E、浙西南党的部分的干部还犯着一种骄傲自大的错误倾向，对干部中部分的不团结对整个工作的进行与党所给予他的任务，不能胜利的进展与完成，党的中央曾经这样指示我们：要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必须求得全党同志思想上行动上的绝对一致，然而浙西南部分的干部，是没有深刻的认识与了解这一指示的主要及其正确性，所以在八越月的斗争中确遭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F、以×××同志为首的贪污腐化现象，在浙西南干部中，还是表现着相当的浓厚，（嫖赌事件）结果不但影响到领导上工作上遭到不少的损失，而且在群众中对自己的信仰亦大大的削弱了，这些事件的发生，虽然浙西南的党曾经在会议上组织上给了某些同志以个别的处分，但始终未能彻底的转变与纠正，以致×××等因赌而被捕，另方面影响到一部分新干部与之同化，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须知在当时那样的斗争环境中，不但需要集中我们全部的精力，去迎接正在到来的复杂繁重的任务，而且需要加倍的努力，才能及时与适应当时的斗争需要，这不仅要号召浙西南的干部好好地反省，而且将借以教育全党以及每个干部和全体指战员。

G、许信根同志的牺牲，对浙西南整个工作上是一个极大的损

失，当敌人对浙西大举进攻时，信根同志率部来找省委，事后不能迅速的回去，这在当时斗争中不但可以战胜敌人，而且胜利与成绩就更加伟大了，正因为浙西南的党，没有这样计划与布置，结果许同志牺牲后，杨干几同志后又牺牲，×××也逃跑了，以致造成浙西南的党在领导上失去中心，省委给浙西南新的指示也没有收到，这是浙西南斗争中最大损失。

H、在敌人进攻时，浙西南的地区本来有好些地方是很巩固的，据下层同志的报告，当时如果能够依靠各县基本地区，采取分散进行居民工作，集中应付敌人的策略，敌人是无法找到目标，而且能够保存更多的实力，与巩固各个基本地区，可是当许、杨二同志牺牲后，浙西南的党将各地干部概行集中于一地，而放弃其他地区之领导和工作，这不仅是极大的损失，而是错误的决定。

I、浙西南的党，在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是没有适时的进行，如×××在敌人进攻中将人枪的遣散，×××为首的贪污腐化现象，某些干部在斗争中表现动摇，并没有及时的抓紧这些现象，在党内外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思想斗争，尤其×××同志的错误，当时未能遭到我们的干部和同志给以及时的纠正克服，这充分表现浙西南的党对不良倾向的思想斗争是没有及时的开展，这是八越月斗争中一个大的损失，同时也是血的教训。

J、当敌人尚在布置进攻时，我们等已得着敌人进攻的部署和布置，当时省委根据所得的材料以及浙西南的实际情形，给了浙西南的党以明确的指示，可是浙西南的党和负责同志，竟以外表镇静而骨子里毫无见识的词句说敌人进攻没有什么问题，以致没有具体的布置迎接行将到来的新局面和新环境，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如果当时能够适时与精密地去计划工作，和适当的配合干部，在坚持八越月的斗争是能够获得更多的成绩。

八个月斗争的总结：

1.由于中共中央领导得正确，与省委灵活的执行和运用了党的正确策略路线，闽浙边的党依靠各级干部和全党同志的努力，及以

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与爱戴，不但战胜了一切困难，而且在八越月的残酷斗争中，表明了闽浙边的党日益走向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敌人八个月的凶残进攻中，更加团结与巩固了我们党的组织，提高与加强了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锻炼与教育了大批干部，巩固与发展了我们的工作地区，开展了新的游击区域，创造了许多新的游击战术，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方式方法，无疑的，这些胜利与成绩的取得，是依靠于我们全党同志的努力，与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与爱戴。

正因为我们争取了以上的胜利和成绩，使××对闽浙边凶残的进攻计划与企图，遭到极大的阻止，尤其揭破了×××所谓闽浙红军只剩七个的武断欺骗宣传，遭到全部的破产，另方面表明了中国抗日人民红军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是不可战胜的武装力量。

2.谁也知道党的中央与国民党谈判成就后，由于×××的不诚恳，和企图打通日寇进攻的道路，消灭东南各省的游击基地和红军，结果动员了八师以上的兵力，消耗了几百万的经费（人力兵力财力和物质补充与清乡费用等)组织了统一领导和指挥机关，（当然他内部的矛盾与冲突是无法消除的）企图给闽浙赣皖四省的边区游击基地和红军各个击破，可是八个月残酷斗争的证明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假如在四省边区我党当时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关，那我们的胜利不但不仅如此，而且还能给×××这次进攻更有力地和更严厉的打击。

3.要保障每一计划与任务的顺利进展与完成，必须要求得党内思想与行动的绝对一致，然而闽浙边的党在第一届省委第十次扩大会议后，是有了极大的转变，但在敌人这次的进攻中，某些地区的干部仍然发现了部分的在思想与行动上未能达到一致的现象，以及违背了省委决议与指示，×××同志，身居县委书记之职，有时对特委的领导与指示不满，浙东南几个青年干部发现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之不良倾向．×××、×××等同志因闹私人的小资产阶级脾气，使部队和工作遭到极大的损失，这些都证明在思想上与行动上

不能取得绝对一致所以造成恶果，因此各级党各级干部在任何斗争环境中均应以最大的努力来克服与纠正本身存在着的缺点和错误。

4.反机会主义和反叛徒的斗争，未能及时的开展和争取必要的处理，结果不但不能及时的克服一切不良倾向，而且在各地区反遭到诸多不应有的损失，这是应该警惕我们的血的教训。

5.在八越月的斗争中，铁一般的事实教训我们，某些地区干部与部队能够与群众打成一片，则该地区之工作不但有了进一步的巩固与扩大，而且尚有许多光辉的例子，另方面由于某些地区的干部和部队不能与群众来打成一片，结果不但工作上以及部队的实力遭到极大的损失，而且对群众的情绪以及对以后的工作也受到极大的损失。

6.策略的运用在敌人这次进攻中，我们的确收到很大的效果与成绩，尤其在斗争中许多地区的干部能够自觉的去了解与运用党的策略路线，结果不能对各阶层各武装部队，以及乡保甲长和大刀会绿林等均收效不少，但另方面，某些地区不能坚决的执行党的策略路线，结果遭到不应有的损失。

7.走马看花敷衍塞责现象，在敌人这次进攻中，给了我们不少的教训，如果某些地区的党和干部能够与群众打成一片，结成难兄难弟的联盟，他不但战胜了一切困难，而且在斗争中更加团聚与巩固了党的组织，表现出他们许多顽强光辉例子，另方面某些的党，由于工作的不实际，未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则得到相反的结果。

8.通讯联络的密切与军政干部代理制度的建立，在敌人八越月进攻中我们感觉到非常重要，某些地区，由于通讯联络的不顺畅，结果不但使某些地区的斗争情形无法了解，而且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对于该地工作的具体布置亦无法进行，另方面过去缺乏准备党政军之代理人，结果在某些地区之主要干部遭到牺牲后，未能及时的建立起中心领导，以致影响到整个工作与斗争。

9.对兵运工作虽然各级党均有根据上级计划去执行讨论，可是始终没有训练一批兵运人材，和从各方面积极的着手进行（仅仅做

到标语传单口号等）这是我们在闽浙边行动数年中最薄弱最没有成绩的一环，正因为如此，所以失去许多良好的机会，与未能争取更多的成绩。

10.提拔创造引进和培养干部的精神，一般的说来我们是得到部分的成绩，但除浙南的党做得比较充分和有成绩外，一般说来是非常不够的，特别是对先进的革命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某些地区的党和干部都存在着二种惧怕的心理和现象，另一相反的现象，便是：某些地方的党和干部（特别是浙南有部分的干部）则认为工农干部没有象知识分子那样容易引进，结果对工农干部的提拔，犯了一种忽视的错误观念，此外对干部提拔后的教育未能及时加紧以及在工作中斗争中给以更多的学习与锻炼，以致新提拔起来的干部，常常感觉自己能力不够，与未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天才。

11.要纠正和克服工作中斗争中存在着的弱点和错误，正确的展开党内外反倾向的思想斗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思想和行动的绝对一致，才能完成上级党给予我们的任务与取得今后工作更大的发展和更好的成绩。

无疑的，在八越月残酷的斗争中，闽浙边的党，基本上是执行了党的路线，取得了不少的胜利和成功，尤其在第十一次常委扩大会议闭幕后，闽浙边的党在中央正确领导之下，发扬了以往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了不少存在的弱点，与更加团结的为党的新政策而奋斗。

(五)关于党与群众工作：

甲、党的方面

1、浙闽边党的建成及其发展的情况：

当挺进师于一九三五年到达闽浙边时，浙江党的组织除浙东有极少数的零星组织外，其他各地均没有党的组织，政委会根据中共东南分局的指示，及各地的具体情形，首先建立了松溪、政和、庆元、太顺等县某些地区党的组织，并迅速地打通了闽东闽北的联系。至一九三五年十月间则建立了景宁、云和、龙泉、遂昌、松阳、

官平、江山、浦城、汤溪、龙游、武义等县普遍党的组织。有些县份如武阳等县则部分的组织并正式的成立了浙西南特委，同时派遣了一纵队配备党政干部挺到浙东，将该地零星的党的组织经过数月整理后，亦成立了永、缙、仙、处等县某些地区的党的组织，是年十月南下开辟与整理了太顺、福鼎、平阳、瑞安等县工作，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正式的成立了浙闽边区特委，一九三六年三月间正式成立浙东南特委，一九三七年三月至一九三七年八月开展了永嘉、青田、瑞安等县工作，和平谈判成就前后，成立了台属工作委员会，当时党的数量是四千余，最多达到五千余党员，一般的说来，党的发展在挺进师胜利的影响之下和各级干部的努力，对于党的发展得到极大的成绩，但由于挺进师的干部党的工作经验不够，只顾大量发展而缺乏严密的巩固，另方面尚有如下的表现：

A、拉夫的倾向表现浓厚，最明显的往往观察其人一时的表现，而未加以严格的审查，以致个别地区吸引了部分的阶级异己分子，在福鼎、太顺、平阳一带，某些地区的党和部分的干部；只要开一个名字就算党员，经常在一起吃饭的就叫同志，十九年斗争时，参加过暴动的都说是老同志，结果把少数的叛徒拉进来了，不过这些现象在临时省委正式成立后，业已逐渐的克服与纠正。

B、缺乏有系统的建立各地的地方党的组织，在某些地区有了十几个支部而无区委领导，有的认人不认组织，同时上下级联系也不很密切。

2、党的教育：

由于斗争的开展，工作顺利的进行，加之挺进师活动地区的宽广，当时地方党的干部，异常缺乏，一般的说来，党的教育做得非常不够，支部生活也不能普遍的建立与健全起来，宣传教育也缺乏有计划有系统的去进行，尤其对马列主义的教育更是缺乏，大部分采取个别教育，或上级派人到下级去巡视工作时，利用开会等去教育同志，其次便是在某些地区，由于提拔当地干部不够积极，外地干部言语不通，除我们翻译外，对当地党教育工作上给予我们不少

的困难和影响。

3、党的影响：

由于内战时阶级斗争的尖锐，双方仇恨异常之深，这是党内一种普遍的现象，于是对先进的知识青年异常惧怕，以致未能大胆的使用，其次便是由于独立行动的时间较多，部分同志骄傲的心理增加，致影响其本身的进步，与对问题的处理缺乏以冷静的头脑去加以过细的思索，此外，则对当地的地方干部有时表现隔阂现象，尤其从部队中调去的地方工作同志，少数的轻视当地的地方干部，和不敢大胆信任当地干部去做，最后便是当浙西南浙南的游击基地业已创造后，部分的表现太平享乐和不愿到白区去工作，同样的对于策略路线的运用，下级党和干部有时表现不坚决的执行，特别来得明显的便是对肃反工作筹款路线和争取乡保甲长、大刀会、绿林兄弟的工作有时未能坚决执行上级的计划和指示，以致影响到工作和群众的情绪，另方面游击习气也很浓厚，缺乏正规化的作风，与照顾全局的精神。

4、党的领导：

在坚持闽浙边三年斗争中，挺进师和浙西南的党，表明着自己的先进和能够随机应变以及独当一面的艰苦奋斗精神，他不但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动了数十县的民众，扩大了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保存了自己有生力量，在某些地区分配了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且创立了成为今天抗战的主要支点之一，这正是东南局总结挺进师及浙西南党三年斗争总结所指出的；挺进师和浙西南的党基本上坚决的执行了中央的政治路线，而且在战斗中工作中获得了不少的胜利的成绩，正因为如此，浙闽边数百万群众对我党的拥护同情与爱戴，是普遍而又深入的现象。

乙、群众工作。

1、动员工作的简述：

（1）当挺进师进到闽浙边的时候，政委会动用了很大的努力，号召与教育全体党员和每个红色指战员成为“党与苏维埃的宣传者

和组织者"正因为这一教育做得比较深入与普遍和由于全体党员与战士们的自觉，因此挺进师和浙西南的党在坚持闽浙边三年斗争中，是起了应有的努力和积极的作用，他响亮的回答了政委会及政治部，每人每日写十条标语，找十个民众谈话，和以班排为单位随时随地举行群众大会，军民联欢大会与组织群众，以及建立党的组织的号召，他在行动上坚决的执行了革命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致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和获得了广大群众对我们的同情和拥护。特别是全体同志和每个红色指战员那种不分昼夜不分行驻军的疲倦之工作精神更是值得学习与表扬的。

（2）能够适时的转变工作方式与方法，以及灵活的运用党的策略路线，如大标语小传单的发挥，利用分发谷物机会进行充分的宣传教育与解释工作，早去晚归的工作精神，分散争取群众集合讨论问题的作风，化装演讲挨户宣传利用当地耆老和有威望的人士深入民间工作，利用姓名与宗族的乡民心理与群众结成骨肉相联、实际的救济灾民难民饥民与贫民普遍布置和有计划的召开用家长及乡里绅耆会议，集体慰问红军家属以及优待红色将士家属，另方面在短期内争取与教育了数万青帮与大批的大刀会及绿林兄弟，争取了不少的乡保甲长及绅耆。同时迅速的由没收政策转变到发征政策，由罚款转到募捐，由对立做到争取与互解，由恐惧知识分子的心理转到积极争取教育的政策，由敌对转到和平团结一致抗日，由秘密转到普遍的宽广地区及重要的市镇，由非法转到合法，正因为如此，所以闽浙边的斗争，能够克服严重的赤白对立现象，以及在宣传组织教育与武装民众的工作上收到极大的效果。

2、群众工作中所给予我们的经验与教训：

（1）有了党的正确领导具体计划，还有充分的动员工作，否则收效势必减少，甚至有时会行不通。

（2）计划不应过于庞大而应根据上级的决议与指示适合当时当地的需要，定出预料能够完成的计划与任务，否则，不但有名无实，不能兑现，而且很容易失去党的威信与削弱下层干部和同志的信

心。

（3）动员口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根据各个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定出简短有力而适合群众斗争重点去提出动员的和斗争的口号。

（4）计划决议确定后，必须派得力干部深入下层进行不疲倦的督促，报导，与帮助工作，特别是下级和同志遇到困难时必须耐烦而又细心为之解决与切实地去帮助他。

（5）奖励和指责，教育和劝导，必须灵活的运用。那种不分轻重，毫无朝气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都是无济于事反而有害的东西。

（6）要大胆与适时的创造大批当地干部，特别是有威望的干部，另方面要大胆信任这些干部去干，包办主义，事务主义，信而不用，打小算盘和狭窄经验等等都是有害无益的东西。

（7）不怕你的能力如何的强，办法如何的多，如果你在领导上不能取得干部与群众的信赖，那么你要建立党与群众中强固的高度威望是不可能的。

（8）群众工作要有埋头苦干与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另方面要具备胜利不骄傲败则不灰心的顽强斗争之常态，任何高慢轻举与昏头灰心的倾向和行为都是极端有害与足以障碍事业的进展和胜利地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

（六）坚持闽浙边三年中所得成绩及所给予我们的经验与教训：

甲、成绩：

1、挺进师和闽浙边区以及浙西南的党，在中央东南分局与闽浙临时省委的正确领导之下，进行了长期的坚决奋斗，基本上执行了党的路线与胜利的先进的党所给予的任务，开辟浙西南闽浙边宽广地区的工作局面，保存了许多优秀的干部，创造了成为目前抗战中最可靠的战略支点，以及抗日武装保持。

2、挺进师与闽浙边区，及浙西南的党，在当地和中央东南局的联系断绝后，能够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灵活的运用党的策略路

线，与顽强的坚持了三年斗争，这表明挺进师全体指战员与浙闽边区和浙西南的党，组织上坚强的信念与顽强的斗争精神，尤其在行动中工作中表明了自己的先进，团聚了成千成万成百万的民众，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揭露了敌人一切无耻的造谣与中伤。所以使得闽浙边的广大群众对党对革命空前未有的拥护与同情。

3、指明与教训了全党的同志以及社会上先进的人士特别是广大群众只要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在国内外形势如何的严重以及自己所处的环境如何恶劣，如能坚持到底团结一致与万众一心，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乙、经验与教训：

1、有了党的正确主张与正确的策略路线还须要坚强的有灵有识有远见能说能为的负责的干部作指导，这在十年斗争中尤其在坚持闽浙边三年斗争中给了我们铁一般的事实教训，假如没有这种干部，挺进师及浙西南的党在当时那样紧张复杂而又残酷斗争中，要独当一面的坚持闽浙边三年斗争与克服困难和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2、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与上下一致的团结要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与顽强的坚持斗争也是不可能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由于几个主要干部的不能团结一致，不仅没有完成党所给予先遣队的全部任务，而且反遭到惨痛的损失，在坚持三年斗争中，由于闽北闽东及浙西南的某些主要干部不能团结一致，不但未能集中全力一致对外，反而闹着小资产阶级无原则的纠纷结果不论领导上行动上工作上都未能取得更有力的配合和采取一致的步调。

3、共产党员及其干部特别是领导者，如果没有用远大的政治眼光去观察全局，照顾全面，与过细的分析和估计各种不同的环境与事件，而盲目的决定自己的斗争方向，或者马虎了事的去处理任何事件，都是极端有害和违背了共产党员的作风，因此我们应该具备远大的政治眼光与掌握住各个不同的环境抓事物的中心环节。精密而又具体的去观察时局和布置自己的工作。并以全力去为自己计

划与决定的实现作持久与不屈不挠的斗争。

4、不论在任何的斗争环境中，我们的干部尤其是负责者，必须具备大胆细心保持常态的精神，所谓布尔什维克的常态，就是胜利不骄傲，失败不昏头，所谓事事要过细那就是要有冷静的头脑，根据事物的发展与变化加以过细的思索和适当的处置，违背了这种原则，要达到事业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5、在环境越发严重斗争越发紧张的时候，加强党的领导与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党内外政治动员，以及耐烦而又细心的去进行说服劝导与解释工作，是特别来得重要，具有特殊的意义，那种所谓环境严重，赶快秘密，任人宰割的倾向与行为都是自我减进丧失自己斗志的有效毒剂，这在过去的斗争中给了我们不少的教训，例如在敌人残酷的进攻中，专门秘密不去工作，把敌人的力量看得如何的大，把自己力量看成显微镜下识别不出的东西，这些人不是自己牺牲或做了敌人的俘虏，便是把自己的实力丧失，有的甚至溜之大吉成了苟延残生去做人民公敌了——叛徒。

6、在干部决定一切的原则下，必须善于团结干部爱护干部使用干部，与不断的创造大批新干部，否则要坚持与适应长期的斗争需要，以及胜利的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都是不可能的。

7、决心是一切问题的成功之母，没有果断的决心，便是犹豫不决，任何事情都不能成就，但决心不是随便下达的，必须事先加以周密的计划与分析，然后根据各方面所具备的条件才能下达自己的决心，那种毫无思索，信口乱说的轻举或顾面子而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不去倾听与采取同志和群众正确意见的顽强脾气，不论对自己对党的事业都是极端有害的。

8、已往的游击部队往往未能及时的放下地方工作人员，结果把党的领导机关背起跑，这是极端不利而且有害的，因此不论任何的游击部队，党的基础一经建立，或群众条件成熟时，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的需要放下得力干部，专门致力于领导党的工作，但须在工作中斗争中不断加以督促指导与帮助，那种所谓从部队中派人去进

行地方工作，会削弱部队领导以及把干部放在某一地区始终不管的现象都是不好的。

9、斗争时机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条件尚未成熟，环境又不许可时，轻易的举动与行为都是不利而且可能性很大的会遭到失败，因为必须根据列宁同志所指示我们的斗争时机原则选择的正确指示灵活的运用到实际斗争中去。

10、要完成党的任务，要坚持某地斗争必须坚决的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决议，同时适时的正确的展开反两条战线斗争以及发扬我党独有的自我批评精神，同时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克服一切不良倾向与错误的行为，与保证党内政治上组织上与行动上的一致。和胜利的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

# 最 后 几 句 话

红七军北上抗日与挺进师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业已写下了光荣的一页，然而这一历史斗争的回忆，一般的说来，已经是旧话重谈了，不过在目前抗战已经进入到敌我相持阶段中，国内少数投降派与多数抗战派的斗争，以及少数分裂倒退势力与多数团结进步势力的斗争，各自向两极端展开日趋明显与严重的时期，我们写这样的一本小册子也有着他重要的意义，但必须向同志们说明的便是这一本小册子只能作我们历史的借鉴与参考，而不应拿他当作死的教条与经典，其次便是这本小册子不论在文法标点与词句上均有许多的弱点和缺点，敬希同志们加以多方的指正与原谅。

我们本来打算将红七军团北上抗日与挺进师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光辉事迹用小说体裁编印单行本并附每次战斗的详图与先遣队

和挺进师诸领袖之遗像与玉照，以及介绍诸领袖之生平，但因环境与物质的关系，只好把原来的愿望作罢了，抱歉之余，谨向同志致诚恳亲切的敬礼！

# 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经过的报告

乐 少 华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七军团由瑞金向东转而北上，出发前在瑞金经过了短时间的整理和补充后，全体计六千余人（内三分之二以上的新战士是出发前的二、三天才补充的），步枪一千二、三百支（其余背梭镖），轻机枪每连一挺（按一师编制算），重机枪每团一挺（详细难记忆，可参看给军委的人员武器统计表）并带有宣传品二百多份。按党政军最高首长所给我们的任务，主要有：一、渡闽江后即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广泛开展闽浙皖赣一带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与这一带的游击区和苏区发生联系，以加强他们；二、破坏敌人的一切交通，特别是杭州通江山的铁桥；三、到达皖南后创造新的根据地，并组织省委（命令原文很长，不能详记）。当时中央派曾洪易为中央代表兼任七军团政治委员会主席。

当我们接受任务后，按中央指示对行动是严格保守秘密的；任务是以后在行动中逐渐提出的。譬如我们从瑞金出发时，在部队中只提出了继续东线的胜利，更多消灭敌人。在苏区几天内的行动是带着休息性的，后来到了边区，军委会电令我们配合二十二师，打击在连城向我前进的敌人李纵队，结果是没有打到，第二天便继续由边区出发，向东行动。为了要出敌意外迅速渡过闽江，这时采取了急行军办法。在小陶碰到九军团，他们是奉命掩护我们渡江的，并接受我们在渡闽江前所征集的资材和伤病人员。这时期我们打开了大田县，一路上袭击了许多碉堡，缴了零星枪支约五、六十条；在樟湖坂渡河后，又击溃大刀会约七、八百人；渡河从第一天黄昏起，到第二天中午才渡完毕。总之，在这一阶段中的任务是顺利地

完成了。渡河后，因附近无适当休息处，于是决定向黄田前进，拟在该地做餐休息，但一路上八里一村或五里一村，都驻有敌人，有的是一排，有的驻有一营，都是水口敌人派来侦察并阻止我前进的；他们守着险要地形和碉堡。那时，我们面前一面是河，一面是山，无法绕道，只好用先头部队去急袭，急袭不开的拣死角绕道，后到达黄田宿营。黄田原有敌八十七师一营在那里驻扎，听说是我们部队来了，便连夜走了。那时我们的声势是浩大的，黄田宿营后的第二天，便继续向谷口前进，驻谷口敌人约一营，闻风向古田撤退。本来谷口是通水口和古田的交叉点，按原定计划是要我们向古田那条路前进的。我们到谷口后，就在那里宿营，预备第二天急袭古田，后来接到军委命令，要我们向福州前进，并要我们占领水口来纪念"八一"，并威胁福州，有可能则袭击取之。这时我们计算时间决定不在谷口宿营，于下午三时继续向水口前进，因找不到好的带路人，又是夜间行军，结果走错了路，走到第二天下午后，才在水口以北三十里地的一个大村子休息，后连夜去袭击水口，水口守敌八十七师四个营连夜闻风而逃，我们在半夜里就占据了水口，次早接到军委嘉奖电。因七军团过去在东方战线上的光荣胜利〔如一百七十里急行军击溃卢兴邦；进攻归化城的敌四个团，我们只二千余人，保卫了赤色归化；单独地攻开了永安城，缴到敌人与我相等的枪支；在三元附近(白区)，以少于敌人的兵力消灭了敌人一个旅等等〕，特给寻淮洲、乐少华、王永瑞，夏中兴以二等红旗奖章；给一排长、一战斗员三等红星奖章。我们就在水口纪念"八一"，并更详细地解说此次行动的意义，鼓动继续袭取福州（这时也不知道福州有多大）。第二天，便向福州前进，在距福州三十里地方休息，准备连夜袭取。可是，当下午三点钟出发时，便遭到敌人飞机袭击，死、伤四五十名，并妨碍了行动，当夜在离福州城十里地的村子宿营，第二天天未明，敌人飞机又来扰乱，并掷弹。当我们走到福州附近俯视"全景"时，大家都认为，如果攻进去了，也只能占据一角，否则兵力便会分散；福州实在太大了，飞机场也就在我们

面前，看到飞机不时上下起落，下午七时半，飞机仍在四周盘旋。夜间，我们只带了几个连下山，当我们放信号枪时，敌人的机关枪，手榴弹就乱打一顿。事实上敌人有了准备，全城的电灯点得比平时还多，并有八十七师全部在城，于是我们决定部队撤回，稍事休息后便继续北上。后来我们得到群众的报告，城内有一部分党员准备响应，因力量太弱反遭屠杀。我们部队离开福州后，走了半天一夜，就有群众报告，说前两天有闽东游击队到过，并告诉我们，再前进二十里便是龙溪渡游击区(地名恐有弄错)。我们便在离龙溪渡十里地的桃源坞宿营，因那时部队很久没有得到很好休息，加上一、二百名伤病员，部队是较疲劳的。当时我们还一面派人去游击区联络。当我们宿营时，又有群众来报告，说福州通桃源的大路上发现白军约一个团的人，我们便派侦察队出去，结果侦察队走错了路，敌人反进到我们哨兵线上，当时我就同粟裕同志带了第二师的同志，上去把敌人击退。在我们上阵地时，第三师已自动地向敌左翼攻击，而我们的第一师好久都得不到消息。事实上第一师在三师右翼抄敌人归路，周师长、政委都负伤，把部队撤回去了；二、三师攻击敌人最后阵地又没有成功，而敌人的空军不断向我们掷弹，因此，直到天黑都没有解决战斗。战斗结束虽然缴到了九架轻机枪和一、二百支步枪，但我们也伤亡了七、八百人，师，团干部受到重大损失，尤其是新战士，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伏在一块不敢动，有的转到芦草堆去躲避，因此这次伤亡的多是老战士，这里也可以看出我们政治工作的弱点来。这样，敌人和我们对峙着，等待援兵到来。所以我们决计连夜撤退，一面派小队向敌扰乱；一面发动全体工作人员和战斗员，在阶级友爱，不丢弃一个伤病员给敌人的口号下，把将近八百名伤员运向游击区去，由曾洪易、刘英同连江县委负责安置；我和粟裕带一个连，在最后掩护退却，当我们进了游击区，敌人就不敢前进了。当时，凡留下的伤病员每人发二十元，并把他们都化装为老百姓，经过政治上的解说和今后任务的部署，团以上干部一律带走。但当我们部队移动时，许多伤病员全都雇群众抬走，

他们哭着不肯留在游击区，要随部队行动，为这事情，我和刘英吵了一场，我说他工作没有做好，他说我不了解工作困难，事后我们还是冷静的解决了问题。以后在闽东省委协助下，逐渐的把伤病员安置了。打开罗源县后，又来了一次慰劳和解说。打罗源时，敌人是有防备的，但还是被侦察连偷袭进去了，把反动县长和保安团长都捉住了。敌一营全部缴械，所有俘虏都交给了闽东省委。我们打罗源县时，群众戴了小斗篷，拿了梭镖、扁担，足足站了有五里路长。县城一打开就自动拿东西，阻也阻不住，话也听不懂。经闽东省委动员，给我们补充了五百人，当我们离开游击区时，只剩下三名跟我们跑，我们索性也叫他们回去。我们在闽东除借手势以助讲话外，简直互相不懂，即使打手势也未必能讲清楚。我们在闽东时，一切工作主要是曾洪易指导，不过我们看到，闽东区的各阶级和平相处(商业比中区盛)是不对的。教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并给了其他许多文件。当我们由福州撤至游击区时，足足走了一天一夜，一路上都有地主武装，大刀会等扰乱，若走大路只要四十里就可到。这时曾洪易(他在敌人飞机袭击下和福州战斗中表现惊慌失措)认为桃源战斗是不应打的，而应掩护撤退。我们觉得在团以上干部会上指出，首先消灭敌人的意见是对的，但事先没有克服对飞机的恐怖观念(飞机来了乱跑)，加之部队过于疲劳，又疏忽敌情(事实上对游击侦察队干部的加强，即使进入游击区宿营也好)，干部指挥上独断专行，不了解战术的错误，如第一师自动出击和自动撤退，也没有同军团部联络，甚至找他们不到，致使兵力用在一线，失去突击力量，这就是不能消灭敌人的主要原因。这时接到军委电，指出我们急行军使部队过于疲劳的错误，要我们今后每天走三、四十里路，而曾洪易则认为应当快一些到皖南，在地方党不健全，不分散兵力(分散主力部队去打游击)，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的；粟裕同志则认为，在敌人追击部队追击的情况下，和敌人交通发达的条件下，为避免与敌主力接触，我们应采取急行军；我认为按军委电令，我们即可休息，又可工作，即使敌人来时，我们也可按情况消灭他们，或打击他

们。曾洪易认为，中央怎么会晓得我们的实际情形呢？他随后并举例子，如说，二、四方面军，中央都责备他们不对，但他们拒绝中央批评，事实上他们弄得很凶（意思是发展很好）。他的意思也要我们不接受中央指示而和他站在一起，快些到闽浙赣去休息整顿，然后再到皖南去创造根据地。我和刘英同志是反对的，寻淮洲同志自未渡河前跌伤手腕后，至此时才开始负责（先时由粟裕暂代），但他也没有什么一定的意见，不过我指出曾洪易这种破坏中央信仰的说法是不对的，大家都是一致和我站在一起的。但曾洪易以后还是说了多次，特别在较困难时来引用，例如要进闽浙赣以及后来在皖南的时期。后来，每天行军总在七十里以上（有几次路线没有调查好），当时闽东派了一个独立团随队行动，目的是在我们打开穆洋镇时，搬资材回去和接受伤病员。当我们打开穆洋镇的第二天，敌七十八师便向我们尾随而来（四十九师也在移动，但较远），本来那次是可以和它决战并消灭它的，因当时离闽东苏区较近，又有独立团配合我们，敌人虽在福安有新十师（肖乾部），但闽东游击队和独立团可牵制他们，战后伤病员亦易于解决，可是我们没有这种决心而很急地撤退了。我们在穆洋镇筹到三万现洋和五十几担烟土，穆洋镇是闽东一带豪绅地主的集中地，所以比较富裕，离穆洋镇的第二天（地名记不起），调查路线有两条可以去庆元：一条说是要翻一座高山，路又小又难走，叫三十里，实有五十里才能勉强找到宿营地，否则要走九十里方能宿营；一条是大路，走四十里路才可以宿营，但要多走一、二天。当时我就说，我们又不赶路，何必疲劳兵力，主张多走两天大路，而淮洲同志主张走小路，但当我说明时，他也没有坚持，就同意了。结果走错了路，淮洲同志到宿营地后就发脾气，并还骂人，意思是，走错了路是我不好。我说那是调查路线不正确的错误，并不是我不好，即使走错了路，也用不到发气骂人（他脾气一向是很骄傲的），后来因他继续不停地骂，我也就同他吵起来，那次吵得很凶，曾洪易就在旁边，当我问他，我们这件事究竟谁是谁非时，他说："你（指我），同我也有分裂，你们又不平心

静气，叫我怎么说呢？他这样叫我们平心静气当然是对的，但是因有意见分裂而存在成见是不对的。很明显，这次争论主要是由于急行军或缓行军的争论，但因提问题的方法不好，结果形成相骂的形式。当时大家都同意曾洪易意见，那当然是快一些去皖南或进闽浙赣，就不会发生什么争论了。以后的出发路线就由粟裕同志调查好，经过曾洪易和淮洲同意起草命令，由淮洲同志盖章后再给我盖章，这时我为避免争闹也就不坚持了。不过说还是说，说过就完。当时我们对外都是以政治委员方志敏和司令员罗炳辉名义出面的，所以敌人只知方、罗，刘英。我们部队将靠近庆元县时，庆元县长派了三个连以游击战术来阻止我们，他本人带了二个营（浙江保安队)来同我们作战。一个连在夜晚埋伏在山地下，想截击我们，被我先头部队缴了械，其余两个连第二天中午和我们伙伕担子碰在一起，他们以为是自己部队，问是哪部分的(他们是第九队称号，当时我们对外也称一、二、三支队)，我们伙伕便回答他们是第三队。他们便说："去告诉你们队长，今天来的不是小土匪，而是红军。你们停一停，让我们先走。"(他们原先以为我们是张克武部)当时，我们伙伕也背有多余的枪，一看不是我们的人，就扳起枪来打死了一个队长，其余的满山乱跑，我们缴了几支枪，捉到了俘虏送来盘问，才知狗县长还带了两营人在前面。他们跑山路比卢兴邦的还要快，一霎间军帽遍地，东西乱丢，如煮好还没吃的饭菜等。我们为着迅雷般地打击敌人，以便顺利地占领庆元县，便不停地继续前进，敌人经我先头部队一冲，便四散乱跑(因为还在等三个连报告)，那已是次日下午。我们进了庆元县(这是一个五、六百人家的小县城，但移到山北来未可称雄)。当时庆元附近久旱无雨，全城正在弄求雨的把戏，我们到后第二天就下雨，所以群众对红军格外尊敬，因红军来了天就下雨，虽经政治部去宣传解释，但这些影响在群众中还是有的。有的群众说："将来天下一定是红军的。"我们在庆元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晚上便向小梅江前进，计二天行程。第二天我们碰到浙江保安团第四和第二团，由副司令张子英指挥（据说庆元狗县长

溃散后，被浙保拉去当担架队员，他化装时把印信丢失，被我们捡来，因此浙保不承认他是县长，只好抬担架），占住了黄竹隘口，虽然被我们击退了，但我第二师师长在战斗中阵亡，损失也不少。因这一路隘口最多，我们在黄竹村集结稍休息后，便继续前进，一路四、五处隘口都因工事未固，被我们一冲而过，敌人的队伍不仅满山乱跑，有的躲在稻田里，有的躲在森林里，我们一路搜索，足有两连人被我们抓获，还有四、五挺轻机枪和两架重机枪。我们到小梅村把炮台里几条枪一赶跑，就占了小梅江，后从俘虏口中得悉，狗县长和副司令尚在黄竹溪，我们决计派部队去打扫战场，并搜捕残敌。在搜索时，许多群众自动帮助我们，后来找到狗县长也是群众之助。他已化装为苦力，同几个苦力住在一个草棚内扎担架，被我们抓到时，他为了要命，对我们恭维得真是无微不至。这次打扫到三架迫击炮，二、三十条步枪和两架坏机枪等。浙江的群众本来听说有兵就跑，我们到时，群众大都在家。在小梅江休息了一天，便向八都前进，这时敌人的飞机又在我们第一天宿营的村子扔炸弹，有几个村子被炸得稀烂，主要是因我们走后有的群众继续斗争，因此豪绅地主不明情况不敢回家（疑我们未走）。到八都毁坏了敌人的汽车三辆，为要安置伤病员和俘虏的土豪起见，我们决定向闽北靠近。在未靠近闽北前一天，闽北便派了一个独立营和我们联络，我们当时派第三师护送伤病员和押解俘虏的土豪，还有多余的枪支及四十担烟土去闽北，我们拟定在二十八都结集等待。当第三师出发后六小时，追踪我们的敌人已出动。侦察来报，系四十九师和浙保一团，但这时我们的兵力已分散，不能消灭敌人，故当时接军委电要我们消灭尾追之敌，我们是没有执行的。我们连夜撤至闽北苏区边界，当我们过汽车路时，截获汽车一辆，步枪三十支，现洋八千元，并俘虏敌副官一名。这时敌人已经停止前进，我们在闽北边区第一天，连吃一餐南瓜都找不到，第二天移到广丰县委附近，但粮食还是不够。从到闽东后，我们和军委通报很不容易，这时就产生了曾洪易要由闽北穿堡垒线去闽浙赣休息补充的提议，并去电要他们

派部队来接。当时反对最厉害的是寻淮洲同志，他不但反对穿堡垒线去闽浙赣，并且根本反对去闽浙赣。我感觉休息补充是需要的，但认为穿堡垒是不妥当的，后来经过军委电示，大家便一致同意继续离开苏区向皖南进发（电示和讨论记不清了），因为这是在敌人交通便利的地区，因此采取了急行军到了清湖镇，该镇系江山，衢州，常山之间的一个水陆要冲，因此堡垒也较坚固，但我们行动迅速，出敌不意，堡垒均被我前卫袭开。渡河后，我们命令第三师一面向常，江山派出适当警戒，主力集中在衢州方面，并侦察敌情（因那边已发现敌情，这时一、二师尚未跟到，当我们渡河到镇上后，便向常，江山方向去看地形。这时只有寻淮洲和我带了两个特务员和一班传令员，因传令员未到，我们便在镇的墙角处等，忽见从树林里来了四五个穿蓑衣的人，淮洲同志就说，第三师一定没有向这边警戒，你看这不是敌探。这时敌探仅离我们十余步，我便大声的说，你们是那里来的，并叫他们停止。他们听了我们浙江口音，便将两手往左右一分，一手是手枪，一手是炸弹，肚子一挺就说："我们是浙江保安队的，我们营长叫我们先来，我们营长也来了，在汽车里。"我说："你们这个样子哪个信你们是浙江保安队的！"我又说："你们有符号吗？"不要动，让我们搜一下，你们知道官长在这里吗？"他们说："那不要紧，我们营长就来了，你搜好了。"他们就不动，我们特务员就把他们手枪炸弹缴下，这时我们传令班上来了。他们一看势头不好，拔腿就跑，其余的也跟着跑。当时被我们击毙两名，缴到手枪四支，炸弹四颗，这时只听村子外一阵脚步声奔向远处和汽车发动声，轻机枪无目的的乱射，等我们率传令班到村子外，敌人已遗弃了三辆汽车。一辆最后的转身快，已驶得很远，其余的一窝蜂跑向江山离清湖二里路的一线高山守着。这时候我们的部队才到，如果早到一些，就可叫敌人全部缴械。这时衢州方向来的敌人已被我击退；这一营当我们一师队伍前进时也就溃逃了。我们就在清湖宿营。在清湖，我们捉到很多土豪，并有一男一女，自称是教员的，那男的并自称曾是共产党员，要随队行动，经

我们详细谈话后，看他观念也还接近。他自说曾在杭州坐过牢，到清湖是来避风头的，和组织上已经久失联络，后来我们将他俩留在皖赣边工作也还积极，当晚我们就派了政治部宣传科带一个营和侦察连去破坏铁路和铁桥，他们是没有完成任务的。第二天一早出发时，又派了一个主力师，并派了保卫局侦察科科长同去，规定第二天在招贤会合，要他们一定完成任务。当我们出发时，由衢州方面来了两个营的敌人向我截去，敌本有一团，因集合训话时忘记和飞机对空联络符号，结果飞机就丢炸弹，把这一营人打得稀散，所以只来了两营，都被我击退。江山之敌也派截击队，都被我击退。这时我们得到后队报告，说是有群众武装二、三百人找了红军几天，要投入红军，在清湖未过河时，正要派代表来接洽，因被敌机驱散，所以就找不到了。当时我们在闽北出发时，派出去破坏汽车路和迷惑敌人的一个团于这时归队，但去接应的一个团(实际是营)以后就跟不上，留在闽浙一带活动，归闽北指挥。当我们第二天抵招贤宿营时，前卫团派出去向衢州进行侦察的部队就发现敌人的四个团，结果成了相持局面，我第一师破坏了铁桥半只脚(炸药不够)，这时也回来了，就从敌后面夹击过来。敌人利用原有工事碉堡顽抗，当夜第一师就从敌人堡垒下通过来归队，我们大队便连夜撤离宿营地，少数与敌对峙。又派了一个团和侦察连由三师政委率领去扰乱常山，并在附近构搭浮桥，有可能并袭取常山，我们队伍天未明就向常山撤退。我撤退后，敌机就在阵地乱轰，常山实际已被我侦察连袭取。当侦察连到达常山城内，敌误认作自己队伍开门，有许多副官营长等来相见，但因三师政委疏忽，(后队好久不跟上)，又被敌发觉，结果，只击毙他们一个营长和捉了几个副官。听说当时俞济时也在常山。当我们渡河时，敌人又从大路派了队伍来截击，都被击退，常山敌瞪两眼看我们安全渡河，在那搭浮桥的船，都是常山城内的大土豪和什么委员家眷们所坐的行李船。我们并未进常山，但还是筹了万余元现款和捉了一批土豪（那船上的行李打开都是满目灿灿的好礼品）。当在招贤第一师归队时，因在黑夜走错

路，致使保卫局侦察科长和政治工作人员一行七人失去联络，后来自动归闽浙赣苏区，我们进苏区后才归队。渡河后，敌人便和我们暂无接触，那一带扩大红军成绩算顶好，每天可扩大二、三十名，一路上来的都是几个结队而来的。这时我们侦察队便经常伪装白军袭击敌碉堡和城墙，保卫局则派出便衣队会同政治工作人员在先头动作。我们到上方镇时，上方镇镇长见了我们侦察队，误认为保安队，喜欢得不得了，弄菜弄酒饭招待，又叫他们去看地形，每人发了一元多草鞋钱，又招了些镇上大土豪来开会。当开会时，我们便都捉他们到司令部来，在皖浙交界一带的反动的镇所保、乡、甲各长差不多都被我们诓捉完了。（自然是指我们经过的地方以及附近）。当我们到上方前一天，军委要我们袭取遂安，因部队自清湖出发后非常疲劳，更因遂安工事坚固，因此未攻。这时敌人分东西两路向我们夹击，每路约五团至六团，我们按军委电示，决定消灭敌较弱的一路，以实现各个击破的计划。但候了一天，敌人却没有来，我们估计不管哪一路，事实上敌人兵力比我们占优势多了。况且战后对伤病员处理问题在遂安附近是不能解决的，因此我们决计脱离敌人向皖赣苏区前进。我们部队经横沿镇抵马金岭脚（大概是磜头）宿营时，敌49师连同浙保两团便向我们分两路进攻。我们同他们坚持至天黑，我们便由马金岭向皖境撤退，第二天中午才在山坑一带休息宿营，这带又安置了好些伤病员（过清湖镇后都一路安置，待二次再来已有许多归队，那一带粮食也不易找，飞机天天轰炸，多少损失些。有一次又走错路，多走了五、六十里，当我们向查口前进时，一路都有敌阻我们的路，不过这时我因痢疾发寒发热，非常厉害，在担架上对经过更不详悉。在沱口我听到打清华镇未成，第一师政委受伤，观铺街也有战事，直到把查口地主武装消灭（原先是苏区被占不久）我们就占领查口，这时，尾我之敌就缓进了，我们在那休息三天，等待尾我之敌，前进而截击消灭之，一共又等了三天，敌又未前进。该处因群众跑光，给养非常困难，有些部队已有两三天找不到粮食，决计转移地区。在路上碰到皖赣特区书记

柳真吾和军区司令员周成龙，决定我们部队继续向苏区中心靠。并要我们打流口。流口系别动队和地主武装，虽被我们攻开，敌人流窜了，但不能解决粮食问题。然后，本欲攻祁门县，但在半途碰到李宗鉴旅的挡路，虽将敌驱走，但祁门县是打不成了。很明显，敌人已退回祁门去固守，否则便一路凭碉堡阻我前进。于是决计进向倒湖方面，但当我们宿营时，敌49师已赶上，相持了一天，缴了一架轻机枪，二十多支步枪，但我们消耗不止于此。第二天进至鸦桥，我们预料敌49师定要尾我前进，决计诱敌进鸦桥村而后包围消灭之。但战争结果是没有能满足我们的愿望，因敌人换了李文宾旅八个营并且是轻装的，他们进了鸦桥村，因我们兵力分散，动作不一致，致遭了敌人的各个击破(当时我们是不了解的)战争没有解决，我们便连忙撤进苏区，在犁痕附近休息整顿了三天，并安置了伤病员。这时，部队已不足两千人，在流口出发时又被敌袭击，一个侦察排失掉联络。在倒湖时，皖赣独立师本叫他们去袭击敌后方，以扰乱迷惑之，结果被敌隔绝，失去作用。我们的意见，如果要继续作战，那我们必须要补充，但皖赣区委答复我们十天之后看动员结果如何，很明显的，我们是不能等这么久的(因敌情如此)最后谈话中我们知道他们是怕我们补充后就走，所以他们不愿意，我便又找周、柳二同志来谈，说明我们北上任务，并告诉他们，我们的目的也是要消灭敌人，何况依靠皖赣苏区作战，对我们部队也是有利的，同时保卫和扩大皖赣苏区也是我们的任务。经过这次谈话，他们才答应给我们补充(后来动员了四个连约五百人)。补充后，我的意见，在苏区敌人不易摸清我军位置，我们应结集主力于适当地点以打击尾我之敌，洪易则认为，为提高部队情绪起见，应消灭较少的敌人或打开几个较富的村子，以解决给养问题，后来大家同意了洪易的意见，把横截苏区的官村坂(不详)敌堡打开，并缴了80余支步枪，本来继续去打石门街，但在半路上我们接到区委通知，敌人向犁痕前进，我们赶去截击时，敌已进了犁痕，是分三路(49师和李宗鉴旅)进的。我们特区继续打击敌前进时，结果形成

了盘转式，我们去截击时，敌早已尾我行进路移动，而我确尾在敌行进路。当梨痕被占领时，洪易就主张退出皖赣，我们则主张继续截击，（补充后我们本来决定在皖南和皖赣间活动，所以当时就组织了一个独立营，派了师长政委各一名前去。去时，因某种耽搁分为两路，先去皖南布置，并取联络，在附近活动，结果政委王天弄的一路因走不通回来了）。在第二次又截不到后，当晚我们就接到中区电示谓敌一共调集22个团(大概此数)分六路向我们"围剿"，企图一举消灭我们于梨痕苏区，要我们连夜脱离敌人，向皖南或闽浙赣，由我们自决。因当时洪易已要去闽浙赣，并又举例子说中央不了解实际情形，而我们主张去皖南，在未去前我们则主张主力在皖南与皖中间行动，我们并且先派了一个营，派师一级干部负责指挥，先去皖南联络和(活动)布置，但因敌人当时的布置是防我们去皖南的，于是连夜由敌人空隙外通过向闽浙赣行动，第二天又遭到李旅在倒湖附近的攻击，使部队更疲劳。这时部队弹药很少，自庆元县后就没有得到补充，并解决棉衣问题，当我们进入闽浙赣后(经过两道封锁线)，在省委领导下发动了群众对我们进行了很大很热情的慰劳，计猪有千余头，草鞋有五万余双，鸡鸭以及粮食糖果等慰劳品堆积如山，数也数不清。这样大和这样热烈的慰劳，是我们七军团所没有碰到过的。第二天志敏同志由葛源来储田桥（我们驻地）后，我们商量了就派了许多代表去各地作报告，并发了两万现洋(向省委换苏票后)去慰劳伤病人员。志敏本来是叫洪易一同去省委的、于是我就利用时间和洪易商量召集了政治委员会会议，来一次比较原则的检阅，并邀请志敏参加此会。在检阅中，我们认为七军团没有完成中央所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由于政治领导的机会主义这一倾向，特别在福州战争之后，表现得更明显。正因为福州战争没有解决敌人（所发生个别干部对战争和敌机惊慌失措），而主张快一些去皖南，实际上就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这一倾向的主要代表是洪易，我们有些同志虽同他作过斗争，不但没有克服这一倾向，反而本身也染上了机会主义。同时又指出洪易一路上几次

胡说中央不懂实际情形的，是企图破坏中央信仰，是不对的。这一意见，除洪易外（他会后就很气的独自去葛源）都是一致的同意了，我们把这个意见，当时连同检阅经过，曾发了一个电报告中区。后经中央复电指出，不仅仅是机会主义错误，而是形成了严重的洪易的退却逃跑路线，并指出我们都是执行了洪易路线。在十月革命节那天，我们召集全体军人大会，纪念十月革命，并请志敏参加。

七军团部队就在储田桥休息整顿，大概一共补完了五百人及弹药等等……我们过后又详细的检查了这次行动的经验和教训。在检查中指出了干部的团结问题，在艰苦奋斗中更须要有同志的一致的团结，但我们有个别主要干部有时竟形成我怪你你怪我的推诿现象，致形成相骂式的吵架，缺乏理智的互相交换意见来克服困难，特别负领导责任的干部，是不应该的。正因为福州战争以后所产生的对战争没有信心的机会主义观点，没有从实际工作中更深一层的来检查和揭发这些错误，致有许多次可以消灭敌人的机会都失去了。正因为想快些去闽浙赣和皖南，把中央所给我们的任务不能完成。事实上不从政治上来克服机会主义观点，不从战争胜利中来消灭敌人，创造和扩大根据地，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队伍常在急行军中过疲劳生活，使破坏敌人交通方面的工作也没有很好准备（特别对炸铁路）。在“不派队伍和没有健全的地方党是不可能的”借口下，（洪易意见）广泛开展抗日的游击战争和许多地方可能进行的工作，都在急行军下被拒绝了，末了我们又指出，虽然这些严重错误下，正因为全体指战员英勇的艰苦耐劳精神和党的领导正确，我们还是获得了许多的成就，并指出今后任务和胜利前途（从略）。根据了这一总的检查，更详细地检查了各部分工作（不易回忆）。这一报告，是凭我个人的记忆写的，很明显，有许多是可能遗忘的，因为没有详细地图和日记为凭借，又隔了足两年，不过一般的还是大部分都写了。

七军团自瑞金出发，以至过闽江的敏捷行动，是顺利地完成了它自己所负的任务，因它在准备工作方面，事先就较充分，军事上

教育主要是关于渡河动作，政治上同样为着完成军事任务而进行。一路曾以问答式的测验，作为战士相互讨论的题材。其他关于保守秘密和发动老战士帮助新战士学习（平均一个老战士要分到两个以上新战士）均进行了。比如关于保密问题，政治工作人员扮着老百姓去问新战士：同志你们是那一部队？他的回答是红军。你再问他，他就说你为什么要问，于是定要拖住政治工作人员到指导员那里去。因为他认为这样问是值得注意的。虽然在过江前是采取了比较急的行军，但这完全是需要的，因你不快，水口、黄田、谷口敌人都有阻你渡河的可能。同样，战士们经过在苏区休整，体力是好的。渡河后本应结集休息一天的，但因附近没有宿营地，同时通水口的只有一条路，一面是河，一面是山，如果黄田、谷口等一路村子敌人筑工事以阻我前进是很有可能的，所以这一路的急袭还是需要的。

军委原先让我们走古田，那是对的。后改叫我们走福州，就不完全对了。因为威胁福州，不一定要从福州城旁走过。事实上，我们过江时，声势浩大，敌人捉摸不到我们究竟有多少兵力，因此当我们前进时，水口敌人闻风而逃。假使我们派一部队去游击，敌人还是要逃的。相反的，我们部队在福州时，让敌人检阅了一下，增加了不必要的疲劳（因为有可能要袭取福州）和蒙受许多不必要的损失。因敌人有了很好的依托和很近的飞机场。敌人一定要和我们求得战争的，虽然主要的七军团本身还有许多错误和弱点，同时，当我们到福州城旁时，敌人就开始从后方迅调四十九师、六十一师和七十八师来闽。

当进攻水口时，路线没有很好调查，致走错路，结果使敌人安然退走。

在水口经过了各种政治动员，军事上又提出了夜袭城市的动作，但在出发后第二天，又因疏于防空（大家以为五、六点钟就没有飞机来）而敌人就利用这短距离内，用空军向我们施以突然的袭击，致受损失而妨碍行动。

这时洪易就感觉敌人飞机厉害，我们快些走为上，但我们觉得既已到了城下，定要施以有可能施的袭取(军委电示)和扰乱；但当时对部队中，关于对空军恐怖观念的解说是不够的。

桃源战争，事先是轻敌疏忽的，和不过分估计疲劳，则应事前先布置消灭行进中敌人，因我们早得到群众报告，而对侦察队的派出，还是很马虎的，即使不战，那么再进十里游击区休息，我们的实力还能保住着，敌人也不敢轻进，即使在游击区作战，对我们也有利多了。战争一开始，首长坚决消灭敌人的决心是对的，主要的是干部独断专行的错误，以致我们调不到一师，而我们也来不及联络，兵力又放在一线，自动的出击，又自动的撤退，这样使敌人巩固了最后阵地，而敌机来时，队伍也就乱跑，致损失更大。同时我们感觉大部分没有经过相当训练的新战士，增加了我们很多困难，你说他不勇敢吗？他和老战士一起，已冲到敌人跟前，但当干部和老战士倒下时，他们就都睡在地上和躲在草丛里，经过我们一个个把他叫起来，才冲上去。其他许多详细的检查，已不能记忆，就从略。但洪易的“这次战争不应打”的说法，我们是不同意的。可是当时没有更进一步的来分析他的讲话的出发点和立场，没有把他在福州以致福州后的恐慌情绪联系起来而给以彻底的揭穿，甚至当他要快一些去闽浙赣和皖南的主张，只是局部的争论一下而已，这样就自然使这一机会主义观点影响了其他许多干部，而我自己也象老太婆一样，也就跟着跑，实际上执行了他的逃跑退却的机会主义路线。正因为如此，以后对消灭尾追敌人的决心就减弱了。以至几次的失去机会，同样的还跌入在对战后伤病员解决的困难里兜圈子，事实上应更清晰地来研究每次战争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彻底揭穿福州战争以后所产生的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所给我们带来的损害而坚决执行军委指示，也只有这样，部队才不至于无目的的乱窜不止和不必要的过分疲劳。

正因为这样，有些干部，特别是我，感觉脑子里转不出什么来，而形成易于发怒的吵架和争论。这是一种不容许的严重错误，

应该是冷静的头脑和详细的研究，干部间更应团结一致的互相说服。

以后主要错误，还是在无目的的急行军和乱窜，几次战争都不是我们布置打敌人，而是敌人已打到我们哨线上和阻路敌人所不免的战争，除鸦桥战争外都是如此的，这样毫无疑义的增加了以后更多困难，使部队更陷于疲乏，战斗力也无形削弱，而敌人因为没有遭到打击，而更大胆起来。这样洪易的快去皖南主张和快去闽浙赣主张，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就得以实现。

此外我还感觉在瑞金出发三天前补充了三分之二新战士，一路上给我们增加了很多困难，同样的还有笨重的宣传品(二百万份)，先时担子还少，后因疲劳挑不动而分担，担子就增多了。

我们自过闽江后是孤独的，没有一方能配合我们行动，尤其是闽浙赣部队，早就应该出动配合我们的。

虽然七军团领导者本身有许多严重错误和弱点，但它在艰苦斗争中对部队团结还是一致的，当他们在清醒时，都是能一致团结着为党的路线而奋斗，是军委的指示坚决执行者，这多次事实可以证明，如反对洪易破坏中央信仰时和几次同洪易斗争时，我们都是团结一致的。

# 下　编

## 闽赣十年斗争的片断回忆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宣　金　堂

我是江西省弋阳县余家仓村人。余家仓靠近横峰边境，有七十多户。一九二六年夏天，党派一个名叫马维琦的年轻知识分子来到余家仓，开展革命工作。在他的帮助下，村里成立了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记得当时他还教我们唱了一首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畅，齐欢畅！"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之前，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风声已经很紧了。就在这时，党又派一个名叫郑祖林的同志到余家仓来。他告诉大家："眼下形势很紧张，蒋介石要屠杀我们工人和农民，要缴我们工农纠察队的枪。现在陈独秀很右倾，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欲盖弥彰。你们村要赶紧准备武器，成立贫雇农团。"事后，我们村农民协会就从外地请来一个铁匠师傅（玉山人），名叫"三崽师"，日夜开炉，制造鸟枪、梭镖、腰刀、铁尺。又规定十六岁到四十五岁的青壮年农会会员，都要拿起武器，保卫农会。贫雇农团也很快组织起来了，凡是参加贫雇农团的，都喝了鸡血酒。

余家仓的恶霸地主宣秉斋对农会又害怕，又仇恨。这时他听见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风声很紧，便故意摆了一桌酒席，请郑祖林吃饭，企图趁机对郑祖林下毒手。农会当然知道"黄鼠狼向鸡拜年，没安好心"，当下来个将计就计：郑祖林按时前去"赴宴"，贫雇农团的一伙精壮后生，则悄悄把宣秉斋的房子包围起来。正当宣秉斋在酒

席间要对郑祖林下毒手的时候，我们贫雇农团冲了进去，把宣秉斋生擒活捉了。当天，我们把宣秉斋押送到漆工镇警察派出所雷夏同志那里。雷夏同志连夜升堂审讯，打了宣秉斋一百大板，然后关押起来。第二天，农会宣布没收宣秉斋的全部财产。活捉宣秉斋，大长了我们贫下中农的志气，大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大大地激发了群众的革命斗志。

不久，我们迎来了一九二七年底方志敏同志领导的弋（阳）横（峰）农民武装大起义。起义区域，包括我们余家仓村，都建立了劳农政府。打土豪，分田地，搞得热火朝天。

反动派当然是不甘心的。一九二八年二月，敌人开始向弋横起义区域大举进攻，革命形势暂时转入低潮，特别是一九二八年夏天，是个非常艰苦的时期，方志敏同志带领游击队上了丁山，在这一带同白军周旋，打了许多胜仗，我就看见许多白军士兵败逃回来，一个个拐手拐脚，非常狼狈。敌人占领余家仓后，强迫老百姓成立"清乡委员会"。为了应付敌人，我们就来个"白皮红心"，派了一些可靠的人打进"清乡委员会"里去掌握领导权。一九二九年农历正月间的一天，方志敏悄悄来到余家仓，就藏在"清乡委员会"主席宣洪斌的家里。驻在烈桥的白军连长带兵来搜查，宣洪斌就对白军连长说："我们这里刚刚清了乡，你们的兄弟又来翻箱倒柜，搞得老百姓非常害怕，这样下去，我这清乡委员会就无法工作了。"白军连长一听，也觉得有理。为了对付这伙白军，保护方志敏的安全，我们杀了一头猪，凑了一百元"草鞋钱"，把他们打发走了。白军一走，方志敏同志便出来同大家开会，商量对付敌人的办法。

一九三〇年，赣东北苏区进入全盛时期，发展很快，红军队伍也壮大了。那时，余家仓驻着红军的团部。一天上午，方志敏同志来到余家仓，主持召开连长以上干部会议，帮助匡龙海同志改正军阀作风。为什么要帮助匡龙海呢？因为他是从白军中哗变过来投奔红军的，后来当了红军的一名指挥员。由于他长期在旧军队里生活，沾染了较严重的军阀作风，不了解我们红军的性质，所以常常

打骂红军战士，动不动就拿军棍打人，搞体罚。会议上，匡龙海对方志敏说："我虽然在红军里当了官，但你要我不打士兵是不行的。"方志敏耐心地回答他："我们是红军，不是白军，我们的战士都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群众，是阶级兄弟，怎能随便打他们呢？老匡，你现在是一名红军指挥员了，应当懂得这个道理。"匡龙海开始还不服气，说什么"中国人是骆驼性，不打不行"，方志敏对他的这种观点严加驳斥，争论得很激烈，还拍了桌子。经过大家的帮助，匡龙海才慢慢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就在这次会议上，这里的红军废除了打骂制度，整顿了部队纪律。后来匡龙海同志成了红军一位出色的指挥员，当了红十军的参谋长，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进军皖南后，又当了挺进师长。我在皖南的泾县、小河口等地还见过他。

一九三二年冬，我在红十军工兵营当营指导员，不久便调到省军区政治部指导员训练班学习。大概是十一月尾的一天，军区政治部组织部李白部长通知我说："省委要组织一个闽浙赣省军事学习参观团，到中央苏区去参观学习，决定你也参加。"我听了，真是喜出望外。

几天后，闽浙赣军区赴中央苏区参观团就在省委所在地的葛源区枫树坞正式组成。全团六十人，都是团、营、连、排级干部，其中赣东北四十人，闽北二十人（在闽北苏区等候）。团长刘毓标同志，弋阳县人；政委韩奏三同志，万年县人。出发前，方志敏同志接见了我们。他说："同志们，为什么要派你们去中央苏区参观呢？是为了学习中央红军支部建在连上，做好政治教育工作的经验；而且也为了培养、造就我们赣东北和闽北红军的大批骨干。你们到中央苏区后，要虚心学习，不可傲慢，把经验学到手，带回来生根、开花、结果。"

参观团是取道闽北去中央根据地的，要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全靠两条腿。出发后，先由省委武装交通队护送到闽北苏区管辖的紫溪（即今铅山县的紫溪）。在那里，受到闽北红军独立师长黄立贵

同志和师政委邹琦同志的热烈欢迎和接待。休息两天后，翻过武夷山分水关，到达闽北苏区所在地的大安（即今福建省崇安县的大安），闽北红军参加参观团的二十名同志，同我们会合了。当时，我们赣东北去的同志穿的是旧军装，戴的是大盖帽，闽北特委书记黄道同志（他原是闽浙赣省委组织部长兼红十军政治部主任）就风趣地说："哎唷唷，你们这身打扮不行呀，到了中央苏区，人家会讲：'那里来的俘虏兵？'你们一定要换了装再走。"就这样，黄道同志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灰咔叽新军服和列宁帽，又发了两元零用钱。黄道的爱人吴品秀同志还带领妇女慰劳队，给我们每人送了双漂亮的新布鞋。晚上，又举行了欢送大会，黄道、薛子正、黄富武、李静愚等闽北苏区的领导人都参加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红军邵光独立团来到崇安县的星村接我们，担任护送任务。团长是湖南人，矮矮的个子。我记得当时他对全团战士讲了这样一段话："同志们，我们到达星村，是来接闽浙赣军事参观团的，责任重大啊！不论遇到什么风险，碰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护参观团全体同志一路平安。"此后，我们就在邵光独立团的护送下，往黎川走。这一路要经过一些白区，同敌人发生了几次遭遇战，都被邵光独立团击退了。一过黎川县的黄村，就看见三三两两的红军战士在帮助农民分田，田坂插满牌子。

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驻在黎川县城。当我们走近城门口时，只见城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欢迎我们的标语；更使我们激动和欣喜的是，朱德总司令竟在城门口亲自迎接。他身穿洗得发白的灰军服，戴一顶列宁帽，穿一双布草鞋，身背斗蓬和牛皮公文包，手枪系在横皮带上，神采奕奕，和蔼可亲。"啊，他就是我盼望已久的朱德同志吗？他就是令敌人闻名丧胆的朱德吗？"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真想离开队伍跑过去说："朱德同志，我终于见到您了！"朱德同志热烈地同我们握了手，亲切地说："同志们，你们走了几百里路，都辛苦了！"进城后，我们来到一座祠堂，大概是个红军俱乐部吧，在这里洗脸、洗脚，休息了一会，就举行茶话会，桌

上摆满了点心。朱德同志又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频频地招呼我们喝茶、吃点心，满面春风地说："我是第一次看到方志敏同志从闽浙赣派来的参观团，心里感到高兴，感到愉快！"象拉家常似地随便和我们交谈。谈话中，朱德同志说："你们那里反帝反封建搞得很彻底呀，妇女都剪了发，放了脚；你们赣东北红军也很能打仗，方志敏同志领导有方呀！"

在黎川，我们度过了一九三三年元旦。除夕晚上，总政治部设宴招待我们，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康克清等同志都来了。这些领导同志同我们亲亲热热，谈笑风生。那时，周恩来同志还年轻，蓄了胡子，双目炯炯有神，讲起话来很风趣。忽然，康克清同志大声地说："同志们，周恩来同志会讲五国的话，大家欢迎他唱个法国歌好不好？""好！好！"我们噼噼啪啪地鼓掌欢迎，高兴地嚷着。周恩来同志也不推辞，站起来就用法语唱了支《马赛曲》。唱完了《马赛曲》，周恩来同志也大声地说："同志们，欢迎朱德同志唱个德国歌好不好？""好！好！"我们又热烈地鼓掌欢迎。朱德同志推辞不过，放声唱了。整个招待会乐融融、暖和和的，非常愉快。度过了元旦，我们就参观了驻在黎川的红五军团几个连队的列宁室，听了连队指导员关于支部建在连上，做好政治教育工作的经验。红五军团还组织一个连队为我们表演了"劈大刀"。

一九三三年一月四日，参观团离开黎川前往瑞金。一月五日抵达福建泰宁时，肖劲光同志接见了我们。经过几天的长途行军，最后终于走到了目的地瑞金——我们工农民主共和国的首都。当我们不顾旅途的疲劳，兴奋而激动地走进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大会场时，受到一位老同志的欢迎，他慈祥的面孔上堆满笑容，亲切地说："欢迎你们，闽浙赣来的同志们！"这位老同志是谁呀？，据工作人员告诉我，是林伯渠同志。我不觉肃然起敬。到沙州坝后，原以为一定能见到毛泽东同志，哪知遗憾得很，据说那时毛主席不在瑞金，所以当临时中央政府为我们举行欢迎会时，只见到项英、博古等领导同志。项英、博古同志在讲话中，都表扬了闽

浙赣的工作。

为了使我们更好地学习中央红军的经验，参观团的全体同志被送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总校学习，校长兼政委是叶剑英同志。我们入校时，第二期学员尚未毕业，第三期没有开学。我们便随第二期全体学员开出去"打野外"，半个月内，先后到了闽西的长汀、龙岩、上杭等地。回校后，第二期学员就毕业了，第三期正式开学，我们又作为第三期的学员，分别被安排在政治、军事、炮兵三个队里学习。我分在政治队二连。一开始就学习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由叶剑英同志主讲。他讲课时，一杯茶，一包烟，不用讲稿，头头是道，大家很爱听。这样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正当我们学习得津津有味时，校本部突然宣布：方志敏同志来了电报，要求让我们提前毕业，立即返回闽北和赣东北。

一九三三年二月下旬，我们带着红军总校送给闽浙赣省军区的两担军用地图离开瑞金，经博生（今宁都）、广昌、黎川、光泽等地，到了闽赣省的资溪。在这里，见到了闽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邵式平同志。他是我们的老首长，和我们参观团中的弋阳人又是同乡，见面后非常亲热。在邵式平同志的建议下，我们在资溪参加了土改，帮助农民分田。后来，经邵式平同志与闽浙赣省委电商，又留了一部分同志在闽赣省工作，如韩奏三、熊加财、张火旺、刘凤生等同志，都留下了。

一九三三年割早禾的时候，我们终于回到了赣东北。省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分配我担任弋阳县独立营指导员，不久我便投入了反"围剿"的激烈战斗。

一九三四年上半年，肃反还在进行。横峰猪头山保卫战后，我所在的红军部队开到上饶县的坑口街，这时我担任连指导员。后来师政治部通过团部来了命令，调我任红十军二十八师俱乐部主任。我到任不几天，就把我叫到军部政治保卫局予以逮捕，据说是三连一个指导员在刑讯中把我也供了出来，说我也是"反革命"。提审时，我们团的陈政委对我说："有人招了你。"我说："我不是反革

命。”第二次审问时，我仍拒不承认，他们就把我吊起来打，把屎都打了出来。第三次审问时，我说：“我是共产党员、贫农，只有革命才对我有好处，我怎么会去当反革命呢？”他们说我顽固不化。最后他们把那个指导员带来“对证”，那个指导员怕挨打，乱招供。我被关进监牢，戴上手铐脚镣，等待判决。这时，我一边坐监，一边回想起曾洪易来到赣东北后给革命事业带来的灾难，许多同志被无故地打成反革命，遭到杀害。吴先民就是最早的一个受害者。一九三二年上半年，我在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时，曾洪易就把一些肃反对象关在杨家祠堂里(军校地址)，命我们学员轮流看守。当时，吴先民也关在里面。吴先民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弋阳方志敏，横峰吴先民，二人共产来革命，都是救穷人”这首民谣，我至今仍记得。当时他们搞了个“苦肉计”，把一个同志故意打得皮开肉绽，然后同吴先民关在一起，对吴先民进行试探。我还听说，曾洪易还把司号员学习班的学员们都打成“AB团”，一律逮捕。而这些学员都是十四、五岁的少年。曾洪易大搞肃反扩大化，搞到后来，弄得两个人都不敢在一起走路。我还听说，有的地方，把整个党支部的同志都打成“AB团”、“改组派”、“第三党”，弄得人心惶惶，个个自危。“左”倾错误的危害何等严重啊！

坐了两个多月的班房，一天上午，政治保卫局的卫队通知我到法庭听候审判，并下了我的手铐脚镣。我被带到法庭，执行部长说：“宣金堂，经过派人调查，你家祖宗三代没有做过坏事，你家是贫农，又是弋阳九区老根据地，因此判你劳改。”接着就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和军籍。宣判以后，我被一个卫兵押送到德兴县磨角桥附近的洋源村，那里设有政治保卫局的一个劳改中队，有中队长和指导员。这个劳改中队共有一百多名“犯人”，分为三个排，主要任务是为红军部队熬硝盐。这一百多名“犯人”，都是肃反中抓起来的所谓“AB团”、“改组派”、“第三党”。

一九三四年十月下旬的一天，为了北上抗日，方志敏同志率领

红十军离开赣东北苏区首府葛源，到达磨角桥。方志敏同志亲笔写了信，派人送到洋源劳改中队，指名恢复八名“犯人”的军籍，其中有一名就是我。这天上午，劳改中队的周队长把我们八个人找去说：“方主席来了信，要你们立即返回部队，北上抗日。”说过，他就让我们去理发、洗澡，重新穿上了军服，戴上了红军帽。当晚，我们到了军部，组织部干部科分配我担任副排长。第二天，从磨角桥随军出发，经德兴县的海口，婺源县的江湾等地，向皖南前进。到达皖南后，因为谭家桥一仗没有打好，遭到重大损失，方志敏决定回师赣东北，重起炉灶再干。哪知在怀玉山受到敌人重重围困，弹尽粮绝，整个部队都打散了，方志敏生死不明。我随粟裕和刘英同志带领的一支部队突围后，又冲过化务德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广材山。其时正值冬末春初时节，天下大雪，我们又冻又饿，在广材山等了两夜，不见方志敏回来，大家心里十分焦急。粟裕同志为了安慰我们，召集大家开会，说：“同志们，我想方主席一定会回来的。现在，我带你们到葛源附近的大山里去找省委、找军区，所有的先遣队都应改编为游击队，同敌人周旋到底。”

我们从广材山出发，到了磨盘山的槎源坞，在这里找到了省委。遵照省委的指示，我们在槎源坞同留在赣东北苏区坚持斗争的三十师合编为赣东北红军挺进师，兵力共一千多人，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英、政治部主任黄富武。师下面分为三个团，我编在三团九连一排，担任副排长。省委给挺进师的任务是：跳出赣东北，进军浙西南，发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这时已经是一九三五年初了。

挺进师从槎源坞出发后，在裴源的一个山上遭敌袭击。战斗中，我们失利了，便回到西源山。后来，我们从上饶县的茗泽关，下灵山，经枫岭头过仙人桥，横渡信江。当时已是深夜，乌天黑地，一点星光都没有。经枫岭头时，我和团部青年干事小杨，还有一个贵溪籍的战士都掉队了，一时找不到队伍。我们三人便集合在一起，伏在地上观察动静，然后悄悄地爬过敌人的碉堡，又遇见三个掉队

的同志。我们六个人都不熟悉路途，大家商量的结果，决定冒充国民党的兵，"抓"个带路的，正好碰见一个老百姓，我们便"抓"他带路，终于在旁罗赶上了队伍，渡过了信江。

渡过信江以后，我们上了武夷山。那天，我们在闽北苏区上铅县龙西村宿营。这时由于苏区失陷，龙西村没有人烟。这天晚上，我们遭敌人一个旅和大刀会的包围，战斗中我负了重伤，子弹从肚脐下穿过。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挺进师在车盘坑同闽北红军独立师和黄道同志会师。车盘坑乡苏维埃政府杀猪宰羊，组织慰劳队，慰劳我们。在这里，挺进师经过几天的休整，即取道浦城、松溪、政和、宁德等地，进入浙西南了。我由于伤势较重，不能随军行动，便留在闽北红军医院养伤。

一九三五年农历三月中旬，我伤愈出院后，行动仍不大方便，被分配到闽北红军独立师二团当管理员，后来又调到二连当连长。这一年是闽北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最为艰难困苦的一年，我们常常因粮食接济不上，只好以毛竹笋、野芋、水芹菜、苦叶菜、糯米藤、竹叶草、红老虎刺等野菜充饥。在深山里活动时，到了夜晚，就坐在石头上，用被单围住身子过夜。遇到下雨的天气，就撑着伞在山里蹲一夜。

一九三六年夏天，我调到闽北一个县委机关里当文书。有一次，闽北红军独立师师政委曾镜冰同志写了一首歌曲，题目是《农民骂叛徒》，用广东小调谱曲。谱好曲，他就拉胡琴，我跑去听。他问我是那里人？我说老家是江西弋阳九区。他听后说："那是有名的革命老根据地呀，你怎么来到这里当文书呢？"我便把我的经历和遭遇告诉了他。

一九三七年九月，闽北红军游击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后，开赴抗日前线。曾镜冰留在根据地里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兼新四军崇安留守处主任，我也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一天，曾镜冰给县委写信，调我到省委党校学习。我跑到省委所在地的崇安县长涧

源，对曾镜冰说："我现在不是党员，怎么能进党校呢？"曾镜冰说："毛主席有指示，要为过去搞错了的同志平反。"我听后，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久，省委恢复了我的党籍，我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 闽浙赣苏区斗争忆实

（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五年）

徐　大　妹

## 一、参加革命

一九二七年，我住在景德镇的樊家井，爱人王节元当时在做地下工作。他经常和唐在刚、黄永辉、余金德、李杰三、柳真吾等人在一起搞秘密活动。我给他们做做饭、送送信，再就是帮他们买碘酒、做米汤，用来写秘密信。后来到了苏区，我才知道：当时，我的爱人已经是共产党员，唐在刚是中央派来的，黄永辉是景德镇特区的区委书记，余金德是区长。

当时，在景德镇的秘密活动，主要是搞工人运动。他们经常分头去向陶瓷工人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起来罢工。一九二七年，举行过三次罢工斗争，三次都取得了胜利，迫使窑厂老板改善了工人的伙食，由每月吃二次肉，增加到每月吃四次肉。

一九二八年，在第四次罢工斗争中，我家老五和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徐莲（乐平人）、陈冬股（万年人）、徐木朋（乐平人）一齐被国民党关进了牢房，后来都判了六个月的徒刑。徐莲、陈冬股、徐木朋三个人，由于家里亲戚朋友凑得出钱，每家用了一百八十块银元，才保释出来。我家老五，因为家里凑不出那么多钱，就硬坐了六个月的牢。家里当时生活十分困难，我只好经常去河边拣些黄菜叶，和锅巴饭煮在一起，再送去给老五吃。后来，还是唐在刚接济了一些买米钱。

一九二九年，老五从牢房里出来后，还和唐在刚等人到乐、

婺、鄱一带地方去秘密活动过。方志敏也来过我们家。一九三〇年五月，老五到弋阳去带红军来攻打景德镇。红军打景德镇，是一路化装过来的，走到马鞍山，才亮出红军的旗号。进城后，一直打进县政府，敌人毫无戒备，连枪都还码集在一边。红军没有打多少枪，就占领了全城。缴到的枪支有上千条，还有许多马匹。当时，革命的经济困难，攻打景德镇，也有一个筹款的目的，除了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外，还没收了一些银行、典当铺、商店，有些小商号也没收了(对于一些不应当没收而没收了的做法，方志敏在红军第二次打进景德镇时，召开群众大会，公开纠正了这种错误，并当即把一部分缴获的财物，分给了群众)。当时，缴获的金银、布匹，是用车推马驮，由景德镇运往涌山，再另外换人运到芳家墩的。

红军在景德镇住了三天就开拔。我爱人和红军同志都动员我同去。我有些舍不得丢掉家具、衣物，唐在刚就对我说："不去的话，国民党来了要杀你的头。"后来，我被说服了，匆匆忙忙带了两套换洗衣服出了家门。唐在刚担心我的小脚走不动，特地牵了自己的马来给我骑。我随红军当天到了涌山桥，第二天又换土车到了众埠街。红军在众埠街休息了几天，方志敏在那里开了几万人的群众大会，各县有好多人打着红旗来接头，乐平县的苏区也是这时建立起来的。当时，大会场上搭了四个台，台下四周围满了人群，红旗多得象树叶片一样。方志敏在一个台上开会，邵式平在一个台上，我家老五在另外一个台上讲了话，还叫我上去讲几句。这是我第一次上台讲话，望着台下成堆的人 我的脚杆子都打抖，讲不出几句话来。这次大会发动了群众，鼓动了群众革命积极性。会后，群众的劲头都来了，四乡都建立了苏维埃，组织了梭镖队，进行了平债分田。区、乡各级苏维埃和贫农团的负责人，都是经过群众选举的。乐平县苏区当时是湾头吴家、黄柏塘(当时归乐平管)、众埠一带，下乐平还有镇桥，涌山等地方，乐平县委扎在曹溪一带。

红军经过扩军，到了芳家墩后，就成立了红十军，这时，赣东北省也建立起来了。

## 二、我的成长

一九三〇年下半年，我家老五在赣东北省工会担任常委。省工会开始扎在横峰集坂，几个月后搬到葛源去了。我在省工会做保管员。一九三〇年十月，我入了党，介绍人是总务科长吴利生，还有一个事务长，景德镇人。当时入党宣誓时说："不怕流血牺牲，刀砍头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等等。省工会的活动，大部分是在白区和灰区，一是发动船帮工人，建立工会，发展苏区对外的交通；二是派人打入工厂去做秘密工作。一九三一年一月份，老五到弋阳乐河区去做船帮工会工作，不料遭到敌人的暗算，与另外两位同志同时被捕，在弋阳县城的河对面沙滩上，老五不肯走，敌人就用禾斛把他盖住，用烟熏，接着用马刀割下他的头，又分尸四块，最后还把他的心肝肺丢到河里去。老五牺牲的消息，我是一个星期后听别人读报才知道的。第二天，交通员就送了他的包袱来。当时，方志敏派了饶玉鸾，叶火娇来，叫我到葛源去。我见到了方志敏，方志敏拿出六十块银元，劝我回乐平老家去。我不肯，坚决要求去弋阳工作。我说："老五在那里牺牲，我就到那里去，杀掉个把敌人也好……"方志敏坚决不同意，说："那里没有建立巩固的支部，没有苏维埃，你去很危险。"讲了二、三天后，他让我受了一个礼拜的训，就派我到德兴四区（饶坑）去做区委委员兼妇女主任。当时那里不少地方是灰区。我日夜工作，非常辛苦。那时开展妇女工作的重点是发动青年妇女。有些会也是男女老少一块开的。四个月后，我被调到德兴县妇女解放委员会当成妇部长，程冬五当青妇部长，还有一个干事，搞妇女工作一共有三个人。德兴县委开始扎在重溪，后又扎在张村、万村、五村等地。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一年，苏区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工作比较好做，当时如果有什么扩红、抚红任务，只要我们到各个村里去活动一下，群众就会自动起来，积极性非常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赣东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召开，我当选为执委，担任妇女工作；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在葛源召开了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会，我参加了省主席团，担任了内务部长。一九三四年，省苏维埃副主席汪金祥调到中央去后，我被补选为副主席、兼内务部长。

后来，中央几次要调我和杨树兰到中央苏区去，方志敏没有答应。因为从闽北到中央苏区之间，有八十里封锁线要跑过去，我们都是小脚，跑不过去就可能牺牲，所以方志敏不同意。

## 三、政权机构

闽浙赣省包括赣东北，闽北和浙江安徽的部分地区。它是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由赣东北省改名为闽浙赣省的。当时的苏区共有十几个县，只有横峰是全县建立了苏维埃，都挂了红旗的，其它各县都是白、灰区交叉；弋阳县城还被国民党占据。

省苏维埃主席团是常设机构。当时省委和省苏维埃的主要领导人有：方志敏、邵式平、黄道、涂振农、余金德、汪金祥、万有群、柳真吾等；另外，军队里的主要领导人是：唐在刚、周建屏、吴先民，等等。我当时不是省委常委，但省委每次会议我都列席参加。当时开会是不定期的，一般有事就开会。

省苏维埃部一级的机构有：内务部（我兼部长）、土地部（余金德兼部长）、劳动部（余汉潮是部长，孙子贵当副部长）、文教部（叶宁是部长）、地雷部（余汉潮兼）、裁判部（柳真吾当部长）、财政部（方志敏兼部长，张其德是副部长）、政治保卫部（汪金祥兼部长，后来是滕国荣继任）、妇女解放委员会，等等。

部一级下面设科，但人员都不多。人数最多的部只有六、七人，如我们内务部有六、七人，劳动部仅二、三人（劳动部主要做白区工厂工人和船帮工人的工作）。

县、区、乡、村苏维埃的机构，也都是按宣传、组织、土地、

财政、文教、妇女解放委员会等工作分工的。村一级还有赤卫队、儿童团、少年先锋队、妇女代表，等等。

当时，大部分是兼职，如省里每个正、副主席都兼部长，而部长也大多数参加常委。我当时还兼了省苏维埃主席团的党委书记。

我们还有一个交通队，是探敌人消息的。这是一个要害部门，都选革命坚决的、勇敢的人参加，大多数是党、团员。

## 四、内务部工作

内务部的主要工作是：社会救济、优红、抚恤军烈属、卫生，办理结婚、离婚，还有修桥补路、组织副业生产，等等。洪竹娇是卫生科长、王凤庆(弋阳人，后在安徽牺牲)是优红科长、江白传是社会救济科长。

内务部下面还有一个红军家属工厂，开始扎在枫树坪，后来迁到王村等地；厂长是陶文水(南昌人)，副厂长是彭海蛾(乐平张家桥人)。工厂主要生产子弹带、医用纱布、绑带，还织布、打袜子、做军衣，等等。织的布是土布和麻间布。生产紧张不紧张，是根据原料情况决定的，原料一来，生产就抓得很紧。

这个厂里的工人，大多数是丈夫在红军里，家又在白区的妇女们(还有许多红军家属在医院当护士，在学校、兵工厂工作)。工厂里对她们非常照顾，如果红军部队回来，就让她们放假回去，和当红军的亲人团聚，时间上三四天、五六天都可以；等她们的亲人随红军部队走了，再回到厂里参加生产。她们中有的爱人在火线上牺牲了，我们就要去安慰和做思想工作，还发抚恤费，当时有的人要，有的人不要；有的人哭得很难过，我们就和她谈心："革命怎么不会流血，我们的政权要保卫，就会流血。牺牲是光荣的。你是团员，要想得开……"

内务部工作做得最多的是烈军属工作，我们经常去各村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发动妇女、儿童去帮她们砍柴火、修房屋。对于困

难户，我们还帮她们贷款、买小猪养等等。在优待劳动日中，我们帮她们下田劳动，上山割嫩叶肥田。有的妇女是小脚，也穿袜子着草鞋下水田劳动。记得在一次耘田时，一只蚂蝗叮到我脚上，我吓得双脚乱踩，赶快叫人帮我抓掉。姚秋香（苏区印钞票的工人）笑着说："不要帮抓，让蚂蝗爬上去……"后来，蚂蝗叮惯了，我也敢抓蚂蝗。我们虽然是小脚，但当时爬山打游击，一天照样能走七、八十里。

## 五、妇女组织机构和妇女的作用

苏区的妇女工作，从下到上都有组织，村有妇女代表，妇女委员，慰劳队长；乡里有妇女解放委员会，也有慰劳队，担架队，队长有的是妇女解放委员会主任兼，有的是另选队长。还有送信组。送信都是由妇女一村传一村送到的；区里有妇女解放委员会，分成妇部长和青妇部长，这两个是脱产干部，一个在党委、一个在团委办公。妇女解放委员会主任由妇女部长兼。妇女组织干事、宣传干事由委员或乡里妇女慰劳队长兼任，不脱产；县里和区里的组织机构一样，只是不作组织、宣传、生产几项工作的分工。在妇女解放委员会里，有巡视员经常下乡工作；省里做妇女工作的有十几个人。妇女解放委员会主任和妇女部长有时一人担任、有时两人担任，我当成妇部长和妇女解放委员会主任时，杨树兰当青妇部长；以后我到省苏维埃担任副主席兼内务部长，杨树兰当成妇部长、闻春香（贵溪人）当妇女解放委员会主任。杨树兰做妇女工作时间很长，在省里做过妇女工作的还有叶火娇、张和凤、李火凤、洪竹娇等。省妇机关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一直设在葛源。

当时的妇女工作是在方志敏同志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志敏同志认为妇女占苏区人口的一半，妇女的力量很大，一定要发动妇女群众。他对妇女干部的培养很重视，妇女干部不识字，他布置工作时一点一滴都交待清楚。在他的领导下，于一九三二年，省里开办了

二期卢森堡团（为纪念德国革命家卢森堡而命名），培养训练妇女骨干。杨树兰是团政委，团长一期是洪竹娇、一期是叶火娇担任。每期都有几百名妇女学习，其中绝大多数是团员，训练时间一般是三个月左右，出来分别做白区工作、士兵工作、医院工作，或者到地雷厂、兵工厂打子弹壳、装子弹。其中还挑选了一些大脚的、身体好的到政治保卫局去做卫队工作。有些有文化的妇女，还调到学校去当教师。此外，共产主义学校、团校都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学员是妇女，其它各种学校都有妇女参加。由于党和方志敏同志的教育和关怀，妇女干部思想提高很快，都能吃苦耐劳顽强地工作。

妇女当时发挥的作用有：

（一）狠狠打击敌人。那时敌人进攻苏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连坐月子的产妇都遭强奸，有的甚至用铁条通妇女的下身，有一个姓徐的妇女，就是被敌人钉住双手，割奶割死了的。群众非常恨国民党，妇女也想了各种办法，配合红军消灭敌人。如埋地雷、栽竹钉等。当时老少分工，老年妇女搓麻绳，青年妇女削竹尖，把竹子削得两头尖尖，放在锅里炒过，再一头钉在松木板上，在敌人快到以前，把钉了竹尖的板，埋到敌人要经过的路上，扎烂了敌人的脚，阻止敌人前进。妇女们还在门口、灶前、水缸边埋地雷，打死了好多敌人，吓得敌人不敢乱动。还有的妇女，在食物中放上毒药、在果品里下"三步倒"药，毒死了许多敌人。因为敌人太毒辣，才迫使我们想出这么多办法对付他们。

（二）参加游击战争，配合红军作战。妇女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上火线去，送子弹、送茶送饭、抢救伤员。德兴县有个妇女背着孩子到火线送饭，结果被敌人一枪把孩子打死了，她还继续到火线上去送饭（她儿子也被评为了烈士）。打夏家岭，打了十多天，妇女天天都去送饭送茶，决不让战士受饿。因为敌军的士兵都没有饭吃，所以我们的战士吃饱了就向敌人喊："老俵，过来吧，我们这里有吃的……"妇女担架队冒着炮火抢救伤员，抢下来以后，就给伤员泡白糖水喝；有个战士子弹打在腿上，痛得难受，妇女就用嘴

把子弹吸出来。妇女对红军是非常爱护的，而对敌人非常仇恨。她们看到穿短裤、打洋布裹腿的伤员，就知道是红军战士，抬起就走；如果看到把裤脚打在里面、打卡机布裹腿的，就认得出是敌兵，就不抬走，有的抬起来就把他翻到山沟里去。方志敏在表扬妇女时说："妇女恨国民党，把他们伤兵丢下山沟，这是觉悟高的一面，说明对敌人仇恨；但是，敌人的士兵也是穷人，我们还应该救他。"（我们一向对俘虏是很宽大的，请他们喝酒，妇女给他们唱歌、洗衣，找他们谈话，他们愿回去就让他们回去，每人还发六元路费。由于我们政策好，宣传工作做得好，有好多俘虏来的士兵，都不回去了）。

（三）扩军。扩大红军工作，真是做得热烈得很，那时扩军对象多半是十八——二十四岁的青年人。由于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宣传工作也做得好，加上方志敏同志威信高，群众知道是在方志敏部下当兵，所以都愿意送亲人参加红军。当时参军，老人给儿子、妻子给丈夫、哥哥给弟弟带红布球，背着包袱，边送边唱歌，一直送到区里。妇女们都会唱："送郎当红军，革命要坚定，你去前方，坚决打敌人，……"记得我到弋阳烈桥去做扩军工作，带回来七、八十个青年，都是团员，后来没有一个退回去的。方志敏表扬了我，唐在刚还讲："看来小脚还不错呀！"这七、八十个人后来全部送到红三十师去了。当时青年人参军没有顾虑，报名很踊跃，文书上名字都上不赢。

（四）站岗放哨、送信、探听敌人消息。妇女还到白区去送信，象饶玉鸾就常把信藏在头发里送出去；有的妇女在南瓜里、棉衣角、鞋底内都藏过信，使敌人检查不到，把信送出去了。

（五）妇女搞生产。苏区对生产很重视，抓得很紧，妇女主要参加积肥、割草，还参加生产突击队、生产冲锋队。弋阳、贵溪、横峰的妇女从那时起，开始有了割草、积肥的习惯。

（六）优待军烈属。那时对红军家属照顾得很好，家属在白区的，就把她们接到苏区，送她们到红军家属工厂织布、打袜子，年幼的

送到列宁小学读书。在苏区的家属有优待烈军属劳动日，包种土地，每人三亩田。干部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都是去给烈军属耕田做事。对没有劳动能力的烈军属，还帮她们洗衣服、打柴火，过年过节还送鸡送肉去慰问。

(七)妇女搞运输。后来形势紧张的时期，敌人封锁得很紧。妇女在艰苦的环境中，没有一个动摇的，仍然坚持工作。敌人封锁的主要是盐和西药，盐当时二元一斤(可买一担谷)。妇女就到白区去运盐，有的妇女假装送殡把盐运进来，有的在南瓜里装盐、装西药运进来，还有的买挂面回来当盐吃，解决了不少问题。

(八)妇女慰问红军的作用很大。当红军打了仗，回到葛源、集坂、芳家墩、漆工、烈桥等地休息时，妇女们就敲锣打鼓欢迎，并送鞋、送鸡、送蛋、送咸菜和整只整只的猪给红军，许多东西都是妇女群众自动拿来的。

当时，妇女工作十分活跃，到哪里哪里就有歌声。我还记得一些歌，其中一首是《妇女解放歌》：

一清早起来，　　做到日落西，
风吹又雨打，　　一世受人欺。
真是不自由，　　真正可怜呀，
劝我妇女们，　　快快觉悟起。
字又不会写，　　书又没有念，
拿起了算盘，　　又不会来算；
地主与豪绅，　　剥削我穷人，
挑拨加离间，　　破坏我团结。
我们要热心，　　加入工农兵，
共产党领导，　　妇女得解放，
我们都来唱，　　《妇女解放歌》，
最后的胜利，　　一定是我们。

做妇女工作有些事也很罗嗦，开起会来，有带小孩的，有带鞋底来打的，小孩打架、哭哭闹闹的也很多；开完会后，又有婆婆来

告媳妇的、又有媳妇讲婆婆厉害的。这样，我们就要下去做婆婆的工作，又要做媳妇的工作，搞好团结问题，还要宣传革命道理。当时是哪村有问题，就到哪村去工作。妇女们的积极性都很高，一有任务就抢着做，比如布置搓麻打草鞋任务时，大家都抢着做，有的说愿意贴布、有的说愿意拿麻出来，还有的表示愿意同别人合伙做。所以每个县的任务都是超额完成的。

## 六、白区、灰区的工作

我们不仅做苏区周围几个县的工作，而且把工作做到皖南和浙西南去。担任白区工作的妇女同志，多数是从卢森堡团学习后去的，从党校团校学习后去的也有。剪了头发的就梳起假髻，通过回娘家、走亲戚、拜干娘的关系去。因为敌人都知道我的名字，再加上我的眼睛一只大一只小，面相容易被敌人认出来，所以我没有去做白区工作。饶玉鸾的脚大，适合做白区工作，便经常到景德镇、婺源、乐平一带去秘密活动。当时白区的工作，首先是发动贫雇农，以他们为基础进行工作。再一个就是买子弹、西药、布匹、白糖、盐、雨伞等等。有的人把盐、子弹、西药装在南瓜里带进来，有的装在棺材里抬进来。白区工作还有一个是做敌军士兵工作，一般是通过俘虏提供线索，再派人去宣传："兵不打兵，穷人不打穷人。"宣传苏维埃政策，什么"苏区每人三亩田，讨老婆不要钱"等等。还在敌军中唱宣传歌、唱骂国民党的歌，许多妇女为了便于和敌人打交道，还学会了打牌。通过这些工作，有时把敌军士兵一排一排都做过来了。象杨莲花啰，还有一个姓罗的。那个湖南师的一个连，就是做了工作起义过来的。

灰区就是游击区，白天是敌人的，晚上是我们的。在灰区开展工作，是用对比的方法。开始是做青年人的工作，接着再做老年人的工作。对比宣传的方法是把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土豪劣绅的剥削压迫，跟苏区的生活相比；宣传共产党的公道，没有剥削压迫；当

红军是保卫自己的政权，是自愿去的，不象国民党军队那样抓壮丁。对青年妇女，我们宣传苏区的婚姻法，如自由恋爱，不受公婆打骂，不受丈夫压制，有经济权，养鸡养猪的钱，自己可以支配，等等。

在白区的组织都是单线联系的，保密得很。

## 七、群众关系和干部作风

当时，方志敏同志再三再四地讲："群众是水，我们是鱼；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他对干部很关心，从不发脾气。干部做错了事，就很耐心地指出来。他发脾气最大的程度，就是双眉一皱，说："这件事不是这样做的嘛！"他从来不骂人。我一辈子都要学习他的工作作风。

当时干部之间很团结，同志之间很亲密。干部之间在会上互相提了意见以后，会后没有隔阂，更没有报复；当时同志和同志之间，根本没有"根性"，工作受了苦、受了累，也没有什么怨言。

党的生活也过得勤，每个星期都开一次支部会，就是到了晚上九、十点钟也要开。党员交党费，不规定你交多少。交几分钱也可以，只说明你记得党、没有忘记党的事业。

当时干革命，大家根本不考虑自己家里的事，没有私心杂念，什么老婆、孩子怎样安排呀、工资待遇呀，房子照顾呀，根本不想，而是一心考虑怎样扩大红军，怎样保卫苏维埃，怎样去做革命工作，脑子里装的不是个人的吃好、穿好，或者做一件什么好衣服，而是时时考虑："我的这支左轮不好，怎样去缴两支好枪。"我在刚参加革命时，还有农民意识，舍不得丢掉家具、衣物，后来，特别是爱人牺牲后，我再没有考虑过吃呀、穿呀，而是一心扑在了革命上。

对于男女关系，当时非常严密。在游击活动时，经常二、三个男男女女睡在一块，根本没有什么问题，作风都很正派。对于贪污

行为是很严格的，贪污了二块银元就杀头，在众埠就杀了一个事务长。

在待遇上，省级领导和群众都是一样。食堂里吃什么，就都吃什么，没有什么特殊化的。省里干部到区乡苏维埃，根本没有什么摆一桌饭菜的，群众吃什么就一样吃什么。方志敏同志有肺病，也没有什么特殊照顾，只是当作病号，每天照顾二个鸡蛋，有白糖就放点，没有就放点盐。群众和干部之间，只有职位上的高低之分，没有生活上的高低之分。

我们和群众就象一家人样。我们下去工作，吃饭时，都是你家拖他家拖的。那时弋阳、贵溪一带，黄鳅干是上等菜，有些群众留都要留到我们去吃。我们吃了饭要交伙食费，那时是记帐的，等以后一齐扣“土地税”(即减收公粮)。有些群众硬不要我们交伙食费，有些还把盐用个罐子装一点，硬要我们带上。群众到我们机关上来，也象到亲戚家里一样随便，到吃饭时，我们把他们带到食堂里去。当时，群众慰劳红军，红军连队里也留群众吃了饭才让他们走。我们和群众的关系十分亲密，就是到了一九三五年最艰苦的年月，许多群众还冒着生命危险，自动上山给我们送情报来。记得方志敏带红军部队北上抗日，离开苏区时，许多群众都哭了。

## 八、经济、文教事业

当时的经济来源，一是发展苏区生产，二是红军打仗筹款。当时，苏区已经分了田，每人三亩，有的地方田多人少，也有分五亩的，割禾时，一家都要收十几担谷。苏区内，还办了石印厂、地雷厂、兵工厂、消费合作社、药店、红军家属工厂，等等，还有自己的银行。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印发了苏票。米票也发行了，是用一升、二升计算的，拿到了米票，随便到哪个村都领得到米。另外，副业生产也搞得很好，那家都养几头猪(猪肉一块钱十斤)。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食盐、西药比较困难，我们就用打土家缴到的金

子、银元、布匹到白区去换。

记得打浦城以后，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钱重的金戒指、发了一套衣服。但当财政紧张时，夏天我们就把棉袄的棉花抽掉，当单衣穿。

文教方面，我参加过共产主义学校（也是训练班）第三期的学习。当时校长是涂振农（后叛变），叶宁也兼过校长。还有团校，关英当过校长。卢森堡团是妇女学校。军事学校有红军第五分校。还有列宁师范、列宁小学。列宁小学是村里的小学。夜校都是晚上用铁篮子点松明上课的，地点有时放在晒场、院子里。那时还有识字班。记得有一次我伏在桌子上学写字时，不知方志敏什么时间来到我后面，突然说了一句"咦，错啦"把我还吓了一跳。

## 九、王明"左"倾错误的罪恶

曾洪易来了后，闽浙赣苏区遭到很大的损失，他今天把这个打成"AB团"、明天把那个打成"AB团"，把人抓起来，二、三天后就再也看不到了。记得为枪毙吴先民的事，开了两天会，方志敏跟曾洪易争论得嘴上白沫都出来了，嘴唇也气青了，两人都拍了桌子，把一张长方形的破桌子拍得砰砰响。当时曾洪易把吴先民笔记本上写了名字的区委书记，区长都逮捕起来，当作"AB团"，方志敏说："哪个人做工作，不在笔记本上记名字？"曾说"吴先民是'AB团'的头子，所以笔记本上的人全部要抓。"曾还向中央打了报告，逼迫方志敏写检查。（当时有这方面的文件，我一直保存到解放后，可惜文革中遗失了）。杀害吴先民的时候，曾洪易组织了群众会，吴先民打着赤膊被绑在葛源的樟树下。方志敏上了一下台，下台眼泪都落出来了，随后他回村去了。

吴先民临死前高喊："我是冤枉的，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杀害吴先民后，曾洪易他们还逼怀孕的吴先民老婆改嫁（周嫦娥）。周不肯，他们说："你还留恋反革命……"

当时在乐平县，从县委到县苏维埃的干部，全部被当“AB团”逮捕了。徐跃是乐平县最好的笔杆子，还没入党，方志敏就调他去当秘书，他也被曾洪易杀害了。群众看见这样搞，心都寒了，意见很大，有些人就不肯下山，对曾洪易执行的那一套非常痛恨。为什么我们从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局部围攻，枪不多，大多数是用梭镖、鸟铳、地雷的还战胜了敌人，而第五次反“围剿”就失败得这么快呢？这就是王明“左”倾错误的罪恶。

## 十　艰难的岁月

一九三四年九月，红军要冲破敌人的包围北上抗日。方志敏在枫树坪开了党的会，又开了一个群众的会。方志敏难过地说：“我舍不得离开闽浙赣的人民……我们要创建新的苏区，这里留一部分人，能发展还是发展，你们不要忘记苏维埃，要白皮红心，要做谷种，不要做烂种……我们要回来的，红军要回来的……”省委留了关英同志代替省委书记；省苏维埃留了余金德和我，还有占金魁（政治保卫局长）。方志敏布置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发动群众，收集枪支，坚持游击，打击还乡的土豪劣绅。

红军从葛源走后，我第二天还赶到德兴重溪送行，看见方志敏正在编队伍。我从重溪回到葛源，和各个部留下的人一起，开会商量了疏散工作，处理了文件，又到地雷厂、兵工厂、医院去，把铁的机器设备埋藏起来、木制的藏到山棚里。伤病员都安排到各个村里去，有安一个的，也有安几个的。难民团的群众，都是白区过来的，能回去的，都动员回去，还发给他们米票、路费。我们把粮食都埋藏起来。

后来，我们开会把苏区十几个县划成三个战区，第一战区是余干、余江、万年、东乡等县，指导员是关英。他名义上负责，人没有去，由县里人负责；第二战区是婺源、乐平、波阳、德兴等县，指导员是余金德；第三战区是弋阳、横峰、贵溪、玉山、广丰等

县，指导员是我。我们都带了一部分游击队上山活动，关英带的那部分是驳壳枪队。时局一天比一天紧，敌人每到一村都筑碉堡，群众的衣物、耕牛、粮食都被敌人抢光了。我们在山上只能吃杨梅、野菜、芭蕉兜，或者用白水煮笋吃。开始，我们还下山和敌人打仗，袭击敌人的炮台，但越打人越少，派去送信的人，往往人和枪都不回来。原来我们一共有七、八十个人，到了横峰关田山后，只剩下五十多人。

一九三五年，涨了最大的水，天上下雨，地上敌人搜山。我们在山上几天吃不到一餐饭，衣服破了，用野麻扎一下，人都成了野人。当时，余金德带了一部分游击队去德兴，说去看看支部还有没有，还说等建立了新苏区再来接我们。他叫九区的区委书记黄福文帮我在山上搭了三个棚，这时，我身边只有十二个人了。一天晚上，好大的月光，敌人来围攻，几个同志牺牲了，我的左臂挂了花，滚下山去，腿上也挨了一枪。我的警卫员带了花被敌人捉去。他对敌人说："我是送信的，你们补我一枪吧……"。因为他始终没有讲出我来，所以我才没有被捕。我爬过了一座山，鞋也掉了，腿也爬麻了，四处拍巴掌(联络信号)都找不到同志。在喝泉水时，碰到两个割禾的群众。他们给我吃了点饭，又给我一双鞋；我也给了一块银元给他们。在山上又坚持了二天，后来被反动派搜山捉去，先是押到横峰敌人师部，以后又押到南昌和缪敏等人关在一起。

# 对葛源暴动前后情况的点滴回忆

刘毓标　陈直斋

葛源是闽浙赣省府所在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浙赣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

革命前的葛源，有周、刘、杨、王四大姓的豪绅地主。周姓大地主周尚达家九代没有穿过蓑衣，他祖父曾做过湖南衡阳知府和浙江衢州知府，家产有三千多担租田，四个大谷仓每年囤谷一万二千余担。田租相当苛重，一般是对半分，有的甚至为"倒三七"。佃户除了交正租外，还得缴纳背租。背租就是按租田加交其它东西，有的一担租田加交一斗豆或一捆草。另外，佃户每年还要送鸡向地主拜年，美其名谓之"佃鸡礼"，遇上地主家婚丧大事，佃户随叫随到，帮工派役，不一而足。当年，曾有这样一首歌谣，形容农民备受剥削的苦难生活：

一担谷子借几年，
九十九担送堂前。
镰刀挂上壁，
饭就没有吃。

农民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过不下去，纷纷组织革命团结起来造反。一九二七年农历十二月初十，方志敏同志领导横峰楼底蓝家农民起义，消息传到葛源，鼓舞了大家的斗志。事过两天，程伯谦同志率领三十二个农民革命团三千多农民举行暴动。大地主周尚达事先得到心腹密告，乘夜逃往河口。他对农民起义恨得要命，不惜支付巨资买通了国民党驻河口的杨劲部队，并于农历十二月二十

三日，带了四十名敌军进攻葛源。这时，程伯谦同志派到横峰县城探听消息的刘生顺，获悉敌军进攻葛源的消息，立即抄小路翻越枫厢岑赶回葛源报告。程伯谦同志得讯后，组织起义军到葛源的前哨清湖村扎口子阻击，大概在下午二时左右，杨劲部队闯进清湖村，起义军立即发起反冲，敌人节节退却。后来，敌人见我方只有梭镖、大刀、鸟铳之类的武器，就停下来反攻。敌人用密集的火力阻挡正在冲锋的起义军，当场打死十三个人，其中有葛源农民革命命团团长刘奇佩、湖口岑农民革命团团长李炎才、上坑源农民革命团团长黄占新。

起义军失利后，躲进了磨盘山。杨劲部队在葛源折腾了七天七夜，枪杀了程昌盛、杨芦华、吴歪头、郑庚成、郑金生，闻勉喜等十多名革命群众，烧毁了程伯谦等同志的房屋七、八间。直到农历二十九，杨劲部队才押着周尚达家的二十担银元撤回河口。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葛源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敌人在葛源成立了靖卫团，驻扎在杨家祠堂内，有二十多支枪，残酷镇压革命人民。

一九二九年秋天，赣东北红军独立团打垮了葛源靖卫团。是年冬天成立了葛源区苏维埃政府。第一任区苏维埃主席是陈直斋同志，区委书记是程伯谦同志。各乡也相继建立了党的支部，枫林乡党支部书记是汪亨林、清湖乡党支部书记是叶照瑞、溪坂乡党支部书记是刘辉太、沙坂乡党支部书记是程泉春、葛源乡党支部书记是王登兴。当时，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发展党员一般是通过亲戚和知心的朋友介绍，填表后送区委审查，没有建立党支部的地方，区委书记要亲自去主持入党宣誓仪式。党员入党后，候补期一般为三个月，知识分子入党的候补期要半年至一年左右。

一九三〇年十月，闽浙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移驻葛源。敌人在一、二、四次“围剿”时，都派重兵进攻并占领了葛源。由于红军的猛烈反攻，方使敌人不敢驻留，但葛源的房屋在敌人三次占领期间被烧毁十分之九，到处都是瓦砾和焦木。然而，葛源人民并不屈服，他们又在废墟上架着茅棚坚持革命，成为闽浙赣省的模范区。

# 三次劫狱

吴品秀

一九二七年春，邵式平同志以省特派员身份来到横峰。这时横峰召开县农民代表大会，我是姚家垅村的妇女代表，出席了大会。

邵式平同志利用省特派员的权力免除了横峰县国民党右派县长和公安局长的职务，分别任命共产党员邹秀峰、吴先民为县长和公安局长。其时，公安局有警察二十余人，枪十四支。

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时捉了地主邹寿先和莲荷的七少爷游街。

当时，姚家垅已成立了秘密党支部。黄道在国民党县党部也秘密建立了党支部，党员程伯谦、黄球、吴先民等，负责在岑阳小学发展组织；党员黄瑞喜、黄道等，负责在街道居民中发展组织；党员邹秀峰、邵棠等，负责在县政府、警察局里发展组织。

我和黄道、吴先民、周嫦娥当时都住在城里的葛西赖家里(一九五一年，葛西赖还在县人民政府当过炊事员)。

"四·一二"事变后，赣东形势开始紧张。莲荷的大地主滕兰凭到河口搬兵打横峰，事先就有风声。一天，邹秀峰的细叔母悄悄告诉邹秀峰："听说明天河口有兵来抓你们，街上都有谣言。"邹秀峰马上跑到葛西赖家找黄道说了此事。黄道听后，决定立即转移。于是，吴先民和我党派进公安局的黄端信等，赶紧带出八条枪保护黄道、邹秀峰撤往姚家垅，钱壁因未通知到，没有及时撤走。这时已是晚上十来点钟了。走在路上，一群流氓想追捕，后见有枪，不敢动手。

黄道匆匆走时，我身边睡了个吃奶的孩子和三岁的知机。当时我母亲对黄道说："叫醒品秀吧。"黄道说："别叫，她带了孩子。"我哥哥吴先民说："叫醒她做什么？他们（指反动派）会要她们（指我和周嫦娥）去吃饭呀？"

第二天一早，反动派就包围了葛西赖家，并捉了邹秀峰的老婆。因为她当场塞了三十块钱给抓她的人，所以又把她放了。当反动派提我和周嫦娥时，有一大伙人围着看。忽然一个操葛源口音的男人从人群中走出来，指着我说："奶娘，我老早就叫你不要到县里来当奶娘，你偏偏要来，你看，惹祸了吧，走，跟我回葛源去！"反动派被弄得莫明其妙，问他："她是什么人？"那人回答说："她呀，在吴先民家里当奶娘呀。"反动派说："既然如此，你将她领走吧。"我趁机跟那人往北门走，不意后面有反动派派人跟着。走到半路，真是冤家路窄，遇到一个裁缝，他认识我，便向反动派告密说："她是黄道的老婆。"我争辩说："不是，是葛源人！"反动派说："你讲十句葛源话给我们听听，讲得对，让你走；不对，你就是黄道的老婆。"我那里会讲葛源话呀，莫说十句，就是一句也说不好。我终于被捕了。

在党部里同钱壁一起被捕的，有吴先民、姚家垅的细牛和一个姓李的同志。

我和周嫦娥关在女牢里，当时女牢就我们两个犯人。钱壁等关在男牢里。女牢看守浑名"地妈"，男牢看守是个左派。

反动派天天过堂，向我和周嫦娥追问黄道、吴先民与邹秀峰的下落。我总是说："不知道。"对钱壁等，则追问八条枪到哪里去了。城里人心惶惶，反动派四处搜查，天天抓人。

"地妈"五十来岁，开始对我们很凶。我俩刚进监时，她说："哼，不拿钱来，洗脸水都休想！"后来，我们的人打听到她的弟弟是我堂妹品珠母亲的干爹。那时品珠只有八、九岁，于时决定利用这层关系。

过了几天，品珠忽然跪在牢门前哭泣。"地妈"问道："外面是谁哭？"品珠说："姑婆，是我呀。""地妈"刚打开牢门，品珠就抱她的腿，连哭带说："姑婆啊，你要照顾我的姐姐和我的嫂嫂呀。""地妈"这才知道我俩同她有点亲戚关系，从此就改变了态度，对我俩一直不坏。

黄道转移到姚家垅的第二天，就发动农民劫狱。农民队伍走到

塔脚山，碰见在警察局做事的黄振太。黄振太拦住大家，不让去，他说："国民党的兵都埋伏在笔架山，去不得的！"带队的黄端喜、黄球，只得临时决定撤回姚家垅，这便是一打。黄端喜身材魁梧，与黄道是叔伯兄弟。黄球比较清秀，个子矮矮的，辈份大，所以喊他为细叔，那时二十五岁，黄端喜二十七岁。

第二天上午，又准备去劫狱，队伍刚刚集合，反动派便埋伏在里家山，派一名便衣进村侦察，正好与黄端喜相遇。黄端喜警惕性很高，进行盘问，便衣露出马脚，两人就扭打起来，滚在地上。一名农协委员跑过来，举起扁担把便衣打昏了，拉起黄端喜就跑，集合好的队伍也散了。这便是二打。此后就隔了一段时间。

反动派很毒辣，本想剥光我和周嫦娥的衣服游街。因为地主陈福田的儿子二禾伪、三禾伪都在南昌念书，被躲到南昌来的黄道发现，把他们扣起来做人质。黄道对他们说："告诉你们的父亲，如果胆敢为难我们的人，就杀了你们！"二禾伪赶紧写信告诉他的父亲，陈福田怕会断后绝根，就阻住反动派，没有拿我们游街。后来，黄道在南昌也将二禾伪、三禾伪放了。

端阳节的头一天，"地妈"忽然对我说："唉，在这里关着，你们有我照应，移到别处，你们要吃亏了。"我一听话中有话，忙问："姑婆，是不是要将我们起解？解往何处？""地妈"说："是的，解到上饶。"

我们的人得到了消息，又探知国民党的兵都已回河口过节，只剩十几个警察，就在我们要起解的头几天行动了，这便是三打。

这一天，姚家垅和下阳等地的农民们，带了九门"过山龙"，天未亮就把县城围了个密不通风。东门先打响土炮，其它三门跟着响。农民们涌进城来，用石头砸开牢门，我们在牢里听见炮声，还以为是要将我们"起解"。"地妈"说不象，起解那会响炮呀。直到自已人打进了牢门，有人用福建话高声喊："牛崽老妈(即黄道老婆)，不要怕，我们接你来了！"我才知道得救了。

我们被救出监狱，回到姚家垅，吃了早饭，国民党的兵就从河口赶到了横峰县城。但是，他们已经晚了，什么也没有捞到。

# 回忆周坊起义

邵柴生

一九二七年九月，党派邵忠和邵棠同志到贵溪搞秘密工作。邵忠和邵棠是贵溪周坊人，他们便首先来到周坊进行活动。

邵忠和邵棠来周坊后，不久就交上了一班穷苦朋友，其中有以阉猪为生的刘炳龙、有老长工邵正生，还有邵金香、邵金德、邵兆记、邵柴生等。每到晚上，邵忠和邵棠便上这些朋友家聊天。记得有一天晚上，邵棠同志到我家来了，闲谈中，他问我："家里生活怎么样？"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真活不下去了"。"欠债吗？""不但欠债，连把老婆孩子卖了都还不清。"于是他告诉我："不要紧，共产党来了就好了"。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听说共产党来了就好了，便忙问他："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他说："共产党是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一个党派。它主张平债、分田，不准人剥削人。它要把穷苦老百姓组织起来，推翻国民党政府，打倒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可以太太平平过日子，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不再受地主恶霸的欺侮。"听他这么一说，"共产党"便成了我的希望。当时，我暗地里祈祷："老天爷，共产党快点来就好啦！"邵忠和邵棠来周坊后就是通过这种串联、聊天的方式启发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的。

我们这班穷朋友经过邵忠、邵棠同志的一番教育，很快地觉醒了，大家纷纷要求组织起来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邵忠和邵棠看到这情况，便叫我们分头组织其他劳苦农民。但怎么组织呢？组织个什么东西呢？又以什么形式出现呢？大家议了好久，邵棠同志终于提出一个办法，叫我们分头组织"十三太保"、"二十四大王"，

还有"九友结义"和"一百单八将"。这些组织，从外表看来，好象是单个的封建小团体，其实，这就是农民革命团的前身，都是革命的小团体。他们接受邵忠、邵棠的领导，行动口号是统一的，只是活动时不在一块。这些组织很受欢迎，因此加入的人象潮水一样，一个周坊村，只三、四天工夫，就有五分之四的贫苦农民参加了"十三太保"、"一百单八将"或"九友结义"等组织。

以后，邵忠、邵棠同志对这些加入了"组织"的农民，进行了一番教育，并从中培养与选拔骨干，将他们吸收进"cy"与"cp"。有了骨干与"cy"、"cp"后，各个组织中的革命气氛便越来越浓厚，白天大家一面生产、一面议论怎样打土豪、怎样分田地；晚上吃完饭，大家又聚在一起，不是开会就是商量工作、商量"起义"。有一次，邵忠和邵棠同志突然做个禁会（禁止地主恶霸的牲畜下田吃我们的禾谷的会），叫我们的人都来吃。名义上是叫我们来吃禁会的，其实是有意识地检查自已的力量，检查大家执行"命令"的情况，检查大家的纪律怎么样。他们的通知一下，没有多久，大家就很快集中起来了，一个也不差。

不久，老彭(黄道同志的化名)、老李(李尚达同志)、老周等同志也来周坊。老彭同志住在邵棠家里，老李、老周住在江家佬家里。他们白天不大出来，要出来便化装成卖药的医生或卖杂货的。晚上便分头召集大家座谈或开会，后来老汪同志（方志敏同志的化名）也到我们村里开过一次"cy""cp"会，开会的地方，放在大山峰庙里。会上，他号召我们要一心一意为革命，要团结所有穷苦老百姓，打倒地主恶霸，推翻国民党政权。接着，我们村便正式成立了农民革命团。

正当革命形势日益发展的时候，岭脚底周家的恶霸水蛇崽四兄弟，却将我村革命活动情况和准备起义的消息向县里告了密，并声言要捉拿老彭、老周、老李。革命群众再也忍耐不住了，大家纷纷向老彭、老邵等同志要求杀掉恶霸水蛇崽，立即举行起义。

老彭、邵忠等同志见时机已到，便答应了群众的要求，于是在

一九二八年的四月的一个晚上，周坊起义了。那天晚上，全体农民革命团团员各带梭镖、马枪、马刀、菜刀、颈上系一条红布巾，手里拿一个火把，向土豪劣绅进攻。当夜，恶霸水蛇崽四兄弟就被我们抓到了，同时还抓到了门上周家的恶霸三崽里。这些一贯欺压人民、无恶不作的地头蛇，当时就被我们杀死在坳后的大树底下。那些一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们，这时有的躲在自家的床底下，有的躲在茅坑里，也有的头顶着田契、借据跪在大门口向我们乞怜、讨饶，表示愿意交出霸占我们的财产，只求留他一条狗命。

周坊起义的烈火刹那间便燃遍贵(溪)、余(江)、万(载)。

# 里村革命片断

张 懋 德

里村，距离景德镇市约五华里，四围环绕着大小十八个村庄，以前街、后街、童街为主要组成部分，昌江由此经过，水运甚为便利。该村以农业为主，但经营竹木、窑柴、瓷土、煤炭、石灰等的也不少。

记得是在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抵达景德镇后，由何燮负责介绍里村小学教职员方维华、张懋德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里村便有了党的秘密宣传和组织工作等活动。宁汉分裂后，由于镇内反动派统治力量加强，党的县级机关负责人便经常隐蔽在里村，假竟成小学开会办公。所以，当时的竟成小学有"赤色大本营"之称。

初期的革命活动：

一九二七年邵式平同志来镇进行革命活动时，原来住在戴家弄王祖恩家里，因反动派跟踪侦缉，里村的地下党组织和群众就把邵式平同志隐藏在里村数日，使他得以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任务完成后，邵式平同志化装为江湖郎中，手持皮包，身穿兰布长衫，由方昭同志伴送到弋阳。胡德兰同志也因同样情况隐蔽在里村黎胜同志家里，然后才被护送到弋阳邵家坂去。

一九二八年，省委张同志来镇发展党的工作，扩大组织，在里村周围共发展了十三个支部，由刘书富、刘书梅、赵老大、徐徽、余昌龙、余立权、方维华、程辉、倪端、徐京丹、濮九平、马少廷、张懋德等人分任支部书记，分二个区委会，一区委辖镇里六个支部，二区委辖镇附近七个支部，竟成小学教员徐京丹同志任区委书记。当时县委书记黄光同志经常出入在竟成小学内，交通站也设在里村樊家井匣钵工人徐细毛家中。

一九三〇年正月初二因刘小鬼叛变告密，我县城乡两地的骨干同志徐京丹、倪端、金光荣等二十余人均同时被捕。这些同志在敌人的刑具面前坚强不屈，没有对敌人吐露一句软弱之词，最后壮烈牺牲在敌人电刑之下。

但是，革命群众并没有被吓倒，而是继续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先后在里村、新老厂、黄泥头，湘湖街，寿安鲤鱼桥等地以至婺源边境展开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组织攻打景德镇前后：

我记得在当年三月间，赣东北特委书记唐在刚同志、土地委员会主席胡仁辉等同志往中央开会路过我镇时，均住在里村马步英家里，由我们负责隐蔽和保护。此后，中央委员胡庭铨、特委肖韶等同志凡来往我镇活动时，均由我们几个人负责掩护和保卫。

唐在刚同志前来我镇的主要任务是策划红军攻打景德镇，扩大红军队伍。我记得当时的分工是这样的：

1.余湘、许长脚、缪新河等同志在邻县乐平等地探悉敌军活动情况。

2.李杰三同志负责侦察景德镇内敌人武力散布情况。

3.张懋德、张水林、马少庭等同志负责了解里村周围的情况，并准备果品在离里村四、五里地的茅家坂等候慰劳红军战士。

4.程辉、马步英先进入苏区，负责做红军响导，带领红军入镇。

5.徐细毛等同志散布在镇内马鞍山一带，准备响导红军分路包围敌伪各军政警机关。

一九三〇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工农红军一个团在方志敏同志和周建屏(团长)、李尚达(团政委)同志领导下攻下了景德镇，并缴获敌人新式枪械四百余支。

自从红军攻打景德镇以后，党的组织大大地扩展了。李杰三同志专门负责景德镇的工人运动，浮梁县委书记由刘惠民同志担任。县苏维埃主席是陈元调同志。当时县、区委会和县、区、乡苏维埃

政权都设在里村。这个离城五华里的村庄，成为我市、县当时革命运动的堡垒。

自红军攻打景德镇以后，我县劳苦群众，不仅成群结队送茶送水慰问红军队伍，而且集结队伍追随红军进入苏区，因为走错了路，在乐平众埠街不幸被乐平靖卫队围住，被杀群众达四、五十人。

# 六 甲 坞 暴 动

陈 云 龙

六甲坞暴动发生在一九二八年的夏秋之交，带头人是我师傅张德顺。我也参加了这次暴动，因为我在家乡申坂打伤了地主的少爷，其时正在六甲坞师傅处避难。

我们这次革命的主要对象是长茅岭一带有名的恶霸地主"眼朝天"。暴动前，我们曾与方志纯、邵式平同志取得联系；暴动时由我师傅亲自组织和指挥。和我们同时举行暴动的，还有附近七、八个村子，其中有三个村的暴动取得成功。

暴动的第二天清早，我们清点了一下，共缴获地主（可能包括地主武装）步枪九支、驳壳枪两支、手枪一支、子弹二千二百发、驳壳子弹二百发。这天邵式平同志亲自前来向我们祝贺，并作了四点指示：

一、在刘家村开一个群众大会，宣布恶霸"眼朝天"的罪恶，按当时红军的法纪宣判他儿子和老婆的死刑，宣判民团班长陈一刀等人的死刑，其他团丁及狗腿子强迫劳动。

二、在大会上宣布没收"眼朝天"的所有土地和财产，将这些财产和粮食的一部分（大约是四分之一）分给村里的群众，其它如现洋、现钞和能做衣服的红、白、兰、黄布匹都上交。

三、组织农协会。

四、组织赤卫队……

邵式平同志作完指示离去后，张德顺找了全村的贫农骨干开会。他向大家传达了邵主席的指示，却没有宣布邵主席对他的任命，所以，他刚传达完，我二师（师傅的弟弟）张有顺就说道："刚才邵主席还宣布了我哥哥是赣东北三纵队大队党代表兼大队长，看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大家一齐举手，大声喊道："我们坚决拥护邵主席的主张"。

后来，张德顺主持了群众大会，讲了暴动的胜利和革命的形势，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接着便着手选举乡苏维埃。当时，选主席、副主席和妇女主席是采用举手通过的方式。选举时议论纷纷，有几个别有用心的人想先发制人，抢着提名，有个中农提出要一个富农当干部，理由是他断文识字、说话公道；接着又有一个富裕中农提出，要一个当过"眼朝天"管帐先生的人当干部，说他有文化、会说话、会办事。这样一来，群众大会的气氛立即紧张起来，大部分群众对这些人的意见表示反对，提出他们和我们贫雇农不会一条心。经过激烈斗争后进行表决，结果提出的八个人之中，有四个贫雇农，两个手工业工人，木匠师傅的老婆是其中的一个。

会后，我们进行了扩红工作，张德顺向大家讲，愿意当红军的站到一边来。不一会，就有五十多名群众表示愿意当红军。后来我们只选了二十六名，其余的都劝他们在家里安心种田。

下午，我们共五十余人编成三个小队，向烈桥进发，四、五点钟到达烈桥指挥部会合。在那里，我们经过整顿，正式编进了部队。当时就给我们发了帽子和袖章，邵式平主持了会议，方志敏给我们讲了话。参加红军后，打中家坂时，我担任了侦察工作。这场战斗是由方志敏同志亲自指挥的。

一九二九年底(应为一九三〇年六月以后——编者注)中央向赣东北派来一批干部。我们感到很奇怪，在连队的支委会上，大家议论纷纷：是不是毛委员派来的？过了不久，就出现了赣东北党、军干部大换班的现象。我们基层的干部和战士对新来的干部，无论在思想言论，还是工作作风上，都有些看不惯。后来，他们就在红军内宣扬要打大城市，要打九江，会师南昌，还有什么饮马长江、攻打湖口等，闹得很起劲。我们本地的军事干部对执行这一中央指示感到非常难办。向外面出兵时，方志敏同志指示不要将主力伸进去。那一仗(敌人从南昌、九江包围过来的)敌我双方损失都很大，特别是我们的根据地遭受了很大损失。回来后，我们在葛源、烈桥、芳家墩等地驻扎下来。一九三一年，便离开赣东北到中央苏区去了。

# 敌人两次投诚的经过

宣　秀　庭

方胜峰会议以后，红军独立团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局部“围剿”。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敌人又以国民党十二师三十六旅周志群部分主力，开始了第三次局部“围剿”。

一九二八年底，周部十一连到德兴磨角桥镇压农民的年关暴动。通过我党派入十一连的内线进行工作，该部以中士班长匡龙海为首举行了起义。时值春节，苏区军民在邵式平主持下，热烈欢迎这批起义的士兵。

敌人第十一连投诚过来后，我们没有缴他们的枪。这些人在旧军队里泡久了，染上了不少坏习气，动不动打人骂人，还有赌博抽大烟的。一次，方志敏同志对我说：“组织上决定派你到十一连去做工作，叫他们不要抽烟。告诉他们，当兵的都是贫苦出身，受虐待的，不要为地主豪绅们卖命。他们愿意留下当红军的就留下，要回家的发给五十元钱的路费。”还一再叮咛我，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把枪杆子掌握过来。

我去十一连的身份也是兵。我到十一连，他们放哨打瞌睡，我说了几次，那些人就用拳头揍我。我受不了这个窝囊气，跑去找方志敏同志，要求把我调回来。方志敏同志笑着对我说：“怎么，事情才开始，就打退堂鼓了。遇到问题，就说做不了，哪叫谁去做呢？”他要我还是回去工作，多动脑子，哪个调皮可以把他的枪栓卸下来。回去后我做了许多宣传工作，这一招果然灵，他们行动上收敛多了。

一天晚上，在张童庙里，我先把那个调皮兵的枪栓卸了下来，以后又一连卸了七、八个。等到天放亮时，我们的同志来了，就把

这个连的二十多条枪缴了。匡龙海到我们这里来后当排长。他有老婆，愿意留下来，后来成了部队的优秀的指挥员。其他士兵有回家的，也有留下的，我们便顺利地改编了这个连。

敌人第十二连起义投诚是在一九二九年四月，地点还是磨角桥。这个连的哗变有些突然，不知是真心还是假意。后来有消息说敌人进攻德兴黄柏塘，我们特意派十二连去应战。他们打黄柏塘时朝天放枪。虽然是在我红一、二连配合下攻下的黄柏塘据点，他们却居功自傲。邵式平便把我叫去说："你把搞十一连的经验用到十二连去，做好他们的工作。"我赶到刘家坞找到方志敏同志，向他报告了一些情况：十二连有一百多条枪。这个连起义后，改编为三个连，原来的连长升了营长。并谈了自己想把他们弄到东坑缴枪的想法。方志敏同志沉思了一会儿才说，那不行，东坑离烈桥近，枪一响，驻守烈桥的敌人就会倾巢出动。如果对他们草率缴枪，不利于在白军中开展士兵运动。最后方志敏决定，还是放在余家仓开大会确定改编的事。他还说，在会上只能叫我做汪先生，说方志敏到别处开会去了。十二连内一些反动分子听说要开大会，就暗地写信给敌人，准备投敌反水，结果他们在信上写错了地址，把吴家墩写成了胡家墩(吴家墩到横峰管辖的胡家墩有十五里路)。听见群众打号铳，国民党反动派的兵认为十二连和我们干上了，慌忙赶到胡家墩接应。我们听到枪声，知道十二连反水了。等我们赶到时，十二连只留下了龙志光等几个人，其余的都逃走了。杨延辉也被反动士兵杀害了，龙志光以后也成为红十军的优秀指挥员。

# 鸣山暴动

余永扬

鸣山煤矿位于乐平境内乐安河边。一九二九年底，乐安河水干浅见底，木船无法通航，鸣山的煤运不出去，矿长张文通便借机扣押了工人三个月的工钱。全矿三千多工人因为生活无着落，所以反抗情绪日益强烈。我党在鸣山煤矿的秘密党支部见时机已成熟，决定发动矿工举行暴动。

一九三〇年春节的一天夜晚，矿地下党负责人王乃太在河边一间低矮的工棚里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参加会议的共有十七名矿工。会议周密地研究了暴动计划。

经过一个月时间的分头准备，到三月初，王乃太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准备请示上级，马上举行暴动。就在这时，得到一个消息：张文通由于"办矿有方"，受到上司嘉奖，打算在三月十八日摆酒设宴，以示庆贺。王乃太和同志们商量后，觉得这是个好机会，立即拟了一份报告，派党员夏长荣送交正在万年富林东源村的赣东北特委。特委接到报告后，详细地向夏长荣询问了鸣山敌人的情况，同意了王乃太他们的暴动方案，并决定由方志敏同志亲自率领一营红军前去支援，来一个里应外合。

三月十八日傍晚，方志敏率领三个连的红军战士和部分万年赤卫队员由万年富林东源村出发，经越坑、镇桥上村，在孙家渡过乐安河，直插鸣山。红军和赤卫队在矿工的配合下一枪未发便解决了矿区门前碉堡里的矿警，然后直奔正在举行宴会的鸣山矿公司，悄悄地把那幢楼包围起来。与此同时，王乃太等拉响了警报，发出了暴动的信号。当即，全矿所属的五山（鸣山、虎山、扁担山、灰山、狮子山）和两岭（涸源岭、大春岭）的工人们燃起火把，带着洋镐、

铁锤、木棒，从四面八方向矿公司汇集。矿警吓得纷纷逃散，正在宴饮的张文通和十来个当地的土豪劣绅以及一个洋主教都束手就擒。

打下了鸣山后，当即召开了庆祝暴动胜利的群众大会。在会上，方志敏同志发表了讲话。他讲了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宗旨，讲了革命的大好形势，讲了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就能推翻旧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道理。方志敏同志的讲话在工人中激起阵阵掌声和欢呼声。这次战斗不仅缴到步枪二十多支，还得到许多财物，清点了一下，计有银洋三铁柜(共九万余元)和大量的机器、钢管等物资。这些物资对巩固赣东北根据地起了一定作用，推动了根据地兵工厂的发展。

# 首次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和信江苏维埃

汪　金　祥

弋(阳)横(峰)武装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弋(阳)德(兴)横(峰)中心县，继而由中心县发展到信江两岸的贵溪、余江、万年、铅山、上饶八个县。为了统一各县苏维埃的领导，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弋阳县漆工区的湖塘方家祠堂里，召开了首次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上述八个县的代表三百多人。当时我是弋阳县苏维埃主席，是大会代表之一。会议开了三天，选举产生了信江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计有方志敏、邵式平、黄道、方志纯、胡粹芳、邹琦、邵忠、严启先、洪坤元、张玉林等三十三人。方志敏同志当选为信江苏维埃政府主席。

这次大会开得非常热烈，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六项决议：1.发表宣言，号召苏区和白区群众一致起来推翻国民党政权；2.颁布信江苏维埃施政纲领；3.对分配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可以出租典当，也可以雇人耕种；4.确定借贷政策，平债之后可以借债，但利息不得超过一分五厘；5.确定贸易政策，苏区内保护贸易自由，准许外商到苏区来开辟市场，赶集；6.颁布临时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和苏维埃组织法，以及红军与赤卫队条例、肃反条例。

信江苏维埃成立后，根据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我们各县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第一，分配了土地。起义后我们没收了豪绅地主和封建祠堂庙宇的土地。这些土地以村为单位进行分配，规定只要不反对苏维埃都可以分到土地，谁种谁收；第二，发动了春耕，解决了耕牛不足的问题。起义后，苏区的耕牛被国民党军队抢劫一空，春耕无法进行。为了解决牛荒，我们一方面捉土豪罚款去买耕牛，一方面鼓励群众集股去买耕牛，从而掀起了春耕生产的高潮；

第三，统一了财政收支。我们把打土豪得来的款子，统一由政府掌管，然后按规定实行分配供给；第四，在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的前提下，我们向农民征收土地税，每亩税率规定上田干谷一斗、中田干谷八升、下田干谷五升；第五，优待红军家属。红军所得的土地由政府发动群众代耕，同时，我们也鼓励红军家属当生产模范，对生活确实困难的红军家属，我们也给予适当的补助。

自信江苏维埃成立后，我们执行了信江苏维埃颁布的各项政策，深得群众的拥护和欢迎，群众参战情绪日益高涨。随着军事不断取得胜利，根据地一天一天地扩大，到一九三〇年五月，红军打下景德镇，缴获了四百多支枪和大量物资，红军扩大到四千多人，扩充为独立师。根据地由信江八县扩大到乐平、浮梁、波阳、婺源和浙江的开化一带，纵横五百余里，人口一百余万。一九三〇年七月（应为一九三一年九月——编者注）成立了赣东北省。

# 对赣东北根据地几个问题的回忆

汪金祥

关于土地政策问题。暴动以后，赣东北的土地政策是没收祠堂、庙宇和地主、豪绅、反革命的土地，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实行平分土地；中农土地不动，采取抽肥补瘦的方法。中央代表曾洪易来了以后，批评赣东北的土地政策是富农路线。他们的土地政策是"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实际上就是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执行，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改变当时的土地政策，大搞查田运动；一个是大反富农路线。

关于赣东北特委改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派万永诚到赣东北来。中央指定万为省委书记、涂振农为宣传部长、黄道同志为组织部长(不久调聂洪钧同志为组织部长)。记得在葛源开过一次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由万永诚传达了四中全会精神，并在这次会上将赣东北特委改为赣东北省委。时间是一九三一年春。改组以后，他们就把地方负责干部和当地群众领袖排挤出去。

接着，中央又派曾洪易为中央代表来到赣东北。曾来后不到两天，就批评赣东北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否定一切。在反地方主义、富农路线的口号下，又在组织上进一步排挤地方负责干部。

关于赣东北的肃反问题。赣东北肃反是一九三一年冬（应为一九三二年上半年——编者注）开始的（这时我在省苏维埃当内务部长）。肃反是怎样搞起来的呢？主要是在省一级机关发现潘务行、何东乔、罗子华(都是中央派来的)和徐文璧等人组织了"健康委员会"，进行反省委和中央的活动。于是，就在地方上开始肃反。在军队里是先从吴先民同志那里开始的。他们怀疑他与反革命有勾结，把吴逮捕扣押在军委会。再就是中央指示，要搞肃反。当时中

央还批评赣东北肃反运动开展迟缓，以曾洪易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为了向中央报功，便不分青红皂白，刑讯逼供，捕了又捕，造成肃反扩大化，以致冤枉死了很多好人，造成惨痛的损失。当然反革命是有的，但没有那样多；反革命也不可能有一套从上到下、从军队到地方、从赣东北到闽北那样完整的组织。肃反的组织开始是叫非常委员会，三中全会后又改为肃反委员会。曾锦坤同志是肃反委员会的主席（他当时是省委委员），肃反委员会委员柳真吾负责审讯。

黄道同志为什么到闽北去呢？主要原因有两个：(1)是被曾洪易一伙排挤出去的。因为曾洪易等一些人来了以后，就排挤地方群众领袖，如果不把这些干部排挤出去，他们那套"左"的东西就难贯彻；(2)闽北苏区的群众领袖陈耿同志在肃反中被错误地杀掉了，需要派人去加强领导。

刘畴西、王如痴两人是不是叛徒？据我所知，刘畴西不是叛徒，王如痴是个叛徒。刘王两人被捕是在方志敏同志之先，项英同志拿着获得的国民党情报给我看过，知道方志敏同志是由于王如痴的口供，告诉敌人方志敏同志躲在什么山上，于是敌人派重兵搜山，方志敏同志被俘了。

# 回忆苏区政权和经济建设的一些情况

汪 金 祥

## 一、苏区的政权建设

赣东北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机构分四级，即省、市、区、乡。村一般只有代表。

初期，赣东北的最高政权机构是信江苏维埃政府，成立于一九二九年，是过渡性的。后经中央批准，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三〇年冬成立。建有如下几个机构：

经济部、财政部、内务部、肃反委员会（后改保卫局）、法院、土地部、文化教育部、卫生部、省军区。

一九三二年，赣东北省改称闽浙赣省。县苏维埃政府所属机构与省基本相同。其区别在于没有军区而设军事部。

县苏维埃政府有主席团和委员会，委员二十余人基本上不脱产，主席团十来个人。初期是轮流主持工作，一九三〇年，选举主席才固定下来。

区级是委员内部分工。乡级与区级相似，但除主席外，委员均不脱产。

苏维埃政府是召开工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形势转稳定时，就召开代表大会。一般三、四十个人中选一名代表。选举后，政府的干部名单要上级审查批准。

干部的成份基本上都是工农分子。群众所选举的是那些对革命忠诚、斗争积极、办事公道、说话正直的人。其中也有些妇女同志。

开初，干部缺乏工作经验，也有少数干部作风不民主，甚至有

打群众屁股的现象。后来方志敏同志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论述干群关系。里面谈到了政府是人民的，干部不能成为群众的老爷。谁要是脱离群众，犯了官僚主义，群众有权把他的职务撤掉，坏作风还要进行批判。

我们根据方志敏的小册子举办训练班。少数干部的坏作风有所好转。大部分干部的作风都很好，受到了中央苏区的表扬。

## 二、苏区土地分配及土地税

1.土地的分配

分田分地是根据革命斗争的发展，一部分一部分地区分别进行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到哪里，哪里就开始分田分地（不是一个县而是几个县同时进行的）。一般有三个步骤：

①算田

以原耕为主（包括佃户租种的田地），自己用木牌插入田中。

②分田

没收土豪劣绅及祠堂公田，再丈田，把田分上、中、下三等。分配的办法是按人口平均分。在家的地主、富农也分给一份，但都是坏田，外逃的就不给。少数反水农民还是分给，并争取他们回来自耕。

③查田

分田后过一段时间要复查一次，有出入的进行调整，但不是重新分配。

三个步骤一般二年完成。

分田分地由苏维埃政府领导，成立分田委员会，以贫农团为骨干。

分田后，县苏维埃政府还要下发土地证。盖县苏维埃政府的大红印。统一编好号码，逐级下发到群众手中。

2.土地税的征收

土地税是累进的，不是平均的。根据产量来定。上交粮食不准随意动用；粮食就地上交，就地保管，由群众保卫。军队或地方开大会要动用粮食要由上级政府开条子给乡、区政府，再由群众送来，帐统一到区政府结算。

粮食还要支援出口，搞外贸。

## 三、苏区的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直接关系到战争的成败和群众生活的好坏。方志敏同志和赣东北的党组织对农业是抓得很紧的。因为大家认识到，粮食不抓好，就不能战胜敌人，就不能支援前线，就不能改善群众生活。那时，政府提的口号是：

“发展生产，支援战争，一切为了前线！”

“多打粮食，保卫土地革命成果！”

具体有一些做法：

临时性的换工，即互助合作，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

干部积极参加劳动，同群众一道种田。当时，干部还响应毛主席在井冈山的号召，一人种一株南瓜，机关的蔬菜自己解决；

生产上还需精耕细作，广泛施肥。政府还帮助群众兴修水利，改良品种。

通过一系列措施，赣东北农业搞的较出色，逐年增产15—20%，群众不但不饿肚子，还自给有余，进行出口。

## 四、苏区的工业生产

为了打破白匪的经济封锁，苏区工业从无到有，发展很快。

那时工厂规模虽小，但很实用。如苏区当时吃盐最困难，我们就自己办起硝盐厂。过去，深山中有造纸作坊，但都产土纸。在此基础上，我们扩大为造纸厂，逐步提高质量，使纸张由黄变白、由

小张变大张；办公用纸、印刷报纸我们都自行解决。还建立了被服厂，发展了制糖厂，等等。

特别是军事工业搞的更为出色。开始只有修械所，以后发展为初具规模的兵工厂。

机器从敌人手中搞来，如打乐平鸣山煤矿就搞了两部机器，还缴获了一批钢管。此外，原料靠群众供给。

从修理到制造，从造子弹到地雷，从造枪支到迫击炮，群众发挥了极大的创造性，特别是土地雷，群众就地取材，几乎乡乡都搞。

再补充二点民用工业：

苏维埃号召群众种棉花，然后用手工纺纱，织出了很多土布。

各乡组织了铁工造农具，解决了生产上的需要。

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苏维埃政府还采取了树劳模、发奖励的措施，号召开展生产竞赛，对工农业生产均有极大的促进。

以后，我带队去中央苏区，带去了两支步枪样品和一些材料。我们赣东北苏区在生产上的做法，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口赞扬。

其它点滴情况：

赣东北省办过一个残废军人学校，照顾那些无家可归的残废军人，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负责过。

省苏维埃有二个剧团，还改造了一个旧班子，省保卫局有一班女兵，主要是站岗放哨，看守女犯人。

# 有关赣东北、闽北的部分情况

薛子正

一九三〇年十月，中央派我到赣东北。我起初在红十军政治部工作，后来被任命为红十军第一团团长。第二年六、七月份被调到闽北，任红军独立团政委。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又被调到闽浙省军区工作。现在，我就来谈谈我所了解的赣东北和闽北根据地的斗争情况。

## 一、赣东北苏区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情况

我到赣东北担任团长没多久，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就负伤了。伤好后，又调我到红军学校第五分校担任教育长。校长是邵式平，副校长邹琦。这个学校主要是训练中、下级军事干部。这个学校里有个副教育长叫江枫。他原是周志群部队投诚过来的。开始时，我们对他是怀疑的，经过一段时间考验，觉得他还可以工作，后来将他由副教育长提升为大队长。

当时派我们去闽北，主要是根据省委的决定。因为闽北苏区在立三错误时期，把主要的武装都集中起来攻打大城市。如李克敌、李静愚等人都带了部队到赣东北，结果闽北只剩下两个连；加上这时国民党又实行全国性的"围剿"，闽北苏区的武装支持不住这种局面，天天被迫躲山，一直退到大安街和铅山西北的一带山地。闽北苏区几乎全部垮了。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决定派人前去帮助闽北党的工作。当时还把红十军一个特务营、一个机枪连(四百多人枪)，由黄道、邹琦和我率领到闽北去。去了以后，就以这个营为主，整编成闽北独立团。

当时赣东北地方党的领导同志能力较强的有这么几个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汪金祥、吴先民等。方、邵要负责赣东北工作，只好派黄道同志去。

今天来看，方志敏同志处理每一件事或决定一个问题都是很慎重的，善于走群众路线，合乎党的正确路线的。他有事和大家商量，有些地方很象毛主席的作风。同时，他却一贯主张巩固地向前发展苏区，这种作法在当时来说是对的。

当时在几个主要方针政策问题上有争论，但总的来说，赣东北对方针政策的执行是好的。

（一）关于土地政策问题：赣东北苏区开始是提出平分一切土地。对待富农与对待地主阶级是有区别的。但当时在苏联对待富农是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这个政策影响到中国党内的某些领导同志，即我们怎样对待富农。富农分不分田有争论。当时有人主张富农不分田，要象消灭地主阶级一样消灭富农。有人则主张富农分坏田，或分远地山坡田。方志敏同志则主张平分一切土地，富农也分田，更不是肉体消灭。可是，方这一主张当时遭受到批判和反对，所以喊叫赣东北苏区有"富农路线"也是这时开始的。当时全国几个苏区比较来说，赣东北苏区的政权工作和党群关系是搞得好的。群众工作是做得最好的一个。主要关键就是深入了土地革命，平分土地，广泛地发动了群众。这与方志敏同志的主张和正确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二）关于军事路线问题：当时也有人批评赣东北军队有保守，发展太慢。我个人认为不能这样说。保守不保守，主要是看当时客观环境、具体条件怎样。方志敏同志主张巩固地向前发展，这没有错。但从曾洪易、万永诚他们到赣东北后，就议论纷纷，有人甚至说"军队守住苏区吃公粮"是保守退却路线，等等。当时的客观环境有困难，红军受兵力等限制，不能攻坚。这不能算保守主义。我自己历史上还有这么一段。我在闽北苏区负责军事指挥工作时，也曾经被指责为退却逃跑主义。后来也搞清楚了，不是这么一回事。

（三）俘虏政策问题：开始有人讲，赣东北不善于作俘虏工作。这话也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赣东北红军很多营长、连长、排长都是俘虏过来的。将拖枪过来的和俘虏过来的人经过短期训练后，就任命为我们的基层干部。所以我说对俘虏教育改造工作是很注意的，而且是有成绩的。

（四）经济问题：有人说，我们对所有的商店（资本家）都采取没收政策。不是这样的情况。当然，开始的时候我们不会作经济工作，不会组织经济生产，这是个缺点。在我记忆中，我们打下城镇后，都是公平交易的。赣东北和闽北苏区有自己的钞票、银元，甚至在周围的区内也通用。我们当时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定还未传到赣东北苏区时，就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口号，如："打土豪归公，缴枪有赏，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等。这些口号已经是很形象化的。

总之，当时经济政策并不是那样乱，对白区也开展贸易。比如买盐、买西药、买布匹、收买子弹等等，都是用现洋，有时用黄金。有些时候，我们也通过小商小贩给我们贩进一些东西。

关于对土豪劣绅的财产没收，也是有区别的。我记得对一般地主兼资本家，我们只没收地主的封建剥削那一部分，不是全部没收。如打蒲城那一次，由于我们采取了公买公卖的政策，就解决了我们部队的冬服问题。我们当时抓到土豪劣绅也不是全部杀掉，对一般情节较轻，罚了款以后，我们仍释放他回去，只是对个别的罪大恶极有血债的才加以镇压。

（五）关于肃反问题：肃反运动中主要错误，是执行肃反政策上有问题，是犯了逼供信的错误。所以，当时就冤枉了一些好人。如果象毛主席在延安肃反时提出的，实事求是，不冤枉好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我相信就不会搞得那样糟。有问题慢慢来调查清楚后再处理。但当时没有这样做。赣东北肃反是一九三二年下半年（应为上半年——编者注）开始搞的。

对赣东北的肃反，方志敏、黄道同志都曾经提过意见，说苏区

不会有这样多的反革命，警告过那些同志要慎重考虑、慎重处理。但有些人在执行政策上有过“左”的现象。

（六）毛主席指示中国革命胜利有三件法宝，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在苏区内体现得很明显。统战工作，当时在赣东北虽然作了一些，但体现得不那样明显。当时，我们还不善于运用这一政策，特别是肃反过后，连知识分子都不敢用，认为知识分子不可靠。医生看病，开了药方也不敢吃。所以，对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工作是不够的。

一九三一年中央派了曾洪易等来到赣东北苏区以后（与曾同来的有聂洪钧、杜石公〈叛徒〉、万永诚等），我个人有这样感觉，曾洪易一到赣东北就很“左”，就批评方志敏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来后，省委和军队的领导都被改组。有一段时间，方志敏同志也被排挤，使方志敏同志没有真正起着领导作用。

总之，我感到赣东北整个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群众工作是做得出色的，执行政策上一般还是比较稳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解决了土地问题。因为土地问题一解决，农民就想法保护胜利果实，所以参加红军的人在苏区是相当多的。当时红军生活那样艰苦，但指战员们都拼命干。当时与群众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红军一回到苏区就能够得到休息、补充。老百姓保护红军。在苏区内，红军脱掉裤子睡觉都没事。群众主动眺高、放哨、打号铳、探听敌人的消息，送“鸡毛信”保护红军。这是赣东北人民最先创造出来的，后来这办法也推行到中央苏区。抗日战争时，我们抗日根据地运用了这些办法。那时，群众对红军真好，红军住下来，就给洗衣服，慰劳红军，红军的伤员也是由群众护送到医院或者留在家里医治。当时群众还编了很多歌谣来欢迎红军，歌颂红军。这都说明当时赣东北苏区土地革命深入，群众工作基础好。如果政策不正确，群众工作基础不好，那怎么能坚持十年斗争呢？

弋阳九区、横峰葛源、贵溪周坊这些地方，都是了不起的，不管敌人怎样烧杀，群众始终坚持革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没

有向敌人屈服过。

## 二、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的闽北斗争

我到赣东北红军第十军时，方志敏同志是政治委员，以后邵式平同志兼了一个时期的政治委员。

那时，黄道同志是闽北特委书记。他对情况比较知道，他是赣东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不幸于一九三九年牺牲。

一九三三年中央苏区打通，我被调到闽赣苏区（建宁、泰宁、黎川原是特区）。当时那里是先有军区，后有党政。军区司令员是肖劲光。后成立七军团，肖当政治委员兼司令员，后又是叶剑英兼司令员。邵式平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省委书记是顾作霖，在内战时期已病死。

我们去闽北时，闽北苏区已经垮了。因三〇年李立三盲动主义者把闽北独立团调去了赣东北。当时中央要赣东北占领长江沿岸几个城市，切断长江。三〇年下半年，赣东北的红军才回到赣东北。那时卢兴邦、刘和鼎和周志群进攻闽北。刘和鼎从建阳、光泽压过来，把崇安搞垮。我最初还在红十军工作，以后被派去带军队，与黄立贵同志在一起。黄当团长，我当政治委员。独立团以红十军的一个特务营、一个机枪连为骨干。那时黄道等同志均回闽北，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把局面打开了。卢兴邦、刘和鼎受了几次打击，特别是三一年下半年崇安一战，解放了崇安城，消灭了卢、刘的一个营。我们在崇安城将近住了一年，到第二年快割稻子时离开，退到洋庄、太安、紫溪、星村这一带，所以这一带地区始终是老根据地，未受到敌人威胁。

三二年下半年，红十军在方志敏同志亲自领导下，带了六个团打浦城、建阳。把浦城打开后，苏区有很大的扩展。当时还有一个任务是筹款，因这时苏区经济有很大困难。浦城打开后即回信江。

三三年下半年，中央苏区开始反四次"围剿"时，彭德怀同志带三

军团攻打建宁、泰宁、黎川。首先打将乐，先消灭卢兴邦部队，后消灭刘和鼎部队。那时闽北独立团改为独立师，主要是配合中央红军。在建宁，泰安、光泽、邵武、将乐、建阳一带活动。这时是三二年底三三年初，闽北即成为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桥梁，中央党的人员要通过此线去上海。此时，正是福建人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队伍不能通过苏区进攻福建人民政府，便只好转道江西、浙江到福建。所以蒋介石的布置是先消灭十九路军，后消灭红军。三二年三三年是闽北苏区的极盛时代。

三三年秋天，黄道同志调闽赣省，是在闽北党未犯错误前调的。黄道同志调走后，代理书记是肖韶同志。这时，我患伤寒病，邹琦同志代理军区司令员、军委的工作。这时闽北已提出"白区耕者有其田"、"巩固地向前发展"(这原是赣东北的口号，即先巩固后发展）的口号。当时中央正在反"罗明路线"。张鼎丞、方方、万永诚(开始在赣东北，以后调为福建省委书记，红军北上抗日时牺牲了）等同志在闽西。现在看，如果"罗明路线"没有错误，那时闽北也没有错误。当时说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说是平分土地，为什么提出耕者有其田。以后肖韶、邹琦调到闽赣省。这二个人都是黄埔学生，是肃反对象。他们二人找的老婆都是地主女儿，（肖韶老婆是打崇安俘虏来的一个地主女儿，邹琦老婆是白区来的一个小学教员，也是地主女儿），再加上政治问题上的错误，几个问题凑起来就被当作肃反对象。这个问题，我以后不清楚了。杨良生一向是做保卫局局长。如果肃反有错误的话，我了解政策上没错误，主要是做法上有错误，有逼供信现象。杨是亲自审问的，却推到邓发同志身上。当时整个苏区肃反都没有经验，闽北肃反是有一点错误的。不象今天这样细致的调查研究。当时军队中也抓了不少。俘虏、干部都有错杀的。

地方党当时是比较好的，环境是很艰苦的，但不知道搞经济建设，主要靠收一点公粮和筹款来维持。干部生活是艰苦的，但政策上是正确的、分土地、打土豪，所以苏区还是坚持下来了，军队也

扩大了。以后编为独立师，成为红七军团二十师，赣东北红十军二个师编为第十九师。第七军团司令员开始是肖劲光，后是寻淮洲，再后是王如痴当军团长。苏区的巩固主要靠人民群众的觉悟。部队靠情报工作，但经验不够。我们距敌人只五、六十里路，一个袭击即可搞垮，主要靠群众放哨眺高。群众拥护我们、掩护军队。当时的苏区群众工作是有基础的。

党是巩固的，军队巩固地发展，由几百条枪发展到二千多条枪，成为主力红军之一。

关于俘虏政策，最初很注意。可以从军队中干部的培养上看出。当时自己没有什么军事干部，一种是拖枪过来的，再一种是俘虏过来的，经过短期训练即成为干部。某些方面犯有杀俘虏错误，但不是政策上的错误。在转移时，杀了一些不肯走、想逃跑的俘虏，还杀了一些企图逃跑的人。杨良生说成营成连地杀，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有一天，在一个会议上，我和汪金祥同志说起这个问题，他也认为不是那样一回事。当时我也没有经验，锻炼不够，有许多问题看不出，有时不敢提什么意见。军队休整时，到特委所在地住一个时期，一般跟部队行动的时间多。

肃反最厉害是三二年冬天，现在我回忆起来确实有许多无辜的人被当成肃反对象。如政治部有些青年妇女和青年小伙子，说他们与外界反革命有勾结。当时没有细致作工作，把十几、二十来岁的人都当作肃反对象，这说明当时工作不细致，不是对人民对党负责。反正一有人攻击他就杀。因此，肃反工作中，群众对我们有怨言。

那时部队缺乏子弹，一元光洋买二粒子弹。平时是用土法做手榴弹，用锡头火药做，铁的做不出来。

当时不会做经济工作，也忽视这个工作。本来在山上是可以做许多经济工作的，但只有机械厂、被服厂、造纸厂、制革厂。主要是不够重视这些工作。因当时市面上是靠白区的小商小贩挑一些东西来，而且这些小商小贩大多是敌人特务，一个是搞情报，一个是

搞现洋。我们内部是使用纸币，对白区用现洋。我们抓到许多小商小贩是敌人的侦察特务。我们经济工作始终被动，因为我们不知做经济工作。敌人利用经济攻击我们，那时我们缴了一挺机枪，赏五十——一百元，缴一支长枪赏五元（以后认为太多，只赏二元，但必须现洋），而敌人更毒辣，你赏五元，他赏十元；你赏十元，他赏二十元。如果我们经济巩固，不会受那个影响。

我们自家搞贸易工作也是很弱的。我们派人到福州买布，到南平、建阳、浦城买药，都是用金子。抓一个地主主要是要他多少钱。因此，经济工作与其它根据地比起来是最弱的。

政权工作还有一套，知道如何组织群众，如组织赤卫队都有一些经验。

干部的教育一般讲还是重视的。自家有党校、有军事干部学校，还有各种工作的训练班。政治教育也抓得紧，刚到闽北不久，即发生"九·一八事变"。"九·一八"爱国教育在苏区是很普遍的。那时没有电台，靠边沿地区国民党报纸，三二年初才搞到了一部电台。

党内的干部还是团结的。当时有三部分干部，一部分是中央苏区和上海派来的，一部分是赣东北来的，一部分是闽北的，但没有隔阂。外地干部有时流露出不重视本地干部的情绪，嫌能力弱，不重视他们。但一般还看不出问题。

我离开闽北后，吴先喜当政治委员，以后他牺牲了。这个干部也不错。

打浦城时，牺牲我们一个团参谋长，叫李金泉。李静愚是四川人，黄埔的学生，是军区参谋长，以后在粤赣边牺牲（与何长工同志一起，长征第二年牺牲）。李克敌回到红十军当副参谋长，是福建人，在虹桥也牺牲了。我回赣东北以后，闽北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在赣东北、闽北最初发现"改组派"是在赣东北案件中，是上海来的材料。上海党发现有"改组派"、"ＡＢ团"到赣东北活动。

是否当时曾洪易就参加这个反革命组织很难讲，他是上海派来的。曾洪易一到赣东北就很“左”，他批评方志敏这样右那样右，以后他就代理省委书记。涂振农比他后来，那时他还好。他是在抗日战争以后，从延安到广州工作被捕叛变的。我现在很怀疑，曾洪易一来就有问题。

当时闽北最大的威胁是大刀会、花篮会、民团，是本地反动地方武装，其次打大仗的才是国民党部队卢兴邦。

吴先民在三〇年下半年结束李立三“左”倾错误后到上海汇报工作，回来不久即被捕，中央是否有材料来？我不知道。还有团省委书记汪明同志（三〇年他到上海接我们的）也是从上海回来后，与吴先民一起被捕的。吴先民当时是红十军政治部主任。那时我在红十军搞团的工作。

陈耿同志是闽北领导人之一，也从上海回来不久就被捕。

李得胜是闽赣军区派来代替我的工作的。这个人作风不正派，一来就向前委告我的状，说军队按兵不打仗。肃反有些错杀的，群众是有意见的，那时杀了就推到山坑里去，群众又偷偷把死者拉走埋掉。另外闽北有许多好干部都到二十师去了，赣东北在皖南事变后也留得不多。

土地改革，在赣东北是搞得彻底的。提出了平分土地，这与中央以后的土改精神没什么出入。闽北是根据赣东北搞的，一般没有什么大错，但因当时群众觉悟不高，也有坏人钻空子。群众路线贯彻得不够。队伍一到某地，就插牌子分田，真正的贫雇农不敢接近我们，只有二流子和积极分子接近我们。所以三天五天就插好了牌子，不象中央苏区搞得那样好。因工作不深入，也有少数地方，当我们一离开就垮了。但群众心里是知道共产党是打土豪分田地的。与敌人搞得最凶的是广丰、上饶、玉山一带，我们与敌人是一来一去的，那时群众斗争也很坚决。有些群众天天背起包袱，部队走他也走，拿起梭镖种田。我们有一次打华埠回来，伤员很多，都是群众一站一站护送回来的。

如果土改不是那样好，群众不会那样衷心拥护苏维埃，日夜眺高放哨保护我们。再说没有饷，吃不好，很艰苦，但红军是一天天扩大。红军吃饭靠公粮，吃菜靠打地主筹款。

那时，对富农只没收参加封建剥削的那一部分，对地主兼商人的没收其封建的那部分，中农不动，执行政策是很正确的。还有一点错误，认为商人抽屉里的钱是浮财，一般现款是搞掉的。

苏维埃代表大会，我在时只开过二次。我到闽北不久，即开过一次，是在泰安，后在崇安又开过一次，前后差不多相隔一年。我三三年十月到闽赣军区时，正是中央苏区粉碎四次"围剿"。那时我在七军团十九师工作。那时粟裕是二十师师长，周建屏是十九师师长。粟裕不久提到第七军团当参谋长。罗炳辉是九军团军团长，始终未到过闽赣省。

黄立贵二七年下半年就开始搞游击队，黄立贵跟方志敏是赣东北九个起义者之一。他跟我一道工作时已负过三次伤，到独立团工作又负过二次伤。他始终是英勇的。在许多战斗中，黄立贵同志比我们有经验得多，阶级立场很坚定，他死了很可惜。他是在国共合作时因失掉警惕而牺牲的。他没有学过军事，但军队带得很好。黄道同志也是很好的，很机智，对干部很关心，善于培养干部。他那时应该到武汉去医病，不应该到河口去医病。黄道同志对中央、赣东北派来的人是绝对信任的，不分那里的干部，一视同仁，所以在艰苦环境里开小差的很少。

我在闽赣省只一年多。顾作霖是中央委员，黄道是宣传部长，彭皋是组织部长，以后闽北特委改组，黄道同志又重新回到闽北工作。黄道同志回来后是余泽洪同志（上海来）代替他的工作，他对地方工作是不很熟悉的。彭皋是后来叛变了的。闽赣省成立得很迟，时间是在三三年初。是江西、福建、赣东北的结合部，以建、泰、宁为中心。它是在战争环境当中成立的，以后巩固不好，土地改革搞得不好，加之领导有那么一个情况，本身没有军队，最初把闽西三十师给它做基本队伍，另外有二个独立团。那时我在军区工

作，叶剑英是闽赣省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原是军委参谋长，他与刘伯承经常调换工作，一个前方，一个后方）。在前委直接领导之下，以后滕代远同志兼了一个时期的政治委员，后来邵式平同志是军事委员会主席，兼苏维埃主席。当时苏维埃委员、省委委员，都在布告中公布过。

在闽赣军区不久，即三四年春天(一、二月)，我就到福建军区去。叶剑英同志调福建军区司令员，周建屏也调到福建军区。我在福建军区将近一年，又调到江西去。

闽赣省成立不到一年，工作底子也弱，首先是军队受损失，五次“围剿”敌人首先向闽赣省“围剿”，从临川打进去。抚东地委以后的情况，我不知道。

闽北独立师刚成立时，政治委员是吴先喜同志，以后才是黄怀仁。

凭我的记忆，当时在中共赣东北省委——(后改为闽浙赣省委)领导下，闽北党的工作和苏维埃运动，红军建设工作的成绩都是很大的，这是可以肯定的。在苏维埃政权工作方面，以崇安为中心周围二、三百里地区的农民得到了解放，消灭了地主武装，推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分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到一九三三年，有六个县的苏维埃和几个区苏维埃——崇安、铅山、广丰、上饶、浦城、建阳等县和光泽、邵武等区。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赣东北省苏维埃所颁布的一切政策法令，保卫了苏区。在红军建设方面，由小的红军游击队到独立营、独立团，到一九三二年下半年又成立了闽北独立师。此外，各县还有独立营、团、队，拥有各种枪支二千余支。有的自已有红军干部学校、有兵工修械厂、地雷手雷制造厂。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历次的“围剿”，打垮了闽北苏区周围的反动民团、大刀会、花篮会等地主武装，胜利地保卫了苏区，完成了打通中央苏区的光荣任务，巩固了赣东北与中央苏区的交通要道，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红军主力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行动。这正是闽北党史光荣的一页。在文化建设方面，苏区村村普遍

有识字班，乡里有小学，大安街有工农剧社，有党校、医院、无线电台，有《红色闽北》报社，有《党的建设》、《青年与战争》等期刊。

## 三、有关黄道同志的情况

黄道是个好同志，我曾和他共事数年。他原是赣东北省委组织部长，是当时四个主要领导人之一。这四个主要领导人是：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吴先民。

一九三一年九月，赣东北省委派黄道同志到闽北苏区去，担任中共闽北特委书记。黄道同志到闽北去以前，闽北根据地在李立三错误的影响下，受到不少的损失，李立三"左"倾错误提出了所谓一刀一枪都要集中起来搞全国武装总暴动的口号，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夺取武汉、长沙、南昌等大中城市。这样，便把闽北红军的武装和各县的游击队都集中到了主力兵团，好的干部也都到红军里去了，地方政权的力量削弱了，地主豪绅趁机反扑，很多村、乡的苏维埃政权都搞垮了，苏区缩小到只剩铅山县石塘以北的车盘地区和崇安县大安山区的狭小地带。赣东北红十军两次进军闽北，才把局势扭转过来，迫使反革命的力量分别龟缩在浦城、建阳等县城。黄道率领红十军的特务营到闽北后，纠正了李立三盲动主义的错误，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使闽北苏区又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以黄道同志为首的闽北特委的领导下，党和红军的力量都先后扩大了，独立团扩大到一千多人枪，打了不少的胜仗，根据地恢复和发展到包括铅山、广丰、崇安、浦城、邵武、建阳等六个县的范围。据我记忆，闽北特委由下列一些同志组成：黄道、邹琦、肖韶、薛子正、黄立贵、黄富武、祝维恒、杨良生(后叛变)等。

由于没有电台，闽北和赣东北的联系是靠交通队的。后来，红军打下浦城，缴获敌人的一部电台。不久，党中央又给了赣东北省

委一部电台，省委便将这部电台留给了闽北特委。自从我们有了电台，就能直接同中央和省委联系，能够及时地了解国内外形势，得到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因而工作能顺利进展。一九三一年下半年，中央电告我们，要我们抓紧打通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战斗部署，使闽北苏区成为连结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桥梁。为此，我们独立团在黄道同志领导下，做了不少努力。

打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后，党中央决定成立东方军，以红军第三军团为主力，由彭德怀同志领导。同时，开辟了建(宁)、黎(川)、泰（宁）苏区。这个苏区后来又发展到邵武、光泽。这样便与闽北苏区联接了起来，这个新苏区便是闽赣苏区，成立了闽赣省委。此时，中央苏区、闽赣、闽北、赣东北已联成一片了。当时中央有个想法，想从西北发展，便调赣东北红十军的主力、闽北独立师、闽西的三十师，组成红七军团，由寻淮洲同志任军团长，乐少华同志任政治委员。一九三三年下半年，闽北划归闽赣省委领导，赣东北省委改为闽浙赣省委。黄道同志调到闽赣省委工作，他是省委书记之一，兼组织部长；肖韶也调到闽赣省委担任宣传部长，我调到省军区，在叶剑英领导下工作。那时闽北发生所谓"罗明路线"事件。顾作霖对黄道同志横加指责，说他在闽北工作时也犯了"罗明路线"的错误，要他做检讨；肖韶同志也因"罗明路线"的问题受到处分。

方志敏同志、黄道同志都是很好的领导同志，政治水平很高。他们虽然当时不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但是他们的政治思想、政治路线，和毛主席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赣东北工作时，黄道同志在土地革命政策上，反对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发展苏区和红军的政策上，他和方志敏同志的看法也是一致的，即革命不能一下子风起云涌地夺取大城市，搞什么全国总暴动，而必须实行土地革命，通过农民夺取土地，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等。

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在土地政策上提出了地主不分

田、富农分坏田、贫雇农当权的极"左"口号。相反，毛泽东同志则主张平分土地，让地主富农也分一份土地，使他们能自食其力，能够活下去，不致逼着造反。但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受到王明等的排斥，在各大根据地没有得到贯彻。有些地区，王明"左"倾错误不但不让地主自食其力，并且主张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一抓到就杀，地主阶级没有活路了，就去"造反"，当时的"A B团"就是活生生的例证。王明"左"倾错误在赣东北的危害不小，当时的中央特派员曾洪易(后叛变)，就是王明"左"倾错误的积极推行者，方志敏、黄道等同志都受到他的打击。

在工商业政策上，毛泽东同志主张对工商业要区别对待，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对于资本主义这一部分，可以在苏区合法经营。但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处于统治地位，对工商业实际上是一扫光。方志敏、黄道对王明的"左"倾错误是抵制的，他们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一致的。尽管红白交界地区封锁很严，由于采取了正确对待工商业的政策，不少白区商人都来苏区做生意，这对于发展苏区生产是有利的。

在军事上，黄道同方志敏一样，实行的是一条正确的建军主张，除了建立正规红军以外，又建立了地方武装、游击队与赤卫队。

在党的干部培养上，黄道到闽北后，建立了党校，各县也举办了自己的训练班，红军连队中的党支部也加强了。

黄道同志性格爽朗，作风平易近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虽然他是个书生出身，但他的身上却充满着农民的习气。他喜欢同农民谈话，同战士谈话。

黄道同志很会写作，闽北工农报上的社论，多是他亲自执笔。虽然他身边有一个秘书，但给中央的电报、报告等，一般都是他自己写的。在党校上课时，他不用什么讲稿。他常常对同志们讲革命的历史、革命的故事。

他吸烟，但不上瘾。那时是买不到纸烟的，一般都是自己切烟

丝，用纸一卷就抽。有时他也吸水烟筒，和农民交谈时，他就吸旱烟。他也爱喝酒，但不过量。我见他还喜欢喝水酒，一喝就是半碗。

最后说一点。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被迫长征，这里有一个历史的教训。当时如果能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实行运动战，一方面向闽浙赣方面发展，向天目山脉进军，直接威胁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巢南京；一方面同十九路军的福建人民政府搞统一战线的话，是不至于出现长征的。可是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却反对这一正确的战略思想，提出什么“不失苏区寸土”，以堡垒对堡垒，大打阵地战，使红军受到很大损失，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毛主席当时对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是重视的，对赣东北苏区在方志敏领导下的工作成就是赞许的。如果中央红军向江浙发展，赣东北的战略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

# 对赣东北四年斗争的回忆

聂 洪 钧

## 一九三一年

一月，河南省委军委书记来信阳，向我们传达：长江局已撤销；中央拟定京汉特委改属河南省委领导。又说，中央开了“四中全会”，否定了三中全会的决议。详情不明。河南省委意见，要我最好去中央一次，接受“四中全会”精神，并最后确定京汉特委的隶属关系。因为南至湖北之孝感、黄坡等县的白区都属京汉特委工作范围，是否划归鄂豫皖苏区党领导更好些呢？同时，我的住处曾被吉鸿昌的巡逻队闯进盘查过，活动受到了限制。因此，特委决定我暂离信阳去中央汇报并接受新的任务。

我党六届三中全会是瞿秋白同志领导的，“四中全会”否定三中全会决议，当然就是反对秋白同志。事情怎么发生的呢？我很惶惑。

二月，抵沪，在各地的在沪干部讨论“四中全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是否完成任务”的会议上，我讲了“四中全会在政治上是前进了一步，但是，在组织上，由于新的中央领导成份缺乏实际斗争经验，恐怕难以保证国际路线执行”。当即被主持会议的李竹声认为有反“四中全会”的倾向。我坚决不同意这个“结论”。在我们争吵中，并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这个“结论”。但是李竹声最后还是宣布为“会议一致的意见”。我向会议表示了保留我对这个“结论”的不同意见。后来，还有王稼祥，接着又有向忠发来和我谈了话。当然，我绝不承认我反对“四中全会”。

三月，孔原（当时名叫陈铁铮）来通知我“关于我的工作调动

的决定”。仅仅因为我提了“赣东北近浙江口音，听话不懂，最好能调鄂豫皖或洪湖苏区工作”的个人意见，竟被李竹声主持的组织局决定：不去赣东北就是不服从中央分配计划，那就进工厂生产，不另分配工作。从吴德峰同志的关怀中，我知道了这一切。我表明不是绝对意见。所以，后来周恩来同志和我谈话，说中央的意见还是要我去赣东北。我无话说，服从了中央的决定。

五月，进入赣东北苏区，根据中央的决定，我担任闽浙赣省委组织部长。

十月，闽浙赣省委在批判了倪宝树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后，决定我调任红十军政委。

## 一九三二年

经过两个多月的摸索和积极的政治教育工作：第一，把模糊红军作战观念的“缴获敌枪奖钱制度”取消了；第二，对严重影响红军战斗力的疥疮，进行了强烈的卫生运动。发给每人一竹筒樟脑油、强制每天洗搽。不到半年消灭了疥疮；第三，批判了军阀残余的军事管理方法与游击主义习气，建立了初步的红军政治教育工作与军事管理教育制度，使红十军逐步走向正规化。

红十军作战行动主要向白区出击。开展在敌后的斗争，来打破敌人对苏区的包围和封锁，巩固发展苏区，发展壮大红军和游击队；在苏区内，则是围困敌人据点来结合部队休整。

一年来，比较大的出击胜利：攻陷浙江华埠、开化和福建浦城等城镇；缴获了大量物资、武器和弹药；建立和发展了浙赣边和闽赣边地区的游击战争。

## 一九三三年

一月，中央红军一部进抵信江南岸之贵溪地区。红十军即奉命

南渡与之会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归入中央红军建制，调到中央苏区，由我回闽浙赣苏区组织新红十军。

红军新十军以赤色警卫师为基础，集中一部分游击队组成。原赤警师师长匡龙海代理军长，我任政治委员。

五月，中央军委任命王如痴为新红十军军长兼政治委员，我任政治部主任。

八月，我调任闽浙赣军区政治部主任。

十二月，我调任闽浙赣军区政治委员。

## 一九三四年

敌由猛攻猛打的"围剿"战术改变为步步为营的堡垒分割推进战术。为了打破敌人的堡垒战术，对于中央的所谓"赤色堡垒对白色堡垒"的作战指导，我和方志敏同志曾提过异议，但中央屡次来电批评指责。不敢过违，致使闽浙赣苏区在敌军的堡垒分割推进下日益缩小。后来，中央军委虽说同意我们派遣挺进部队到皖南游击，并且批准红军主力可以相机出击浙皖，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但是时机已失，大势已去。我军主力活动已经处于很不利的地位。

这个期间，闽浙赣军区在方志敏同志直接参加与具体指挥下，进行了巨大的保卫苏区的斗争：一、发动与组织了广泛的群众的地雷战。包围敌人堡垒，杀伤了大量敌人，迟滞了敌人的前进；二、发展了苏区周围白区和敌人远后方的游击战争。组织了两起挺进游击队深入浙赣皖边各地活动，建立与发展了浮婺乐及浙皖边地带的游击区域与游击战争；三、动员、训练了大量的赤卫军和少先队补充主力红军，保证了红军的兵源。

地雷战，曾被中央指责为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向白区派遣挺进游击队，被中央批评是一种"分散红军力量"的分散主义。后来，中央还是同意了闽浙赣省委和方志敏同志的意见。因为实际证

明我们是对的。

当时，中央的“左”倾错误大大地帮了刘畴西、王如痴等的忙。从一九三三年以来，他们对于出击敌后，从来都是犹豫不决，不敢深入敌后活动，总拿中央指示做借口，带着红军在苏区内打圈子，到处游行。

十月，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到达闽浙赣苏区与红十军合并组成红十军团。方志敏同志担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我调任红七军政治委员。红七军先出皖南，红十军随后跟进皖南，集中行动。寻淮洲同志牺牲后，战况益显严重，伤员无法安置，大家深感无根据地的苦恼。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方志敏同志的提议下，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皖南柯村会议决定我调任皖南特委书记，做地方工作。以太、旌、黟、积地区为中心，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配合红军行动，创造红军后方苏区根据地。不料，我离开部队不久，接方志敏同志信，说红十军团已得项英同意，转往闽北地区活动。要皖南特委以后直接受上海中央局领导。我很不同意红军回苏区转闽北的行动，派了专人送信去，但没有赶上部队，又返回了特委。过不了几天，就听到传说方志敏同志被捕的消息，这个损失太大了。

# 关于闽浙赣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几个问题

聂 洪 钧

我是一九三一年五月到达赣东北的，来时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同年秋天，我又调到部队里去了，开始是在红十军搞政治委员，后调到军区搞政治委员。一九三四年底经军政委员会决定调离部队到皖南特委，任务是发动群众起来斗争，配合红军行动，创造皖南苏区。

关于当时闽浙赣的军事路线，总的还是离不开中央所提出的军事路线。曾洪易那时在军事上不起什么作用。曾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军事，而且胆小如鼠，从来不敢随军行动。实际上当时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的意见。每次省委讨论军事行动计划，比如应向什么方向出击，打什么敌人，多半是根据方、邵的意见决定的。每逢较大的军事行动计划，非方即邵必有一人参加行动，直接领导军事和地方党的工作。

在敌人大举进攻的时候，我们就发动群众到处用地雷、陷坑等阻滞敌人的前进；发动地方武装游击队到处袭击敌人和疲困敌人。红军主力则找敌人的弱点进行截击和袭击，不断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以粉碎敌人的围攻。一般的说，闽浙赣苏区能够粉碎敌人各次围攻，中央苏区红军消灭敌军主力的战争是决定的关键。如果敌人退出中央苏区，在闽浙赣苏区军民打击下的敌人，也必然同时怆惶逃出。当然，如果没有闽浙赣本身的红军、游击队和全区人民的英勇斗争，到处截击敌人、围困敌人、疲惫和消耗敌人，并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敌人是不会轻易甘心退出苏区的。所以说，全国各

地红军支援了中央苏区，中央苏区红军在粉碎敌人的围攻中，每一次都缴获敌人成千枪支和大量弹药来装备和扩大地方武装。

闽浙赣红军主力大概六、七千人左右，编成三个主力团。此外，还设有机炮营、特务连、通讯连等直属部队。地方武装有赤警师。赤警师由军区直接指挥。主要任务在于配合各县游击队打击在苏区周围驻扰的敌人，警卫苏区，以利主力红军的机动和出击敌后的行动。县里一般有独立团或独立营。凡是青壮年都参加了自卫军或地方武装。

为什么不更多集中地方武装到主力红军去呢？我们当时认为如果过分集中就会削弱地方武装，拿今天的话来说，就不是两条腿走路。主力还可能被迫分散来对付周围驻扰之敌和在苏区内的敌人据点。所以过分集中地方武装不一定是好办法；不把地方游击队过分集中起来，也不一定就是保守。不过分并不等于不抽调地方武装到主力红军来壮大主力红军。而地方武装始终是红军主力扩大的源泉和主要后备力量。闽浙赣红军主力的扩大，一个是直接动员农民自卫军参加红军，另一个就是抽调可能抽调的部分地方武装补充主力。同时，群众在开始时往往愿意参加当地游击队。经过地方武装这么一段时间斗争生活的教育和锻炼，很多人不仅愿意，而且常常以能参加红军主力作战才觉过瘾。经过一段地方武装斗争，再抽调补充到主力红军里来，这对保持主力的战斗力也有重大意义。

赣东北红军二次出击闽北打下了浦城等城镇，没有去打建欧、建阳，这是不是保守呢？好象不能这样说。我们打下蒲城后，国民党刘和鼎等部兵到建欧、建阳。偷袭已不可能，强攻很难得手；而且我军远离后方，更有成千挑子和成百担架需要掩护，行动是相当笨重的。这次去闽北，我们收获很大，但我们也损失了几百人。从闽北回来，经过沙溪信江河，还遭到敌人一次拦腰袭击，在这里受到了一点损失。因此，红军从闽北回来后，当时省委开会，有的同志说：胜利很大，就是机警不够，未能避免过信江河时遭受敌人袭击的损失。

一九三一年冬天，我被调到红十军去，是接倪宝树的职务。倪宝树这个人没有能力，什么工作都干不了，政治工作一团糟；更是动摇不定，毫无主张。当时，省委曾开展了一次批判倪宝树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

我初到部队时，还有"缴到敌人一根枪赏三块钱"的作法。这种作法，很多人都不同意，后得到方志敏和邵式平同志的极力支持，经过不记得是方还是邵去作了一次动员，讲明道理，就把这个制度取消了。

军队能不能打仗，不仅要看战士的战斗情绪，而且还得要看指挥员的指挥才能、意志和决心。刘畴西、王如痴两人在军事上都很右倾。王如痴是红十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来的，新十军成立时，他当军长。当时，中央介绍王如痴富有游击战争经验，不想他来新十军后，几乎对每次战斗都是犹豫不决，前怕狼后怕虎，似乎什么仗都不好打。方志敏同志为这事很恼火，省委曾数次开会反对王的右倾，最后只得打电报要求中央另派人来，结果来了个刘畴西。他在军事指挥上同样是一个迟疑犹豫的人。

打碉堡，当时中央指示，要以"红色堡垒反对白色堡垒"，这是"左"倾错误的顶峰。用主力到处去攻敌人堡垒，结果我们损失很大。当时方志敏同志和省委都不主张这样死攻碉堡，而提出出击怀玉山及浙江开化一带，乘敌纵深堡垒网尚未形成的时机，调动部队到广大的敌后去打运动战来保卫苏区。可是中央认为这是逃跑主义。经多次请示，最后中央才同意了我们可以相机出击浙江开化一带的主张。因为时机已迟，虽未能有力地破坏敌人碉堡网的进攻，然而却给了敌人严重打击，取得了很多胜利。

关于闽浙赣的肃反问题。记得是在贵溪地区的一次作战过程中，原定作为预备队的一个营不见了，吹号也调不来。到战斗结束后才在一个很远的山沟找到这个营。于是我和建屏同志当即决定撤营长的职，送葛源审理。在讯问中，他承认自己是个反革命，并供说吴先民（赤警师政治委员）也是反革命。记得搞吴先民的时候，省

委开过几次会，我也参加过一次。方、邵都不同意吴是反革命，为这事，方、邵还写过检讨书。闽浙赣肃反，曾洪易是最积极的负责人。我在当时虽然没有直接主持肃反工作，但在某些地方却是支持了曾的错误主张。

当时我主要是思想认识模糊，“左”倾幼稚，没有经验。闽浙赣苏区肃反可算够“左”的了，但是当时中央还认为肃反不彻底，一再督促要深入肃反斗争。

在以方志敏同志为首的省委领导下，闽浙赣苏区的党和群众的确作到了团结得好象一个人一样。当时中央苏区到闽浙赣苏区来的干部都说：兴国群众工作好，闽浙赣群众工作比兴国还好。我看不会差于兴国。

一九三四年七月，七军团从中央出发到达赣东北，在德兴重溪与新十军会合，成立红十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红七军团改变番号为第十九师。军团之上成立了军政委员会，方志敏同志任主席，统一领导军团、闽浙赣苏区及皖南地方军事和党的工作。刘畴西任红十军团总指挥兼红十军军长，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在苏区内，十九师获得略事休整之后即出浙皖活动。十一月红十九师由浙江折回皖南与红十军会合后，在谭家桥遭遇王耀武等敌军，寻淮洲负伤牺牲，红十军团在皖南的行动从此陷入比较困难的局面。

红七军团由中央苏区出发北上，曾洪易也随军到了闽浙赣苏区。他一来就大肆散布不满中央的言论。为此，方志敏同志和省委（红七军团负责人都参加了）曾向他开展了两天的斗争，严厉地指出了他的政治动摇和反党行为。这个人到赣东北之前在上海的时候就给我一个很坏的印象。开始中央决定万永诚到赣东北任省委书记，我任组织部长，曾洪易当宣传部长。后来他提出要当中央代表。不知怎么搞的，中央就接受了曾的要求，就由他当起中央代表来了。这说明这个人的个人欲望之高。

# 五年军事生活的片断

赵 火 福

我是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的。小时候在漆工邵祥泰家看牛看马，后来学皮匠。

一九二八年四月，我参加了德兴县游击队。当时游击队只有六条枪。游击队员头扎手巾，也作腰带用，每人一条子弹袋，一条干粮袋。白天，我们化妆成农民，扛着锄头上田和老百姓一起干活；晚上，我们就摸进村子打土豪和袭击敌人。我在游击队不到一年的时间，第二年正月，就被调到了信江特委警卫队，住在弋阳烈桥一带。特委有一个独立团，下设四个连。一九二九年元月敌周志群部×营十一、十二连相继在磨角桥起义投诚，不久，十二连在吴家墩反水。大约在这个时候，我调到了二营四连当班长。

一九三〇年五月，方志敏同志带领我们独立团消灭了盘踞在乐平秧坂的白军一个连，接着打下了众埠街、鸣山、铁山、黎桥等集镇，将乐平县东南乡地主武装大部分肃清。以后又打下了景德镇，留了两个营（匡龙海、龙志光为营长）在市区，一个营送东西回苏区。当时乐平已经被我军攻下，成立了县苏维埃。这时有一批新兵在乐平受训(包括横峰、上饶等地的新兵)。当地的靖卫团听说新兵没有枪，就想包围消灭他们。我们送东西回苏区的这个营正好走乐平县城过，在新兵的带领下，打进了乐平，由新兵把俘虏押到了众埠街。这年的六月，红军独立团扩编为独立师，我也被调到第一旅第一团团部特务连二排当副排长。七月十四日，我们又开进景德镇，开了一个提灯大会，有狮子灯、罗汉灯、叠瓦子灯，等等。我们还召开了一个有好几千工人参加的工人大会。这个会，方志敏同志参加了，还在工人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工人阶级是革命的

领导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过去我们工人受尽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一天要做十几个小时的牛马活。我们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推翻地主资本家的统治。”会上，工人代表也讲了话。这个会从上午八时开到中午十二点多钟。会后，我们在市区成立了苏维埃。许多工人同志踊跃报名，纷纷参加红军。我们在景德镇住了一个多月，没收了一些资本家的东西，把它分给穷人；派人把守典当铺，让群众拿当票领回当掉的东西。十月，我们又回到众埠街，成立了红十军，下辖一、四、七旅。后来红十军改成三个团（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团），外加一个湖南师（师长晏文卿）。连部组织设有党支部（一九三一年以后公开）、共青团支部、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管理连队生活和保藏缴获的战利品，连队还设有列宁室，组织文化娱乐活动，用沙盘教战士们识字。

红十军在众埠街停了一个星期，便开回方家墩。这期间，打了上饶河口，后来又走乐平、田坂街去打波阳。在波阳缴到敌人两船鸦片，全部烧掉了。接着就打缸桥，抓到敌人一个团长。打都昌，第一次缴获了敌枪榴弹和汤姆森枪，消灭了敌十八师一个团。接着全歼了由湖口出来的宋子文税警团的缉私营，抓住了敌营长。第二天，敌人派了几架飞机追击轰炸我们。我们回到波阳田坂街，休整了一下，转回贵溪，经景德镇去攻打彭泽。打彭泽对敌人震动很大，派来了军舰。军长通知我们，部队撤出彭泽城，在城头遍插红旗，作为诱敌之计。敌人不知底细，空耗了许多炮弹。

打了都昌以后，我们回到苏区。首先打上饶。打吉阳山时，我们包围了山上的敌新编第四师的两个团，敌人派出五架飞机给山上的敌人空投物资。我们把白布铺在地上，敌机见了，以为是他们自己的部队，便把棉衣、面粉丢在我们的阵地上。这次战斗是周建屏指挥的，方志敏同志也亲临了战场。战斗结束后，吴先民同志组织上饶、横峰两县群众来挑缴获的物资，挑了两天两夜才挑完。

当时敌赵观涛的第四师一个团扎在上饶，另有好几个县的靖卫团扎在罗桥。我们一旅打罗桥，四、七旅打上饶，全歼了敌人。打

进上饶，在河里捞到了一挺机枪。

在上饶住了一夜，部队开往灵溪过夜。侦察兵前来报告，说敌李金坤一个团正在河口。方志敏同志立即召开战前动员会，分析了敌情，认为我军三战三捷，士气高涨，而驻扎河口的敌十三师的一个团，是被中央红军击败溃退下来的，士气不振，是不堪一击的。我军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打胜这一仗。部队第二天早上出发，在横峰港边吃了晚饭。第二天天还没亮，战斗便打响了。战斗打得很激烈，方志敏同志的那匹马在浮桥头负了伤，他便徒步指挥。同志们非常关心方志敏同志的安全，劝他不要上去，他却对同志们说，快去追击敌人，别让敌人跑掉。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人全部被歼，仅敌团长负伤后逃掉。进了河口，方志敏同志住在朱大昌家里，向他筹款。结果筹款二十万元，全镇百姓放鞭炮喜庆。

接着，部队回师贵溪，朝城里放了几枪。以后又打了贵溪墩上徐家，歼灭了江西省警备第一团的一团敌人。

一九三一年四月，红十军一进闽北。首先是打浙江的华埠。敌人有一个营，其余的是靖卫团；红十军去了一个团。这次很快拿下了华埠。攻华埠一是声东击西，使敌人产生错觉，二是为了搞盐。不到一个月，部队就向闽北开拔。在长涧源打卢兴邦的部队。敌人躲在一座土屋里，从枪眼里向外放枪。我们就从土墙外挖坑道，堆茅草烧，用烟熏土屋里的敌人。很快就歼灭了敌人。匡龙海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负了伤。在长涧源休息了两天，指挥部就派七旅攻打赤石街，一、四旅攻打崇安。赤石街有茶号，我们缴获很多。打崇安时我们碰到了国民党海军陆战队，这些家伙在陆地上无用，不大会打仗。打下崇安后，部队每人背一百银元，挑伕挑五百，马背上也驮着，来了个满载而归。这次打闽北，巩固扩大了闽北苏区。因为在这以前，闽北苏区已经丢得差不多了。红十军回师苏区时，留了一个特务营在闽北。

# 回忆上横特区的工作

苏四妍

一九三一年上半年成立了上横特区，一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还在坚持工作。上横特区成立时，特委书记是陈直斋、团委书记张冬元、青工部长廖禾仔、军事部长杨维炎、精干连长鲁正兴、青妇部长苏四妍、成妇部长谢火珠、财政部长徐桂生、互济会长徐春林。

特区机关驻在南塘江家（现隶属于铅山县），我们白区工作人员定期过江来这里汇报请示工作。

上横特区的工作范围从信河下游的洋林冈村开始，溯江而上，其中包括公公庙、杨梅岭、上前进、中前进、下前进、白射、金鸡山（铅山县信河边一小村落），到老虎塘止。当然，河口镇也是，并且还是上横特区工作的重点。以上就是整个上横特区的工作范围。

特区的工作是侦察白军军情、镇压政治上最反动的和有民愤的土豪劣绅，发展我党地下组织，扩大根据地的影响，沟通与闽北根据地的联系，骚扰敌军，采购根据地内紧缺物资，（主要是食盐、西药）。

一九三二年三月间，我被县委派去上横特区工作。当时县委发给我十七块银洋、一副爆竹作为活动经费，并安排我在铅山的中前进村朝拜了一个老娘（即干娘）。她的大儿子我称他为"干哥"，是一个"白皮红心"的地下党工作者，公开身份是保长。我是特区成立后第三个被派往白区的工作人员。第一个是谢火珠，莲荷人；第二个是徐月花，比我早三、四个月；第三个是我；第四个是龙门的聂爱香。

我们四个人分了工，组织上决定我化名黄秀珍，负责中前进、下前进、白射一带的白区工作。

刚到白区，我一时不摸情况，加上我年纪轻，什么都不怕，在讨猪菜、洗衣服时，一高兴起来，就憋不住唱些根据地的歌给周围

的妇女们听。风声传开，引起了白军稽查的注意，到处探听查找一个“会唱曲的姑娘。”好在我有当“保长”干哥的庇护，才给遮掩过去。陈直斋同志也善意地批评过我，并再三叮嘱我要注意隐蔽。经过这次小小的风险，我也认识到我干的这项工作的危险性、艰巨性，并老练了不少。

不久，特区决定打老虎塘的一家土豪，并组织了独立营、精干连和在当地群众中发展的革命积极分子参加，结果牺牲了五、六个当地群众骨干分子。不久我得知这家土豪的儿子要大摆筵席举行婚礼。我及时向特区报告了这一情况。当夜县独立营、精干连袭击了这家土豪，把宴会闹得一塌糊涂。这个土豪平时横行乡里，民愤很大，当场被我军镇压。把新郎公、新娘也双双押到南塘江家扣押，罚款四百“花边”。结果拿了三百多块，剩余部分实在拿不出，就捉了他家的四十多只鸬鹚来抵偿，才让他家把人赎回。这次打土豪，影响很大，白区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顿时收敛了。群众真开心啊！他们编了句顺口溜说：“莫惹红军，惹了遭瘟。”用当地铅山土话说起来，别有一种风韵与情趣。

在经济上，白军对根据地是实行全面封锁的。当时根据地内什么都不缺，就缺食盐。我们做通了河口镇一家盐栈的工作。这家盐栈上至老板，下至伙计，都乐意与我们做生意。起初，采购大批食盐都用棺木盛放，找四个人一抬，我们找一批妇人装作哭丧，蒙混出城门。不料有次抬棺材出城时，哭丧装得不象，引起稽查怀疑，便一直追到城门口。抬棺材的四个人飞快地逃走了，丢下的棺材被白军撬开，原来是满满一棺材食盐。以后白军便加紧了盘查。当追查到盐栈时，盐栈老板沉着应付：“我只管做生意，卖盐、进盐，别样我怎么管得了那么多呢？买盐的人很多，敝栈一天都要销好几百斤，谁头上号了字?!你们其中有哪个看到有人抬棺材到我栈里来买盐呢？”白军稽查反而被老板问得哑口无言。后来我们特制了一批夹底粪桶，面上是大粪，下面两大半桶是食盐。就这样一挑又一挑从白军的眼皮底下，源源不断地挑出城关口，输入我根据地。红十

军一军人所需的食盐，就靠我们上横特区这条地下运输线保证供应，一直比较顺利，没有泄露。

一九三二年七月间，组织上决定做驻扎在洋林冈炮台的一连白军的工作，争取他们哗变。我与谢火珠、黄春花时常到炮台去帮士兵洗衣裳，了解情况。这连白军的连长姓杨，贵州人。黄春花私下向他宣传起苏区的情况，不料这个丘八连长非常顽固，还追问黄春花是谁叫她来讲的。黄春花以“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听哪一个说的记不清了”来搪塞。大概那丘八连长认为黄春花是个乡下姑娘，不懂什么世事，也只有作罢。特委分析，既然这丘八连长对苏维埃没有认识，那么要想他组织全连哗变，是不太可能的了。于是决定我和谢火珠放毒将他们毒死。一天，我和谢火珠商量后，把毒药用宣纸分别包成长条条，别在袖口上，借送衣服上炮台的机会，经过炮台厨房的大水缸时，就随手将毒药投进去。第二天一早，消息传来，说炮台上闹死了十多个兵，那个姓杨的连长也闹得差点死掉。不久，这连兵就调防了。

八月间，谢火珠同志不幸被白军稽查逮捕，惨遭敌人杀害。我们特区的同志得知这个消息后，个个义愤填膺。我干哥告诉我，最近稽查查得很紧，每逢双日出动，见可疑的人就捉，捉住就杀，要我们格外小心，无事不要外出走动。我把这情况及时地报到南塘江家特委处。特委认为，应该及时打击一下稽查，扑灭他们嚣张的气焰，为牺牲的同志报仇。我得知白军稽查往返时，七里亭冈上是必经之路，那里地势险要，南面是信河，陡壁下水流湍急，四两丝线打不到底。特委根据我的提议，把精干连埋伏在路边。果然，该死的五、六个稽查队员，不知在哪里喝得醉醺醺地踉跄而来。等他们到了七里亭冈上隘口时，精干连战士一拥而上，抱起两个吓呆了的稽查队员往河里一扔，其余的酒也吓醒了，落荒而逃。精干连这一次缴到两支枪。

一九三二年九月，我奉县委的指示，到省列宁师范学习，从此我就离开了上横特区。

# 铅山县河南特区的革命斗争

陈直斋

一、河南特区建立前的一些情况：

一九二九年信江北岸的铅山地区，因受横峰革命的影响，已有革命活动，西坂一带发展了互济会的群众组织，一些富裕农民也都买了互济票。买了互济票的，睡觉也睡得安稳。当时在群众中还没有建立党的组织。

一九三〇年红军第一次打河口，我在葛源和程伯谦一起工作，任区委委员，曾动员群众到河口对岸庙湾搬运粮食（这些粮食是河口豪绅堆放在庙湾栈房内的）。以后我调到横峰二区任区委书记，驻在横峰城内。红军第二次打河口，我到了河口。河口守敌是李全坤团。我们先夺下金鸡山，居高临下，直取河口。这次获得很大胜利。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都去了，河口商会还请他们吃了酒。方志敏同志等在河口曾召开全军战士及全镇群众大会，方志敏同志讲了话，宣传我们党的政策。

一九三〇年冬，上级派我到铅山担任县委书记。当时铅山还只有北岸是红色区，划为横峰五区，我便担任区委书记兼区苏主席。我调河南特区后，区苏主席由苏金阶接任，区委书记由谁接任，记不起来了。

二、河南特区的建立和发展：

一九三一年下半年，闽浙赣省委决定建立河南特区，由省委直接领导。我担任特区区委书记。特区委设有组织部、宣传部和妇女部、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委等部门。行政方面，设河南特区革命委员会，代行苏维埃政府的职权。开始，革命委员会的主席是姓姜的，名字忘记了，以后是张文彬。省委根据当时该地区情况，为了领导

方便，把特区分为上横河南特区和下横河南特区。我是在上横河南特区；下横河南特区的区委书记是张炳全。但这两个特区通称还是河南特区，不过内部分工负责。

特区的活动范围，自信江北岸的后坂、南塘、界石、旁罗到信江南岸的杨村、鹅湖、前荆、安洲等地，恰好对河口形成一个弧形的包围圈。信江北岸的地方建立了红色政权，比较巩固，是特区机关驻地，也是特区工作人员在南岸紧张时的休息地方。南岸这些地方是我们开辟出来的，先后建立了五个分区委，分区建立前称特支，作为领导支部活动的中心支部。后来条件具备，就成立分区委，领导支部活动。每个分区委都领导四、五个支部的工作。

五个分区委的活动地区和负责人：杨村、公枭庙、凤来、杨梅山是一个分区，负责人徐泉林；鹅湖那个分区委范围比较大，包括鹅湖书院周围的一大片地区，分区委书记刘辉太；上、中、下前荆一个分区，书记邵仁荣、杨国良（也可能叫杨绍隆）；新岭、安洲等地一个分区，负责人姓徐，名字忘记了；七里亭、老虎岩等地一个分区，负责人忘记了是谁；河口镇内有一个支部，归特区委直接领导，这个支部有党员六、七人，大部分是手工业工人，我到过里面开过一次会。

五个分区委共有二十多个支部，党员不下三百余人。

在特区范围内，人民斗争情绪高，各种革命的群众组织如赤卫队、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互济会等都有。前荆分区是最活跃的地区，可说是特区中的小苏区。但这些分区内都未成立苏维埃政权。当时特区脱产干部有四、五十个，有一个短枪队，约有四十多支驳壳，力量比较强。汪金祥、万永诚等同志去中央时，没有随部队去，而走特区经过，就是因为这一带比较安全。

随着特区的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也日益壮大，省委在一九三三年春（红军去中央前后）曾决定要在鹅湖书院成立苏维埃政府，建立鹅湖县。这个决定是方志敏同志到南塘来传达的。由于敌人加紧封锁和包围，斗争环境日趋紧张，没有建成。

一九三四年我离开河南特区，由一个姓陈的接任特区委书记。不久，他带枪投敌，组织也被破坏了。

三、特区革命斗争的任务：

特区的革命斗争是艰苦、残酷的。我们凭借信江北岸的一点根据地向南发展。每天从太阳落山到第二天拂晓前，在界石到杨梅山这一段信江里，我们运输的船只川流不息。虽然匪二十一师及靖卫团在公果庙、中洲、凤来沿江岸都筑了碉堡，封锁信江，但我们的船只仍然渡来渡去，使我们能胜利地完成接济苏区物资的任务。当时黄仁喜同志为省苏购买的一些宣传用品和物资都是经过我们特区的。当时具体的任务有下列几方面：

1.发展组织。向没有革命组织的地方发展革命组织，扩大革命力量。一般以互济会打先锋，在群众中大量发展互济会会员，启发贫苦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再在农民中成立农民革命团，然后吸收其中的先进分子为党员，三个党员即可成立一个支部。其它革命群众组织如赤卫队、少先队、青年团、妇女会都先后成立。

2.抗租抗债。特区内的土豪大部分逃到河口、铅山、上饶等地去了。每年收租时，他们自己不敢来，派狗腿子来。我们就发动群众不交租或少交租，有时警告土豪，不准来收租。"平债分田"的口号，在半公开的状态下实现了。

3.打土豪和消灭地方恶势力。特区的土豪虽然大部分逃走了，但是还有一部分依靠匪军的碉堡和地方恶势力留在地方上。我们对这部分人给予打击，把他们抓来罚款，不准他们乱动。前荆有个地主就住在敌人碉堡下面，我们还是把他抓来了。特区周围白区的土豪，我们也要捉，罚了款又放回去。这样周围的地区便有人来接头，我们就可以去那里开展工作。每次没收了土豪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分给劳苦群众，这样群众便更加拥护我们。

4.扩大红军。在特区扩大红军虽不象苏区内轰轰烈烈地开展，但是扩大红军仍可以进行，每次可以动员几个青年去参加红军。有时，从地方群众武装(赤卫队)中选拔优秀青年去参加红军。

5.武装斗争。我们自己有一个短枪队，在战斗需要时，还可以向上饶和横峰调用游击队，所以武装斗争是很活跃的，有时一天打几次。我们依靠这些武装力量，保护边界农民种田。当时敌人军事力量很强，除了匪军二十一师外，还有很多地方靖卫团、保安队。我们总是在夜间活动，遇到小股敌人，就把它歼灭；有时一夜出动六、七次，每次都是短兵相接。白天，我们化装隐蔽起来，如果有机会也要出动。有时我们化装在公果、凤来一带路边种田，有坏人来了，便给他一个迎头痛击。在鹅湖书院也和峰顶山和尚所武装的靖卫团打过仗，打得他们藏在碉堡内，不敢出来。

6.接济苏区，破坏敌人封锁。当时敌人对苏区是采取严密封锁政策的。凡是苏区所缺乏的东西如食盐、布匹、西药等，一概封锁。我们组织群众和敌人作经济斗争，派出大批采购员，采购我们所需要的物资，晚上偷运过河，一直运到葛源省委所在地。特别是食盐，我们费了很大力，有时一块钱只能买到四两，甚至只能买到二两。食盐现在对我们来说并不稀奇，但是，当时由于国民党采取严格的封锁政策，苏区人民吃不上盐，部队也吃不上食盐，只好用醋和辣椒代替，盐对我们就成了十分珍贵的东西。

7.沟通南北交通。赣东北省和闽北分区相隔几十里没有联通，特区的活动把这两块红色区的交通联络起来了。省委的文件由政治交通员送到我们特区，再由我们送闽北，通过闽北和中央联系起来。

# 赣东北苏区的经济情况

谢 文 清

我在赣东北省苏维埃工作期间，先是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后来调任经济部部长。

赣东北的经济，主要有三种成份：一是省属全民经济，二是合作社集体经济，三是农民个体经济。当时，这三种经济都很活跃，农工业生产基本上能满足苏区人民的需要。

从农业方面来说：自一九三〇年底苏区实现平债分田以来，省委和省苏维埃采取了一系列办法发展生产，具体的办法是：1.组织互助组，提高生产率；2.组织妇女参加生产，解放生产力；3.鼓励表彰生产模范，调动生产积极性；4.政府工作人员参加生产，带动和影响群众；5.采取有力的措施，保护和繁殖耕牛；6.搞好农具供应和修理。一九三三年春，省苏维埃发了《关于搞好春耕运动的训令》，方志敏同志在《工农报》上发表社论：《为全部实现省苏维埃农业生产计划而斗争》。省苏维埃还在各种会议上发动群众批评那些生产上的懒汉，同时又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去鼓励积极生产者。由于政府大力鼓励农民生产，苏区的农业虽然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但很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亩产由革命前的一季三百来斤增加到五百多斤，仅一九三三年秋收统计，农业产量就比往年增产两成。

从工业方面来说，省苏维埃自力更生创办了各种类型的小工业，如地雷厂、兵工厂（兵工厂的机器是打乐平鸣山煤矿时缴获来的）、造纸厂（过去只会生产毛边纸，后来改进了技术，学会了造白纸，取名尚光纸），还有榨糖厂、炸药厂、织布厂、织袜厂、硝盐厂、铸锅厂、棺材厂，甚至还有规模不等的煤矿、铁矿和炼铁厂、

樟脑厂等。这些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了供给军需和群众生活外，有的还远销外地。如尚光纸和棺材曾运到苏杭一带销售，每口棺材售价300元银洋，价钱好得很。此外，毛竹和木材驮运到信江，由水路通过对外贸易局与白区的商人做木竹生意。那时候在葛源还开办了一家大染坊，红军灰布军装多半是这家染坊染的。染料靠从白区采购进来，有时候缺少染料，也有用冬青柴叶染制军服的。记得在一九三一年，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方志敏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苏维埃财经委员会，提出了大办苏维埃工业的方针。自后，不仅省、县有自己的工业，连区、乡也有自己的小工业，至于家庭纺纱织布更是普遍，基本上形成了适应革命战争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生活的工业体系。

赣东北的经济，除了自力更生经营农工业生产外，还有三个方面的财源：一是取之于民。苏维埃政府每年向农民征收一定数量的土地税，制定了农业税的征收和减免办法。同时还发放了战争公债；二是取之于敌。起初，红军和赤卫队在苏区内部打土豪罚款子，后来苏区内部的土豪打光了，就到白区去捉土豪，要他们用钱来赎人。为了筹备军饷，增加财政收入，红军深入敌后，袭击了城市和富裕的街镇，如红军奇袭福建崇安的赤石街，缴获二十多万银元、两千多两黄金。奇袭景德镇更为可观，没收豪绅和当铺的黄金八十多斤，还有大量的物资和药品，那时候我们用了八十匹马去运；三是取之于商。苏维埃政府自己开了商店，我们把没收来的物资和自己工厂里生产出来的物资，放到店里出售，从中赚取利润。同时，我们也同白区商人做生意，通过对外贸易局把苏区出产的桐油、砂糖、药材、皮毛、木竹推销出去，赚取利润。我们还征收一定数额的营业税，这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总之，赣东北苏区的经济，虽然在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的情况下，由于广辟了财源，发展了农工业生产，经济繁荣兴旺。当时的物价很便宜，一块钱买十斤猪肉，毛鸡跟肉价，也是一块钱十斤。红军战士每月定粮三斗三升大米，干部定粮二斗八升大米，菜金每

人每天七分钱，机关里都种了菜，每星期还要上山打一次野鸡，伙食吃得相当好。并且每月结算伙食都有结余，结余下来的钱叫伙食尾子。伙食尾子可以年来分，大家都感到满意、高兴。赣东北的经济情况是好的，对于巩固革命根据地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

# 回忆贵溪的土地革命情况

江 天 辉

## （一）土地改革情况

贵溪县的北乡实行过土地改革，是在夏家岭炮台未建造以前进行的。那时的土改是经过许多次才结束的。但是全县情况不统一，有的经过三次基本上结束了，有的进行过五次。土改情况是与当时革命形势的变化有密切关系的。

第一次土地改革：

在第一次土改未进行以前，随着革命的发展，在苏区里就出现了不交租、不还债，谁种谁收的情况。同时，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划分阶级。贫农分为三种（上贫农、中贫农、下贫农），中农分为三种（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富农有富裕富农，地主分为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三等。群众对这工作讨论得非常热烈，对这事是很关心的。

为了在苏区进行土改，成立了没收委员会组织，负责没收地主土豪的财产。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土改工作开始后，在党的领导下，从省到县直至乡都成立了土地改革委员会，以贫农团为核心，充分发挥了贫农团的积极作用。

首先进行分田的地区是北乡。贵溪的北乡有里北乡和外北乡之分：里北乡东边到弋阳、万年、余江边界的乡村全部分了土地；外北乡就只分了老志光区（薯铺、翁家、董家、下塘、刘沙以上）、西洋丁家那边的七孔八董，以及上至河潭埠边上等地。在靠信江边上，只有一部分地区没有分田。基本上整个北乡都进行了土地改革。

那时土改没有土地法，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只县里土地改革委员会有几条规定，也就是第一次进行土改的几项原则：

①以乡为单位进行分田（实际上是以自然村为单位，小村就几个村合并为一单位）；

②土地划分成三等（上等田、中等田、下等田）来分配；

③分田按人口数平均分配；

④地主不分田；

⑤工人、雇农、红军家属分好田（本村最好的即秧田分给红军家属）；

⑥好田坏田要搭匀进行分配；

⑦襟田（会田）不分，留下来。祠堂、庙宇田全分光（县里没有这样规定，这只是地方上的做法）。没有房子分。贫雇农没屋住就住到地主家里去，把地主赶到庙里去。地主的财产全部没收；

⑧穷人分好田，富人分坏田。

但在工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①瞒田数目字很大：

1.富农和中农瞒田最多，以后贫农也瞒田；

2.封建的宗族观念很严重，整村瞒田（不愿调田出去，那时以村为单位分田也是这个原因）；

3.其它一些古怪的瞒田情况：女儿出嫁要留田，为兄弟分家要多留田，父母未死要留棺木田，庄坛田要留要瞒，有人在外读书要留田，等等。

②少数的土改干部不公道、自私自利，自己分好田，给亲戚朋友和拉关系的人分好田；

③地主趁机送金银物品、送田地与干部，贿赂拉拢干部；

④地主不分田，实行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的办法，并杀了很多地主。于是，地主就在外造谣说："今天杀地主，明天杀富农，后天杀中农，以后再杀贫雇农工人了……"这样，有的人便受影响，逃跑出去；同时影响到上贫农和上中农，产生了离开苏区的打算。

⑤分田以后，有的田没有人去种(规定要自己种，但孤寡、红军家属的田因没有劳动力就没法种了)，这样一来就造成了荒田。被瞒的田也荒了不少。因此，只好再进行第二次土改。

第二次土改是一九三〇年二月开始进行的。第二次土改只有二区、四区、五区、七区进行了，其它地区没有进行。

这次吸取了第一次土改的经验教训，在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具体领导下，发出了正式的文件。那时，县土改委员会对内发指示，对外施用布告(仍然没有正式的土地法)。土改中，发挥了贫农团的积极作用，全面进行了田亩的丈量工作，掌握了确实数字，合理分配土地。县土地改革委员会的指示原则是：

①以乡为单位就近分田，作法是由里向外分，抽签分田；

②把土地划分为三等(上等田、中等田、下等田)进行分配；

③好田坏田要搭匀，按人口数平均分配；

④工人、雇农、红军家属分好田，准备当红军的人要留田；

⑤不管什么田都要调出来搭匀分掉(不准留什么出嫁田和其它田)；

⑥地主要分田，但分坏田；

⑦新生小孩要补田，死了人要调田出来。

根据这些原则分田，情况比第一次有所改变，但群众对一些问题争执得很利害：

①因时间迟了禾苗要下田，群众要求赶快分田，以免影响生产；

②跑出去的人分不分田(以后决定去当反动派的人不分田，家属要分田；大力号召外逃人员回家分田)；

③外出打铜打铁的手工业工人分不分田(以后决定已划为工人成份的不分田，家属要分田)。

在这次土改中，基本上是以乡为单位分田(但乡也很小)，但还存在下列主要问题：

①按人口分田的数字规定不大合理，如：二人分三亩，一人只

分一亩(使有的寡妇因此急于要找爱人);

②由于一律不留田，全部分配，使已订婚的姑娘急于出嫁，(婆家未分田，而在娘家又没有田分);

③分田时间拖得过长，弄得群众为肥料等问题争吵(因为原田已由原主下了肥，可是未分给原人，因此在向受田人讨要肥料时发生争吵);

④名义上土地全部分掉，实际上漏田瞒田仍不少，尤其是上等田(因为土地税较重些)越搞越少，坏的田却多起来了;

⑤靠刘沙戴家以上、河潭埠以上(即北乡以外)名义上分了田，实际上未按分田耕种，因这些地方是赤白交界地区，贵溪鹰潭经常有反动派来骚扰)。

因第二次土地改革在具体分配问题上还是没有搞好，所以又进行了第三次土改。

第三次土改是从一九三〇年十月间开始的(年代不肯定，月份不错)。在这次土改中，省土改委员会已颁发出正式的土地法。各地都按照土地法进行分田。

在这次土改中，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出现了劳力不足的情况(有的当干部去了，有的当红军去了)，群众要保证帮助红军家属，因而群众都争着要好田不要坏田(这时粮食很便宜，一块钱一石谷，一石谷一斤盐。盐非常缺乏)。

通过第三次土改，广大的劳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有的还分到了山林房屋(有的地区没有分)等。

关于第四次和第五次土改，因我已不在区里工作了，情况不太清楚。

## (二)党的建设

党的建设问题，我只能讲一个大概。在一九二五年、二六年的时候贵溪就有了党的组织。贵溪苏区暴动，我记得是先上名字，后

建立党的组织，从上名字过程中来观察哪些人是积极分子，哪些不是积极分子。在党的组织发展方面，有的地方先建立党的组织，后建立团的组织；有的先建立团的组织，后建立党的组织；有的地方是党团组织同时建立。总之发展党员的大体步骤是：①通过上名字，了解一个同志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是真心革命还是假心革命；②详细了解社会关系、家庭成份。那时参加党很强调成份，成份不好不要，社会关系复杂的不要，另外就是工作是否积极。党组织的成立要召开秘密会(党的会议)。党召开会议，开始是很严密的。在未暴动前都是在山上、在土地庙里开会。党员在入党时最少是一个人介绍，有的是二个人介绍(工人、雇农可以一个人介绍)。介绍人要对被介绍人负责，有问题找介绍人。入党后有的是三个月的候补期，有的是六个月的候补期。在候补期间是很紧张的，不能有一点错误。那时党员登记很经常，有两种表要经常填：①新党员登记表；②党员登记表。那时，党的生活很健全，而且很严格，一个礼拜要召开一次党小组会，除了打仗以外，按期一星期一次生活会，会议内容是：①谈谈自己的思想动态；②每次党小组会议都要讲国际形势，特别是能抓住节日，对党员进行教育。如：红五月的“五、一”劳动节、“五卅”惨案等，我们都讲解得很清楚。由于当时县区党团干部都深入下层，因此党小组会经常有区委参加。开会时小组长主持会议，然后区委讲话。会议一开就开到半夜，会后党员对群众进行宣传。再谈到党的纪律问题。党支部会、小组会对违犯党纪的人的处理是很严格的，所以打土豪劣绅没有一个人敢把铜板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党为了更好地教育党员，还开办了训练班。训练班主要是结合当时的工作；讲讲国内外形势，进行党纪教育。那时对于纯洁党内工作是做得较好的，对于那些错误严重的党员就要清洗出党(或叫开除出党)。对成份很强调，把地主富农叫作阶级异己分子。

党的组织机构，我记得一开始就是以四个村子为一个支部。到一九二八年初，一般是一村一个支部。到一九二九年二、三月间，

乡里成立了支部，村里成立了小组。每个小组由三至四人组成。小组人数规定逢单不逢双。因为当时每通过一个问题都要表决，逢单便于表决。也有比较大的村子有两个支部，如胡塘就有两个支部（一九二九年，我是胡塘乡的支部书记），支部受区委领导。支部有书记，有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区委有区委书记一人，有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还有常委、执委。常委由区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苏维埃主席等人组成。执委一般还加上工会委员长、团委书记、妇女部长等。区委没有开过党代会，我记得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县委派来的，区苏主席是选的，妇女部长是区委调的。关于贵、余、万中心县委问题：在一九二八年七、八月间，贵溪闹得很乱，刚割了禾就有共产党来了将怎样怎样等话。当时张贵清在三板桥受了党的宣传，回来便叫我不要怕，并说种田不要交租。大概是在同年九、十月间一天晚上，我和汤维新、李才继等几个人到和尚源见到了方志敏。他说共产党是怎样的一个党，弋阳、横峰怎样，我们贵溪怎样。我还听方志敏说到"列宁"，并说你们这些人就是我们的人了。我们贵溪有贵溪县委，因为地方小，所以与余江、万年合起来成立贵、余、万，中心县委（到一九二九年以后就没有了）。开会回来，我就开始做宣传工作，和要好的朋友说什么叫共产党；革命可以分田地，种田不要交租等。党代会我记得一共开了四次。县委机构原来只有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县苏主席、工会委员长、团县委书记，后来才有妇女部长、保卫局长、军事部长等人。县委一般是七至九人。那时党对纯洁党的组织工作做得很好，做法是：①调查成份，看你成份好不好；②调查社会关系；③看你这个人贪污不贪污。对错误严重的同志就要开斗争会，对错误缺点进行无情的、坚决的斗争。

## （三）各区游击队简况

贵溪七区游击队成立得最早，接着六区、五区也成立了。那时

在河潭埠成立了船泊检查组，这支队伍是在敌人修筑夏家岭炮台前成立的。开始成立游击队时没有什么武器，大部分是鸟铳、木枪，枪支少得很，每个游击队有三、五支枪就算不错了。游击队队员有多有少，经常变动，经常扩大，但经常保持七十至八十人，番号叫某某区游击队，如七区游击队、八区游击队等。

在战斗方面，有几次仗是打得很漂亮的，如六区河潭埠船泊检查组，有一次把国民党反动派调运的两船布匹、食盐、子弹都缴过来了。那时游击队有打土豪筹款的任务。还有西方一仗是打得很漂亮的(是黄德俊带去打的)。我记得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横田罗家村里在打醮，大部分地主都在那里拜天地。我们七区游击队二十多人去围攻，捉到罗金山、罗秀山这两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头子，其它地主也都捉到了。

关于游击队里党的工作问题：那时部队里党员很多，党团员占一半以上。游击队在每次战斗前，党支部、党小组都要开会，研究讨论作战的策略问题，号召党员要带头冲锋，攻破敌人的碉堡，打较重要地方时，要组织敢死队，而敢死队的组成人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

## （四）扩大红军问题

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夺取政权，而要从庞大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手中夺取政权，就必须要有一定数量和素质的人民军队，这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贵溪人在一九二九年革命暴动后，对于参加我们自己的军队，还存在着两种看法，因此表现各有不同。一种是积极参加红军，这是正确的一面；另一种是落后的一面，少数人认为共产党领导革命是好，打土豪分田地更是好，就是参加红军远离家乡舍不得。这个矛盾在青年妇女中反映较为尖锐。有的就说：“嫁老的不甘心，嫁年青的又要当红军。”鉴于上述情况，党在这项工作上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

①扩大政治影响，深入宣传教育，说明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党，红军是自己的队伍；

②党团员在扩军中起带头作用。在每次扩大红军时，省委将任务(数字)放到县里来，县委根据各区的情况将数字下放到区里，区委再将任务下放到各个党支部。并且在各种群众组织内充分研究讨论(例如贫农团、赤卫军、工会、少先队、妇女会等)，党团员自己带头报名，而且还要带动一两个群众，多的十几个参加红军。在少先队里进行比赛，如果动员了父亲、哥哥等去参军的，就叫作"坐飞机"，没有动员去的就叫作"背乌龟"。

另一方面我们深入白区进行宣传，唤醒他们的觉悟，因而白区也有不少同志报名参加红军。

③在政策上优待。红军家属，在土改时分给好田好地，家中人的衣食住行等一切都受优待，使他们感到比儿子、丈夫在家还生活得更好。

④不断扩大地方武装和对它进行正规训练，在扩大红军时使赤卫军能够整排、整连地转为红军。

经过党的宣传教育，提高了群众对参加红军的认识，妇女们坦率地向自己的丈夫表示态度说：你去参加红军，家中一切事情由我负责，请不必担心。从这时起大小脚妇女们都下田做事了。所以在一九三一年七月、八月，我县就扩大了一个补充师，根据省委指示，不久又扩大了一个少共国际团。这时青年们都争着要去当红军，妇女们也都唱道："吃菜要吃白菜心，嫁人要嫁当红军……"

# 上 清 会 师

马 步 英

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天空飘下了大雪。早上，军长周建屏把我叫去，命令我带一个营到贵溪县的上清架桥。记得当时他是这样对我说的：中央红军已经到贵溪牛田了，明天我们就和中央红军会师。你的任务就是架桥。我听军长这么说，高兴地敬了个军礼，连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同志们。大家听了都很兴奋，一刻儿就准备停当，跟着我赶到目的地。

上清河水冰凉刺骨。战士们冒着严寒，在水里奋战了一天，将桥架好。第二天，中央红军三军团在朱德总司令率领下，先头部队赶到上清后，摧垮了盘踞在上清的敌人碉堡，扫除了会师的障碍。我们赣东北红军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三个团，在军长周建屏，军委会主席邵式平同志率领下，也急速地向上清运动。邵式平同志先到达上清，与中央红军接上了关系。随后我们的大部队过河与中央红军会师。

会师的那天，上清街到处挂满了红旗。当我们赣东北红军开进上清街时，街两旁的店铺燃放爆竹，许多群众送来了猪肉、鸡蛋等食品慰问我们。中央红军的战士们还唱起了歌：

来来来，打倒它，
反动派，哪怕它，
挨户团，小奴才，
建立起工农兵政府苏维埃！

第二天，我们都在上清过春节。过了春节，朱总司令召开了两

军干部会。我是赣东北红军侦察科长，也参加了这次会。会上，朱总司令要求大家努力作战，把枪和刺刀擦洗干净，消灭阻挡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敌人。朱总司令身穿灰布大衣，脚着黑色力士鞋，浓眉大眼，庄重沉着，精神非常好，讲话的声音很响。当时在场的还有彭德怀、王稼祥等同志。

会师以后，中央红军和赣东北红军开始分头行动。我随红十军出发，一路打了资溪、黎川、建宁、归化、清流、乐昌、顺昌、邵武、光泽、浦城、崇安等许多城镇。中央红军也打了许多城镇，从而打出了一个闽赣省革命根据地。后来，由邵式平同志留下担任省苏维埃主席，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肖劲光同志（后由叶剑英同志接任），省委书记是顾作霖。赣东北红军军长周建屏调红二十四师当师长，赣东北红军改为中央红军第十一军。

中央红军与赣东北红军会师，打通了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加强了两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后来赣东北常派出各种参观团到中央苏区学习，对于指导赣东北根据地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两军会师后开辟了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闽赣省，扩大了革命区域，增添了革命力量。

# 闽浙赣苏区工人运动的片断

余　金　炉

## 一、工会的组织建设

闽浙赣根据地一经创立，工人就有了组建工会的愿望，只是因为敌军常以重兵围困，斗争环境异常险恶，故而在头一、二年未能如愿。

一九二九年十月，信江苏维埃政府成立。此时，全特区（共八县）虽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工会组织，但各县、各行业的工会已零星出现。我是个裁缝工人，记得弋阳最早建立的就是裁缝工会。

随着根据地的巩固扩大和形势的相对稳定，工人要求组织工会的愿望愈来愈强烈，一九三〇年三月，第二次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颁布了《工会临时组织条例》。"五一"劳动节前夕，信江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诞生。至此，闽浙赣苏区的工人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工会的性质：为团结工人力量，谋本阶级利益，实行阶级斗争的工人团体。

工会的组织机构：省、县（市）成立总工会，由工人代表大会（每半年召开一次）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下设秘书处及组织、宣传、青工、妇女四个部。

总工会以下成立各产业工会。

城市建立瓷业工会、矿业工会、店员工会、苦力工会（车夫、轿夫和搬运工人）。

乡村建立雇农工会（雇农属无产阶级）、手工业工会（按行业设立铁、木、石、篾、裁缝、皮匠、理发各分会）。

江河流域建立船业工会、码头工会（下设某段分工会或支流分工会）。

工会会员：凡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店员、船工、苦力等以出卖劳动力为生者以及乡村雇农都可加入工会。会员要按期交纳会费。每人每月交铜板三枚。

《组织条例》颁布后，各地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工人踊跃参加自己的组织，故会员甚众，单船业工会会员，在一年时间里，就发展到二千余人。

一九三〇年以后，闽浙赣苏区相继创办了兵工厂（工人最多时达八百名）、被服厂、印刷厂、织布厂（计划发展十万妇女工人）、织袜厂、煤炭厂、锅炉厂、制伞厂、制糖厂等数十种。造纸厂、制盐厂星罗棋布。制硝厂多达一千三百多个。随着苏区工业的飞跃发展、工人队伍日益壮大，促使工人运动更为波澜壮阔。

## 二、大规模地参加革命战争

当年闽浙赣苏区的工人运动，是围绕着进行革命战争这一任务开展的。工人们参军参战，踊跃支前，闹得热火朝天。

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苏区每次扩大红军，工会会员总是争先恐后地报名，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一九三〇年七月，赣东北红军独立团打下景德镇，在短短几天里，就有一千多名瓷业工人报名参军，为部队扩编成红十军增添了大批有生力量。

一九三三年，在省委、省总工会的号召下，三月十八日，集中了四百多名工人，组成红军中的第一个无产阶级团。五月一日，又集中了五百多名工人，组成第二个无产阶级团。工人争当红军的革命精神，受到中华苏维埃政府的赞扬。

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苏区的工会会员普遍实行了半军事化。由工人组成（或参加）的武装组织有工人赤卫队、红色游击队、

水上游击队等。这些武装都能单独作战。

工人武装更多的是配合红军作战。当年，红军部队每攻打一个城镇，几乎都有工会组织工人充当内应。红军智取景德镇，就是显著的例证之一。

特别是船业工会的许多船工，他们如同“浪里白条”，神出鬼没，威震江河。红十军激战河口、三打弋阳、二进闽北、滩头黄家拦截来船，蛤蟆卡大捷等等，仗仗都得到他们的有效配合。

工人武装还经常开展破坏公路、断敌交通，围困和拆毁敌军碉堡的斗争。

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会员们喊出了“奋斗，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并努力付诸实践。

在根据地斗争的头两年，红军部队“人比枪多，枪比子弹多”，枪弹的缺乏，对革命战争甚为不利。当时，苏区还流传着一个“越修越坏”的故事，说的是用高价聘请了一个修械师傅，结果却把枪修得更坏了。

自从兵工厂创办之后，状况逐步有了改变。工人们充分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但造出了步枪，手榴弹，就连机关枪，迫击炮等武器也造了出来。子弹的产量也大大地增加。

除兵工厂之外，各业工会还充分利用手工业作坊，制造各种土武器。如木工造松树炮、篾工造竹筒炮、铁工造铁雷、石工造石雷、窑工造罐雷等。

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苏区工会还组织广大会员，积极参加慰劳红军的工作。

一九三二年，赣东北省委在《红色五月工作总结》中表扬说：“工人方面慰劳红军的工作，更为激烈。修械处工人节省伙食买东西送给红军。被服厂工人组织补衣队替红军补衣服……一部分剃头工人则自动到红军去替红军剃头。这些事实是非常之多。”

当时，我任弋阳县总工会委员长，就带领过工会会员去替红军家属种田，砍柴。

## 三、积极参加苏区的经济建设

革命战争的持久开展，群众生活的改善、提高，都需要经济的发展和充裕的财政。闽浙赣苏区的工人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在经济建设方面也充分表现出来了。

在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雇农工会起了很好的骨干作用。每一乡村分配土地，雇农工会都依照“土地法”的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首先要定出一个方案，经农民讨论后，予以实施。雇农往往是打破宗族观念，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主将。

土地还家后，雇农工会又带头组织生产冲锋队，生产突击队；组织生产合作社、贮粮合作社。经过广大工农的共同努力，那些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农业生产发展很快，粮食、猪肉吃不完，大宗大宗地出口，发展对外贸易。

工人们发展工业生产的热情同样很高。那时，工会组织工人签定合同，广泛开展卓有成效的生产劳动竞赛。军工产品逐步适应战争需要。民用产品除医药、布匹外，诸如硝盐、砂糖、瓷器、铁锅、雨伞，袜子、石灰、砖瓦以及各种农具等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基本上能自给自足。纸张、竹木制品还能成批出口，远销上海、杭州等地。

主要由工会管理的设在各条河道上的船舶检查局，每处每年还可收入大洋近万元。

方志敏同志说：“解决被敌人严密封锁的经济问题；解决经过八、九年战争的财政问题……都不是照抄前例的，而是用前所未有特创的新方法去解决的，表现出苏维埃惊人的创造力量。”

毫无疑义，苏区工人所发挥创造性当在此列。

## 四、党对工会的领导和对工人生活的关怀

苏区党和方志敏同志对工会工作非常重视。当年，党和政府对

于职工运动曾颁布一系列政策，法令、条例和决议，对于工会的性质、工会的组织、工会的任务、工会的斗争纲领等等，都有明确的阐述和规定。

根据地的党组织非常注重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省、县、各业工会的委员长都由工人出身的党员同志担任，他们也都是同级的党委委员或政府执委（青工部负责人则参加同级团委）。

为了提高工会会员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党在教育和训练方面的措施也很扎实，规定每十天召开一次学习会，并定有讨论大纲。间隔一时期，上级又出一些政治常识问答进行测验。

记得问答题有："共产党是什么？""苏维埃是什么？"工会是什么？""工人为什么要加入工会？""为什么要交纳会费？""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同黄色工会开展斗争？""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五一'劳动节？""什么是'巴黎公社'？""'二七'惨案是什么？""'五卅'惨案是什么？""什么叫做'九·一八'事变？""为什么要学习和开会？"等等。

通过学习讨论，苏区工人基本上都能明了上述内容和各个纪念节的来历。在每年的二月七日、三月十八日、五月一日、五月四日、五月五日、五月卅日、九月十八日、十一月七日、十二月十一日等都要举行纪念大会（或纪念周、纪念月）。工人们还不断地创造出优异成绩，以实际行动作为纪念。

各级工会还普遍开办了工人俱乐部，出板报、壁报，编演文明戏。在这里，除学习政治、开展文体活动外，同时还要学文化。

当年，工农文化补习夜校遍地开花。上级还大量编印《工农读本》，规定每人每天至少要认三到五个生字。这样，苏区的许多工会会员都摘掉了文盲帽子。

苏区党和方志敏同志，对于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更是关怀备致。

对此，《劳动保护法》和《关于苏维埃的职工问题》决议案曾作出规定：

实行八小时的工作制。夜工工资要比日间多。各种革命纪念日休息，工资照发。

女工须受特别保护，月经期应休息。产期前后休假两个月，工资照发。

对于工人卫生及疾病须由工厂负责保护和医治。

实行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工会中设救济委员会、职业介绍部。政府要设法开办工厂。尽一切可能救济失业工人和为失业工人介绍职业。失业工人，苏维埃政府应分田给其耕种。

一九三二年颁布的《土地税征收法》规定："工人雇农免其本人纳税"。

省苏政府还兴办了工人疗养院，对于因战、因工负伤的工人和劳动模范，实行休假疗养。

工人们享受到了实际利益，充分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民众的大救星；要求得阶级解放和保卫胜利果实，只有铁下一条心，跟定共产党革命到底。因此，他们的斗争热情和干劲不断高涨。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全国总工会代表大会在红色首都——瑞金召开。

闽浙赣苏区工会代表团由二十余名代表组成，省雇农工会委员长黄万生同志带队。我也荣幸地被选为代表去出席这次大会。

三月下旬，代表团从赤色省会葛源出发，在柴家埠过信江河，由武装交通队护送，漏夜闯过敌军的封锁线并甩掉敌人的一团追兵，越过巍巍武夷山，到达了闽北苏区的崇安县。和闽北分区的工人代表会合后，于四月四日来到星村街，这里是闽北苏区的边缘地带，到中央苏区还要通过一大块白色区域。

这一次，中央苏区还要召开全国儿童团代表大会。闽浙赣儿童代表团与工会代表团同时出发，我们每个大人要负责带一个十来岁的儿童。我们胜利地闯过信江封锁线，通过邵武、光泽、建宁数县，于四月中旬到达瑞金。

代表大会于"五一"劳动节这一天正式开幕，这是我们毕生最难

忘的一次会议。盛会期间，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等中央首长在大会上作了报告，还学习了文件，交流了经验。我们还到闽西长汀县进行了参观，耳濡目染，受益非浅。大会闭幕时，全体代表又一次放声高唱《工人歌》：

我们工人创造世界人类衣食住，
不做工的资产阶级反把我们欺！
起来起来同心协力坚固我团体，
努力奋斗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

会议结束后，代表团在返回闽浙苏区的途中，我和十几名代表团员被邵式平同志留在新创建的闽赣苏区工作。

# 采购食盐

练金科

一九三一年四月，我由横峰县消费合作社调到省消费合作社工作，任常务委员。这时敌人对苏区已加紧实行经济封锁，禁止食盐和其它重要物品输入苏区。敌人在白区成立食盐公卖处，限制人民买盐的数量；如果抓住将盐运往苏区的人，就要重重办罪。

由于食盐供应日益紧张，军用、民用都很困难，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方志敏同志，交给省社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打破经济封锁，开辟贸易路线，广找食盐来源。省社为此在葛源召集有横峰、弋阳、贵溪、乐平、德兴等县社和葛源区社主任参加的紧急会议，省苏国民经济部、财政部都派有代表参加。会上，各地汇报了缺盐的严重情况：由于我们没有盐卖，群众只得熬硝盐吃；有些人冒险到白区买盐，在途中被敌人打死了。听到这些，大家的心里真是又难过、又愤怒。会上，大家提了许多办法，反映了不少情况；其中，德兴县社负责人反映的情况引起大家的注意。据他反映，敌人运往乐平县白区的淮盐，是在婺源县装船，顺流而下的，途中要经过我方控制的铜埠，可以在铜埠动员船户把盐卖一部分给我们。根据这一情况，省社主任宁春生同志，决定我作为省社的特派员，去铜埠看看，如果可行，马上就地收购。

第二天，我赶到德兴县社所在地的重溪。翌日县社派李双庆带路，直奔铜埠。这里有上百户人家，经济部在此设有船舶检查处和对外贸易局，并且有一个连的红军保护机关和人员的安全，防止敌人骚扰。我同这些机关取得了联系，问明了情况，便开始工作。正好河口经过几只盐船，船舶检查处去检查和收税时，我便趁机动员船户卖盐给我们，效果不错，买到一千多斤。如此数月，收获不

少。

敌人终于发觉了，不久就停止从水路往乐平县城运盐，而改由陆路武装押送。我们在铜埠开辟的路线被掐断了。一九三一年十月间，省社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开辟新路线。

省军委主席邵式平同志参加了我们的会议。他针对一些同志的畏难情绪，很严肃地说："同志们，根据地比过去扩大了，红军也有了洋枪洋炮了，这些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靠我们革命者的勇敢和不怕死的精神打出来的。同志们，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也应该有这样的精神！我看你们当中有的人就怕死。同志们，你们不但要有努力性、积极性、创造性，还要有勇敢不怕死的精神？"接着他又说，"全苏区有两三百个采办员吧，即使每人每天搞到一两斤盐，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呀。怎么搞呢？譬如我们去到边境对白区过来砍柴的人说：'朋友，帮帮忙，你们把盐买来，再转卖我们，价钱嘛，假如你一元一斤，我就算二元一斤给你。你们上山砍柴，藏个一两斤盐不成问题。'你们还可以同白区的商人交朋友，敌人封锁我们，我们就请商人朋友开锁。"邵式平还特别交待说，"你们到边境或白区去办货，一不准赌，二不准嫖，三不准抽大烟，但可以同商人结交，在这方面花点钱有价值。"他又提议我们搞采办的同志在边境和白区拜干娘，这是有好处的，必要时可以得到她们的掩护。就在这次会议上，省社决定派出一批采办员，开辟两条主要路线，一条由上饶到玉山，由宁春生负责；一条深入华婺德，由我负责。

一九三一年十月中旬的一天，吃过早饭，我同省社杂务员方志牛同志动身到华婺德去。第二天到达李宅。德兴县第十区消费合作社设在这里。区社主任陈炳友同志告诉我，浙江省开化县华埠的盐，比别的地方好买一些。但去华埠的大路都被敌人封锁了。敌人在白沙关、豪岭关、银岭关都筑有炮台，只有去鹅公岭。那里很偏僻，有小路通到华埠，敌人不大注意。我根据老陈提供的情况，决定上鹅公岭。

第二天中午，我们去到一个叫土地坑的地方，四周都是原始森林，路口有个茅棚，德兴县第四对外贸易分局派了一位姓占的同志在此收棺材税。因为有些人在此伐木做棺材卖，做好的棺材，每副都要交税。我向老占询问华埠的情况。他告诉我，在那里每人准买八斤盐，合一元钱，多了不行。

在鹅公岭找到埂头村苏维埃的干部罗章业。他看过我的介绍信，见信上盖有方志敏的印章，对我很尊重。他告诉我，华埠的盐比较好买，只是路途遥远，从鹅公岭去要走六十里小路。我说先发动鹅公岭的老百姓到华埠买盐，而后我们再向他们收购，可不可以。老罗同意这样做，我就请他帮忙找个房子，设立收购机关。老罗满口答应了。后来，我们又到距鹅公岭三里多路的小村子粪箕担，拜会了一个叫黄金红的小商人。老黄反映说，华埠有家商号，招牌是“万康源”，经营南北杂货；老板王老三在当地颇有势力，他曾说过，食盐不是枪炮子弹，不论红区、白区，老百姓不能不吃盐呀。要买盐的，大胆到敝店来。我想：“好呀，有这家店老板，到华埠去买盐，就可以少担些风险。”老黄问我“你们打算用什么价格收购？”我说：“既然华埠卖一块钱八斤，我们就以一块钱四斤收购，来回一百二十里山路，又辛苦，又要担惊受怕，价钱就出高点吧。”老罗和老黄都表示同意。

鹅公岭虽然是个灰不灰、白不白的地区，但这里的穷苦人都是心向共产党、拥护苏维埃的。经过动员，大家都愿意帮助红军和苏区人民克服困难，粉碎敌人经济封锁。大家听我宣布，收购食盐的货币既不是共产党的“苏币”，也不是国民党的钞票，而是“花边”（银元），都很高兴。就这样，我们在鹅公岭把工作开展了起来，建立了一条秘密的贸易路线。我马上向省委和省社领导写了鸡毛信，汇报情况，请求指示，交给老罗由埂头村苏维埃政府负责传送。几天后，回信就来了。信中表扬了我，同时指示我对于送盐来卖的老百姓也好、商人也好，都要热情招待，每人免费供应半斤猪肉、半把粉丝。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送盐来卖的人越来越多，地区越来

越广，除鹅公岭外，方圆上百里内的岭头山、茶壶口、方塘、塘底、马岭头、马岭脚、大板、源头、徐家村、王坂等穷乡僻壤的大小村庄，都动起来了，日收购量猛增到千斤以上，来卖盐的不但有大人，也有小孩。对于小孩，我们除了照给猪肉、粉丝外，每人还发两块寿饼。

一天，黄金红跑来告诉我："老练，你要小心呀，听说国民党侦探到你们在鹅公岭设了机关，说不定那天会来捉你。"自从老黄报信后，晚上我们就不在机关里睡，分别隐蔽到山上的苞粟蓬和岩洞里过夜。过了一些时候的一天夜里，一股敌人果然前来偷袭。幸好我们都转移了，没有遭到损失；可是却打死了六名从葛源来的挑伕。

我们在鹅公岭一共工作了三个月左右，收购了二十多万斤盐。每天从苏区来运盐的人，不绝于途。一九三二年一月，我调回省社，休息了几天，又接受了新的任务。

# 回忆赣东北省红军彭杨军政学校

宣　金　堂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一九二八年二月，我们党集中二十几条枪，建立了赣东北最早的红军，即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第二连。与此同时，又派出可靠同志打入国民党军队中，秘密进行兵运工作，于一九二八年冬，策动了进攻弋阳县第九区革命据据地的白匪军周志群旅两个连(即十一、十二连)起义和哗变，投向革命阵营，使刚刚建立不久的赣东北红军的力量增加了一倍。到了一九二九年间，我们赣东北苏区扩大了，成立了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各县也先后成立了赤卫军。

红军中的战士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中的贫苦手工业工人和农民。他们在革命战争中，勇敢不怕死，但很多人都缺乏军事知识。我们党和方志敏同志为了使部队在打仗时有人指挥，平时有人训练，便在起义的白军官兵和俘虏的士兵中，挑选一些比较好的人，担任连、排长。由于这些人来自旧军队，根本不了解我们红军的性质，所以他们把封建军阀打骂士兵、侵犯群众利益等坏习气，也带进我们工农红军中来了。

我们党和赣东北革命据据地的领导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为了把红军建设成新型的革命军队，彻底铲除打骂制度，做到官兵平等，爱护群众利益，就一方面在部队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决心创办一所军事政治学校，从出生成份好的红军战士中培养骨干，造就我们工农红军自己的指挥员。一九二八年底，先在弋阳县九区大溪头村成立了一个教导大队，训练红军中班、排两级干部。随后于一九二九年春，在弋阳县第九区吴家墩村，创办了一所信江特区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一期吸收学员一百余名，校

长邹琦，校政委则由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邵式平同志兼任。这年冬，我们信江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迁至弋阳县第四区芳家墩村，信江军校同时迁往，在此开办了第二期，学员二百人，编为两个区队。我当时分在第二区队。这时邵式平同志因军务繁忙，不再兼任校政委了，政委由校长邹琦同志兼任。信江军校开办不到一个月，便因敌人对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大"围剿"而被迫停办，全体学员开到弋阳北乡港口，根据军委会的命令编入了红十军主力部队，参加对敌作战；当时我分在八十二团第二连第一班当班长。

一九三一年初春，赣东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弋阳芳家墩迁至横峰县葛源街。同年四、五月间，信江军校也迁来此地。为纪念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烈士和工人运动领袖杨殷烈士，党和苏维埃政府决定将信江军政学校改名为赣东北省红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校址设在葛源街杨家祠堂里。这期的学员，基本上从农村干部、贫下中农和手工业工人中选调，共二百余人，学习时间三个月。这时，邹琦同志已调闽北工作，校长改由江枫（后叛变）担任，校政委由舒翼同志担任，教育长彭干成、大队长宣化民。

粉碎敌人第一次反革命大"围剿"后，赣东北苏区开始进入稳定发展时期，苏区的面积进一步扩大，红军主力部队除发展到三个足团外，还成立了赤色警卫师，上饶县成立了红军独立团，其它各县成立了红军独立营，各区苏则普遍成立了脱产或半脱产的游击队；另外还成立了信江船舶检查大队，总兵力达到数万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人为了把我们赣东北红军建设成为一支百战百胜铁的红军，特别重视办好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第三期。

第三期的学员全部从部队中选调，都是些有实战经验和较高政治觉悟的、年轻的优秀红军战士和班、排、连级干部，共两百多人，分为两个区队。入校前，我是八十二团的一个班长，入校后，编在二区队三分队九班学习。我的同班同学中，现在还能记得起来的有刘以标、饶德道、刘风生、张火旺等，他们后来都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了。

省委、省苏、省军委为了办好第三期，调整和充实了军校领导力量。除了由舒翼任校政委外，提拔彭干成为校长，宣化民为教育长，并在每个区队增设四名助教。宣化民同志是弋阳县第九区道塘岭宣家村人，是国民党黄浦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原任蒋军炮兵团团长，驻守上海吴淞口；后经方志敏派弋阳仙湖村一位姓刘的同志去做他的工作，晓以革命大义，他才毅然投奔赣东北苏区，参加了革命。我们党和方志敏同志对他很信任，派他在彭杨军事政治学校主持教学领导工作。他为人公正，作风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深受学员们的尊敬。

鉴于第三期的学员都是贫苦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不高，虽有实战经验，但缺少军事知识，方志敏同志等便决定这期的学习时间为一年，希望在这一年中，我们能够提高政治和军事理论水平，掌握一定的作战指挥才能，具有一定的军事素养。整个学期的课程是这样安排的：

第一、文化课。每天安排了一小时，主要由文化教员教学员们识字、学算术，提高文化水平，扫除学员中的文盲。我记得识字课中有这样的内容："革命，大家向前进，工农兵联合，万众同一心"，"大树下是课堂，用不着高楼和洋房"，等等。

第二、政治课。在整个学期的时间安排上，政治课约占百分之三十，学习内容主要有《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和苏维埃运动、国际国内形势、土地革命的政策等。除了校本部领导同志讲课外，在省里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如方志敏、邵式平、唐在刚、涂振农、朱光辉等，都来讲过。

第三、音乐课。为了鼓舞革命的战斗意志，培养革命情操，每天都有一堂音乐课，教唱革命歌曲。音乐课由方志敏的爱人缪敏同志担任。

第四、军事课。每天上下午各有一堂，学习军事知识，内容有步兵操典、战斗条令、野外勤务、进攻和防御等。

第五、军事操练。这是军事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主

要部分。全部军事课由讲堂到操场、由理论到实践互相穿插、相互结合，讲授时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入校初期，在教官指导下先学基本教练，从单个基本动作做起，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则操练战术战斗动作，练好单个散兵，一伍散兵，班、排散兵群，如前进、后退，利用地形地物，掩蔽身体，发扬火力，班、排、连、营的进攻和防御，等等。到了第三阶段，也是毕业之前，全体学员都开出去打野外，进行战斗演习。一次，我们开到弋阳县苏区打野外时，接到命令，攻打叶家坝的地主武装靖卫团。我们一个突袭，把靖卫团打垮了，还缴了五支枪。

为了活跃学习生活，军校设立了列宁室，也就是俱乐部。列宁室的工作人员均由民主选举产生，有正副主任各一人。列宁室里分设墙报组、文娱组、军事体育组、青年宣传组。每月出两次墙报，每星期六开一次文娱晚会，演出自编的文明戏和其它节目如双簧、快板等。早晚开展打军拳、刺枪、跳高、跳远、拔河、翻杠子、爬城墙、过障碍物、上木马、投手榴弹等活动。此外，还经常结合国内外形势、举行演讲比赛。可以说，我们的学习生活过得既紧张，又活泼。

在一年的学习时间里，要进行两次大考。第一次在学习了半年的时候，第二次在毕业的时候。考试内容，军事方面主要是战斗条令、野外勤务；政治方面主要是政治常识，等等。方法是将试题油印好，发给学员"笔试"，文化水平实在太低的，可以口讲，由别人代笔。考试成绩一律出榜公布。毕业分配是据据考试成绩和按德量才的精神进行的。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学员，毕业后可以当团长、团政委，如刘以标、饶德道、杨水球等同志；有的出去当营长、营政委，如刘风生和我等人。考试成绩在及格分数以上的，出去都当排、连级指挥员。个别成绩实在太差的，出去也有当班长的。

一九三三年初，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打通后，赣东北红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分校。

# 闽浙赣省委共产主义学校

徐　大　妹

在我的记忆里，闽浙赣省委共产主义学校共办了三期。一九三一年办了一期，一九三二年办了一期，一九三三年办了一期。一九三四年因环境日趋紧张，没有办。

共产主义学校设在枫树坞附近的叶家村祠堂里。学校性质类似今天的党校。方志敏同志兼任校长，教务方面的具体工作，是由省委宣传部长涂振农负责的；事务工作如膳食等，由省苏维埃政府总务科长吴立生同志兼管。吴立生同志是湖北人。

我是第二期的学员。当时我任闽浙赣省妇女解放委员会主任。这期只有三个女学员，除我外，还有杨树兰、饶玉兰等。学员均由省委组织部选调各县和省委、省苏各部(委)区委书记和区苏主席以上干部，共八十人左右。学期三个月，毕业后，除少数仍回原机关工作外，多数均由省委组织部白区工作部派往白区或新苏区工作，担任领导骨干。

我记得在学习期间，学习了如下一些课程：

阶级斗争。讲课人有方志敏、柳真吾(省苏裁判部长)、汪金祥(省苏政治保卫局局长)。

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包括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等，讲课人涂振农。

白区工作。讲课人万永诚(省委组织部长)。

土地问题。讲课人余金德(省苏副主席兼土地部长)。

青年工作。讲课人关英(少共省委书记)。

婚姻法。讲课人是谁，已记不起了。

学习生活很紧张，每天早起要上军事操和跑步。学员分三个班，每天听课后就分班讨论。晚上有时也开讨论会，没有灯，燃松光照明。白天讨论时，有时在草坪上，有时在山上。吃饭八人一桌，每桌一大盆菜，一般都是青菜，有时也吃点黄豆烧肉。

# 回忆在共产主义学校的学习生活

陈 直 斋

共产主义学校设在葛源区枫树坞的叶家，一九三一年八月间开办。其前身是“忠发”学校，方志敏同志兼任校长。学校的宗旨是培养和造就各级领导骨干，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和领导艺术，以适应革命战争形势不断发展的需要；实际上它就是省委党校。这一期的学员，都是县、区级领导骨干，还有省委机关的旁听生。学员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纪律很严，如早上紧急集合，不能迟到一分钟。

一九三三年初，省委曾设想过以上横特区（也叫河南特区）为基础，公开成立鹅湖县。因为我是特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所以方志敏同志找我谈过。我当时认为条件尚未成熟，这一带都在敌人的鼻子底下，白天，驻守上饶、河口的敌军能随时出来骚扰；我主张等到把上饶和河口两面的敌人都赶跑了，再成立就比较稳当了。方志敏听了我的话后，未置可否。后来因省委的意见也未统一，此事就搁下了。事后，特区机关有些同志说我有右倾思想，不主张及早成立鹅湖县，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观点。我知道后，思想不通。我就是带着这一思想疙瘩调离特区上共产主义学校学习的。

在学校里，我学习了马列主义概论，听了方志敏等领导同志的讲课，联系实际，进行思考，我的思想疙瘩才慢慢解开了。认识到，我不主张马上成立鹅湖县，是对形势只看到不利的一面，未看到有利的一面；是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革命的力量，无视上横特区成立几年来的工作基础和群众的呼声。事实上，如果在一九三三年初就把上横特区改为鹅湖县，公开打出红旗，不仅符合群众的愿望，而且政治上对敌人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有利于革

命形势的发展、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通过学习，我想我的毛病就出在用主观主义的估计，代替了对客观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对工作的正确指导上。

经过四个月紧张而火热的学习，我毕业了。学校的旁听生都回到省委机关，正式学员则等待分配新的工作。不久，省委就分配我到皖南去，担任歙南县委书记，并参加皖南特委，又兼任浙西特派员。

# 闽浙赣省中国工农红军总医院沿革

刘 济 铭

一九二八年上半年，红军在弋阳仙湖的勇背村筹办了一所调养所。一共五人，学徒四人，师傅是高安过来教打的，名叫杜振芳，由他充当医生。

一九二八年十月间，红军第二次攻打河口，当时我部队拥有三、四百条枪了。攻克河口镇后，动员了厦门医科大学毕业的何医官，名叫何秀夫，连人带药品与器械，一并迁到弋阳九区的西潭庙（现弋阳磨盘山），办了一个医院。这时医院有五个医生，还专门配备有后勤人员。医院能接收一百多名伤病员，已初具规模。医院政委是钟洪达。

一九二九年，红军攻克景德镇，动员了在日本留学回国的医学博士邹思孟到红军医院担任院长，医院政委这时由邵伯平担任，医院搬至黄家源。

一九三〇年，红军打到彭泽以后，在秋浦动员了一百多名中学生，全部安排在医院里学医，成立了红军总医院，红军总医院附属医务学校。

一九三一年，由于形势紧张，黄家源红军总医院遭敌袭击，被迫迁至窖头。后又被冲散，分成四个分院：一分院设在铺前大源坞，后迁至上坑源，负责人大老周；二分院设在黄塘垅，罗某某负责；三分院设在德兴双港碧岩，院长拱向林；四分院设在德兴小梅坞，负责人邓怀民，广东人。其中二分院专治慢性病，此分院以中草药为主。

一九三二年，总医院、附属医务学校驻在仙湖村。医务学校的

任务是培养医生，学生平时就是医助，一切军事化。医院药品、器械都设法从上海采购而来。外科药品以碘酒为主。

一九三三年，红军总医院搬到弋阳九区祝家，直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为止。总医院隶属于闽浙赣省军区卫生部领导，在野战军内，军设野战医院，师设卫生队，团设医务所。

# 忆红军总医院

骆乾初

红军总医院设在弋阳磨盘山的祝家村。那里的地势优越，周围群山环抱，山上竹木葱笼，医院就设在树影掩映的四幢大房子里。在这里住院的都是班长以上的红军伤病员。三百多张病床。设有外科、内科、手术室和药剂室。

总医院政委是邵伯平同志，后来由陆吉龄继任，院长是邹思孟，我任政治部主任。邹院长原来是景德镇一家大医院的医生，医术很高明，早年与我党就有联系，后来到苏区来任省军区卫生部部长兼红军总医院院长。总医院的医生有六、七个，其中罗医生、蔡医生的水平很高，他们与邹院长一起，除了给红军伤病员看病，每天上午还要给医务训练班的学员上课。医务训练班有四十多名学员，上午听课，下午实习，有时我给他们上政治课。学员毕业后分到各地红军分医院去当见习医生。

当时，药品奇缺，许多伤员的伤口化脓出血，没有消炎药品。邹院长开动脑筋，用黄蜡煎茶油调入白糖，制成各种软膏，又用盐水煮过的纱布，代替填伤口的消炎纱布，这些土办法并不亚于外地进口的西药。可是，后来连食盐也不多了，我们研究决定动手熬硝盐。硝盐吃起来又苦又涩，许多伤病员吃过后，嘴唇上起泡。为了让红军伤病员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又决定自己吃硝盐，把仅有的一点海盐留给他们。由于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许多重伤病员的身体很快得到恢复，如曾任省委无线电队政委的李伯君，以及李德时、刘太根等营一级的红军干部，都是从总医院治愈重返前线的。

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总医院迁到德兴鸡头山，伤病员疏散在

山上搭棚住下。后来，省委、省苏驻地葛源被敌占领，形势日趋严重，我们又迁到德兴县大田村。这时，省委曾洪易召集我们开会，要我们赶快动员轻伤病员回家，重伤病号则放到群众家里隐蔽起来。红军总医院也随之解散了。

# 回忆反帝拥苏大同盟的工作

周　新　炎

反帝拥苏大同盟，是在闽浙赣省委领导下的一个群众组织，我当时主持反帝拥苏大同盟青年部的工作。

反帝拥苏大同盟在根据地内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经常性地进行政治经济形势，时事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在白区，则广泛吸收劳苦大众参加我们这个组织，向参加者宣传苏区的各项政策和苏区盛况，并对会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白区人民的思想觉悟。在经济上则有"互济会"相配合，给参加的会员以适当的资助。这样，使白区的人民相信苏区，向往苏区。当时，这项工作受到省委的极大重视。

参加反帝拥苏大同盟的对象很广泛，凡是年满十八岁的男女群众，只要愿意反对帝国主义，拥护苏联，均可参加。会员入盟后，发给会员证，会员负有每月按规定交纳会费的义务。

我们开初在根据地内开展工作，得以迅速发展，会员猛增至五万多人，后根据省委指示，要我们把组织扩展到白区去。大同盟立即召集有关负责同志研究，遴选了二十多名白区工作人员，潜入白区各县，开展建立、扩大反帝拥苏大同盟的工作。

各县各特委十分重视这项工作，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到一年，白区内就有两万多名会员。直至一九三四年，白区会员增至五万多名(不包括闽北苏区)。白区民众参加了这个组织，得到会员证后，非常高兴，他们认为这就是参加革命的证据。红军如打进白区，可以凭会员证接头联系工作。自然他们热情很高，按月送交会费。

一九三四年前后，反帝拥苏大同盟已拥有十八万会员，这是一

支了不起的群众力量，这对巩固与发展苏区起了很大作用。

反帝拥苏大同盟的工作是繁忙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我们机关的同志，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项工作。平日里，我们组织宣传队，带着用白竹布绷紧的画框，上面画着配合当时省委中心工作的宣传画，深入各基层乡村，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同时，也向劳苦大众解释“九·一八”事变、“五卅”惨案等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霸占东三省，进而侵占华北，屠杀我国人民，蹂躏我大好山河的罪恶。还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出卖中国领土，亲帝反共，充当汉奸，为虎作伥的行径。宣传方式多种多样，利用大、小集会做时事报告，由文艺宣传队演出，张贴标语，出墙报，黑板报。总之，利用一切能利用的宣传工具，大力开展了这项工作，造成了浓厚的“反帝拥苏”的气氛。

每逢“五卅”、“九·一八”，省、县都要召开大型的展览会。我记得一九三四年“五卅”纪念日，在反帝拥苏大同盟主持下，在枫树坞广场召开了“五卅”展览会，要求各县派代表参加。当时省委、省苏直属机关、各县代表团、葛源区人民群众共五千余人集会。广场四周挂满了永久性的宣传画，中间是主席台，两边还搭了两个戏台。集会时，一个台讲解画报内容，一个台演活报剧，一个台文工团演戏。锣鼓喧天，热闹非凡。通过几次大集会，宣传效果非常好，群众容易接受，他们认识到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狼狈为奸，共同欺压中国人民。也充分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出卖领土，卖国求荣的嘴脸，从而使广大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苏维埃政权周围，为保卫苏区，巩固苏区，扩大苏区而努力奋斗。

# 闽浙赣省属模范区葛源的列宁小学

郑 秉 裕

闽浙赣省委、省苏维埃迁驻葛源以后，葛源成为省属模范区。模范区的列宁小学村村都有、遍地开花。当时的列宁小学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省直属列宁小学，一类是各乡的列宁完备小学，一类是各村的列宁劳动小学。

省直属列宁小学设在葛源南市街，约有学生一百多人，除两名正式的教师外，还有若干列宁师范的学生在校实习兼课。课程设置有国语、算术、政治、体育、音乐等五门课，语算两科有石印课本。此外，省列宁师范附属小学也设在葛源湖塘沿，约有学生三十多人，都是省一级军政干部的子弟，教师有柯正华、黄若云两人，同样也有列宁师范的学生在校实习，课程设置与省属列宁小学一样。这两所学校的体育教学很活跃，操场上有跷跷板、溜板、杠子、秋千、沙坑等体育设备。体育课及课外活动时间，还经常开展主题游戏活动，如“工农翻身”、“搭五角星”、“叠高楼”、“苏维埃的道路”、“袁世凯梦想当皇帝”等等。

葛源区各乡的列宁小学，又称列宁完备小学或称列宁模范小学。设备比省属列宁小学差，规模也比较小，每校只有一名教师，最多不超过两名，学生几十人。学校设教育主任，由乡苏维埃主席兼任，教育主任不兼课。如果有两名教师在同一所学校的，分主教和助教。课程设置与省属列宁小学一样。操场上也备有一些体育游戏设备，但不齐全。

各村的列宁劳动小学是按自然村设立的。由村苏维埃主席兼任教育主任，教师多数是聘请本村识得一些字的人担任，学生人数不

多。课程设置只有国语、算术、音乐三科。设备也差，有的要学生自己带凳子上课。村列宁劳动小学非常方便群众，学生可以就近上学，仅葛源一个乡就有南市街、西园街、舒溪街、店前街、牌楼底、后弄等六所小学，很受群众欢迎。

我是于一九三三年秋从列宁师范毕业分配到葛源区关田乡列宁完备小学任主教的，该校还有一个助教，叫潘云仙。那时区里也开过会，记得黄山乡的教师是周根盛、沙坂乡的教师是郑标盛、枫林乡的教师是汪兆隆。我们都吃派饭，家里分得的田地由苏维埃政府派人代耕。每月生活津贴费分为三等，列宁劳动小学教师每月四元，列宁完备小学教师每月伍元至伍元伍角，省直列宁小学教师津贴略高于我们。各类列宁小学均实行免费教育，学生不交学杂费。学生除了在校上课外，还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如站岗放哨（站岗放哨两个任务，一是查路条，二是扫盲，凡是过往行人一定要认读识字牌上的字，否则不准通行）。有时还要到街头去演讲、演唱，宣传党的中心任务。每当形势紧张起来，乡苏常布置学生削竹尖，削好交给赤卫队安在陷坑里。许多学生还自制了木头手枪带到学校里玩，他们举着枪唱着："噼里啪，噼里啪，我们枪向前杀！要杀尽反动派，建立苏维埃，我们的红旗插遍天下。"

# 回忆赣东北省工农剧团

钱 荣 花

一九三一年十月间，在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领导下，在葛源成立了工农剧团。演员分别从列宁师范学校、列宁小学、机关、农村中选调，乐器手大多数来自农村。当时我十一岁，到列宁小学读书不久。

剧团分设宣传(包括演员、编导)、乐器、总务、勤杂四个组，共五十余人。演员中男同志多，女同志少。黄知真、邹毅、徐文玉、罗秋林等，都是当时的演员，年纪轻轻，能歌善舞。剧团刚成立时，由上海来的一位女同志教我们演唱《可怜的秋香》、《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明月之秋》等，练练基本功，以后就自导自演了。

那时，苏区是不准演旧戏的，提倡演文明戏。因此，我们都演文明戏、歌舞、快板、双簧等。剧本除省文化部供给外，自己也编一些小节目、小剧本，紧密配合形势，做好宣传工作，如扩大红军啦、募捐买飞机大炮啦、扫除文盲啦、讲卫生啦，等等。譬如就有这样一个独幕剧《检查卫生》，内容如下：

时间及地点：现代苏区。

人　　物：魁元夫妻和一个七岁的孩子(都生了满身疥疮)。卫生检查员。

布　　景：一所农民房屋里，锅灶桌凳挤在一起，非常龌龊。

幕　　启：魁元夫妻正在匆忙地扫地、整理东西，小孩在一旁剥疮痂。

魁元妻：检查员来了，快点搞好，免得挨批评。

(检查员上)

检查员：咳！你家里真龌龊，到处铺满灰尘，锅灶桌凳又不洗，怪不得你们会生疮，长久这样下来，你们还要生病呀！

魁元：我们事多，哪有闲空来做这些事？！

检查员：这样理解是大错的！要晓得，不讲卫生，就容易生病，生病就要妨碍工作。现在你们认为没有闲空来做这些事，将来生病时，看你有没有空呢！拿没有闲空来掩饰你们对卫生的怠工，是不允许的错误，应该迅速纠正。你们应该经常把各种用的东西洗干净，地扫干净，身上要多洗澡，把疮治好，这样会使你们健康起来，更加有工夫去做事。

魁元夫妻（脸上充满了悔意）：是呀，我们以前确实错了！

（检查员下）

闭　　幕。

《检查卫生》的剧情很简单，十几分钟便演完了，但对群众的教育意义却是深刻的。

剧团把面向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当作主要任务，经常下农村、下部队，有时还深入到红白交界地区去演出，只有遇到盛大节日如“五一”、“七一”、元旦等，才回省里（葛源）演出。红军打了胜仗回来，在葛源开庆祝大会时也回来。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正在离笋兴十多里的一个村子里演戏，突然接到命令要回葛源慰问红军。大家二话不说，演完戏，卸了装，打起背包急行军，第二天一早便赶回到葛源。不论在哪里演出，一般都是晚七时开演，十时演毕，开幕之前，先由团长向观众做个报告，时间十至二十分钟左右，围绕当前党的中心工作或突出任务，进行宣传。报告完了，再演节目。节目的次序安排是这样的：跳舞（歌舞）、戏剧、双簧或快板。一个地方演三、四天，天天节目不一样，不会炒现饭。演出时，点起熊熊的松明，台上台下，一片辉煌，欢声笑语，好不愉快。

剧团的生活很艰苦、很严肃、很紧张，也很活泼。出发靠两条腿，道具自己带。我是剧团里年龄最小的，大家都把我当小妹妹看待。记得有一次我们走到溪坂，离葛源还有十四里时，我走不动了，

正好遇见方志纯同志。他笑嘻嘻地跑来说：“来,驮马科科！”说过，将我抱起来，分开双腿在肩上一放，我的两只手扶住他的头。就这样，他把我驮到了葛源。我们睡的是地铺，吃的是派饭。每天早起要跑步，然后练嗓子、洗脸、漱口、吃早饭。上午学习、排节目，下午或学习，或测验。一星期出一次墙报，文章由大家写，还搞演讲比赛。文章写得好和演讲讲得好的，可以得到牙刷、牙粉、香皂、笔记本等奖品。没有文化的演员，规定每天学会五个生字，定期进行文化测验。我只读了三个月的书就调来当演员，在剧团工作了三、四年，也学会写文章了。我们没有工资，开始一个时期，每月发两块花边(银元)，以后就只能发理发费、草鞋费了(女同志是卫生纸、草鞋费)。吃饭不要钱，自有村苏维埃政府妥善安排。我们每到一地，就去替红军家属挑水、扫地、做好事。有红军医院的地方，我们就举着红旗，去唱歌、跳舞，为伤病员洗衣服。每当我们到边境演出时，省军区都派红军保护，四处放哨，严密警卫。

一九三三年，剧团从广东保训练团里吸收了一批新演员，扩大为一团、二团。

方志敏等领导同志，每当看了我们的演出，都要前来慰问，对我们热情鼓励。有次在葛源周家祠堂演出后，方志敏来到后台，拉着我的手，满面笑容地说：“小鬼，演得好呀！”有次，在贵溪县标溪夏家演出时，正好邵式平同志在这里巡视工作。演出后，他对我们这些小演员亲切地说：“不错不错，演得不错，你们辛苦啦！”他还杀了只鸡慰劳我们这些小鬼。

一九三四年下半年，我们来到上饶县的沙溪附近，准备从这里到闽北苏区去。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我们奉命回到篁村开会。开会时，方志敏心情沉重地对大家宣布：“由于形势紧张，情况复杂，去闽北的交通已断，决定暂时解散工农剧团。你们回家后，不要忘记苏维埃。等以后情况有了好转，再通知你们回来。”当时，我们的心里是多么地难受啊！不久苏区即失陷了，我回了家，工农剧团的影子却一直留在我的心上。

# 闽浙赣省工农剧团第二团

周 炳 香

我于一九三一年冬由省卢森堡训练团调到省工农剧团第二团当演员。

省工农剧团二团共有五十多个演职员，其中女的有十三人，如钱枣花、罗梅香、余荷珍、刘冬莲、周梅娟等同志。唱歌跳舞都是很不错的。团长姓刘，乐平人，四十多岁，大家都叫他刘主任。教戏的是一个二十六、七岁年纪的大姐，脾气很好。

省苏维埃政府对我们很照顾，每年要发两套衣服，每月发五角钱的草鞋钱。吃饭不交伙食费，每到一个地方演出，就由当地苏维埃政府安排大家到群众家里吃饭。当时，剧团的流动性很大，每到一个地方演出一、二天就得走，活动地点大部分在山区或部队驻地。有时在红军的行军路上进行鼓动宣传，有时在县独立营的掩护下，深入到敌人的炮台底下去宣传。我们躲在枪弹打不着的地方，先是喊话，穷人不打穷人啦，白军弟兄赶快拖枪来归编啦，苏区有田分啦，讨老婆不要钱啦。喊过话就唱歌，唱过歌又喊话，反复交替进行。真也怪，大部分的白军士兵都不吱声，只有个别官长骂几声，但他们不敢走出碉堡来，只是朝天放枪壮胆。

有时候我们也要到红白交界的灰区去演出。一天夜里，刘主任带我们走路到乐平的众埠街。敌人的炮台离街上只有五里远，我们爬上戏台化好妆，突然村口上响了两枪，原来是担负警戒的的红军独立营同敌人接上了火。刘主任立刻命令我们跟着一个响导跑，一路上我跌了好几跤，跌倒了又爬起来继续跑。刘主任总是催促大家要把两只胳膊夹紧些，跑快些。这天夜里我们一口气跑了几十里，直到弋阳的曹溪东港——乐平县委的驻地，才歇下脚。我坐在县委

的院子里动都不想动，偶然摸到袜子湿了一大块，举起手一看才晓得是血。象这样的演出，每年都要搞好几次，我们虽然心里害怕，但总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正如方志敏同志经常告诫我们那样：剧团要为工农大众和革命战争服务。想到此，也就乐了。

那时，红十军打了仗常开回葛源休整。红军回省里我们也回省里慰问演出。演出多半在枫树坞红军操场的大戏台上进行，红军战士们整整齐齐坐在地上看戏。我们演出的节目，大部分是自己编的，把红军打胜仗的经过编成戏，调子是经常唱的歌曲。有时军区军乐队还为我们伴奏，洋鼓洋号一吹打，跳舞、演戏特别有劲。一场戏演下来，贴身的衣服全湿了。那时，每逢节日，也要演出。团省委还组织过演戏比赛，我们工农剧团二团得过奖旗，大家接到奖旗，劲头更加足了。

# 闽浙赣省铅印局

汪泉源　饶秋香

闽浙赣省的印刷事业较发达，有石印、排印、油印和铅印。当时，石印主要是印刷《工农报》，同时也印制票面为一角和一元的红票。排印的字模是木头雕的，主要是印刷列宁小学课本和各种布告。至于油印，各机关单位都有。当时没有油印机，是用手工刷的。铅印专门设立了铅印局，归省苏维埃总务处领导，厂址在离省苏维埃所在地枫树坞三里远的后山背。

我们夫妇俩是一九三〇年十月到铅印局工作的。全局只有十七个工作人员，主任是李明清；车间负责人何阿毛，是上海人，技术很好；校对工是周生茂；拣字工是郑阳生、徐立生；雕刻工是邱元双、项根太；切纸工是曹宗保；装盘工是李金炎、李四儿；装订工是郭启豪、饶秋香，汪金兰；杂务工是曹宗向、李水旺；清洁工是孔菊香；事务长是汪泉源。

铅印局的主要工作是印刷期刊《突击》，每月出一期。《突击》与课本差不多大，厚度有三本课本那么厚。主要是刊登中央和省里的工作报告、文件，介绍前线、地方以及白区的工作。有时候我们还要印刷传单、宣言、公债券和苏维埃纸币拾枚票。拾枚票相当于十枚铜元的价值。

铅印局的设备只有一台圆盘机，是一九三〇年七月红军打景德镇时缴获的。铅字很齐全，有时缺少的铅字就叫雕刻工用梨木刻就代用。纸张开始是从白区采购来的，后来省苏维埃政府办了纸厂，经过工人们反复试制，居然能生产一种质量很不错的印刷纸。油墨的主要来源是从河口采购来的，有时为了避免敌人搜查，把油墨放在大粪桶里偷运过境。后来，省劳动感化院试制油墨成功，从此两

种印刷材料都解决了，印刷量也随之大增，记得在打河口镇的时候，我们赶印了一万张传单、两千张标语。

铅印局的职工每人每月发三块钱的零用钱，吃饭不交伙食费，星期天大家集体去砍柴，每月结余下来的伙食尾子可以拿来分。我们工人的待遇虽然不高，但工作热情很高，每天要干十小时以上的工作，遇有紧急任务就打夜班，甚至通宵达旦地干。由于我们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曾受到省苏维埃多次表扬，省劳动部部长余汉朝经常到局里来开会，鼓励我们努力工作，支援革命战争；财政部长张其德和总工会的同志也常到局里询问生产情况。

# 闽浙赣省委无线电队

蔡　月　松

闽浙赣省委无线电队，是红十军二进闽北时，攻打浦城缴获了一架无线电机器后成立的。一九三二年秋，我报名参加红军就分配到无线电队任运输员和通讯员，后来提升为警卫排排长。

省委无线电队驻扎在离省委所在地枫树坞四华里的塘里村。塘里村背靠磨盘山，回旋余地大，遇到紧急情况，搬迁隐蔽较之方便。那里有二十多户人家，我们住在一家大房子里。无线电队政委是李伯君，队长是李鉴英，报务员是赖佑民，还有一个报务员叫广东佬，机务员是韩进杰。后来，李伯君调走了，由李鉴英继任政委，韩进杰升为队长。另外还训练补充了两个机务员和一个报务员。这几个新补充来的都是上饶过来的青年学生。无线电队共有百把人，分为三个排：一排是警卫排，我任排长；二、三排为运输排，二排排长廖松文、三排排长周发春。他们都是葛源区人。

无线电台的设备比较全，有收发报机、冲电机、电瓶好几只，还有许多大小不一的煤油箱。我们在转移时，两个运输排五十多人无一人打空手，一只电瓶就要两个运输员抬。警卫排担任警卫、通讯、架线、拆线等任务。我当通讯员时，经常在半夜送电报，首长亲自在投递簿上签字。那时，方志敏、刘畴西、曾洪易等都收过我送去的电报。首长们要发报，先拟好稿子交通讯员送到电台报房拍发。具体内容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

到了一九三四年，省委又搞来一台无线电机器。这架电台缺少许多零件，李鉴英同志亲自画了许多零件图纸，又把图纸送到德兴洋源兵工厂去制造，不久就修好了。这时，省委决定将无线电队分为两个队，一队上前方，一队留在省委。我们都报名上前线，最后

省委批下来，任命原报务员赖绾民为队长，带领运输排廖松文、周发春两位排长以及四、五十个战士，跟随方志敏同志参加北上抗日先遣队了。我和余下的同志仍跟着省委。由于红军离开了葛源，敌人乘虚而入，形势非常紧张，我们把电台搬到德兴的爆竹坑，过了几天又转移到广定山，在广定山的腊肉馅掩埋了一部分备用机件。这时形势更加严重了，广定山四周筑了敌人的碉堡，我们乘夜抬着机器偷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翻目坑与省兵工厂会合在一起。这时，省委、省军区司令部和我们失去了联系，我们只好把全部机器埋在翻目坑的山上。过了两夜，国民党二十一师占领翻目坑，抄山时敌人把机器挖走。我们无线电队组成了游击队，与兵工厂游击队、德兴一区游击队并肩作战。

# 洋源兵工厂

黄令正

## 一、兵工厂的建立及其变迁

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在横峰县塘湾村建立了兵工厂，其前身是一个仅有百余人只能修理枪支的机械处。同年四月，从塘湾搬到徐家坦，十一月又迁往弋阳江冲源。一九三一年二月至七月，红军取得第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五月间趁反"围剿"的空隙，兵工厂由弋阳江冲源迁到德兴洋源村。初搬来只有九十多个工人，随着生产发展和需要量的增加，到一九三二年已扩大成为拥有八百余人的兵工厂，其中妇女有三百人左右。

## 二、安居下来，健全组织

兵工厂搬到洋源，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帮助居民迁移，一个是解决这拥有数百人的兵工厂的生产和住宿的用房。因此必须尽快搭盖一批茅棚以便安居下来，尽快地投入生产。厂党委号召全厂动手，人人争先。在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几天功夫，洋源的居民就得到妥善安排，草棚也搭盖起来了。

在健全组织方面，工厂成立了党委会、管理委员会、工会、团委会。政委先是宣有元，后由中央派来的戴良接任，厂长是我。在管理委员会下设有供给科、接洽处两个部门。供给科负责原材料的供应；接洽处负责与各地的联络工作，运往各地的枪炮子弹也是接洽处负责的。另外，在生产机构方面，分制造部、炸弹部、子弹部、翻砂部、木工部、硝磺部，共六个部。

制造部——部长张炳荣（上海人）。有二十多名工人，负责制造各种枪炮、刺刀、马刀等；

炸弹部——部长徐荣修（乐平人）。专门负责制造手榴弹和各种类型的地雷，大的一百二十斤一个，小的六斤半一个，一般的每个二至三十斤不等。

子弹部——部长杨道成（横峰人）。有五、六十个工人，专门制造步枪、短枪子弹；

翻砂部——部长曾耀发（德兴人）。有五、六十名工人，主要任务是浇铸枪炮的铁制部件和地雷壳。

木工部——部长严高纯（弋阳人）。只有四、五名工人，负责制作枪炮的木制部件及装子弹的木箱。

硝磺部——专门制造火药、红硝、乌硝、炸弹硝、炸药等。

## 三、生产情况及原材料的来源

全厂唯一的一部手摇车床，还是攻打乐平鸣山煤矿时缴来的。兵工厂虽然设备简陋，基本上是手工操作，但六个生产部门生产出来的产品，品种却不少，产量也很高，仅子弹每天就制造一千发，炸弹（包括手榴弹、地雷）三百个。全厂性的劳动竞赛和晚上二小时的义务劳动，是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重要措施。

当时原材料的供给是相当困难的，除了利用废铜碎铁外，红军各部队都尽量交回子弹壳，以便加工重新制造弹头。但是，制造火药的硫磺还必须从洋村运来。洋村与洋源相隔九十余里，途中必须通过敌人封锁线。在这种情况下，供给科便挑选出十几名年轻力强的小伙子，晚上偷过敌人的封锁线，把硫磺从洋村肩挑回来。

## 四、生活福利和文化娱乐生活

工厂分技术工和学徒工两种，按月发工资，技术工每月十二

元，学徒工每月三至五元（都是红票），政委、厂长和工作人员不发工资，按红军优待办法供给。在党的关怀下，除按月发工资外，生产用品由上级发；看戏、剃头不化一分钱，工人治病公家开支，并加发病号补助费；家属探亲由接待处招待。

本来苏区的食盐是非常缺乏的，但兵工厂从未缺过。为满足工人对文化生活和娱乐活动的要求，工厂成立了识字班、俱乐部。虽然生产繁忙，但休息时到识字班学习的人也还不少，每当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俱乐部的歌声响彻了这寂静的山村。我们有时还排演一些小型剧目，在工厂内部演出。

## 五、支援红军，打击敌人

为了加强工厂的保卫工作，工人自动组织了纠察，成立了赤卫军，赤卫队员轮流日夜站岗放哨，警惕性很高。兵工厂在洋源的几年里，防奸、防特和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从来没有发生泄密和被敌人破坏的情况。兵工厂把制造出来的子弹、枪炮运出去，大力支援了红军。

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抗日，革命遭受挫折。在这种环境下，洋源兵工厂便分散到婺源、横峰、弋阳、贵溪、化婺德五个县，分别成立了小型修理厂。妇女同志全部动员回家。这五个小型修理厂给坚持斗争的同志，特别是给坚持在敌人的心脏斗争的游击队同志以很大的支援。

# 闽浙赣省兵工厂

蒋 冬 林

闽浙赣省兵工厂开始只是个简易的枪修所，厂址在横峰县葛源的密坑村。由于经常遭受敌机的空袭，厂址几经搬迁，从密坑迁到塘湾，又从塘湾迁到弋阳江仲源，再从江仲源迁到德兴的洋源村定居下来。

洋源村离德兴县城六十多里，地处偏僻，周围都是大山，山上长满了青翠的金钢树丛，易于隐蔽。自兵工厂搬到这里以后，全厂已发展到六、七百人。厂长是姓黄的，大家管叫他黄矮子，还有一个姓戴的政委，工作都很积极。军委会主席邵式平同志也常到兵工厂来检查工作。厂里的工人一部分是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队技术兵，他们每月拿很高的工资。我是一九三一年进厂的，因为是苏区内的人，家里分了田地，没有工资发，每月发给六块钱的津贴费，吃饭不要钱。厂里还有一部分女工，多半是工人家属，这些女工主要是从事擦子弹壳，做炸弹蕊等杂活。厂里的纪律很严，工人不准随便进出，厂门口设了卫兵岗哨，也不准外头的群众进内，甚至连工人的家属来探亲，也只能到离工厂三里远的大田接洽处会面。

兵工厂直属省军委会领导，业务上由供给部具体负责。全厂按工种性质设了六个部，计有翻砂部、制造部、子弹部、炸弹部、铁工部、木工部。设备非常简陋，只有一台车床。翻砂部负责翻砂炸弹、地雷、手榴弹的外壳，熔铁炉子是汽油桶改装的，每六、七天就要开一次炉，开炉时日夜不歇，一气干完。有时为了搞突击，全厂工人打夜班，一夜要点五十多斤桐油。造子弹也是手工操作的，工人们把用过的子弹壳拿来换过底壳，装进红硝，安上锡弹头就成了。当时每天可以生产三百多颗子弹。炸弹部开始只能造地雷，大

的地雷有一百多斤重，小的地雷只有六斤半重，每天可以生产六、七百个。后来红军从敌人手里缴获了两门迫击炮，军委命令我们造迫击炮弹，大家就把从敌人那里缴来炮弹拆开，照着里面的样子仿造，经过几次反复试造，终于造成了迫击炮弹。那一天，我们放在大田试射，第一炮没打响，第二炮打得很远，落地开花，大家高兴得把巴掌也拍红了。制造部原先主要是修枪，后来制造了枪管和迫击炮筒子。铁工部和木工部都是为前几个部服务的，如做模子、打工具和制造零件等。厂里还有二、三十人的运输队，负责挑炭，运军火到供给部。当时，原材料很缺，除了供给部派人外出采购外，还发动儿童团捡弹壳，同时也规定红军把打过的子弹壳捡回来上交。

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国民党二十一师打到德兴洋源村，我们急忙迁址到翻目坑。敌人又尾随过来，我们只好把车床掩埋起来，每个工人身上带着简单的修理工具，白天躲进山里，晚上修理枪支。最后，我们兵工厂工人建立了一支游击队，与省委无线电台游击队、德兴一区游击队配合作战，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第五次"围剿"的部队。

# 闽浙赣省消费合作总社

郑 秉 裕

闽浙赣省消费合作总社设在葛源。一九三二年省总社的主任是宁春生、统计员是郑国正、文书是张国义、营业部部长是王永安、我任事务长。采办员有好多个，练金科就是省总社的采办员之一。搞杂务的有四十多人，主要的工作任务是挑运货物，他们还配备了两匹马和两匹骡子。

省总社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各县的消费合作社业务，同时总社也设了门市营业部。当时，设在葛源街的营业部有五个营业员，经营布匹、糖、盐等南北杂货。营业部对入股的群众发给社员证，做生意买卖公平，老少无欺，但对非社员不营业。不过那时候除了少数地主豪绅之外，大多数人都是入股的社员。

这年十二月，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对我们苏区疯狂进行军事“围剿”，而且在经济上加紧了封锁。特别是盐，严禁运入苏区，致使苏区许多地方常常吃不上盐。为了解决吃盐问题，省苏维埃政府号召各机关大办硝盐；同时要求我们消费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必须深入白区，采购食盐，想尽一切办法打破敌人封锁。我们响应省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从白区搞到许多盐。偷运过境时，有的用担冲通开竹节，把盐灌在担冲里，再用灌着盐的担冲挑柴混过境。有的把盐藏在粪桶的夹层里，挑着粪桶混过关。有一次，省总社采办员在上饶五区搞到一批盐，大约有八百多斤。采办员便通过五区的青妇部长程田珍，叫了八个基本群众抬着一口大棺材，程田珍和另外几个基本群众跟着棺材哭哭啼啼，真的象死了爹娘一样。匪兵见了，连忙吆喝大家赶快抬过去。他那里知道，棺材里装的是我们省总社

的盐呢。

总之，省总社的工作是很出色的，特别是营业部生意兴隆，卖百货的、刨烟丝的、倒烧酒的、做豆腐的，十分热闹。除了食盐定量供应外，社员们都能买到想买的东西。

# 万年游击队和赤警师的片断

俞　金　开

我是在一九三二年二月间参加游击队的，那时有三个分队。第一分队在万年古亭，五、六个人，三支枪，队长是坞头的叶乌卒；第二分队在湾头一带，七、八个人，三支枪，队长洪进辉；第三分队在坑边一带，六、七个人，三支枪，队长吴金老三。我自己在游击大队。大队里有二十几条枪，三、四十个人。徐定山任政委，阮洪标任大队长，还有一个教练员是广东人。大队下设三个排，一排长是长源周家的周金声，二排长是大悟叶家的叶汉春，三排长是湾头的四麻子。每一个排下设三个班，一个班三、四个人。另外还有一个驳壳大队，有十几个人，七、八支驳壳，队长是河西的戴亥时。游击大队经常活动，驳壳队不太出面，只在河西一带，经常进行秘密活动。这些部队先都由县委方佩龙领导，后由县军事部长徐定山领导。

当时的游击队员都是二十到三十岁以内的贫雇中农和手工业者，全部脱产，由苏维埃政府供给吃穿。衣服也是便衣，几套不一定，有时会发，有时缴到衣服当时就分配给队员穿，每人有一条军毯，子弹由上面发，每支枪有子弹十来颗。

县里还开办了一个训练班，里面有政治和军事人员近百人，我也在里面学习了半个多月军事，教员是由葛源省苏派下来的。训练班的地方也不固定，经常流动。叶家湾、南谷等地都扎过。一九三二年正月游击一分队在万年古亭被国民党围困，伤亡队员三人，后队长被撤职，我由训练班出来，到这个分队当队长。三分队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在霍源，被古埠伪兵突然包围搞垮，这一次还把我们的县妇联主任毛茶花同志捕杀了，此后也就没有三分队了。

一九三二年八、九月间，葛源来通知，将我游击大队改编为赤色警卫第一师一团一营一连，人数扩大到一百三十余人。游击分队没有改编，仍属余干县委领导。改编后我们的衣帽就改装了，军衣军帽都是灰色线布，一年三套或两套不定，棉衣一年一套，子弹还是由上面发，每个人多则三排子弹，手榴弹二个，军帽上有红色的斧头镰刀。连部有长方印一颗，上刻"苏维埃政府武装第一连"。还有红色军旗一面，上写"中国红军赤警第一师一团一营一连"，并缀有斧头镰刀。连部有连长一名、教官一名、号兵二名、旗兵一名。连以下分三个排，三个排长、三个中士(即排副)。三个排下分九个班，九个班长。一排一面军旗，一个旗兵。另外，伙伕等人员编为第四排，有事务长一人。

这时吃穿由上面供给米或发米票，到地方以米票兑米吃（米票可抵土地税），由连队自已搞饭吃。其它东西如油、盐、菜……等要拿钱买。鞋子由当地慰劳队慰劳，有布鞋、有草鞋。零用钱上面不发，我们打游击会搞到一些钱用，打了胜仗上级还会发给我们奖金，有时每人发一、二元，有时发三元。打开一个村子，那个村就会送猪送米来接头，这就用来改善伙食。

# 闽赣省的一般状况

邵　式　平

粉碎敌人三次“围剿”后，我们在闽赣之间建立了建黎泰（建宁、黎川、泰宁）根据地，中心县是泰宁，中心县委书记余泽洪，城防司令刘××。这是一块根据地。

另一块根据地叫闽北苏维埃，以崇安为中心，包括蒲城、建瓯、建阳、光泽、上饶、广丰、铅山。负责人开始是陈耿，后来是黄道、黄立贵（独立师师长）、邹琦、萧韶、杨良生、祝维恒。

再一块根据地是以资溪为中心，包括邵武、资溪、金溪、贵南，由我、彭祜和方志纯创立。

闽北苏区存在的历史较长，在第二次反“围剿”前就有了。第二次反“围剿”时期，我们和敌人在建宁打了一仗，我们胜利了。敌人第三次“围剿”开始时，我们主动退出了建宁。粉碎敌人的“围剿”后，我们又在黎川、泰宁、邵武和金溪、资溪等地建立起根据地。一九三三年四月份第四次反“围剿”时，建宁、黎川、泰宁、崇安、金溪、资溪、贵南、邵武、光泽这些根据地相互间已经打通，联成了一片，成立了闽赣省委。省主席由我担任，省委书记顾作霖，组织部长黄道，军区司令肖劲光。这个时候南城、广昌等地都属闽赣省管辖。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先后到过建宁根据地的有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王稼蔷；一军团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三军团彭德怀、滕代远；五军团董振堂、刘伯坚、朱××；七军团寻淮洲、肖劲光、参谋长粟裕；九军团罗炳辉、何长工、蔡树藩；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冯文彬、师长肖华。还有一些中央同志到过建宁。

一九三三年七、八月间，我们组织了东方军，由彭德怀为司令，到将乐打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部，在沙溪口打福建土匪头卢兴邦部。不久，蒋光鼐、蔡廷锴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和我们搞联盟，共同反对蒋介石。这时，蒋介石派兵从资溪、金溪、福州两路进军，十九路军官兵虽英勇奋战，最终还是失败了。接着蒋介石又进行了第五次“围剿”，把闽北根据地又划成三块，根据地间的联络很不方便。最后，资溪、金溪变为游击区，闽赣省只剩下建黎泰根据地了。

一九三三年十月黎川失守，闽赣省退到建宁。一九三四年广昌、泰宁失守，一、三、五、七军团都退守到建宁。这时我在搞后勤工作，主要是搞粮食。当时，我们在建宁、泰宁之间打了一仗，结果这一仗没有打好，失败了。第五次反“围剿”在建宁打得很久。一九三四年三月建宁城防由少共国际师肖华、冯文彬负责，那时敌人从泰宁和黎川两路进攻建宁，所以在一九三四年四、五月间退出建宁，到宁化去。当时生活很艰苦，一天只吃一餐饭，朱总司令到建宁时生活很艰苦，什么都没有，我只剩一只小鸭子杀了请他。

退到宁化，那时县委书记是龙腾云，是个好同志。

# 忆闽北的游击战争

黄知真

我是一九三四年三月间到闽北的，直到一九三八年闽北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才离开闽北。

闽北根据地的创建比赣东北根据地的创建要迟一年，时间是在一九二八年。一九二六年底，北伐军十一军走崇安过，他们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在崇安做了一些工作，组织了民众会（相当于赣东北初期的农民协会），撒布了革命的种子。一九二八年，陈耿、徐福元在崇安建立了党支部。

闽北起义是二个地区：一个是崇安上、下梅起义；一个是铅山、石垅起义。崇安起义是陈耿、徐福元二同志领导的，杨良生、祝维恒（麻子）也参加了。铅山起义是赣东北党组织派人去领导的。主要负责人是黄怀仁。

起义后，闽北斗争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九二八年起义至一九三〇年初，与赣东北红军会师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是闽北苏维埃根据地创立的时期。刚开始，只有一块以上、下梅为中心，包括岚谷附近大浑寮竹关一带的小根据地，后来根据地扩展到五夫，直达长涧源、坑口。一九二九年，根据地中心转到坑口。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陈耿同志，以后福建省委派李静愚、李克敌两同志来闽北负责。军事力量不大，有个独立团。

一九三〇年，中央决定闽北苏区与赣东北苏区合并，闽北部队也调到赣东北去，陈耿同志也被调到赣东北工作。同时，赣东北也派来黄立贵、黄富武、邹琦、肖韶等同志到闽北，开始由黄富武担

任书记，以后由肖韶任书记，组成闽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主席邹琦，苏维埃主席祝维恒，独立团团长黄立贵。与赣东北红军会师后，把赣东北的经验带到闽北，根据地建设进展很快，组织也比较完整。根据地范围北到铅山，上饶南乡一部分，广丰一部分，崇安（大安、崇安城、赤石）、浦城一部分（到赤石街以西，即山表一带），建阳的黄土、麻沙，福建根据地主要是以建阳、崇安为中心。一九三〇年底，省委派黄道同志到闽北，一直是特委书记。

第二阶段是闽北根据地大发展时期。

一九三一年红十军进闽北，打下崇安、赤石、浦城，闽北苏区扩大了，北面到铅山附近（永平八都为赤白交界处，铅山中心在紫溪，国民党地盘只剩下河口一点，我们几乎占领了铅山大部分），崇安全部，建阳大部分（到邵武交界的二渡桥）。闽北苏区的基础在铅山、崇安、建阳三县。这三个县群众基础最好，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设在崇安。南面靠邵武有一部分，光泽有一部分，江西的资溪、贵溪、金溪的一部分，北面有浦城的一部分。成立了崇安县委、铅山县委、广浦县委、上铅县委、建阳县委、光泽县委、邵武县委、资光贵县委等八个县委，人口约二十万人。地形都属于山区。这时党的特委书记是黄道同志，青年团特委书记是黄富武同志，苏维埃主席祝维恒，军区司令员邹琦，后来是薛子正，独立师（由独立团扩大为独立师）师长是黄立贵，政治委员是吴先喜。

一九三三年年底，反第四次"围剿"取得胜利，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红军会师，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打通了，开辟了一个新地区，中央就决定成立闽赣省委，省委设在江西黎川。福建的建宁、泰宁、将乐成了解放区，但时间很短，不到半年时间就丢失了。这时从闽北调了一些干部到闽赣省委，省委书书顾作霖、宣传部长黄道、省苏政府主席邵式平、军区司令员肖劲光、青年团省委书记刘邦华（刘以后叛变）。把闽北独立师编入了中央七军团，成为七军团二十一师五十八团，团长黄立贵。闽北又另外成立了一个独立团。当时留在闽北的有肖韶等同志，闽北特委书记是肖韶，宣传部长邹

琦、组织部长是个驼子(姓名记不清了)，青年团书记黄富武，军分区司令员薛子正。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反动派对我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第五次"围剿"。敌人首先占领黎川，切断了临川——南城——光泽——邵武沿富屯溪到南平的这条线路，这就使闽北苏区与闽赣苏区隔断了。中央又派黄道同志重来闽北。这时敌人攻打崇安，占领了大安。这一段时间，五十八团又回到闽北，闽北地区又重新与赣东北地区合并，当时组织情况也有了变化，设崇安县委、铅山县委、建阳县委、上铅县委、广浦县委、金资光贵建立了一个中心县委。党的特委书记黄道、青年团书记曾镜冰、苏维埃主席温卿绍。后来苏维埃主席是曾绍铭(徐莲娇爱人)。军区司令员李得胜(叛徒)。这一期间根据地缩小了，人口只有十万余，红军实际上只三个团兵力，编制是四个团：五十八团(主力)，团长黄立贵、政治委员陈一；闽北独立团，团长胡××(名字记不清了)；西南独立团(这个团是跟金资光贵县委的，中心县委书记是先喜)；广浦独立团。各县还有独立营，合起来共五千人。除五十八团有三个营外，其它团只有三个连。

一九三四年三月，我到闽北。当时正是敌人五次"围剿"时期，敌人把主力摆在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当时闽北正面敌人还未动，摆在面前的有敌张銮基的独立四十五旅，在四渡桥与我对峙。江西方面有梁立柱的二十一师(驻上饶)、十二师(驻河口)，靠建阳有周志群十一师，靠建瓯有刘和鼎的五十六师，靠邵武有李玉堂的第三师，这种局面没有保持多久。

一九三四年年底，敌人主力即转向闽北，因闽北是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桥梁。敌人增加了郜子举的河南剿匪总队(驻广丰)，江西保安团、福建保安团，首先往邵武占领二都桥（邵武县委所在地)、五夫(崇安县委所在地)，兵分两路，一路由独立四十五旅从崇安向北打，一路从铅山向南打。那时铅山县委在紫溪，敌我在四渡桥打了一仗。双方相持一个多月（如果从敌人占领崇安县城算起

相持半年多)，接着敌人占领了洋庄、小浆。小浆离大安十里路。北面敌人占领了紫溪。紫溪到大安只五十里路。敌人又由资溪进到黄莲坑。黄莲坑离大安十里路。过了阳历年，大概是二、三号，我们在大安埋了些地雷就撤走了。三五年初，敌人打通了铅山至崇安这条线路。敌人为什么前进得这样慢呢？因为敌人前进五、六里就要修筑碉堡，所以每天前进的速度不到三公里。敌人占领了小浆、黄莲坑(均离大安十里路)时，我们还住在大安街呢。

敌人打通了铅山到崇安这条线路后(以后敌人即修了公路)，把闽北地区即分为二片，我们又搬到长涧源、虹溪一带，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把四个团编为三个团，成立独立师，师长黄立贵，政治委员卢文卿。原五十八团为第一团，西南独立团和广浦独立团为第二、第三团。后来敌人主力摆在崇安，接着敌人又开辟第二条封锁线，即大洋——岚谷，直至寮竹关关头。这时敌人发现我们在坑口，即分三路进攻我们。一路从大安翻虹溪山到长涧源背后，一路从崇安直接到长涧源，一路从岚谷到水碓垅过十八湾到长涧源。当敌人包围长涧源这个山区时，我们部队即分路出发，由黄立贵带第一团到资光贵，吴先喜带第三团到邵武、建阳，第二团去崇安，司令部由长涧源走温林关过车盘到篁村。到这里看报才知道方志敏同志被俘。敌人发觉我们在铅山，就由紫资过石垅到篁村。我们又由篁村向桐木关撤退到东坑。我们到了东坑，敌人到了篁村。就在那天晚上，司令员李得胜叛变了。李借口到十五里外看阵地，中午去的到晚上还不见回来。我们估计情况不妙，就想在夜里由东坑转移到桐木关。那天天下着大雨，到晚上十二点不得不走了。因天雨路滑，部队走到天亮仅走十五里。天亮后行军速度加快，在离桐木关五里的路上，碰上吴先喜带了部队来。大家很高兴，准备进三江休息。刚进村庄，还未坐下，叛徒李得胜带敌人一个团轻装追击上来。好在和第二团在一起，部队打了一个败仗，把什么东西都丢光了，一部无线电台也丢掉了，与我党中央断绝了联系。三江战斗以后，司令员由吴先喜接替。从此，敌人对我们的封锁更严了。

一九三五年这一年就在根据地转，在建阳与崇安间来来往往，打过几仗，最打得漂亮的是甘溪之战。后来由三江转坑口到五子袋，我们又打了一个败仗，第二团胡团长就是在这次叛变的。这一仗敌人集中了二个团的兵力打我们。敌人从大王坳那边分上下二路来进攻。我们沿着小路退，走了三里路，前面是绝壁，无路可走。我们从山沟溜下来，敌人跟着我们溜下来。我们爬上对面山后一、二小时，敌人又追赶上来，我们又溜下一个洼，到第三洼敌人才没追。这一仗，我们把什么东西都丢光了。后来跑到五府岗用望远镜向下一看，到处都是敌人。东西丢光了，岗上天气很冷，王助同志的通讯员就在山上冻死的。我们打算到江西去补充给养，二团姓胡的团长虽然叛变了，但二团的人还在我们手中，就提拔该团二营营长饶守坤同志担任团长，调来准备攻打甘溪镇。当时侦察到甘溪有三十多个地主武装，想到甘溪搞他们一下发点洋财，补充一下部队给养。部队到离甘溪五里路的金钟山，遇到了大刀会，他们就叫喊"土匪来了啊"，跑了。因我们在山沟里转，天又黑，大刀会没有看到我们的全部人马，认为只有一个排。到了甘溪，民团发现我们，几挺机枪猛烈地向我们扫射。我们又返回金钟山，从一个木匠那里了解到，部子举一个营刚开到甘溪。我们估计敌人认为我们只有几十个人，一定会出来搜山，因此就决定在金钟山打埋伏。果然，第二天拂晓，敌人一个营全部出动，遭到我们伏击。打了三个多钟头，敌人除逃跑了几十个外，其余的全部被我击毙击伤，结果未去攻甘溪，却获得了一大胜仗。

除甘溪是个大战役外，其余都是小战役。敌人天天搜山，我们在北坑住了一个星期。敌人二百多扎在村口，我们出去不了，差不多快饿死了，粮食吃完吃山粉，山粉吃完吃草。这时黄立贵由金资光贵转到建松政活动，发现敌人后方非常空虚。特委根据黄立贵同志的报告，就决定把主力分成几路，挺进到敌后去，留下少数部队坚持根据地斗争。三团向金资光贵活动，二团向上饶、广丰活动，一团向建松政活动。后来，我们到了建松政，由汪林兴、曾昭铭、

左丰美等十几个在崇安坚持斗争。王荣生在建阳坚持斗争。挺进到敌后，吃穿问题都解决了。敌后活动范围又广，我们转到敌后去，迫使敌人撤掉了好些封锁线。由长涧源到温林关这一线也撤了，敌人转向后方来了。我们到了建松政，即与闽东叶飞同志会师。当时浙西南、闽东北、闽北三个地区是鼎立的，闽北由八个县委扩大到二十几个县委，建立了闽北地委，地委书记汪林兴；闽东北地委书记是王助；闽中（将乐、顺昌、泰宁）地委书记由黄立贵同志兼任。金资光贵中心县委书记刘波。与闽东合并后，成立了闽赣省委，省委书记黄道。成立了两个独立师：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政治委员吴先喜；闽东独立师，师长卢文卿、政治委员叶飞。这种局面一直坚持到一九三六年底。

西安事变后，敌人一面和陕北中央谈判，一面企图消灭我南方游击队。敌人增加了七十五师、七十九师、浙江保安团等约五个主力师的兵力"清剿"我们。我们损失最大的也就是这一阶段。加上浙西南和闽东的部队不团结，力量也消耗了些。我们几个根据地被敌人搞得好苦，军事干部牺牲得特别多。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吴先喜在光泽寨里牺牲；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黄立贵牺牲；卢文卿也在闽东牺牲。

我们知道西安事变发生，知道敌人的力量转向南方，也曾从邮局发出通电，提出和平谈判，但国民党不与我们谈，特别是福建（因为黄立贵等同志牺牲了，敌人有些嚣张）。我们估计情况会有变化，就隐蔽在光泽、金溪、贵溪交界的山上二个多月，直到"七·七"事变，国民党主力撤退。这时国民党想和我们谈判。光泽县政府伪县长派了一个人来谈判。我是我方谈判代表。那时谈判我们也太老实。他们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不要打土豪。我们条件也很简单：第一，划出地方给我们住下来整理队伍；第二，允许我们派一人去中央请示；第三，撤掉封锁线，便于我们集合部队。我们当时的番号是闽赣边抗日义勇军。后国民党派南城保安副司令来谈判，我们要他全部撤出崇安，将崇安给我们，他说："福建没有办法给

一个县，江西铅山县可以给”。国民党部队从铅山撤走后，我们部队就在铅山集合。那时我们对福建有点气，以后由饶守坤带部队从邵武沿路下来，见着民团狗就打，缴了几百支枪。国民党江西方面政府天天与我们办交涉，我们也有理由，借口说封锁线没有撤走，部队不好集中，等等。

真正到部队下山时，只有三百多人，每人发了一枚纪念章。国民党派了个点验专员来点验人数，我们说有六个中队，给造了一份一千七、八百人的名册。点验专员也知道数字有虚假，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后来在铅山石塘集中，连当时游击战争中失散回来的同志和新参军的同志，一共有一千二百多人。这支部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和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八省健儿汇合在一起，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战场。

# 忆闽北的革命斗争

曾镜冰

闽赣省成立于一九三三年，省委书记顾作霖、苏维埃主席邵式平、宣传部长黄道、组织部长刘炳龙，还有肖劲光、方志纯等。在当时党的会议上经常见到的就是这几个人。我那时是团的宣传部长。当时团组织和现在不一样，党的会议，团组织一定派代表参加。刘邦华不在时，一般都是我去。后来闽赣省委怎么变动我不太清楚，敌人进攻时我们就分散了，黄道同志就带代表团到抚东地区，听说后来已有许多变动。

我是一九三三年底到光泽，一九三四年一月到闽北崇安的。原来的闽赣省委本来只有黎川、资溪、贵溪、建宁、泰宁、光泽等六个县委。闽北崇安这边叫分区委，原属于闽浙赣省委，以后解放了黎川、资溪、贵溪、建宁、泰宁、光泽等地区，成立闽赣省委，也把闽北分区委划归闽赣省委。到五次"围剿"之后，红军向建宁这边撤退(原省委在黎川)，成立了抚东分区，司令员是郭如岳，政治委员黄道。当时省委是叫代表团，由黄道同志（代表团书记）、曾昭铭、吴华有和我等人组成。我当时是团的宣传部长。我们主要在光泽、资溪、黎川、贵溪等地活动。当时的任务是：坚持二、三个月，等待主力红军的反攻。以后红军主力撤退之后，敌人的力量较大，那里虽曾被红军占领过并分过田，但因为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所以在敌人进攻时，坚持游击战争感到困难。黄道同志原是闽北分区委书记，后调任闽赣省委宣传部长，对闽北情况是熟悉的，所以他打了电报请示中央，意思是：背靠闽北、邵、光，在闽北坚持活动。中央以后回电同意我们这个意见，在那一带不好活动就不勉强，同时要我们抚东分区和闽北分区合并。三五年一月才转入游击

战争，在大安那里搞了约十个月的时间。当时我在闽北分区搞团的工作。团的工作主要是搞扩大红军。这一段时间主要搞两件事情，一个是从抚东分区带来了五十八团，以后派到松溪、政和、建瓯一带活动，创造新苏区，现在看这一条还是对的。一个是在苏区内部，集中一切力量搞扩大红军，也是对的。从现在看，十个月时间搞了这些事情，任务是完成了的，扩大红军是做得很好，但好象是扩大得多了点。要是检查缺点的话，可能对群众发动、组织还有点不够，所以有些边区，在国民党组织大刀会扰乱时，遭到一些损失。另外肃反工作上，也还有些错误的。在那十个月里边有这么个感觉。

三五年以后，在我看来大体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敌人刚刚开始进攻，我们转入游击战争，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即三五年上半年这一段，情况比较混乱，是最困难的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部队巩固以后，崇安这一带地区感到困难的是，队伍多、地区少、粮食给养等有困难。当时是挺进师刘英、粟裕同志，挺进到浙江活动，派人回来联系，感到浙江情况很好，开辟一个新的地区，群众搞起来了，敌人力量分散。再一点，我们转入游击战争前后，三五年一月（或三四年底），中央有过一个指示，要闽北队伍注意和闽东叶飞同志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并且告诉我们说，他们当时活动在寿宁、福安一带。因这样一个情况，就决定把部分力量留在闽北，坚持闽北地区工作，一部分力量挺进到松溪、政和、建瓯、屏南、古田一带活动和叶飞同志取得联系，同时也和浙江刘英、粟裕同志取得联系。在那里活动一个时期情况比较好，也和叶飞同志取得了联系。叶飞同志那时和浙江的刘英、粟裕同志也联系上了，所以情况比较好。原来闽北这边由于外面地区如铅，敌人力量分散，所以老地方情况也比较好（崇安、建阳、邵武、直到贵溪。刘文学在贵溪坚持斗争情况也较好）。三六年情况是比较好的，叶飞同志建议党需要统一，因敌人组织闽浙赣剿匪指挥部，统一对付我们。所以我们几个单位也需要统一。因此，黄道同志从崇安到建瓯、政和这边

来，搭了闽赣省委架子，以后又分散（浙江未找到，未加入进来）。闽北成立省委，黄道同志当书记，闽东成立特委，搞一个军分区。闽东原是一个特委，这边由叶飞同志代表省委领导工作。黄道同志回崇安、建阳一带，闽北特委由汪林兴负责；闽西北（邵、建、泰）准备开辟新区，由黄立贵同志负责；抚东江西方面由吴先喜同志负责；闽东北由王助同志任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饶守坤当司令员。这些地区分散不久，西安事变发生。第三个时期到三七年春季或夏季（具体日子，记不清了），敌人在北方和中央红军谈判，想乘这个机会加紧对我们南方红军进行"围剿"。他们从一九三七年的三、四月一直搞到日本大进攻。这个时期，我们损失较大，吴先喜、黄立贵同志牺牲，原来两千多人的队伍，到后来整编时，只剩下三百多人。编入新四军时又搞到一千多人，多数是以后扩充的新兵。

在这三年游击战争中，有这么三段，总的讲三年游击战争是有成绩的。中央在抗战时作的总结指示中，对能够坚持斗争，好象有这三条：一是群众联系得好，二是打得好，三是政策好（但这一点记不大清楚了）。总的说三年游击战争中，在黄道同志领导下是好的。

到新地区活动当中，虽然也打土豪分田地（不能分田地，也分东西给群众），但主要的着重于军事活动，想把地区搞大，分散敌人，因此到处活动，从这方面想得较多，对真正发动群众创造一个巩固的根据地，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因此，队伍受到一些损失，虽然地区扩大了。我们集中打了镇公所，搞了些地方武装，但有些损失。有一次在建瓯的玉山，给敌人包围一次，差点被敌人消灭了，以后冲出来，损失了二、三十人。还有一次在屏南的上楼村，被敌人包围了，打了一天一夜，晚上才冲出来，损失几十人。

这一段主要着重军事活动，分散敌人力量，没注意到深入发动群众的工作，所以几次遭受失败。这责任主要应由我负，因为我跟他们一起在这一带活动。

也正因为这样，到以后第三个时期敌人集中兵力对付我们，"围剿"我们时，饶守坤同志带的百把人，打到最后只剩下二、三十人。现在检查起来，真正依靠群众是不明确的，如真正搞一个地区，把群众发动起来，依靠群众力量，采取波浪式的前进，是会搞好一些的。以上是三年游击战争总的感觉。

再补充说一下，当敌人占领大安街，我们转入游击战争时，曾发电报请示中央，得到中央回电指示(在遵义会议之前)：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等待(或是争取)主力红军总反攻胜利。以后因电台丢失，就与中央失去了联系。

在游击战争政策上来讲，因当时有这么一个情况，敌人力量强大，摧残群众，实行移民并村。开始我们用"坚壁清野"来对付敌人，敌人来犯，群众都跑光，把东西都藏起来，同敌人硬搞。后来敌人采取搜山的办法，把人和东西搜下来，集中在一个地方，凡敌人没有驻兵的地方，老百姓就不许住。在那样情况下，领导感到有些困难，我们不让群众并村，敌人一定要群众并村，因为我们对群众发动得不够，有些群众脱离了我们，敌人把这些人组织成"壮丁队"，一起来打我们。这样，黄道同志认为政策需要改变一下，提出：实在没有办法的，只得采取"红心白皮"政策，表面上应付敌人，实际上坚持斗争，在当时情况下，这种方法是必要的。有了这样一个办法以后，群众更靠拢了我们。当时出现的第二问题是：开始时，闽北的大刀会是国民党组织起来向我们进攻的，后来出现建瓯林乃道一股大刀会，是以抗丁抗税做号召的。当时，黄道同志认为抗丁抗税还是代表农民意识的，应该加紧联合。所以我们部队与林乃道大刀会联合起来，与国民党打了几仗。当时这样做是好的。但在执行当中，阶级路线是不明确的，因为这样一搞，阶级路线就弄得有些模糊，即刚才所讲的，对发动群众有影响，对地主和反动分子斗争不够，对大刀会本身也有些斗争不够。记得有人曾这样对我说过：开始时政治委员卢文卿同志(后在闽东牺牲)讲，大刀会要我们吃符，我们就吃符。这有些右倾，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到新

区行动的这个时期，对地主采取筹款的办法，现在看也是错的，没有阶级路线。当时整个方针是打土豪，是没收地主东西分给群众。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有时是抓到地主罚款，有些地主害怕了，就送上钱来找我们，自己送钱来的就可以少筹一点款。这样搞了以后，地主的东西就不要没收分给群众了，我们拿到地主的罚款又没有分发给群众，群众就不易发动了。现在看，这在阶级路线上是不明确的，错误的，这样做使群众不容易发动起来。

在游击战争发展的方针上，当时反对保守，搞大发展。开始根据中央指示方针，是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争取红军反攻。后来一段，因得到挺进师消息后，感到新区好发展，同闽东叶飞同志取得联系，分出一部分力量向松溪、政和、建瓯、屏南、古田一带发展，我们觉得还是对的。但有些过分，不是毛主席所讲的"波浪式的推进"，没有后方，到处搞，没有注意建立巩固根据地。所以后来部队是遭受一些损失的，部队多数是在打新地区行动中损失的。因此，当时的游击战争方针，在扩大地区反对保守有它对的方面，现在看，也有一些冒；从政策上看，有些右；从发展上来看，有些过"左"。总的说是有些右。这样大搞是不相信群众，是巩固根据地信心不高，实质上是右的。

再补充说一下，在肃反政策上也有点错误。三年游击战争时，闽北的肃反是有了教训的，到司令员李德胜叛变以后，就有点惊慌，因怕动摇叛变，看到有些人有动摇的就有怀疑，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是有些错误的。动摇叛变的人确是不少，但是否是反革命组织，却没有什么证据。原来我是做团的工作，转入游击战争后，就要我在部队里搞政治工作，在机关就少了。李德胜叛变的经过是这样的：在敌人进攻以后，一点也没有感到李德胜有问题（他原是中央红军三军团师长），但以后看起来，他叛变是有计划的。原来我与黄立贵同志带部队走，李德胜当时要部队向江西行动。他头天晚上交代任务，早上部队出发，一过了江西关，敌人就重重堵住。他在下午佯装到外面侦察敌情，并带上一个警卫员，与警卫员说大便

去就溜走了。第二天早上，他就带来敌人把机关包围，无线电丢失了，搞得我们很苦。敌人到处搜山打我们，李德胜还带敌人包围了我们的伤兵医院，亲自把伤兵用火烧死，搞得很惨。这样一来，我们就感到内部有问题，对肃反问题又不慎重，感到叛变威胁很大，有些人害怕了。在肃反中没有调查研究。据我现在看法，处理了一些人，大概是在斗争中有动摇的。逃跑叛变的人不止李德胜一人，以后还有原政治部主任，后一团团长、参谋长张燕珍也叛变了。那时局面已较混乱，大大小小逃跑叛变者已为数不少，大家有些慌。这一情况马长炎同志可能知道得多一些，因他跟黄道同志在一起，先当警卫排排长，后当教导队队长。

敌人未发动五次"围剿"前，我们住在崇安。当时蒋介石集中主要兵力围攻十九路军，以后十九路军被消灭，又将兵力向我们压过来。我们退出崇安，在大安住了一年，敌人未进攻。那一段环境还是有利的。不过从现在看当时对如何应付敌人"围剿"，事先准备不够，认为敌人不会有大的"围剿"。结果敌人向我大"围剿"后而采用保垒硬守，敌人占住四渡桥，我们则退守五渡桥，用碉堡、挨丝炮来围困敌人，这样相持了一年时间。在江西方面也是这样，我们县委住在紫溪镇，敌人则住在离紫溪镇十几里路外，各筑保垒，我们使用挨丝炮不让敌人出来，也维持了一年。后来在一九三四年底或一九三五年一月，敌人增派独立四十五旅驻崇安，差不多全旅出动来打我们碉堡，而我们只用一排人坚守，打了十多天。敌人便弄炮来轰，这样就不行了，无法再守。中央在事先也来过指示，说万一不行的话(无法坚守崇安)，可以用建松政地区作为机动地方。这时李德胜动摇，不想打游击，主张硬守。在分区委会上，黄道同志不同意李德胜意见，准备撤退。在退出大安前准备了一天一晚，在大安相隔河的操场以及各家房子内都埋了很多地雷。第二天晚上我们才退出来，首先退至道观厂，以后又退到虹溪。五十八团在樟山头打埋伏，整整干了一天，但未打好。当时打埋伏有两个作用，一是掩护机关撤退，使敌人进来不会太猛；另是打击敌人，使其不会那样

疯狂。当时五十八团政委陈一同志牺牲。在铅山方面，我们也退出紫溪，在石垅打了一仗。我独立团与敌江西的一、二个团干了一天一夜，缴了敌人二、三十条枪。以后退到紫溪岭做堡垒守在那里，还打了一下（若情况不行也不能出）。

后来将五十八团、独立团、军区警卫连、建溪游击队、崇安独立营合编为独立师，下设三个团：原五十八团为一团；独立团为二团；三团是以军区警卫连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师长是黄立贵同志，政治委员卢文卿。以后二团到崇安、浦城交界的十八村活动，一、三团到江西方面活动。那时出去的目的，一是牵制敌人，二是筹款。在那边曾消灭敌人三个保安队，缴了百把条枪，敌人增援部队也被我们打垮，又回到崇安。黄立贵和吴先喜同志到顺昌、光泽一带行动。

现在从军事上来检查，在敌人未占领大安街以前，我们对游击战争的准备不够。我们在退出大安街前，在群众工作方面是作了一些准备的。当时黄道同志看到敌人在交通线上修公路，感到敌人要占领大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准备在西线活动，并且在铅山布置一些秘密工作。那时斗争主要是注意发动妇女，因妇女容易活动，而男人弄不好容易被敌人杀了。当时小浆在敌人占领后有过一次斗争，因群众被敌人叫下山无饭吃，而向敌人要饭吃闹过一次。还有一个女的叫程彩金是个团员，在国民党部队中搞兵运工作，据说被敌人发觉后，在她脸上划了好几刀，以后情况不明。另外，在岚谷方面也有一些小的斗争，也是敌人并村，群众闹饭吃，在铅山方面没有看到有什么突出的斗争。总的是在我们撤退时，有好多群众为了掩护我们而牺牲了，有的为替我们买米买菜而被敌人杀了，也有很多群众跟我们躲山。当时群众对我们支持和帮助是相当大的。

从部队来说，黄立贵同志对整个闽北部队的巩固和发展，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在闽北群众中有威信。他对党是无限忠诚的，一般的对军事指挥员来说，是很容易骄傲的，但黄立贵同志没有。吴先喜与黄道是妻舅关系，吴对黄道还有些骄气，而黄道同志也认为

黄立贵比吴先喜党性强。黄立贵同志打仗是勇敢的，有办法的，带游击队也非常熟练，在危急时也能应付。

对于国共合作，开始根本不知道，在崇安看到从广丰买东西包扎来的国民党报纸，才知道有西安事变这回事。一九三七年春天，我到闽东建瓯这边，叶飞同志那里派人同我们联络，送来了南委(南方工作委员会)转达中央有关统一战线的一个指示。到七、八月间由建瓯回到光泽，把这指示带给黄道同志，机关就讨论学习这个指示。研究后，认为我们这个地方也可提出与国民党合作谈判。因卢沟桥事变已发生，日本已进攻中国，国共双方再打下去也不好搞。到八月十三日，就开始提出合作谈判的几个条件。我们向国民党提出的是三条：一、成立闽赣边区人民政府。在崇安和邵武（崇安已定，邵武是否定下，记不清楚）县城成立边区人民政府；二、我们部队改编为人民抗日军独立旅；三、给人们言论、结社、武装的自由。我们答应国民党的是二条：一、停止打仗，不打国民党，一致抗日；二、停止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实行减租减息。都是由全国国共合作谈判内容套过来的，基本上是中央的精神。

这里插上一个细节，原光泽县委书记蔡诗山，被国民党抓去又放回来。他一个人回来，说是光泽伪县长要他来找我们下山一致抗日。既然一致抗日了，队伍就应该改编。我们就决定写一封信给江西国民党政府，内容是提出上述合作谈判的条件，通过蔡诗山送去。后来国民党回信同意谈判。当时我们还是提高警惕，黄道同志不出去，不与国民党代表见面，开始叫黄知真去谈判，后来我和王文波同志同去。双方表示停止行动是可以的，对提出的几个条件，国民党代表不讲行，也不讲不行，要到省决定，就是说双方停止打仗。后来黄道同志听说项英同志出来了，就派曾昭铭同志去南昌找项英同志。从此，我们就没有单独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都交给项英那方面进行。因原来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以后，留下中央分局，由项英同志负责，南方这些地方都由他领导，所以就交给他去搞。曾昭铭见到项英，其它问题均未谈到，只指出一条，即停止行动，部队

集中准备改编为抗日义勇军。这样，我们就通知各个地方，陆续把部队集中起来，向崇安集中。不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还有些不甘心，因条件对我们有利，这样便宜了国民党。在部队集中过程中，我们在建阳渡潭又消灭了国民党一个连，最后才集中到崇安。

以后，中央指示南方游击队成立新四军。所以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初，一个最主要工作是扩大队伍。

因那时整个队伍只剩下三百多人，于是在崇安、上饶、铅山努力搞扩大队伍，后来达到一千多人，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闽东编为第六团。到一九三八年二月，正式部队就开走了。

在西安事变后，中央本来要派人来通知我们的。国民党那时很可恶，不让中央派人来通知我们，要集中力量消灭我们南方的游击队，消灭了南方游击队再来抗日。到芦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又要中央派人来找我们，因为他们消灭不了我们。听说那时中央不派人来，没有找我们，意思是让我们同国民党斗争。另外，听说当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独立自主靠山扎"。闽北队伍在黄道同志领导下，执行这个指示是好的，没有出问题，部队没有损失，我们搞了国民党一下，因没有指示，又不敢多搞。那时，我们的队伍在山头上集中，外面只放一个排与国民党接头，国民党却宣传说：城市好，要我们出去，进县城。事实上，其它地区因到城市去有点损失，我们闽北没有损失。这样看，黄道同志执行中央指示是好的。

现在感觉到(我个人看法)，当时有一个问题解决得不明确，即停止打土豪分田地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对已经分了的土地，地主要来收租，那时怎么办？这个问题，当时没有讨论。从现在看，当时应该讨论这个问题。据魏金水同志说：闽西这方面搞得好，明确了已分得的土地不让地主拿回去。我们没有讨论让拿回去还是不让拿回去，只是集中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在未得到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指由叶飞同志转来的指示)前，曾派吴华有去香港找关系，是有过这回事。

部队集中开赴抗日前线，项英指示过：不留一根枪、一个人，

只叫搞好统一战线。黄道同志和我们都感到没有枪不好搞，我们就私自留下二个班的枪，一排人。以后国民党知道我们留了枪，非叫调走不行。项英同志也说不行，把枪都拿出来，我们又搞了个埋伏，把以前埋存得很久的二、三十支烂枪，应付了这个差事。

一九三四年，黄道同志由闽赣省返回闽北分区委解决了几个问题：一是当时闽北分区委对城市看法有错误，黄道同志回去后，对那种错误的估计作了改变。因当时有这样一个错误估计，即国民党占领崇安主要是对付闽北十九路军。这个估计是错误的。不能从阶级斗争来分析当时形势，从敌我矛盾去分析当时形势。在那样的错误估计下，闽北党当时有点麻痹，敌人住崇安，我们住大安，好象太平无事。这点，黄道同志回来后起了很大作用，改变了这种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这一段的工作主要来讲是指三件事情：一个叫查田运动，即分了土地以后，根据中央指示查田查阶级，即对过去漏划的地主和田分得不彻底的，重新查田查阶级。这个工作，当时好象是有了一些成绩(那时我在搞团的工作，未具体搞过这个工作)，查出一些漏划地主，纠正分田不彻底的现象。这对发动群众对敌斗争和鼓舞群众斗志是起了作用的。第二个，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来进行扩大红军，是有成绩的。那一年当中扩大了一千多人，如独立团由原来的三、四个连扩大到一千多人，五十八团也有些补充，还有各县的独立营、游击队都扩大了一些。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敌人占领大安街，好象整个部队有二千多人，还有五十五团一个营（跟黄道同志来的，是中央留在后方失掉联系的）。到闽北后，也补充了一些力量(后接中央电报，回到中央去了)。第三、黄立贵到建松政开辟新的地区创立新的苏区，并分了田。

黄道同志重返闽北的一九三四年，主要是搞上述三个工作，成绩突出。黄道同志回闽北开展工作是起了作用的。如果当时他不去，问题还要多，如李德胜判变，黄富武更要困难（黄富武原是闽北分区委团的书记，黄道去闽赣省，分区委书记是肖韶同志（肖韶调走后即为黄富武）。

闽北分区委改组后，肖韶、邹琦好象都调到中央苏区去了。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我还未去闽北分区，据我以后听到的情况，认为黄道同志到闽北后，在党的建设上比较突出。他未去以前，地方主义、小宗派、干部中勾心斗角很多，内部较混乱。五十五团、五十七团之间互不服气，还有赣东北去的一批干部和原来闽北的一批干部闹不团结。我听黄道同志讲，这段为解决内部团结问题做了很多工作，化了许多时间，有许多笑话。农民暴动刚搞起，有许多人好象土皇帝。黄道同志把党的建设引上了正轨。第二件事情，是占领崇安以后，便进行了土地改革。第三件事情，部队搞成一个独立师，师长黄立贵，也比较正规，以后编入中央红军，成为五十八团。

当时的大安街，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各种组织都有。有一条与中央苏区不一样，与赣东北是一样的，是好的一条，即在白区有秘密组织，重视白区工作。所以国民党无法封锁我们。大安街当时不觉得有困难，中央苏区当时盐、布、鞋子、胶鞋、手电、西药等物资有困难，闽北由于白区工作搞得好，敌人封锁不了，所以群众生活不感觉到有困难。第二，我们除了粮食很多以外，纸、茶这类东西也比较多，可以想办法偷运出去，所以当时副业产品还能出口，用钱花钱不感到困难。从分田以后，我们感到本地干部一般都比较有钱，外来的较艰苦一些。这可以反映一般的群众生活，粮食是有多余的，加上土纸茶叶有出口，群众生活好。在农民家里吃饭，猪肉，豆腐、鳅干、鸡蛋是不难拿出来的。购买东西也不困难。总之在土改后生活情况好。这与中央苏区江西情况比较（我一九三一年在江西）差不了多少，有的还好一些。

从文化上讲，当时村里普遍有识字班，乡里有小学，在大安街有个工农剧社，有党校、军分校、教导队、红色医院、女子工厂、造币厂、修械厂、印刷厂、红色饭店、无线电队，报纸有《红色闽北》、党有《党的建设》、团有《青年与战争》、军分区也出了一个刊物，还有“反帝大同盟”，多数是油印的，也有三、四种是铅印的。因此当时大安街的规模不会比解放后的小县城如松溪、政和弱。

# 对闽北革命斗争情况的回忆

王 文 波

## 苏维埃土地革命时期

### （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

这个时期，我年纪还小，不懂什么。只能就当时铅山车盘乡的情况作些片断回忆。

### （一）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

当时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的口号很明确、很通俗，适合群众现实的革命要求。例如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平粮废债"，"种田不交租，欠债不还钱"，"婚姻自由"，"讨老婆不要钱"……等等。

一九三〇年正月，我的家乡——江西铅山县车盘街的群众到崇安去挑盐，被国民党盐兵阻拦（国民党政府设有关卡抽税，不准老百姓随便挑盐）。正好我党组织的"民众会"赶到，在草鞋岭打死了十个盐兵。因此，红军的影响就更大了。国民党知道有红军在分水关一带活动，就从铅山县开来一个保卫团。同时，还有下渠大坑任家七兄弟组织的反动武装"挨户团"（有八、九十人，只一支洋枪，余皆土枪长矛）驻扎在车盘。红军便于农历二月初五日袭击挨户团。因事先侦察不周，虽包围了白军驻地，但大部分敌人还是由后门破墙口逃脱了。这时，革命火焰已由分水关内燃烧到距分水关二十里的车盘街（车盘街原先游击区，未建立革命政权）。在二月初五消灭车盘守敌后，红军又烧毁了车盘国民党的厘金卡，赶跑了当地

的土豪劣绅，没收了这些坏家伙的财产。这些亡命之徒便与挨户团勾结一起，经常来苏区骚扰。

八月十四日，闽北苏区派了一个姓赵的负责人来，在车盘召开了有三、四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开成立乡苏维埃政权，并将没收黄日申、陈和尚、余晚波几个劣绅家的财产分配给群众，向群众宣布说："这就是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但他们是不甘心的，所以广大群众要组织起来，向他们进行武装斗争。"群众情绪很高，到处张贴标语口号。会后，消息传开，群众虽然欢欣鼓舞，但又害怕红军走了，国民党再来要吃苦头。这时，当地党组织（一九二七年就有秘密组织了）就组织和领导群众，于第二天（八月十五日）上山。之后红军返回闽北。当地党和苏维埃政权便把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青壮年都武装起来，叫赤卫队。任务是配合红军作战，有时单独作战。当时防守工作做得很好，有两种防守哨：一种叫"跳高"，设在山头，跳高的人带上一支敬神用的三眼炮，打第一号炮，表示有敌人进攻，通知群众武装起来；打第二号炮，表示敌人由远而近来了；打第三号炮，是紧急警报，通知把各个口子、阵地占领或把守好，将老人、小孩和牵牛挑担的转入深山。群众叫做号铳；另一种叫守口，设在路口。守口的人带上一支梭镖，一般是由儿童配合四十五岁——五十岁的赤卫军把守。儿童团的责任是盘查过往的人，防止坏人混入和送信。一个口有二——四个儿童团兼管送信。送信是一站一站递送，紧急信就插上鸡毛或打几个圈圈，表示紧急。赤卫军的主要任务是抓送嫌疑犯或抬伤兵。

当时敌我斗争很尖锐，经常打来打去，有时一天打好几次仗。车盘和水口（白区）只有五里路距离，有时敌人天未亮就来抢劫。我们又打过去，夺回来，打来打去。敌人烧我们的房子，见屋就烧，烧得最厉害的一次是一九三一年二月，国民党匪军来了三个团，其中马团最凶，到车盘，见房就烧、见物就抢、见人就杀，连鸡、狗也被杀光，实行"三光政策"。连续烧了十余次，几十个村庄化为灰烬。

当时发动群众是采取大会动员方式，但会不多，一个月最多开二、三次。不是开群众大会就是开秘密会（即党团员会，这是不公开的）。开群众大会是先由区通知乡，乡政府到时即敲锣通知群众。每次开会的主要内容有两个：(1)扩大红军；(2)防守工作。那时不象现在这样注意领导生产，主要是发动对敌斗争，谈完就分配任务，要发展多少红军、搞多少武器，等等。逢到纪念日，开会也谈一谈大道理，但基本内容还是"为保卫土地利益而斗争"，"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要扩大苏区，不扩大苏区就不能保卫土地利益"。

一九三一年，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打下了铅山县石塘镇，打垮了民团狗，抓了几个大土豪，并乘胜进入福建打坑口（长涧源），消灭了国民党匪军卢兴邦一个连，一直打到赤石街，缴获无线电一台，但攻打崇安城未下。同年，红十军又回转江西。从此，闽北苏区就更加扩大和巩固，铅山县的苏区扩展到石塘、杨村、湖坊等地。总之，铅山70—80%的地区都成为苏区，除县城（当时在永平）和河口区以外的十一个区均成立苏维埃政权，并成立了铅山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上饶县的苏区也扩展到船坑、禹溪、茗洋、坑口、郑坊，石人一带，成立了上饶县委、上铅县委、怀玉县委，上铅县委领导上饶县的毛楼，禹溪、船坑、西山、及封官山等一带苏区和铅山县的英将、大横、小横，并成立了广浦县委，领导广丰、浦城的苏区部分。同时，崇安方面发展到黄由仙店、兴田；建阳发展到七保竹鸡垅、麻沙、书坊，界首直到邵武边界，并成立建阳县委、邵光县委；闽北苏区也扩展到十多个县。

一九三二年，我们解放了崇安城，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所以说，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是闽北苏区发展的全盛时期，特别是一九三二年，发展到松溪、政和。一九三三年闽北苏维埃政府迁入崇安城里。同年，十九路军来福建，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不久失败。国民党匪军主力又返回来进攻闽北苏区。闽北苏维埃政权住在崇安城里不到一年，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又退回大安街。这时，苏

区环境发生了变化，松、政、浦和崇安的一些地区就先后被敌人占领了，苏区缩小了，闽北苏区首府仍驻扎大安。我们能坚守在大安街，主要靠四渡桥、五渡桥两个红色堡垒，和武装起来的苏区人民。他们到处埋伏，用地雷、挨丝炮打击敌人；另一方面，四渡桥形势险要，只有一条小路可通，所以在这里足足与匪部张銮基独立旅相持了一年之久。张旅屡攻不克，伤亡惨重，张匪本人因此失声痛哭过。八月，张旅由福建借来两门小钢炮，才把四渡桥炮台摧垮。于是，我们撤退到五里路外的五渡桥，与敌隔山相对，又持续了几个月。有时晚上，群众还打起火把举行示威。我前线指挥部设在洋庄（五渡桥到洋庄还不到五里路）。那时，军民关系密切，群众经常慰问红军，赠送慰劳品，白天黑夜生产的生产，守口的守口。以后敌人又用小钢炮摧毁了五渡桥炮台。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我们才开始撤出大安，实行坚壁清野。数日后，敌人就进占了大安街。

因此，到了一九三四年底后，闽北苏区基本上告一段落。在这段过程中，发动群众工作是做得很好的，群众和部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实际上就是党群关系很密切。因为当时党团员未公开，党团组织是秘密的（连父母妻子都不知道），开会也很秘密，群众叫做开秘密会。群众和军队关系密切表现在：军队出发，只要通知到哪里吃饭、到哪里宿营，哪里的群众就为部队准备好一切。同时，因部队有严明的群众纪律，群众都很满意。征来的土地税存放在乡苏维埃的仓库里，作为部队的粮食给养。红军以粮票领粮，不给钱，苏维埃就以粮票顶土地税。红军每人每月菜金四元五角。红军所到之处，当地群众还组织妇女、儿童敲锣打鼓、唱歌喊口号热烈欢迎，对红军很大鼓舞。红军驻扎到一个地方，就有慰劳队（青年妇女组织的）到宿营地唱歌、慰问；有洗衣队（四十到五十岁妇女组成）尽义务给红军洗衣服；有补衣队（年老妇女组成）替红军缝缝补补。给红军送慰劳品一年约有四、五次，慰劳品中吃的有各种菜干、猪肉（当时苏区粮食多，养猪也多，猪肉一块钱买五、六斤、牛肉一块

钱买十多斤）、米果；穿用的有草鞋、布鞋、凉鞋、草帽、扇子等。并且开展比赛，看谁的慰劳品漂亮。鞋上绣有花草和口号，如"英雄杀敌，百战百胜"，并绣上赠送人姓名。每乡苏维埃都备有慰劳品，红军每次打胜仗，都有群众赠送慰劳品。红军在前线打仗，群众就往前线送子弹、送茶、送饭，并带回战利品和抬回伤病员。正因红军与群众关系密切，对苏区的扩大和巩固创造了积极的有利条件，使苏区的发展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并坚持斗争达七、八年之久。当时许多武器也是靠群众的智慧创造出来的，如土枪、土炮、土炸弹。只有洋枪洋炮是从敌人方面缴获来的。土武器还有：用生铁或锡做的地雷、土铁做的过山龙（一种土炮）、木头做的松树炮（守口用的），还有用竹子做的"竹筒炮"、烧酒瓶做的"玻雷"、石头做的"石地雷"，炸药也是土制的，由年久的土墙和茅厕土中提炼出土硝，土硝加硫磺加杉木炭制成炸药，叫黑色炸药，确也厉害。

## （二）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

土地改革：当时我还是儿童团，没有参加过土改工作，印象不深。今天能回忆的一些情况是：那时土地改革的做法比较简单，因为地主、反动富农、反动派大多数都逃亡了，土地契约也被带走了，县城未解放，田粮清册等档案找不到，因此只得把所有土地打乱平分，但工人农民还可以照顾原耕基础，按人口分田。十六岁以上到六十岁以下的全劳力，分大号田；十六岁以下的分小号田，妇女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分小号田。各地分田多少不一，田多多分，田少少分。我的家乡大号是分二十四担谷田，小号分十二担谷田。土地大体上分为三等九级，好坏远近搭配，尽可能照顾原耕基础。当时因土地券都被烧毁掉，未有存底，分亩不详，分田时仅根据自报，有些马虎草率，成片成块地分给各户，有的一份大号田五十担谷还不止。女人都分小号田是不合理的。分田有清册（记下地名、亩数）存底，也有发给土地凭证的。乡苏维埃按清册在田里插牌，群众按凭证找田。山林到后来也分配了，但没有人要，砍木头

砍竹子，说一说就行。在土改政策方面，地主、富农、贪官污吏的土地一律没收；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红军家属和工人农民们分好田。土改时也大致划了成份，自己没有田或有少许田，欠债受剥削的叫贫农；自己有些田不借够吃的叫中农；有雇工有放债剥削的叫富农；靠收租吃饭的叫地主。因地主没有了土地都向外逃跑，有的被我们杀掉，所以苏区很少有地主了，实际上和我们斗争尖锐的是富农。一九三三年进行了查田查阶级也就是查成份工作，纠正了一些错划或瞒划成份情况，对混入革命队伍中的一批富农分子和富农子弟，表现一般的开除，表现坏的惩办。因为，土改时没有发动群众向地主、富农面对面进行诉苦斗争，群众总认为土地是苏维埃恩赐的，所以对内部敌人的斗争不如今天坚决，甚至有些群众还把土改分得的财物暗地送还一些给地主富农。但对拿枪的公开的敌人斗争是很坚决的。一九三五年苏区失守，地主就向农民算倒帐，把土地夺回去了，并变本加厉，逼得有些群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镇压反革命：对这个问题也和土改问题一样，我不懂什么。我记得当时闽北肃反，主要对象一是“AB团”，一是“改组派”。开始时群众还搞不清什么叫“改组派”（因一九三三年以前还没有听过“AB团”、“改组派”这名称，只有“私通反动”、“私通白区”的罪名）。当时的审问方法是重于口供，不着重于调查研究。特别在初期，乡苏维埃都有杀人权，先斩后奏（后来制止了乡村政府乱杀人的现象）。一九三二年以后，江西方面开始肃“AB团”、“改组派”了，随着闽北也开始肃反运动，逮捕了不少人。根据后来的了解，被肃的不一定都是反革命，这里面有三种人：一种是阶级敌人，对苏维埃政权有仇恨，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但不一定是“AB团”、“改组派”；一种是一些受了欺骗的；再一种是完全冤枉的，被诬告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是反革命分子所陷害的好人。因此，在当时苏区不论干部和群众都有一点恐怖心理。在肃反方法上也有些做得不妥当。如有些群众，通知他来挑枪，到时就扣押起来。所以后来群众

一听说“挑枪”、干部一听说“调动工作”就害怕了。那时肃反，对成份出身好的人会好一些，出身不好的人危险就大一些。总之，当时肃反是过“左”了一些，加以平时对干部不很了解，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搞得比较乱。

总的看来，在阶级斗争那样尖锐的情况下，没有坚决的肃反是不行的：内部潜伏的敌人总会乘机活动，而且和外部敌人相呼应；何况当时整个苏区周围为白区包围着，如果不坚决肃清内部反革命是很难巩固的。但肃反偏重口供，不着重人证和物证，这是错误的。

## （三）苏区经济文化和群众生活

当时苏区经济来源基本上靠生产；生产又主要靠农业生产，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只有少许手工业)。那几年，农业年年丰收；没有闹过什么灾害，甚至有些荒田也长出野谷子，一亩田产量达几百斤，粮食很多，猪也养得很多。苏区财经收入只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农民交纳土地税，一担谷交一斗，红军家属田免交，鳏寡孤独户交得少些。土地税收供红军和国家机关干部吃饭。没有什么屠宰税、烟酒税、货物税；二是靠打土豪筹款，如打赤石街缴银元无数，但把伪钞票都烧掉，不晓得拿到白区去买东西。对外贸易也有一些。闽北机关有个贸易处，专门把苏区生产出的土产品，如粮食、黄麻和缴获来的鸦片烟土运到白区去，从白区换回布匹、盐和日用品等。在商业上设有信用、生产、消费、粮食等合作社。在金融管理上有苏区银行，发行货币，以银元、粮食做基金。苏区大店铺很少。一块钱只买一斤盐。经常吃不上盐，以辣椒代替，甚至挖地皮煎硝盐吃。再就是工业品很缺乏，参加合作社的，购买有优先权。参加合作社每股股金二元。群众生活一般是过得很好的，吃得很好；穿衣虽有困难，不穿洋布，穿土布还是有的。盖房子有的是木头、砖瓦。生病主要服中药或草药，西药只红军医院有，是向外采购或缴获来的。

当时婚姻是完全自由的，父母不能干涉子女婚事，没有买卖婚姻，结婚时只需花三块钱(一元钱猪肉，一元钱糯米，一元钱糖)，请大家吃吃，至多备上一桌酒，宴请乡里主要干部；再找个介绍人、证婚人，双方自愿，到乡苏维埃政府登记一下就行了。

在苏区没有赌博、搞迷信等活动，抽鸦片的、乞丐、妓女、流氓、盗贼等也没有(因人人可以谋得生活)。有的也逃去白区了。在禁止抽鸦片、赌博、搞迷信等问题上，曾采取过一些措施，由儿童团去监督检查。首先是宣传教育，如有违反即没收迷信品和赌具，抽鸦片者禁闭二、三个月，过后也就自然戒绝了。老百姓非常感激我们做了这些好事。也没有人敢乱搞男女关系，让者游街示众。

在文化教育方面，苏区没有中学，只有小学。各乡、村都办有小学，有的叫列宁小学，也有的叫红旗小学。后来在大安街办了一所师范学校，一年毕业，出来担任小学教员。乡里有业余剧团，有新剧、三脚戏、文明戏、赣戏。看戏不花钱，做戏的人也不要钱。

各种组织团体：有党、团和群众组织。党、团以乡为单位建立支部，都是秘密的。党、团员在一个乡内是不多的，但很精干，并兼乡村干部。发动群众也是秘密的，所以群众在一个乡内对党、团支部印象不很深刻，一般都是由苏维埃政权出面领导，群众只懂得有个党代表，知道是个领导者。公开的群众组织有儿童团、少先队。但与今天的儿童团、少先队组织不一样。过去的儿童团等于今天的少先队，但不完全一样。七——十五岁儿童都编为儿童团，儿童团又分模范队（即由年纪较大、操练较好的人编成，每天早上要操练，有假枪、有军号、有军衣军帽——一般是罚款买来或奖励得来的）；一般儿童团员（一个月操练一、二天）。十六——二十四岁的青少年编为少先队，等于现在的基干民兵，每人发一支土枪，或一支梭镖，或一把小刀，配合红军作战，是一种军事组织。二十五岁——四十五岁的青壮年编为赤卫军，等于现在的一般民兵，也是军事组织。它的任务是配合红军作战、抬伤员，平时就在家里种田生产。此外，妇女有慰劳队、洗衣队、补衣队等组织。

#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一九三五——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们撤出大安街，首先撤退到离大安街十五里的道观厂。开始对打游击战是外行，虽事先做了动员报告，但只原则上说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等等。在道观厂住了几天，敌人就进占了大安街，什么也没有。我们还有意识地留下一部分党员做地下工作，到处埋下地雷，使敌人吃了很大的亏。敌人占领大安前，是往大安后面攻取大安炮台的，我守炮台的分队长有些动摇，就烧毁炮台撤走。铅山草鞋岭炮台也是同样情况。这时，我们又由道观厂撤退到二十多里外的虹溪，在此住一个多月，过了阴历年，并开会整顿队伍，枪毙了退却逃跑的铅山司令员。后敌人进攻地源，我们又从甘溪撤到长涧源、再由长涧源到坑口，住了半个月。司令部驻坑口，无线电队和一百八十多人驻孟家湾。后敌人进攻郭前，我们又由坑口转车盘坑，驻扎温岭坳。这里地势很坏。住了十多天，敌人分两路向我们进攻。一路进地源；一路进坑口，距我驻地都只有二十里。我们不得不星夜出发，艰苦斗争就从此开始了。因第一次走夜路，又有许多妇女小孩的拖累，从温岭坳出温林关到江西境内的桃树坪只十里路，就跑了一夜。待天亮再从桃树坪到铅山大坞，住了半夜，出发到篁村，休息了三天，又开到徐家厂、东坑等地。共有一千多人集中在这里，住了半个月。当时独立师的几个团远远地调离开闽北领导机关，剩下一个较弱的红四团也调到光泽边界去了。保卫机关的部队只有教导队、保卫队及无线电一个留护排，党校、训练班等武装队，而且武器不多，其他均非武装人员。敌人占领篁村后，建筑了碉堡。李德胜就带一个警卫员，借口前往侦察敌情，走到敌人碉堡下，威胁警卫员一起去投降；警卫员不从，李就打倒警卫员，夺走警卫员的武器，一个人投敌叛变了。李

一叛变，马上引敌向我追击，情况就严重了。书记黄道同志鉴于情况紧张，就命令队伍半夜十二点吃饭，二点出发。大家因天黑，都不愿行军，等到天亮才走。当我们进了桐木关，兵工厂还在关外三十里路的草坪被敌人追上了。有人跑来告急，我们就继续出发，到了三港和红四团一个营会合，于是又停下休息了一个多小时。敌人又追上。我们不知从哪一条路走。原来往高桥走是对的，但司令部一个参谋（反革命）却叫我们回头走小路，正好走在敌人机枪火力下，还叫我们躲在房子里隐蔽。这不是等死吗？以后政治部传来命令向后转，但已来不及了，大家就乱窜起来，无线电、银元及其它一些贵重物资都一起丢失了。我们这些走错了路的单位损失很重。幸好司令部教导队都走对了路，没有受损失。但无线电已丢掉，和中央就失掉了联系，从此就更感困难了。三、四天以后，敌人撤退了，我们再回到三港集合，整顿队伍，任命吴先喜同志为司令员。一部分动摇分子都跑回家了，牺牲了十余人。队伍人数少了，并公开宣布李德胜叛变，声讨其罪恶，开除其党籍。整顿中，有些单位撤消合并，无线电队解散，大部分人员编到红四团去，部分人员编到司令部去，部分编到兵工厂去。这时把党政工团等领导机构都合并组成一个司令部，另成立一个红色医院。整编后，红四团开到邵武光泽去，司令部（包括闽北苏维埃、党区分委，团区分委等）连保卫队一共只有二百多人，兵工厂五十多人，医院五、六十人，往三港又回桐木关。翻越了一座大山，经石门，过双溪口，上北坑。这里地形很高，是个大山沟，只有五、六户人，生活很困难。因此，机关分散居住，医院住半岭厂、司令部住下北坑、兵工厂住上北坑。因粮食吃不上，供给部长到外面买粮食，被敌人抓去。在北坑一个多月，开始还可以吃一干二稀，以后连两餐稀饭都喝不上了，每天每班派人采苦叶菜吃，整整吃了半个月，没有见过一粒大米，每个人瘦得不成样子。没办法再住下去了，我们又从北坑出发到大安街后面龙宫，在一家纸厂住了一夜，宰杀了两头耕牛吃，继续去到马家，拟由寒泡岭过口。然而，刚到敌人炮台脚下，内部反

革命分子打了一枪，我们即被敌人发觉。我们通不过去又向后转返回马家，司令部开会决定分两路过口，医院留在北坑，兵工厂随红二团走龙宫，经浆溪、出路口，在敌人碉堡下轻轻摸过，再过路口大河，回到坑口，磨石坑。在此吃了一天饱饭，敌人又追上，打了一仗。后二团调走，兵工厂留下，进了东坑大山；司令部则由大安街上面大安源过口，转移到龙东门。兵工厂在东坑住了几个月，缺少粮食。国民党实行移民并村，群众都搬了家，粮食更加困难，与群众联系也不易了。这时斗争更加艰苦了。后来司令部把我们兵工厂护送到樟村广浦县委。那里还有村苏维埃政权。我们就在山上搭了一个棚，继续修枪造子弹。住了四十多天，敌人又来进攻。当时有些挑担卖东西的广丰人，实际上是国民党的便衣队，把我们侦察得一清二楚，发现了我们的游击司令部住在山边、犯人厂住在山顶上。结果，匪军打劫犯人厂。我军与敌人打了一仗。后兵工厂找不到司令部。过了半个月，广浦游击司令部找着兵工厂，就将兵工厂送回崇安的谷大坑闽北司令部驻地。这时，闽北司令部已由建(瓯)松（溪）政（和）县到闽东北，据说是要和闽东、浙西南会合，成立闽浙赣省委。因此，一九三五年冬，黄道书记、吴先喜司令员、卢文卿政治部主任等同志都去闽东北了。这时，闽北成立崇安中心县委，由曾昭铭负责，还留下团分委书记王礼运（后任政治部主任）、周存林（原崇安县苏维埃主席）。我们兵工厂归中心县委领导。黄道等同志去到闽东北，结果没有合并。故一九三六年五月，黄道等同志又返回闽北，仍回到峰谷大山，单独成立闽赣省委，省委书记黄道、司令员吴先喜，独立师师长黄立贵，青年团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曾镜冰，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卢文卿。下面设闽北分区，管辖崇安县委、广浦县委、建阳县委、上铅县委。分区委书记汪林兴、司令员熊家材、青年团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王礼运。司令部有一百多人，也住在四畲山上。一九三六年八月，由崇安县转到建阳界首乡的大垅地区，又决定成立四个分区。把汪林兴派回崇安成立一分区（亦称闽北分区）；邵武为二分区（亦称闽中分区），由黄立贵兼

书记、政治委员、司令员（实际上这个分区没有主要负责人，只有我与吴维全两人负责。我是总支书记兼机关指导员，吴维全是供给部长），管辖邵光特区、邵顺建县委、邵将泰县委（该县委及二个中队不久都垮了）；三分区或称抚东分区，管辖资光贵，书记吴先喜、司令员饶守坤、四分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左丰美。当时军事上有个独立师，下编一、二、三、四纵队，由团改为纵队。大的纵队八、九百人，小的纵队有三、五百人。二纵队在崇安，一、三纵队在建、松、政，四纵队在抚东。最多时曾有七、八个纵队。七个纵队在邵、将、泰，以后搞垮了，接近国共合作时，只剩下四个纵队。崇安一分区有：崇浦独立营、广浦独立营、上广游击队、西南游击大队（即桐木关大队）、崇西游击队（即大安游击队）。武装力量强的是二、三、四分区，一分区是群众基础好。当时敌人进攻我们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开始，张銮基旅被我们搞垮了一半。还有驻光泽的七十五师、驻邵武的七十六师、驻建阳的新编十一师、驻浦城的第三师。省委转移到邵武方面，敌人的军事重点也跟着转移到邵武去。

三年游击战争，敌人力量强大，我们也不算太弱。敌人进攻我们，我们也能反击敌人，有时也还能主动出击。黄立贵骁勇善战，敌人号称他"黄老虎"。那时是游击根据地，公开政权已不存在。群众还是属于我们的，群众和我们的关系仍和以前一样密切。环境最恶劣的是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情况逐渐好转。一九三七年春天，我就离开第二分区，到邵光特区去了。

一九三六年冬到一九三七年春，省委驻在鸡垅高山顶上。这时，黄立贵已带兵打到屏南、古田方面去了。敌人侦察到黄立贵同志已不在省委机关，就来进攻。敌人最喜欢袭击我们的领导机关，因他们认为机关力量薄弱好打，而且财物很多。所以省委机关转移到哪里，敌人就跟着转移到哪里。可是，这次敌人却打错算盘，正在敌人向省委进攻时，黄立贵同志刚刚回来，敌人来了一个营，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严阵以待，一举消灭了敌人半个营，击伤匪营长、毙伤敌人一百多名。这次战斗后，省委就搬到邵武建阳交界的

五里考、老鼠岗。没住几天，有一个家伙开了小差，省委便搬到邵武猪母岗下的屏风山。省委在山顶上，邵光特区委在山下。省委还没住上一个月，大概在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敌人又向省委进攻，省委被逼上猪母岗。

“七·七”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把大量兵力抽调到南方搞我们游击队，限在七、八、九三个月内消灭闽北红军，步步逼我们上猪母岗。这地方很苦，吃米很困难，向北走要跑到八十里路外的邵武永枚乡，向南走要跑到五十里外的光泽大洲乡。起大雾时，连方向都摸不清。省委在这样的地方住了二、三个月。这时白匪军七十五师、七十六师在邵武开会，扬言要在七、八、九三个月内消灭闽北红军，并把猪母岗包围起来，满山满坞都扎了兵；单在一个十几户人家的李家坡，敌人就驻扎一个团，到处搭哨棚，我们出去就挨打，情况很紧张。这时，“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国民党不得不和日本打一下，围攻猪母岗的白匪军不得不撤走一个师。此时，光泽中心区委书记蔡诗山被俘到江西。江西方面项英同志和国民党已谈判好。但我们这方面还不晓得，还在和敌人打。后蔡诗山在南昌自新，承认是共产党，并说了我领导机关在邵光地区。匪江西保安处急于和我们谈判，于是就派蔡诗山回来找黄道同志谈判。蔡不敢来找省委。以后我们事务长在光泽大洲村看到蔡诗山，就把他抓回来，黄道同志就诱导他，他才把江西方面项英同志已和国民党谈判好，国共已经合作等情况说了，并说江西保安副司令周志群派他回来找省委。黄道同志一面很好款待他，一面开会研究。会上谁也不敢主张国共合作。因为每个人思想上都认为国共合作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后来，黄道同志分析了当前形势，引用列宁“革命的妥协”、“以退为进”等理论根据，反复动员，才说服了大家。因此，省委决定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并写一封信令蔡诗山带给江西省保安司令。九月间，伪保安副司令周志群就亲自到光泽来和我们谈判。黄道同志就派他的儿子黄知真带一个精干的武装班到大洲去谈判。第二天再由曾镜冰、曾昭铭去继续谈判。这次国共合作基本

上谈判成功。曾昭铭就去南昌见项英同志，把中央指示带回。大家这才相信真的国共合作了。大家很高兴，以为再不去猪母岗这个苦地方了。没几天，省委又决定再回猪母岗，越过它去打邵武二都桥，给民团狗一个报复。这一仗毁了敌人的炮台，消灭了一个民团分队，并写信限邵武伪县政府三天以内来谈判。我队伍继续前进，打建阳香菇厂炮台，消灭敌人一个连。再攻杜潭，又消灭敌人一个连。一天一晚连打三个胜仗。崇安方面，在汪林兴同志领导下也攻打了铅山石塘街附近的朋城，烧毁了敌人的炮台。国民党正规军一撤退，伪政府害怕了，才答应和我们谈判。那时，曾昭铭担任二分区书记，我担任邵、光、建县委书记及邵光建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我就以军政委员会主席名义写信给邵武伪县政府要他们来和我们谈判。我当时没有经验，缺乏准备，没有给国民党代表一个威胁。在谈判时，那个区长总是点头称是，他提出停止打土豪。我就提出：要停止打土豪，就要给我们粮饷，先给我们二百套军衣。一百条军毯。国民党代表都答应了。后来只送来四十套军衣、二十条军毯，并提出要我们的花名册，点名发饷。我说不行，由我们自己包干，申言：不给发饷，就打土豪。那时我们这支挺进队只有四、五十人，临时扩大到二、三百人，大家没军衣，就先戴上个军帽。开始，伪县政府还陆续拿些钱来应付我们，但天气愈来愈冷，没有衣服穿不行，我们就叫队长带了四个人到伪邵武县政府去，严正指出："不给我们钱，就要在城里打土豪。"因我们已知道敌人在邵武城里只有一个排，其中还有一个班是我们掌握的。他们没办法，又给了我们一百多元。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上级调挺进队到铅山石塘街集中开赴抗日前线。县委住在二渡桥，只留下一个警卫班，都是新兵，又都是些小鬼。此时，我们写信给邵武的资本家，叫他们募捐。我们没经验，一户要几千元，实际上他们是拿不出的。因此，起初他们还零零星星地缴一些款来应付我们；以后他们知道我们队伍调走了，又硬起硬话来了，说："你们要钱，到城里来拿。"我们力量不足，就不好办了。

三年游击战争，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就算结束了。

# 关于闽北革命斗争的几个问题

黄　　英

## 一、土地革命初期情况

一九三〇年冬天，红军从福建车盘那边分几路进入江西铅山，将保安队打垮，解放了我的家乡。从车盘到下渠、桃树坪一带，基本上没有了国民党队伍。红军一来，第一步工作是发动贫雇农起来革命，组织贫农团开展工作；第二步是从贫农团积极分子中吸收党团员，建立党、团支部组织，然后就建立苏维埃政权组织；第三步是有了政权后，就发动群众，进行分田地。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红军一来，豪绅地主都跑掉。车盘、紫溪、石塘一带，除了白区如河口以外，差不多苏区的地主都跑光了。红军将逃亡地主的土地财产全部没收，分配给贫雇农。红军打到一个地方，就叫老百姓到地主家里，将谷子、家具，挑的挑、背的背，一下子都分光。当时弄得到处都是谷子，浪费也不少。那时房子很多，故群众都住自己的房子，地主房屋根本就不要，苏区内富农还有一些，中农都在。对富农政策是将好田抽出分配给贫雇农，坏田或开荒田留给他自己种。地主要劳动，田地契约都烧掉。当时打土豪不仅从经济上消灭剥削制度，而且从肉体上消灭豪绅地主。到了一九三六年初，黄道同志根据当时游击战形势，总结了经验，提出将打土豪改为筹款政策，让把缴了款的地主放回去，很坏的杀掉，一般不再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了。

当时将祠堂、庙宇里的祖宗神牌都打掉，不准烧香，要破除迷信。

从现在来看，当时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还是正确

的。这可以从三方面看：

一方面，不进行土地革命，整个苏区农民群众发动不起来，群众力量也组织不起来；另一方面，只有进行打土豪分田地才能将革命和群众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再一方面，不这样打土豪、分田地，就不能组织群众斗地主，要扩大红军、巩固苏区是搞不起来的，革命的目的也不能达到。

偏差地方：一方面是在打土豪分田地过程中，有些地方不仅从经济上消灭，而且从肉体上消灭豪绅地主；二方面，把庙宇菩萨、祖宗神牌打掉，这不适应当时群众的觉悟。记得七星山上有个大庙，每年六月十九日都有很多人去烧香、拜菩萨。老百姓传说，一天红军有一个人去打菩萨，一条蛇冲出来把这人咬了一口。因此，老百姓说，菩萨就是不能打呀；三方面是，对富农分坏田这一点上，好的在于启发了群众觉悟（因为他们过去收租剥削人，今天分给坏田、开荒田种也是应该的），不好的方面是没有区分富农与豪绅地主之差别。现在看来，打击面较广了些。

## 二、肃 反 问 题

闽北肃反是在一九三二年九月间，方志敏同志带红十军第二次入闽作战时开始的。在闽北是布置说有“A B团”和“改组派”。听说在大别山那里是搞“改组派”和“第三党”，叫“老三”。肃反是整个苏区都搞，被杀的很多，在执行政策上是有问题的，有的人被错杀了。但我认为：肃反是应该进行的，这是不能怀疑的。这是一点；第二点是，当时部队和机关中是有反革命的，这也是肯定的；第三点，如果不进行肃反，要巩固部队、坚持三年游击战争，问题会更多些，叛变投敌的可能不会是李德胜一个。被肃反的人当中有三种人：一种是阶级敌人，对苏维埃政权有仇恨，是反革命，也可能是“A B团”、“改组派”；二种是一些受了欺骗的；三种是完全冤枉的，被诬告参加反革命组织，是被反革命分子陷害的好人。

肃反开始时着重逼供吊打是错误的。到一九三五年开始游击战争时，做法上有了改变，采取开"自新"大会：会场上放一张桌子，不论你是参加"A B团"，还是"改组派"，上去"自新"一下，并表明你自己革命的决心和态度，一般都不杀。可是组长以上的头子是要杀的。

肃反是必须的，可是做法上犯了错误。当时主要应由杨良生负责。一是逮捕面很广，我们修械处就有三个人，一个晚上抓去杀掉了，也不考虑修枪、打仗的需要。后来向红十军要人，最后还是打浦城时提了二个俘虏补上；二是抓了那么多人，没有进行很好的审查，着重搞逼供吊打，有些人在临死还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象这样的人还是杀了，这是否是反革命呢？就有问题了。我认为没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有些负责干部工作上犯了错误（当时反富农路线很厉害）、也采取逼供信，有的被打糊涂了就乱说上二、三个名字，这样面就广了，从大安街一直弄到江西铅山。李立三同志的老婆李安娜，个子很高，她在闽北，后来也被捕起来了。说什么从大安街——铅山——河口——南昌都有反革命的联络站，主要干部如吴先民同志都搞掉了，但是对李德胜这个真正反革命没有肃到。总之，当时肃反是过"左"了一些，没有执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政策。由此在部队中造成很坏的影响，一是造成恐慌情绪，弄得二、三个人不敢在一起说话，你一说话，被保安机关或别人看见，就说你是反革命。那时党、团生活抓得紧，如果三个人在一起，晚上就会有人去汇报。谈思想也只是说："为革命艰苦奋斗到底。"所以真正有思想问题也反映不出来；二是不敢当干部。因为肃反首先杀干部，危险得很，不当干部责任会少一些。到了后来，这种情况好了一些。

肃反中最大的错误就是逼供吊打，不承认的也杀，有的人被打糊涂了就乱说，拉上很多人。这样弄，真正的反革命又未肃到。有一次在大安，我参加省委召开的干部会，听黄道同志作了关于马列主义理论报告，有一个党校校长（从赣东北派来的，姓名记不清了）

做记录，同时记录的还有好几个。这个报告很多人听，报告后一、二个月审查他的笔记，说其中掺进很多托洛斯基的话，便开斗争会说他是托派。我也参加了斗争会，后来把他党校校长的职务撤了，送回赣东北，可能以后也被杀掉了。那时枪毙人太容易了，也不要出布告。

## 三、转入三年游击战争

转入游击战前是有准备，而且讨论过。黄知真同志说得比较正确，谁愿把那么大块的苏区丢掉呢？那时苏区很大，敌人进行五次“围剿”，整个中央苏区紧张，各个苏区也开始紧张，你的战略不转变是不行的。转入游击战争是为了保存力量，继续坚持革命斗争，但准备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是否预计到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会那样艰苦呢？我看那时黄道同志也未估计到。到了一九三六年时，黄道同志才根据一年游击战争发展变化总结了经验。

我们撤出大安街时，在村庄里里外外都埋上了地雷，把办公家具全部放到广场里烧掉；兵工厂撤走时，工具全部埋掉，什么也没留给敌人。黄道同志还在党团内部作过动员报告。

那时我们有三、四个正规团，机枪、迫击炮都有。但游击战争怎么打，干部没有经验。以前是集中力量到白区打一仗，扩大政治影响，将战利品带回苏区再休整。如果打游击战，兵工厂怎么打游击战呢？对这些问题当时弄不清楚，后来经过近一年时间，黄道同志总结了几条经验，即出敌不意，声东击西，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化整为零，深入敌后开辟新区等几条军事原则。总之，是在有利条件下，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不是死拼硬干，而是采取打一下就走，使敌人找不到我们。

三年游击战争开始时，除独立师有三、四个团外，各县还有独立营、团；也是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到处都有我们的队伍。白天，我们在山林休息，晚上出去打击敌人，搞粮食。那时，还注意

保存自己的力量，在有利条件下，集中优势力量消灭敌人。

当时在游击战战略战术上，还有些地方不恰当；如每当敌人进攻到苏区境内，我们正面打，如守卫大安街和四渡桥打硬仗，我们伤亡大。因为敌人来进攻苏区，都是集中了优势兵力的。如果我们能到敌后去打就好了。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打鬼子就有了经验。转到敌后去打游击战争、打一下，就到山上休整一下。一九三五年底后，我们就深入到敌后薄弱地区展开游击战争，这样做既开展了新区，同时也坚持了老苏区斗争。从游击战到改编为新四军一个团，闽北党一直领导群众坚持革命斗争、并未被搞垮。闽北苏区从大块变小块、从小块变白区，白天不能工作，我们就在晚上开展活动，如崇安、建阳、邵武、光泽、广丰，上饶等地区，都还有党组织。

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期间，有十万多敌兵被我们牵制在闽北。如果这些敌人都去追击中央红军，那他们就困难多了。所以说，闽北苏区的革命斗争，对全局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闽北红军对国民党部队杀伤很大，如刘和鼎部队被我们打垮、国民党只好又调一些部队来。

另外，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还搞了个争取大刀会的工作。闽北大刀会很多、开始到处都是，说是吃了朱砂，刀枪不入。他们人又多，冲下来确实不好打。打了几次，我们又有了经验了：只要你把他前头的打倒几个，后面人一看就退了。后来，我们将大刀会头子林熙明争取过来，通过他又争取许多大刀会保持中立，不打我们了。我们叫他们到苏区外头去搞，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样群众也满意了。大刀会争取工作做得不错，如开展建松政地区的工作，就是利用大刀会来进行的。三年游击战争中，黄道同志对保存干部工作做得不够，当时主要负责干部都是在前线，一打仗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黄立贵和吴先喜同志都是这样牺牲的。这两位领导干部牺牲了确实太可惜了。当时，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从黄道同志到战士都泪水汪汪，非常伤心。这是闽北革命斗争中的一大损失。

## 四、兵工厂发展情况

修械处和兵工厂关系：兵工厂成立于一九三〇年二、三月，修械处是由兵工厂调出一部分人员，专门修理枪支的。大毛病的枪还得送兵工厂修理。修械处成立于一九三一年四、五月间，它业务上属兵工厂领导，政治领导和伙食都在司令部。到了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间，修械处并入兵工厂。主任徐光明被捕后，由张昌龙同志当主任。到了一九三三年，司令部搬到崇安城内（一年不到又退回大安街），又派出一位刘师傅和几个人组成修械处到城内修枪。姓李的修机枪，我负责子弹科。后来说我们的子弹打不响，子弹里头有的装沙子，可把我们吓坏了。这时，叫我去城里。我看是枪上的毛病（以前我也学过修枪），把枪修了一下，打得"叭，叭"响，才没事。到敌人进攻崇安城时，修械处又搬回兵工厂。修械处是临时的，不是单独组织。

兵工厂发展规模最大是在一九三二年——一九三四年，有二百多人，共五个科：修械科，没有科长，由一个姓李的和二个姓刘的师傅负责，还有几十个学徒；子弹科，是由我负责。有三、四十个学徒和一个刚从浦城俘虏来的陈师傅。我们造六五、七九步枪子弹，还有驳壳枪子弹，打时还会连发，有时也修迫击炮弹；炸弹科，科长是姓卢的，有四、五十个人；翻砂科是由一个姓张的负责（从赣东北过来的），他是铸锅出身；打铁科还包烧炭。当时要烧两种炭，一种是木头炭，一种是竹子炭。另外还有三个专门做枪壳的工人。

当时兵工厂造的锡炸弹、地雷，作用可大啦，打得国民党部队不敢进屋，在空地挖坑做饭。兵工厂除了造炸弹、地雷、子弹外，还造了两挺手提花机关枪，以及马刀、刺刀等。刺刀还是仿新式三角带在枪上。红色兵工厂对当时红军作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 关于北上抗日的片断回忆

黄 礼 华

一九三四年八月间，在横峰县港边的张家村，举行了省苏执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党政方面是县委书记、县苏主席以上干部；部队则为营长以上干部。

会议由方志敏同志主持，唐在刚、涂振农、聂洪钧、滕国荣、程伯谦、邹秀峰、邹琦、王如痴、刘畴西、关英等都到了会。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中央指示，北上抗日，开辟浙西、皖南大片新苏区。方志敏同志在会上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与华北，我们要执行新的转移政策，北上抗日。开辟浙西、皖南新苏区，就是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会议共开了三天。

九月间，我调到省委，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参加了省委工作队，分赴各县协助地方苏维埃政府扩大红军，构筑炮台。我分到乐平县。全省新扩大的红军战士，都送到德兴县重溪，补充到红七军团里面去，红十军没有留下一兵一卒。

这时，赣东北面临的形势是，在横峰方面，敌军推进到了铺前；在上饶方面，敌军到了大岭；在弋阳方面，敌军到了烈桥；在德兴方面，敌军到了花桥。葛源已四面受敌。

记不清是哪一天，一万多人在葛源区的下黄溪开大会。大会上，方志敏同志对群众说："现在我们到了决战阶段，要暂时退出苏区了。你们不要忘记党，不要忘记苏维埃，也不要难过。等打败了日本，我们再回来！"说到沉痛处，方志敏边讲边流泪。他还说："我们不是故意丢下大家，为了抗日救国，不得不如此啊！"

第二天上午，便从葛源出发北上抗日了。当时红十军兵力共约五千多人；军政工作人员则组成了政治工作团，涂振农任团长，我

是工作团里的一个班长；每人发了四颗土造手榴弹，一袋干粮，衣服只准穿一件带一件。走到德兴县界田桥时，方志敏召集政治工作团全体同志开了会，他说："同志们，在任何千辛万苦的情况下，都要坚持下来，要准备吃大苦，不能灰心

翻过大茅山经过暖水时，我们把敌人的电话线都剪掉了，敌人在炮台里不敢开枪。这时天下起雨来，方志敏见后卫没有过来，就撑了把伞，站在敌人炮台底下，等后卫都过完了才走。一路都是山，有马不能骑。

到达安徽省休宁县的山斗时，烧了敌人四个炮台。在这里，我们打了土豪，没收了不少金银财物。没收委员会主任是谢文清同志，他原任省苏财政部副部长。打土豪要事先经没收委员会批准，不批准不能乱打。没收的财物中除黄金、白银、烟土（当药用）外，其它都分给当地的老百姓。在山斗，开了群众大会，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讲为什么要北上抗日。

从山斗出发后的第三天，到达太平县的汤口。在这里，红十军同中央派来的红七军团会师了。会师后，正式成立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方志敏同志任总指挥。会师时，我们开了欢迎会，七军团和红十军互相赠送了礼品，如香菇、糕点等等，还编了一首歌，歌词是："日本帝国主义真可恶，占领满蒙与华北，我们万众一心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收回满蒙与华北！"第二天从汤口出发，中午到达黄山，大家说这就是有名的风景区，我只到黄山学堂看了看，就跟队伍走了。

在潭家桥与敌人遭遇了，发生激烈战斗，从天亮开始打，直打到下午五时。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都来不及收尸，但对伤员和枪支，都要抢回来。只要是没有停止呼吸的伤员同志，都要抢回来。我们政治工作团担负着输送弹药和抬送伤员的任务。撤离潭家桥时，对伤员的处理是这样的：排长以下，放在老百姓家里寄养，每人留二十块银元和一些药品；排长以上，都抬着走。当地老百姓很好，乐意收养红军伤员。从这以后，敌人对我们是前堵后追，两

面夹击，头上还有飞机轰炸和扫射。

到达青阳县蓉阳镇时，抓了个大恶霸（他当过伪县长和民团团长），把他杀了，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光是没收的布匹，分给群众就分了一天。没收的食品也多得很，部分给了各个连队。从这时候起，军团部命令我们，群众如问红军开到那里去，就回答说往南京开；如问红军有多少，就说后面还有大部队。

行军路上纪律很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违犯。买东西不讨价还价，集镇上的商店都照常营业。在蓉阳镇时，有些同志拿苏区的红票买东西，商店老板不敢不要。军团部发现这一情况后，马上命令政治工作团带人挑着一担一担的银元，到每一家商店去查问："老板，你们收了红票吗？"有的老板不敢讲，我们就对他们说："你们这里不是苏区，红票不能流通，你如收了红票，我们就用银元换回来，一元红票换一块银元，不打折扣。"商人们非常感动，说我们红军真是仁义之师。

到达皖南特区的太平县柯村时，方志敏召集特区工作人员和政治工作团人员开了会，到会有五、六百人。方志敏说："现在，我们已胜利抵达皖南特区。特区书记李杰三同志因犯了右倾，改任王弼（后叛变）为特区书记，并把皖南特区改名为江边特区。"在这里，我们政治工作团的同志都遵照方志敏同志的意见，全部留了下来，在特委领导下工作。为了加强各县游击队的实力，军团还给江边特区留下了一批枪支弹药。第二天，特委任命我任太平县委书记、王牛同志任太平县团委书记。当时，太平县在南河，原县委书记兼游击队长是宁月生同志（上饶县人）。游击队有八十多人，六十条枪。我带了八条枪去担任县委书记后，宁月生同志就专任游击队长一职。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方志敏同志了。

# 皖浙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概况

李步新 江天辉 刘毓标 许登寿

## 前　　言

皖浙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是继承方志敏同志的革命遗志，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英勇的皖浙赣边区广大人民的参加和支持下，经过与敌人生死搏斗的斗争过程而取得最后胜利的。它有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在整个人民革命战争史中，占有光荣的一页。

编写这部皖浙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史，对于保存革命历史资料，积累革命斗争经验，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作为纪念革命先烈，激励我们自己和教育广大青年一代来说，也是有它的重要现实意义的。

要想编写好这部战争史，并不是没有困难的。第一，当时许多重要历史文献，在游击战争中被损毁了，保存下来的很少；第二，相隔时间太久了，已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解放后近十年的和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些事实是不可能没有遗忘的；第三，当时一起参加革命的同志，有的在对敌斗争（包括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了，有的为了革命工作，贡献了他的生命，剩下的人就不多了。这次在南京参加座谈的，仅有我们四人，还有倪南山、邹志成、黄光裕、柴荣生、郑古魁、陈祥元等同志均因工作关系未能参加，只好凭着我们几个人的回忆，来担负这个光荣的编写任务了。

虽然存在这些困难，我们还应该尽我们的努力把它编写起来。我们编写的办法是：采取大家想，大家谈，个人回忆和在群众中调

查的材料相结合，互相启发，互相补充，然后把材料汇集整理起来，加以核对，从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力求材料真实完整，尽管这样，遗漏和差错的地方仍是难免的。

## 一 皖浙赣边区概况

皖浙赣边区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以黄山、鄣公山、磨盘山、怀玉山等山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包括江西的弋阳、横峰、德兴、贵溪、上饶、乐平、婺源、浮梁、鄱县、湖口、波阳、彭泽等县，安徽的休宁、歙县、祁门、黟县、太平、石埭、青阳、贵池、秋浦、东流、泾县、旌德、宁国、宣城和浙江的开化、淳安、遂安、昌化、孝丰等县地区。

这里有世界闻名的景德镇瓷器、祁门红茶、婺源绿茶，有漫山遍野的森林和丰富的地下宝藏，盛产大米、玉蜀黍、茶油、桐油和香菇、药材以及大量的竹、木、柴、炭等，这许多大宗的土特产品运销国内外的各大城市。

虽然物产这么富饶，但是广大人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却深受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方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地下矿藏为日、英帝国主义自由地开采，由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丝、茶、桐油等大大跌价，这些都直接影响广大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广大农民在高额地租和高利贷……剥削下，更是苦不堪言，“镰刀挂上壁，饭就没有吃”。就是当时农民生活苦痛的写照，在这重重压迫下，人民不得不起来为争取生存和解放而斗争。

从战略上来讲，这个地区也是十分重要的。黄山、鄣公山、磨盘山、怀玉山等，山峦起伏，连绵不绝，加上皖浙交界的天目山，构成了一道进可以出击，退可以隐伏的游击地带。

在交通上，浙赣铁路贯穿在边区的东南部，青屯公路直达黄山，西临赣水，北倚长江，内河有信河、乐河、青弋江、新安江，交通四达，不仅沟通了边区与外地的物资交流。更重要的是：革命根据

地的建立和革命武装的扩大，直接威胁到九江、南昌、芜湖，特别是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这就不能不引起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一地区的重视和破坏。于是在这个地区，就展开了敌我之间“围剿”和反“围剿”的残酷的革命斗争。

## 二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浙进军

当时总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侵占东北三省之后，继续侵犯我华北各省。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大敌当前，仍然奉行其“不抵抗”政策，反而进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欺骗宣传，积极反共，调集百万以上的大军，进攻苏区和红军。这种“反共投降”的卖国政策，不能不激起全国广大爱国人士的愤怒，不能不引起国民党反动统治地位日益走向崩溃的局面。

我党中央鉴于民族危机已达到千钧一发之际，坚决主张团结抗日，公开对日宣战，发表了庄严的北上抗日宣言。我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先后分别出动北上抗日。全国人民对于我党我军北上抗日的实际行动，表示全力支持和拥护。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高潮下，并未丝毫改变其“反共投降”的卖国政策，继续调集大军，一面对我西进长征的红军主力，前堵后追，一面集中力量向我各根据地大举“清剿”。

赣东北苏区是在方志敏、黄道、邵式平、方志纯、吴先民、邹秀峰等同志领导下建立的。一九二七年，这里就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弋(阳)横(峰)起义。后来革命形势很快发展到闽北、浙西、皖南，建立了闽浙皖赣根据地，先后成立了红十军与红十军团，并粉碎了敌人先后四次“围剿”，巩固了苏区。

国民党匪军调集大军向我赣东北苏区发动五次“围剿”，苏区军民经过一年的苦战，在敌人的步步为营堡垒政策推进下，形势日趋紧张。虽然处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闽浙赣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指示，根据中央命令，中央苏区红七军团与赣东北红十军团

向皖浙进军。以方志敏为领导，组成强有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我赣东北根据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逐步地被缩小了，并遭受到严重破坏。虽然革命遭到暂时的挫折，总的革命斗争形势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但是革命前途是光明的，从斗争形势的发展来看，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就采取了新的斗争方式，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新的根据地，积蓄和保存力量，准备迎接新的形势的到来。

红七军团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从中央苏区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青流、大田、古田，于十月到达赣东北苏区德兴重溪。

根据中央指示：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团应跳出敌人的包围，向皖浙地区进军，北上抗日。于是红七军团复于十月二十日左右，从赣东北苏区出发，经常山、上坊、分水，克旌德县城到黄山汤口、芳村一带。红十军团于十月二十四日从葛源出发，经重山关到德兴重溪，到二十八、九号才最后突破封锁线，经婺源到开化，在婺源大坂和驻守碉堡之保安团打了一次仗，歼灭敌人大部，烧毁敌人碉堡，复在蓝渡截击敌人汽车数辆，缴获敌人弹药武器及一部分物资后，就到了黄山汤口、芳村一带和七军团汇合。

一路上，北上抗日先遣队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群众见到红军，杀猪送粮，夹道欢迎，象见到自己亲人一样；而豪绅地主则纷纷逃命。北上抗日先遣队每到一处，向群众宣传我党主张和政策，散发北上抗日宣言，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反共卖国行为，更加激起了广大人民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愤怒，而对共产党和北上抗日先遣队则有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两军汇合后，部队正式进行改编，将原七军团与十军团合编成十军团（即北上抗日先遣队），以方志敏为前敌总指挥，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刘英为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参谋长。军团下面设十九、二十、二十一等三个师。与此同时经中央批准，以方志敏、乐少华、刘畴西、刘英等同志组织政治委员会，方志敏同志为

书记。这是当时党政军最高的领导机构。

当时我军的主要任务是：以黄山为依托，在皖浙边相机歼灭敌人一部，牵制东南方面的敌人，掩护中央红军西进，并创立新的根据地。于是经过两天的整编后，即翻黄山，到达古竹溪。但这时敌人已布置了重兵在皖浙赣边，阻击我北上抗日先遣队。第二天我军抵达谭家桥，和敌补充王旅战斗了一天，后因敌人增援部队到达，且双方伤亡很重，我军便在当天的晚上退出了战斗，接着走旌德庙首、白地翻皮岭大山经泾县、茂林、青阳进入柯村苏区作暂时休息。不到三天，因敌人进攻，部队又向东流、祁门、休宁、太平、泾县、石埭、秋浦、青阳等地进军，屡胜强敌。但是终因敌人重兵堵击，我军又十分疲劳，加上给养困难，伤亡很大，乃决定回师赣东北苏区准备重新整顿队伍，补充修整后，再执行任务。于是部队就向赣东北苏区行进。但是在走到怀玉山时，部队遭敌袭击，司令部电台被打掉了，方志敏、刘畴西等同志不幸在陇首村因叛徒告密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被俘。刘英、粟裕等带了一部分红军（人数不详）进入赣东北苏区，不久，向闽浙边行动，建立了闽浙边根据地。

方志敏同志被俘以后，革命内部有一部分人丧失革命信心，而走上了动摇逃跑和自首、叛变的道路。如王弼、倪宝树、李伯钧、苏承平、徐世良之流，就叛变投降敌人，反过来破坏革命。但是绝大部分同志，继承方志敏同志的革命事业，在为方志敏同志复仇，为革命烈士复仇的口号下，继续坚定地顽强地同敌人作斗争。

## 三 赣东北苏区军民的英勇斗争

红军主力离开苏区以后，敌人更加疯狂地大举“清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闽浙赣省委领导赣东北苏区广大军民转入游击战争。

这时省委机关和关英、余金德、滕国荣、邹秀峰等同志以德兴为中心，在德兴、婺源、乐平、浮梁一带，开展了游击斗争。唐在刚、

邹琦、徐炎荣等同志率领一个独立团（九个连）和葛源战区游击队，以磨盘山为中心，经常活动在葛源、簦村、槎源坞一带，并数次打进葛源街，消灭敌人。

为了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一九三五年四月，省委在德兴大田苏家召开了会议，决定成立信河和乐河特委。信河特委包括弋阳、横峰、上饶、铅山四县，由余汉潮负责；乐河特委包括德兴、乐平、婺源、贵溪四县，由程伯谦同志负责。信河和乐河特委及其所属县委均组织有精悍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据我们所知道的：在信河特委领导的地区，有上饶县何启泉等同志领导的一支游击队，在茗洋、关里及石人殿等地与敌人进行斗争；横峰的上坑源一带亦有一支游击队，在周志以等同志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在乐河特委领导的地区，由贵（溪）余（江）万（年）中心县委组织的一支游击队，在中心县委书记赵梓明领导下，以三县岭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不断地给进驻我苏区的敌人以严重打击，大大地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于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赣东北苏区进行了更加残酷的“清剿”，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而苏区人民革命斗争又受到极端严重的摧残，活动地区日渐缩小。省委及特委的一些负责同志如唐在刚，邹秀峰、程伯谦、徐炎荣等亦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光荣牺牲。

敌人以无数倍的兵力继续向赣东北据据地进攻，采取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血洗苏区，使苏区军民武装斗争受到暂时挫折，苏区形成几十里地方无村庄，田园荒芜，渺无人烟。剩下的一部分群众在敌人统治下，所受的精神痛苦和生活无着，苦不堪言。但是敌人不能改变苏区人民革命的心。苏区人民仍然采取各种方式与敌人斗争着。

我们为了支持据据地人民革命斗争，在适当时机组织了短枪便衣队进去，打击了随国民党匪军回来称王称霸的豪绅地主、特务、流氓，捣毁了联保机关，捉杀了反动派，以揭破敌人说：“红军被消

灭了”等等的欺骗宣传，启发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可是因为苏区所有青壮年差不多都参加了红军，留在家乡的仅是些老弱残废、妇孺和小孩，他们见到红军游击队，在敌人白色恐怖的严重情况下，含泪带哭地问长问短，并打听方志敏同志等消息，有的问：听敌人说方志敏同志被俘了，可有此事？哭哭啼啼。但是他们懂得，要继续坚持革命斗争，革命一定要胜利的。他们时刻盼望着和祝福红军打胜仗。为了表示他们的心意，把剩下一点粮食都给游击队吃，关心红军安全，派妇女带路，不让敌人发现，说发现了不得了啦。

苏区人民革命斗争，是更加困难了，但是人民革命的心和对革命胜利的盼望，给了我们极大的感动，更加坚定了我们对敌斗争决心和胜利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省委为保存有生力量，并统一皖浙赣地区的领导起见，乃决定由关英同志带领部分同志向皖南转移。赣东北地区，成立中共赣东北特委，余金德同志为书记，领导赣东北地区革命斗争。

三五年秋，关英同志到了鄣公山后，信、乐河特委，在敌人包围“清剿”中失了联系（据上饶地委的调查材料，这些地区的游击队遭到了损失，负责同志光荣牺牲），赣东北特委在余金德，杨文翰等同志的领导下，仍继续坚持着顽强的斗争。到三七年四月间，余金德等同志率领独立营一部，与王丰庆率领的独立营两个连会师，打乐平鸣山，后因目标暴露，敌人集中兵力向他进攻，五月间在与敌人的斗争中，余金德同志不幸牺牲。然而这一地区，在杨文翰的领导下，仍旧坚持着革命斗争。

此外，柳真吾、王丰庆、周成龙、匡龙海等所带领的挺进师，在一九三四年六月转到皖赣地区后，组织了赣北特委，同年秋末冬初领导了以浮梁之小源为中心，波及祁门、都昌、湖口、波阳、彭泽等地的武装暴动。暴动后，赣北特委改名为皖赣特委，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并成立了皖赣分区，周成龙为司令员，下辖一个独立师，王丰庆为独立师政委，匡龙海为师长。这次暴动后不久，敌人

就集中了几个主力师和地方保安团进攻该苏区。挺进师主力大部于三五年初撤出苏区，转到贵（池）秋（浦）东（流）地区活动，皖赣苏区就转为游击区，由柳真吾等同志领导苏区军民继续坚持斗争。不久，匡龙海、田英等同志率一部分部队由贵（池）秋（浦）东（流）仍回到皖赣的都（昌）湖（口）波（阳）彭（泽）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打开新的局面。

一九三四年八月太平柯村暴动与皖南苏区的对敌斗争情况，其大体是这样的。刘毓标同志，在一九三四年夏经赣东北省委派往皖南白区工作，先在歙县任县委书记，同年年底又在太平、石埭、祁门、泾县、贵池任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四年上述地区发展很快，搞得很红，难以秘密下去，于是请示了赣东北省委，经批准后，同年八月即举行暴动。不久省委又派来宁春生同志率领的三百人的游击大队，加强苏区红军武装力量。当时分了土地与稻子，烧了田契、债券；土豪杀的杀，逃的逃，那时太平西乡一带，南北七、八十里搞得轰轰烈烈，群众斗争情绪非常高涨。

三个月后，北上抗日先遣队来到皖南苏区，方志敏同志指出这里离中心苏区太远，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要求把苏区转为游击区，并决定成立皖南独立团，有两个营，六个连，约五、六百人，一个营是原来宁春生同志率领的游击大队改编的，另一个营是方志敏同志留下的一个侦察营，原营长熊刚，政委姓张。独立团成立以后，熊刚任团长，刘毓标任政委，受皖南特委领导，特委书记是王弼（也是方志敏同志留下的，原是赣东北省委组织部长，以后叛变），前任书记是李杰三。方志敏同志还规定了独立团行动的方针和任务：（一）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二）积极发展白区秘密工作；（三）进行抗日宣传。部队最初的行动主要是掩护以柯村为中心的苏区转为游击区，在柯村周围活动，也到过九华山、黄山边境进行活动。

几个月后，王弼叛变了，皖南党的组织受到很大的破坏，独立团失去了领导，于是决定到赣东北找省委，柯村根据地则留一个营由张政委负责，地方工作由宁春生同志领导，继续坚持对敌斗争。

不久，宁春生同志在对敌斗争中不幸牺牲。

## 四 新的游击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烈火是永远扑不灭的。虽然敌人集中兵力向我赣东北苏区残酷“清剿”，可是在皖浙边一带一块一块的游击据据地象雨后春笋一样地蓬勃发展起来了，皖浙边一带早在大革命时期，即开始有我党的活动，我党曾领导群众进行过多次的革命斗争，在群众中影响很深。特别是北上抗日先遣队来到皖浙边一带以后，虽然北上抗日先遣队失利，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纪律严明和坚决抗日行动，给皖浙边一带人民群众留下了极为广泛深刻的影响。当我们部队跳出敌人包围，又转到皖浙边一带活动的时候，人民群众象对待自已亲人一样迎接我们，我们部队继续发扬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开展游击战争，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发动与组织群众，这样与群众建立了血肉关系，，皖浙边一带各游击据据地就这样在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同一目标下，逐步地建立发展起来。现将皖浙边一带几个主要的游击据据地的情况，分述于后：

贵（池）秋（浦）东（流）游击革命据据地

北上抗日先遣队到皖南后，江天辉同志根据方志敏同志的指示，带了一部分部队去同在谭家桥战争中失去联系的倪宝树部队取得联系，开展游击战争，两次找到倪部，都被敌人冲散，后在一九三五年一、二月间到达婺源岈崌山遇到了在该地坚持游击战争的王丰庆、匡龙海部队。匡龙海告诉江天辉同志说：方志敏同志已经被俘了，我们已处在敌人的包围圈中，应该立即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进行活动。于是在一九三五年二、三月间王丰庆、匡龙海、江天辉等即率部到达了贵（池）秋（浦）东（流）一带活动。此后，就与在该地区活动的江纵新、黄翠山、倪南山等及其所率领的武装取得了汇合，王丰庆、匡龙海、江天辉等就一方面派人到他们的部队中去，加强其部队的政治工作，另一方面又派人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教育工

作，从此，就在贵（池）秋（浦）东（流）地区展开了游击战争。

同年四、五月间，为了掩护以浮梁之小源为中心的原游击区的群众，免受敌人的摧残，部队去都（昌）湖（口）波（阳）彭（泽）活动，在那里检查与布置了都（昌）湖（口）波（阳）彭（泽）中心县委的工作，随后部队又转向浮梁之小源，在去浮梁小源途中，路经祁门的倒湖，消灭了一个伪保安中队，缴长枪几十枝。到达小源时，那里已经完全为敌人所占领，因此，我们在那里了解了一下情况，布置工作，就转到了祁门的鸡毛尖。

部队经过几次行动后，我们深感没有地方党与根据地，供给和安放伤员情况等问题，都难以解决，就想创立新的根据地。于是王丰庆、匡龙海、江天辉、陈胖子等就在祁门的鸡毛尖开了一次会议，研究创立新根据地的问题，会上有人主张去婺源蚸岖山搞，有人主张去都（昌）湖（口）波（阳）彭（泽）搞，有人主张去贵（池）秋（浦）东（流）搞，最后王丰庆说：几个地方都好，都可以搞，以后根据情况变化再行决定。会后部队向婺源出发，在鄣公山的庙里又和周成龙汇合一处，周成龙坚持要找省委，部队进到德兴，无法过去，复返回蚸岖山，在这时就决定去贵（池）秋（浦）东（流）创立根据地。三五年六月在贵池高山部队就分开了，由匡龙海、田英带一部分人去蚸岖山创造根据地（匡到蚸岖山后，由于那里条件不成熟，他便转到都（昌）湖（口）波（阳）彭（泽）和田英同志在那里创造了一块游击区），周、王、江等人留贵（池）秋（浦）东（流）一带准备创建根据地。

为了很好的准备这次暴动，首先在党内成立了江边特委，王丰庆任书记，江天辉任组织部长（后调任贵（池）秋（浦）中心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姓余（后调东流县委书记），周成龙是省委代表，苏衡发（后叛变）为青年团书记。特委对暴动范围、政策等问题，曾作了多次研究，根据过去的经验，决定采取保留一部分秘密组织，不把秘密组织全部暴动。其次积极地进行组织群众工作，组织了贫农团、妇女会、儿童团、赤卫队、少先队等。

在军事上也采取了积极行动，部队迅速发展到七、八百人，成立了独立团。七月间我们在猪公岭打了一次接近根据地的安徽保安团一个中队，缴获枪二十余枝。随即转至青阳与贵池交界处伏击，活捉了国民党安徽省宣传部长。八、九月间，我们又向殷家汇发动进攻，歼灭了殷家汇驻军一个保安中队，缴获枪四、五十枝，烧毁碉堡一个。由于军事行动中的节节胜利，大大地扩大了我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提高了群众的斗争情绪，巩固了群众的胜利信心，从而加速了准备工作的进展。

一九三五年秋，以丁香树、高山、火龙坑等地为中心，波及七、八十里的贵(池)、秋(浦)、东(流)地区，正式地开始了暴动。成立了江边特区苏维埃政府(没有开代表大会进行选举)，陈胖子曾任过苏维埃主席，江纵新任财政部长，倪南山作保卫工作，成立了特区总工会和青年团，并且分了地主的浮财及其房屋。

不久，敌人调集了几个团的兵力，采取了步步为营的方针和碉堡政策，大举向根据地进攻。我们的部队在和敌人的几次作战中，由于采取了硬打的战略方针，部队受到一些损失，环境处于紧张，特委即召集会议，对当前形势作了讨论。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部队就向都(昌)湖(口)波(阳)彭(泽)去了一趟，同匡龙海交换了意见。回来后，在贵池小姓王家和敌人打了一仗，部队遭到重大损失，杨团长牺牲，情况更加严重。这时特委又召集会议（周成龙已离开去找省委了，以后无下落，东流姓余的书记已不见)，会议决定：把部队分成两部分，王丰庆率领一部，组成江南游击总队，江天辉率领一部，组成江南游击大队。会议对撤出贵(池)秋(浦)东(流)根据地后的善后问题也作了讨论。

会后王丰庆率部先离开了贵(池)秋(浦)东(流)到鄣公山找到省委，江天辉同志在对根据地的医院以及部队所储存的物资等问题作了处理后，也率部离开根据地，在鄣公岭会师，找到省委。

鄣公山游击革命根据地

刘毓标、熊刚所带领的皖南独立团，由于王弼的叛变，皖南特

委遭受破坏。经与宁春生、张政委共同研究，决定宁、张带一个营在皖南继续坚持斗争，刘毓标、熊刚率领一个营前往赣东北找省委，经过了千辛万苦，终于在德兴广田山见到了关英同志，刘等汇报了皖南情况后，关英同志即谈苏区情况不管如何严重，他仍要坚持斗争，方志敏同志交代的任务是正确的，应该很快回去，以黄山为中心，展开皖南游击战争，但必须尽量避免打消耗战，尽量保存有生力量。于是刘、熊即在苏区精编了部队，补充了弹药、枪支，带了一百多人回到皖南。

刘毓标、熊刚部队回来时，经过婺源、浮梁、祁门、休宁四县交界的鄣公山、苦荠山、休宁石屋坑等地，看到这里地形险要，山大林密，群众条件又好，早期就有先进知识分子余玉堂在传播进步思想，并且有过红军活动的影响，因此就在这一带坚持活动。在群众中积极宣传我党我军宗旨，宣传贫富对立原因，号召大家只有革命，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抗捐抗税、反对抽丁，才能获得翻身。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于是就落下了脚。不久刘、熊又外出找到了张政委，那时他与宁春生(后来牺牲)已失去了联系，柯村苏区亦已失败，不能立足，于是部队即全部会师鄣公山，开展该地区组织工作，发展了党员，最早加入的有余玉堂、余同庆、张志成等人，在鄣公山、苦荠山、石盟坑三地建立了支部，而群众参加农民团、妇女会的就非常普遍了。同时，组织也逐步发展到鄣公山附近的白山、洪源及休宁石屋坑、里广山、里庄、上、下大连等地，以后这里发展成为皖浙赣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根据地。

泾(县)旌(德)宁(国)宣(城)游击革命根据地

泾(县)旌(德)宁(国)宣(城)早在一九三〇年前后，就有我党的组织活动，以后，大别山有一批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教书为名，在这一带活动。中共皖南工委、皖南特委也派有人在这一带活动过。一九三四年冬建立了中共泾县县委，潘茂彬为县委书记。徐世良为团县委书记。十二月由洪维恭带领了一个四枝枪的短枪队来泾县东北乡戴阳村活动，开始进行打土豪、分粮斗争，由于枪少子弹缺，

只能打些小土豪，活动范围不大，目标亦小，敌人还不很注意。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旬，抗日先遣队到泾县新峰地方，方志敏同志决定派李步新同志在泾县西南乡一带工作，经涂振农谈话，当时改名李荣华，发展和整顿了党的组织。一月后，泾县县委派交通来西乡带李到了东北乡戴阳村。一九三五年一月由老柯（又名吴介堂）、王晓南和王岐山（王岐山同志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十九师的团长，带一个排掩护红军主力转移，被敌人截断失去联系，到青阳找到老柯），带一个排部队和青阳县的一个游击队（在青阳九华山活动到敌人清剿不能站脚）共七、八十人到了泾县东北乡戴阳村。这时洪维恭召集李步新、老柯、王晓南、王岐山等开会。讨论当前敌人进攻形势和我们部队行动方针，决定成立泾（县）旌（德）宁（国）宣（城）中心县委，洪维恭同志为书记，李步新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晓南为宣传部长，储希文为秘书长，团中心县委书记李先进、老柯因腿害病，不能长途行动，决定仍回青阳去搞秘密工作。

匪军鲍刚四六旅一个营紧跟着后面追击，当时决定部队向宁国、旌德方向行动，把敌人引到外面去，当晚即要行动，王岐山同志提出要配一个政治委员同他一块行动，这时，洪维恭决定李步新兼游击队政委，就在当晚出发，第二天清早打宣城溪口，消灭保安队一个分队，缴获长短枪二十余枝，部队就向宁国、旌德方向活动，在大王山遭敌人袭击，李步新负伤，抬到太平黄花岭刘永寿家休养。部队继续向泾县西南乡又转到东北乡，就在这几个县和敌人打圈子，这时因为有了根据地，部队发展到一百多人枪。

中心县委决定在这四县边区发展成为一个隐蔽的游击根据地。部队分为三个中队（实际是三个排的兵力），王岐山带一中队（有一挺轻机枪），三中队在泾县、宣城一带活动，二中队（是原青阳游击队的基础）在宁国板桥一带活动。部队行动任务是：打击地主保安队，打击敌人便衣队，宣传组织群众，打土豪筹款。地方党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抗租、抗捐、抗税，反对抽壮丁，组织农会、妇女会、青年团、自卫队（任务是捉敌人的便衣），没有建立苏维埃

政权。保甲制度虽然未宣布取消，实际为农会所代替了，群众拿保甲长路条还可以到城镇去买东西。

一九三五年四、五月间，由于苏承平、徐世良叛变投敌，破坏了太平、泾县一部分党的组织，带敌人向泾县戴阳村根据地进攻，七月间，洪维恭同志遭敌人袭击不幸牺牲。八月间王岐山同志率领部队在宣城大小麦坑与敌作战又不幸牺牲。中心县委由王晓南代理书记，部队继续坚持在这地区斗争。但是王晓南、储希文已经腐化，各搞一个女人，把打土豪的钱捆在自己腰里，不发部队经费。不积极领导部队行动。这时部队意见很多，地方干部思想比较混乱。

一九三五年十月间，李步新在泾县西南乡活动，派人找到部队关系，即回到部队。开始了解各方面的情况，部队对王晓南意见很多，地方干部思想混乱，徐世良的叛变，对泾县东乡情况熟悉，天天带敌人进攻，破坏地方组织，有些干部动摇叛变，问题感到十分严重，真是“内忧外患”之苦。为此我们当时采取的方针，首先是从团结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部队教育，主动团结地方干部。加强地方干部思想教育，关心爱护部队，要提高警惕，全党团结，只有地方干部和部队的团结一致，才能积极打击敌人，坚持斗争。经过这样处理与教育之后，关系已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这时王晓南提出不担任中心县委书记，经讨论决定李步新为中共中心县委书记，王晓南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储希文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团中心县委李先进为书记。党委对当时的情况作了具体分析，决定部队积极向外出击，打击徐世良所带的“清剿”部队，经过几次战斗，打击了敌人，缴获枪枝一部。

这时根据地扩大了范围：泾县的戴阳村黄头岭、蔡村坝、丁溪、漕溪、涌溪、榆桃岭、乌雀岭一带地区；旌德的大王山、十一都、二溪；宣城的大小麦坑、禾村、青龙山；宁国的板桥等地。横直约一百余华里。此外在泾县西南乡的水东、濯万村、小河口、麻岭、茂林、后岸王家山一带亦有党的秘密组织，群众斗争情绪亦高

涨起来了。

中心县委决定大力发展武装力量，动员一批工农青壮年参加红军，把三个中队充实起来，经过动员参军，这时部队已发展到二百余人。

一九三六年一月间，敌人向我中心地区大举进攻，国民党调来七十八师和四十五旅，把根据地包围起来，实行分进合击，对群众采取烧房子，捕捉群众带走，损失很大。中心县委秘书长储希文被敌人捉去，当即叛变，秘密写信勾通王晓南叛变，企图包围歼灭我一、三中队未成。这时形势更加严重了，地方组织和干部，由于王、储叛变投敌，很快遭到破坏。

因为洪维恭、王岐山等同志牺牲，又失掉了上级领导，因此我们决定部队回赣东北苏区去找省委，同时避免部队损失，迅速突出敌人包围，大家一条心，部队就从涌溪出发，经过旌德、太平、石埭、黟县到休宁西乡鄣公山脚下里庄找到省委。

此外，在开(化)婺(源)休(宁)一带，还有赵礼生(又名曹立森)，丘老金等同志，带领一部分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

另有倪宝树、李伯钧二人所带的部队，经不起艰苦环境斗争的考验，对革命抱有失败的情绪。因此，在敌人的清剿下，先后投敌，变成可耻的叛徒。

## 五　鄣公山会师，省委扩大会议的召开

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关英同志来到鄣公山，这时，赣东北苏区已经转为艰苦的游击战争，关英同志带了五个人(邵长河也在)在里广山见到了刘毓标同志，急于了解皖浙赣各游击根据地分散坚持的情况，感到必须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争，因此积极派人，派部队前往各地联系寻找，刘毓标同志也带部队去各处行动，以便与各地取得联系。

这时各地游击队大部因为在敌人清剿下，或是内部发生了重大

的叛变事件或因策略上没有明确的转变，大都先后撤离了根据地，并寻找领导。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撤出贵（池）秋（浦）东（流）根据地前往赣东北寻找省委的王丰庆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间到达鄣公山。二月间，在泾（县）旌（德）宁（国）宣（城）坚持的李步新同志率部在休宁里庄见到了刘毓标同志，找到了省委。不久，江天辉同志率部也在鄣公山找上了省委。在这以前，关英同志还找到了余金德，余熙庆、滕国荣等人，先后在鄣公山会合。在鄣公山会合以后，省委为了统一和加强各个根据地的党的领导，结束一年多来的分散坚持斗争的局面，于一九三六年四月间在鄣公山召开了皖浙赣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如下事项：

（一）对当前政治形势作了详细的分析研究，讨论和决定了当时整个边区的工作方针任务，当时总的工作方针任务是：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大力进行抗日宣传工作，积极发动与组织群众，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为巩固与扩大以鄣公山为中心的皖浙赣边区根据地而斗争。

（二）讨论了有关各种政策问题。

（三）决定成立皖浙赣独立团。

（四）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根据当时发展形势和具体情况，决定划分为五个特委。大会结束，省委开会讨论，决定扩大省委组成人员，通知各特委书记。据我们所知道的，关英同志仍为省委书记，唐在刚、余金德、刘毓标、李步新、江天辉、滕国荣、邵长河、王丰庆等为省委委员。

独立团成立和几个主要战斗情况

在省委扩大会议不久，即在木岚山召开了军人大会，宣布皖浙赣独立团的成立。任命熊刚为团长，刘毓标兼政治委员，邵长河兼政治处主任，下辖三个营，以原皖南独立团为基础，编为一、二两个营，各地调来的游击队，编为三营，共约八百余人，机枪十余挺。除独立团为边区主力部队外，各地仍留少数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当时省委决定独立团的任务是：积极到鄣公山为中心的根据地

的外线，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人，随时随地做好群众工作，大力开展抗日宣传，筹集经费。

一九三六年秋，熊刚、刘毓标同志率领独立团向皖南和浙西北一带行动，七月转战到开化附近，侦知县城空虚，仅驻有伪保安团两个中队，战斗力较弱，同时这一带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即于七月七日拂晓，一举攻入开化县城，当场打死伪军中队长，被伤俘的一百余人，缴获机枪六挺，步枪一百多支，子弹无数。并捣毁县衙门，释放全部犯人。在开化县城逗留四小时后，继即回师婺源、经裔官、三坑至沱口，沿途乘胜摧毁碉堡及联防办事处数十个，俘保丁数人。

行至沱川月岭附近，俘伪电话兵二名，得知伪四十六旅二个连将从清华街开往沱川，即于沱川月岭组织伏击，一举击溃伪军二个连于月岭脚下，当场打死打伤伪军三十余人，大部为我俘虏，缴获机枪四挺，步枪一百余枝，子弹无数，剩下一小部伪军，沿水沟夹着尾巴逃回清华街。战后我独立团即退回鄣公山休整。

休整后，独立团复向休宁方向行动，从休宁西乡、溪口转到汪村的途中，碰到一个邮差，得知驻休宁伪四十六旅一股伪军出动，经侦察了解情况后，即选择平鼻岭组织伏击，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后，乘其无备，猛扑下去，迅即解决战斗，生俘伪连副一名，打死打伤伪军很多，缴获枪技七，八十枝。

由于独立团几次战斗的胜利，群情振奋，部队战斗力大为提高，而伪保安团队闻风丧胆，不敢出来骚扰，即当时伪军之主力四十六旅，也不敢轻易行动。

省委根据这一斗争形势，一面指出，独立团在战斗胜利中必须防止骄傲和麻痹轻敌思想的发生，一面指示独立团要到更远一些地区去开展游击活动，扩大声势。一九三六年九月间，独立团即续向青阳、泾县、宁国、宣城、昌化等一带行动。

由于省委的正确领导，各地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独立团和各地红军游击队在战斗中不断地扩大和不断地取得胜利，以及广泛深

入地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群众发动起来了，开辟了不少新的地区，边区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建立五个特委和发展地方武装

省委为了加强党的领导，继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决定将边区划分五个特委：(1)在赣东北地区以德兴为中心，包括乐平、浮梁、婺源、上饶、横峰、弋阳、贵溪、余江、万年等县建立赣东北特委，余金德为书记；(2)以祁门为中心，包括休宁、婺源、浮梁、都昌、波阳、湖口、彭泽等地区为皖赣特委，王丰庆为书记，朱步新为副书记；(3)泾县、宣城、宁国、于潜、昌化、孝丰、郎溪、广德等一带地区为上浙皖特委，邵长河为书记；(4)淳安、遂安、歙县一带地区为下浙皖特委，何英为书记；(5)开化、婺源之东南及休宁一带地区为开婺休特委，赵礼生(又名曹立森)为书记，并派余熙庆在该地区指导工作。各地特委领导下又都建立了几个中心县委。如当时皖赣特委下设有四个中心县委：1.祁(门)婺(源)休(宁)中心县委，李步新兼书记；2.祁(门)浮(梁)婺(源)中心县委，江天辉兼书记；3.浮(梁)乐(平)婺(源)中心县委，老肖任书记；4.都(昌)湖(口)波(阳)彭(泽)中心县委，田英任书记。在中心县委之下设县委区委组织。边区武装有了很大的发展，除边区独立团外，每个特委都有一独立营，一般有两个连，准备发展为三个连，每个连都有一、二挺机枪及花筒手提枪。每个中心县委也有游击大队或游击队，每个县委有游击队或短枪队(大都是便衣活动)。根据地内，各地农民团、青年团、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团体，象雨后春笋一样建立与发展起来。各地并在重点地区，通过革命斗争的锻炼与培养，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加强党对根据地各项建设的领导和各种政策的转变

在省委领导下，对于边区党的建设，武装建设，文化工作，特别是在执行政策上的某些转变，都是有很大成绩的，这些直接关系到边区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1) 军事上，我们的部队是在为了完成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

款的三大任务及广泛开展原根据地以外的游击战争，巩固扩大游击根据地的思想指导下，进行战斗和一切工作的。

皖浙赣独立团成立后，便采取了规模较大的行动，并狠狠地打击了当时的主要敌人(独立四十六旅)。在战术上主要的是采取奇袭，远距离的奔袭(如打开化、昌化县城)、伏击(如月岭和平岭战斗)和速决的办法。

在作群众工作方面，部队中除了有足够的宣传员作宣传组织群众外，部队每到一地人人都自觉自动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我们许多新区工作，差不多都是首先经过部队的行动，向群众进行宣传，然后留下工作人员再进行组织工作搞起来的。如上、下浙皖特委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部队作群众工作除了宣传外，最有效的办法是实际行动和严明的群众纪律。不论部队怎样苦，决不动群众一针一线，即是我们十分需要的东西(如：油、盐、粮食和日用品)而群众又不在家的情况下，我们也得写好条子并将钱钞包好放在实物的原处。另外部队还经常帮助和掩护群众进行抗捐、抗税、抗债和反对抽壮丁等斗争。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们的部队仍然坚持贯彻了党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与政治委员制度。团有总支部，连队有支部，政治委员不仅独立团营以上都有，而且各个独立连也有。因此，部队的政治工作都是以党支部为核心，根据每一时期的政治任务，部队思想情况来进行的。三年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主要内容有：阶级教育、时事与革命前途教育、政策教育(主要是俘虏政策，没收政策和对保甲长政策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官兵平等艰苦奋斗以及党员标准教育……等。其方式是：环境许可时召集会议作报告，一般情况下由营政委或连政指作简短讲话，有时则采取上课方式，另外还采取编印小调、歌曲(如打开化、昌化县后就编印了两支歌子)散发给部队和根据地群众，在较大的行动和战斗后，即时总结作战经验和政治工作经验，进行表扬与批评。同时部队中一直坚持着党的生活制度，只要有时间，就召开小组会，进行政治思想和工作的检讨。由

于上述一系列的工作，便保证了部队顺利地完成任务。部队也得到了巩固和很大的发展。整个皖浙赣地区的部队由千余人发展到近三千人。

（2）根据不同情况和条件，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和活动方法。

以积极的军事行动作掩护，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积极向穷苦群众深入宣传我党主张和政策。然后有对象地进行个别串连教育。发动他们参加革命活动，建立各种群众组织（主要是农民团、妇女会），再后，将经过革命斗争严格考验的同志发展为党团员，建立支部，扎下革命根子。在赤白交界区或在敌人占领的情况下，则教育群众采用“白皮红心”的政策，以应付敌人，但要坚定革命立场，不许破坏革命。

积极领导群众进行抗租抗息和抗税反对抽壮丁的斗争。红军所到之处，虽然没有分田地，但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领导群众向豪绅地主进行抗租抗息抗税斗争，并以红军的军事威力，迫使豪绅地主实行这种政策，不许他们危害群众和进行破坏活动。此外在敌人抓壮丁的时候，领导群众反对抓壮丁的斗争，并警告抓壮丁的反动保长，不准他们胡作非为。这样群众就靠向我们，我们就慢慢的在群众中站稳了脚根。

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实行打击首恶分子，争取中间力量，便利发动群众的政策。对于保甲长采取教育为主，打击其中个别坏的。教育争取大多数为我工作，允许他们做两面派，他们就为我们搞情报，给我们代购一些一般群众难以办到的东西；有时也掩护我们同志进行秘密工作。对于土豪除民愤很大有直接血债的予以镇压外，一般不杀，采取筹款办法，土豪为了生命安全，不得不接受罚款，和我们所提出的不打击报复群众、不进行破坏等条件，这样有的土豪就不大敢乱动了。对于城市商人（如香菇商、茶商、窑柴商、瓷土商……）允许他们来山区做生意，商人只要有利可图，就愿为我们打听消息，买些书报、文具、药品及其他的用品，但不准他们进行任何破坏活动。

（3）关于党的建设问题：

发展党的工作，注意政治上的纯洁，不论部队和地方发展党员时，要具备三个条件：1.成分出身好；2.社会关系好；3.须经过革命斗争的长期考察。这种严格要求，就保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战斗性。

加强党的教育，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地方和部队的党组织都能抓紧时间积极进行党章教育，党员须知教育，并注意党的活动（如党小组会、支部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保证党的团结与行动一致，并把及时反映当地政治情况作为支部生活重要内容之一，这样，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反映到党支部来，地方党组织就赶来报告我们。

培养提高党的干部。省委在莒菪山开办有短期的干部训练班，每期二十人，时间五天。在环境好的时候，特委一般都办有短期训练班，如祁（门）浮（梁）婺（源）中心县委就在祁门办了训练班，在内容上，主要是教育干部加强群众观点，关心群众利益，紧紧地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并加强内部团结，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

（4）随着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不断的胜利，不论是部队和群众的文化娱乐都是非常活跃的，部队和群众编写出很多的歌子，现在可以搜集起来的有几十首，有的歌颂红军的胜利，有的歌颂苏维埃的幸福生活，有的号召人民向敌人作斗争。每当部队休息，同志们便打开嗓子唱起歌来，或者唱黄梅戏。在根据地每个角落里，都可以听到这种雄壮的欢乐的歌声。

妇女们要求解放是非常迫切的，我们对妇女文化教育是非常注意的。她们参加妇女会，就要求学文化、学政治、学唱歌，特别是妇女解放歌，在根据地是普遍流行的。山间有些妇女不懂我们的话，就要求学普通话，通过这些学习，广大妇女的思想觉悟提高了。

对儿童教育也是很注意的。红军每到一地，儿童们就如同自己

亲人一样的接近，要红军讲革命打仗的故事给他们听，我们就抓住儿童们这种纯朴的心理，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对儿童们进行教育，告诉他：什么是坏人，什么人是好人的区别，见到匪军不要乱讲，儿童们就这样受到教育。国民党匪军想利用儿童，买点糖果给儿童吃，骗他们，想从儿童口里探得我军情况，那是不容易办到的。

## 六 西安事变后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国民党反动派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和国民党一部分爱国军队和将领的反对。西安事变正说明了全国人民对抗日的强烈要求，也是全国人民对蒋介石卖国政策的直接回答。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省委召开了会议，对当时的形势与任务作了详细的分析研究。当时省委对时局的估计是基本正确的，省委一致认为在新的形势面前，必须积极寻找党中央的关系，只有得到党中央的及时指示，才能更好的掌握方向，才能避免在政治上犯大错误。但是当时对蒋介石对南方根据地实行残酷“清剿”这一形势估计不足。因此省委决定独立团离开根据地到浙西南找刘英同志（估计刘英同志那里可能还有电台与中央联系），与此同时，各特委和其领导下的独立营仍然继续坚持各根据地的游击活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不仅不接受我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对南方根据地的进攻，而且变本加厉地集结了大量兵力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进攻，在我区周围就调集了十几个正规师和三省保安团及地方武装（当时国民党的驻军情况如：八十八师驻开化、五十五师驻歙县、一百九十二师和独立四十六旅驻屯溪、休宁、祁门一带，九十三师驻贵池、六十六师驻东流、至德，独立四十六旅驻婺源，浙江保安团两个团驻遂安、开化、安徽一个保安团驻太平，十六师和江西保安团三个团驻乐平、浮梁、婺源，刘建绪别动大队驻浮梁瑶里等）以刘建绪为皖浙闽赣四省“清剿”总指挥，

对我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围剿"，对根据地人民实行"移民并村"和"自首"政策。

为了应付敌人的"移民并村"，我们一面发动群众"在山靠山吃，下山没饭吃"与敌人进行斗争，如果敌人强迫群众到万一不能抵抗时，为了避免群众遭受重大损失，同意小村群众暂时并到大村去。一面我们也作些准备工作，群众卖给我们不少的粮食，我们把粮食分散埋藏在山区各处，还准备一部分干菜，准备长期坚持。

敌人"移民并村"的办法是很毒辣的，把所有山棚拆光烧光，将分散的小村庄的群众强迫并入大村庄，周围做起木城围住，并设关卡看管封锁，不准群众带出任何东西，然后将小村庄的房屋，锅灶等全部毁掉，不让我们有停脚之处，到处设立明餐暗哨，寻找红军踪迹，清山烧山，乱放冷枪，造成白色恐怖，以此来割断红军和根据地群众的联系，妄图把我军饿死、冻死在山上。

在国民党实行"移民并村"以前，党员、群众曾向我们反映这个情况，并请示办法。我们估计敌人这次"清剿"比以往更加毒辣，但认为山区土特产很丰富(如香菇、茶叶、毛竹、木材……)，如果敌人实行"移民并村"办法，不许群众上山生产，任其荒芜，固然会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豪绅地主的直接利益损失更大，群众为了生活，长期不上山种庄稼，也是不行的，因而估计这个办法不能长期实行下去，而对"移民并村"的长期性、艰苦性则有些估计不够。

我们部队一面留些少数人在中心区坚持，与群众保持联系，与群众共生死同患难，使群众感到有希望，有靠山。一面把部队转到外线去行动，在敌人的空虚地带，积极加强武装活动，牵制敌人，并积极开辟工作。同时我们在各方面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条件好的地方保存了一部分粮食。

虽然，我们有了粮食准备，但数量终久是有限的，过了一定时间以后，粮食吃光了，就只好吃野菜，现在还记得起来的，有红芹、蕨其苗、红菇、野洋姜等。没有火柴，我们用火镰刀和火石，打火石必须用纸引火，后来没有纸，就想办法用艾绒引火。没有煤

吃，我们用树叶卷起来代替吃。敌人把山棚拆光、烧光了，我们在山区没有房住，就自己搭棚子住，有时敌人剿山，把搭的棚子又烧掉了，我们就随地临时搭棚子住，敌人把锅子都搞光了，我们就用洋瓷盆做饭吃。不论怎样的困难，我们都有信心坚持和克服的。

“移民并村”以后，根据地群众还是想尽一切办法，与我们取得联系，尽力支援我们，如借口上山砍柴、妇女看娘家等名义给我们送信，运送粮食、医药、火柴、黄烟等日用品。我们没有粮食吃群众经常把上山砍柴时带的饭脊给我们吃，到处设法替我们找野草、野菜吃。祁门县有个群众名叫土老(汪振斗同志)，红军游击队一来到祁(门)浮(梁)婺(源)以后，他就跟着红军跑，始终没有离开过我们。“移民并村”后，土老坚决跟着我们走，他把一家搬到几十里以外的山角里住下来，我们吃带壳的谷子，需要石磨子，他把一个小村子里群众没有带走的石磨，一盘一盘地翻了几个山坡背回来给我们用。每当吃一种新的野菜时，他总是抢先尝尝，会不会毒死人。土老始终是和我们一起坚持到最后胜利。我们就是这样依靠群众，战胜了种种困难的。

在这非常复杂而又非常艰苦的岁月里，千千万万的革命同志不屈不挠的斗争着。翻过了无数的丛山峻岭和无人走过的羊肠小道，甚至走到无路的地方就自己开辟道路前进。漫山遍野到处都有我们的脚迹！到处都有我们革命烈士和革命者洒下的鲜血。

这时国民党用来“清剿”我根据地的刘建绪部队，正大量集结在浙赣边境，以优势兵力围剿我游击队，正在这时关英同志带几人和独立团正逐步向浙西南伸展，在浙江开化碰到国民党正规部队，便陷入敌人包围圈，我独立团受到严重损失，省委关英同志和独立团长熊刚同志被冲散，团政委刘毓标同志被俘入狱。

自从“移民并村”以来，国民党对我根据地的全面封锁，一天紧似一天，各根据地的游击活动，处于相当困难境地，上浙皖和下浙皖地区的游击队遭到敌人包围，受到很大损失，组织受到破坏，何英和苏宏发被俘叛变，邵长河同志冲散后失去联系。这时皖赣革命

根据地亦在敌人重兵包围下受到严重损失，同省委失去联系，粮食也发生了严重困难。四月间独立营由王丰庆率领和余金德部队会师，打乐平鸣山后，即被敌人十六师包围，王丰庆同志被俘，仅杨汗生政委带十余人及机枪一挺冲破敌人重重包围，回到祁（门）浮（梁）婺（源）根据地。由于张志成（原为景德镇秘密交通）叛变，敌人将张解到景德镇，破坏了景德镇党的组织，王丰庆亦同时被解到景德镇；后来又到浮（梁）乐（平）婺（源）根据地（此时王丰庆乘机逃出），但是由于目标暴露，后来浮（梁）乐（平）婺（源）地区受到很大破坏。在这个问题上王丰庆同志是有错误的。

## 七　部队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我们和国民党的谈判是如何开始的呢？自“七七”事变爆发了全面对日抗战，“八一三”日本帝国主义又进攻上海，国民党南京政府撤退逃到武汉。这时围攻我根据地主力调走了，我们部队就出击敌人，积极行动，敌人没有力量对付我们，他们就利用叛徒来搞我们，想通过叛徒诱骗我们下山，企图缴我们械。因为我们保持着高度警惕，粉碎了敌人这一阴谋，打击了叛徒可耻行为。国民党被迫派人来与我们进行谈判。这时特委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利用和谈的机会，积极派人出去找部队联系，取得中央指示。当时南昌正在成立新四军办事处，陈毅、项英同志给我们送来“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收到不久，特委发表了“告皖赣同胞书”。此时刘毓标同志被刘建绪释放回来，也带来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这时，我们才开始正式与国民党谈判，驻浮梁瑶里别动队大队长张参议也被迫来找我们谈判，我们当时向国民党提出：谈判条件应由中央统一决定，在未得中央统一规定前，要求他们履行下列条件：

（1）准许我们通行无阻，派人联络各地红军人员；

（2）停止向我进攻，撤退根据地周围驻军，解除移民并村的封锁，恢复群众生产自由；

（3）释放一切政治犯；

（4）我们不打土豪是可以的，但要负责解决我们部队的供给问题。

根据当时情况，皖赣特委决定派李步新、江天辉两同志为代表到南昌去找陈毅、项英同志的关系，请示当时党的方针政策，从瑶里出发，经婺源，在婺源我们向国民党县政府交涉释放了些同志。这时驻婺源伪剿总刘建绪侄子（伪团长）向我们提出，要我们写信调部队下山改编，当遭我们严正的驳斥和拒绝。到南昌找到了陈毅、项英同志的住处，这时陈毅同志到湘赣边联系部队去了，不在家，在我们未见到陈毅同志以前，国民党省保安团司令还要想利用陈毅不在南昌的机会，欺骗我们说：项、陈已留言，叫我们写信回去叫部队到景德镇集中改编，当场被我们严词拒绝。

不几天，陈毅同志到南昌，我们向他汇报了工作，他完全同意我们的警惕性，并介绍了闽南游击队在谈判过程中被骗缴械的教训。这时陈毅同志和李步新、江天辉同志一同来到祁门石灰山，陈毅同志给我们指示和勉励，要我们迅速将部队集中进行整编，加强政治教育。不久，我们将根据地原皖浙赣独立团熊刚所带领的部队和阙怀仰所带领的一支部队，共约五十余人，一挺机枪；王丰庆、李步新、江天辉、杨汗生所带领的独立营和活动在祁门、浮梁、婺源一带的游击队一百五十余人；二挺机枪；田英同志带领的在都（昌）湖（口）波（阳）彭（泽）一带活动的游击队一百五十余人。上述各地部队共三百余人，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

一九三八年一月，特委再次派李步新、杨汗生等同志到南昌参加会议，汇报了部队的联系和集中的情况及与各地党组织联系的情况。经项英同志指示，为了继续联系皖浙赣边区一带尚未联系上的部队和地方党组织，将皖赣特委改为皖浙赣省委。会议结束后，陈毅同志再次同李步新、杨汗生等同志来到浮梁瑶里，中央并派来陈时夫、朱辉、李华楷、张振东（又名张福前）、刘玉林和袁大鹏等九同志到边区工作。陈毅同志来后，传达了中央指示，并召开会议，

对王丰庆被俘后所犯错误，作了严肃的批评和处理，撤换了王丰庆皖赣特委书记的职务，同时宣布成立皖浙赣省委，以李步新同志为书记，委员有江天辉、陈时夫、朱辉、熊刚等同志。

省委为了处理部队改编后若干善后事宜(如安置残废人员、联络我红军烈军属等)，经研究决定：在瑶里设立留守处，李华楷同志为主任，党内是祁(门)浮(梁)婺(源)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江天辉同志当时任书记，江调走后，李为书记。在鄱昌设立了留守处，田英同志任留守处主任(负责领导鄱(昌)湖(口)波(阳)彭(泽)地区党的工作)，以后国民党背信弃义，派伪军包围我留守处，田英等同志英勇牺牲。在景德镇市设立"新四军驻景德镇办事处"，朱辉同志任主任(党内负责联络指导各地党的工作)。

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这时部队已扩展到五百余人，三挺机枪，二百多枝长枪，三、四十枝短枪)全部集中瑶里，在瑶里召开了抗日誓师大会，群众杀猪宰羊欢送。会后，除留下一部分短枪队和工作人员计百余人外，其余部队均开往岩寺，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

从此，我们这一支曾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队伍，走上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 开辟闽东北游击区

饶 守 坤

## 一

一九三五年，闽北敌后游击斗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敌人四、五个师配合地方保安团队，进入苏区，对苏区进行残酷摧残的同时，又以密密麻麻的碉堡结成封锁线，把坚持在闽北的红军部队和党政机关，紧紧地压缩在崇安县境的山区内；还派出重兵，不停的搜山，妄想连困加"剿"，把我们消灭在武夷山区。我们在反包围中和敌人纠缠了一段时间，虽然没有受到什么大的损失，但被动的时间多，形势越来越紧张。看来继续集结在这狭小的圈子里，已是非常危险了。

二月下旬的一天，整个闽北独立师的团以上干部，都聚集在一家土豪的厅堂里、研究部队新的行动。特委书记黄道同志分析了当前的处境后，接着传达了特委的决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调动和消灭敌人，我们必须抽出一部份力量打出去！当时，黄道同志通俗地解释这一决定说："敌人不让我们安安稳稳地呆着。好，我们就跟敌人换换防——你搞我的家，我也搞到你家里去！"

打到外线去，开辟新区，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这一决定是大胆、主动的，无疑也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应该向哪里打呢？我们聚集在黄道同志的周围，围着一张地图，仔细研究起来。

当我们俯向地图细看时，才更清晰地理解到我们所处的境地是多么困难：号称闽北苏区首府的大安街，已被敌人占领；从崇安到铅山，一道严密的封锁线牢牢地扣住了我们活动的山区；西南面的资(溪)、光(泽)，贵(溪)地区也已被迫撤了出来，有的变成了游击

区，有的已经变成白区，我们所能活动的地盘，只剩下崇山峻岭中寥寥的几个村庄；说准确些，只不过是在敌人重围中的几个山头罢了。

考虑到出击的去向，大家的注意力不约而同地集中到驻地的西面，那里是老区。提起老区，谁都涌起一股怀恋的感情，在座的人差不多都在那里战斗过。那里有和我们同生共死多年的革命群众，有我们指战员的家园和亲人；群众条件好，地理熟。但是也不行，因为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正在那里疯狂地“清剿”。再看看北面，一条绵密的封锁线横梗在那里，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即使突了过去，前面又是一条铁路；靠近敌人统治的心脏地区，要展开活动确是困难的。还有一条路，是向东北、进入浙南。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留下的部队，正由粟裕、刘英同志率领在那里活动。我们可以与他们会合；但是，这样做，容易把敌人“带”了过去，增加了对浙南方面的压力。

绕着崇安转了一圈，最后决定：向东南，越过天堂山区，到闽东北的松溪，政和，迪口一带去。这一地区在古田以西，南平以东；东临古田溪，西滨建溪，南靠闽江，方圆约有一百余里。这里完全是新区，人口比较稀疏，红军影响也小，困难自然很多，但也有有利条件：（1）地处闽东、闽北、浙南三个游击区之间，又是一带山区，地形较好；（2）估计敌人正集中主力于闽北苏区，这里的兵力不会太多。如果我们用一定的兵力开展活动，打开一个局面是可能的。

任务确定后，接着研究兵力使用。特委决定：成立闽东北分区，将我从二团调出任分区司令员，派原闽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王助同志任政治委员，组成军分区机关，带二、三两团（小团）前去。

## 二

一个漆黑的夜里，我们告别了特委机关和留在原地坚持的兄弟部队，踏着武夷山区的密林小道，插过崇安、浦城间的封锁线，向

闽东北新区挺进。

走了没有多久，我们的行动被敌人发觉了。敌人调集了一部分主力和民团，沿途阻截我们。为了争取时间早日到达指定地点，我们竭力避免与敌人作战。尽管如此，一个多月内还是打了二、三十次仗，绕道行军七、八百里，才到达了吉田以西地区。当即我们留下三团在北面的松溪，政和一带活动。我和王助同志带二团留在迪口地区。

正如临出发前黄道同志指示的那样，在我们面前将遇着一系列的新问题。自然，好的条件是有的。事实证明，这里敌人比较薄弱，只有刘和鼎的一个师，他们要守备这样宽阔的地带，只能驻守在较大的城镇里，这对我们的威胁并不大。但是，困难也不少：首先是地主武装和反动会道门武装的袭扰。他们一见到我们就打；对我零星的部队包围追击，对我大部队则采取小股袭扰；而我们初到这里，地形不熟悉，社会政治情况不了解，再加上福建话不好懂，便不能不处处被动。在开头一两个月的时间，几乎没有一天不打仗的。尤其困难的是当地群众对我们一点也不了解，而且由于长期受地主武装的欺骗和反动会道门的愚弄，跟着他们来反我们。我们一进村，人都跑得干干净净，根本见不到老百姓的面。这时，我们落进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每天行军的时候，说不一定什么时候会打来一排枪，队伍里便倒下几个同志；有时，突然从山梁上涌出一群人来，身穿奇奇怪怪的法衣，口喊杀声，手扬梭标大刀，杀上前来；我们且战且走，好容易来到一个村庄，想宿营或者休息一下，村子里却空空荡荡，想吃饭买不到粮米；想走路，找不到响导；在连续进军和遭遇战中，有了近百名伤员，没有人抬，也没处安置……。在几年的革命战争中，我们从来没有一天离开群众，现在第一次尝到了没有群众支持的滋味：整个部队象掉进了荆棘丛里，四面受刺，却坐不下来，苦恼极了。

这样被迫拖了大约两个月，转遍了五峰山到白云山之间的大小村庄，伤员增多了，弹药快消耗完了，餐风露宿，疲惫不堪，别说

站住脚，甚至连部队的生存也受到威胁。在这艰苦的情势下，部份同志对这次开辟新区的行动，开始动摇了。有的说："象这样，还想开辟根据地，拖也拖垮了。"于是，有的主张打回去，有的主张到浙南去，有的主张到闽东去……。我们也很着急，并感觉到应迅速转变活动方式，但这些同志的提议都是行不通的。我们的任务是开辟新的阵地，以新区的游击战争来策应其它苏区的斗争，决不能把敌人引到苏区去。两个月的实际斗争教训了我们：眼前的处处被动，并不是这次行动带来的，而是由于我们对发动新区群众的勇气不够，信心不足，没有很快和当地群众结合起来。于是，我们劝说了那些动摇的人，并转变了工作方法，决心深入到群众中去，把被敌人欺骗，蒙蔽的群众夺过来。

争取群众的斗争开始了。我们确定以迪口为中心开展活动。遵照毛主席"集中以应付敌人，分兵以发动群众"的原则，白天，部队以连、营集中起来，迎击来犯的敌人；晚上，便分散开来，到村庄去找群众进行宣传、调查。能找到一两个、三四个人谈谈也是好的。

我和王助同志也分开了，各带一部份人，分别到群众中去。

我带着一个侦察班、换上便衣，来到一个名叫乌地的村子。这是一个约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村子里只留下几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子，我们找到他们，开始集体谈，以后又一个个地谈，向他们说明我们红军是为穷人打仗的军队，并解释我们的政策。从晚上七点多钟一直谈到下半夜三点，总算使这几位老人对我们有了些了解。他们说："早知道你们是这样的队伍，我们就不跑了。"并表示一定去把村里的人们喊回来。

这次谈话，帮助我们了解了附近的政治地理情况，知道了那些家是土豪，以及会道门的组织和活动情况。这时，我们心里顿时觉得亮堂、踏实了许多。更重要的收获是使我们得到了深刻的教育，也更明确地认识到：不管敌人如何进行恶毒宣传，统治得如何严密，群众还是可以争取的，问题在于你是不是坚定地相信群众，并坚决地

深入到他们中间去。

普遍的宣传调查，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群众陆续回来了，见到我们也不再逃避了。我们又根据调查，开展了打土豪的工作，没收土豪的财物、粮食，分给贫苦的群众。这样，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了。虽然，由于地主武装统治严酷，又有会道门的活动，群众还不敢公开地接近我们，但半夜拍门总有人开，还可以买到粮食和用品。我们的生活解决了，而且有了耳目，行动也主动多了。

## 三

站稳了脚跟，我们便可以开始着手第二步工作——对付反动会道门了。一连几天，王助同志和我都在研究这事。研究应该怎样做才好呢？这时，我们十分希望得到特委的指示，但是和特委的联系早已断了。原来带来的一部电台，因为军区司令员李德胜的叛变而失效了，派人联系也过不去，一切问题只有自己设法解决。当时，我们还不懂得和会道门搞统一战线，争取他们，但从两个月的接触中，凭直观觉感到这样尖锐地对立，硬拼苦打下去不是办法。我们知道，会道门武装成分主要是被欺骗利用的穷苦人民，在战斗中必然要被我们打伤打死一些，这对我们没有好处，反而引起仇恨，招致群众反对我们；而且我们也免不了要有伤亡，这些牺牲是毫无价值的。经过分析，我们看出会道门武装与反动的正规军、地主武装是有区别的，况且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是能争取过来的。

争取会道门，是从团结上层和瓦解下层两方面着手进行的。我们从群众中了解到，这一带会道门武装头子姓林。于是，我们一方面积极地进行下层工作，教育群众，争取群众脱离会道门的控制；一方面找关系和姓林的联系。

我们知道和这些人打交道，单靠交往、谈判是不够的；必须结合军事压力，充分显示我们的力量才行。于是我们决定在他们进攻

的时候，集中力量组织一次战斗，杀杀他们的气焰。在乌地北面的一个小村庄里，我们设置了一个伏击圈，会道门武装一百多人来进攻了，我们把他们诱进伏击圈，一个合击，除了打死打伤，其余全部活捉了。

有了这一百多“人质”，我们便又多了一项谈判的条件。过去抓他们的人，我们都是遣散回去；这次我们全部带上，连续教育了五天。从俘虏里，又查出了头子姓林的一个舅舅，我们对他进行了教育，随后把他放回去，并带给姓林的一封信，信上表示了我们想和他停战言和，交成朋友的意思。当然口气是硬的。我们故意威胁他：“如果不明大义，继续向我们进攻，我们是不能对这一百多俘虏的生命负责的。”这个威胁是必要的，一来显示了我们的力量，二来这些人都有老婆孩子在，他们如果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这些家属也不会答应。

这一着棋很有效。被我们释放的人很快返回来，送来了林某的回信。信里说了许多好话，表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得到了这一成果，我们又趁热打铁，派了一个宣传干事前去谈判，双方达成了协议：由我出面和姓林的会见一次。

我从来没有和敌人公开打过交道，对这次见面很是发愁，便找到王政委商量。王助同志原来在福州做地下工作，福建人，很有办法，对当地情况也比较熟悉。进入新区以后，他积极地领导了宣传群众和争取会道门的工作。这次他给我出主意，告诉我见面时应该注意的事项。他说：“大胆地去吧，我们的目的就是拉住他和我们一道来反对国民党，只要站稳立场，凡是有利于这个目的的条件都可以答应。”

于是，我带上一个连便去了。

傍晚，我们来到姓林的住的村子。他们早已等候在那里。看来他们很警觉，村前村后都是人，人人都穿着五颜六色的“法衣”，围着头巾，手执刀矛。村口，一伙人簇拥着姓林的，迎上前来。这人约摸有三十多岁，中等身材，并不强健，一张黄黄的脸，唇边一抹

短胡髭，一笑便露出两排大黄牙。

喝茶，抽烟，闹腾了一阵后，我便把话头扯到正事上。从谈话中，我了解了他的身世：他是政和县人，原是个贫苦农民，后为债务所迫，便离乡背井，走闯江湖，混进了青红帮。开始是个小头子，慢慢熬上去，便控制了迪口地区几十个村的武装。看来这是个直性人，谈得很坦率（据后来了解，他谈的情况都是真实的）。

见他谈话开诚相见，我心里也踏实些了，便详细谈起来。我谈到自己经历，谈到全国形势，谈到我们的任务和政策。他静静地听着，一面咕噜咕噜地吸水烟，不时地点着头。末了，我把话引导到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问题上，我说："一切坏根子都是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这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不说别的，单说纳税、抽丁这一项就害苦了穷人。要是我们联合起来打国民党，免除人民的负担，对你的徒弟们也有好处。"我所以特别强调国民党抽丁的问题，是因为我在群众中了解到：国民党在这一带抽丁抽得很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有的连独子也抽走了；眼看劳力在减少，他们武装也日益削弱了，这是他感到最痛切的问题，我便特地以这个问题去打动他。

提到这个问题，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他立即暴怒起来，一张黄脸涨得通红，水烟也忘了抽，身子往前倾着，目不转睛地望着我说："说，你说，说下去……"。

我看这是个机会了，便进一步拿话激他："我们共产党是要解除人民的痛苦的，就是你们不干，我们也还是要干的，不过——"我故意略略迟疑了一下，"林师父为一教之长，不能眼看着徒弟们妻离子散，吃苦受气不管呀！"

"管！管！"他长叹一声，"不瞒你说，我不是没有这个心，就是人少力单，斗不过他们！"

"现在我们团结起来，力量不是大了吗？"我连忙把话接过来。"你，加上我，我们拉起手来，背靠背地和他们干！"

"对！"他啪哒一声把水烟袋扔到桌子上，伸手抓住我的手腕

"一言为定，背靠背干！"

就这样顺顺当当地把主要事情谈妥了。我们又谈了一些细节，象怎样配合，怎样联系，我们部队的物资供应怎样解决，伤员如何安置等等，并且和他郑重地约定：今后双方解决经济问题的活动，只许搞有钱的人家，不许勒索贫苦人民。

从此以后，姓林的就与我们结成了联盟，在整个游击战争期间，他始终和我们靠在一起，反对国民党。抗战爆发，我们下山时，我曾几次劝他编入抗日部队，他不干，后来被国民党骗到建瓯杀掉了。

这个同盟结成了，消息很快在群众中传开来："林师父和红军的饶司令谈和了！从今以后是一家人了。"从此我们的伤员有了安置治疗的地方，我们的衣食供应也有了依靠。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了直接公开接触群众，开展工作的机会。

有了这样的条件，我们便可以组织大规模的战斗了。这时，正好有国民党一个团从政和出动，向我们进攻，我们便和会道门武装配合，组织了一次战斗。由姓林的集中了一千多人正面迎击敌人。我们的部队则埋伏在大路两侧的山林里。按照我们拟定的计划，会道门武装和敌人一接触，随即就向后撤，敌人见是会道门的队伍，便大胆地追进山来，我们一个伏击，吃掉了敌人两个营。这次战斗，提高了我们的信心，也有效地鼓舞了他们。为了进一步团结他们，我们又将缴获来的物资送给了他们，甚至还给了他们一部分枪支。

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我们更广泛地展开了群众工作，把部队分到各地去，肃清地主武装，打土豪，分地主财物，开展抗税反抽丁斗争，进一步把群众组织起来，并抽调干部、建立了区、乡政权。

这是一个大发展时期，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开辟了松溪，政和，古田，迪口等四五个县的地区。敌人的主力都集中在福州、建瓯等大城市里，地方民团打不了我们，我们则放手发展，部队也扩

大了，许多青年农民纷纷参军，从原来的一千三百多人，增加到二千多人。于是，闽东北这块空白地区，便成为我们的游击根据地了。

## 四

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宣告结成，但在南方各游击区，却开始了更艰苦的日子，闽东北区自然也不例外。

十二月下旬，正当我们进一步巩固游击区的时候，敌人背信弃义调动了刘和鼎两个旅，国民党七十九师、十二师和两三个县的保安团，突然涌进了游击区。这块纵横不过百里的地方，一下子涌进了三个整编师和地方部队共好几万人，根据地就象一棵绿树遭到了严霜，顿时变色了。

敌军的"清剿"是几种手段同时并行的，首先是疯狂的屠杀，抢掠、残酷镇压；再就是碉堡政策，二里一堡，三里一碉；所有的集镇和村庄都设据点，驻上军队，以封锁游击队的活动。尤其毒辣的是"移民并村"，所有小镇、村庄的居民都迫使迁往大镇上，编保甲、搞连坐法，以此来切断我们和群众的联系。

对于敌人的进攻，我们不是没有准备的，但敌人如此集中，来势如此凶猛，特别是这一套手段，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外。当时，我们的游击区还不很巩固，基层的党政组织和武装还没有普遍建立，或者建立了还没有巩固。我们的部队也分散在各地活动，没有集中起来，因此对敌人突如其来的袭击难以应付，一时处于困难的境地。部队被切断了，收不拢来，有些单独活动的部队被消灭了，保存下来的部队，联系不通，情报不明，物质供应不上……活动越来越困难。

开始，我们估计敌人这样搞时间不会太长，还想改变这个局面，连着组织了几次战斗。

一次我带五六十个人，在乌地一带活动，发现敌人一个连正在

向我们进攻，看看敌人没有发觉我们，便决心揍他一下。当时我们估计敌人扑空之后会按原路返回来的，于是我们便在乌地南面五里路的一段山中隘路上埋伏起来。一个突然袭击，搞掉了敌人一个多排，其余的被打散了，缴获了七八十条枪。

又一次，我们听说敌人有一个运输部队，从古田到迪口去，这又是一个好机会。我带两个连连夜赶到离迪口三十里的小溪镇去埋伏。后来发现敌人有两个连的兵力掩护，物资在中间，要想消灭他们是困难的。于是我们瞅住敌人先头部队过去的机会，从中间打下去，猛扑敌人运输队，一下子搞到了一些粮食、弹药，等敌人展开阵势后，我们却早已撤出战斗转移了。

象这样一些战斗，虽然挫伤了敌人，也多少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但终究不能改变整个形势。敌人仍然步步逼进，到了一九三七年二月间，实在呆不住了，我们只好退到深山里去了。

进了山区，斗争更艰苦了，由于和群众断了联系，生活供应完全断绝，吃穿无着落。有整整两个月，我们没有见到一粒粮食，搞东西吃成了我们的首要任务，竹笋、树叶、野菜、野果，山林里凡是能够下肚的东西，差不多吃光了。野兽成了我们“作战对象”，人人成了狩猎的猎人，打到一只野猪、野羊，就算是我们的一个不小的胜利。穿的只有一身旧的单衣短裤，长期的爬山钻林已经成了一团褴褛，穿草蓑衣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谁有一件单衣就是富有了。鞋子早已磨完，就连穿草鞋的也不到三分之二。就这样，我们度过了高山的严冬和阴湿的雨季。冬天，大家钻到树下的枯草里，一场雪来，人人都成了雪人；雨天，就泡在水里，让水滴在身上横流。同志们的体质一天天坏下去，病员一天天增加，但治病的条件是没有的，只好找些隐蔽的山窝窝，这里放三个，那里放二个，给他们留下点野菜和几根火柴，让他们自己与饥饿，病魔和敌人的“围剿”作斗争。过了些日子，敌情缓和的时候，我和王助同志就割点干草，带上点兽肉和野菜，到各处去转转，带回了些病痊愈的同志，也掩埋了些被疾病和饥饿折磨而光荣牺牲的烈士。

自然，我们也想尽办法改变这种境地，只要有机会，我们就要活动，就要解决生活问题，还要告诉人民：红军游击队还在。记得有一次，我们派出一支三、四人的小部队，由特务连连长刘德仔带领，从乌地山上一下插到浦城、西平之间的西溪镇去，一夜跑了七、八十里，打了一家大土豪，然后带上筹得的二百多元现洋，每人背上二斗米再赶回来。但这种活动是冒险的，有时候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在这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人们的政治表现和革命意志是不尽相同的：虽然绝大多数同志表现很好，但有些卑鄙的懦弱分子，吃不得苦，便不辞而别；也有另一种人，表现了盲动情绪，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提出请求："去跟他们拼吧，打死也比这样饿死强！"有的甚至骂我们是"怕死鬼"。但是，我们还是拒绝了这种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拼不得啊！

我们批判了那些可耻的动摇分子，说服了这些拼命主义者。全体人员在党的"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下，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熬过了半年最艰苦的日子。

## 五

在这艰难的时刻，支持我们的是对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早在上山以前，看到敌人的标语和打土豪时弄来的报纸，上面都透露了国共合作的消息，报上也连续报道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情形。当然，要从敌人宣传品上得到对形势的真正认识是不可能的。究竟是什么事情，党的路线方针有了些什么改变呢？我和王助同志看着这些消息，分析来分析去，弄不出个名堂。

唯一能够弄清形势的办法，便是和上级党取得联系，但这也同样困难——这已是一九三七年的八、九月间，我们和特委断了联系已经一年多，这期间只知道他们还在武夷山区的崇安附近活动，连续派了几次人去，不是因为敌人封锁得紧过不去，便是不见回音。

他们还在不在？在哪里？

多次取联系的企图都没有成功，但我们没有放弃这个希望，仍在想着种种办法。一天，我把大家召集起来，一道讨论怎样去找特委，同志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自己的计划，一个又一个的计划提了出来又被推翻了。最后，一个同志提议得到了大家赞同：各人把自己崇安老区的关系交出来，派人去找红军家属。红军家属是不会反动的，一定有人和革命组织保持着联系。

于是，我们派了一个干部，偷偷地潜回崇安去，找到了过去的一个乡苏维埃主席。这个革命老同志儿子在独立师当战士，他被敌人抓去坐了三个月的班房，出来之后仍然继续与特委联系，坚持工作。通过他的关系，找到了特委（这时已改为省委了）。

和省委联系上了，去人带了黄道同志的指示来，说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关于南方各省游击区的停战问题，也已达成了协议，要我们立即到铅山石塘街集中。

接到这个指示，我们当即派人把分散坚持在各处的零星部队集合起来，然后折转向北，按省委指定的方向前进。回忆两年半以前奉命南下的时候，我们共有一千三百多人，而这时集中在一起也不过只二百多人，但这是经过战争考验的精华。这些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辟并坚持了闽东北游击区，把红旗牢牢地插在闽江北岸的丛山峻岭中；也就是这些人和在崇安、建、松、政、资、光、贵各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一起，组成了新四军三支队第五团，成了抗日战争中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 回忆资光贵的革命斗争

刘 文 学

## 一、恢复资光贵革命组织

我是由中央苏区到闽北军区，担任邵武独立团政委，来到资光贵一带的。在一九三五年夏天以后，闽北党委决定在贵溪、资溪、光泽恢复革命组织。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成立了资光贵中心区委，分别以光泽的柴家，贵溪的昌坪，白沙坑、冷水坑等为两个基本地区。这个时候，中心区委由我担任书记，宣传科由曾广贤负责，民运科由叶金太同志负责，青委由夏润珍负责，中心区委之下设有冷水坑区，区委书记叶金太；陈坊区，区委书记鲍永泉；昌坪区，区委书记曾广贤(后叛变)。在贵南划分了三个区委组织；光泽县划分成立了柴家区，区委书记姓谢(做裁缝的)。

一九三五年底(或是一九三六年春)，闽北区党委派吴先喜同志为代表来我区，决定撤消中心区委组织，成立资光贵中心县委组织。中心县委书记由我担任；下设组织、宣传、民运、财经四个部和一个青委，均由原中心区委委员，各科科长担任。财经部长由一个别名叫铁思的贵溪人担任。

中心县委仍然以昌坪、白沙坑、柴家、冷水坑等地为中心地区。

一九三六年春到一九三七年秋，地方党组织仍是资光贵中心县委，县委委员由四个人组成，当时有我和鲍永泉，原区委书记有二个是县委委员。

这时，革命组织逐渐发展和巩固，不断扩大。那时，发展党团组织是面向贫雇农的，党员的标准和要求，是按照中央苏区党章规

定的，要有三个人介绍。雇农入党没有候补期，贫农三个月候补期，中农六个月候补期，富农不吸收入党。团的组织也是同样。组织发展工作极为严格，采取个别发展的形式。三个人可为一个支部，支部与支部之间不发生联系，只是与区委联系，并有专人负责联系工作。因形势需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严格党的组织纪律是必要的。我党纪律是严的，党团费在困难中按期缴纳，不过数额不限定，全由自己向党交纳。经费统一上缴，就是打土豪有余的钱，除了规定的供给外，不能有什么浪费现象，多余的经费要上送省委。如果交通被敌人截断，就把多余的钱埋藏在山上，不使它落入敌人手里去。

由于组织机构健全，深入群众工作，驳倒了敌人虚伪宣传，我们日益巩固和坚持了该地区的斗争。

一九三七年春，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向我们进剿，企图消灭我们。后来，在国共合作，开往前线抗日的决定中，我九月间带领部队，离开资光贵地区，开往光泽北乡集中。后统一在省委黄道同志的领导下，又到铅山县石塘镇集中，与一分区饶守坤军队会合，改编成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团长是饶守坤，政治处主任由我担任。

一九三七年冬，我们开赴皖南岩寺一带，向敌后挺进。

我们下山后，留下了叶金太和夏润珍等二十多人，负责资光贵地区的工作。闽赣省委留下了曾镜冰同志负责。这些人坚持了游击活动，直到一九三八年春，这块地方还是很好的（以后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 二、游击队开展活动情况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从闽北黄坑镇来到资光贵这一带时，带了七、八十个人，各备有武器，到中心区委和中心县委成立时，这里的红军游击队也建立起来了。

闽北地区自从黄立贵(独立师长)在邵武某地牺牲后，部队受到很大的损失，马长炎率领突围出来的一部分队伍，来到我们地区。后来便成立了红军游击队，队长姓张的(名字记不得了)，我兼政委，游击队共有一百余人，一百多支枪，并有机关枪等。一九三六年冬，我们出发攻打文坊某地保安民团，由于张队长骄傲轻敌，相反受到敌人袭击，使部队受到损失，机枪全部损失，只剩下一些步枪，这样我们将张送往省委处理，纵队便由马长炎同志负责了。

我们游击队在资光贵活动是非常艰苦的，夜间出来活动，一面配合做地方工作，一面打击反动派的地方武装和土豪劣绅，甚至乘机骚扰国民党正规军(五十二师)。我们游击队的活动大大影响了群众，也使国民党江西，福建的反动政府惊吓，国民党政府调动各县反动民团和江西保安团(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团)，向我们展开无数次大小搜山"围剿"，还修筑了碉堡，实行移民并村，保甲联坐，以及一连几个山头围剿的方法。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国民党正规军五十二师，由光泽过来，我们与他们在柴家、昌坪、峰山等地打过一仗。

那时，反动派每年最少有四五次较大的围剿，一围就是二三个月之久、并建造土炮台；大道小径，山顶山脚都驻兵。当时我们的力量是很小的，土炮台也无法打它。但是，我们还是想出了很多办法，从战术上来战胜敌人：我们采取白天隐蔽，化整为零；人员枪支分散到各区委，深入敌后活动，以及打土豪筹款等等。（那时我们是有钱的，打土豪来的银元，埋藏在地下，还供给闽赣省委的经济。）有段时间，我们与省委断了联系，省委以为我们不在这个地区了，后来又从反动派报纸上发现我们仍在这里活动，一九三六年某月，吴先喜带了一个团来我们这里，行动了半个月左右就回福建去了。

我们化整为零，就是深入到敌人白区去活动、发动群众，趁机打击地方反动派和民团。当时，我们的组织生活，总结工作和布置任务，都只能以区为单位进行，要召开什么大会是没有条件的，在

紧要关头只由领导同志集中座谈一下，进行研究，如何对付敌人。临时记录也得在会后烧掉，事后大家行动，分别领导就是了。

当时，每区带十至二十个人分开活动，我们既是战斗队，又是武工队，白天躲在山上睡觉，晚上下山和群众接近，并相机打击土豪和地方反动武装；当敌人一发现，我们就又分散开；敌人到冷水、昌坪一带来，我们已经到了福建；当福建敌人来围剿，我们又回到贵南游击根据地。

我们活动中的主要原则是：保存自己有生力量，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持该区的游击斗争。我们在和敌人的斗争中总结出一套对敌斗争经验：因为敌人在围剿前，必须发动几个县的反动武装来配合(因我们活动在几县交界之处)，可是反动地方武装和封建军阀一样，各守一方，有着矛盾。我们利用他们的矛盾，在他们空隙中活动，等他们配合好了(但总有矛盾的)，我们也掌握了情况，就可以使敌人扑空而回。因此，我们的活动，完全是根据敌人的行动规律而采取的灵活战术；当敌人退了后，我们就选择地区发动群众，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抽壮丁等等。同时，找粮食，分散藏放，应付敌人的再次围剿，使我们今后的活动能处处找到粮食，处处有锅做饭吃(锅也预先埋藏好了)。但是，一般情况虽然是这样，如果围剿时间长，兵力多，我们就得吃竹笋，野菜度日，白天则藏在丛山之中。

在每个地区活动，我们都严格执行毛主席拟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经常检查官兵关系，党群关系是否保持紧密。那时提出口号是：“没有群众，就没有我们的生存，始终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后来，敌人采取毒辣手段，切断我们与群众关系，强迫群众移民并村，把白沙坑、昌坪、柴家等地的群众，集中到冷水坑附近。我们也采取秘密的办法，去与那里的群众联系和解决群众的困难，如设法砍伐地主们的杉树去卖，再通过群众帮助买盐买布。每次少买点，并给群众工资，使群众愿意帮我们做事。每年秋收后，都有浙江佬上山做香菇，我们又通过他们了解情况，买东西。这

样，反动派就无法限制我们了。

为了坚持资光贵根据地斗争，当时，我们对国民党地方组织人员，也采取了各种策略和方法：甲长一般不动他（绝大部分是中农和富农，也有少数地主），要他们做三条：1.不压迫老百姓；2.保障我地方工作人员安全；3.不走漏我们的消息，红军游击队来了不能去报告，等我们走了一二天，才可以去报告。我们在敌后活动，要多报我们的人数、武器；我们在接近我们中心地区活动，则不准报。如果违背了这些条件，我们就要没收其财产，假若我们工作人员受了损失，就要他们双倍偿还。这样，甲长一级被我们基本掌握了。对保长要严一些，除了做到甲长的那些条件，还要加上三条：1.敌人进剿的情况要报告我们(人数、时间、地点、枪支、番号)，如果敌人来了，没有报告我们，要他们负责；2.要尽量减少老百姓的苛捐杂税；抽壮丁要尽量用钱到外地去买；壮丁逃回村后不准追查；3.我们工作人员在你保工作，要保证安全，走漏消息要严格处理，对于我工作人员一般活动不能报，假若违背了这些条件，查明了情况，要严厉惩处。

对地方上的反动头子，我们就不象保、甲长一样对待了，而是坚决镇压(个别联保主任按保长条件，可不以镇压办法处理)。为了使这一办法得到实现，我们对一些反动顽固的保、甲长，杀掉了几个并出布告宣传。就这样，一大批保、甲长也被我们利用起来了。

我们坚持斗争的主要一条是，依靠群众，每当夜里出发时（计划去某地打土豪或消灭反动地方武装，地方工作人员事先就秘密地通知党团员和基本群众），集中许多群众一起去，我们枪虽然少，可都吓坏了土豪劣绅和地方民团，也壮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声势。在打土豪时，我们把一些财产分给同去的群众，使他们也直接得到一些利益。

# 对金资贵苏区革命斗争的片断回忆

陈 仁 洪

## 一、红军活动情况

一九三五年二月，独立师在闽北长涧源成立，我在三团一营担任政委，营长姓惠。我们营是由闽北军区红色教导大队和军区警卫连合编的，成员绝大部份是班、排、连干部。这支部队战斗力强，一直单独在白区活动。后来，我们营改为闽北红四团一营，同年十二月，红四团在崇安县陵谷，与浙江挺进部队（原北上抗日先遣队第四纵队）合编为闽浙赣二纵队，我担任一支队政委。合编后，我们离开闽北苏区，到邵武、建阳、顺昌地区去进行活动，目的是建立苏区，分散敌人兵力；经过半年的艰苦斗争，我们建立了邵、建、顺苏区。

一九三六年，大概七月间，听说金、资、贵苏区情况紧张，上级派我们到那里去找吴先喜联系，找到后，环境好，站得住脚，就在那里活动；如果环境不好，不能活动，就回邵建顺苏区或者直接回闽北苏区。我带了一支三百人的队伍向贵南地区前进（支队长负伤没有去）。从邵、顺、建苏区到金、资、贵苏区的路途较长，要经过邵、光、资境内的一段很长的白区。一路上，我们是边打仗边行军的，八月底（或是九月初），才到冷水坑，这里是敌人窜扰金、资、贵苏区的一个据点，我们在这里打了一仗，消灭了国民党一个六、七十人的民团，同时，我们还打了土豪，把缴获的粮食，布匹分给了当地的农民。我们打这仗的目的是：一、消灭这部份敌人；二、使坚持在金、资、贵地区的游击队知道我们来了，便于取得联系。果然，这一仗影响很大，消息很快传开了。二、三天后，吴先

喜、刘文学派了便衣队来和我们联系，并把我们带到吴先喜的驻地——坂守岭(尚待证实)。这样我们便联系上了。

一九三六年九月，我们二纵队一支队，与金、资、贵苏区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共五、六百人，合编为闽浙赣四纵队，纵队长是吴德初，我仍然担任一支队政委。以后，情况就开始紧张起来了，因为，我们是一路打过来的，冷水坑那一仗影响又大，敌人派了主力部队和江西保安团来"清剿"。为了不使敌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苏区，我们转到白区活动。当时，我们的衣、食用品比较困难，因此每当抓到民团团长，就要他买药，做军衣，买鞋子和手电等等；抓到土豪就进行罚款，或者要他拿出布和食盐。一九三六年十月间，我们采取夜袭的办法，一夜突击走了一百多里，袭击了贵溪花桥镇的民团，消灭了五、六十个敌人，抓到十几个土豪。这一仗，是合编为四纵队后的第一仗。以后，我们就这样在白区展开了活动，（有时也回苏区休整）一方面牵制了敌人，减少了苏区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可打土豪筹款，扩大部队，扩大政治影响。

一九三七年八月中秋节，我们攻打饶×民团，将民团全部消灭，缴到四、五十条枪，这是我们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后一仗。

十月，我们在贵南地区下山，到铅山下渠集合；十一月正式接到项英同志指示，又到铅山石塘镇集合。四、二纵队被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五团二营，我任二营营长，马长炎任教导员。以后，我们就向东战场——浙江、江苏、安徽地区进军，赴敌后抗日了。

## 二、金、资、贵苏区情况

三六年九月间，金、资、贵苏区的形势很紧张，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了"移民并村"的政策；小村庄并到大村庄去，大村庄又驻有几十个甚至一百多个民团；我们活动面积很小，都是这里一小块，那里一小块的。我们去之前，那里只有一些游击队，只能打一些土豪，进行一些小战斗。我们去后，苏区扩大了，由原来潜伏性的活

动，转为积极性的公开活动，政治影响大，群众斗争情绪也高涨。民团知道我们来后，都集中起来，十几二十个民团都不敢离开据点出来活动。但这也引起了敌人注意，经常向这里"剿"，特别是一九三六年冬至一九三七年下山以前，国民党乘南方没有停战前、集中兵力、企图扑灭我南方红军部队，因此情况更加紧张，斗争更加残酷，特别是吴先喜同志牺牲以后，部队损失更大。但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我们始终坚持了这一地区的斗争，直至下山改编为新四军。

## 三、对敌斗争的策略问题

在对敌斗争策略方面，当时是有了改变。过去是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当时不主张这样做了。因为我们没有巩固的政权，和足够的武装来保护农民所分得的土地，今天分了田、明天就会被地主夺回去，把田分给群众，可是他们不敢要。这样做不但不能鼓舞群众的革命情绪，相反增加了他们的负担，所以我们只是将缴来的东西分给群众。另外，那时对地主的打击面也缩小了一些，过去凡是民团，地主，保甲长，一律采取打击的办法，这使那些可以争取利用的人没有去争取利用。到了一九三六年冬，我们改变了策略，采取利用的办法，提出了几个条件来争取，这些条件是：一、不向敌人报告消息，等我们走了一、二天以后才可以报告；二、敌人来"清剿"时，要送消息给我们；三、不能给敌人带路，带路要带往我们没在的地方；四、要送粮食给我们；五、必要时给我们安置伤员；六、不能欺压群众。他们做到了这几点，我们就不没收财产和打击。当时采取的这一政策，对坚持苏区斗争起了极大的作用。

## 对领导方面的看法

金、资、贵地区开始是吴先喜同志领导，后来是刘文学同志领

导，总的来说是正确的。自一九三四年主力红军北上以后，整个苏区经历了敌人长期的残酷的“围剿”，我们坚持了苏区的斗争，这说明党的领导是正确的。但在闽浙赣苏区和金资贵苏区领导方面，也有些错误，最主要是表现在肃反过“左”，尤其严重的是在一九三六年冬至一九三七年下山以前，在红军和苏区中杀掉所谓“改组派”。其实那时根本就没有“改组派”。如果真有的话，他们为什么要和我们一道，在那样长期残酷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呢？这是难以理解的。但那时极个别对革命前途认识模糊，企图逃跑或投敌是有的。由于肃反过左，以致造成相互怀疑和战斗中变相自杀的现象相当严重，错杀了很多好人，使当时红军力量损失很大。这种错误直到一九三七年十月下山，经项英同志指示后，才得到纠正。

肃反政策的过左错误，使红军和地方干部遭到极严重的损失。当时许多好干部好同志，在工作和言行上稍有一点差错，就被认为是“改组派”，受到打击。有的同志头一天带一个连打垮了敌人一个营甚至一个团的进攻，而第二天就认为他是“改组派”，被杀害了。想起那些同志被害真心痛！正如黄道同志到了南昌项英同志处，回铅山石塘镇召开的营以上干部会中所说的那样，大意是：同志们，应该相信党是正确的，但党的个别领导干部，在执行党的政策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也是有的，例如闽浙赣苏区在肃反上过左了，错杀了很多好同志，这是党不可弥补的损失，这事我要负主要责任。他讲到这里自己流了泪。他又说：也有些活着的同志为这事而受了处分，从今天起应解除这个政治包袱，使自己愉快地走向抗日战场……。的确，当时不少同志从此放下了长期沉重的包袱，深深体会到党的领导正确，真正轻松愉快地走向抗日前线。

# 回忆闽北和贵南的革命斗争

马 长 炎

我原来是给黄道同志当特务队长、教导队长，开始时在二团的二纵队任政治部主任。在一九三六年七月间，我们带了一百八十余人，又有两挺机枪(在去洋口时留下了一挺给省委)，准备去铅山一带打通贵溪与刘文学同志联系。可是，由于敌人集中"围剿"，未得成功。我们这个二纵队有个别名叫"老乡"的任队长，我任主任。这次没有打通，但与敌人交战了好几仗，双方都有损失。此后，我们便回到崇安一带，到将乐、顺昌一带活动。

在还没有到顺昌一带活动时，我们在洋口过年。这时环境很恶劣，国民党的五十二师等很多武装紧跟着我们进行"围剿"，有的人经不起困难的考验动摇起来，纵队长、支队长、排长等都开小差走了。此后，我们整编了队伍，又去到建宁活动。在建阳碰到了曾绍铭同志带的五纵队(是没有机枪的部队，力量算是较差的)。这样，便把他们编入到我们二纵队来扩充力量。没有多久，师长黄立贵同志就来到我们这里，便由他负责。柴金林任政委。刘芒(外号"小流氓")当队长。我调在六纵队当政委，带着队伍去罗昌一带活动。

师长黄立贵领导的这一支力量，在光泽、邵武等地活动。黄师长在当时非常有威信，人家称他是"黄老虎"，敌人听见是他都很害怕。不料在一九三七年六、七月间，黄立贵师长在邵武战斗中牺牲了。队伍损失极大，最后只剩下五个人(刘芒、二纵队长、参谋长、吴生茂)。那时，我们也从顺昌、将乐一带过来。敌人在报纸上大作宣传，企图瓦解我们。在这情况下，我们带了八十余人于七月底向邵武、贵溪方向出发，其目的是一方面收容，二方面打听黄师长下落。当找到这五个人的时候，我们便实知情况了。为此便向贵溪

方面去。因我们早知刘文学同志在那一带坚持活动。八月间到达刘文学那里过了中秋节(在冷水坑)，不久便回到崇安一带去。路上我们是边打边行动的。这时刘文学部队力量很大，有轻机枪等武装，据说在我们走后，部队受到损失，机枪没有了，力量小起来。

我们回到闽北在部武找到了省委，把五纵队邱××和参谋长以及刘芒，还有一个军需等叛变分子枪毙了。

刘文学的部队开始是吴先喜同志(省委委员)负责的。吴先喜同志牺牲后，便由刘文学同志和鲍永泉同志负责。这一时期中，这一地区部队日益发展，地方党组织也发展和巩固起来，保存了有生力量，扩大了苏区。与刘文学同志在一起战斗的有：吴德粗、张××、张有旺(号兵)、吴瑞生、陈仁洪等人。对于他们的具体斗争情况我不大清楚。

我知道在铅山石塘镇集合会师，编成新四军时刘文学带了队伍来(是广丰独立营六纵队的队伍来)，一共有三挺轻机关枪（省委留下的那一支、我们一支、广丰独立营一支)和二挺重机枪(是早已埋藏起来的)，扩编了新四军。

我感到在革命斗争中，我们党领导是非常正确的(省委)，从这几方面可以证明：

①在敌人残酷的“围剿”中还保存了有生力量，没有被消灭，这和党的正确领导有关系。

②党组织始终保住了，没有遭受敌人的全部破坏。

③群众始终跟我们走，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支持我们。

④分散了敌人的力量，积极打击了敌人，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只是在个别问题上还存在一些缺点：

①肃反过“左”：黄道同志在石塘街召开了一个营级以上干部会，会上也曾讲过肃反过“左”，错杀了很多人。在讲话时他流了泪，很痛心。

②在行动中有时对敌人情况估计不足，致使遭受损失。

③那时有的认为保守(在个别事情上)，但我还认为不保守。

# 闽北红军的斗争

## 马长炎

我原是挺进师的，李德胜叛变的第二天，我由挺进师送电码去闽北。那时，敌人正在疯狂地进攻我闽北，长涧源，岚谷街到处是敌人，所以关系不好找。开始挨了几顿饿，以后地方发觉，与我们联系，才在长涧源后面的大山上找到黄道同志。不久，黄道同志要我当他的特务队长，以后便一直在建宁、泰宁、将乐一带坚持斗争。

自李德胜叛变后，主力红军撤离闽北，只留下地方游击队。那里原是个老区，敌人进攻很频繁。我们的斗争条件是相当艰苦的。

三五年以后，闽北主要是黄道同志在那里负责，还有黄立贵、吴先喜、曾昭铭、曾镜冰等。以后部队分散到崇安、广丰、建宁、泰宁、将乐和闽东北(即建松政地区。饶守坤、王助同志负责)。刘文学、饶守坤、马长炎带的三支部队是地方主力，实力最强的是饶守坤那支部队。黄立贵同志牺牲后，在黄坑那边打了几次仗，杀过几个两面派的保长，敌人也把我们的侦察员杀了四个。陈仁洪同志，原在我们纵队的一个支队当政委。那时我的部队在将乐、建宁、泰宁，刘文学是在贵溪、光泽，饶守坤在建松政，王荣生在崇安(王牧鸭出身)。

黄立贵是一九三七年六、七月间在将乐、邵武交界地牺牲的。那是最艰苦的年代。我在将乐这边，黄立贵到邵武方面去。他那个纵队只出来四、五个人来。他那个部队原来是我带的，以后二纵队、五纵队合编，五纵队是邵武、建宁等地方武装编起来的。黄立贵带五纵队。纵队长是刘芒(江西人)。以后我调到六纵队当政委，六纵队纵队长是老向，是从浙江保安师俘虏过来的。他不是党员(后叛变)。

五纵队原是曾昭铭同志带的，二、五两个纵队合起来，在建宁的一座山上，和敌人打了一天一夜的仗。以后回到省委，黄立贵师长即把二、五纵队合并。

黄立贵师长牺牲是因为丧失了警惕性。一个军事指挥员太大胆了也不好，应该是胆大心细。如果黄立贵同志不牺牲，那我们的力量就大了。

那时将乐县委书记是邱子明（剃头出身，邵武人），还有个县委书记是姓陈的。我主要在那几个县活动。环境恶劣时，那几个县委书记就跟着我们走。后来我当六纵队政委，邱子明是政治部主任，部队的战士都是当地人，对地形很熟悉。部队的班、排干部基本是当地人，连以上的干部是江西去的多。那时我们作战尽在苏区范围，原因是部队在苏区有群众基础，熟悉地形，伤员由地方安排。从今天眼光来看，那是保守思想，不敢向敌后发展。敌人步步为营，占一点地盘，筑一些堡垒；再向前推进一步，我们的地区一天比一天小。同时在苏区内作战，损害苏区群众的利益太大。省委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讨论了如何巩固苏区和老游击根据地（崇安），如何分散敌人力量，和敌人打圈子，向敌人后方进攻。

后来我们分散部队，向几个地区发展，结果部队突出去了。机关向闽东突过一次，未成功，以后又回来了。他们人员不多，常常为部队筹备粮食。那时黄立贵经常带着部队出去，部队被称作"黄部"。这样一出去，根据地就好搞了。在崇安方面，敌人只有地方武装民团，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有特务队、侦察队，而且都是老兵，打垮敌人一个营不成问题。机关人少了，吃粮也少，目标也小了。

省委还交待我们：第一、打仗向外不向内；第二、掩护地方，发展地方组织；第三、想办法供给后方机关给养。部队在外面打土豪，把缴获的白银送回机关。

部队每到一个地方活动，首先即与当地党组织联系，掩护地方力量，打击敌人，镇压叛徒，帮助地方除奸。我们有伤员即交给地方，在山上搭棚疗养。那时我们与做香菇的和做纸的人关系搞得很

好，对他们的利益很重视，并常常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那时部队都在山上搭棚睡觉，比干地方工作的痛快，要打就打，要跑就跑。

到国共合作时，部队已扩大到一千多人，将乐、邵武、崇安等地组织均未遭破坏，特别是国共合作时期还发展了一批。闽北地区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与黄道同志正确领导有关。

李德胜叛变后，我们的电台丢失了，与中央断了联系，只能在敌伪报纸上看到一些消息。福建大刀会是很凶的，被我们争取过来的不少，还掩护了我们许多伤员。这说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群众始终是拥护我们的，我们也始终是爱护群众的。

我认为闽北的党组织是坚强的。李德胜司令员叛变，连一个警卫也带不走。二纵队长和几个支队长叛变，如果没有坚强的党，部队早就垮了。

闽北党对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始终抓得很紧。部队班、排干部都是经过教导队培训学习出来的。对部队经常进行优良传统教育，有空就上课，讲苏联情况，讲八路军情况（根据从敌伪报纸上了解到的材料），进行游击战术的学习，训练军事上的基本动作。敌人把我们包围在山上，我们还是坚持上课。没有饭吃吃苦菜。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不但军事训练和学习搞得很好，而且文化娱乐活动也开展得很活跃，经常演戏、唱歌，讲战斗故事，学习文化（黄知真同志当文化教员，教我们地理），学习卫生常识。讲课一般是由机关的负责同志和前方回来的负责同志担任，没有专职教员。

敌人把我们包围在山上，部队常常吃苦菜、吃生笋。福建山上吃的东西特别多，如野真真、杜鹃花、乌饭、苦珠、山粉等，共有十多种。有时还把埋掉的牛皮挖起来吃。白天生火怕暴露目标，只得吃冷食，晚上再煮着吃。天冷时，有稻草就睡稻草，搞不到稻草就割茅草晒干来睡。那时部队和群众的关系搞得很好，群众运米来或是把米埋藏在一定的地方让我们去拿。

敌人妄想消灭我们，采用了种种方法，但敌人始终没有搞垮我们。

# 闽北党同闽东党的会合问题

曾　镜　冰

在快要转入三年游击战争的时候，好象是一九三四年底，那时闽北有个电台，接到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的电报说，闽东在叶飞同志领导下，举行了农民暴动，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在寿宁、福安一带活动，要我们派人去和叶飞同志联系。

但接到这个指示后，敌人已经大举进攻了。我们被迫撤出大安，转入游击战争，设法抽人去找叶飞同志。到了一九三六年，情况有了改变，老的地区巩固下来了，新的地区有了些发展，闽北部队开到了松溪、政和、古田、屏南这一带活动；在浙西南那边是粟裕，刘英同志在活动；闽东叶飞领导的情况也较好，这一来闽浙赣三个单位也比较接近了。那时，敌人建立了"闽浙赣剿匪指挥部"，刘建绪任总指挥，统一对付我们；而我们没有统一，觉得有统一起来对付敌人的必要。同时，我们活动地区的发展，也有可能统一。所以在一九三六年×月，闽北分区委（实际是特委）决定要我和黄立贵同志到闽东去找叶飞同志。于是，我和黄立贵同志到周墩附近的官司、坂对、红桃洋等村，在一个小村子里同叶飞同志会合，把闽北分区委的意图讲了一下。

还在我们未到闽东之前，叶飞同志与刘英同志已成立了闽浙赣边临时省委，但统一后在团结上存在若干问题。于是我们回闽北汇报了这个情况。不久（大约一九三六年四月），黄道同志到了闽东北地区的洞宫山（政和和周墩交界地），与叶飞同志见了面，确定成立闽赣省委。我记得省委书记是黄道同志，省委委员有叶飞、范式人、阮英平、黄立贵、吴先喜、曾昭铭和我等人。许旺和王助是否参加省委已记不清了。军区司令员是叶飞同志，黄道兼政委，下有

七个分区：福寿一个分区，范式人负责；古屏宁一个分区，阮英平负责；霞鼎一个分区，许旺同志负责（以上三个分区原属闽东特委）；闽东分区，包括建瓯、建阳、松溪、政和、屏南一带，王助为特委书记兼分区政委，饶守坤是司令；闽西北分区，包括邵武、建宁、泰宁、顺昌，黄立贵为分区司令兼政委；抚东（贵溪、资溪一带）分区，由吴先喜负责；闽北分区汪林兴负责。省委还是设在闽北。原来的闽北党管三个分区，把闽东北分区拨给闽东，由叶飞同志代表省委和军区管四个分区。会开完后，我们又回崇安了。

闽东北划给叶飞同志领导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王助原是在叶飞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是叶飞同志在福州介绍他入党的。后来，他到上海参加苏维埃代表会，回来路过闽北被留下来。故闽东北划给叶飞同志领导是很好的。因此，说第三纵队被王助同志"肃反"收编，倒不是因为团结问题。闽东第三纵队是叶飞同志派去闽东北地区行动，归闽东北特委指挥，并不是去找什么领导关系的。三纵队原来有七、八十个人（实是一个连），开到新地区活动，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一样，开小差的很多。当时缪英是没有什么反革命证据的，只是说他破坏这一类话，怕有问题，就给处理了。这事情我本身也要负责任，因为处理缪英时，我刚刚到达闽东北，我恰在场。总之杀缪英是没有真正的反革命证据的，这是一九三六年底，或一九三七年春的事情。以后，第三纵队剩下曾阿缪等二、三十人，到北上抗日时编为一个连，曾阿缪为连长，带队到新四军内，编在五团里。所以说这个问题的性质是肃反中的错误。

闽赣省委成立后，讨论了一下就分开活动，每个地区由几个人负责坚持，实际还是各搞各的。就是这么一个组织，没有更多的统一活动。到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敌人大举进攻时，相互联系更少，就是闽北的几个单位，也是互相找不到联系。

# 收编大刀会

宣金堂

大刀会原名大道会，多分布在闽北的建瓯、松溪、政和以及寿宁、周宁一带广大农村。大刀会的宗旨是“劫富济贫，顺天救命”，他们的活动是打土豪，但有时被地主豪绅利用，又打我们红军游击队。我们在闽北建(瓯)、松(溪)、政(和)地区打游击，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同大刀会打仗。大刀会的组织名称有其独特的叫法，相当于军队营一级的编制称为布队，相当于连一级的编制称为红冠。大刀会在最盛时期达到好几万人，有一千多条枪。他们的最大头目名叫林熙明，手下有会徒一万。林熙明早年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个排长，后来从部队里退伍回家便组织大刀会。这个人一天到晚做着黄帝梦，自称为主公，称他老婆为主母。他身穿龙袍，上身肌肤刺有盘龙的花纹，项颈上成天挂着一个红布袋，袋里装着一张黄裱纸，纸上写满了如来佛祖，关圣帝君、齐天大圣等神仙菩萨的名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了这张符纸，刀枪不入，因而大刀会的每一个会徒都放着这样一张符。当然，这是迷信的，打起仗来，我们红军游击队的子弹一点也不认得它。

那时候我们奉特委指示到建瓯开辟新根据地，林熙明的大刀会也曾同我们交过手，他们也知道红军的厉害。可是，为了争取多数一致对敌，我们认为光用打的办法对付大刀会不济事，黄道、黄立贵等领导人提出了争取大刀会的主张。一九三六年二月的一天，国民党军队包围了大刀会，林熙明带着会徒左冲右突，都被敌人的子弹顶了回去，眼看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时，黄立贵带着红军赶到，替他们解了围。林熙明见我们红军帮了他的大忙，真是千恩万谢，感激不已，特别是对黄立贵，把他当做救命恩人看待。由于有这样一段关系，特委决定派黄立贵去同大刀会谈判，把大刀会争取过来。那

天，黄立贵同志带了警卫员走近大刀会驻地，突然大刀会的哨兵举枪拦住去路。黄立贵耐心地对他们进行了解释之后，他们才勉强同意带黄立贵去见主公。黄立贵见着林熙明，说明了来意，申明了我党的主张。林熙明听后哈哈大笑起来，他反问黄立贵说，既然你们要同我们合作，为什么又想缴我们的枪？黄立贵极力阐明没有此事，最后才弄清楚是他们的一个会徒造的谣。弄清了事实真相之后，林熙明连忙叫人点起一柱香，斟满两杯酒，杀了一只公鸡滴几滴血到酒杯里，两人饮酒起誓，握手言欢。当场把那个造谣言的会徒杀了。事后才知道，那个会徒是国民党反动派派进来的奸细。

经过这次谈判，大刀会同我们合作了一段时间，我们终于在建瓯站稳了脚根。可是，后来林熙明又被国民党拉过去了。有一次，饶守坤同志带了二个团的红军到政和等地开辟根据地，也经常遇到当地民团、保安团和大刀会的阻击。有一次在乌地附近一个村子俘虏了大刀会一百余人，病员伤虏给医治，经过教育把他们作为谈判的条件，并给林熙明去了一封信。不久姓林的回了信，他的弟兄表示感激，说了很多好话。事后进一步派人联系谈判事宜，并达成协议。于是，饶守坤同志带了一连人到姓林的住的村子里举行谈判。这次谈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刀会向我们靠拢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政和的敌人增加了一千人枪的保安团，大刀会马上告诉我们。我们同大刀会商量协同作战，决定由他们打埋伏，我们则诱敌深入回师阻击。结果打了大胜仗，消灭了敌人二个营。由于我们同林熙明搞好了关系，便进一步通过他广泛地向各地大刀会写信。各地大刀会都听他的话，都转向了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靠拢了。就这样，政和变成了我们可靠的后方，尔后腾出了兵力向迪口的山头，登地等方面发展，并以乌地为中心开辟苏区四、五十里。红军队伍由五百人发展到八百人，各地也先后组织了延迪独立团、松德独立团，还组织了许多游击队。

后来，闽北特委派了周国华去收编大刀会，林熙明任大队长，周国华任参谋长。后来，林熙明被国民党骗去杀害了。

# 在艰苦的岁月里

杨 金 福

一九三四年十月，敌人调集十二师和张銮基独立四十五旅、刘和鼎的五十六师、郜子举的河南纵队，周志群的十一师及江西、福建等省保安团共十万兵力，开始对闽北苏区进攻。到一九三五年二月，南路之敌已进至小浆镇，北路之敌已进至黄连坑，两路敌人距闽北特委所在地大安，都只有十里左右，形成了一个南北夹攻的钳形攻势。闽北特委决定撤离大安，转入武夷山区，坚持游击战争。

撤离大安的那天晚上，我们全体红军战士集中在大操场上，许多当地的群众包括一些妇女儿童也都跟着我们，大约有千把人左右。黄道向大家讲了话，希望留在当地的群众要想着党、想着苏维埃；他强调红军的撤退是暂时的撤退，红军一定要打回来的。黄道同志讲完话，李立三同志的爱人李诺杰同志还指挥我们唱了《拥护苏维埃》歌。最后，告别了乡亲，爬上了大安东面的高山。

离开大安，在洪溪村过春节。大约在洪溪住了个把月，由于洪溪的大安岭炮台和草鞋岭炮台被敌人占领，我们站不住脚，又撤到坑口。在坑口住了半个月左右，再转到长涧源，由于我们人多行动缓慢、目标大，在长涧源进行了编师，精简了随行家属，队伍轻装撤到温林圳住下。这时，粟裕同志率领的挺进师从赣东北突围出来，驻在车盘坑。黄道同志专程到车盘坑同他会过面。黄道同志从车盘坑回来的当天晚上，就把队伍带到王家坞住了一宿，第二天过车盘坑到桐木关的东坑住下。

一天夜里，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投敌。黄道同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向三港方向转移。那天夜里下着雨，我们的衣服都淋湿了，后面李德胜又带着敌人追赶我们，情况万分危急。黄道命令

把笨重的东西全丢下，轻装撤退。我们摸黑攀着悬崖的岩缝，拉着蔓延的树根，上了高山，终于甩开了追踪的敌人，队伍赶到三港集中。在三港我们参加了军人大会，痛斥了李德胜的罪行。黄道同志还编了一首《骂叛徒李德胜》的歌，教给我们唱。当时，我们都很激愤，恨不得抓到叛徒千刀万剐。会后，整编了队伍，由吴先喜同志任分区司令员，并派他率红四团到邵武一带活动，以牵制敌人，发动群众。同时，闽北党团分区委、苏维埃、分区司令部、政治部等机关合并为一个新的游击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是当时一元化领导的最高领导机关，完全适合游击战争的需要。

后来，我们开到北坑住了半年多。北坑是个偏僻的小村子，只有五户人家。我们却有二百多人，大家挤在几间破房子里，有的搭了草棚栖身。司令部派财政部长查水旺带人到山外搞粮食，不幸查水旺被捕，完全断了粮食来源。我们只好靠野菜充饥，黄道同志也和大家一起吃野菜，还称赞野菜是革命菜，说将来革命成功了，要把那些野菜陈列到纪念馆里去，让子孙后代们看看先辈们是怎样革命的。然而，野菜也确实难吃，没盐没油苦涩难咽，起初大家吃得很少，饿得脸黄肌瘦，司令部无线电员王文饿得躺倒在地上，连一只苍蝇爬在他脸上也无力举手去赶。生活是极其艰苦的，但红军纪律仍然严明，有一次，我挖了群众种的一棵蕃薯，挨了领导的批评；又有一次，山后突然跑出来一条黄牯，大家实在饿得慌，就把黄牯打死分吃了。黄道同志知道后，找我们去谈话，事后还叫事务长王忠华到群众家里赔礼赔钱。

一九三五年六月，形势开始恶化。独立师政治部主任王助带领红二团一个营来北坑，护送我们司令部转移到双溪口。双溪口原来有二十多户人家，敌人搜山时烧掉房屋，整个村只剩下一座破庙。那天又下着大雨，事务长王忠华要黄道同志住到破庙里去，黄道同志执意不肯，硬是把伤病员让进庙里，自己撑一把雨伞同一位战士一起站到天亮。天亮后，我们烧了半锅水喝个饱，又翻越几十里大山到达龙空。这时，大安的群众得知我们住在龙空，悄悄地送来许

多粮食和山芋。大安的群众正象黄道同志撤离大安时所说的那样，他们没有忘记党，没有忘记苏维埃，没有忘记红军子弟兵。由于群众的接济，我们总算暂时地度过了饥荒。后来我们开到大桐源，搭棚住了几个月，大桐源的山很高，站在山岗上可以看到崇安县城。这时已近年关，山上下了几天雪。人常说，高山的雪，平地的霜。我们住的寮棚象一顶大白帽子，冬茅上结了手臂那么粗的冰柱。自然，填肚子的东西就更困难了。我们都是刨开雪挖些草根、野菜过日子，许多打仗很勇敢的同志也倒下了。这一年，我们都在深山僻坞里转来转去，敌人到处筑碉堡封锁我们，逼着我们出山投降。但是我们没有屈服，尽管有时与猴子为伍，有时与毒蛇共栖，吃的是野菜、山果、竹笋，住的是山洞、寮棚，我们总算是熬过来了。我们心里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认定革命必胜。

到一九三六年初，司令部改变了威天躲山的办法，决定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由黄立贵、曾镜冰率第一团挺进闽东；黄道、吴先喜率第三团挺进金(溪)、资(溪)、贵(溪)。我们进入敌后，敌人自然不可能再造封锁线了，他们就采取跟踪追击和分进合击的办法，一发现我们的踪迹就咬着不放。我们从建瓯到建阳，周志群足足跟了我们三个月；有时我们一夜走了八十里，等敌人追上，我们又走。我们人少，周志群有一千五百人，天天跟着我们跑，我们把他拖住了。有时敌人追过来，我们走了一段路隐蔽起来，等敌人追过头，我们又回到原地宿营。有时候我们遇到有好的地形，就狠狠揍他们一顿，在建阳的界首附近，打死打伤敌人五百多人。周志群再也不敢跟踪我们了。

由于我们深入到敌后去了，迫使敌人撤离苏区，回师保驾。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崇安、铅山苏区屯兵的张銮基、邵子举正准备撤退。我们乘敌收兵之际，集中兵力在上饶甘溪附近的金钟山，伏击邵子举一个营，歼灭敌人两个连。并乘胜打击了张銮基。从此闽北根据地稳定下来了。

# 回忆三年游击战争

倪南山

一九三五年秋，皖浙赣省委成立，书记关英，组织部长刘毓标，王庆丰、江天辉为委员。由于省委的成立，统一与加强了对皖浙赣边区工作的领导，对斗争形势与任务，工作方法与步骤都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从此开始了三年游击战争的新时期。一九三五年秋至一九三七年春，皖浙赣边区无论军队与地方工作都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特别是一九三六年七、八月间，为地方工作发展最大的时期。省委下面有五、六个特委，每个特委下面都有几个中心县委。休宁、婺源地区党的组织，也就在这个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是依靠一九三四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五年下半年红军在这里活动过的群众，通过鄣公山余玉堂与休宁石圩坑胡同庆等先进分子的关系，先后发展了党的组织。

一九三五年成立休祁婺中心县委，书记是李步新，后换方启相。一九三六年二月，活动地区以浮梁陈家山为中心，这个中心县委书记是吴镇尧(外号"小老吴")

皖浙赣特委主要以婺源莒君山为中心，特委领导中心县委，有四个(休婺开、浮乐婺、祁浮休、彭湖都鄱)中心县委。祁浮休中心县委书记江天辉，浮乐婺中心县委书记叫老肖，彭湖都鄱中心县委书记田英，休婺开中心县委书记前任李步新、后任方启相。休婺开中心县委下设休婺中心区委，区委下有三个区，石屋坑区、塘堀区(婺源)、四力区。我兼石屋坑区委书记，塘堀区书记聂有寿，四力区书记××。石屋坑区下有石屋坑、田岑脚等六个支部。

一九三六年底至一九三七年初，刘建绪任伪皖浙赣"剿共"总指挥，以十余个正规师、三省保安队和反动地方武装配合，向皖浙赣

进行极端残酷的"围剿"，封锁交通要道，在大小山头筑碉堡，布下了层层封锁网，对根据地人民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除此还有一个更毒辣的办法，就是"移民并村"，强化保甲制度，实行五户联坐，还把年轻人编成壮丁队。反动武装经常化装四出侦察，在山区见房就烧、见人就抓，稍有反抗就遭杀害。国民党对群众也实行自首政策，不管男女老少都要自首。这个政策是最毒辣的，有的人的魂也变了。同时敌人对群众还实行一种欺骗办法，就是抓到一个红军奖多少钱，抓到死的多少，抓到活的多少。敌人曾这样扬言，抓到倪南山一千元、抓到谢细娇五百元。由于敌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对我们封锁，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难。当地群众的心虽是红的，但由于被敌人杀怕、烧怕了，不敢接近我们，有的也产生了悲观情绪。这时情况紧张，我们地方工作都受到很大损失，党组织也陆续遭到破坏。一九三六年秋天，休、婺、开中心县委书记方启科，就只能在休南婺东边中心区一带活动，坚持的时间较长一些，到一九三七年夏季其余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仅茶山石屋坑还能够找到少数党员活动。这里的党组织为什么会垮得这么快呢？主要是在一九三六年九月间，敌人向我里庄广山进行搜山"清剿"，袭击了我中心县委住的一个山棚，捕去了胡游击（胡是中心县委常委、红军副司令）的妻子，牵累了胡，后也被捕叛变，反过来带领敌人到处捕杀革命群众，破坏各地的党组织。

※　※　※　※

这里我再谈谈三年游击战争时婺西北的情况。红军在婺源建立的游击根据地有浮乐婺中心县委，在鄣岷山；婺东是三十里降；粟木坦是由开化秧田发展来的、岭尾、古蜀地、朝阳坑是红军经过的地方，曾做过一些群众工作；鄣公山主要是由浮梁发展过来的，以后转到西山篷，同时也有由休宁高舍、石屋坑通过亲戚关系发展到鄣公山的。总的来说，婺源在土地革命时期末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是很复杂的。

从一九三五年起，婺源的革命斗争以鄣公山为中心（三五年前

以岍嵋山为中心）西安事变后，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在鄣公山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婺源东乡主要是以开化为中心，因为那时开化红遍全县，基本上每个村都有党的工作。

婺源西北有两个县委。一是休宁中心县委（辖源川以东的地方），后来又改称祁婺休中心县委，书记是李步新（他在西安事变后调祁门工作）。当时我任婺休区委书记；一是婺源县委（辖鄣山、红源以西），一九三四年夏季设在莒莙山。县委书记吴镇清（弋阳人），群众习惯上叫他小老吴，我们下山时他还在山上坚持斗争，后来被敌人杀害；县委委员有宋金山（贵溪人）、周矮子（任团县委书记）、宋××（在浮梁东王庙被敌逮捕示众两天）、方启湘（牺牲）。县委经常活动于莒莙山、大坑、西山篷和浮梁的程家山、石灰山等地。两个县委下有四个区委：

一、红源区。区委下辖鄣山、红源（十八村）、佛子坑、源头、小汪坑、白砂坞、下村、红庙、月岭、汪平坦、十亩坦。这些地方都建立了党的组织，红源、车田还建立了党支部；车田段、方村有活动，但未建立党组织。

二、莒莙区委书记方启湘 调休宁县委书记后余淦金继任 区委书记（一九三七年摘茶时，到白山搞粮食被敌杀害）。区委书记主要住在粪箕坟。莒莙区委的范围包括大源、源口、方村、湖村、槎口、白山、白坞、松源。这些地方不但有群众革命活动，而且建立了党的组织；在我的记忆中，古坦、岭下、香岭、施岭、王家庄都没有建立党组织。白山的老百姓很好，香岭的差些，工作难以开展，但比水路、黄村好得多。白坞主要受水路的影响，黄村还建立了群众关系，水路连群众活动也没有。

三、石灰山区委书记宋金山，他主要住在石门坳、通元观，经常活动在水岚、西山篷、戴村、程村，浮梁的石枧坑、黄泥坑、程山等地。通元观、石门坳、戴村、程村、浮梁的石枧坑、黄泥坑的群众很好，姐妹坑主要受菊径的影响，地方工作不易开展，但这个区委一直坚持到我们下山。

四、角子尖区委是婺西北坚持到最后的一个。区委书记是方田贵。下辖四十里长降、源头、闹岭、湖山、梁山伯、小黄砂和里、外南山。角子尖、源头的群众很好，小黄砂群众和我们的关系搞僵了一段时间，后来关系搞好起来了。这个区委一直坚持斗争，至一九三七年四月与县委中断了关系。后来又找到了断岭山县委。

洪源区委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也掉失了。二月份我到那里，一个老关系也找不上。此时，县委先后两次到芮塔找吴灶文，没有找到。

一九三七年六月，根据地全被敌人占驻，这时只剩下小老吴、周矮子、程玉民、宋金山、汪老头、毕兴弟和石枧坑的两个交通员共十几人了；毕兴弟后因回家看孩子被敌枪杀，接着吴灶文叛变，到三七年六月后婺源县委只剩下七人了。

那时，我这个中心区（婺休中心区）仅剩下一个交通员、四个红军战士和我等七个人；这时婺源县委和婺休中心区委这两个单位总共只有十四人。但是我们却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一直顽强地和敌人作斗争，坚持到第二次国共合作。

沱川区委下属溪头、汪珩、塘窟等地。西溪头、汪珩、塘窟还建立了党支部，并一直坚持到一九三七年四月。区委聂有寿（铅山人）被俘后叛变，还带敌人来抓我们。当时我们不了解情况。敌人来了仓促应战，我中心区团委书记张松太在这次战斗中牺牲，县委书记老江（弋阳人）负伤被捕，我幸免逃脱出来；当时与聂有寿同时被捕的还有张裕才。张被俘后未作坏事。当时只剩下我和小余、汪老头、王长清、吴启盛和没有手指的管怀德等十四个人，一直坚持到抗日，除一个叛变外，现在只留下我一个人了。

我认为皖浙赣三年游击战争主要的经验教训有：

一、执行政策上过"左"，对待问题及时分析研究做得不够，同时也没有很好地采取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来争取群众。如杀余洪堂、余老五、余日兴，只是因为怕他们暴露秘密，就不加分析地杀掉了他们；对一些有思想毛病的同志本来既应执行党的政策也应照

顾其本人情况（主要指家庭人口多的同志）。但我们没有这样做，反而把他们杀了。这样就给敌人错了我们的岔子，大肆宣扬所谓共产党党内"恐怖"，因此张裕才被捕后就一直住在清华，不敢返回原地。

二、军事上的盲动和冒险，也是我们失利的主要原因。那时特委独立团营有一百二十余人，还有李步新同志领导的一部分队伍，熊刚也有三十余支枪、二百余人，那时先后攻打了休宁的上、下大连及樟前、樟坞，婺源的清华、游山，德兴的香潭，乐平的鸣山。这样东打西打，打到鲇鱼山牛角岭以东暴露了目标，敌人主力十六师就由南昌坐汽车到乐平"围剿"我们。乐平地下县委王书记被俘后叛变，向敌告密，景德镇地下工作全被破坏了。对乡、保长及地主杀害也多了些。地主组成了武装——民团，增加了我们的阻力。这就是统战工作做得不够的结果；本来那时也不应大搞武装斗争，因为当时敌人主力已撤走，只剩下保安队，我们应多做群众工作，扩大地区和做一些社会救济工作。

# 忆皖赣边区浮、婺、祁地区的革命斗争

邹志诚

我在浮梁时，年纪很小，对当时的革命活动，了解得不多。

当时我们在浮梁一带的军队有挺进队、七军团的侦察营、湖南师一连(该师没有团，共有九个连)。这三支部队在一九三五年合起来成立了独立团，熊刚当团长、宋详林当副团长、厥怀仰当主任、政委是姓张的(福建人)。合起来不久，国民党就调了十几个师来围攻我们。我们就又分散了，各将各的队伍带走了。现在看来，当时还有点宗派主义。到了一九三六年底，三支部队在休宁又合起来了，还是熊刚当团长，由刘毓标当政委。这时，关英也来了，跟着部队到婺源鄣公山找到了浮乐婺中心县委，成立了皖浙赣省委。省委管一个独立团(特委有个独立营，陈矮子当营长，杨汉生当政委)。省委的独立团向安徽宁国、建德一带去了。不久，独立团被国民党打散，刘毓标同志在浙江被俘入狱。敌人将独立团打散后，就向婺源鄣公山(老根据地)"围剿"，王丰庆只好带一些人去打乐平鸣山煤矿(当时是英国人开的)，头天打进去，第二天下午才出来，缴了四十余条枪。在回来的路上碰到国民党五十五师，就把我们搞垮了，王丰庆被俘；只有杨汉生带了十二个人、一挺机枪冲出来，到婺源西边棚找到了我。我身边那时实际上只有二个人，其余的人因为出去找米被敌人打散了。不久，我们找到了江天辉、小老吴，他们有十三个人。这时，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撤走了，群众也由山中回来种田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到祁门一带打土豪。听到群众说："现在国共合作了"，当时我们思想模糊，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合作还认为这是投降国民党。后来中央派陈毅同志来了，说明国共合作是为了打日本帝国主义，并不是投降国民党。不久，中央也来了命

令，要我们下山扩军。命令的大意是："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打倒日本侵略者。我们要保持自己军队的独立性，坚持共产党领导。"这样，大家的思想才安定下来。

部队下山，驻在瑶里做扩军工作，不多久就扩展了四百余人。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国民党抓兵，一个都抓不来，我们一号召，就来了四百多，这说明群众热爱共产党。这部分人，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熊刚当营长。不久，这支部队到安徽竹家桥，组织了一支挺进队，到江苏省镇江去打日本鬼子。后来，在一次战斗中缴了日本鬼子五、六辆汽车。这支部队以后由营扩展为团了，不过还没有第三营，这个营一直到现在都保持着。这个营从一九三七年在浮梁瑶里成立到现在，一直表现得很好，每次战斗都打胜仗，对人民的贡献很大。

我们在浮梁，祁门一带打了几年游击，建立了根据地，依靠的主要是群众。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贯彻了群众路线。为了打土豪，我们事前有详细的调查研究；对穷人的东西，我们一点都不动；如果要用，就拿几倍的钱向他们买。打土豪得来的东西都分给了群众。当时我们虽然离开了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但政策每个人都晓得；既使说不出理由来，穷富这条线还是分得很清的，没有发生腐化的现象。由于依靠了群众，群众就不辞辛苦地为我们带路，如果是国民党抓他们带路来打我们，群众就会把他们带到很远去，同时还派人来向我们报告，使我们有所提防。当时，国民党实行了"坚壁清野"、"移民并村"，环境非常恶劣。但是群众没有忘记我们，他们无法把粮食直接送上山，就利用出来做工夫时，多带一些饭给我们吃；有时带得不多，也是先让我们吃，自己情愿饿肚子。有的地方，群众被逼得并村搬走，还把粮食藏在地下，留给我们吃。没有群众的支援，我们三年的游击战争是不能坚持的。如鄣公山，由于错杀了一个人，群众恐慌了，结果鄣公山根据地遭到失败。

另外，由于对青、红帮，保长、国民党的兵，我们也做了不少

工作，收效很好。浮梁大连坑的红帮头子谢长才，经过我们再三教育，替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后来成了我们的县委书记（被国民党杀害了）。保长有很多是经过我们做了争取工作的，后来为我们通风报信，做了不少工作。有一次，一个保长带人来"剿山"（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到山上他看见了我，就摇手叫我们伏下，然后朝天打了一铳就走了。对于国民党，我们也采取二种办法：对那种坚决"剿共"的，只要我们打得赢，我们就拼命同他打；对那种"剿共"不积极的，他们不打我们，我们就不打他们。江西保安团"剿共"都是走大马路的，所以我们也不动他。浮梁保安队有个军官说："他们是混饭吃，我们也是混饭吃，何必要那么样去打。"所以我们对国民党也宣传"你不打我，我不打你"的政策。

国民党最坏的算别动队（江西别动队长张参议原是红军内的师长，叛变过去的），但他表面上也做做好人，实际上利用地方上的旧势力开壮丁训练班来搞我们。群众也相当怕。当时我们感到最头痛的也就是这么些人，对于国民党正规军我们倒不怕，因为他们没有群众基础，站不住脚，群众请一下他们的客，大吃大喝一顿就可以交待过去。有时，我们出钱，要群众出面去做，收效很好，我们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 关于挺进师第二纵队坚持浙西南革命斗争的情况

宣 恩 金

## 挺进师挺进浙西南

一九三四年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十军团（原红七军团和赣东北红十军团合编而成），在安徽谭家桥战役受挫折后，由刘英(当时十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十军团参谋长)两首长率领部分干部和战士撤回赣东北苏区休整(那时，两首长都负了伤，一个伤左手，一个伤右手)，并电告党中央第十军团失利情况。中央电示：责成闽浙赣省委由赣东北独立师抽调一个团，组成远征挺进师，到浙江省西南部开展游击战争，准备长期活动，并创建根据地。

挺进师成立于一九三五年二月间，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英，政治部主任黄富武(原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共三百余人，编成一、二两个纵队和师直属队。在粟裕率领下，从赣东北苏区弋阳县西原山出发，经仙湖村，冲破何家坝等国民党的七层碉堡封锁线，越过上饶县之灵山，强渡信江河，进入辽竹关，到达闽北崇安根据地的车盘坑，与闽北红军和红三团会师。红三团原属北上抗日先遣队第七军团。一九三四年夏秋七军团路过浙江龙泉县境时，留下一个加强营，后来就改为红三团，由洪家云政委、朱团长(后牺牲)率领在浙赣铁路以南开展游击战争，并创建游击根据地，牵制国民党军队，掩护主力通过浙赣铁路，后又撤回闽北，在那里略作休整，把原来的两个纵队、一个直属队的编制，扩编为三个纵队、一个直属

队，并成立了政治委员会，由刘英、粟裕、黄富武、洪家云、宗孟平、刘达云(后叛变)等组成，以刘英为书记。政委会决定：向浙江省西南部挺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根据地。

浙江西南部地区，由浙江省的龙泉、景宁、庆元、松阳、遂昌、江山以及福建省的浦城等县组成。早在一九三二年，赣东北红军就配合闽北红军出击，一度占领了福建的浦城县城，并休整三天。红军纪律严明，召开各界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主张、政策等，给了当地广大人民群众良好的政治印象。从此，在闽北成立了广浦独立营(群众称它为闽北独立营)，在叶营长、周政委的领导下，常来龙(泉)、浦(城)边界——龙泉的高山、水塔，浦城的浦城坑、青云山、毛洋、交溪等地区活动。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七军团又一度占领了庆元县城，在庆元县的竹口歼灭国民党两个旅。后经龙泉、浦城、江山、青湖镇，通过浙赣铁路，从安徽，转向赣东北苏区进发，与红十军团在德兴、重溪会师。留下红三团在洪家云同志的率领下，配合闽北独立团。又在龙泉、浦城、江山等县展开游击战，发动群众，建立了党的基础——贫农团，从此，在这块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浙西南地区，除松阳、遂昌、浦城等县属平原地带，出产大米，并有余粮出售外，其它地方都属山区，很少有大米，主要粮食是地瓜，苞米(玉米)等杂粮。由于是山区，这里还有木材、毛竹及药材等。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以高额地租向地主租山，种点苞米、地瓜，种了几年之后，地主要农民“插苗(插杉树苗)还山”。所以农民群众生活来源主要靠帮地主驮木材、毛竹，才能渡过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艰难岁月。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蜡烛满山倒，上岭当棉袄，辣椒当油炒，山粉当大枣”(如遇身体不舒服或生病，吃不下杂粮，就得弄点山粉打点面吃)。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当地农民的生活处境。地主老财高利重租的剥削，使当地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我们红军一到，就拍手欢迎，对“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的革命要求更加迫切。正如毛主席所说：

中国到处是一堆堆干柴，一点火就会燃烧起来。

挺进师于一九三五年三月间，从崇安出发，经浦江公路（即浦城至江山县公路），胜利到达浙江龙泉县境内的溪头，并当即歼灭驻防该地的浙江保安基干队的一个中队。第二天一早，继续通过龙浦公路，向庆元、松溪等县前进，转战景宁、云和等县，又全歼驻防景宁县内黄山、沙湾两地浙江保安基干队各一中队。我军无一伤亡。我军利用休整的两天时间，发动群众分地主的粮食、衣物等，群众欢欣鼓舞，积极主动地帮助我军架设桥梁，打听消息，当向导。在一个月之中，我军转战龙泉、庆元、松溪、政和、景宁、云和和寿宁等七县，每到一处，即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分发地主的粮食、衣物。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建立了秘密的革命团体——贫农团组织。

由于我军不断取得胜利，驻防各乡镇的保安团队闻风而逃，龟缩县城。国民党反动县政府吓得手忙脚乱，到处告急，请求派兵。于是，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集中兵力来跟踪、堵击我军。首先，我军在庆元县上田遇敌战斗半月，撤出战斗，接着，又在斋南战斗中，击溃浙保主力第一团李秀部和闽保二团马洪深部以及大刀会千余人，缴获甚多，这样迫使敌人由进攻转为防守。我军利用这个时机，将部队分散活动，做争取群众工作，扩大党、红军、苏维埃(工农兵民主政府)影响，收效很大。但敌人不甘心失败，又重新组织、调动兵力向我们进攻。于是我军收拢部队在庆元、政和两县交界处集中，选择有利于我们的地形，歼敌一路。不料，我军行至上标地方宿营，遭敌夜间袭击，我军稍有损失（电话线丢光，从此就没有电话联系了），部队被分割两路撤出战斗，第二天我军又在政和县境内集结起来了。从此，敌人就形成前有闽保团堵击，后有浙江保安团跟踪的局面。

根据上述情况，在政和县召开了政委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制定了今后的行动方向和任务。大家一致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军如集中行动是很不利的，应该采取分散行动，互相呼应，

牵制敌人，展开积极的广泛的游击战，打击敌人，创立根据地。就当时的条件来看，在龙（泉）、浦（城）一带建立根据地是比较合适的。因为，（1）早在红十军和闽北红军曾一度占领浦城县城，在当地群众中有良好的政治印象；（2）之后又有闽北广浦独立营常来这一带活动，有群众基础；（3）以后又有北上抗日先遣队路过龙浦边境，留下红三团在这带活动，在浦城县的毛羊地方和刘坑、叶岭头等地方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员关系。最后，政委会决定，主力北进，由洪家云、李重才率领第二纵队向龙浦边境一带地区活动，并派宗孟平同志随任二纵队政委代表兼行动委员会书记；由粟裕同志率领第一纵队转战于金华、永康、东阳、义乌、宣平、缙云、龙游等县打击敌人。第三纵队和师直属队在刘英、黄富武等同志率领下，仍在原地（政和、寿宁县）活动，主要是拖住尾随敌人，以让一、二纵队打击歼灭敌人。他们随后隐蔽地到达龙泉、遂昌、松阳、丽水、云和等县活动，并以松阳县的白岸（现改为玉岩）、遂昌县的枫萍、龙泉县的安岱后为中心，建立游击根据地，留下地方工作干部开展群众工作。

## 初战告捷，建政权，分田地

我们第二纵队在宗孟平、洪家云、李重才等同志领导下，从政和县经松溪县境通过龙浦公路回到龙泉县的三溪宿营。第二天继续向浦城县的党溪前进，全歼浦城县保安队驻防该地的一个分队。接着我们转向浦城县的毛洋进行休整。之后消灭了龙泉县保安队驻住溪的一个班和驻八都镇的一个分队。这样经过半个月的行动，我们消灭了这一带的反动地方武装，在龙泉、高山、岱头、三溪、浦城毛洋组织建立了秘密贫农团和农民游击队，并在毛洋、岱头、高山等地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

为了加强和统一对地方工作的领导，一九三五年六月在龙泉县上王塘（即浦城县的东坑桥上面山腰上）宣布成立中共浙西南特委

会，由宗孟平任书记，洪家云、李重才等人任委员，同时宣布成立龙浦县委，调高信全任书记，曹景恒等人任委员（其他委员名字记不起来了）。另外，纵队给地方留下了工作干部多人，很快开展了龙、浦、遂整个地区的群众工作。以住溪、高山、温坑、岱头为中心建立了龙浦区委，曹景恒任书记；以碧龙为中心建立了龙遂区委，杨矮子任书记(后牺牲)。

由于我们在这一带活动狠狠打击了反动武装——伪县基干队，敌人十分恐慌，龟缩县城，国民党赶紧抽调浙江保安团向浙西南地区发动首次进攻。我们二纵队在龙泉县的茶岙岭与敌人血战一夜，打垮他们一个营，但，特委书记宗孟平同志在这次战斗中不幸光荣牺牲。

为了保卫基本地区的胜利成果，纵队党委决定转移敌后，采取外线作战、消灭敌人的方针。为此，二纵队在洪家云、李重才二同志的率领下，经过一天两夜的急行军，跳出龙浦遂边境，进入江山、遂昌边界的胡袋口、塘岭头一带。当地群众看到我们红军都拍手欢迎。我们到达胡袋口时，群众帮助买米买菜、烧开水。我们行军经过江山县塘岭头，队伍在此原地休息，吃中午饭时，群众用自己家里的茶壶倒水给战士们喝。他们对我们非常热情，要求我们打掉驻塘源口的江山县的基干队。他们说："我带路走在前头，那些放哨的士兵我认识。"于是，我们红军化装成国民党省方军，由向导带路走在前头，哨兵一声不问，点点头，就过去了，顺利地进到塘源口，敌人还在睡午觉。我们一枪未放，就全部消灭了敌人，缴获机枪一挺，广东造马步枪五十余支，子弹几千发，而我方无一伤亡。我们在那里休整两天，并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主张、政策，将地主的粮食、衣物分给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群众说："你们红军为百姓做了好事，把这班吸血鬼打掉，我们日子就好过了，不然又要来催捐款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了，群众打早起床欢送。

第二纵队在江遂衢之间活动了三十多天，先后歼敌两个基干分队、一个乡自卫队，缴获长短枪八十余支，扩大红军七十多人（编

为一个中队)。六月间,回到了基本地区龙泉三溪、岱头村一带。刘英同志派人送信到新莲,"要二纵队立即到松阳白岸会师"。我们二纵队立即出发向松阳县方向行动,在周际地方就与刘英、粟裕两位首长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后,一起回到松阳白岸。这时,挺进师已发展到两千多人,编为一、二、三、四纵队,每个纵队设两个支队,另外,还编了一个第五支队(后改为第五纵队)。

为了研究下一步的战斗任务,在玉岩召开了政委会议。各纵队政治委员参加,经讨论决定,七月、八月各纵队开展袭击敌人城镇、多缴枪扩大红军的竞赛活动,以实际行动纪念"七一"、"八一"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会议规定部队的行动计划是:先南后北,即集中兵力,先扫除根据地周围的敌人据点,然后回师北上,分别袭击丽水、金华、衢州等县城,使敌人南北兼顾不及,以便利我更迅速地开展群众工作。这次会议又决定调黄富武同志任浙西南特委书记。这次会议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决定成立浙西南军区,由粟裕同志任司令员,刘英同志任政治委员,王永瑞同志任参谋长,黄富武同志兼政治部主任。

会议结束后,黄、王率领第五支队留在玉岩,其余四个纵队在刘、粟两首长率领下,浩浩荡荡向南开进。在龙泉县八都镇首战告捷,全歼敌人一个基本中队,切断了龙浦公路。继又在夺取该县小梅和庆元县之竹口等几个镇子的战斗中,全歼了驻当地的各一个基干分队。

取得这些胜利之后,刘、粟分开行动。刘英同志率领四纵队直逼庆元县城转松溪、政和、寿宁一线。粟裕同志则率领一、二、三纵队奔袭龙泉县住溪镇。在粟裕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全歼驻住溪伪基干队一个中队,继又化装成放木排的农民,身穿棕衣,肩背撑篙,已进到王村口敌人住房周围,控制了敌人营房门口。守在碉堡上的敌人发现我们大部队后,仓促鸣枪报警,敌人一时混乱。只见一个敌军官拼命吹哨狂叫:集合,集合……,有的敌兵跑进营房去拿枪,有的从营房往外逃。我们便衣队早已猛烈开火,打死那个吹

哨的伪军官（后查明是中队长）。我们喊声："缴枪不杀！"残余敌人纷纷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连他们的中队副逃在老百姓家里，群众来报告，也被我们活捉。

在王村口休整两天后，我们二纵队又与粟裕首长分开行动。粟裕同志率领主力攻打丽水、金华等县去了。我们二纵队由王春华、崇安佬二同志率领第六支队留在王村口、住溪一带活动，配合开展地方群众工作。李重才、洪家云同志率领二纵队第四支队奔袭衢州火车站。在这之后，敌人一个团尾随我们，在白沙岗，侦察班与敌先头部队遭遇，由于敌众我寡，部队不得不撤出战斗。于是我们绕道江山县境，与敌人周旋打圈子，最后转道回遂昌。九月初，我们回到王村口，刘、粟二位首长率领的队伍早已到达该地，并列队在王村口街上的石桥两旁，欢呼"二纵队胜利归来！"

部队汇合后，召开政治委员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遂昌的王村口和玉岩、龙泉的住溪，分别成立苏维埃，领导农民分田地（分配青苗）斗争，二纵队政委洪家云兼任王村口政府主席，黄自富（龙浦县委书记）兼住溪政府主席。玉岩苏维埃主席陈凤生。其他委员由地方群众提名推荐。各村也相应成立乡村苏维埃。这次会议还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估计敌人很可能就要进行围剿进攻。这样的估计主要根据三方面的材料：第一，浙西南的农民分配土地运动直接威胁到浙赣铁路；第二，从二纵队袭击衢州火车站后，敌人紧紧尾随二纵队；第三，侦察员得到情报，国民党调动罗卓英部精锐的十八军与闽浙两省保安纵队纠合在江山、衢州一线，准备进攻我们。当时，我们挺进师总共只有两千人。大敌当前，会议做出决定，二纵队的六支队由洪家云指挥，坚守王村口和住溪；第五纵队由黄富武、王永瑞带领坚守玉岩一带；其余主力视情况变化，必要时，撤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配合根据地斗争。

这次会议之后，我们在王村口发动群众轰轰烈烈开展了查田和分浮财运动。我们党和苏维埃干部和工作人员，在这一运动中都发扬了大公无私的精神，先群众后干部。如王村口的财政、土改委员

和农民游击队副队长等，都优先把好土地和财产分给群众。在敌人进攻的时候，带领游击队到馒头岭扎口子阻击敌人，想办法设石楼阻止敌人进入王村口。在分配土地，查田插标（即在一块竹牌上，写着此田分给×××所有）工作中，不顾敌人的进攻，仍然积极地进行。如杨柳树下的干部，肩上还背着一捆分田的竹牌，被敌人逮捕，当场杀害了！

## 敌人的反扑和我们的教训

在发动群众的同时，粟、刘两首长率领部队到达安岱后，集结待命。于1935年9月20日，敌人先头部队一个团已进到龙泉县上田村构筑碉堡工事。当天晚上，我部乘敌人站脚未稳，我军突然发起进攻，击溃了这个团，俘敌人连以下官兵四十余人。拂晓前我们又主动撤出战斗。这时我们弄清了蒋介石调遣十八军罗卓英全部，另外有五十二师、南京税警团两个团，浙保六个团，三个独立营，十五个保安大队，福建新三师及五十六师，共计有七个师以上的兵力进攻我们，明知不是浙省保安纵队。面对强敌，形势十分严重。为了保存力量，部队决定兵分三路出击，冲出敌人的封锁线。一路由一纵队向丽水、永康、义武、东阳出击；一路由李重才率领第二纵队第四支队向浦城江山方向与闽北打通联系；另一路主力两个纵队由刘英、粟裕两位首长亲自率领，渡过欧江上游，于1935年9月25日袭击龙泉县安仁镇的敌人，转战于庆元、宁县，并向浙南沿海平阳、太顺、瑞安出击，攻打并占领大学镇（今为文成县）、三溪两个重镇，但狡猾的敌军，按兵不动。

在主力部队撤走后，我们六支队（坚守住溪、王村口一线）和五纵队（坚守松阳、玉岩一线）抗击着数十万装备精良的敌军。为了争取时间安置隐蔽好伤病员，各地组织广大群众不分昼夜地砍伐路柴，封锁大小要道，延长敌人的前进时间。另外又组织游击队在几条主要的道路上阻击敌人（老百姓叫作“扎口子”）。这些战斗中，游

击队表现十分勇敢。如王村口的馒头岭阻击战，农民游击队想出了“设石楼”的原始打法，就是用木头扎成排子，放上大量石头，再用藤吊住，敌人来时砍断藤束，几千斤的石块往山下滚，四处开花，大量杀伤敌人，阻止敌人三昼夜，打得敌人四处逃窜。最后，狡猾的敌人不得不绕道从石练爬上白鹤尖，从侧翼向馒头岭进攻。当时农民游击队只有我一支步枪，其余是猎枪，在这种情况下，从馒头岭迅速撤回到独口继续阻击敌人。又如坚守住溪、母猪岭的游击队，顽强阻击敌人达三、四天之久，杀伤了大量敌人，最后敌人从墙夹迂回进攻住溪。坚守在松阳白岸的第五支队，组织农民游击队用土枪、土炮、石头等武器，到处打击敌人，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胆战心惊，他们很久才到达我们的基本区——毛洋、西坑、水塔、高山等地。

由于敌人在我们游击队的打击下吃了大亏，（因为我们隐蔽在大小路旁的树林中放冷枪，打掉就跑）因此敌人每到一地把大小路两边的山全部烧光。敌人的凶残进攻使我们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和困难，部队每天都处在战斗之中。我军的伤亡也很大。尤其是坚守王村口和住溪这两个碉堡的战斗，从清晨打到夜里，又从夜里打到天明。如二纵队政委洪家云同志率领六支队的一个大队共三十多人坚守王村口的河对面的碉堡，顽强阻击了好几天，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敌人不得不调来小钢炮，把碉堡轰垮。洪政委指挥同志们转移阵地继续战斗，在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下，部队伤亡很大，大队长是横峰人（我称他横峰佬），当场牺牲。洪政委率领剩下的同志于1935年9月22日全部撤出战斗。六支队在坚守住溪的碉堡阻击战中也打得十分艰苦，他们遭到敌人密集炮火的轰击。于1935年9月21日突围至住溪以北茶园坑，与敌人血战，支队长（崇安佬）和龙浦县委书记黄自富都身先士卒，英勇抗击敌人，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英勇牺牲。最后支队政委王春华带着剩下的同志与洪家云政委在青龙源会合。

黄富武、王永瑞同志率领第五纵队坚守玉岩一带地区。在枫坪

战斗中，重创了敌军，之后他们撤出战斗。但在柳山头遭敌两路夹击，黄率一部分同志撤出战斗，向遂昌县王村口方向转移。在遂昌馒头岭、观音岩(庙)遭敌袭击，黄富武同志受伤被捕，在丽水县城大水门沙滩上英勇就义。参谋长王永瑞失去联系，不知去向。直到第五纵队的同志们找到龙泉县的清龙源与洪政委会合之后，才得到这一噩耗。

黄富武同志的牺牲，对浙西南党的工作和斗争是一重大损失。同副参谋长王永瑞同志又失去联系，不知去向，这使部队领导失去中心，队伍失散，集中不起来，有些当地同志就潜回家去了。

今天回顾起来，有哪些教训呢？

1.当时组织发动群众成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分配土地斗争，为时过早了。因为我们红军挺进师正从江西苏区撤到浙江，站稳脚还不久，不到一年。同时浙江又是蒋光头的老巢，我们在他的窝边实行分配土地。他睡得着觉吗？必然集中优势兵力围剿，把这块正在萌芽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摧毁，实践证明，以二纵队第六支队为例，在遂昌王村口和龙泉住溪两地战斗中，敌人除了飞机外，什么小钢炮、迫击炮都一齐用上了。大队以上领导骨干，几乎全部牺牲了。

2.留下坚持浙西南斗争的部队过多了。因为浙西南这块地区纵横不过五百华里宽，留下三个支队，加上地方工作干部（大部是红军中抽调出来的连以上干部），共计约四百人。而敌人有七、八个师，八九万人，把这块地区包围得铁桶一般，不分大小路口、山头、山坳、山坑，见路就构筑碉堡、工事，派兵驻守。在山里五户以上村庄，就驻兵一连，五户以下的村庄，就强迫搬进敌人据点，叫做移民并村，把房子、山蓬都烧光，在敌人所谓“三光”政策下，我们部队整天都活动在敌人碉堡下，伤亡很重。

3.在坚持斗争中又没有注意保存有生力量，而重犯在江西苏区，反敌人五次围剿战斗中所采用与敌人碉堡对碉堡，阵地工事对工事的死守硬拼的消耗战，来阻止敌人的进攻，使自己部队在敌

人的炮火轰击下，伤亡惨重，特别是我们的领导骨干，在这种关键时刻牺牲更为严重。以上三点，我以为是我们沉痛的教训，应该记取。

## 群众支援我们进行艰苦的斗争

经过王村口、住溪战斗之后，洪家云、王春华将部队三、五个，七、八个地陆续带到龙泉清龙源、源头山（碧龙背后大山里）和浦城的毛洋、坑口、兰花蓬、金竹岗、西坑岭等一带集中，因为这一带是老区。所以群众熟悉洪政委，我们战士也熟悉群众，他们之间已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群众热爱红军，红军热爱老百姓。在那次袭击衢州车站的战斗之后，一个班哨与部队失去联系，后来回到毛洋地方，就是隐蔽在这里，等部队到来归队。因此，第五纵队失利后剩下的同志都陆续到这里来找洪政委，就是因为熟悉群众。这时我们总共集合了三十多人。在敌人疯狂的围剿中，他们进驻到大山里的西坑、黄皮等地，实行移民并村、烧杀政策，强迫群众搬进据点或在据点周围一、二里地的村子里去住。他们还在各处坳门、岭头上和三岔路口修筑了大量碉堡工事，他们见村驻兵，见路设哨，把住溪——碧龙——白岸——毛洋——福青山（庙）——浦城坑——金鸡岩——住溪这一圈，围了个水泄不通的封锁线。敌人的用心是十分险恶，企图割断我们与群众的联系，活活地把我们饿死。但由于我们红军与群众有深厚的感情，亲密的关系，群众不顾敌人的威胁，仍然千方百计上山支援红军。如源头山（即青龙源上去约十华里）的老大同志（姓名忘记了），一家被迫搬进敌人据点白岩（即碧龙的白岩），就向伪保长请假说：上山看守苞萝，回到蓬上来了，白天为我们磨苞萝粉做饭、送饭（因为我们分散隐蔽在森林里）。一天伪保长带兵上山搜山，发现老大同志蓬里（家里）的饭甑，蒸过苞萝饭，就把他逮捕带回敌人据点严刑拷打，但没有得到半点口供，最后敌人气得象疯狗一样，所谓"藏匪"，老大同志就这样被杀害于白

岩。

从此以后，群众被敌人封锁得更加严格，我们的粮食供给已被敌切断，生活更加艰苦了。同时，敌人不分天晴下雨、下雪，都上山搜山、烧山、烧蓬、烧房子，寻找我们的脚印，以便跟踪追击。这时，我们只能依靠野菜、野果子充饥。有时乘敌烧山、烧蓬的余火，烤点青芭萝、苦菜、萝卜吃，很快，九冬腊月来临了，苞萝、萝卜都被收下山了，野菜枯死了，只能寻找萝卜山，挖点萝卜下脚啃啃，充充饥。有时甚至与刁鼠争食(刁鼠能吃，我们也可以吃)。由于长久吃不到食物，同志们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大家躺着哼着顺口溜："身无冬衣夜无被，日无粮食饿肚皮，野草萝卜来充饥。敌人清剿想消灭我。同你一命拼一命，打死你一个不亏本，打死你两个赚一个。……"洪政委听到同志们的哼声，坐起来找王春华同志商量说：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围出去，找到纵队部才好。老王说，突围是要突出去，现在同志们体力恐怕支持不了，特别是原来几个身体差的同志就更难支持。但同志们听说要突围，劲头就来了，接着说："走不动的我们背走呀，不能这样饿死呀。"洪政委听到他们七嘴八舌，就说：莫吵了，不管怎样，先去找点东西吃，吃饱肚子再说，今天出发转移。我们翻过一座山再上山，望见对面的山坑里冒出一股烟，看看，不象是敌人烧山。洪政委叫老王派两同志去侦察一下。侦察回来说，是一户人家，同志们都高兴极了，有的说，这是天照应呀！等到下午五点钟(五点后敌人不来搜山，就是我们活动的时间)，就摸下山去。到了他的家，原来是一户老百姓回来收苞萝的。向他买了苞萝粉，煮了一顿苞萝糊吃一顿。还想再蒸一笼苞萝饭，磨一些苞米粉带走，准备天未亮上山隐蔽，不料又遭到驻碧龙的敌人袭击。王春华同志掩护部队撤上山时，自己中弹光荣牺牲。据说，遂昌县玉岩地区的苏维埃主席陈凤生等同志，也因下山搞饭吃。被敌人逮捕杀害，所谓"破腹"示众。

从此以后，敌人烧山搜山，见房子、蓬就烧，更加紧迫了。洪政委召集同志们说：现在敌人更加残酷了。我们要分成两班，白天

隐蔽要到接近敌人据点附近山头上去，晚上到某地集中。于是我们一班八、九个同志，就摸到西坑——黄皮岙敌人据点之间山头上隐蔽，一天发现西坑敌人据点，有两个士兵送饭到黄皮岙门敌碉堡上去，这是一个找吃的好机会呀，晚上回到洪政委身边，请示，是否可以截住敌人的饭？洪政委一听到饭字，答：截住。第二天正下大雾，到四、五点钟，我们就埋伏在半路上，等两个敌人挑着饭菜和开水，低着头一步一步往上爬岭，刚到转弯的地方，我们的同志大喝一声："不准动"！迅速把这两个俘虏拖进林子里去了。我们把饭菜挑回到洪政委身边，洪政委说：这是第一次吃到白米饭和猪肉，同志们多吃点，让身体差的同志带上一点，今晚转移。吃饱饭，当晚出发摸了一夜，我们到达了金竹岗的山岗上休息。哨兵报告，西坑那边火焰冲天，是敌人在那里烧山，机枪声也不断。我们打算在这一带(属浦城县)住三、四天，一方面是想等毛洋来的同志打听一些消息，了解敌情，确定突围方向；另一方面，这一带山茏还没有烧掉，下雨下雪可以住一下，同志们这几天吃到一些饭，需要再搞到一些粮食，进一步把精神养好。但是刚住两天，敌人就上山搜山。哨兵开枪抵抗。掩护大家撤退，有两个身体差的战士在路上支持不住，失足滚下山去，壮烈牺牲。

由于我们开始时与敌人周旋没有经验，吃了不少的亏。如敌人进攻围剿正猖狂的时候，我们就急急忙忙组织连续地突围，这里突不出，碰了壁，又往那里去碰钉子，结果遭受到不应有的牺牲。后来在敌人搜山、烧山时，又不会隐蔽，采取阻击、掩护撤退，也吃了亏。以后我们知道，敌人搜山、烧山，但他们不敢进到森林里来，只是在山岗上、山下或横路上打枪，我们可以按兵不动。必要时，敌人从山下放火烧，我们可以从中间放火烧出去。这样我们很安全，敌人看看没有动静就撤走了。这正如毛主席说的："吃一堑，长一智"。

# 敌人"围剿"失败了，我们胜利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我们二纵队、第六支队部分同志，在洪家云政委带领下，乘敌人正规军与省保安队换防的空隙，突出重围，到达江山、遂昌边境的胡岱口、邱坑口。在沿途与周公源和猪腰口反动地主武装激战一夜，又牺牲两位同志和带路的老乡。这样我们到达邱坑口时，只有十二、三位同志了。这里的群众很好。我们叫开了老乡的门，可惜这户东家的名字忘记了，但他家里房子是新建的，房内板壁还未装修好。洪政委进到房子里问老伯伯，我们是来找二纵队的（以前我们二纵队在这一带活动过，群众都知道二纵队），现在哪里？你听到消息吗？他没有回答，反问：你吃了饭吗？洪政委心中有数，他不敢讲，就答：要搞饭吃。他一面烧开水，一面从房间里拿出苞萝粉出来，说搞点苞萝糊吃吃。我们正在吃饭时，二纵队的两个伤员同志从房间里出来，叫声洪政委，你们来了。这时东家才说，是自己人就好了，你们吃过饭先到后面山蓬里去休息，中午饭叫儿子送来。就这样我们同伤员同志到后面山蓬里休息了。洪政委请他找一个人去联系纵队老李（重才），说"我要与他会合"。老乡说："我要自己去"。政委问他："你年纪大，天又冷，能去吗？"老乡答："能去。青年人毛手毛脚，不放心让他们去"。

第二天晚上，老乡同纵队部侦察员一起回到邱坑口，并带回李重才的信说，今晚他们在陆坑源（离邱坑口十里）宿营。当晚我们与李重才、余龙贵等胜利会合了。干部战士看到洪政委回来，争先向他问长问短，那种高兴、激动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纵队长李重才同志向大家讲话说："同志们，政委带回六支队同志们同我们会师，证明我们已经战胜了超过我们几十倍兵力的国民党正规军，国民党进攻围剿失败了，我们胜利了！我们红军有千百万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是不可战胜的"。接着，他又说，"同志们早点睡觉去吧。我同政委有事要商量。"同志们高高兴兴地解散了。

洪家云、李重才、余龙贵等同志当晚开会，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因我是纵队部的文书，也参加旁听。首先，洪、李各自谈了单独行动的情况。李重才同志说："自从龙泉出击，进入江(山)遂(昌)衢(州)之间活动后，遭到敌人围剿袭击。重机枪丢失，有十来个同志失去联系未归来。现在部队剩五、六十个人，一挺轻机枪。同志们战斗情绪都很高，可是子弹少得可怜，大家都为此发愁呢，没有子弹怎么打仗呀？！"政委说："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要鼓励我们的同志增强胜利的信心！这一带群众很好，只要我们做好宣传工作，向群众收买子弹，群众是会卖给我们的。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就在这一带重建游击根据地。这里群众有民国十九年(30年)农民暴动的经验教训，对红军有好的感情；在周村(江山县境)那一带，原来就是闽北广浦独立营活动的游击区。两大山脉相连(邱坑源的山脉与江山浦城交界的大阳山)，把它连起来是一块很大的地区。这里的缺点就是胡岱口离猪腰口、洋(音)溪元反动地主武装较近(到猪腰口二十里，到洋溪三十里)。但只要我们把猪腰口反动地主武装吃掉，其余的地主武装只能守土围子，不敢出来捣乱。"大家都同意政委的意见，决定重创和恢复这块游击根据地。

从此，我们第二纵队就活跃在以遂昌县胡岱口和江山县周村为中心的这一块地区。我们每到一地，首先就是向群众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和政策。这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对敌斗争经验教训，在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曾组织过农民暴动，被国民党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只要我们一提起国民党屠杀工人、农民、抽壮丁，苛捐杂税等，使我们贫苦农民不得安宁，群众无不咬牙切齿，痛恨国民党，骂国民党是刮民党。他们拥护共产党和红军，称共产党和红军是穷人的救星！因此，当群众听到我们要收买子弹、打国民党反动派，有的当场就回家拿来了，而且不要钱。说，"我们没有用场的，送给你们多打死几个国民党反动派……"；有的还通过亲友关系，帮助我们收买子弹和手榴弹。后来，甚至整箱的机枪子弹和手榴弹都给我们送来。为什么这一带有这么多子弹呢？因为一九三四年我们北

上抗日先遣队路过周村，国民党军队跟踪在周村一带宿营，国民党士兵为了减轻身上负担，把整排的子弹和手榴弹丢掉。老百姓第二天打扫时拾到很多。不几天，我们的子弹得到比较多的补充了，同志们战斗情绪更加高涨。因此纵队长李重才和政委洪家云等同志研究决定：首先打掉猪腰口的反动据点。因为这个据点最反动，直接勾结国民党，赠送枪支弹药，还敢于私设公堂、监狱，四出骚扰，敲诈民财，当地群众恨之入骨。经过周密侦察，布置进攻路线，一举攻下了这个据点，活捉了罪恶累累的伪乡队副和伪乡长。当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他们的罪行，宣传我党的政策、主张，根据群众的要求，就地处决，群众拍手称快，说：红军为民除害！

继拔除这个据点之后，各县伪基干队胆战心惊，龟缩城池。我们决定乘胜前进，奔袭江山县峡口伪区公所。目的是为了搞到一些报纸，看刘、粟两首长在哪里活动。结果打进峡口，全歼敌区自卫队。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全部烧毁伪区公所文书档案。在此住了一天，打土豪、召开群众大会，把地主的粮食、衣物分发给群众，群众高兴地说："红军烧得好呀，那些交不完的短命的苛捐杂税！"晚上我们才撤出峡口镇，并带回不少国民党的《东南日报》，回到周村一带休息。一天，洪家云他们在翻阅那些旧报纸时，发现一张报纸上刊登了刘、粟两首长袭击大学（今为文成县）、三溪等镇，当即向全体战士们传达这个消息，同志们听了个个精神振奋。他们高兴地说：粟司令员、刘政委还在瑞安！好似小孩，找到母亲一样的高兴。

我们这次去打峡口伪区公所的目的，就是为了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宣传的所谓红军已被消灭的谰言。另一面，也是要国民党登报，使刘、粟两首长知道我们二纵队还在江、衢一带活动。

由于我们这几次战斗胜利，当地群众的情绪高涨，积极性也更加高了。有的自动报名要参加红军，有的地方自动组织起农民游击队，要求我们红军派人去，领导他们打土豪、分地主的粮食衣物。如周村背后山上一个村庄，群众就是这样组织起来把地主的粮食分

掉了。有的地方，我们建立和恢复（周村早有广浦独立营在这带活动，建立过党的组织）了党的组织。政委洪家云同志，在胡岱口亲自发展一个五十多岁老农民入党，据说，这个同志曾参加领导民国十九年农民暴动，在群众中有威信。总之，这一带群众运动发展很快。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及土豪劣绅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积极阴谋策划，向革命人民围剿进攻。

## 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

一九三六年四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起江（山）浦（城）遂（昌）三县反动地方武装，配合正规军四个团以上的兵力，向我们根据地——胡岱口、陆坑源、周村、东坑一带进行围剿。当时我们部队虽已发展到一百来人，但敌人则以一个营的兵力，尾追跟踪。在东坑岭头与敌人接火打了一仗未果，撤出战斗，向大阳山方向转移。到达大阳山，洪观鼎得知，遂昌县的观音岩到敌一个团，另外浦城县海溪也已到了敌人，数字不知。这样，就形成前有堵敌，后有追兵。为了摆脱这种不利的局面，纵队长、政委决定向龙浦老根据地——毛洋方向转移。一方面，了解敌人进攻后党群的情绪；另方面要设法与刘、粟两首长取得联系。因此，在洪观鼎吃了晚饭，立即通过十八店（即海溪至遂昌县观音岩）的大路，到达毛洋岭头，当地群众的情绪还好。第二天一早把毛洋的党支书杨斋南同志请来了。他说：上次敌人进攻，党员群众都逃在山蓬里，没有损失，只是破点财，家里的东西被抢光了。最坏的算是水口那新房子的富农这个地头蛇，必要时设法把他打掉。因为他一听红军来，就要到浦城县的尤村去报告。

我们得知这些情况，因此在这带行动几天，打圈子的目的，是为了把敌人引向遂昌王村口，然后隐蔽撤向龙泉县的水塔、对头，突然通过龙浦公路，转战庆元县去浙南找刘、粟首长的。但洪政委身患病（臀部生烂疮），不能随部队行动，故从水塔经叶岭头，回到

毛洋西坑岭，决定由高信全(原是龙浦县委书记)同志，带一个班保护政委在毛洋一带隐蔽养病，我也随政委一起行动。其余二纵队在纵队长李重才和四支队长余龙贵同志率领去浙南找刘、粟两首长。不幸，李部进到马迹坑宿营，在第二天一早遭福建保安团袭击，撤出战斗继向龙浦公路方向转移，在浦城的青云山、青草阳之间，又与敌遭遇，血战一日，陷入重围。李重才同志指挥部队，坚守山头，坚持到黄昏撤出战斗。但是子弹全部打光了，在这严重的时刻，同志们毫不畏惧，端起刺刀，冲下山去，杀进敌群，杀得敌人哇哇叫。由于力量的悬殊，我们的纵队长李重才同志英勇牺牲，其余的几个同志(其中还有伤员)带着一挺轻机枪，在曹景恒(大队政委)带领下，冲出重围，回到毛洋岭与我们会合在一起。

从此以后，环境更加艰苦了。敌人不仅采用移民并村、烧杀抢的老办法，割断群众与红军的联系，而且颁布了悬赏令："捉到一个红军赏50块银元，缴到一支步枪赏30块银元"等等。敌人还利用当地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坏分子带路，进行搜山、搜蓬。在敌人的高压政策下，加上当时正值青黄不接，老百姓自己都在向地主、富农借粮掺着野菜吃，我们队伍的粮食就更加困难了。为了保存力量，洪政委决定把队伍撤回闽北、为了保持当地党的组织不遭破坏，洪政委委派高信全、曹景恒、宣恩金等七、八个同志回毛洋地区消灭敌人耳目，特别是毛洋那个反动富农分子。

洪政委带着十来个同志在原地——浦城县的党溪附近茶坪上面山蓬等候。他为了筹备干粮去闽北，派两名同志下山向一个住在茶坪水外(靠右边山脚下)的富农(名字忘记了)去买粮食，谁知道这个富农把我们两个战士抓住送到党溪敌人据点，当晚带兵袭击洪政委他们的住蓬。洪政委和他的警卫员以及轻机枪手等四位同志，不幸光荣牺牲了。被国民党反动军队抬去党溪所谓"示众"。

第二天早晨我们七、八个同志回到洪政委的住蓬附近的山头森林里休息时，只见一受伤的同志(祟安佬)隐蔽在那里。他告诉我们说：昨晚我们被敌人袭击，洪政委牺牲，我受伤滚下山去，看到敌

人抬了四个同志走了，其他同志也不知怎么样了……，我在这儿呆了一天，不见一个同志来，今天你们回来……。

当晚我们八、九个同志，经黄泥塘，到一户人家买饭吃，这个东家起床开门告诉我们说："你们快走，这里离党溪只二十里呀，前天你们有两同志被茶坪那里的人捉去，送到党溪，敌人给一百元银洋，当晚带兵去打死好几人抬到党溪街上示众……。"我们说："知道了，他捉我们的同志，不会那么好过的，以后你们看好了。现在你得搞点饭给我们吃。"他说："这里有现成饭烧热给你们吃，快走吧。"

我们吃过饭又向他买了点米走，转到另一个山头天已亮了，一看一大片苞萝山，还幸存有个苞萝蓬，还有一个苞萝仓库，打开一看，好呀，半仓苞萝。真是喜出望外，大家高兴极了，天不饿死人呀。就此住下，白天上山隐蔽，晚上回蓬烧苞萝子吃。同时商议去闽北，已有足够的干粮了。但去闽北路线都不熟悉，只高信全同志一人去过闽北，可他反对去闽北。我和曹景恒同志说："你不去，我们到黄沙地方找同志带路。"到晚上我们出发，又找老高同志，说一起走吧。他坚持不去，在这种情况下，好吧，你不去，请把你短枪交出来……我们走。这样把他的枪拿下来了。当晚我们到黄沙找到党员同志一问，他告诉我们现在浦江公路敌人警戒很严，不能通过，要去也得过一时期再说。就这样，第二天晚上我们只得再回苞萝蓬，另作打算。而高信全也身不由己地回到这里，又同我们会合。我们一起到毛洋、兰花蓬（这里是坑口老三同志的苞萝山），在那里等老三同志上蓬来，要他转告毛洋杨斋南同志搞点米来。当晚，老三与杨斋南同志及毛洋另一个党员（姓郑）背来一百多斤米。于是，我们与斋南等同志讨论了如何去闽北向组织汇报李、洪两同志牺牲及二纵队受挫折的情况。要求斋南他们给我们带路（他们去过闽北）。谁知高信全又一次提出："你们分十斤米给我，让我去龙泉城挑水卖。"他还说："老三同志，请把你叔叔（在龙泉城卖水）叫回来带我去"等等。我和曹景恒同志严厉批评他："米一粒不能给

你，你身为县委书记，不但不同我们研究怎样回闽北。相反，却想逃跑、搞分裂，去龙泉城里挑水卖，这是企图投敌。”我们针锋相对地对他声明：“枪是用同志们的鲜血换来的，不准带走，把你的枪交出来。”于是，又解除他的武装。这时，站在一旁的斋南等同志也严肃批评高信全。他们说：“洪政委刚死，骨头还未凉，你就吵着分粮食，老高，太不应该了。你们要团结一致，在这儿隐蔽。粮食吃完了，我们会设法送来，以后设法去闽北。”听了这话，高信全才不响了。

就这样我们在这里住了十来天（三六年五月间），斋南同志来报告说：“昨晚上支队长余龙贵、大队长黄发田（黄后已逃跑在浦城县古楼敌炮台里去了）等带着十几位同志回来了，我将他们安置在西坑岭山蓬隐蔽休息。”这时我们两处集中在一起（共二十余人）正研究了抓地主、筹集部队经费的部署，准备行动。一天清晨，哨兵向我们报告：“坑口背后敌人碉堡烧着了。”我们一致肯定，是自己队伍来了，老百姓是不敢烧敌碉堡的。到了十点多钟，毛洋斋南同志赶来说：“闽北广浦独立营叶营长带部队来了。”我们兴奋极了，立即下山与叶营长会合。但高信全抢先下山，向叶营长报告我们解除了他的武装。部队在毛洋宿营，由叶营长召集我们几个人当晚开了一个团结会。最后，叶营长在会上说：“我们在闽北，从报纸上看到李、洪同志牺牲的消息，省委派我们赶快来毛洋收容二纵队的同志。现在你们二十几位同志要团结一致，完成你们纵队长、政委未完成的任务！不要吵了，谁是谁非，到闽北去解决。”

第二天，我们随广浦独立营向龙泉的高山、东坑桥一带活动。经过青草洋，准备到岙头山（庙）去休息。部队向四方派出侦察员。九点多，青云山方向侦察员回来报告，发现敌人一个连，向岙头山前进。叶营长说：“各部队照原计划进入阵地”，准备伏击敌人。正在这时，我们来路留下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青草洋也来了股敌人，约一个连”。叶营长叫侦察员，要大队长调一个排占领观音堂（小庙）阻击来路敌人。同时叫：“司号员，吹号问他们是哪一部

分。"对方也吹号："回答是挺进师师部。"这时，叶营长赶紧叫侦察员跑步向师长报告情况。这时，正面的伏击打响了，挺进师师部也吹起冲锋号，跑步前进，与独立营两路夹击。全歼闽保安团一个连，生俘排长以下官兵三十余人。独立营与粟裕、许信焜等首长胜利会师。部队决定在吞头山宿营。为了庆祝胜利会师，当天下午去半岭（离庙上五里地）买回一口大肥猪。粟司令员说："我们在国民党《东南日报》上看到二纵队与敌人战斗的消息，知道二纵队还在浙西南"。

第二天从吞头山出发，经溪头到达塘上宿营。独立营叶营长向粟司令员、许信焜等首长告别，仍回闽北去了。我们随粟裕、许信焜首长回浙南，当时闽浙省委活动在瑞（安）平（阳）地区。

##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一九三六年六月，省委书记刘英召开省委会议，决定恢复二纵队建制，调赵春和（后来带枪逃跑）任纵队长、张文碧任政委、张友焜（友焜后来逃跑了）任政治部主任。同时，调许信焜同志任浙西南特委书记，会议结束，二纵队在粟司令员率领下，回浙西南活动。主要任务：是在部队帮助下打掉驻在当地的反动地方武装和反动地主的土围子。所以部队到达浙西南，首先就把住溪敌人的据点拔掉。接着打掉了浦城县白岩的反动地主（伪保长）的土围子。回到毛洋，并在毛洋宣布恢复龙浦和龙遂两个县委。龙遂县委由曾友昔任书记。下设两个区委，由"矮子"担任住（溪）（碧）龙区委书记；由刘继海任王村口区委书记。龙浦县委书记由宣恩金担任，下设两区委，即大北区和小北区委．曹景恒同志任小北区委书记。龙浦县委设在大北区（即浦城县的背头村），因此，区委书记由我兼任。

根据当时闽浙省委决定，二纵队在粟（裕）司令员领导下，完成了帮助浙西南特委拔掉当地反动地方武装据点之后。二纵队留下一个大队（实际是一个排），组成肃反工作队随特委机关行动，在特委

书记许信焜领导下，配合开展地方工作。二纵队随粟司令员转战宣平、武义、永康、缙云等一带活动，然后再转回闽浙省委。

由于当时两广军队联合反蒋，即两广事变以及相继的东北西北两军联合反对内战，逼蒋抗日，即著名的西安事变。在这段时期（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二、三月）浙西南地区的正规军他调，只有一些地方保安队。但在我军袭击下，据守城池。大片的乡村都在我们手里。这就使我们浙西南地区工作得以一个发展机会，尚且发展很快，不仅巩固恢复龙浦、龙遂两县的工作，而且迅速扩大江浦地区——浦城县的海溪至江山县的周村东坑一带的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因此特委决定成立江（山）浦（城）县委，调我（因这一带地区是我曾打游击活动过）任县委书记，（县委机关设在浦城县的山岱岩地方）调肖国标同志为县委组织部长，调张麒麟接我龙浦县委书记职务。

这时我们整个浙西南地区，大小村庄，有党的支部或党小组，或者有群众组织贫农团，在单家独户的山蓬里也有我们个别党员关系和群众关系。这样，使后来敌人所谓"八个月（一九三七年三月～一九三七年十月）围剿进攻时，成了不可摧毁的力量。龙浦、龙遂两个县委书记张麒麟、曾友昔（龙遂县委书记）二同志，以及全体同志和曹景恒同志带来的一部分二纵队的同志们，一直坚持在浦城毛洋、隘上桥、福青山（庙）、浦城坑、杨梅滩、刘坑、西坑岭头、碧龙、叶岭头等等地方，在这一带党员群众团结一致，在敌人严密封锁，外出搜查下，仍设法为县委同志和红军送粮、送盐、保存我们一部分红军力量。

在这段时期工作的经验教训：一是注意加强山里的工作，开展较普遍，但对平原城镇工作开展不够，很薄弱，有的只有个别党的关系。如住溪、浦城县属的高桥等。对于龙泉八都镇和浦城的仙阳等公路沿线，村庄、市镇就没有我们的工作，因此，消息很不灵通。如这次敌人八个月的进攻，当时，只知道，闽浙赣皖四省"剿匪总指挥部"迁驻江山县城。但具体的敌人兵力部署都不大清楚，肃反

工作队到松阳周际活动与敌人打响才知道敌人开始进攻了。二是大胆提拔使用当地干部不够，有些区委没有一个当地干部，有的区委虽然有当地干部，但都是一九三五年搞分配清苗斗争的老干部，面目都很红了，群众都知他当过红军，行动也不方便了。平源的城镇工作开展不够，也是原因之一。这是一个损失，失去了时机。以上两点是个教训。

这次敌人进攻是在西安事变之后，谁知蒋介石在西安亲口答应接受张(学良)、杨(虎成)二将军和西北人民要求"立即停止进攻红军，联共抗日"的要求，被释放回到南京，立刻翻脸不认帐，撕毁诺言，调兵遣将，纠集八个师的兵力，大举进攻浙南和浙西南红军挺进师。

这次敌人围剿进攻的特点，在战略上是采取：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大包围，各路都有纵深的配备，以五十二师及闽保第二、第四团和第九师首先散布于闽浙边，构成一条七百华里的封锁线，并构筑相当坚固的碉堡(群众称乌龟壳)工事防守。他们计划实力布置，在刘建绪亲自指挥下，首先把兵力布置于江山(剿匪总指挥的驻地)、衢州、龙游、汤溪、武义、宣平、缙云、丽水、青田、永加一线，企图由北向南，把我们直逼到闽浙边，协同由西向东进攻之敌及困守闽浙边封锁线上之敌企图夹击，把我们消灭。于是西线之敌布置：有新三师、五十六师、江西保安团和福建保安团，从江浦公路(江山至浦城县公路)以及松溪、庆元政和方面之敌由西向东，向我们压过来，又以独立第九旅、第二旅及浙保安团、保安大队、独立营等，首先布置在龙泉、遂昌、松阳、云和以及大港头、碧湖一线，封锁欧江，盘查来往行人，将所有民船每天到下午三点钟就集中派兵看守了。

在政治上，国民党利用反动的乡保长、地主和反动富农，强迫群众组织"剿共义勇队"，"壮丁队"，并实行移民并村(把乡村群众集中搬进敌人据点附近地方住)，烧杀政策(把山头山尾房子和茅蓬统统烧光)群众上山干农活均受反动哨兵搜查。这样，我们红军粮

食和其他食物全部断绝。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到处大造谣言说："朱毛红军已投降了，为了打日本，先要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等等。同时颁发了所谓"通红军者，为红军送粮送消息者，知红军不抓者，捉杀不赦"等等十条"罪状"，还颁发所谓"奖赏条例"，其中有一条，捉到红军首领或杀死红军首领，只要拿到他的头来就赏五百大洋（银洋），捉到一个红军赏五十大洋等等……，更加毒辣的是组织所谓："五户联保"，（即一户通红军，五户同罪）。还有什么，叫"五十步一哨，三百步一个班"，并构筑有碉堡、工事。他们以为在强大的军事进攻和政治上宣传欺骗，就可把我们这支红军消灭于闽浙边了。蒋介石也说：有这样大的军事力量，又组织了那么多的"剿共义勇队"、"壮丁队"，共产党和红军均全部消灭干净。但他们没有想到所谓那些"剿共义勇队"、"壮丁队"是被迫组织起来的，除了少数个别死心塌地的反动分子外，多数人还是心向共产党和红军的。

闽浙省委根据当时敌我（当时红军不到二千人）力量的情况，认为部队集中行动实属不利，于是除了各地区留下少数武装坚持游击基本地区进行持久的顽强的斗争外，其余大部队都出击在敌后翼侧活动，采取时而集中打击敌人，时而分散活动，这样使敌人企图消灭我军于闽浙边的计划完全归于失败。

我们闽浙省委和闽浙军区，在正当敌人大举进攻之时，曾数次发出呼吁代电（快邮），要求"停止进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双方派出代表到温州举行谈判，并邀请各界先进民主人士参加。但国民党为了欺骗人民，表示愿与我方和平谈判，派出代表到温州，另一面却在暗中又大搞阴谋诡计，蒋介石给刘建绪"停抚进剿"的手令，这样使和谈破裂。我方代表绕道安全归来。此时以后，我们省委和军区首长，为了揭穿敌人阴谋破坏和谈，继续发出"为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和谈破裂告各界人民书"。发出呼吁各界人士要求"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同时发出"和谈通电"，立即再行谈判。这时蒋介石才知道不象刘建绪报告那样红军消灭了，只是

"残匪"在流串……。因此蒋介石给刘建绪以谎报军情责备处分、

## 将计就计牵制打击敌人

敌人进攻浙西南开始是一九三七年二月，特委书记许信焜率领肃反工作队到松阳(现改为遂昌县)周际地方活动，过春节那一天敌人来进攻，当即与敌激战，由于敌众我寡，撤出战斗，但敌人以一个营的兵力，一直跟踪追击到江（山）浦（城）地区。当我们肃反工作队进到洪观鼎宿营，当晚遭尾随之敌夜袭，我们肃反工作队，被打成两路（一个班哨失去联络）撤出战斗，向大阳山转移。

当时根据敌人来势凶猛，以一个营的兵力跟踪追击，从松阳连续跟踪三四天，到达江遂边境，是少有的。因此我们来一个将计就计，向外出击，把这股敌人拖出去，这样，可以减轻敌人对根据地的压力。为此，特委书记许信焜同志决定：江浦县委留下肖国标同志，就地收容失去联络同志（一个班哨），把他们带回到龙浦县委张麒麟同志那里去。宣恩金同志随肃反工作队一起行动。就这样，肃反工作队在许信焜率领下，向外出击，深入敌后，打击牵制敌人，并与浙南省委取得联系。

我们肃反工作队在特委书记许信焜同志率领下，经龙游、遂昌边境，直奔袭汤溪县之塔石镇，然后转战宣平、丽水、缙云等县境，横渡欧江下游，向瑞（安）平（阳）地区前进。在瑞安县之李山地方与原二纵队长赵春和、谢文清率领二纵队会师。谢转达省委书记刘英同志指示："要二纵队立即回浙西南，向江山、衢州活动，打击牵制敌人，减轻浙南地区的压力。"当天在此宿营，改编二纵队，即将原二纵队一分为两：一部分由谢文清同志率领在此地区一带活动；肃反工作队和原二纵队合编为二纵队，纵队长仍由赵春和担任，政委由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焜兼任，杨干凡为纵队政治部主任。下设两个大队，即肃反工作队为第一大队，我为大队政委；原二纵队一部分为第二大队，曹景恒同志为二大队政委。改编就绪

后，第二天立即向浙西南地区方向挺进。但我们二纵队，进到青田县之桃垄附近宿营，第二天上午九、十点钟光景，就与敌人一个营的兵力遭遇战打响了，由于敌人的兵力占优势，我们处在劣势。但我们抢先占领优势的阵地（我们部队正到岭上了），边打边撤，撤到青田县之徐村，正抢占徐村对面高岭时，特委书记许信焜同志受伤，但仍坚持指挥部队掩护。这时我也受了伤。

这次遭遇战，我们且战且退，整整打了一天，到达青田县徐村，敌人也不敢再追了。因为我们已占领徐村对面的制高点，封锁一座石拱桥。这时我们部队才从容地向瑞景青地区(这里有我们的区委书记，据说是陈××，但未见过面)进发，到达李庄烧晚饭吃，当晚继向叶山前进，因我双脚伤势较重，寄放在叶山，当即把我转移到岭后村的山脚下炭蓬里程宝抗同志家里养伤。部队在纵队长赵春和、杨子凡、曹景恒等同志率领下，继续向浙西南进发，完成闽浙省委交给二纵队牵制敌人的任务。

我们部队走后不久，叶山一带的环境不断恶化，敌人进攻，到处搜山，无故乱抓群众，严刑拷打逼供，追问红军去向。叶山有个党员(名忘记了)几次被敌人抓去拷打逼供，追问红军。开始把老头抓去，追问不出，后又抓他儿子、媳妇拷打，他们始终坚强不屈。最后，他家里被敌人抢劫一空，没有半句怨言，而且仍关心我们红军的生活和安全。后来敌人撤退了，我的伤口也痊愈了。我住的东家老程同志，到叶山找这个党员同志说："现在红军同志的伤好了，但没有得吃呀。"他马上答应说："同志没有吃，我家还有点山芋干你带去，他的生活安全一定要保护好。"后来我做了一些笠棚（雨具），由东家拿去换米或山芋干，毛竹都是叶山这个党员同志家里提供的。

我在岭后山脚下炭蓬程宝抗同志家养伤，从三月至九月间。一天老程同志到岭后卖笠棚，见浙南一支红军路过，到李庄休息吃中饭。他急忙赶回家说："你们红军来了，在李庄吃中饭……。"我和老程同志赶到李庄，原来是范联辉和贵溪佬二同志带领的一支部

队。先安排老程同志回家，我就随范联辉同志一起行动了。连续走了两三天之后，我的伤口发炎红肿了。本来想到三溪附近，把我留在那个村子党支部的，但到了该地党支部遭到敌人破坏，党员和群众都逃到山上去了。同时三溪已驻了兵，不能渡江去浙南省委了。要另选择渡口，并要准备战斗。在这种情况下范同志找我商量，要把我交给在途中带回的一个伪保长（名字忘记了）。他是大学乡（现改为文成县）朱山村人，他家三兄弟都分了家。当晚范同志找这个伪保长谈话说：我有一个红军战士，不能走了，交你带回家治疗，过几天派人来接回部队……。这个保长说："我一定保证安全，接着写了保证书交给范同志。就这样，伪保长把我连夜背到家里。先进房子看看有无外人。他和他老大出来把我扶进老大家楼上（我有一双象牙筷子，放烟囱背后），住了几天脚红肿退了，再转移到后面山上他侄儿家里（是个田铺）住了近一个月左右。同年十月间闽浙省委书记刘英同志派交通员到朱山伪保长家，把我接回省委去了。

后来知道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焜和傅振军二同志也曾在叶山养伤。在敌人进攻时离开叶山，去浙西南找部队，到龙泉县的跳鱼坑休息，被岭根乡的下笨一个反动富农发觉，报告敌人在敌军袭击中，中弹牺牲。

另外二纵队在纵队长赵春和、政委杨于凡、及曹景恒同志率领下，离开叶山后，一路上也打得很艰苦，当部队进到庆元县和龙泉交界的凤凰山（庙）宿营时，又遭尾随敌军袭击，政委杨于凡同志在这次战斗中牺牲。最后，经过顽强战斗，终于撤出重围，回到浙西南地区与张麒麟同志会合，由于敌人五十二师进攻，采用前堵、后追的战术不能集中行动，因而随即就分开行动。张仍留在原地区领导群众坚持斗争。二纵队由赵春和、曹景恒率领下，继续向江、衢地区活动。但当部队进到江浦地区——洪观鼎、大阳山一带，纵队长赵春和发生动摇，抛弃部队，带枪逃跑了，同志们见领导逃跑了，战士们的思想产生混乱。损失甚大。曹景恒同志一人无法控

制，即派同志向张麒麟同志报告，张闻讯，立即冒险冲出敌人封锁线（浦城县海溪——遂昌县的观音岩），赶到大阳山。当同志们看到张麒麟到来时，思想情绪表示高兴起来，后经过说服教育，多数同志表示要继续战斗下去！对少数个别的，经教育仍坚持不干的交回武器，发路费回家，随后同志们都跟张、曹两同志回到毛洋、西坑岭、刘坑、叶岭头一带分散活动，集中打击敌人。二纵队及龙浦、龙遂等县委的同志们在张麒麟、曹景恒、傅振军、曾友昔等同志领导下，一直坚持到一九三七年十月和谈成功，全体同志回到浙南平阳北港集中。

## 奠定了党在浙西南的基础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特别是"八·一三"，日寇从宝山县金山卫登陆进攻上海，南京、杭州相继沦陷，人民失业、失学，怨声载道，愤激当局不抵抗，国民党当局在全体军民愤激压力之下，不得不责令四省"剿匪"总指挥部刘建绪派代表来温要求同闽浙边省委举行第二次和平谈判，我方派吴毓同志为代表与之谈判。国民党当局是一个"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家伙"，第一次我们要求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进行和平谈判，可国民党想利用和谈把我们消灭，使谈判破裂。这次他那种傲慢的神气没有了，乖乖地接受我方提出一切要求，都一一允许，并再三恳求，停止军事行动（因我各地区游击队、出击非常活跃），1937年8月双方在温州签订和平谈判协定。我军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先后陆续集中平阳北港三门街集训待命。当时主要力量集中用在举办党训班，恢复各地工作，加紧部队教育训练，同时创办救亡干部学校，由粟裕同志任校长，学生毕业后分赴各地组织救亡团体，教育群众。

浙西南特委和挺进师第二纵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领导着浙西南全体同志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区域和工作地区，巩固与加强党的组织和领导，保存了有生力量，灵活地运用了党的政策和策略路

线，争取了在自己区域内的各阶层大多数人们的同情和拥护，在行动上表现自己顽强和英勇，战胜了敌八个月凶残的大举进攻，奠定了党在浙西南以至闽浙边后来斗争的良好基础。在八个月的斗争中，从领导工作上，红军行动上，有如下经验教训。

1.浙西南党的工作发展限于偏僻狭小地区，没有发展到宽广的平原和城乡镇上去，这不仅是与各基点的联络没有迅速打通，而且自己对外消息也很闭塞。如这次敌人进攻，兵力部署，开始都不太清楚，这对整个工作的指导和布置都是一个极大损失。

2.浙西南的工作和斗争，虽经过三年之久，工作地区纵横将近五百华里，但大胆提拔培养当地工农干部是很差的，这对我们工作和斗争都是一个极大损失。这也是工作没有扩展到平原市镇上去的原因之一。

3.在敌人进攻之时，特委率领肃反工作队去浙南找省委请示汇报工作。今天回顾起来是个缺点，因为对浙西南几个县委工作没有部署好，当时只是交代要江浦县委组织部长肖国标同志转告张麒麟（龙浦县委书记）同志，特委去找省委，部队注意分散隐蔽，结果江浦地区工作无人领导了；二是特委虽然找到了二纵队得到省委指示：要立刻返回浙西南地区，特别加强对江衢地区活动，打击钳制敌人，但二纵队返回途中，后沿途战斗，特委书记许信焜同志、政治部主任杨于凡同志牺牲。纵队长赵春和在敌人进攻时又动摇，带一支短枪逃跑了。所以许、杨牺牲，对浙西南整个工作是个极大损失，也是一个血的教训。

我们第二纵队，在这次国民党蒋介石的残酷进攻下，虽然受到一些挫浙，但仍然巍然不动，坚持在浙西南这块土地上！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趁敌不意，打击歼灭敌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给养补充自己，完成了闽浙临时省委交给二纵队的任务。同时，粟裕、谢文清两同志率领一支部队，从浙南出击，转战到宣（平）遂（昌）汤（溪）边界活动，即宣平（现改柳城区）子坑、和尚殿、汤溪（现为金华县）银坑、池都坑、遂昌门阵、坑口、坞英坑等一

带地区活动，创造了新根据地，建立了党的组织，成立了宣遂汤边区工作委员会，调赖德标任工委书记（一九四三年动摇逃跑了）。

浙西南的党和第二纵队，在闽浙省委和军区领导下，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经受了国民党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历次围剿进攻，红军不被消灭，而且巍然不同，坚持在这块土地上，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出发阵地之一。浙西南人民，尤其是龙遂浦地区人民群众和我们红军结成了同甘共苦的血肉关系，特别是在国民党派兵残酷围剿进攻的岁月里，无所畏惧，把每个红军战士看作亲生儿女，兄弟姐妹一样爱护，千方百计地支援帮助红军。象这样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不胜枚举，使我终身难忘！

他们为了党，为了革命的胜利，热爱每个红军战士，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摧残和杀害，他们无论在监狱里、刑场上，始终抱着头可断、血可流，革命志气不可丢的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英勇就义。烈士们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我们二纵队在张麒麟、傅振军、曹景恒、曾有昔等同志率领下，浩浩荡荡开往浙江平阳县北港、风门、三门一带集结待命，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于一九三七年冬三八年初，我们红军挺进师各部队，在粟裕同志率领下，经遂昌县开赴皖南茂县整编新四军东进抗日。

回忆闽浙皖赣苏区
方志敏　邵式平　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625　字数 47万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7110·447　定价：1.68元

**历史知识丛书**

汉武帝
晋文公
隋炀帝
班超

唐僧取经
解缙及其传说
千古奇冤——皖南事变始末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史话

伟大的会师（即出）
不平等条约史话（即出）
爱国者传（即出）
反帝爱国斗争故事（即出）

责任编辑：吉　匡
封面设计：邱右先

统一书号：7110·447
定　　价：1.68 元
（内 部 发 行）